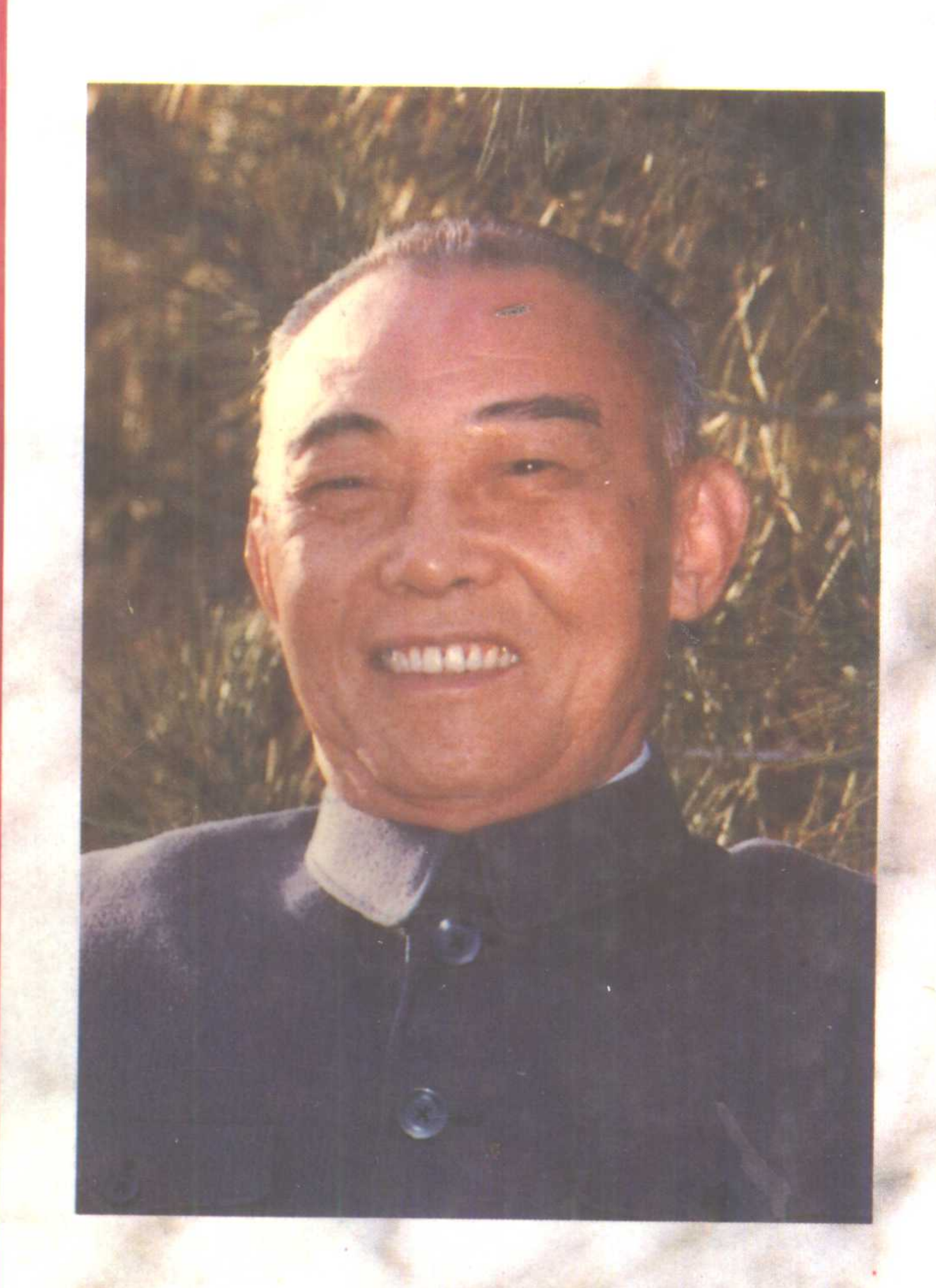
江渭清回忆录



七十年征程

江苏人民出版社

七十年征程

江渭清回忆录

江苏人民出版社

书　　名　七十年征程——江渭清回忆录
著　　者　江渭清
责任编辑　王　楠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南京中央路165号
邮政编码　210009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南京五四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　　张　19.125　插页12
印　　数　1—5130册
字　　数　383千字
版　　次　1996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214—01757—1/K・249
定　　价　(软精)35.00元
(江苏人民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江渭清



1. 1956 年 1 月，毛泽东视察江苏，与江渭清亲切交谈



2. 1961 年周恩来视察江苏，与江渭清等合影，右二为曾希圣

3. 1958 年朱德在江渭清等陪同下视察江苏

2

3



4

4. 1983 年邓小平视察江苏，与江渭清亲切交谈

5. 1980 年胡耀邦视察江苏，与江渭清等合影

5



6

6. 1978 年叶剑英在北京与江渭清合影

7. 1978 年李先念在北京与江渭清合影

7

8

8. 1986年陈云视察江苏，与江渭清等合影

9. 1983年彭真在上海与江渭清合影

9

10

10. 1991 年江泽民视察江苏，与江渭清亲切交谈

11. 1990 年 7 月，乔石视察江苏，与江渭清合影

11



12. 1965年越南胡志明主席访问江苏，与江渭清等合影，右二为伍修权

13. 1991年10月，朝鲜金日成主席在江泽民总书记陪同下访问江苏，与江渭清亲切交谈

12

13

14



14. 1966 年 5 月，江渭清会见来江苏参观的李宗仁先生

15. 1986 年 5 月，薄一波在上海与江渭清合影

16. 1977 年 10 月，谭震林出席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 50 周年纪念大会，与江渭清摄于江西泰和机场飞机上

15



16

17



17. 1955年傅秋涛（左）、陈士榘（右）和江渭清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礼时留影

18. 1958年江渭清在南京与群众一起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

18

19



19. 1976 年江渭清在江西南昌参加农业生产劳动

20. 1977 年，李志民（左一）、朱绍清（左二）、江渭清（右三）等参观福州军区雷锋式的军医陈大新同志事迹展览

20

21. 1980年江渭清率江西省经济友好访问团访问日本，摄于东京

22. 1980年江渭清率我国党的工作者代表团访问罗马尼亚，摄于布加勒斯特

21

22



23

23. 1941年江渭清（第二排右三）从“皖南事变”中突围来到苏南抗日根据地，与新四军十六旅部分同志合影

24. 1943年，王必成（右，新四军十六旅旅长）、吴仲超（中，苏南区行政公署副主任）与江渭清（十六旅政委、苏皖区党委书记、苏南区行政公署主任）合影



24

25



25. 1948年4～5月间，朱德（前排中）代表中共中央出席华东野战军在河南濮阳地区召开的前委扩大会议，与部分领导干部合影。前排左六为陈毅，左四为粟裕，陈毅后左为江渭清



26



27

26. 摄于抗日战争时期的 1939 年

27. 1979 年，摄于江西庐山

28. 1983 年，摄于江苏常州

28



29

30

29. 1950年江渭清全家合影。母亲卓咏贞(右二),妻子徐敏(左一),儿子江旅安(右一),女儿江海滨(左二)

30. 江渭清与徐敏摄于1960年



31

31. 1989 年，江渭清在题词

32. 江渭清手迹一帧

时局风云几度迁
坚持苦战整三年
光辉业绩千千万
八省群英谱史篇

参加讨论编纂南方八省健儿坚持三年游击战争丛书即席赋诗一首

九八八年三月于北京

32

代　　序

张云

顷接江渭清同志来信，得知他的回忆录即将成书，至为高兴。渭清同志从繁重的领导工作岗位上退下来后，勤不辍笔，孜孜以求，终于有了丰硕的成果，这是他长期从事军队工作和地方工作的真实写照。渭清同志约我为之作序，实属勉为其难，但我们不仅是出身湖南平江的同乡，也是风雨同舟、并肩战斗半个多世纪的战友，我乐于为其回忆录的问世讲几句话。

渭清同志迄今已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了整整70个春秋，几乎经历了我们党领导的所有革命历史时期。1926年春天，第一次国共合作发动的大革命达到高潮，高举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大旗的北伐军进入平江，当地许多工农群众卷入了大革命

的洪流。渭清同志那时年方15岁，风华正茂，满腔热情地投身革命。大革命失败后，他坚决响应党在“八七”会议上发出的号召，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同许多战友一道拿起武器，在湘鄂赣边投入了土地革命战争；主力红军长征后，他留在原地，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坚持三年游击战争。抗日战争时期，他作为新四军的一名指挥员，先是率部战斗在苏南、皖南，“皖南事变”突围出来后，又转战在苏南、苏北，抗击敌寇。解放战争中，他参加了苏中战役、涟水保卫战、莱芜战役、孟良崮歼灭战、豫东战役和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等著名战斗、战役。他军政兼优，智勇双全，身经百战，屡建战功。他八次负伤，打断了腿，一直未影响工作。逐步从一名普通战士，成长为我军一位出色的军事指挥员和政治工作领导者，担任过团长、旅长、纵队政委和兵团副政委等重要领导职务，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立下了卓著的功劳。

新中国成立以后，渭清同志即转到地方工作，长期担任江苏省委的重要领导职务，也曾兼任过南京军区政委。他在任期间，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遵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密切联系群众，深入调查研究，努力把党的方针政策与本地的实际结

合起来，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为推进江苏的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他是党的许多重大事件的参与者和见证人。十年动乱中，他和党内许多老同志一样，经受了磨难和考验，面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倒行逆施，他坚持党性原则，刚正不阿，与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文化大革命”后期，在中央的关心下，他得以“解放”，担任江西省委书记，兼任福州军区政委。80年代初，他响应中央的号召，主动要求从第一线退下来，担任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后来他定居江苏，照他自己的说法是“江苏的一名普通公民”。他虽以“普通公民”自居，仍时刻关心着党、国家和人民的命运，以极大的热情支持地方领导的工作，不时提出有益的建议。

渭清同志在他70年不平凡的革命生涯中，经受了战争烽火的考验，也经受了各种复杂环境的磨练；他不论境遇顺逆，不计个人荣辱，对党对共产主义始终忠贞不渝。正是这一坚定信念，支持着渭清同志永远乐观向上，百折不挠，老而弥坚，奋斗不息。长期的革命经历，使渭清同志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现在通过回忆录的形式记录下来，留给后人，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们党的斗争历程。牢记过去，是为了开创未来。我

们党历来重视以史育人，以史为鉴。党的三代领导核心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同志都曾强调，我们要用历史教育青年，教育人民。我相信，渭清回忆录的出版，对于帮助人们特别是青少年了解党的历史，了解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光辉革命历程，继承和发扬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一定会大有裨益。

目　　录

下 卷

七 十 年 征 程

——江渭清回忆录

上 卷

（1925—1949.4.）

第一章　北伐洪流

一　农民家庭

1910年11月16日，我出生在湖南省平江县秀水乡余家洞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旧时为孩子立名讲究生辰八字，这在穷乡僻壤更是如此。同族长辈不知依何为据，定说伢儿命中缺水，故父亲替我取名“渭清”。这么一来，我的祖籍、名姓、衣胞地都与水字结了缘。

平江位于湖南省东北角，是湘鄂赣三省的交通要冲，为历来兵家必争之地。境内山丘起伏，江河纵横，战国时代中华民族杰出的爱国诗人、楚大夫屈原，抱着亡国之痛自沉汨罗江，这条汨罗江就是由东向西穿越平江全境而流入洞庭湖的。但平江称县在公元9世纪之后。原名昌江县，因境内与汨罗江交汇的另有一条比较大的江叫昌江，在唐朝即以昌江为县名。昌江有数十里河床宽阔，水流平缓，到五代始改昌江县为平江县，到如今也已有上千年的历史了。然而在旧时代，不管怎么称呼，没有哪年哪月能让老百姓们感到过

昌盛发达、太平安宁。我家祖辈以农为业。祖父是贫农，靠种田维持生计。到了父亲江载文这一辈，自己家里有了20几亩薄田，加上再租种人家一些田，成了中农。置下这么一点田地，真不知耗去了祖父和父辈们多少血泪、汗水。江家虽不富裕，可人丁兴旺，父亲弟兄二人排行最小，加上叔父及其子女，一户竟有20来口人，真是个大家庭。我们和叔父家长年生活在一起，这样平均下来每人才只有一亩几分田。好在老老小小都能团结和睦、勤俭度日，艰难的家境中也有温暖和乐趣。我的父亲是个非常忠厚老实、正直善良的农民，他很疼爱自己的孩子，待邻里乡亲也热情谦恭、与世无争。母亲卓diff咏贞，更是朴实慈祥，达理通情，擅长持家，因而父母在当地乡村颇受人们尊敬。他俩的做人处世之道，有形无形地启迪着儿女们，良好的家教家风甚至影响了我们的一生。

山区农民生活是贫苦的，人多田少的家庭日子更难过。为维持生计，父辈们在离家不远的山坡上又开出几亩荒地，种上茶树。每到冬闲，父亲还带着我的两个哥哥去窑上帮工挑木炭，将百十斤的炭担子挑至邻县湘阴新市街镇上去卖，两天一个来回，步行130余里，每人一趟才得三角苦力钱。到了夏忙时，他们又北上洞庭湖打短工，帮富户人家割稻子，三个强劳力起早摸黑累弯了腰干十天，可得三元几角钱。我当时还小，看见归来的父兄拖着疲竭的步子跨进家门时，就高兴地嚷着要买糖辣椒、豆腐花吃，虽然只消几个铜板，这已是农家孩子最奢侈的零食了。父亲总是会满足孩子愿望的，因我毕竟是他最小的一个儿子。他们年复一年地抽

空外出打短工，攒几个钱贴补家用。在当时五角钱就可买一石稻子(出70斤糙米)，三个人苦上十天八天能有三四元钱到手，这对横竖苦惯了的庄稼汉来说，已是一笔可观的收入，除此又有什么法子？

平江西乡农户多以种稻谷为主，只在山地上种些杂粮。但我清楚地记得，儿时家中一年三百六十天，多用山芋掺米做饭，只有过年过节才能见到一点荤腥，吃上一顿纯米饭，长年吃山芋，铁锅里只下少量的米。时间久了，我的肚子胀得像小鼓，每到吃饭就盯着碗发愁，母亲总是默默地将我碗中的山芋拨到自己碗里，再到锅里给我添上一点米饭。父亲看在眼里多半不吱声，有时气我不懂事，才会用中指关节在我头顶轻轻地敲一下。母亲和哥哥、姐姐都袒护迁就我。

同是农户也分三六九等。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三座大山压在人民头上。在农村，贫雇农被压在最底层。土豪劣绅、贪官污吏，恣意欺压剥削，许多贫雇农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加之南北军阀混战不止，在我出生后的十多年里，湖广只要有战事，平江总是首当其冲，北去南来、你进他出，拉伕派款、烧杀淫掠，到头来遭灾受罪的还是贫苦农民、普通百姓。社会昏天黑地，农民苦不堪言，当时家乡流传一首民谣："吃的菌(即红薯，亦称山芋)拌菜，穿的露见背，睡在门板上，冬天抱秆盖。"在死亡线上挣扎的贫苦农民，急切地期待着火种，盼望着有朝一日彻底改变这不公平的社会。

二 文化启蒙

我出生在冬天，月份小，1919 年实龄 8 周岁。

那年秋天，我穿着一身干净衣服，背着书包，高高兴兴地走出家门，上学去了。父亲没有读过书，受尽不识字的罪，深知穷人如不想方设法读一点书识一点字，那只有更加受人欺，遭人压。他与叔伯、婶婶们再三商量，大家咬咬牙才下了送我上学的决心。

我上的是初小，学校离家有四五里路，是一座旧祠堂改建的。几十个学生来自附近几个村庄，多半家境比较好。当地人姓江的很多，同学中同姓的就有好几个。学费很贵，每个学期要缴七块现大洋。我知道要筹措这笔钱，对一个贫苦农民家庭需付出何等的代价，父兄们不计寒暑帮工挑炭、割稻的身影时常在我脑海里映现，我不敢浪费半寸光阴，拼命刻苦读书。路远的学生中午在校代饭。我怕回家吃饭，耽误自学时间，也在学校代饭。虽然还是大半山芋少量米，也满足了，再不像几年前在家中盯着碗犯愁，毕竟又大几岁懂事多了。

我入学那年适逢“五四”运动，反帝反封建、提倡新文化的浪潮方兴未艾，我家在平江西面的偏远山区，也多少受到这股浪潮的影响。平江县城里一些进步知识分子和工商界人士曾组织起数千人的爱国游行示威。从那时起，隐隐约约

听到了许多陌生新鲜的名词，什么“巴黎和会”、“不平等条约”；什么“打倒卖国贼”、“抵制日货”等等。虽然还不明白其中的含义，但总感到那些年龄比我大得多的“大人”，不像碰上兵荒马乱那样惶恐不安，反倒显出新奇和激动，我似懂非懂，暗暗萌发了是不是世道要变的念头。

那个年头的乡村学校很怪，四处传着要搞新文化，但用的仍是旧课本，新旧交替的教育变革十分艰难缓慢。可以说，我最初的文化启蒙就是读了那三年初小，先是学“人、手、足、马、牛、羊”，再吟《百家姓》、《三字经》、《弟子规》、《增广贤文》、《朱子治家格言》等，后来又陆陆续续读《论语》、《孟子》、《中庸》等书，读了三年初小，也没有见一本新课本。而旧课本，开始还容易念，渐渐就艰深了，初学“四书”“五经”已很吃力，加上教书先生一副阴冷面孔，一把沉甸甸的戒尺，哪能不令学生望而生畏？所以当年有许多孩子惧怕进学堂，尤其是些富家子弟，养尊处优，生性懒散，更怕读书；倒是穷孩子读书用功。我每学期成绩都第一，老师对我是另眼相看的，没有挨过骂，更没有挨过戒尺打。父母亲见我肯上进，更感到莫大安慰，总算不负苦心。

回想上初小读书距今已有70多年了，至今我仍能背得出那时念过的有些课文，印象最深的要数内容包罗万象的《三字经》。比较而言，这本启蒙教材最通俗易懂，有韵脚，读来琅琅上口，极便于记忆；千余字中融历史、地理、气象、天文、诗书礼乐、人物风采等知识于一体，类似一部小百科全书。传说《三字经》原作者是南宋著名学者王应麟，亦有人说是区适子，而我学的已是民国初年的重订本，在民间流传很

广。无论哪种版本的《三字经》，都有不少封建糟粕的东西，那是显而易见的；同时也应当承认，作为普及文化知识的一种手段和形式，《三字经》对于启蒙教育，可谓作出了开创性贡献。在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就编过《新三字经》，运用旧形式，装进革命的内容，所谓旧瓶装新酒，成为战士的文化教材和群众的扫盲课本，效果很好。

上完初小，家中供不起我读书了，只好随父兄在家种田。那年我11岁。

三 二进学堂

我辍学务农三年，学会了许多农活，培养了吃苦耐劳的习惯。劳作之余仍努力看书。什么《西游记》、《三国》、《水浒》，只要能找到的书，我都看，熬掉不少灯油。这可加重了父母心理上的压力，他们愈发觉得对不起儿子。我从未抱怨过谁，数以千万计的农民穷得揭不开锅，我这个农民的后代能上几年学堂已是万幸，理当满足了。

旧时穷乡僻壤之地，念过几年书的人，大小都算得上个知识分子而受人尊重。我虽年少，同样颇受族人的青睐，故时而有人在父母面前为我惋惜，说"渭伢子聪明文静，是个读书人料子。"族里的一些老人还说，"渭伢子再读几年书，定能中举。"其实那年月，科举制度早已废除，各种长议短论皆属好心，无外乎鼓动家人设法让我继续上学，若有出息，

乡亲族人脸面也增光彩。

机会终于来了。1925年的夏天，父亲带我跑了几十里路去浯口江家祠堂同族人一道祭祖。我个头小，挤在人群前排，出于好奇，只顾对挂在厅堂里的江氏世代祖宗画像看得入神，没想到引起了主祭的族长注意。祭祀结束后，他将我们父子留下，对我父亲说："许多族里人都讲这伢子聪明，既然这样，还是继续读书的好，他若能考上高小，学费就由族里出。"当年，念初小虽已比较普遍，念高小可还很希罕，现在有了一个可能上高小的机会，这真是喜从天降，我恨不得插上翅膀飞回家去报讯，让母亲和许许多多关心爱护我的邻里乡亲们都知道，我又有可能上学了。说实话，我也很感激那位族长老先生。此人是晚清的举人，民国初年当过县知事，是平江西乡的知名绅士，为人比较开明，正是他才使我有了失而复得的上学机会。

经家人商量，我决定投考平江第四高小，这所学校设在平江西乡名叫东山的地方，离家50里，算是最近的。当年平江县在新文化运动影响下，创办了一批新学堂，主要办在县城里，有县立中学、启明女子师范、女子职业学校，还有培元和明原两所教会学校。但农村仍以私塾为主体，经馆、蒙馆、延馆（即家塾）比比皆是，国民小学不多。比较像样的高级小学（即完小）全县只有五所，除城区一所外，东南西北四乡各一所，这对平江西乡近20万人口来说，第四高小算是唯一的"高等学府"了。

赴考正值8月，天气很热。考试主要内容两项，作文和常识。我记得作文的题目是《你为什么要读高小？》按命题靠

船插篙，我在试卷上写了大致这样一些话：读高小，求升学，为的是学习和掌握更广博的知识，有了本领才能为社会做事、报效国家；当今天下，军阀混战，民不聊生，湘地涝旱，饥民满目，世间不平国人有责，吾生立志效法愤世嫉俗诸有识之士，倡新制而革旧体，救社稷于水火。当时我还不懂什么是无产阶级革命，什么叫为人民服务，思想单纯得很，只知道学到本领，增长才干，将来好为解救社会不平做一番事业。文章的用词造句也并不都很妥帖，没有料到这篇千余字的短文，竟得了满分。同考的一些富家子弟，他们的作文一般都写：读高小是为了上中学，有了知识文化，将来从政者可谋乡长、区长，从戎者可当连长、营长；书中自有黄金屋，读好书才能升官发财，荣宗耀祖，不枉一生。后来才知道，班主任兼国文教员周子槛是共产党员，他从批改作文起，就对我产生了好感，认为一个十四五岁的农村穷孩子，能有这等抱负和进步倾向，实属难能可贵，日后对我特别关照，帮助很大。

我被破格录取为插班生，直接上高小五年级，其他被录取的考生则从四年级读起。因离家太远，从9月开学就在校寄宿。开学前几天，有几个富豪家庭出身的学生不服气，向校方提出责问，意思是为什么江渭清的作文能得满分，跳级插班？校长姓向，人还不算坏，就是比较圆滑，他心知我确实不错，又不敢得罪豪富子弟，于是就把难题交给训育主任宋润清处理。恰巧学校为庆祝开学和欢迎新生，组织了一次乘凉晚会，其中一个节目是“应对子”，由训育主任宋润清出上联，学生自由答下联，气氛很是热烈。在这个节目中，宋主任

出了多次上联，学生们纷纷抢答，有的马马虎虎说得过去，有的牛头不对马嘴，叫人啼笑皆非。后来，他听到附近水塘、稻田传来阵阵蛙鸣，于是灵机一动闻声命题：蛙声如雷。四字出口，满座打愣。有些学生反应不过来，小声嘀咕："这是什么对子？"碰巧我抬头思索，看见临空一弯月牙儿正追着一缕浮云，于是先于众人也来一个触景生情，起身应道：蛾眉似月。话音刚落，校长和教师们都连声赞扬"好对句，好对句！"从此，那几个豪富子弟再也没话好说了。师长们对我的评价是：此生聪睿，悟性颇好。

四　参加共青团

开学正式上课，才使我尝到全日制国民高小的滋味。课程有13门：国文、国语、英文、历史、地理、自然、习作、算术、珠算、音乐、图画、手工、体育。这和上初小时的单一教育大不一样，科目繁多又是从五年级上起，学习担子是沉重的。只有拼命用功，学不好有何颜面对乡亲父老！

刻苦的代价总能获得硕果。渐渐地，我不仅能跟得上，而且每一门新触及的课程也应付得不错，跳级插班带来的学业差距消除了，考核成绩引人注目地名列前茅。同学中虽还有人嫉妒，但大多数人对我很佩服。在各式各样课程中，我最有兴趣的是历史和地理，不但认真看书听讲，课后还时常找教师，问这问那，渴望得到更多的知识。在五年级的第

一学期，训育主任就向校长推荐，让我担任了全校的学生队长(那时中学、大学才有学生会)。

上高小就像进入了一块新的天地，接触的人多，知道的各种消息也多，与在闭塞的秀水乡余家洞真是不好比了。那年秋冬，平江发生了许多大事。灶门洞、徐家洞、芦头洞、百福洞等地，有五六千造纸工人不堪剥削压迫，组织了长达数十天的罢工。继而几千纸工又结伙去平江县城向县公署请愿，城里几千工人、学生和市民公开声援造纸工人的罢工斗争。事情闹大了，县公署只好答应纸工提出的全部要求，罢工获得了胜利。紧接着在年底平江城又爆发了一场近万人参加的反鄂军斗争。这场斗争是平江"五卅惨案雪耻会"组织的。当时鄂军夏斗寅驻平江所部向县里强索军饷，并勾结英商亚细亚公司偷运煤油，引起了公愤，市民罢市，学生停课，断了鄂军粮草，连蔬菜和日用百货也不卖给鄂军，再次显示了平江民众团结的力量。

家乡接二连三发生的这些大事，使我大开眼界，更促使我进行苦苦思索。为什么天下总是富人少穷人多？为什么官府和军队害怕民众团结？为什么古代陈胜、吴广、李自成的义军会从轰轰烈烈走向失败？近来平江城乡诸多鼓舞人心的群众斗争又是如何组织发动起来的？……然而再怎么思考也找不到使自己满意的答案。当时还无从知晓平江已经有了中国共产党的地方委员会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地方组织。其实，就连国民党平江县党部也是共产党帮助建立的，但我并不知道。共产主义的幽灵，在东方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已经徘徊多时了。

时间过得飞快，转眼已是1926年。

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洪流汹涌澎湃，以摧枯拉朽之势冲击着南中国，席卷整个城乡。到处都在谈论革命，尤其学校这类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谈论革命的就更多。世道真的在变了。

我作为校里的学生队长，除了念书，还要领头参加学校里一些活动，与训育主任和教师们的接触也就比较多。宋润清时常约我谈话，天下大事、家庭状况、个人志向等等，天南地北什么都扯。看来似乎漫无边际，其实是在开设"小灶"，从思想上帮助诱导我，启发革命觉悟，让我这位"特殊学生"政治上进步。

在宋润清的宿舍里，我听到了许多前所未闻的事，如：苏俄十月革命、马克思和列宁、布尔什维克党C.P.、党的助手C.Y.、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等等，等等，尽是些新事物、新名词。后来，他又借一些油印的进步刊物给我阅读，并要我看完再谈体会。从此我便渐渐进入了一个全新的精神世界，对人生意义的认识与理解，一步一步由混沌模糊而变得清澈明白。是的，我开始找到应该为之毕生奋斗的光明道路了。

我恨自己年龄太小，才15岁，盼望快长大成人。也就在这一年，党团组织对我进行考察后，由宋润清介绍参加了C.Y.——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在中共平江县委（建党初期称地委）领导下，平江地区青年团组织建立得较早，发展也很迅速。1924年3月即由共产党员陈菲章负责组建了第一个青年团支部，当时一共

才有八个团员，大多是工人或教师。一年后，又由支部、特别支部扩建为平江地方青年团委员会，团员发展到数十人。我入团时，平江地方团组织已下辖 16 个支部，有团员 130 余人。滚雪球似地发展，青年团组织迅速壮大，随着北伐革命的深入，其活动也日趋公开化。是年底，团支部和团员人数又都翻了一番。

宋润清等同志都是普通的小学教员，我不仅感激他们教给我文化知识，更感激他们将我引上了为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而奋斗的征程，这种政治的启蒙要比文化的启蒙更令人毕生难忘。在我少年时期的印象中，为师和为父这两个词是并列的。“天地君亲师”嘛！尽管“民国”已经叫了十几年，好多人家堂屋里还供奉着这块牌位。教师亦即导师。据说，英文里这两种“师”是一个词，都叫“teacher”。平江第四国民小学几位教我书的老师，称之为我参加革命起步的导师，是当之无愧的。

近年来，我常给一些年轻人讲当年的故事，其中有一个就是关于宋润清的，在此不妨一叙。那是上五年级的第二学期，一天听说宋主任的父亲不幸病故了，我便约了几位要好的同学一起去宿舍探望，本想说些子安慰老师的话。一进门，就看到他写的挽幛，内容是：

本不愿，做超度三四日，只因迷信难除，也学俗人烧洞纸；

最可耻，诵道德五千言，试看良心何在？打起锣鼓骗光洋。

看见这 44 个字，学生们皆愣住了，面面相觑，瞠目结舌，还

能再说些什么呢?不难想像,这幅幛子一旦出现在超度其亡父的道场上,宋氏亲戚、街坊邻居、和尚道士会是怎样的反应。这是何等彻底的唯物主义气度,对封建传统道德的讥讽揭露又是多么的深刻无情!我十分钦佩他这种斗争精神,当时就暗自思忖,此人定是人们常说的C.P.。不久他介绍我参加青年团,身份也就明朗了。

五　欢迎北伐军

1926年大革命的形势如火如荼,迅猛发展。5月间,著名的北伐军叶挺先遣独立团入湘,揭开了北伐战争的序幕。不久,广州国民政府发布国民革命军出师宣言,八个军建制的十万兵马正式出师,矛头直指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这三个军阀集团。北伐军前敌总指挥唐生智(湖南东安人)率八万部队沿粤汉路北上两湖,使60万人口的平江县涌现出近代史上罕见的民众革命热潮,人民盼望已久的这一天终于来到了。

在此前一年,中共平江地委即秘密组织过四万城区居民参加的民众大会,向广州国民政府发出十万火急的《快邮代电》,强烈要求国民革命军出师讨伐吴佩孚、张作霖。电文提及:"军阀横行,国势阽危,帝国主义在华之势力,亦必因此日益巩固扩大。国民政府为谋民族之自决,与帝国主义之打倒,军阀之铲除,务请乘此时机出兵北伐。""我民众为国

为身奋斗牺牲，自当不遗余力，以为后援。专电奉闻，不胜迫切待命之至。”这份《快邮代电》曾在湖南全省散发，产生了很大影响。

共产党员叶挺率领的先遣独立团刚由广东进入湘境，平江党团组织便立即召开了骨干会议，要求充分发动各界民众行动起来，大力宣传“打倒军阀统治”，“完成国民革命”，为迎接北伐军作好各种准备。平江人民是言而有信的。工、农、商、学和其他阶层的市民统统动员起来了，组织向导队、侦察队、交通队、运输队、破坏队、冲锋队、宣传队、慰问队，准备策应，迎接北伐军。当时驻扎在平江地区的北洋军阀吴佩孚部，有八个旅、团万余人枪，驻防我家乡西乡一带的是第九十团。他们在平江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民众早已对之深恶痛绝，听说要迎接北伐军，驱赶吴佩孚，个个摩拳擦掌，情绪高极了。

8月18日这一天，唐生智、李济琛指挥的北伐军，也就是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和第八军开始向平江发起攻击。在江家祠堂所在地浯口以及新市一带首先展开了激烈战斗。当时还未彻底暴露反革命面目的蒋介石抵达长沙，并发表了一通“讨吴宣言”。19日，北伐军第十二师一部已逼近平江县城西门；第十师强渡汨罗江逼近东门；叶挺团占领了城北十余里的团山铺一线。北洋军陆沄旅部遭沉重打击后，慌不择路向北逃窜，恰中叶挺团埋伏，一顿猛冲猛打，敌军纷纷投降，共生俘官兵6000余众。北伐军胜利地开进了平江县城。至22日北伐军攻克岳阳，湖南境内的战事基本结束。

当年实行第一次国共合作，北伐军里凡是有共产党员、

共青团员作为基本骨干的部队，都是士气最旺盛、军民关系最好、战斗力最强的部队。我当时还在学校读书，只参加过一些宣传工作。看见身穿灰色军装，系着红色领带的北伐军走过，内心翻腾起伏激动不已。我从未见过竟有这样一支纪律严明、打仗勇敢、深受民众爱戴的部队，心想哪一天也参加这样的部队才好。

北伐军在平江地区的所有胜利，都离不开当地人民群众的支持，连我这样才15岁的少年，也多少为支援北伐军出力做了些工作。当年湖南《民报》和长沙《大公报》上就有过不少这方面的报道，其中一篇《平江民众之参加北伐战争》的文章即说："此次我军无坚不破、无城不下者，全赖全军将士及农工群众热烈参战，热烈者因深明北伐之意义，故死伤均不计及，由此可知农工群众在革命上所占之重要位置。若不得其帮助，则决不容易成功。"文中还举例说："平江北乡及西乡涪口、梓江一带农民纷纷奋起击敌，计此次敌军被农民杀毙者，不下三百人。农民死者亦二十人，其参战之猛烈，已可概见。"远在广州的《民国日报》也称："此番胜利夺得平江，其力量全在于农民。"一股冲决旧社会樊篱的无比威力，犹似火山爆发，在光荣的平江农民身上显现出来了。

北伐军进入平江城的那天，全县数十万民众无不兴高采烈，到处欢呼雀跃，锣鼓鞭炮震天，大街小巷"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国民革命成功，国民革命成功，齐欢唱，齐欢唱"的歌声不绝于耳。眼看着就要结束军阀的反动统治了，哪能不高兴？次日，县城召开欢迎北伐军大会，

全县各地党组织和农会动员了大批青壮年前来参军。无比高昂的士气，无比高昂的民气，汇入了浩浩荡荡的北伐洪流，继续向北冲击。叶挺团仍一马当先，所向披靡，8月29日晨攻占汀泗桥，30日又克贺胜桥，直捣武昌城下，首先攀登城头。其他各部相继入城，全歼吴佩孚主力。捷报传来，举国欢腾，人民沉浸在北伐节节胜利的喜悦中。

谁能料到，图谋背叛革命的国民党极右分子已在磨刀霍霍。人民太天真了，我们党太年幼了！一场反共反人民的大灾难正在孕育……

第二章　投身革命

一　农运高潮

北伐节节胜利，推动了农民运动的蓬勃兴起。当时全国农民运动的中心就在湖南。毛泽东同志曾在我们湖南家乡作了32天实地调查，写出了那篇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平江地区广大农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领导下，积极参与北伐革命，在斗争中经受锻炼，普遍建立并壮大了农民协会。早在1925年间，全县多数乡村就在地方党组织的宣传鼓动之下，办起了农民夜校，并在此基础上建立秘密农会。为培训农运骨干，平江地方党组织还选派了一批党员南下广州，参加农民运动讲习所第五期学习。1926年8月，北伐军攻下县城后，原先秘密活动的农会，此时便公开亮出了农民协会的牌子，带动了全县还没有农会组织的所有乡村。在铁锤镰刀旗帜的召唤下，新的农会犹如雨后春笋，纷纷建立。整个平江地区沸腾起来了。

面对统治中国农村几千年的封建势力，“泥腿子”们第一次真正直起了腰，抬起了头。他们的口号是“农民万岁！”“一切权力归农会！”有组织的农民，将不法地主、土豪劣绅打入另册，根据其罪恶大小，分别采用清算、派捐、罚款、游乡、关押等办法给予惩处，罪恶深重民愤极大者还要公审直至判处死刑，从政治上、经济上给封建统治阶级以沉重打击。我所熟悉的西乡浯口就有过这样一件事：有两个人叫江来仪和江竹林的，都是西乡有名的大劣绅，多年来欺压农民、为非作歹，群众恨之入骨，却又敢怒而不敢言。浯口区农会成立后，农民有了主心骨，便把他俩一齐抓住戴上两尺多高的纸帽子巡回游乡，那天参加游行的农民达两万余人，真是声势浩大。江来仪和江竹林在愤怒的群众面前，哭丧着脸连连赔礼请罪，西乡农民扬眉吐气。总之，疾风暴雨般的农民运动，使一切土豪劣绅、贪官污吏、不法地主的威风扫地以尽，而世代当牛作马的穷苦农民则翻身掌了大权。那时的农会权威大得很，大事作主，小事也管，甚至连婆媳不和、夫妻吵嘴也要到农会去评个理，要求参加农会的人越来越多。我当时还在学校读书，只顾参加青年团组织的活动，忙于做宣传工作，很少顾及农村的斗争。没料到父亲在家乡已入了农会。因他出身贫苦，为人正直，不久即被选为乡农民协会委员长，成了秀水乡一带农民运动的骨干，带领当地穷苦农民组织梭镖队，抗租、抗捐、抗税，与土豪劣绅、不法地主作斗争。当时的农民运动真如泰山压顶，农民协会主宰一切，没有入会的争着入会。好些中小地主、富农乃至中农，从前反对农会的，此刻求入农会而不可得。真有这样的事：有些

小劣绅想出钱买个农会会员做做，而遭到农民的坚决拒绝，说是“谁要你的臭钱”。全县乡乡都办起了农会，会员有数万之众。在这基础上，平江县农民协会成立了，选举产生的常务执行委员都是共产党员。

农民起来革命，荡涤着一切封建传统和旧社会恶习。平江县农民协会明令禁止封建迷信、禁赌、禁毒、禁娼、禁偷盗、禁止虐待打骂妇女，提倡男女平等、妇女放足、婚姻自由、识字扫盲。一时间，平江农村风气大变，真是牌赌禁绝，盗匪潜踪，夜不闭户，道不拾遗。学校也是一派新气象，学生胸怀大志，讲革命理想，讲救国救民，讲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女学生还穿起了裙子和短袖衣，表示反对旧礼教，抛弃封建的传统服饰。当年辛亥革命推翻帝制，仅革掉了“长辫子”；如今农民起来“打倒列强除军阀”，一切反动势力和旧社会恶习都在革除之列。当然也有些过头的东西，但主流是好的。在短短几个月内，几乎使整个平江农村兜底翻了个身，这实在是个奇迹。

然而，对于如此急剧高涨的农民运动，党内的看法并不一致。毛泽东同志那篇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讲了对待农民运动的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一种叫“好得很”，一种叫“糟得很”。这虽然说的是整个社会舆论，实际上主要是针对党内一些人的思想来讲的。

当时瞿秋白同志主持党中央的宣传工作，支持农民运动“好得很”的意见，重视毛泽东同志的这篇报告，并亲自为之写序，于 1927 年 4 月在汉口以《湖南农民革命》的书名公开出版。但是，由于以陈独秀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很怕农

民起来造反得罪了国民党，还有以张国焘为代表的一部分人从“左”的方面强调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忽视了农民运动，因而毛泽东同志当时的正确意见，只在包括我的家乡平江在内的湘、鄂、赣一带产生了一定影响，从整个说来，农民运动并未受到党内重视，使我们党与工人阶级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国民党右派之所以敢于发动“清党”，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遭到失败，这不能不说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 投笔从戎

平江最初的农民武装，是为配合北伐军攻打县城而建立起来的，多少带有自发性，不仅人枪少，也缺乏训练。但平江党组织十分重视这批农民武装，并进行了积极的引导。

当北伐军夺取平江县城时，在各地农民协会的组织和发动之下，几乎所有区乡都成立了农民自卫队或梭镖队，在城镇还成立了工人纠察队。虽然这些工农武装的武器都很落后，大部分是梭镖、大刀、鸟铳，只有少数枪支，然而这些武器操在工农手中，威力就大不一样。就连儿童团扛着红色木棍盘查放哨，也颇有几分威严。中共平江县委以国民党县党部名义，以这批工农武装为基础，成立了县团防总局，由共产党员余贲民任局长，直属队就有500余人枪，基层骨干全部是党团员。

1927年春，我从西乡第四高小毕业，因政局动荡和家

境所限，无心也无力继续升学。回想这两年读书生活，可以说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转折点，不仅组织上加入了青年团，而且基本确立了为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的信念，决心投身革命。离校前夕，上级团组织约我谈话，交代了回乡工作的任务，并将团组织关系转至西乡梓江团支部。

回乡之日，正值湖南农民运动鼎盛时期，平江全县农会会员已达30余万人。我在西乡农民协会帮助工作，同农民接触多了，才深切体会到农民一旦觉醒所释放出来的革命积极性，真是无穷无尽，可敬可贵。记得当年家乡广为流传的《农民协会宣言》中有这样一段话："农民协会是广大农民谋利益的唯一大团体，是由真正农人，一个一个有秩序而组织的。平江的农人一齐结合了，会员人数可达四十万，此力量较什么都要伟大，再进而联合全省全国，就可以打倒侵略中国的一切资本帝国主义，打倒一切压迫人民的军阀。到那时，全国不是统一了吗？中华民族不是自由独立平等了吗？凡是受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劣绅土豪及一切反革命派压迫的农友们，一齐行动起来吧！"这些通俗易懂、慷慨激昂的文字，即便现在读来也还是很有感召力的。当时的实际情况就是这样，轰轰烈烈、如火如荼的农民革命，使人们看到了未来，充满了希望，切身体验到民众大团结的伟大力量，鼓舞着人们去向一切反动势力作拼死的斗争。新的工作环境，要比在学校里对我的思想影响和触动更大，更坚定了我投身革命的决心。

那时候，我真可以说夜以继日，以饱满的热情，积极的行动，去努力完成农会和团组织交给的各项任务。因我年纪

小，目标也小，这是完成任务的一个有利条件，我总能比较准确地侦察到当地土豪劣绅的活动情况，并及时向农会报告，供农会和上级研究决定斗争策略。每当农民自卫队行动时，我也积极参加，传消息，摸情况，带路抓土豪，样样都干。还时常为农会书写标语口号和各种告示，替申请加入农会的农民填写志愿书。学校里学来的一手毛笔字，有了用武之地。

平江西乡各农会组织当时属中共平江西三区区委领导，区委书记是萧助国。在几个月做农会工作的接触中，他见我积极肯干，又是青年团员，蛮有好感，不久便动员我脱产参加武装。这真是求之不得！其实我早有此念，只是碍于年龄小，怕队伍上不收，才未启口。

1927 年 5 月 1 日，是值得纪念的日子。我这个踌躇满志的西乡学生，拿着区委介绍信，来到"平西游击大队"部报到了。那年月，青年小伙子、又是能说会写的小知识分子参军，这在以工农分子为主体的革命队伍中，是很受欢迎的。游击大队长钟永彪见我是萧书记介绍来的，非常热情，当即决定留下当他的警卫员（当时又叫勤务兵）。从此，我开始了长达数十年之久的军旅生涯。说来也巧，1929 年 2 月，又是萧助国、钟永彪介绍我由青年团员转党的，这当然是后话。他俩和当教师的宋润清、周子鑑一样，都是我思想启蒙、投身革命的引路人，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正当我拿起枪杆子的时候，国内的政治形势已经起了急剧的变化。臭名昭著的长沙反革命叛乱正在密锣紧鼓的策划之中。

三　风云突变

我刚参加部队，从立正、稍息、齐步走学起。工农革命武装的一切，都使我感到新鲜。为了让大队长工作起来方便，我除了扛自己的一枝马枪之外，平时要帮大队长背驳壳枪和装有文件、材料的挎包，还有他随时取用的一柄铜制水烟袋，也由我代拿，那家伙挺沉的，如有行动，我还得背两床毯子和两个人的干粮，这样夹七杂八加在一起，足有40斤，再跑上几十里路，确实够累的。到了宿营地，大队干部在一起商量工作，我得安排好他们的食宿，领导休息时，我负责警戒。有了实践才知道，种田虽很劳累，当兵也不轻松，尤其是铁的纪律，与在农村、学校都无法相比。尽管如此，我仍兴致很高，浑身就像有使不完的劲。

当"打倒列强，除军阀"的歌声不绝于耳，南方数省民众正沉浸在北伐胜利喜悦中时，国内的政治风云突变了。两湖地区几个大中城市消息传得较快，乡村的信息却闭塞。就在我参加队伍的前些天，身为北伐军总司令的蒋介石已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白崇禧亲自执行蒋氏"清党"大屠杀密令，出动大批流氓、军队强占上海总工会，解散工人纠察队，打死打伤共产党员、工人积极分子数百人，革命志士的鲜血染红了上海滩。15日，号称"革命堡垒"的广州城也开始戒严，反动派大肆搜捕共产党员和革命分子，数

日内就有200余人遇难,2000余人遭关押。18日,蒋介石控制的国民党右派政府在南京成立,所发第一号通令,即是搜捕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和革命分子190余人的通缉令。第一次国共合作就这样破裂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就这样失败了。一切来得都那么突然!

此时,湖南乡村的农民革命虽仍在继续发展,但两湖的反革命政变已呼之欲出。5月13日,国民革命军独立第十四师夏斗寅部在湖北宜昌宣布脱离武汉国民政府,联蒋反共,17日进攻武汉,幸被驻防当地的叶挺部队击溃。5月21日,原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指使所部第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在湖南省城长沙发动反革命叛乱,叛军武力封闭省总工会、省农民协会等革命团体,解除了全部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的武装,捕杀共产党员、工农积极分子100多人。这就是湖南大革命史上最黑暗的一天,因旧时电报用韵目"马"字代表21日,故史称"马日事变"。

自长沙发生反革命叛乱后,整个湖南地区的革命形势急转直下。5月24日,反动派在长沙成立了"中国国民党湖南救党委员会",公开拥护反动的蒋介石南京政府。在短短20多天里,许克祥等反革命分子在长沙和附近各县疯狂屠杀共产党人、革命群众一万多人,湖南城乡陷入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中。

平江与长沙相邻,省城距平江西乡不过八九十里地,只因山路阻隔,"马日事变"发生两三天后,我们仍未得到消息。可是县城里,以代县长曹修礼为首的反动分子已闻讯行动起来了,宣布所有机关团体立即停止一切革命活动,积极

策划“清党”，密谋屠杀革命人民。而在农民运动高潮中逃亡省城的一大批土豪劣绅，此时也杀气腾腾武装还乡了。在国民党右派分子江峪涢等人策动下，返回平江西乡的反动派与潜伏在当地的土豪劣绅纠集在一起，于5月24日清晨，突然围攻我浯口农会、工会、妇女会等机关，抓走一名党员同志，并将所有财物抢劫毁坏一空。那天，浯口党支部正在乡间开会，不知“马日事变”之事，还以为是地主豪绅一般性的反扑，第二天便组织人马夺回了浯口，但武装冲突一直未断。浯口是个镇，由于工农武装力量单薄，长期坚持消耗太大，不久便撤至农村，到此时才知道天下已经大变。

面对整个湖南的严峻局面，平江县委遵照湖南省委的指示，坚决组织了反击。5月底，被叶挺部队击溃的夏斗寅叛军一部窜入平江与通城边区，余贲民同志亲率县团防队主动迎战，一举将叛军打垮，缴获了大批武器和军用物资。数日后团防队凯旋县城，狠狠地镇压了一批在平江领头搞反革命叛乱的坏分子，代县长曹修礼被我工农群众抓去游街示众，逼着他呼口号：“打倒蒋介石！打倒许克祥！”“工农运动万岁！”在我们西乡搞反攻倒算的劣绅江望南、皮扬名等人被处决。乘机蠢动的反动派遭到了平江人民的迎头痛击，嚣张气焰暂时被打下去了。县委组织了盛大的群众集会，声讨许逆克祥。那次大会是在月池塘召开的，县农民协会、工会、商会、妇女会、教育会等团体代表纷纷发言，愤怒声讨反革命叛变的滔天罪行，一致表示“只有农、工、商、学、兵大联合起来，整齐我们的队伍，跟着共产党的领导，努力前进”，才能“讨伐许逆和一切大大小小的反革命，争得最后

的胜利”。当时邻县浏阳有数万农军正在围攻长沙城，叛军许克祥部龟缩城中，平江也有农军去协助，参加破坏车站和铁路。共产党员涂正坤在群众大会上提出了“梭镖亮光光，擒贼先擒王，打倒蒋介石，活捉许克祥”的口号。这个战斗口号后来在平江一带广为流传，事隔六七十年，至今我还清楚记得。

由于平江党组织的坚强领导，掌握着一批工农革命武装，所以“马日事变”后的6、7月间，平江形势虽有小反复，但从总体上看还是不错的。7月下旬，为配合即将在南昌城举行的红色暴动，由县团防队和部分区、乡游击队合编组成的平江工农义勇军近2000人枪，奉党中央和湖南省委之命，紧急奔赴江西。这样一来，留下坚持斗争的武装就为数不多了。我们平西游击大队是上级决定在原地坚持的武装之一。主力刚走没几天，反动派便乘虚而入，镇压湖南革命运动的刽子手何键，下令调来一个团进驻平江，并派其亲信刘作柱来当县长。刀光剑影，枪声不绝，反动派对平江工农群众的血腥大屠杀开始了。

平江地区的白色恐怖日益严重，我们的处境越加艰难。反动军队打着“治安肃正”的旗号四出“清剿”。前些日子还能公开活动的各地工农武装，眼下成了真正的游击队，许多农会也迫于形势而解体，地主豪绅又耀武扬威起来。我小小年纪就参加了游击队，从感情上讲，父母不是很放心的，但他们从未扯过我的腿。形势最紧张的时候，游击队在西乡也难立足了，一天行动前，我匆匆回家与父母话别，父亲悄悄问我是否参加了C.Y.或C.P.，因为有组织纪律，这叫我

很难回答。父亲见我不吭声，心中已有几分数，便说："如果参加了，也是很光彩的事，只是世道不顺，最好远走高飞，除非死了，活着就千万别回来。"母亲早已泣不成声，但父亲还是说着："搞了这些年农会，我心中多少也明白个道理，共产党是为穷苦大众办事的，总有一天能得天下，只是不知要等到哪年哪月。"

即是今日，旧话重提也难免伤感，但我更多的是觉得自豪。多么忠厚纯朴的农民，多么深明大义的父母，他们定会知道我这一去随时都可能发生不测，但他们却想到劳苦大众，想到共产党终有胜利的一天。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不正是千千万万这样善良的劳动人民献出了他们的子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拼搏奋斗，忘我牺牲，而换得来的吗？

我自从1927年那个难忘的秋夜离家后，一直辗转在部队里，父母兄弟音讯全无。直到1937年秋抗日战争爆发后，我才得一机会回家探望，此时相隔已整整十年了。

第三章 平江地区的战斗

一 两次扑城

1927年8月，中共湖南省委计划以平江、浏阳为中心，继续组织秋收暴动，特派夏明翰、李六如同志来平江领导这场斗争。他们帮助平江党组织改组了领导，建立新的县委，传达了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并成立了“平江县秋收暴动委员会”。县委还决定将全县分为五个乡，各乡成立党的特委、暴动委员会以及敢死队、烧杀队和搬运队。党组织的一批骨干毛简青、朱璋、张警吾、邓神生、邱平川、钟仁阶、李宗白、吴钦民等，都分别到东、南、西、北各乡宣传发动群众，作好秋收武装暴动的准备。

县委和“暴委”根据当时情况，计划在9月16日组织一万余人的农民队伍，分三路进攻县城，救出被捕的数百名革命同志，向反动派作一次武装示威，搞些武器弹药后就退出县城，上山打游击。

但是，9月16日晚上行动时，原负责在城里善慧庵以

鸣钟为信号的同志不幸被敌人巡逻哨抓走了，结果攻城队伍与城里接应人员失去联络。直至次日清晨，只有从东门进城的队伍在李家巷捣毁了县杂税局，杀死了局长，向敌“清乡”司令部院子投了两枚手榴弹，便匆匆撤退了。

这次扑城，由于发动群众和具体组织不严密，虽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但这是平江革命暴动的先声，是“马日事变”后，平江革命斗争由低潮向高潮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它震惊了反动势力，鼓舞了广大民众，重新点燃起武装斗争的烈火。在此之后的第五天，即 9 月 21 日，夏明翰、李六如、罗纳川等就成功地发起了献钟暴动，工农武装群众在共产党员的带领下，拿起梭镖、大刀、鸟铳、斧头、棍棒，一举肃清盘踞在献钟镇上敌人的武装，占领了这座位于连云山口的南乡重镇，召开了万人群众大会，公开审判镇压了反动势力的首恶分子。

秋收武装暴动在平江大地激烈地展开了。9 月 23 日，工农武装胜利袭击了辜家洞泰安墈挨户团，缴获了数十枝长短枪。10 月间，平江木瓜农民暴动取得胜利。12 月间，平江北乡虹桥农民暴动又获得成功。在此期间，平江工农武装还取得了捣毁长寿街警察所、击溃沙墈挨户团、夜袭思村挨户团等大小战斗的胜利。在平江轰轰烈烈的秋收暴动影响下，经过党组织派人做工作，黄金洞地区的金矿矿警数十人枪起义，并全部编入了平江游击大队。

平江地区秋收暴动是毛泽东同志领导的湘赣边秋收起义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党的“八七”会议确定了以革命武装反抗反革命武装的正确路线，促使平江地区党组织更加

认清了武装斗争的重要性，在实际斗争中不断地总结经验教训，所以，平江工农武装队伍迅速壮大，党员数量也由原先的千余人发展到万把人。1928 年 2 月，县委在嘉义市召开党的活动分子会议，认为秋收暴动以来工农武装斗争普遍高涨，国民党反动派必定会疯狂镇压，因此应提前作好残酷斗争的准备。县委决定集中平江所有武装，成立“湖南工农革命军平(江)湘(阴)岳(阳)游击总队”，以便统一指挥，统一行动。总队下辖五个大队，一大队驻南乡，二大队驻下东乡，三大队驻北乡，四大队驻西乡，大队长钟永彪，五大队驻上东乡。我随钟大队长率领的四大队经过半年的东征西战，参加多次战斗后，又回到家乡附近地区活动了。

1928 年 3 月，阴历正好是二月，县委和暴动委员会又发出扑城号召，成立攻城总指挥部，组织起了二三十万农民队伍，准备扑城。老百姓习惯用阴历，叫这次行动是“二月扑城”。当时平江城内驻有国民党一个团，敌军用机关枪架在城墙上扫射，攻城农军伤亡很大。特别是平江城东南西三面紧靠汨罗江，河面宽二三百米，敌军拆掉了河上的浮桥，东乡南乡农军受阻于三阳街一线无法参战。只有喻庚那个游击队从北门冲杀进城，与提前化装进城的人马会合，在城里展开了巷战，战斗十分激烈，从上午 9 点一直打到傍晚，双方都有相当大的伤亡，因从长沙赶来增援的国民党军两个团快到了，农军被迫又从北门撤出县城。战斗结束，队伍返回出发地点献钟时，黄金洞、长寿街的数万农军才赶到(迟到了十几个小时)，这么大的队伍缺乏通讯联络，又没有重武器，再加上缺少指挥经验，在土地革命战争史上颇有名气

的平江"二月扑城"就这样失败了，但影响很大。仅一个平江地区一下竟有二三十万农民被共产党发动组织起来，敢于拿起武器向国民党反动派进攻，这确实大大地震惊了反动统治阶级。事实上，扑城虽然没有成功，但唤醒和锻炼了人民群众，锻炼了党，为尔后坚持湘鄂赣边的武装斗争积累了经验，在平江，在湖南，都是一次富有历史意义的革命行动。

这两年连续两次攻打平江县城的大战斗，以及许许多多小的战斗，我都随游击大队参加了，作为一个青年小知识分子投身革命后，这是最初的战火洗礼。对革命艰巨性、斗争严酷性，以及随时可能流血牺牲的现实，有了切身的感受和体验，这为日后迎接更严重的斗争打下了基础。

二　平江起义

1928年7月22日，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等同志，继在党领导下的南昌起义、秋收起义、湘南暴动后，在我的家乡组织和领导了又一起大规模武装行动，这就是威震湘鄂赣、声撼全中国的著名的平江起义。

自从"二月扑城"失利后，平江的敌我形势起了急剧变化。国民党反动派疯狂"清乡"，除正规军外，仅反动民团地主武装就有几千人枪。在平江县委领导下，我们游击队也在反"清乡"斗争中逐步壮大，6月中旬原游击总队又改名为"平江工农革命军"，由邱训民指挥（后任红军第七师师长），

人枪都有了较大发展，战斗力也明显提高，有时一仗能包围击溃反动民团两三百人。何键为镇压平江的工农革命，慌忙增调其所属部队独立第五师三个团进驻平江，而第五师的一团团长就是共产党员彭德怀。

6月19日，彭德怀所率第一团驻扎县城，第二团驻北乡梅仙至南江桥一线，第三团驻东乡长寿和嘉义市一线，黄公略所在的第三团三营就驻在嘉义市。一团和三团都有秘密党组织，部队到平江后，加紧准备起义，特别是一团党的工作非常活跃，党员经常秘密在县城贴出“打倒土豪分田地”、“消灭清乡队”、“工农和士兵是一家”、“打倒屠杀工农的真正土豪劣绅”等革命标语。国民党平江县长刘作柱领着一批豪绅向彭德怀告状，结果彭团长回答说：“真正的土豪劣绅也应该打倒。”

当时，滕代远是中共湖南省委特派员。他巡视湘鄂赣边，一路从浏阳来到平江。7月17日，滕代远一到平江，首先找到一团副官长邓萍，他是一团党支部书记。滕与他接上了党的关系，第二天即与彭德怀会面。就在滕与彭会面的当天，彭德怀接到长沙反动当局的密电，命令逮捕黄公略、黄纯一、贺国中等三名共产党员。彭德怀见情况危急，决定立即发动起义（当时叫暴动），滕代远同黄公略等一起参与组织领导暴动。经过紧张筹划，以发动士兵“闹饷”为名，于7月22日下午13时暴动开始，只用两个小时就顺利解除城内2000余名反动民团和警察的武装，控制了整个县城。城内反动分子大部被起义军逮捕，经临时革命法庭公审，判处了反动县长刘作柱和一批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死刑并立即

处决。同时，起义军从监狱里解救出了800余名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其中包括300多名已被判死刑的革命同志。

起义胜利了，鲜红的镰刀铁锤旗帜插上了平江县城楼，往日笼罩在白色恐怖下的平江人民，一下得到了解放。这次行动是以独五师第一团彭德怀部为主体的，随营学校和第三团三营部分官兵也参加了暴动。7月24日下午，平江县委召开了有几万军民参加的庆祝暴动胜利大会，宣布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和平江县苏维埃政府，公举彭德怀为红五军军长兼第十三师师长，滕代远为红五军军代表（当时党还未公开，故称为军代表），胡筠任县苏维埃政府主席，红五军下辖一、四、七三个团。

在彭德怀指挥举行暴动时，平江各地的工农武装和游击队，在县委的领导下给予了积极的配合，发挥了很大作用。县委负责人亲自率领四乡工农队伍进城，扛枪背刀，挑菜抬猪，浩浩荡荡，从四面八方赶赴平江城慰劳红军，并协助红军清查躲在城里的土豪劣绅，将他们带回农村处理。

彭德怀的起义打乱了国民党反动派“清乡”、“剿共”的部署，牵制了敌人大量的有生力量。加之与朱德、毛泽东领导的红四军遥相呼应，使湖南长沙的反动派处于南北夹击之中。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鲁涤平如坐针毡，急调八个团的兵力，与数县地主武装相配合，直向平江扑来。其中以六个团的兵力分五路围攻平江县城，两个团的兵力直插长寿街，堵击起义军后路，妄图一举消灭起义军。红五军经过多次与敌浴血奋战之后，撤出平江地区，先后向赣西北的修水、铜鼓、万载和鄂南的通城、通山、九宫山地区转移，同敌

人兜圈子，打推磨战。敌军一路围追堵截，红军伤亡很大。到9月底，彭德怀所率部队虽只剩下500余人，但革命信念坚不可摧。他对士兵们说："我们举旗起义是为了革命，干革命就不能怕失败和流血牺牲，如果谁想走，可以走，就是剩下我一个人，也要举着红旗，爬山越岭干到底！"11月下旬，红五军在修（水）铜（鼓）边境休整，接到中共湖南省委指示，决定向井冈山挺进。全军合编为三个纵队，其中第二纵队由黄公略带领，留在平浏地区坚持，第一、第三纵队由彭德怀、滕代远带领，直奔井冈山，沿途不断消灭敌小股武装，并吸收贫苦农民入伍，队伍又发展至700余人枪。12月9日，在宁冈与红四军胜利会师。

三　第三次扑城

平江起义后，红五军在平江地区作战以及向井冈山进军，直至1929年8月又回师平江。这一年里，我们坚持在平江的游击队经受了严峻考验，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尤其是在红五军突围过程中，平江游击队在邱训民、孔荷宠（后叛变）、钟绍秋等指挥下，钳制敌军，掩护转移，作了很大贡献，先后在南江、梅仙、安定、献钟、宦田、爽源等地展开激烈战斗，给敌正规军和民团以沉重打击。

1929年春，由于蒋桂军阀冲突日见明显，湖南鲁、何战争爆发，敌人原在湘鄂赣三省"会剿"的大部队陆续调走，这

正是我们主动出击的大好时机。县委将分散在平江四乡的游击队又一次集中起来，采用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作战方法，首先包围歼灭了嘉义、虹桥、三墩等地的反动地主武装，尔后乘胜将全县挨户团一一扫平，最后一战是打岑川民团，这是平江地区最顽固猖獗、实力最强的一支反动武装，有几百人枪，盘踞岑川大屋，凭借48只天井，天井四周有高大围墙，修有炮楼枪眼，土圩子外面挖有“护城河”，易守难攻。这一仗我们全部力量都投入了，在当地广大群众积极配合下，先用火攻，诱敌开枪，消耗其大量弹药，接着全面出击，搭桥过河，强攻护墙，用手榴弹炸开通道杀进敌堡垒。有部分敌人企图逃跑，慌不择路，结果又全部中了我们预先设下的埋伏。这是一次干净彻底的歼灭战，仗打得很漂亮，扫清了平江县境内所有反动武装。

武装斗争的胜利，为地方党和政权的建设奠定了良好基础。胜利了的平江人民情绪空前高涨，在党的宣传鼓动下，纷纷要求建立基层政权。1929年4月，正式公布了《平江县工农兵苏维埃政府行政组织大纲》，全县五分之四的地区建立起了基层苏维埃政权，巩固和扩大了乡、村农民协会，并建立了工、青、妇和儿童团、互济会、反帝拥苏同盟以及赤卫队等群众组织。到8月底，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红五军大部回师平江，在黄金洞与黄公略率领的红军湘鄂赣边支队会合，共3000余人枪，合编为五个纵队。红军主力部队返回平江，这对平江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发展有重要作用，我们度过了一段相对稳定的时期。在这时期内，我由青年团员转为中共正式党员，并由小队长提升为中队党代表。不久，

我们平江游击总队这支地方工农武装上升为红军主力，改建为属红五军指挥的湘鄂赣红军独立团，活动的区域也开始逐步扩大了。

1930年初，湘鄂赣特委根据当时李立三“左”倾盲动主义路线，提出了“打下长沙，饮马长江，夺取武汉，会师幽燕，由一省总暴动达到五省总暴动”的口号，平江县委据此制定了“红五月大暴动”计划。首先在3月18日巴黎公社成立59周年纪念日这一天，组织和领导了平江武装大示威，全县数以万计的农民参加了大示威。当晚每个暴动点都燃起了火堆，抓了100多个土豪劣绅押着在四乡游街，打掉了敌人许多哨线，镇压了100多个反动分子。从此，乡村的财主们都吓得躲到县城里去了，因为城里驻着敌正规军一个团。

平江“红五月大暴动”的标志，就是第三次攻打平江县城。红五军与我们独立团在农民赤卫队的支援配合下，于5月6日强攻县城，一举攻克，歼敌一个团，缴获步枪千余枝，机枪12挺，其他军用品无数。这是继1927年“秋收暴动扑城”和1928年“二月扑城”后的第三次攻打平江县城，是一次胜利的扑城。

打下县城后仅休整两天，红五军彭德怀部五个纵队主力就分别向修水、浏阳、铜鼓、万载一线进发，县城里只留下我们独立团。因为人员武器大大加强，上级遂批准我们独立团改建为湘鄂赣独立师，由孔荷宠任师长，下辖三个纵队1000余人枪。我也由中队党代表改任大队党代表，该大队有人枪两百余。这次占领县城后还有点小反复，没几天敌军又纠集两个团兵力来反扑，我们不愿硬拼，只好先撤退到东

北方位的钟洞。经过重新组织准备，到 6 月 28 日，我们独立师真正独立地重新攻打县城，守敌被上次攻城吓破了胆，听到枪声大作，一见黑压压的红军和农民队伍扑城而来，干脆弃城而逃了。

第四章 转战湘赣负重伤

一 一打长沙

1930年，我们党内“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愈演愈烈。当时，湖南省委接受中央70号通告中提出的“集中力量积极进攻，组织地方暴动，争取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等“左”倾观点，作出了一系列相应的决议，认为湖南确有取得数县或数十县甚至全省政权的可能。所以，不仅我们平江搞“红五月大暴动”，全省范围内，到处都在搞暴动。即使这样，当时的中央认为湖南省委还是工作不力，犯了“右倾”的错误；并致信红五军军长彭德怀，错误地指示“根据地不要建设在大山中，而要夺取大城市作根据地”。

是年6月，根据中央指示，红五军的第五纵队扩编为红八军，军长李灿（后为何长工），政委邓乾元。红五军军长邓萍，党代表张纯清。红五军与红八军合编为红军第三军团，军团前委书记兼总指挥彭德怀，政委滕代远，参谋长邓萍，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全军团17000余人。红三军团成立后，

攻黄石港，克大冶城，经通山、崇阳，挥师南下，一举攻克湘北重镇岳阳，切断了长沙与武汉的水陆交通。

在主力部队四处出击作战的同时，我们平江正在召开中共湘鄂赣边区第一次代表大会，贯彻中央70号通告精神，提出边区党的中心任务和主要策略是反“右倾”，反“富农路线”，反“保守主义”。7月中旬，红三军团前委和湘鄂赣边特委（书记李宗白）召开紧急联席会议，传达党中央的命令，决定各路红军分别攻打南昌、九江、长沙等地，先会师武汉；要求红三军团在湘鄂赣边地方武装配合下，迅速攻打长沙城。

会后，成立了以赖汝樵为总指挥的湘鄂赣边工农兵军事暴动委员会，组织全省各地农民武装迅速向平江县集中。7月22日，近20万人在平江城天岳书院草坪举行攻打长沙誓师大会，同时纪念“平江起义”二周年。24日，红三军团攻占晋坪，歼敌一个团，活捉团长侯鹏飞。25日，红三军团占领长沙东北面外围据点金井。十余万军民继续南下紧逼长沙城。

当时的形势是蒋、冯、阎三派军阀势力混战中原，桂军倾巢犯湘，迫使湘军败退，何键的四路军夏斗寅部退出长沙城进入汨罗、岳阳一带，长沙城防空虚，只有部分民团武装。因此当红三军团和我们地方武装十余万人扑城时，战斗进展是比较顺利的。我所在的红军湘鄂赣独立师先占领离城区五里路的东门渡。当继续向城内攻击时，红三军团主力已经攻进长沙城，攻城军民纷纷从四处涌进市区，打扫战场，处理善后事宜。此时已是7月27日下午。

短短的几天里，红军主力和农民武装先后歼敌4000余人，攻占长沙的战斗，成了工农红军在整个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打下的唯一省会城市。

二 二打长沙

打下长沙后，十万农民武装也都随着红三军团进了城区，很多人是平生第一次踏进省城，显得非常新奇、兴奋，但还是有组织有纪律的。当时，我们的部队已经初步有了三条纪律规定：一、一切行动听指挥；二、打土豪要归公；三、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因此，虽然战火刚刚熄灭，城里却社会秩序井然，我这个大队党代表带着战士们在城里参加没收土豪财产，维持社会治安，工作做得很带劲。

7月29日，红三军团前委发布《告长沙民众书》，阐明革命形势，提出革命主张和任务。当天下午，市民举行盛大集会，热烈欢迎红军和赤卫军。第二天，湖南省苏维埃政府在长沙正式成立，主席李立三（未到职，由王首道代理），副主席杨幼麟，彭德怀等13人为委员。省苏维埃政府宣布了政纲，颁布了《暂行劳动法》和《暂行土地法》。8月2日，长沙80多个团体共十多万人冒雨隆重集会，纪念“八一”，庆祝省苏维埃成立。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我们雄赳赳气昂昂走在街上，顶着大雨呼喊着口号，有着无比的自豪感，充满了胜利的喜悦。

与此同时，上级决定以我们湘鄂赣红军独立师为基础，扩编为红十六军，军长胡一鸣，副军长孔荷宠(后来由孔任军长，黄志竞任政委)，属红三军团指挥。红十六军下辖第七师和第九师，七师师长邱训民，九师师长喻庚。我们大队被编进第七师。不久，我由大队党代表调任团总支书记。

我们在长沙城只驻了一个星期，形势就紧张起来。国民党军开始组织反扑，何键部四个师向长沙运动。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刚打下长沙城，我军就全面占领了城里的湘造兵工厂，控制了成千上万的枪支武器。有人提出是否可将大批武器运出省城，疏散保存以防不测，而头脑发热的同志却坚持说，从此长沙就是我们革命势力的大后方了，不需要转移。眼见何键所部向长沙运动，才不再争论，并迅速组织力量将大批武器弹药先运出了长沙城。

8 月 5 日，国民党军队在帝国主义军舰掩护下向长沙城反扑，我们随红三军团退出长沙向平江转移，湖南省苏维埃政府机关也一起搬迁到平江长寿街，分别驻在邓湘高大屋和第二高小。红三军团在长寿街驻扎期间，对部队进行了整训，调整和宣布了各军、师、团一级的领导干部，还成立了一个炮兵团，下辖两个连，当时已有四门山炮、四门迫击炮。

在平江休整了半个月，情况又起变化。为配合红三军团彭德怀部行动，毛泽东、朱德率红一军团由赣西万载向湖南进军，并写信约彭部到浏阳永和会师。红一军团在西进途中，取得了文家市大捷，歼敌何键部第三纵队一个整旅，俘敌 1000 余人枪，并击毙旅长戴斗垣。8 月 23 日，两个军团如期会师，接着召开了两军团前委联席会议，遵照党中央指

示，决定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中共第一方面军总前敌委员会和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朱德任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毛泽东任总前委书记、总政委和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主席。一方面军从此下辖一、三军团，共三万余人枪。红一方面军的组成，使两支主力红军汇合成为一股强大的力量，这对中国革命武装从以游击战为主向运动战发展，打下了实力基础，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第一次攻打长沙兴师动众，气还未喘过来，以李立三为首的党中央又发来指示，要求红军主力继续夺取长沙城。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根据这一指示精神，于8月24日作出了再打长沙的决定。月底，主力红军13个团及农民武装数万人马进抵省城近郊，迅速将城池围困起来。这一次，敌人以31个团的主力集结城内，且工事坚固，早有准备。9月3日，敌军两个团从猴子石出击，被我军全部歼灭在城外。从此，敌人龟缩工事里拼死抵抗，再也不敢轻易出城。我军主力和众多地方武装两次发起总攻均未奏效，伤亡不小。眼看硬拼不行，毛泽东同志亲临作战前线作调查研究，并当机立断，提出停止攻打长沙、移师江西的意见，做了许多动员说服工作，得到了朱德、彭德怀等领导同志的支持，重新调整了作战方针。

9月12日，红军主力和我们地方部队开始从长沙撤围。次日，总前委在株洲召开扩大会议，正确分析了敌我形势，认真总结了两次打长沙的经验和教训，冷静思考后决定，红一方面军拟改攻吉安，以便将赣江两岸的根据地连成一片，各部队要相对分散在广大农村宣传、发动、组织群众，

壮大革命力量。14 日，主力部队从株洲出发，沿途连克醴陵、攸县、安仁、茶陵等县城，移师江西，攻占吉安，开拓了湘东、赣西广大地区。

毛泽东同志将马列主义的革命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提出了“长沙虽好，但不是我们现在去的地方”，“革命力量要退出城市，转移到反革命力量薄弱，而有深厚革命基础的农村，使革命走上武装割据农村，以武装革命的农村最后包围城市夺取城市。”实践证明，这些思想和理论都是符合当时中国国情的，是正确的。毛泽东同志决定适时从长沙撤兵，使这次“左”倾冒险军事行动得以避免重大损失，保存和壮大了革命力量，为日后同反动派作持久的斗争，创造了条件。

9 月 24 日至 28 日，党中央在上海召开了六届三中全会，作出了立即停止组织全国总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行动的决定，从而结束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的统治地位。

三　万载负伤

红一方面军的建立及在湘赣地区广大农村的转战，在全国都造成了很大的政治影响。红军主力所到之处，敌军望风披靡，民众拍手称快，各地党政军群众组织也得到了大的发展。红军确实是战斗队、宣传队、工作队和“播种机”。

1930年10月以后，在中共湖南省委辖区内已有岳阳、湘阴、长沙、益阳、沅江、常德、茶陵、攸县、醴陵、浏阳、平江等22个县委，约1000个党支部，近两万党员。湘鄂赣和湘东两个红色区域发展很快，县、区、乡、村各级苏维埃政权大部已经建立起来，并广泛开始了土地革命和经济、文化、教育等事业的建设，搞得轰轰烈烈。

革命事业的发展，红军力量的壮大，使国民党反动派坐卧难安。历时近半年、双方动用兵力达100多万人的蒋、阎、冯中原大战一结束，蒋介石立即掉过头来，调集了十万人马，由鲁涤平为南昌行营主任，张辉瓒为前敌总指挥，从当年10月开始，对我中央苏区进行第一次"围剿"。敌军气焰嚣张，来势凶猛，红一方面军主力四万余人在毛泽东、朱德指挥下，诱敌深入，退至宁都县黄陂、小布地区，待机歼敌。

12月29日，张辉瓒率第十八师进入龙冈我红军布下的伏击圈，次日我军主力突然向龙冈发起猛烈攻击，一鼓作气，全歼敌号称"铁军师"的第十八师近一万人，并活捉师长张辉瓒，树立了我建军史上第一个围歼整师的歼灭战典型。

敌第十八师遭全歼后，"围剿"中央苏区之敌阵线大乱，敌公秉藩师和谭道源师仓皇退兵，企图和许克祥部会合。红一方面军主力乘敌纷乱挥戈东向，星夜追击。当谭道源师退至东韶还未及和许克祥师取得联系时，就遭红军突袭，被歼半数以上。总计两役，前后不过五天，共消灭敌人一个半师，缴枪13000枝。剩余之敌闻风溃败，蒋介石的第一次"围剿"就这样被粉碎了。

我军取得了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后，蒋介石仍不死

心，才隔一个月，又调动了20万军队，以何应钦为总司令，采用所谓“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法向我中央苏区再次发动更大规模的进攻。我主力红军从5月16日至30日，半个月内行程700里，打了五次仗，又歼俘敌军三万余人，缴枪两万余枝，痛快淋漓地打破了敌人的第二次“围剿”。

当红一方面军主力在中央苏区连续几次进行反“围剿”作战之时，我所在的部队红十六军(后改为十六师)，也在湘鄂赣边根据地与敌军打得不可开交。从1930年12月至1934年6月期间，先后进行了五次反“围剿”斗争。前三次反“围剿”都取得了辉煌胜利，第四次是湘鄂赣根据地的红十六军和红十八军奉命配合中央苏区反“围剿”，向东进入外线作战。到第五次反“围剿”，由于毛泽东同志受党内“左”的错误路线排挤，失去了对红军的指挥权，因此吃了败仗，主力红军被迫长征了。我们红十六师在宜丰等地被兵力优势的国民党军队包围攻击，大部牺牲，少数突围到平江、浏阳、铜鼓一带坚持打游击。

我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冒着枪林弹雨，炮火硝烟，打了20多年仗，虽得以幸存，但先后八次负伤，身上留下累累伤痕。给我造成终身残疾的那次负伤，是1931年秋冬之时，发生在万载的朱木桥战斗。在这之前不久，我的左小腿曾负伤。刚养好出院，便奉命从红十六军第七师调到红十八师四十八团任政委。此时，正值国民党军队集中三个师合击宜丰、铜鼓我红军根据地，我们的口号是“保卫省苏维埃”，“粉碎敌人第三次围剿”，并在万载围歼敌人另一部，算是打了个“平手”。在战斗中，我的右腿又负了重伤，腿骨被

打断了，因流血过多，医疗条件又差，昏迷了个把星期才救醒过来。部队只能用两块木板将我的断腿夹住，放在担架上抬着行军转移。

后来，我调至红军第三总医院任政委，这样可以一面养伤，一面做些党务工作。当时有一位被我军俘虏的国民党上校军医主任，在第三总医院当医疗顾问，有50岁了。一天他查看了我的病情后说："江政委，其实依我的经验看，你这条腿是可以接起来的，只是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如果红军湘鄂赣军区能有个书面承诺，万一手术做坏了也不杀我的头，那么我就肯试一试治好你的腿。"

上级终于批准了我的报告，同意做复杂的外科接骨手术。当时我身体极差，体重只有80斤重，照那个老军医的意见办，必须先养好身体，恢复体力，否则吃不消开刀再流血。他从国民党部队带过来30元大洋，算是积蓄吧！说好借3元钱给我买营养品。后买了5斤猪油、5斤红枣、45斤糯米，让我吃了整一个月。真管用啊，果然体力明显增强，长胖了许多。进行手术的第一天是清洗创口，将打断的骨头锉平，并把留在腿部肌肉中的碎骨碴清除；第二天接骨，用夹板、绷带将断骨固定起来。好在用了半身麻醉，总算从痛苦中捱过来了，想到"长痛不如短痛"，下决心要有两条好腿继续驰骋沙场，也就什么痛苦都能挺过来了。当时的医疗条件确实是很差的，连石膏都没有，完全靠用木板夹硬夹固定。所幸我才21岁，很年轻，生命力旺盛，经过40天的休息，右腿骨长好了，又能行军打仗了。美中不足的是因为创伤处锉掉了许多碎骨头，右腿明显比左腿短了一小截，行走时有点跛。

但不管怎么说，总算救下了这条腿！我十分感谢组织上的关心，也非常感激那位从旧军队中过来的医术高明的老医生。

到了 1949 年，大军南下解放了南京城，我是华野八兵团副政委兼南京警备区政委，名声传到了湖南家乡。不久接到来自长沙市的一封信，拆阅得知那位有恩于我的老军医还健在，颠沛流离近 20 年，已是古稀之人，且家境很困难，望能给予帮助。看信后心里真不是个味，我想到他也是个老朋友，又是个好老头，不能见难不救，一定要帮他。但那时我们自己都是过的“军事共产主义”生活，就是兵团级干部也拿不出多少钱来。我便将这件事对粟裕（时任南京市委书记）和柯庆施讲了，他们也都赞成帮助他，于是向公家先借了 20 元钱寄往长沙，以解这位老人的燃眉之急。

转眼到了 1952 年秋天，我回家乡探亲路过长沙时，就按门牌号去看望老军医。可惜啊，老人已病故数月，只见他的后人愁容满面，悲戚之情溢于言表，我看着挂在堂屋里的老人遗像，情不自禁地摸摸自己的右腿，百感交集，谋见一面而不可得，真是憾事。

第五章　湘鄂赣边的三年

一　六、七月事件

在中国革命斗争史上，1934 年的秋季可谓是多事之秋。当时，中央苏区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频频失利，其他一些苏区包括我们湘鄂赣苏区亦处在国民党军队重兵包围、“进剿”之中。“围剿”、反“围剿”，战火四起。

早些时候，中央曾派陈寿昌、徐彦刚等同志来湘鄂赣工作，但人事方面的局部调整，并未使整个领导层摆脱“左”的错误影响，面对十数倍于我之强敌的疯狂进攻，继续采用集中兵力、死打硬拼的办法。结果，我红军官兵虽英勇作战，根据地还是一缩再缩。原驻江西境内万载仙源一带的湘鄂赣边区机关和红军部队，被迫北向湘赣边区的幽居一带转移。仙源的失守，从某种意义上可以算是湘鄂赣苏区进入更艰苦的三年游击坚持的前奏。

转到幽居，喘息未定，当时湘鄂赣省委主要负责同志仍抱住“左”的错误指导思想，作出了更为冒险的决策，提出：

幽居也不可“居”，应向东开辟奉新、靖安、五梅山等地新区，配合中央苏区夺取南昌重镇，实现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计划。省委机关和红军主力第十六师是东进了，刚刚到达修水划坪、全丰一线不久，即遭国民党军队几个师的包围。经红十六师广大官兵浴血奋战，领导机关突出重围转移到了鄂东南地区，但该师的第四十六、四十八团却在连日掩护突围的鏖战中蒙受了巨大损失。师长高咏生同志也在西撤途中不幸被捕牺牲。

敌人并未就此罢休。当省委机关和部队匆匆向南转移至龙门山区百丈、西塔一带，国民党军第十八师、五十师、六十二师、七十七师等部，又尾追包抄过来。我们在当地无法立足，只得再向湖南境内平江转移，途中又屡遭敌军袭击，省委机关和红十六师指战员 1000 余人大部伤亡失散，队伍只剩了几百人。仅有的一部电台也坏了，湘鄂赣省委和所属红军部队从此中断了与党中央的联系。原先比较大的几块根据地，被敌人相继分割成十几块零散的游击区，其中最大的一块游击根据地是平江县境内的黄金洞地区，方圆也不过五六十里。

这次湘鄂赣边因“左”的错误战略指挥造成的严重失败，称之为“六、七月事件”。由此，比中央苏区提前两三个月进入了更加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时期。

1934 年 8 月，湘鄂赣省委在平江黄金洞的何家垅召开紧急会议。参加会议的有：省委书记陈寿昌、副书记傅秋涛、省军区司令员兼红十六师师长徐彦刚，以及涂正坤、钟期光、刘玉堂、秦化龙、邓洪、谭启龙等同志，我也列席了会议。

参加会议的同志心情都很沉重。大家认真总结了边区斗争接连失败的惨痛教训，尖锐地指出省委在前段时期工作中的错误，并批评了少数同志因斗争暂时失利而对苏区前途失去信心的脆弱观念。省委作出了新的部署，要求"迅速努力恢复、壮大红军主力，保卫并联系苏区"。边区党政军主要负责同志对当时的形势基本统一了认识，头脑比较冷静了，故湘鄂赣边一度工作开展还算顺利。

是年 10 月，省委提出用一个半月时间突击扩大红军的工作计划。随即在黄金洞的杨雀坦召开了一次省委会议，因陈寿昌同志不幸牺牲，决定由傅秋涛同志代理省委书记兼省军区政委。会议还决定，将扩红工作列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要求湘鄂赣边全体同志迅速积极行动起来，大力号召、广泛动员各地群众参加红军，保卫苏维埃。

正是这个时候，中央主力红军因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踏上了长征之途。红一方面军从瑞金、雩都、长汀、宁化一带出发，突破了国民党军队重兵驻守的安远、信丰间的第一道封锁线，又连克汝城、桂东、城口等地第二道封锁线，向郴县、宜章方向运动前进。由于我们的电台早在 7 月份就损坏了，所以大家对于这样重大的军事行动竟一无所知。当时，我在黄金洞地区担任湘鄂赣军区的东南军分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因腿部第七次负伤未愈，不能从事正常工作，使我得以参加了一项始所未料的新的工作实践——招兵扩大红军(简称"扩红")。这是我在湘鄂赣三年游击战争时期一段重要经历，其中颇有些令我难以忘怀的戏剧性遭遇。

二　三次扩红

第一次，自告奋勇搞扩红。

深秋的一天，东南特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涂正坤同志找我谈话，大意是，上级决定让我离开黄金洞，去百余里外的平江喻献区养伤。为照顾我的身体，除配一名警卫员和一位司务长负责生活外，还拨给我一匹马。战争年代人们的组织观念都很强，我二话没说，坚决服从。

赴喻献的第一天，骑马顺利地跑了几十里山路，傍晚时分遇到一所红军医院，就准备在那里休息。说来也巧，医院百十号伤员中有许多是我熟识的同志，其中还有我早年在平湘岳游击大队，以及后来在红十六军第七师工作时认识的干部和老兵，久别重逢，相互问候，一时有说不完的话。他们还是按习惯称我"江政委"，也有叫"江书记"的，这是因为我曾一度担任过湘鄂赣军区政治部机关党委书记和红军第三总医院政委。

在与这些熟识同志交谈时才知道，国民党军队和地方民团对根据地分割封锁，派出去搞粮食的同志又迟迟未归，这所医院已断炊两天了。伤员们说，这两天大伙已开始吃野菜，天气渐冷，再拖下去恐怕连野菜充饥也难保。当时根据地财政供给已经很困难，缺衣少食是意料之中的，但百十号伤员，有的已是生命垂危，吃得消再挨饿吗？我憋得坐不住

了，立即找医院负责人商量，决定将我骑的那匹马杀掉，以解燃眉之急。

那匹马驮着我走了一整天山路，还未来得及喂上一口草料，就倒下了。我实在不忍心看它咽气时的情景，禁不住背过身去……夜幕降临了，秋风瑟瑟。马肉煮熟后连汤带水盛满了两只半人高的大木桶，没有盐和作料，淡而无味，但饥肠辘辘的饿汉们根本不顾这些，喜滋滋地吞食着热乎乎的佳肴。多么好的同志啊，他们虽然身残体弱，却都是坚强的革命斗士，忍饥受冻的艰难环境，更加锤炼了顽强不屈的钢铁意志。

警卫员拿着洋瓷碗打算给我也盛些来，被我制止了，心里不是滋味。小伙子生气了，嚷道："是你叫杀的，你又不肯吃，看你明天怎么赶路！"我说："不用担心嘛，腿不方便就撑根棍子慢慢走，总能到喻献的。"

喻献区的形势也很不妙，当地的区乡干部，以及一些与红军有过联系的人，都已经离开村子躲到附近的山里去了。山腰里搭起了许多小草棚，当地人叫"山棚子"。我们在山里住下不久，因一个姓钱的叛徒告密，引来敌人搜山，险些儿遭难。

敌人袭击搜山刚结束，有一支红军游击队从我们那里路过，这支游击队是打算去浏阳一带打土豪筹款的，带队的政委外号叫"直高子"。因为我过去同他很熟，所以一见面便扯了起来。他看我也在挖野菜吃，就热情地说："渭清同志，你身边的两个同志让我带去打土豪吧，这样既可减轻他们区里的负担，也能解决一下你们目前的生活。"我觉得他这

个建议很好，就同意了。“直高子”临走时又有些放心不下，于是介绍我暂时搬进喻献区委书记黎光同志的山棚子里去住，托他们帮助照顾我几天。

一转眼十天过去了，随“直高子”游击队去浏阳活动的警卫员与司务长满载而归，背回来百十斤大米，还有好几块银元，是用打土豪搞到的稻子，碾成米换的钱，大家着实高兴了一阵子。

这件事引起了我的思考。我想：消极等待只会招致坐以待毙的恶果，只有积极行动起来才会有出路，才能更好地坚持斗争。我住的山里有人有枪，当地有党的基层组织和支持拥护红军的群众，为什么不能自己动手来解决眼下的困难呢？

有一天，我和黎光同志的妻子开玩笑说：“看你每逢做饭时都为难，总是找不到什么东西下锅，如果让我来做你们区的‘财政部长’，保管大家有米下锅，甚至可能有鱼有肉吃。”说这番话，是穷则思变的一次情绪流露。那天黎光同志一回来，他妻子就很认真地说，“住在咱家的江政委是个能人啊，你们工作中的困难为什么不找他一起商量商量？说不定请他出面，区里的干部、群众日子会好过一些。”当时，喻献区委接受了平江县委布置的扩红 30 人的任务，怎么完成，区委和扩红队长单瓮中正为此事愁眉不展。

区委领导人开会研究后，果真找上门来和我商谈工作了。他们恳切地要我为喻献的财政和扩红问题出主意、拿办法。我那时年纪轻，说话胆子大，马上夸下海口说：“只要给我一个月时间，就能扩充红军一个连，不过首先要解决财政

困难问题，干部群众没饭吃、无衣穿，就无法坚持斗争嘛！”当我把具体设想和部署谈完后，同志们都兴奋起来了，一致支持我的意见，并迫切要求尽快行动。

第二天，我撑着拐棍和区委同志一起分头行动，一个一个山棚子挨着做工作，说服动员散居在山沟里离队的原红军战士和群众参加区游击队。我对乡亲们讲，只有拿起刀枪打土豪，消灭、瓦解国民党区、乡组织和民团，才能坚持苏区，大家才有饭吃。

经过大家分头做工作，没隔多久就动员并集中了近40个人、十几枝长短枪，加上大刀、长矛，人人手中都有武器了。紧接着便开始进行简单的军政训练，老兵带新兵，大家情绪都很热烈，仅个把星期这支队伍就蛮像样了。我再次体会到，群众是真正有力量的，关键在于如何将他们组织领导好。

这支新招起来的区游击队，第一次行动夜袭平江东乡嘉义市就打开了国民党的区公所，搞到许多大米、猪肉、粉丝、海带等吃的东西，还抓了几个土豪带回山里。我亲自给土豪讲明政策，不侮辱其人格。他们原先以为性命难保，看到我们确实讲道理，相信不会有生命危险，纷纷表示愿意支持苏区政府和红军钱财，只求早日回家，日后再不敢欺压百姓。你一百，他二百，经一番“自报互评”，最后合计达一千块银洋，通知他们家人，按约好地点送上山来。钱一到手，我们立即放人，没有食言。

对筹来的这笔款子，我们商量了处理方案。我说，目前整个湘鄂赣边都处于非常困难时期，喻献区的党组织和游

击队同志们，定能顾全革命大局，愿为上级排忧解难，故建议送五百块银元给省委机关，送两百元给平江县委，我们区里留三百元用作扩大武装和解决区委供给之用。这个建议顺利通过了。当时的那几百块大洋，是可以派上不小用场的，因为按当地市价五角钱就能买到一石稻子，扯一尺布也只消角把钱。

那些天，区委的黎光、单瓮中等人可高兴了，他们急着催问下一步如何扩红。我说，大家分头去做这样几件事：买布赶制120套军服和干粮袋，再买120副雨伞和胶靴。我们大家齐心合力干，保证区里能搞起一个连的队伍来。同志们分工去做“后勤”时，我自己也撑着拐棍上了第一线。我们用召开座谈会和串门个别谈话相结合的方式，找散居在山棚子里离队的原红军战士和群众谈话，做说服动员工作，大道理、小道理都讲。打通思想的工作虽不是万能的灵丹妙药，但我始终认为，这是革命队伍中不可缺少的锐利武器。只要善于深入浅出地将道理讲清楚，群众总是通情达理的。

眼看自定的期限快到了，可喜的是夸下的“海口”也如数兑现了。一个月时间，120套崭新的军装被新入伍（或重新归队）的战士们穿上了身，虽各人手中的武器五花八门，但列队站下来时，也显得气势不凡。这支队伍的素质是比较好的，其中相当部分是重新归队的老兵，还有地方干部、党员和游击队员，也有少数新入伍的当地群众。

这一来，平江县喻献区以主动上缴经费和超额四倍完成扩红任务的工作成绩，在湘鄂赣边根据地传开了。区委向县委、省委汇报工作情况时都提到了我，于是，省委的负责

同志也知道我了。是时正值1934年岁末，省委决定在黄金洞召开全省扩红工作大会时，也通知我去参加。可惜因前段时间的劳累，我的腿伤又发作了，没能去成。

1935年初，省委派湘鄂赣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曾国祺，带着廖立云、徐敏、王桂英等同志来喻献区找我，通知我和他们一起去平浏长县搞扩红突击工作，并说省委决定我去担任该县扩红突击队副队长。队长是廖立云同志。

我在喻献山区住的时间并不长，但和当地干部、群众结下的友情却是深厚的，临别时都有些依依不舍。

第二次，省委派我去扩红。

冒着寒风，艰难跋涉百余里路途，我等一行才抵达目的地。长满络腮胡子的曾国祺，是工人出身的老同志，当时已是五十出头的年纪，我虽年纪较轻，但毕竟是个伤员，另外两位青年女同志也累得吃不消，只有廖立云感觉还好。

该地区位于平江、浏阳、长沙三县交界处，故称平浏长县。这一带自国民党军队施行第五次“围剿”后，逐渐变成了边缘游击区，再向外延伸二三十里，就是敌人控制的白色区域，而边缘区的斗争往往更艰苦、更复杂。

我们也是在山棚子里，才找到当地县委机关，见到了县委书记陈洪同志。曾国祺同志开门见山地向该县党政主要负责人讲了我们的来意，直接交代了省委布置的具体任务是“在三个月时间内，突击扩大红军一个连”。曾胡子（这是同志们对他的爱称）说：“你们这个地区，在前不久的一个半月扩红期间，工作做得不好。依我看，主要是县委没有广泛深入发动干部和群众，是领导人思想没有认真切实重视这

个工作。为什么平江喻献一个区就能动员一个连呢？这青年人叫江渭清，搞扩红突击是有点经验的，省委这次派他来具体负责你们的扩红工作，希望大家很好配合！”

当时决定，五天后即召开一次全县各区、乡党员干部会，广泛动员，尽快掀起一个扩红突击的高潮。我和县委的同志商量，“是否能集中你们手头现有的经费，派专人负责先制作几百套军装，相信这批衣服做好了，一定会有人穿的。”县里同志听了这话后，看了我一会儿，没吱声。当然，后来还是按照这个意见办了。不知怎么搞的，我仿佛已经有了一种预感，只要领导上态度坚决，善于指导，善于做思想工作，团结和依靠人民群众，平浏长县的扩红突击任务有把握超额完成。

在山腰的一个背风处，近两百人聚在一起，全县的区、乡党员干部大会召开了，其中有许多同志是从很偏远的山区赶来的。因地处白区边缘，为保障大家安全，我们在附近的山头上还安排了瞭望警戒哨，以防敌人趁机袭击。

曾国祺同志在会议上首先讲了话，在向大家简单讲明来意后，即宣布省委的决定。这位打铁工人出身的老革命做起报告来，很有些鼓动性。他声音洪亮地说：“省委向湘鄂赣全苏区提出了重要的战斗号召，‘前线消灭两团敌人，后方动员两团新兵；前方飞兵前进，后方跑步扩军’！同志们，红十六师正在向前线飞兵前进着，前不久连战皆胜，现在该是我们平浏长跑步扩军的时候了，相信在座各位在这场前方和后方展开的‘竞赛’中，决不会甘当落后者。我们几个人就是奉省委之命，来和大家一起跑步扩军的……”

接下来由我做扩红动员报告。我讲了补充、扩大红军主力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讲了湘鄂赣边根据地的坚持巩固与党领导下的革命武装斗争的关系；讲了各级地方党组织及广大党员、干部在扩红运动中应起的作用等等。当我讲到根据地的主力部队红十六师，为保卫苏区而战，前线每天都有人在流血、牺牲时，连自己也抑制不住一股翻涌的激情。

我说："革命斗争形势迫切需要老兵归队、新兵入伍，需要广大党员、干部带队参军、参战，我们都是堂堂七尺男子，都是党培养的骨干和积极分子，在根据地存亡的紧要关头，我们能无动于衷，能置革命利益、置大局于不顾吗？大家都看得见，我是个伤员，腿被白军的子弹打残了，至今也未完全恢复，但前线需要我的话，我现在就报名参军再上战场。"话音刚落，会场上就沸腾起来，许多县、区、乡干部都嚷着要报名参加红军，当场就掀起了一个签名参军的热潮。我又被眼前这热烈激奋的景况感动了。

在这次会上，我们还提出了具体部署和要求，全县的各基层党支部都要保证动员一个班，每个党小组要确保动员一至两人参军；全县各区委立即成立扩红突击领导小组，坚决地不折不扣地完成省委提出的这项"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任务"，誓做红军主力的坚强后盾。

动员大会开得很成功，曾国祺等同志也非常高兴。曾胡子说，我们几个分分工，同县委同志一道，尽快深入到区、乡基层群众中去，要趁热打铁把工作抓起来。我们听了这话，都笑着说他"三句离不开本行"。因为众所周知，胡子参加革命前就是个铁匠。

分工定下来了，我与县苏维埃主席去茅田区，廖立云同志与县委书记陈洪去另一个区。一到茅田我们就召集该区全体干部谈话，打通思想，明确任务，讨论工作计划和实施步骤。我还是相信那条经验：干部带头，深入基层，做过细的思想工作，发动群众，先将小队伍拉起来进行军政训练，以扩大政治影响；打土豪和敌区、乡公所，以鼓舞士气，最终达到壮大队伍，完成并力争超额完成扩红指标的目的。说来也怪，才半个多月时间，茅田区就动员到30多个人参加红军，迅速组织成了一个武装排。

当时正值"三九、四九冰上走"的时节，可有了这些初步成绩，大家心里都热乎乎的，一个个喜上眉梢。曾胡子召集我们开碰头会时，各个区扩红工作进展情况也都报了上来。除去我们茅田区外，其他五六个区已动员到的人也有30余名，这样全县合计就有70个人了。他听了汇报后，兴高采烈地说，"部队打仗就讲究个首战胜利，我们的红十六师元旦那天就打了个大胜仗，这可是个好兆头啊！我们这半个来月的工作，也可以说是首战告捷，同样出现了令人鼓舞的好兆头。我代表省委（曾是湘鄂赣省委常委之一）祝贺大家，感谢大家！希望同志们还要抓紧时机，乘胜前进，一鼓作气完成任务，能超额那就更好。依照这样的进度，我看再有一个月时间，就马到成功了。"

碰头会上洋溢着愉快的气氛，只有廖立云同志闷声不响，因分工由他负责的那个区，还没有做出什么成绩，曾胡子对此事有点恼火。后来他向省委写了报告，其中提到廖工作不力，建议免其平浏长扩红突击队队长一职，提议由江渭

清接任扩红突击队队长。报告由党的政治交通送往省委，省委和秋涛同志很快就批了“同意”两个字。

没多久，曾国祺、廖立云等同志奉召回省委，平浏长的扩红工作就全交给县委和我了。曾胡子这个人工作大刀阔斧，待同志感情却颇细腻，他临走时特地向县委负责同志交代，说“江渭清这个年轻人，是个革命坚决的好同志，他是养伤期间来你们县帮助工作的，你们一定要照顾好他的身体，支持他的工作。”后来陈洪同志把这些话告诉了我，我深深感到上级党组织对我的亲切关怀。

继扩红“首战告捷”后的第二个月，全县又动员到了200多个新、老兵；到第三个月，平浏长县扩红突击的累计总数达到420人，超额三倍多完成了省委下达的任务。到这时，才觉得我起初的思想还有点保守，因为制成的新军服差点儿不够用。也是到这时，陈洪他们才对我说了“真心话”，他们说我第一天刚到县里来，八字还未开始画一撇，半个人影还不见，就提出赶制几百套军装，当时真叫人心里纳闷，以为我这个年轻人不是胡乱吹牛，便是好大喜功。实践的结果，使我们对今后的工作更有胜利信心了。

我回说，这如果也算是功劳的话，那么应该将功劳记在县委、区委的帐上，且不说我的腿有伤，行动不便，即使我长着三头六臂，一个人的作用，少数几个人的作用，总是有限的。更准确地说，这次扩红的成绩应归功于平浏长县的全体干部、党员和广大拥护我们党的群众，他们才是革命力量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真正源泉。

转眼又到春天，我们驻地周围，野杜鹃花盛开，山上山

下一片火红。前方不断传来振奋人心的好消息，红十六师主力连连出击敌人，其中两战崇阳高枧，俘敌官兵就有四五百人，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这些胜利，极大地鼓舞了湘鄂赣边的人民群众，根据地的形势开始逐步趋向好转。

第三次，担任扩红突击总队长。

1935 年 4 月，省委发来通知，要我去黄金洞参加全省的扩红工作总结大会。我向省委写了一封信，说腿伤未愈，行动不便，可否请假。哪知傅秋涛同志看了“告假信”后，急切地对信使说：“开这样的会，渭清同志一定要来参加，我们派担架也要把他请来。”既然如此，只好赶去参加会议。

省委书记傅秋涛同志在会上讲了很多。他说，年初省委曾向湘鄂赣边全党提出一、二、三月以扩红为中心，各县学习了平江县的经验，扩红取得了可喜成绩。东南地区八个县，扩红总数是 1200 余名，西北地区各县也动员了 700 余人参军，但相比之下，还要数东南地区的平江做得最好。平浏长苏区山大人少，也超额完成了任务。我们的主力部队红十六师，在频繁作战中虽然伤亡不小，但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不仅连续打了许多胜仗，而且又扩大到 2500 多人，拥有一千四五百枝枪。为了保障和巩固胜利，省委现在提出红五月扩红冲锋计划，争取六、七月再发展新的胜利。

秋涛同志还说，当前形势与去年同期相比，已有基本好转，这次大家认真总结了去年“六、七月事件”的经验教训，是非常有益的。我们下一步的工作，要进一步巩固中心区，恢复边缘区，还要领导和开展好敌占区的工作，但这些工作与扩红突击、补充主力都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因为武装斗争

的坚持和胜利，是苏维埃根据地一切工作最基本的保证。最后，秋涛同志说，经省委常委研究决定，任命江渭清同志为湘鄂赣边扩红突击总队长。

会后，秋涛同志找我谈话。我说，涂正坤同志原是扩红突击总队长，我在他领导下工作过，了解他。他有领导能力，工作经验丰富，前段时期他负责边区的扩红突击工作，是有很大成绩的。省委这次免了涂正坤同志的总队长职务，我觉得似乎有些不妥。所以我建议，还是由正坤同志担任总队长，我给他当个副手，一定努力协助好他的工作。

秋涛同志坚决不同意我的意见。他认为涂思想保守，不适宜再担任这个职务。他叫我大胆地将担子挑起来。我只好服从组织决定。

1935年的“红五月冲锋”，是我参加的第三次扩红工作。虽然有前面两次区、县组织动员扩红的成功经验，但对眼下担任总队长职务，负责全边区的扩红突击工作，总觉得担子很重。好在当时各方面条件都比较有利，主力红军连连打胜仗，党政军民情绪振奋；边区环境比较稳定，人民群众更加拥护、信赖党；加上这次省委扩大会议，统一了大家的思想，“天时、地利、人和”，开展“红五月冲锋”，也就有把握多了。

当年湘鄂赣边区五月扩红的生动情景，真是令人难以忘怀。许多地方出现了“锣鼓震天响，标语贴满墙，妻子送丈夫，父母送儿郎，昨天拿锄头，今日上战场”的动人场面，很快全边区就动员到2500多人参加红军主力，红十六师部队又恢复了三个团（第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团）的建制，总

兵力扩大到5000余人。个把月时间，部队人数翻一番，这是很了不起的事情。

接着，边区机关和红十六师转移到湘鄂赣三省交界的虹桥、长庆、钟洞等地整训。恰在此时，原进攻中央苏区的国民党汤恩伯、樊松甫等部，伙同湘鄂赣三省保安团队，开始向我根据地“进剿”。敌人在西起平江、浏阳，东至铜鼓、修水、武宁，南起株萍铁路，北至通山、崇阳的广大区域内，逐步形成了一个包围圈，到处拉伕派差，构筑碉堡工事，加紧准备向我红军主力发起大规模进攻。

但是，对于如此严重的敌情，省委和军区的领导同志却未能及时察觉，还沉浸在上半年取得的胜利喜悦之中，麻痹松懈情绪导致对来犯之敌失去了应有的警惕。

记得就在那次整训期间，我向省委和秋涛同志提过建议。我说，边区机关和主力部队集中的时间不宜太长，短时期休整后，应分别转移，帮助各地区开展工作。国民党千方百计想消灭我们，要随时准备应付敌人的突然进攻。我还特意讲了一句“长安虽好，却非久居之地啊！”秋涛听后，并没有采纳，大概他觉得我有点太多虑了。

直到敌人的合围计划接近完成，边区党政军负责同志才匆忙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应急计划。

当时提出两个方案：一个是打算先东向修水突围，去修铜宜奉边区，尔后俟机南下高安、奉新，打开几个县开辟一个新区。这个计划如果难以实现，那么再沿罗霄山脉入湘赣苏区。另一个是，如果湘赣苏区也进不了，就沿通城、崇阳、阳新、鄂城一线迂回，北渡长江赴鄂豫皖之大别山区。如果

连这个方案也不能实现，那就再由修水、武宁到赣西北的永修、瑞昌、德安一带打开一个新区。

突围计划确定后，本应立即付诸实施，在困境中力争主动。但省委却在考虑开辟新区所需要的干部问题，花了一个多星期去动员和调集地方干部。时间就这样耽误了，使自己陷入了被动局面。

就在主力准备突围前夕，大约是6月中旬，秋涛同志和省委两名常委集体找我谈了一次话。秋涛讲，“敌重兵压境了，眼下形势非常严重，为避敌之锋芒，边区机关和红十六师准备就在这几天内突围，转移到外线活动。省委研究决定派你负责咏生中心县委的领导工作，并兼管这一地区的地方武装部队，和当地同志一起坚持原地斗争。”他还说，“这次敌人来势凶猛，我们转移后，敌人定会重点‘清剿’这块苏区，所以留下来坚持的同志很可能要更艰苦一些，但省委相信你们是能够坚持这一地区斗争的。”

谈话后，有几个很熟悉的战友曾私下里和我开玩笑，“渭清同志，这可真是‘受命于危难之际’啊！”然而，我当时已无这等谈笑的雅兴了，一门心思只是想着该如何完成好省委交给我们的任务。

6月14日，红十六师和边区机关东向修水方面突围，而我们留下的人则向西稍作了些移动。从此，坚持湘鄂赣边区的游击战争，又进入了一个更加艰苦的时期。

三　去咏生县

咏生中心县委当时下辖咏生、平湘、平通、临岳四个县委。所以称咏生县，是为纪念高咏生烈士而命名的，该县位于汨罗江西北地区。

6月突围之前的那一任县委书记是钟秀存，我接替他工作时，县委组织部长李化玉和宣传部长黄耀南等都留任未动。我一直做部队工作，这次独当一面领导一个地区的工作，很多事还得从头做起。第一步就是召开咏生地区党政军负责干部会议，了解情况，讨论形势，统一思想，部署工作。

我在会上讲了红十六师主力转移去外线作战，这个地区留给我们坚持，这是省委对我们最大的信任。目前的严重形势是暂时的，经过红军主力外线的英勇战斗，和我们顽强地坚持原地斗争，困难局面不久就会过去。但大家必须对今后工作的艰苦性、斗争的尖锐性、环境的复杂性，有足够的认识，时刻保持头脑清醒和高度警觉，只有这样才能顺利地坚持到红军主力重新打回来。特别是我说的“在思想上作最艰苦的打算，在工作上作最大的努力”这句话，大家很赞成。

大家还讨论了下一步工作的具体部署。其中有立即起草并印发（我们当时有台油印机）告民众书，讲清形势，稳定民心，号召群众和我们一起保卫苏区；兵工厂、被服厂和医院伤病员立即向山区转移；除山区外，各地党政机关与群众

组织转入半秘密活动；开展锄奸斗争，肃清根据地内敌特；继续动员群众参加县独立营、区游击队，扩大地方武装力量。

中心县委决定，派一部分干部立即分赴各县、区基层，传达这个计划部署，帮助、督促各地贯彻执行，以积极的姿态来适应形势的变化。

不久，敌人大批涌进我们活动的区域，游击根据地环境一天天恶化。国民党军队到处杀人放火，搜捕党员、干部，摧残红军家属，少数不坚定分子开始动摇，有的甚至自首叛变，中心区渐渐缩小。当时，除平江的西乡与北乡，其他地区基本上都垮了，原地坚持完全进入游击状态。

尽管形势险恶，大多数同志并没有丧失信心与勇气。那时，我们控制的县、区武装还有 200 多人，采用灵活多变的游击战术，昼伏夜出，割电线、破公路、打冷枪，袭击敌区、乡公所，搅得敌人无法安宁。这些活动规模虽小，但对人民群众影响很大，它传递了一个信息：共产党与当地人民生死相依，苏维埃没有垮，红军还在战斗。

11 月间，转入外线作战的红十六师遭受许多严重挫折后，其中一部又辗转回到了黄金洞一带，人数虽然损失过半，但在咏生地区坚持斗争的同志看到部分主力又杀回来了，仍然是高兴的。为了补充主力部队，咏生县的独立营（此时已发展到 400 余人了）全部加入了红十六师的第四十七团。

这样一来，我们自己掌握的地方武装少了，坚持工作显得更加困难，活动起来不那么自如了。生活上也常常有一顿

没一顿的，非常艰苦。

到了年底，省委在平浏山区的辜家洞召开扩大会议，各特委、中心县委书记都去参加了。在人烟稀少的深山老林里，我又见到了傅秋涛、涂正坤、曾国祺、邓洪、钟期光、刘玉堂、谭启龙等同志。这一年冬天，天气奇冷，省委机关许多干部身上还穿着夏天突围时的那套衣服。吃的是野菜、竹笋兑点米煮的稀饭，睡的是茅草山棚，偶尔几天中能吃上一顿米饭，那就算很不错的了。会议期间天公不作美，纷纷扬扬地落了一场大雪，白雪封山后解决生活给养更困难了。

夜晚，我和钟期光、谭启龙三个人挤在一个小棚子里，靠烤火取暖还是冻得吃不消。冬日的夜晚总是那么漫长难捱，而我们当时连杜甫所说的冰冷似铁的布衾也搞不到一床。钟期光同志冻得牙齿上下打颤，浑身瑟瑟发抖，因为他穿的衣服最少，腿上套的还是夏天突围时我就见过的那条短裤，加之他那时情绪不太好，由师政治部主任降为普通文书，叫人看了更为同情。我虽也只穿三件单衣、两条单裤，还是从身上脱下一条单裤送给他。他感动地说，“渭清，这才真正叫‘雪中送炭’，我就不客气收下了。”所以我的老战友谭启龙同志，后来一直夸赞我具有“松柏精神，云水风度”。这虽是过誉之辞，但多少也反映出我们这些老同志之间的深厚阶级情谊，是经历过战争和生死考验的。

1936 年春，省委为加强对湘鄂赣边游击根据地的领导，重新将整个边区划为四个大区，即东北区、东南区、西南区、西北区，每个大区成立一个特委和一个军分区；同时提出努力创建十个独立营的扩军计划，号召根据地军民在党

的一元化领导下，广泛开展群众性游击战争。不久，省委机关部分干部与机关警卫队组成了一支百余人的游击队入赣，在万载、宜丰、高安、分宜一带活动了两个月，使队伍迅速扩大到了近千人，根据地的形势又开始部分好转了。

就在这时，我自己遇上了险情，差一点牺牲。已是入夏季节，我带着咏生中心县委的财政部长涂玉华和粮食部长周宜高及一个警卫员，一行四人去周坊山区检查工作。我们还没有找到区委机关和负责人，就被突然遭遇的一股敌人包围了。那次的确非常危险，周宜高同志当场牺牲，涂玉华同志负了重伤(后来也牺牲了)，警卫员失踪，我自己也负了轻伤，我们付出了血的代价。后来几经周折，还是依靠当地群众的掩护、帮助，我才得以脱离险境并与区委书记汪兆民接上关系。

我在咏生中心县委工作的一年零四个月间，再次深刻体会到，革命战争每时每刻都不能离开人民群众的支持，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只有同人民群众保持血肉联系，才能生存，才有可能战胜敌人。

1936 年 10 月，游击坚持整整两个年头过去了，在萧瑟秋风中，我又来到了还是第一次搞扩红工作的地区——平江县喻献，参加省委在该区乱石坪召开的会议，总结去年“六月突围”的经验教训和近半年多来的工作。

四　到西北地区

在喻献乱石坪会议快要结束时，又出现了一件出乎我意料之外的事情，省委决定再次调动我的工作。在向我交代具体任务时，省委负责同志说，湘鄂赣苏区游击坚持的形势依然严重，各个地区工作发展情况也很不平衡，其中要数西北地区最为落后。省委认为，西北的局面之所以迟迟打不开，敌人频繁进攻是一个原因，但主要是那里的领导工作不力，一把手犯有思想右倾的错误。省委决定派我去西北地区负责党的特委和省苏维埃驻西北代表团工作，并兼任军分区政委。

我明白，省委派我去不仅是接替秦化龙同志的工作，打开西北局面，而且还要组织发动对秦化龙同志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开展斗争。说实话，上级无论派我去什么地方工作，我都会无条件服从组织决定，但是要我去批判秦的机会主义，我当时的思想是不太通的，不大同意那种说法。

我宛转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省委决定我去西北地区工作，我坚决服从，但由我去组织领导反秦的机会主义的斗争，似乎觉得不够稳妥，请省委考虑是否可派一名常委同志亲赴西北地区，以便更慎重地处理这件事。"这个建议，省委采纳了，决定派常委兼宣传部长谢亦吾同志与我同去。

西北特委机关，当时驻鄂赣边的九宫山区，我和谢亦吾

等同志到达那里时，已是1936年11月初。特委下辖四个中心县委、若干县委，都分散在各地坚持，摊子铺得不小。谢与我商量，打算先召集特委扩大会议，向该地区党政军主要负责同志传达省委决定，尔后再逐步向基层组织传达。

在特委扩大会议上，谢亦吾同志代表省委宣布了对我的任命，接着又传达了批判秦化龙同志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决定，号召大家一起开展对秦的思想斗争。我则讲省委对西北地区全党寄予很大希望，号召各级党组织为迅速扭转和打开这一地区的工作局面，积极行动起来。具体要求是：各中心县委、县委和所辖区、乡基层党组织，深入开展对群众的宣传工作，提高广大人民群众对苏维埃的信心；各级党委都要抓武装，继续进行扩红动员工作，各县都要尽快建立起一支游击队；迅速整顿和大力发展党的组织，扩大党的政治影响；广泛开展群众性游击战争，巩固中心区，扩大边缘区，并开展白区工作。

当时西北地区的武装建设工作确实搞得不好，堂堂军分区，统共才有十几个兵。我提出要尽快建立军分区独立营，各县要将建立游击队的任务放到首要位置，没有一定的武装，我们将寸步难行。

这一年的冬天来得很早，12月初就下了一场大雪，没几天便发生了著名的“西安事变”，当我们从国民党报纸上得到蒋介石被扣押的消息，干部和群众高兴得跳起来，都为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叫好。也有同志说，“干嘛光扣押？干脆杀掉算了！”

后来又听说蒋介石给放掉了，大家很想不通。记得省苏

维埃政府还发表过一个“讨伐张学良私放蒋介石的宣言”。我们呆在山沟里，对外界大势并不清楚，同党中央又没有联系，一度竟把闷气都出到张学良将军身上去了，直到几个月后知道事情的原委，才消除了误解。

西安事变刚发生的那段时间，国民党内部好像显得很乱，连我们驻地周围据点里的白军也撤了，保安团、队也跟着收缩起来。我们以为不知哪里又发生了军阀混战。

趁敌混乱撤退之机，西北特委在冷水坪召开干部大会，提出了“恢复苏区，抗日反蒋，巩固和发展群众游击武装”的号召，同时开展扩红突击动员，有数百人参加红军游击队，成立了军分区独立营，并迅速扩大了边区。

1937年初春，傅秋涛同志率湘鄂赣军区主力一部来西北地区活动，决定将我们刚组建的分区独立营大部编入主力部队，仅留下四个班给我们。这支主力部队集训数天后，由九宫山附近的三界尖下到崇阳县境，与敌保安第十团遭遇，激战中许多同志负伤和牺牲。秋涛匆匆将一批伤员托我们照料，他自己又返回平江地区去了。3月间，我们接到上级通知时才知道，省委书记已改由涂正坤同志担任，秋涛同志改任省苏维埃主席兼省军区政委。

是年春夏间，全国政治形势发生了微妙变化。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中共中央为促进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实现，向国民党提出了五项要求：(一)停止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二)保障言论、集会、结社的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三)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四)迅速完成对日作战的一切准备工作；(五)改善

人民生活。中共愿意作出四项保证，即：（一）实行停止武力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方针；（二）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三）特区实行彻底的民主制度；（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国民党在2月15日召开的五届三中全会上通过了一个含糊地部分接受中共中央提议的团结御侮、共赴国难的“决议案”，国共两党在陕甘宁地区的军事冲突和缓了；但另一方面，国民党却又加强了对南方数省红军游击队的军事进攻。这种在特殊背景之下产生的“南紧北松”的局面，一直延续到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的一段时间。

国民党军队对湘鄂赣边西北苏区根据地的“围剿”进攻是频繁的。由于敌强我弱，我们在这一地区游击坚持异常艰苦。但在逆境中，当地党政军民仍进行着顽强的斗争，虽有少数意志薄弱者脱离了革命，甚至有个别人充当了可耻的叛徒，但绝大多数同志是坚决革命的。

我们紧紧依靠人民群众的支持，利用九宫山区和通城县山区有四十八洞的复杂地形，与敌人的“清剿”部队“捉迷藏”，用灵活的游击战术袭击消灭小股之敌，积小胜为大胜。记得当时张藩同志也率一支部队来我们西北地区活动过一段时间。

我来西北特委任职不久，谢亦吾同志就离开鄂东南（属西北特委管辖）返回了省委机关。这时，发生了一件在当时是很新奇的事情。那天上午，在我们驻地对面高山的山头上，出现了一股国民党部队，哨兵来向我们报告后，我们一面吩咐大家立即做好战斗准备，一面由我们领导自己去前

沿观察。奇怪的是，红、白两军相距不远，相互发现目标后，对方30余人竟持枪站在原地不动，没有任何准备向我方进攻的样子。对峙了好大一会儿，我们决定派人主动去联络，原来是国民党崇阳县保安团一个排集体起义，来山区寻找红军游击队接头的。再进一步了解，那为首的排长和三个班长都是秘密党员，是我们的同志。这次起义成功，地下党崇阳县委的同志做了许多工作。

我们为起义的新同志举行了欢迎会，表扬他们投奔红军、参加革命的正义举动。不过，我们也客观地讲了苏区严峻的斗争形势与困难的生活状况，使他们对今后一道坚持艰苦游击斗争有充分的精神准备。

我们就是有这样的气魄，即使是对俘虏，都要做思想工作。特别是对敌方的下级军官和士兵，向他们宣传红军主张，讲清楚道理后，愿留者欢迎，愿走者发路费欢送。国民党造谣说共产党“共产共妻”，“杀人放火”，他们实际一看，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共产党讲政策，光明磊落，不谋私利，跟国民党军队完全两个样子。所以很多人愿意留下来，放回去的，也是说共产党好话的多。

我们西北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曾多次下山，袭击国民党区、乡公所，搞武器弹药，打土豪筹款。只要环境许可，我们总是要召集俘虏讲话。我们在讲话中指出，当区丁、乡丁的人，大多数是被逼迫来的，是为了生活出路；当保长、乡长的人，是上面委派的，有的人也是为形势所迫，这种处境我们是能理解的。我们彼此是一次生，二次熟，三次四次交个朋友。不要看眼前红军、苏维埃的力量还不大，然而星星之火

可以燎原，将来定是共产党领导的工农天下，奉劝诸位三思而行、早留后路。

在开展政策攻心的同时，我们注意区别对待，宽大与镇压相结合。对那些一贯残害百姓、作恶多端、非镇压不足以平民愤的惯匪、恶霸和其他反革命首恶分子，我们毫不手软，该杀的杀，以此达到动摇、瓦解敌人的目的。

是年 5 月间，湘鄂赣省委根据党中央倡议的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主张，决定成立“湘鄂赣人民抗日红军军事委员会”，军委会主席是傅秋涛，委员有涂正坤、邓洪、刘玉堂、谢乾、钟期光、谭启龙、江渭清、明安楼等同志。

我们当时曾以湘鄂赣人民抗日红军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向全国发表声明，公开主张并呼吁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省委一方面派专人赴延安和党中央联系，请示在关键性的历史转变时期，应采取的方针政策；另一方面，要求湘鄂赣边区各游击根据地，为与国民党地方政府或军队谈判，积极作准备。

第六章　迎接抗日高潮到来

一　适时应变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一声炮响，中国人民开始了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8月，陕甘宁地区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并开赴华北前线作战。与此同时，国共两党对分散在南方闽、粤、浙、赣、湘、鄂、豫、皖8省15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的改编问题，加紧进行谈判。

此时，在鄂东南的一些叛徒和国民党的县长曾分别写信给我，说"共产党的代表已经上了庐山，共产党现在已经服从国民党的军令、政令"；"陕北朱毛红军也向国民党投降，并准备改编为国民革命军"；还说了些"识时务者为俊杰"之类的话，意在"劝降"。对此，我们当然嗤之以鼻！当时，虽然消息闭塞，但抗日战争爆发这样的大事，我们还是知道的。况且在西安事变之后，我们就知道"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主张是共产党提出来的。我们坚信黑暗终将过去，光

明就在眼前。

为了分析形势、统一思想、研究对策、适时应变，我提议召开了特委会议。会上，我分析说，目前形势正在急剧变化中，显得复杂、微妙。日本人的进攻，激起了全民族的反抗。国共两党有可能重新合作，但国民党部队对苏区根据地的压力并未减弱。一些人的叛变引起的思想波动也不能低估。共产党和红军是决不会向蒋介石集团投降的。根据多年斗争的经验，我们可以从敌人的报纸信件中作分析、判断，有时从反面去理解，倒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停止内战，共同对外”的口号，早在红军《北上抗日宣言》中就提出了。现在外敌入侵、民族矛盾迅速上升为主要矛盾，我们也应作好思想和斗争策略转变的准备。我提出了这样的建议：一方面将苏维埃政府改名为抗日民主政府，把红军游击队改变为抗日游击队；另一方面扩大宣传共同抗日的政治主张，注意联合各界力量共同抗日，广泛争取同情和支持。

可是，由于很长时间以来，苏区与党中央的联系中断，无法了解党中央对当时局势的准确分析和具体的方针、策略，尤其是未得到中央的文件指示，因此，我的建议一时未被多数人接受。特委组织部长和秘书长都是常委，他们与我共同战斗多年，感情是很深的，但会上却不同意我的提议，认为根据不足，甚至说是“受投降派的影响，是不是也想叛变”，真使我哭笑不得。

为了解当时的情况和党中央的方针策略，我们决定部队进行一次军事侦察行动。出发前，号召指战员们：（一）不打硬仗，保存实力；（二）打土豪和筹款；（三）搜集各种书

报、杂志、文件。第三条是主要任务，是这次行动的目的。下山后，在长(沙)武(昌)铁路线上，干净利落地打下了羊楼司、羊楼洞两个小车站及附近的一些国民党区、乡公所，搞到了一批报纸和材料。行动近一个月，回到九宫山根据地后，同志们看了这些报纸和材料，大开了眼界，都围在一起议论分析抗战时局。报纸上有国民党外交部发表的声明，说“中国之领土主权已横受日本之侵略，惟有实行天赋之自卫权以应之。”这说明，国民党政府自“九·一八”以来所执行的不抵抗政策已有了初步改变。还有一份《中共论革命的三民主义》的材料，其实就是被蒋介石拖了一段时间，至9月才公开发表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其中提到“争取中华民族之独立自由与解放，首先须切实地迅速地准备与发动民族革命抗战，以收复失地和恢复领土主权之完整”;“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并待命出动，担任抗日前线之职责”等等。

得到这些消息，我们分外高兴，立即决定再次召开特委会议。我在会上说，过去我们对形势做了一些主观判断，虽大致正确，但并未作出结论和决定，现在时机较成熟了。在民族危亡的艰难时刻，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既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还必将产生更深远的历史影响。我们要适时应变，根据我区的具体情况，改变斗争策略，采取新的措施。

在新的形势背景下，没费多少工夫，领导同志们的思想就基本统一了。会议同意将苏维埃政府改为抗日民主政府，部队也改称“湘鄂赣抗日游击第三纵队”，我任纵队长。在部

队改名称的过程中，个别同志对“红军”两字感情很深，舍不得改掉，有的甚至流了泪，对这些为革命出生入死、忠心耿耿的同志，我打心底理解他们，但不得不耐心做说服、解释工作。我说：“同志哥，问题不在于名称、番号的变更，主要是我们部队的实质，抗日游击队仍然是人民自己的队伍，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永远是政治上、组织上独立的，并不受国民党任何限制和约束，我们要解放劳苦大众的目标和决心是不变的，和国民党合作是为了团结更多的人一起打击日本帝国主义。”

鄂东南根据地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逐步形成的新形势下，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局面。指战员们为能尽快下山，开赴抗日前线，为国为民作战而兴奋得夜不能寐。经特委常委们研究，决定立即向国民党省、县政府发通电或信函，阐明我游击纵队愿与友军合作抗日的愿望。因此，坚持了三年之久的湘鄂赣边区内战才和缓下来，我们被国民党部队重兵包围的困境亦开始有所好转。

二　呼吁合作抗日

第二次特委会议决定向国民党当局发通电、公函后，我们便忙于搞起这类颇为讲究的“文字”工作来。通电拟发湘鄂赣等省，省内各有关县拟发信函。内容是我亲自提出并与大家一道商议的。大意是“自卢沟桥及淞沪战事以来，中华

民族生死存亡乃系千钧一发，……我们愿与全国各党、各派、各军、各界共为实现中山先生之遗训而努力，联合起来，扫荡敌虏，收复失地，彻底恢复领土主权之完整。”

通电、信函发出数天后，湖北省主席兼武汉行营主任、第四预备军司令长官何成浚首先作出了反应。他按约派出两个代表来与我们接谈。一个是武汉行营副官长，另一个是岳阳警备区司令。为安全起见，我们把见面地点安排在离我部队驻地十里路外的一个庄子上，并再三叮嘱我方接头代表，要提高警惕，注意有无大批国民党军尾随其后。

在确认情况正常之后，那两位国民党代表才被接到我纵队司令部驻地。看他俩身穿黄呢军服，武装带上挂着手枪，那副趾高气扬的派头，可谓神气十足了，我倒真想试试那金玉其外的内瓤里究竟揣的什么货色，略作寒暄就进入了正题。

他们说，“江司令（此时已改称纵队司令），贵方通电、信函，省方皆收悉，请先讲讲有哪些谈判条件，我等两人受何主席委托，可全权处理有关具体事宜。”好一对“特命全权使者”，听那口气，仿佛谈判就这么简单。

我说，“条件有三，第一是用何成浚、江渭清的名义共同签发通电，首先保证双方从此停止一切敌对行动；第二是停止军事行动后，军费给养等均由省方妥善解决；第三是具体谈判过程，暂定用三个月时间。以上诸条，请务必转告何主席，他如同意接受，我们就谈判，否则，话不投机……”下半句话我故意不说了，用轻松的哈哈笑声代替了潜台词：“否则只好继续坚持游击根据地斗争。”

何成浚派来的两位代表对我所说的第三个条件很不理解，他们觉得无须用三个月时间谈判。我解释说，“我们如何谈判，是要请示共产党中央的，要请示朱总司令、毛主席，这不是简简单单随随便便的小事情；何成浚虽是省主席，他就不要请示蒋介石啦？恕我直言，就怕这么重大的事情，两位未必就能擅自作主，为慎重稳妥，拟用三个月时间计议，双方都可从容行事。”

其实，当时我们与党中央的联系还未完全接通，所言要请示总司令、主席之说，是为了引起国民党方面的注意和重视，有利于合作谈判工作的进行。何成浚接到我们提出的三个条件后，不久就给我写了一封信，并派原先那两个代表送到我军驻地来。信上说：

渭清纵队司令台鉴：

来函敬悉，你是有志之青年，过去误入迷途，现在幡然觉悟。政府站在宽大为怀，不咎既往立场，准予自新之路，望台端立即统率所部开赴岳阳，整训受编，连发三关饷，并授予台端上校军衔。

进退由台端采纳，否则以武力解决，专此奉达。

即颂

公安

何成浚

我将该信的内容公开宣读后引起了巨大反响。指战员

们气愤地说，“这不是在公开招降吗？干脆，我们不跟国民党谈判了，有本事就再来干一仗！”纵队参谋长饶惠谭同志更是怒不可遏，抡起大刀，就要杀两个谈判代表。这一来，两个裹着呢军装的代表原形毕露了，他们吓得跪在地上，连声喊“江司令饶命！”我制止住参谋长要落下去的大刀，和缓地说：“自古以来就有‘两军相争，不斩来使’的规矩，留他们两条命。”并对魂不附体的代表说：“何主席完全是误解了我们的意思，我军是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团结一致、共同抗日，才提出谈判的。根本不存在‘入迷途要醒悟’的问题，要我们投降受编绝对办不到。假如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能被招降的话，就不会坚持到今天了。全国人民都不愿做亡国奴，坚决要求团结抗日，这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请再次转告何主席，望他慎重考虑我们合作谈判的建议，三思而行。”我又向何成浚严正申明我军的立场和条件，并留下那个武汉行营副官长代表，让那岳阳警备区司令回去送信。说是留下一个作客，实际是扣作人质，那家伙见回不去了，吓得面如土色。我安慰他说：“生命安全由我负责。共产党人说话是算数的，不必害怕。”

为了回敬国民党顽固分子的嚣张气焰，也为了显示我军的实力，促进谈判，我们组织了一次袭击县城的行动。一天夜里，我纵队除留小部防守驻地，其余全部下山，大造攻城声势，但只将通城东门一个排的国民党军歼灭后，就按原定计划主动撤出战斗，仍回原地。我们采取的这一举动，使驻通城的一个团驻军若惊弓之鸟，发电告急，四出求援。第二天，包围我根据地的八个团兵力急忙开往通城。第三天，

开来了近两个团的兵力向我驻地发起进攻。

我当即命令指战员全部进行埋伏，将一个班的号兵集中起来。待敌人距前沿阵地30米时，冲锋号响起，再全线出击。大家肚子里正闷着一股子气，个个摩拳擦掌，决心打个漂亮仗回敬何成濬，战斗情绪十分高涨。

国民党保安团的战斗力是很弱的，100余人的进攻，根本不在我们话下。伴着雄壮的冲锋号声，我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扑下山去。结果，很轻松地歼灭了敌人的一个多营。

我召集俘虏们讲话，上了一堂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要一致对外、抗日保家的政治课，收到良好效果。最后每人发一块银元放了回去。还托俘虏带封信给通城县保安团团长。大意是，这次冲突纯属误会，两军交锋贵部亦是被迫，我部正与省方何主席进行合作谈判，如此相争必大伤中国人之元气。现将所俘官兵如数奉还，敬请查收，后会有期，等语。连同那位中将副官长也一起放了。

这两次战斗，使我军声威大振。方圆近百里的老百姓拍手称快，扬眉吐气，亦震惊了国民党当局，舆论压力终于使何成濬等不得不有所收敛。几天后，那位少将使者带着通城县长曹公锦再次上山，送来何的信。这封信的口气大大变了样。说共产党方面的董必武先生等已抵武汉，国共合作和谈正在进行中，省方答应我提出的三个条件，暂将谈判地点就近设在通城，特派代表前来请我下山云云。经过斗争，争取和谈有望了。

三　在国共谈判桌上

湖北通城，当时是国民党军队“进剿”我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据点之一。我亲自进城接洽谈判事宜，这无疑是进狼窝、入虎穴，去不去？如何去？何成浚是否会变卦？这一系列的问题，使许多同志很发愁，担心敌人搞阴谋，设圈套。在红军队伍中，我和战友们相处多年，同生死共患难，感情很深，因此，我理解大家的心意。但国共第二次合作是件大事，人民的利益、民族的危亡、党的事业高于一切，哪怕明知是“鸿门宴”，我也得去闯一闯。经和其他几位领导人反复研究，决定还是我亲自去为妥。

就在我准备下山前，董必武同志派了一名政治交通送来了指示。当他从衣服的夹缝中拿出一张折得很小的纸条交给我时，我激动得半天说不出话来。自红军主力北上后，这些年同志们日日夜夜思念着党中央，如今终于和中央接通关系了，就如经历千辛万苦的游子又回到亲娘的身旁……

字条内容很简单：

独立自主靠山扎

董必武

后来我才清楚，1937年9月23日，蒋介石发表了承认中国共产党合法地位和国共两党合作的公开谈话。根据两

党达成的协议，董老代表我党中央在汉口主持八路军办事处工作。他已从何成浚处知道了我纵队正要与国民党地方政府谈判之事，所以才及时发来指示，提醒我们要谨慎，要小心从事，谨防上国民党的当。

遵照董老指示精神，我将部队领至山脚驻扎，这样可进可退；同时带一个秘书和几个警卫员按约赴县城。一路上，我的秘书在我身边喋喋不休，说："你胆子怎么这样大，敌人有一个团驻城里。我们就几个人去，这不明摆着是自己送上刑场吗？游击战打了好多年，敌人想用许多大洋来买你的头，也未能捞到你半根毫毛！这下倒好，不花钱反主动贴上一条命。"还说我临死拉他做垫背的。从这些话中可以看出，当时有许多同志对国共合作谈判，短时期还不能适应，思想弯子很难转。

下午，我们一行进了通城，虽已立秋，但天气很热，大家都跑得一身汗。县长曹公锦和县保安团的胡团长很客气地接待了我方谈判代表，并用冰淇淋招待。稍事休息后，我便开门见山地发问："你们今天请我来的目的是什么？武汉方面有没有派专人来参加？"

胡团长说："何主席委托我们与红军方面代表作初步洽谈，有什么具体要求，鄙人与县府方面定尽力而为。"

我一听这话，就觉得仅与国民党通城地方政府谈判，是达不到目的的。看来还是要施加些压力，最终要武汉行营出面解决才行。于是我讲了具体条件，"为了国共和谈合作，我军已半个多月不打土豪劣绅了。现在部队经济有困难，何主席许下'连发三关饷'的诺言，望尽早兑现。"

对方试探着问我纵队有多少人。

我早就想好了对策，随口答道："官兵共计1500人，按每人每天三毛钱核算，部队每个月供给需发13500元。"其实，我纵队(包括地方党政人员)仅几百人，多报一些，准备国民党还价打折扣。还有，报少了，国民党看不起，增加工作麻烦。只能多报一点，这是一种斗争策略。

另外，我又提出给100张武汉行营"护照"。理由是根据地周围几十个县，到处有红军游击队和共产党员，既然现在谈合作，就该有诚意。我们需要用这些证明，合法通过国民党方面设下的层层关卡，通知各地游击队停止军事行动，并打算将共产党员都带走。实际是想趁这个机会，派人去各地联络我们的同志，整顿党组织并宣传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主张。

这些条件一提出，县长却为难了，说："所提问题事关重大，容当上报武汉省府，由何主席最后决定，贵军眼下困难，县府先垫支部分，以解急需。"还讲了一大套请谅解、别介意之类的话。

对方所表的态度，早在我预料之中，这次谈判也就这样结束了。我们安全返回驻地。事后，我们用对方拨给的第一批钱，定制了500套军服，买了些粮食，根据地的困难得到较大的缓和。

初次谈判成功，给同志们很大鼓舞，是否要继续谈下去的问题，自然没有人反对了。几天后，我们接到武汉的通知，何成浚派汽车来接我方代表去行营谈判。经研究决定，还是我亲自去，那位秘书再也不说我拉他做"垫背"了，非常爽快

地答应随我同行。

到了国民党武汉行营主任办公处，何成浚笑容可掬地迎出门外。进了办公室，我才发现原来董必武同志已早一步赶到了。后来我才知道，董老怕我吃亏上当，特地赶来为我壮胆的。

当着何的面，我不便单独向董老请示，只正襟危坐，为自己的讲话打腹稿，何成浚首先发问："江司令，这次国共合作，是贵军向国军投降，还是国军向贵军投降？"

何成浚老谋深算，一上来竟提了这么个出人意料的问题。看来是想欺我年纪轻，要试我一试，找点口实另做文章吧！我决定先顶他一下，说："何主席，我军发出的呼吁通电早已说明，国共两党合作是双方努力，一齐工作，为驱倭寇于国门之外，根本谈不上谁投降谁，而且共产党从来没有投降习惯，想必这一点，何主席是有体会的。"

何又问："既然不是投降，为什么你们中央红军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呢？"听了这句话，我不由自主地望了一下董老，看得出，他也为我担心，怕我答错话，我也确实觉得有难度。

我考虑了一下，郑重地说："红军被编入国民革命军战斗序列，正是共产党为了抗日所采取的顾全大局的措施，也是为了便于统一指挥和作战的需要，这是我党我军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才作出的让步。顺便问问何主席，你们能做到这一步吗？何况，我们的政治主张是自主的，组织上也是独立的。"听了我的答话，董老在一边微笑着点点头，我心里也踏实多了。

何成浚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继续发问："江司令，这次进行抗日战争，你看是以贵党贵军领导为主，还是以国党国军领导为主？"

这叫什么谈判？尽说些不着边际的话，我心里闷住一肚子火，但这是谈判桌上的斗争，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针锋相对，我提醒自己要沉住气。我一面吸着烟，一面想何绕弯子，我也绕弯子。我说："何主席，领导权不是自封的，国家、政党莫不视民意为依归。全中国人民如拥护贵党贵军的领导，就以贵方为主；全中国人民如拥护我党我军的领导，就以我方为主，一切顺应民意！"

听了这个回答，何成浚呆住了，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这场唇枪舌战中，何始终未能占到上风。他还想继续发问。董必武同志已看出，当即说："江司令一路匆匆赶来很辛苦，时间不早了，有话吃过饭再谈！"这下何成浚也只好作罢。

出了武汉行营，我才抓紧时间向董老作详细的工作汇报。他听后很高兴，表扬我们在艰难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中，为党保存了一批精华、骨干；认为我们在合作谈判工作中，基本上掌握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策略，坚持了党的原则。

在下午的谈判中，何成浚迫于形势，答应了我方提出的全部条件。谈判结束后，我遵照董老指示，回到鄂东南根据地，一面整训部队，一面广泛发动群众，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两个月后，我纵队又补充了200余人，为后来湘鄂赣地区部队聚集于平江县嘉义市，组建新四军的第一支队第一团，打下了基础。

第七章　东进抗日

一　八省健儿汇集岩寺

我们出于民族大义，与国民党当局谈判合作抗日，可以说是一场“特殊的战斗”。经过几番唇枪舌剑的较量，我们湘鄂赣边区的红军游击队于1937年秋改番号为“抗日军第一游击队”，离开各个山头，集中到平江嘉义市驻扎。国民党当局曾企图派他们的军官打入我军以“副司令”、“参谋长”的名义控制部队，理所当然地遭到了我党我军的严辞拒绝。

与此同时，我们得知国共两党高层谈判，达成了协议。包括我们部队在内的南方8省15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正式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1938年1月新四军军部在江西南昌成立，我们为此而欢欣鼓舞。正像后来的事实所表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团结和带领广大民众取得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中流砥柱。

当时，全军编为四个支队，加上军部直属机关，共计10300余人，6300余枝枪，虽人数不多，装备又差，但大部是

三年游击战争保存下来的精华，是一支久经考验的队伍。特别使我引以自豪的是，北伐名将叶挺从海外归来，荣任新四军军长。新四军其他高级将领，如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张云逸，副参谋长周子昆，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副主任邓子恢，以及一支队司令员陈毅等，都是我党我军素负威望的领导人。为加强党的领导，中共中央除从延安调来一批干部参加新四军的组建工作以外，决定成立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和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新四军分会，由项英任分局书记兼军分会书记，陈毅任军分会副书记。

新四军组建以后，我们湘鄂赣边区的老队伍被编为第一支队第一团，团长由一支队副司令员傅秋涛兼任，我任副团长，参谋长王怀生，政治部主任钟期光。由于处在国共合作的特殊时期，尤其在初期，军内党的组织是隐蔽的。新四军的各级副职，其实就是党代表、政治委员。

2 月 30 日，我们奉命从湖南省平江县嘉义市梅塘的集训地向皖南岩寺开发，途经宜春、樟树、东乡、玉山、常山等地，一路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扩大政治影响。我们与新四军第二支队张鼎丞、粟裕部及第三支队张云逸、谭震林部先后抵达岩寺。现在回忆起来，皖南乡村确实是个好地方，山明水秀，人杰地灵，历史上出过不少名人。岩寺是歙县（徽州）一个小镇，在附近的篁墩、潜口、西溪南、万安等村庄驻满了新四军，军部也于 4 月 4 日由南昌迁来了。各路红军指战员聚集在一起，学习党在新历史时期的方针政策；了解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内和国际的时局；在当地宣传、发动、组织群众；部队和地方各界人士联欢，一起唱歌、演戏。原本沉静

闭塞的山村猛地热闹起来，岩寺沸腾了。

在岩寺附近有个著名的古迹鲍氏祠堂，门前竖了四五个大牌坊，表明鲍家在历朝历代有几位贤人，曾分别担任过朝廷宰相。那个祠堂很大，能容纳千余人，成了天然的会堂。军部移驻皖南不久，就在这个祠堂里召开了全军营、团以上干部大会。我们一支队老一团干部坐在会场的最前排。叶挺、项英、陈毅、袁国平、周子昆等首长都上了主席台，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我第一次见到这么多久所敬仰但仅耳闻过的首长，心情异常激动。那时，他们都还是40岁上下的壮年。那种雄姿英发的风采，我至今记忆犹新。

鉴于南京、芜湖失陷之后，日军把进攻的主要目标集中到了徐州这个战略要地，台儿庄战役的胜利，又迫使敌人从江南各地抽调重兵压向津浦沿线。中共中央审时度势，抓住这个重要时机，于4月24日致电新四军，“主力开泾县、南陵一带，先派支队去溧水侦察”。接着，毛泽东致电项英，“在侦察部队出去若干天后，主力就可准备跟行。在广德、苏州、镇江、南京、芜湖五区之间广大地区创造根据地，发动民众抗日斗争，组织民众武装，发展新的游击队是完全有希望的。”历史事实证明，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是正确的。军部接到上述指示以后，迅即决定从一、二、三支队中抽调部分团以下干部和各支队侦察连，共400余人，组成先遣支队，由粟裕任先遣支队司令员，深入苏南敌后作战略侦察。

二　铁军东进苏南

粟裕率部于4月28日从岩寺出发，揭开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四军东进抗日的序幕。

陈毅率第一支队所属老一团、老二团，也于5月12日离开岩寺，向苏南敌后挺进。14日到达泾县茂林镇，28日在南陵召开了一支队全体干部会议，陈毅司令员作了《新的战斗条件和新的战斗任务》的报告。他在报告中具体分析了苏南敌后斗争的特点，深刻阐述了如何发挥我军优势，去战胜强敌的战略战术。他指出我军作战还要继承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必须紧密依靠人民群众，充分发扬主动、灵活的游击战特长，以分散对敌之集中，以伏击、袭击、近战、夜战等手段，积小胜为大胜，战胜优势装备的敌人。他强调，共产党所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战胜日本侵略者的基本路线；取得广大群众的拥护是开展游击战争的基本条件；而新四军的模范纪律、党的政策的正确执行、战斗的不断胜利，则是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的中心环节。大家感到，南陵会议确实是一次极其重要的战前动员会。特别是听了陈毅的报告，使我们这些长期转战山沟里打游击的同志，都有一种茅塞顿开之感，进一步澄清了认识，统一了思想，明确了深入敌后开辟新战场的斗争方针，对我们以后打开苏南地区抗日斗争局面起了方向性的指导作用。

一支队在皖南境内稍事休整，于6月1日晨离开南陵，继续东进。3日抵达高淳、宣城边境的狸头桥，连夜渡过固城湖，进入高淳县境，这是我平生第一次踏上江苏的土地。

我们初到高淳，一切都感到很新鲜。这里属于苏浙皖边区，丘陵不多，基本上是水网平原地区。这与我们红军过去活动的大山连绵、人烟稀少的湘鄂赣边区大不相同，生活条件也比我老家平江富庶得多。时值初夏，看着正在拔节抽穗的垄垄麦田，不禁想起南宋诗人范成大咏高淳的诗来：

路入高淳麦更深，草泥露润马骎骎。

雨归陇首云凝黛，日属山腰石渗金。

冬柳不春花自蔓，古祠无壁树空阴。

一箪足居前村店，袅袅炊烟起竹林。

6月5日，我们刚到高淳驻扎，粟裕司令员就风尘仆仆从前方赶来向陈毅司令员汇报先行侦察的情况。陈司令员立即部署部队行动。老一团由傅秋涛和我带领，北渡石臼湖，经博望到小丹阳，活动于京杭国道以西的江宁、溧水、当涂地区，并派出部队去江宁等地侦察，沿石臼湖走，在长流嘴登陆，已属华中日军大本营南京城郊；老二团由张正坤、刘培善带领，直指茅山，并以营为单位展开于溧武公路以北、京杭国道以东的镇江、句容、丹阳、金坛等县。6月15日，陈毅率一支队继续前进到宝堰，司令部设在前隍村，一方面积极布置部队与敌作战，另一面广泛深入地宣传和发动群众，壮大抗日力量。

这里，我还要补充讲一点新四军组建初期的军史知识。当时，新四军一、二支队的几个团，习惯上都有个“老”字称

呼。这是因为，随着部队迅速扩大，建立了许多重复的“新”团。例如，我所在的老一团后来发展为新四军新一支队，下辖新一团、新二团和特务营。老一团除傅秋涛和我及钟期光、王怀生等主要负责人而外，第一营营长熊应堂、副营长王克敏，第二营营长吴咏湘、副营长王义顺，第三营营长开始由王怀生兼，副营长是萧惠锡。所有这些团、营干部，在红军部队中多数担任过师、团级职务，有着丰富的作战和工作经验。只是由于蒋介石蓄意要限制“异党异军”发展，硬将全国的红军限编成八路军和新四军。我们各级干部的职务也相应压低了。那时，大家只有一个念头，就是从各个山头汇集到一起，不是为做官，而是为抗日。只要能抗日，哪里计较什么职务高低！这正是我们在窳劣装备条件下能够战胜敌人的力量所在，也是我们这支队伍同国民党军队的本质区别之一。

还有一点，新四军四个支队所属各团的番号，对内按数字序列顺排，称第一至第八团；对外则按“保、持、发、扬、优、良、传、统”来称呼，所以我们老一团又叫“保团”，老二团就叫“持团”。这些代号除当事人外，外界一般是不知道的。但研究党史或军史的同志还可以从当年的档案、文电中查到。

三　南京城郊试锋芒

我们部队挺进苏南之初，正是日军占领原国民党首府

南京后不久。我们的干部、战士，对于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杀戮我30万同胞的日本军国主义及其兽兵，无不义愤填膺、怒发冲冠，恨不能立即与之决一死战！

这时，双手沾满了中国人民鲜血的日本侵略军更加骄横不可一世，根本不把中国军队放在眼里。他们所到之处，一路奸淫掳掠，驻地不放哨，行军无警戒，三三两两的散兵下乡骚扰，横冲直撞……

面对这个情况，我和战友们百感交集！中国军民难道果真这么畏敌如虎么？绝对不是！山西的平型关战役，徐州的台儿庄血战，以及坚持三个月之久的"八·一三"淞沪抗战，都足以证明，中国军队是能够打大仗、打硬仗的。中国人民是有着不怕任何强敌，并与之血战到底，足以压倒一切敌人的气概的。但是，上海、南京、徐州等城市失陷之后，国民党军队兵败如山倒，日军则如入无人之境，正企图攻占国民党政府退守的重镇武汉。在富庶的江南，眼看大片锦绣河山沦入敌手，就是没看见过一支真正敢于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中国军队。一切有正义感的中国人，谁不扼腕叹息！

回忆我们初到苏南敌后，到处断垣残壁，满目疮痍，河沟里浮着尸体，有的断了头，有的砍了四肢，都是被日本兽兵残杀的中国军民，真是惨不忍睹！我带着老一团的干部、战士向乡亲们宣传说："我们新四军就是当年的中国工农红军，是来江南打鬼子的！"老百姓弄清楚我们的军队，既不是国民党的败兵，也不是别的杂牌队伍，而是纪律严明的工农子弟兵，感情上亲近了起来，不过，大家看到我们的武器装备陈旧，不免心有疑虑，说："中央军有飞机大炮也打不过鬼

子，你们这个样子怎么去同鬼子拼杀？”还有的说：“你们部队规矩好，不扰民，我们老百姓能放心，就怕打仗弗来事。”

我们感到，群众有此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广大指战员更感宣传和发动群众，光靠嘴巴还不行，还必须来一番真刀真枪的拼杀，用军事斗争的胜利来扩大共产党、新四军的政治影响。就在此时，粟裕司令员亲自指挥先遣支队一个连，于6月17日晨，冒雨在镇江西南30里的韦岗，用“小口袋”战术伏击日军运输车队，激战半小时，击毙少佐土井及大尉梅泽武四郎等13名日军官兵，伤敌8名，炸毁汽车4辆，缴获长短枪10余枝，日币7000余元，以及车中满载的军用物资，我军仅亡1人，伤数人。“江南处女战”捷报传来，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地振奋了广大军民的抗战情绪，提高了他们胜利的信心。陈毅司令员向我们连声夸赞：“江南处女战打得很好！”并乘兴作诗：

弯弓射日到江南，终夜喧呼敌胆寒；
镇江城下初遭遇，脱手斩得小楼兰。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也为此向新四军军部发了嘉奖电：“叶军长所属粟部袭击韦岗，斩获颇多，殊堪嘉尚，仍希督饬继续努力，达成任务。”

但是，国民党当局虽然迫于形势和全国舆论的压力，同意与共产党合作抗日，实际上却处心积虑地要限制八路军、新四军的发展，特别是想借日军之手来削弱、消灭异己。国民党第三战区顾祝同起初在苏南敌后划给我军的地盘并没有两溧地区，主要是句容、江宁，加上金宝圩那块狭小地域。我们一支队到来之前，这几个县都被敌人占领了，国民党委

任了留在敌后的几个杂牌部队的头目汪国栋、朱永祥、陈德功、张少华、胡肇汉（就是《沙家浜》中的胡传魁）等人为“司令”，从而形成了敌、伪、顽、我四股军事力量并存的局面，其中“忠义救国军”打着国民党旗号，暗地里与日军勾结，以“曲线救国”为名，同新四军作对，鱼肉乡里，民愤很大。

处此复杂形势，我们的部队要立足和发展，不仅要取得广大穷苦群众的拥护，还必须争取当地富裕士绅包括乡保长的理解和支持，肃清国民党散布的“共产”、“共妻”之类谣言的影响，更重要的是要以对敌斗争的胜利来打消人们对我军能否打鬼子的怀疑。我们老一团从 6 月中旬挺进苏南敌后，我记得四五个月内作战就达 30 次，平均每月大小战斗五六次，先后歼敌 3000 余人，主要是袭击日伪军据点，解决少数民愤极大、反对抗日的土匪武装。我亲自指挥和参战的众多战斗中，影响最大的一次是 7 月 14 日攻打南京城南郊的西善桥镇，打了整整一个晚上，消灭了日军一个分队，南京城为之震动，人们纷纷议论说：“新四军打到冈村宁次眼皮子底下来了！”再一次是我亲率一个营于 8 月 24 日袭击南京城东郊的其林门，消灭了伪军一个连。由于离城更近，仗的规模也较大，所以对南京的震动更大。第三次是打江宁方山附近的一个小镇，拔掉了设在那里的敌伪据点，打得也很成功。所有这些战斗，虽属初试锋芒，但确实鼓舞了在日军铁蹄下挣扎的南京民众，对苏南抗战局面的开拓，也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正是通过模范的战斗、模范的纪律、模范的群众工作、模范的统一战线，争取和团结了抗日力量，壮大了抗日武装。仅我们老一团，短短几个月内就发展

到近2000人枪，装备也大为改善，淘汰了长矛、马刀，步枪都换成了“中正式”，每个连至少有三挺机枪，还新建了一个重机枪连。

四　瓦解刀会歼土匪

我们初到苏南，在打日伪军的同时，还要对付极少数破坏团结抗战的土匪武装。粟裕同志在1939年4月15日所写《先遣队的回忆》中提到的“以抢地盘为主”的“游击司令”朱永祥就是这样一个手中有枪不抗日，专门鱼肉人民的恶霸土匪头子。他拥有2000余人，活动在当涂、溧阳一带。其队伍的成分，多数是从上海溃败下来的兵痞和当地流氓、土匪、青红帮门徒，还有个300余人的“大刀会大队”。他设了个“游击司令部”，有“参谋处”、“副官处”，气派真是大得很，平时杀人放火、抢劫绑票、私设关卡、敲诈勒索、无恶不作！

起初，我们本着团结抗日的宗旨，曾对朱永祥做了统一战线工作。陈毅司令员对此也有专门的指示。首先动员他不扰民，打鬼子；其次，争取他中立，不与新四军作对。但是，朱永祥一面接受国民党加封的“司令”，一面暗中与日军勾搭，并自恃人多有“本钱”，冥顽不化，为虎作伥，老百姓称他是比“二鬼子”（伪军）更加狡猾多变的“小鬼子”。当、溧地区民众切齿痛恨他，纷纷找我们一支队，要求说：“新四军打鬼子、打汉奸是好样的，你们为什么不把朱永祥拔掉？”许多老

年人也对我说："朱永祥搞得百姓鸡犬不宁，我们请求新四军，一定要把这个恶人打掉，以保一方太平！"因此，我们消灭这支土匪恶霸武装是有深厚群众基础的。

我们从抗日大局出发，对朱永祥还是采取"先礼后兵"。我曾两次亲自上门做劝说教育工作。同朱永祥接触后我发现他对新四军多少还是有点惧怕的，所以对我讲的抗日道理，他表面上还能听一点进去，但暗地里在察颜观色，摸我们的虚实。第二次，我决定亲自去他的"司令部"察看两天。第一天，我对他说："不仅你朱司令和上层的人士我们要相互了解合作，我们也要和贵部下层的官兵建立友好合作的关系。我可不可以到你的部队中去看一看，讲讲话啊？"他见我只带了三个人，一个警卫员、一个参谋、一个司号长，并没有起疑心，同意带我去各大队巡视。我边看边做宣传工作，实际是了解他那支队伍的情况。

第二天，我还在朱永祥的司令部里继续做工作。傅秋涛同志不知怎么搞的，竟让我们老一团第一营熊应堂营长带着部队向朱永祥司令部驻地发动了进攻。战斗打响后，朱部大乱，嚷叫"新四军打过来了！"由于事先没有通气，我也感到突然，只好随机应变。我说："朱司令，这肯定是一场误会，可能是你们外围部队与我方部队发生了点小摩擦，我马上赶去制止，双方都不能开火。"朱永祥当时确实也麻痹了，没反应过来，说："江副团长，请你赶快去吧！"我趁机带着随行的三个同志迅速脱了身，出了朱永祥司令部驻地，回到了我们老一团一营阵地，与熊应堂同志会合。

战斗愈打愈激烈。朱永祥搬出"大刀会"打头阵，向我军

猖狂反扑。大刀会的徒众吃了朱砂，一个个像发了疯，挥着大刀一闪一闪地向前冲，嘴里还齐声吆喝着“刀枪不入”以壮声势。我们的战士和班排连营干部从未见过这等奇特场面，也紧张起来了，请示这怎么办。我说，“先停止射击，组织大家政治喊话，这批人大多是当地农民。”于是阵地前安静下来了，所有的干部战士都扯起嗓子喊：“新四军只打朱永祥，不打大刀会！”“大刀会的农民兄弟，不要再上朱永祥的当！”“新四军只打鬼子汉奸，不打自己的阶级兄弟！”我也参加喊话，人多势众，把喊话传得很远，大刀会徒众们也听清楚了我们的喊话，前进的速度开始缓慢了。加之吞服朱砂的兴奋作用只能维持个把小时，药物效应渐渐减退，头脑就会清醒。眼看大刀会的人离我方阵地越来越近，甚至只有二三十米了，我和一营的全体指战员还是不射击，继续做宣传、继续政治喊话。就在这千钧一发的节骨眼上，大刀会队伍中头脑先恢复正常的人开始动摇，止步不前了，冲锋的吆喝声也慢慢低了下来。这样，我军通过坚定沉着的攻心战术，采用动员宣传、政治喊话瓦解了朱永祥控制的 300 多人的大刀会，彻底打破了他赖以取胜的作战“法宝”。我们党的政策感召力有多么大。

“大刀会”被我军瓦解以后，朱永祥着了慌。我军的战斗情绪则愈来愈高涨，开始放手向朱永祥的土匪队伍发动进攻。这时，附近各村的群众听说新四军打朱永祥，奔走相告，赶来助威，形成了军民齐打过街老鼠的强大攻势，使对方更难招架。为了全歼这支汉奸土匪武装，我立即给傅秋涛、钟期光写了封短信，让他们火速派人向粟裕同志报告，请求粟

司令员派第二支队第三团进入金宝圩一线，切断朱永祥残部的后路。

我和熊应堂等同志带着老一团一营部队，展开扇状包围攻击。朱永祥残部开始全线崩溃。果然不出所料，这些逃窜的残部刚到金宝圩一带，就被粟司令员派来的部队堵住了退路。我军前后一夹攻，这支土匪武装终于被彻底歼灭，朱永祥在混乱中化装逃脱。

我们新四军深入苏南敌后英勇作战，敢于碰硬，不仅与武装到牙齿的日军抗衡，而且消灭伪军，打击反共顽固派，并对阻碍抗战的土匪武装加以坚决镇压。这与装备优良的国民党军狼狈溃败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江南各阶层人民，由此逐步认识到谁是真抗日，谁是假抗日，谁是真心为民众，谁是弃民众于不顾，因此，谁才能真正领导敌后抗战便一目了然了。我军则通过一系列胜利的战斗，得到了很大锻炼，提高了战斗力，初步取得了平原水网地区作战的经验。

五　与陈毅对饮作诗

我军初到苏南敌后，人地生疏，供给困难，这是不言而喻的。那时，陈毅同志曾乐观而生动地说过，要打开敌后抗战新局面，除了我军光荣传统作风——战斗队、宣传队、工作队以外，还要学会解决“人、枪、款”问题。

解决“人、枪、款”，是中央的指示和新四军军部交给我

们的任务。广大指战员都是三年游击战争中熬过来的，深知“人、枪、款”对部队立足、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当时，抗日民主根据地尚未建立，除国民党发军饷以外，部队无其他经费来源。三战区顾祝同秉承蒋介石的旨意，既要我军在苏南敌后与鬼子拼杀，又不肯发军饷、拨枪支弹药，实际上是要让我军自生自灭。

为了解决“人、枪、款”，我们在作战的同时，有目的地进行了一些调查研究。我了解到国民党在小丹阳开办的实业银行，有十几个董事。于是，就找傅秋涛、钟期光同志商量。我说：“我们团的经费很困难，陈司令员那里经费也很困难。没有钱怎么购买枪弹，怎么扩大队伍？过几天我想去小丹阳请实业银行的董事们吃顿饭。”傅秋涛纳闷地问：“怎么想起来要请他们吃饭？”我说：“想向他们借点钱用用嘛！”钟期光也感到奇怪：“钱这么好借？吃顿饭就肯借钱给你？”我笑着解释道：“我有这么个设想，先借用顾祝同的名义搞一个电报，大意是：新四军在敌后抗战，坚持斗争功勋卓著，现因交通阻塞，军饷粮秣不便发至敌后，为解燃眉之急，望贵行先拨款一万元给新四军苏南部队暂用，不日由三战区奉还。顾祝同。”听毕这番话，傅、钟二位紧张地说：“这可不能搞，追查起来要杀头的啊！”我讲：“有的是办法，电报文稿不给他们嘛！这不就查无实据了吗？”经我这么一说，他们觉得有道理，便同意我去一试。

隔日，实业银行的几位主要董事应邀前来。他们显得很高兴，觉得战乱期间能得新四军第一团长官的青睐，还请吃饭，是件很有“面子”的事情。席间，彼此一番寒暄，也算“礼

多人不怪"吧！酒过三巡，我才"言归正传"，说："今日请各位董事先生来，一是建立友情，二是有件事情通报。顷接三战区顾司令长官电，暂借贵行一万元给我部作军费。电报在此，请各位先生过目。"说着，我打开挎包，一本正经地拿出电文给他们传阅，看完后，我漫不经心地又将电文收回。他们说，"江副团长，拿一万元现金出来有点困难，是否能先付五千元？"看来，董事们在酒酣之际，都很相信这个电报，我就顺水推舟说："适逢国难当头之时，各有各的难处嘛。贵行如确有困难，那就先付五千元吧！"他们凑齐五千元，当场交给我之后，提出要打个收条备查，并解释说，这是例行手续。我灵机一动道："收据当然应该有。因为顾司令长官明电借用一万元，而现在才有半数，等借足一万元时打一张总收条好了。"他们看我很顶真，也并不怀疑，于是同意付清钱后再找我拿收据。

我带着副官，拿了五千元现金喜滋滋地回到了老一团驻地。傅秋涛、钟期光等同志也非常高兴，于是商量这笔经费的用法。我说："支队的困难更大，我意送三千元给陈毅司令员处，我们自己留二千元吧！"钟期光同志赞成我的意见说："起码给陈司令员一半。"秋涛同志说："好吧，一半就一半。"

第二天，我就带着二千五百元现金，向一支队司令部驻地进发。那时，陈毅同志住在镇江地区的宝堰，距离当涂小丹阳有几百里地，又是在江南敌后，不是一段简单的行程。多次穿越敌军封锁线，避开敌人据点，才安全抵达目的地。陈司令员乍见我这不速之客，颇感突然地问道："江渭清，你

跑来干什么?"我笑嘻嘻地说:"没什么大事,就是来看看你。"他脸一板,严肃起来:"我有什么好看的!"我还是乐滋滋地说:"听说司令员这里很困难,我是来支援你的,给你送二千五百元现金!"他更显迷惑不解,急着追问这么大一笔钱从何而来。此时,国民党的钞票还是很值钱的,新四军官兵每个人每天平均只有八分钱伙食费。这次搞来这么多钱,确实可以派点用场了。

于是,我一五一十地讲了"借钱"经过,陈司令员听了哈哈大笑,说:"渭清同志,你还真有办法来!好啊,今天我请你吃饭。"说罢,就吩咐机要科长到宝堰街上去安排炒几个菜,买两瓶好酒。支队司令部的同志们发现陈司令员情绪特好,开始也颇感惊奇。因为他平时生活俭朴,难得去馆子里炒菜。而今天来的又不是什么首长或统战对象,不过是自己的老部下,为何如此张罗?

开始吃饭了,陈司令员出了个题目说:"今天我们边吃饭边谈工作,一面喝酒一面作诗好不好?"我说:"司令员,你是全军有名的大文化人,作诗填词是行家里手,在你面前我是小巫见大巫了,哪里敢呢!"说心里话,军中干部、战士,谁不敬佩陈毅同志?他既能武,又能文,出过洋(法国),上过山(井冈山),谈今说古,口若悬河,是真正的"博学鸿儒"。在他面前,我充其量只是个小知识分子而已。

陈司令员风趣地说:"管他大巫小巫,听说你平时也喜欢写写诗,今天就趁酒兴试一试,古人言'斗酒诗百篇'嘛!"我想既然推辞不得,正好是个学习机会,好在当时年轻,反应也快,胆子也大,稍一定神就准备"奉命作诗"了。

陈司令员利索地端起酒杯说："先敬你这一杯，喝完说第一句。"我举杯一饮而尽，道："铁军东进挽狂澜。"他说，"好，有气势，来吃筷菜再说第二句。"我只好往下顺句子了："威震京沪敌胆寒。"有了这两句，我心里踏实些了。陈司令员面带微笑，又向我敬酒一杯，要我大胆说下去。我吃了两筷菜，想到我们东进以后既打鬼子、伪军，又搞掉了反动顽固派的几支部队，就脱口说了第三句："既靖寇氛顽亦靖。"接着第四句是："千门万户尽开颜。"听了我的即兴诗，陈司令员很满意，表扬说："不错嘛，还是和我的诗原韵味，可以可以。"

随后，陈司令员同我边吃边谈，又谈了当前老一团要做的工作，特别强调新四军在苏南敌后作战，不仅要抓"人、枪、款"，而且要注意宣传发动广大人民群众一齐参加抗日，要做好统一战线工作，尽可能地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

这是半个世纪前的一段亲身经历，也是半个世纪前与陈老总饮酒作的一首诗，我终生难忘。因为，那是尖锐激烈的民族斗争的真实写照，是言之有物的作品。那天兴致高，我和陈司令员都喝了不少酒，后来他留我在宝堰住了一夜，第二天才匆匆赶回老一团。

第八章　皖南事变前后

一　重返皖南，开展民运工作

1938年10月1日，我们一支队老一团奉新四军军部命令，返回皖南。距6月1日随陈毅同志从南陵出发开往苏南，正好四个月。

此时，新四军军部几经变迁，已移驻泾县云岭的罗里村。一团驻在汀潭、土塘、杨村、左杭一线，团部设在汀潭，离军部15公里。安顿好部队后，我与傅秋涛同志来到军部，看到了叶挺将军。他对我们重返皖南表示热烈欢迎和慰问，对一团转战苏南敌后取得的战绩给予高度的赞扬。由于项英同志正在延安参加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就由袁国平、谭震林、周子昆等同志同我们两人谈了话，着重介绍了皖南敌我顽三方所处的态势。从他们的谈话中，我们得知，在日军大举进攻武汉，国民党正面战场组织会战的同时，汪精卫亲日派加紧策划公开投降，国民党顽固派则密谋制造反共摩擦。在这种反共投降的空气日趋浓重的情况下，被国民党当局

限于芜湖、宣城、青阳、大通镇一线活动的皖南新四军，处在一面临江，长江沿岸密布日军据点；三面受围，背后是顾祝同的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部，两侧是国民党军的密集布防；一旦有事，我军几乎没有回旋余地。鉴于这种形势，军部决定将一支队一团和二支队三团从苏南调回，以加强皖南新四军的兵力。我们一团先调，归军部直接掌握，任务主要是保卫军部。正好三支队五团政委病故，袁、谭还要我暂兼五团政委。后来五团有些同志称我是他们的"老政委"，就因为有过这么一段关系。

我们一团在皖南刚住下，稻子成熟了。按照红军老传统，团部立即组织干部、战士，帮助驻地周围的农民割稻，作为民运工作的第一步。不久，项英同志来我团视察。他是未等六中全会结束，于10月22日提前从延安返回军部的。我和傅秋涛同志向他汇报工作，特别讲到这里的情况复杂，到处有国民党特务活动，90%的居民参加过青帮。所以，开展民运工作，比苏南敌后还要艰巨得多。我们还谈了民运工作中如何注意"合法性"的问题。所谓合法，就是要遵守政府法令，服从统一战线，多做上层人士的团结工作。那时，皖南的县长、区长、乡长都是国民党委派的。如果我们的一切活动都要"遵守政府法令"，实际上就是去遵守国民党当局和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部的法令；"服从统一战线"，实际上就是放弃做发动群众的工作。事实上，当时新四军民运工作队所到之处，减租减息均已开始，但项英同志对此不以为然，还说"搞过头会吓跑地主的"。我汇报说："要农民拥护共产党，积极抗日，总要让他们得点经济实惠。"他听了很不高兴地说：

"现在是全民抗战，眼光不能老盯在农民身上。"

我又汇报了扩充部队和筹款的问题。我说：现在许多青年想找出路，帮会的力量也可以利用。可以从这些方面做工作，扩充点部队。部队经费不足，缺军饷，我们可以收点税，必要时还可以对不法地主罚点款。我们在苏南敌后就是这样搞的。项英同志不赞成，连说"不行"。他认为：皖南是军部驻地，要一切"依法办事"。收税是政府的事，扩充部队要经顾祝同批准，不能乱来。

项英同志是中国工人运动的先驱者之一，在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在完成组建新四军的艰巨而复杂的任务中，他都表现了杰出的领导和组织才能，工作是出色的。到皖南以后，他也决不是不想有所作为。但由于基本的指导思想确实受王明"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影响太深，所以不敢放手发动群众，不敢大胆招兵买马，不敢独立自主地开展敌后游击战争，以至捆住了自己的手脚，酿成皖南事变的悲剧，这是后话。

我们一团返回皖南以后，新四军副参谋长周子昆、政治部副主任邓子恢等领导同志都来视察过工作。邓子恢同志的思想和讲话就大不一样，他说，统一战线当然要坚持，但要统住上层人物，首先要团结好基本群众，有基本群众的支持，共产党说话才有份量，否则，只好做人家的尾巴。他还说，"二五减租"，国民政府有法令，国民党只说不做，你们来做，不犯法，不要怕闲言碎语。那时，军政治部在茂林章家渡和三里店都派有民运工作队。汀潭的民运工作队，他要一团组织并由一团领导，具体指定我负责。他还讲了最近去苏

南，同陈毅、粟裕以及张鼎丞同志商量的共同意见是，要放手发动群众，统一战线要坚持，但不能束缚住自己的手脚。傅秋涛和我都同意这个看法。好在一团没有民运股，我主要是抓政治工作的，民运工作队很快组成，在汀潭成立了各种抗日群众团体和农救会、工救会、妇救会、青救会等等，减租减息运动也比较顺利地开展起来。

1939年2月23日，周恩来同志到达皖南新四军军部。第二天晚上，军部在大会堂(陈氏宗祠)举行盛大欢迎晚会。我在这个晚会上第一次见到了周恩来同志，聆听了他在会上作的《新阶段的新关键》的报告。3月6日，我又聆听了周恩来同志在排以上干部大会上作的《目前形势和新四军的任务》的报告。这两个报告，都结合新四军的实际情况，传达并贯串了六届六中全会的精神。当时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周恩来同志明确指出抗日战争已经进入“敌我相持”的阶段，敌人已将主要力量放到了他们的后方，我们也应当坚持三个原则，就是：哪个地方空虚，就向那个地方发展；哪个地方危险，就到那个地方去创造新的活动区域；哪个地方有敌人和伪军，友党友军比较不注意，就向那里发展，并且提出了新四军的活动方针应该是“向北发展，向东作战，巩固现在阵地”。所谓“巩固现在阵地”，是指必须提高警戒，防止意外事件。关于统一战线问题，周恩来同志指示我们，只要坚持游击战争，不断取得军事上的胜利，就会使部队发展，就能提高我们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地位，达到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的目的。他还号召新四军干部、战士深入到群众中去，深入群众才能保障我们的发展。听了周恩来同志的报

告，我和大家都觉得很顺心，受到很大鼓舞。所谓“一切通过”、“一切服从”的许多禁忌解除了。

遵照周恩来同志代表党中央给新四军提出的方针任务和实施原则，军部派张云逸、邓子恢等领导同志北上淮南，成立新四军江北指挥部，为尔后开辟淮南抗日根据地、发展华中抗日武装力量创建了一个指挥中枢。军部对扩充部队也放开了一点手脚，成立了新一团和新三团，随后，新一团和老一团扩编成新一支队，傅秋涛任新一支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我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赵希仲任参谋长，熊应堂和张铚秀分别担任老、新一团团长。至此，新四军在皖南除司政后机关外，发展为六个团，即老一团、新一团、老三团、新三团、老五团、特务团，还有六团留下的一个三营和教导总队，直到皖南事变爆发，共有 9000 多人。就力量而言，比我重返皖南前强多了，但四面受围、困守皖南一隅的被动局面，始终未能改变。

二　反击日军“扫荡”，保卫云岭军部

我重返皖南以后参加的最重要的战斗，是反击日军“扫荡”，保卫云岭军部，这是从繁昌之战开始的。

1938 年 10 月，日军攻占武汉。随即，日军占领了皖南沿江的铜陵县城以及大通、顺安等集镇，妄图进而侵占繁昌县城。繁昌面临长江，随时可以监视江面往来的船只，既是

皖南的门户，又是新四军军部及其后方基地的屏障。敌我双方都非常重视这个战略要地。这时，国民党军在沿江节节败退。身为第三战区司令长官的顾祝同故伎重演，把原属国民党军防区的繁昌、铜陵、南陵一线，划归新四军第三支队接防，让新四军来替他站岗放哨挡头阵。

自此以后的一年多时间内，我军在沿江的铜、繁一线与日军进行了200多次战斗。尤其是繁昌县城屡失屡克，先后打了10多次比较大的仗，后来概括为五次繁昌保卫战，这是皖南新四军最早抗击日军的著名战役，参战的主力由谭震林同志指挥，是三支队五团和六团三营，一团和三团也曾多次配合作战。记得1939年1月中旬，我们老一团配合三支队与日军激战，攻克了繁昌城，受到过谭震林同志的表扬。同年4、5月间，为策应保卫繁昌之战，老一团在铜陵境内作战11次，毙伤日伪军500余名。当年11、12月的两次繁昌大战中，毙伤日伪军1500余人，再度夺回了繁昌县城。老一团在战斗中，主动配合，有力地阻击了敌人。

繁昌保卫战的胜利，狠狠地打击了日寇的气焰，再次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粉碎了反共顽固派诬蔑新四军“游而不击”的谣言，揭开了保卫云岭、保卫军部，进行反“扫荡”之战的序幕。

日军第一次皖南大“扫荡”于1940年4月22日开始。这是侵华日军为巩固3月份粉墨登场的汪记“国民政府”的“京畿”(南京)，进而对国民党内的其他动摇分子诱降而发动的。

我军在4月初就发觉日军调动频繁，得知在芜湖、湾

沚、三山、横山、峨桥一线，集中了日军第十五师团五十一、五十二两个联队，十七师团一部和三一二旅团一部；并在铁矿山、荻港、铜陵、大通、贵池一带驻有日军一一六师一二〇和八三三联队，合计兵力一万多。军部及时向各团通报了敌情，项英同志亲自部署反“扫荡”。老五团布置在繁昌城以南以西地区。老三团配置在水龙山、何家湾附近山地。我们老一团以营为单位梯阶配置于田坊、土坑、土塘之间，掩护我军指挥中心，一部兵力分散游击，断绝南陵、三里店交通，另一部伏击沿南陵到青阳公路西进的敌人。

4月22日，日军向皖南腹地出动。其作战意图是，摧毁新四军指挥中枢，威胁诱降国民党部队。“扫荡”一开始，日军先声夺人，在芜湖一路聚集5000多兵力，在六架飞机掩护下向青弋江一带的国民党部队进击。国民党部队一触即溃，纷纷向青阳、太平方向败退。24日晨，日军攻陷南陵，次日向三里店、戴家汇进犯。另一路荻港方向日军分三股进犯繁昌，24日晚侵占繁昌城。两路日军企图分别包围何家湾以北、繁昌以南地区的新四军，然后直趋青阳。

日军来势汹汹。26日上午8时，日军池前联队2000多人向我老一团阵地攻击。我和傅秋涛同志率部抢先在父子岭一带有利地形设伏，一直打到下午16时，激战8小时，毙伤敌300余名，缴获日军军旗3面和一批武器弹药。同日，坚守何家湾阵地的老三团激战一天，毙伤敌200多人，内击毙中佐一名。这次大“扫荡”延续到5月3日，历时11天。我军顽强拼杀，日军以失败告终。

日军的第二次大“扫荡”于10月2日出动兵力一万余

人，在飞机掩护下，分进合击，其中主要一路约 5000 多人，由繁昌经南陵直扑云岭，妄图一举摧毁新四军军部和后方基地。叶挺将军判断日军由繁昌、南陵进犯云岭，必经三里店、汀潭，遂命老一团、老三团沿三里店、汀潭一线节节阻击，层层设伏。4 日中午，日军以 200 多骑兵开路，主力跟进，闯入我老三团预设在三里店附近之第一、第二伏击圈和布雷地带。日军受重创后始进入三里店，继续向汀潭迂回前进。当日军通过汀潭以南许村桥时，我老一团埋伏在桥头西侧的部队，突然猛烈开火，毙伤敌数十名后按预定计划转移。日军进入汀潭后大肆烧杀，并有向云岭推进模样。叶挺军长率轻便指挥所和军部特务营，亲赴老一团防地指挥作战，御敌于汀潭以南、云岭以北山地。我老一团在正面抗击来犯之敌军的同时，还在两侧山地以密集火力向敌突击，使日军陷于我三面包围之中，打得极其激烈。7 日傍晚至深夜，日军向我反扑十余次，都未能前进一步，遂于 8 日凌晨转向大岭、小岭突围。他们在 30 多架飞机掩护下，穿越青弋江，扑向泾县县城，国民党驻军五十二师闻风遁逃。叶挺将军率部追击日军，直扑泾县县城，指挥所设在泾县县城东北西峰山附近高地。叶军长抓住战机，查明当面敌情，并派员联络泾县附近的国民党军队，趁敌立足未稳，发起攻击。同时派联络参谋把我找去，他对我说："江渭清同志，你能带两个主力营突击一下冲进城吗?"我说："军长，最好用几个连兵力攻击城外敌人阵地，以引日军出城增援，再打援敌，不是更有把握吗?"叶军长沉思片刻，采纳了我的建议。果然，城外日军阵地受到我军攻击后，大批敌人出城了。我老一团

和特务营埋伏在南关附近，立即向出城之敌猛烈进攻。国民党第五十二师眼见泾县县城将被我攻克，也从东、北两方配合围攻；泾县所在地区的邓昊明专员则率领地方团队，在城郊阻击敌人，加上从四面八方赶来助战的当地民众，形成了声势浩大的人民战争，日军陷入了两万多军民的包围之中。9日拂晓，日军不得不弃城突围，向泾县东北方向逃窜。我老一团率先进入县城。当时，日军出动30余架飞机，一面向县城狂轰滥炸，一面频频轰炸扫射西峰山一带我军阵地，军指挥所附近硝烟弥漫，有几个炸弹就在离叶挺将军三四十米处爆炸，一位通讯参谋不幸被炸牺牲。叶军长浑身上下都是烟尘灰土，他镇定自若，指挥作战。当叶挺将军进城时，受到全城民众士绅的热烈欢迎。邓昊明专员连连称颂新四军打得勇猛，打得好！我就是在攻克泾县县城时，认识邓昊明同志的。

历时一周的第二次皖南反“扫荡”，终于以我军毙伤日军1000余人而宣告结束。这一重大胜利，震动了大江南北。各方来电祝贺，蒋介石也致电叶挺将军，表示“嘉奖”。叶军长在泾县县城里住了三天。为照顾大局，我们把泾县县城交给了国民党第五十二师，随叶军长撤回原防。

但是，战斗未有穷期。蒋介石决不会坐视新四军发展壮大，我们也并未因为连续取得两次反“扫荡”的重大胜利而松懈斗志。当时的形势是，国民党于1939年11月召开五届六中全会，确定了以“军事限共为主，政治限共为辅”的方针，相继出兵进攻陕甘宁边区、晋东南和冀南抗日根据地，在华北掀起了一次反共高潮。党中央及其领导下的八路军

对国民党顽固派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第一次反共高潮刚被打退，当日军在皖南发动第二次大“扫荡”时，韩德勤趁机在苏北黄桥地区向我新四军发动大规模进攻，开始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为了从政治上反击这股反共逆流，我与傅秋涛同志商定，于11月21日在老一团团部驻地召开了泾(县)、南(陵)交界民众代表反内战反投降座谈会。到会的有老一团驻军所在地五个乡的乡长、士绅、民众抗日团体代表等100多人。我主持座谈会，军部《抗敌报》对这次座谈会的报导中，记载了我的“开场白”——

> 今天泾、南两县交界的民众派代表到这里来开一个反对投降的座谈会，是非常必要的。本人能够参加也非常之高兴，很想趁着这一机会，谢谢各位地方绅士对于我们的这次工作上的帮助。现在的时尚，大家也都知道，正处在一个空前的、对日投降和反共危险面前。来源有三个：(一)德国、意大利为了拉拢日本，助中国投降；(二)日本的诱降；(三)中国内部亲日投降派的罪恶活动，挑拨反共内战，在华中有29个师准备向新四军进攻。我们一贯忠实于抗战建国的事业。大家也都看到，这毫没道理，目的还不是把共产党反掉了去投降。今天大家都在这里，请对这个问题发表意见。

会议开得非常成功。大成乡一位国民党委派的乡长说：“投降就会亡国。我老了，我不能叫我的后代作亡国奴。我提议打电报到重庆去，中国要打日本，不要打新四军。”三里乡的一位士绅也竭力主张“打电报给政府、给蒋委员长，请

他来制止内战”。许多民众代表都说共产党反不得，反共就会亡国，要求新四军帮助加强民众自卫的组织领导。傅秋涛同志也在会上讲了话，表示支持代表们的要求。会后成立了泾、南交界地区民众自卫队总队部，并向蒋介石发去了要求坚持团结、坚持抗战、反对内战、反对投降的电报。电报对蒋介石当然不会起作用，也到不了他那里。但对广大群众则是一次揭露顽固派反共、投降罪行的有力控诉，正如《抗敌报》报导中所说，“电报的‘每一个字都代表了全皖南民众的呼声’”！

三　突出重围到苏南

我们召开座谈会之后不久，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第二次反共高潮终于推向皖南，趁新四军军部及所属皖南部队9000余人奉命北移之机，于1941年1月6日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周恩来同志曾在《新华日报》上写了“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十六个大字，愤怒控诉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罪行！

关于此次皖南新四军北移，我思想上多少是有准备的。早在周恩来同志前来皖南视察时，我就同傅秋涛同志议论过，认为周副主席关于新四军行动方针的三句话，第一句“向北发展”是主要方向。这次新四军北移，是遵照国民党军事当局的命令并经中共中央同意的。军部接到中央关于北

移指示后，立即向各团和军直机关作了传达。项英同志曾亲自到新一支队老一团驻地传达布置，要大家准备放弃皖南，转移到江北。我在新一支队排以上干部会议上作了政治动员，积极进行北移准备。1940年12月，军部先后将1700多名非战斗人员、干部家属和1300多担重要资料移往苏南北渡。

当时我们新一支队驻在土塘、杨村、汀潭、左坑一带，整装待命，随时准备转移。但是，在北移路线问题上，蒋介石集团处心积虑，制造了种种障碍。开始同意新四军沿马头镇、孙家埠、郎溪、南渡镇至竹箦桥、水西地区，然后经苏南敌占区过长江。这条从皖南到苏南的路线，正是我老一团两年多前重返皖南时走过的，新一支队指战员，特别是老一团的指战员对此都很高兴。没过几天，蒋介石集团忽然变卦，一方面坚持要新四军从铜陵、繁昌渡江北移；另一方面又命令李品仙所属一七六师控制若干渡口，随时准备袭击我们；不仅如此，他们还故意大叫大嚷，把新四军将于铜、繁之间渡江北移的消息泄露给日军，致使铜、繁江面日舰艇忽然加强巡逻。我们得知情况有变，立即向军部反映敌情。此时，军部也在考虑改道北移。12月28日，新四军军分会讨论决定皖南部队全部绕道茂林、三溪、旌德，沿天目山脚下的宁国、郎溪到溧阳，待机北渡。

遵照军分会决定，傅秋涛与我一道召集一支队其他领导干部具体研究行军路线，然后，由我再次作政治动员，准备正式命令一到立即行动。

1941年1月4日上午，我们接到军部下达的行动命

令，整个皖南部队编为三个纵队。我新一支队，包括老一团、新一团和一个特务营，共约3000人，编为第一纵队，傅秋涛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我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赵希仲为参谋长，都是新一支队原班领导。按照12月28日军分会决定的路线，本来第一纵队应该朝茂林方向前进，但为牵制国民党第五十二师，军部命令第一纵队改从泾县向宣城、宁国方向前进。按照军部的这个部署，我们当即决定以老一团为前卫，4日下午16时出发。先头营刚翻山行至泾县县城附近，我们突然接到军部电话，在事先没有通气的情况下，决定派军部参谋处长赵凌波任第一纵队副司令员。大家都觉得很奇怪。大敌当前，怎么临时变动参谋处长的职务？但既然是军部委派的，我们当然表示接受。赵凌波到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要部队停止东进，改往茂林方向走。他说：这是军部决定，那就得服从。当时天已很黑了，部队摸黑前进，细雨霏霏，寒风凛冽，泥泞路滑，走了一夜，才到青弋江边。因河水猛涨，涉水过不去，就赶到章家渡，想从浮桥上过江，不料浮桥已被大水冲断，全体指战员只好在水深齐腰寒冷彻骨的河流中涉水而过。军部预定，各纵队在5日拂晓到达指定位置，结果直至下午15时才到齐。大家都非常疲劳，还要烘烤衣服，军部决定在茂林地区停留一天。我们一纵队就在茂林附近的大康王休息待命。

6日下午，军部在茂林南面潘村的潘家祠堂召开各纵队首长会议，研究下一步走向。叶挺、项英、袁国平、周子昆、李一氓等军部首长都到了，一纵队由我和傅秋涛两人参加会议。赵凌波虽已任命为一纵队副司令员，但没有通知他到

会。会议气氛很严肃，因为当天上午已经发生了两起国民党第四十师攻击我搜索部队的“小接触”。接触虽“小”，但国民党七个师包围我皖南北移的新四军的态势已经形成。会议决定，三个纵队分三路会攻星潭。第一纵队的任务是7日拂晓攻占裘岭，然后会同其他两路纵队会攻星潭。攻占星潭后，再向东挺进。这是我在皖南事变中最后一次参加军部召开的会议，也是最后一次见到叶挺将军和项英同志。

会后，我同傅秋涛同志立即赶回部队作紧急部署，以老一团三营为前卫，当晚攻占了裘岭，并越过徽水河追击逃敌。7日清晨，老一团一营和二营占领了举山北面的榜山。新一团向榔桥至白桦公路两侧展开，攻占了太山头。一纵队队部设在榜山北侧的梓坑。傍晚，老一团攻占了与星潭只有一水之隔的举山，团长熊应堂在举山等候纵队下达进攻星潭的命令。其实，我与傅秋涛同志的心情是同大家一样的，都在着急，在等候其他两路纵队的到来，以便向星潭发动会攻。就在这紧急关头，军部突然改变了6日潘村会议的决定，命令各纵队往回撤，改道走太平，转入黄山，再待机东进。这样，我一纵队只好服从命令，再往回冲。冲了一段路，未能同军部以及第二、三纵队联系上，却陷入了敌人的包围！

情况万分危急，我们一纵队负责人开会商量对策。我主张往东打。这时，我纵队还有2000多人。虽被包围，但敌人立脚未稳。只要全体指战员勇猛拼杀，定能杀出一条血路，冲到苏南边上就有办法。纵队参谋长、作战处长、新老一团的两个团长都同意我的意见。但赵凌波坚决反对。他装腔

作势地对傅秋涛说:"秋涛同志,要顾全大局。军部和二纵、三纵都未冲出重围,我们应当回去救援,切不可单独行动,否则要犯大错误。"傅秋涛同志碍于赵凌波是刚从军部派来的,说话份量又很重,沉吟着采纳了他的意见,决定部队继续往回打。8日拂晓前,大批援敌围来,把我一纵队封锁在榔桥河地区。我们与国民党第五十二师打了一整天。赵凌波见延缓我纵行动,把我纵诱入敌军重围之中的奸计已售,遂于8日晚趁倾盆大雨脱逃投敌。这个血债累累的内奸当了国民党"皖南剿匪司令"之后,被我游击队击毙。不过,这是后话了。

赵凌波叛逃,傅秋涛同志猛悟中了奸计,致使部队陷入重围,他毅然宣布,从此刻起,纵队军事指挥由我负责。这时已是9日凌晨3时。我在危急时刻受命,迅即指挥部队继续与敌五十二师激战,伺机突围。原打算由我带头,9日下午15时突围。傅秋涛同志说,白天突围伤亡太大了,还是改在晚上突出去吧!到了晚上,又是大雨。我决定调整部署,由我带一连兵力先杀出一条血路,让纵队部和老一团跟进,新一团担任掩护,待纵队部和老一团突出去后,新一团立即跟着突围。在张铚秀团长、丁麟章政委的指挥下,新一团打得很英勇,依靠新一团拼死掩护,我带的一连多战士,首先冲过榔桥附近的公路,上了山。同时冲出来的有纵队副参谋长吴咏湘,老一团团长熊应堂、政委萧辉惠等干部。傅秋涛于10日凌晨率领部分队伍也冲过榔桥,在黄田附近同我会合。两批突围队伍加起来有几百人。新一团全团和老一团部分干部、战士未能突出来。后来知道,张铚秀团长带了

100多人从西北方向突围渡江到了无为，大部分干部、战士牺牲，一部分被俘或散失了。我永远怀念一纵队在皖南事变中牺牲的战友们！7日晚上，如不为内奸赵凌波的花言巧语所迷惑，而是坚决向东打出去，一纵队决不至于遭受那么大的损失。这个血的教训，又是多么惨痛啊！

我们突围出来的几百人，后来到了泾县、宁国、旌德山区一带，靠地下党和当地群众的帮助，多次躲过了国民党军队的"清剿"。我与傅秋涛同志商量，长久困在这里，不是办法，要尽可能转入苏南敌后，才有生路。他同意我的意见，同时提出：几百人一块走，目标太大，还是分三摊：几百人中大部分是战士，指定一名营长带领。我说我来带战士。他说军分会有个精神，尽量保存骨干，要我带干部，这一摊有50多人，连机要员、司号员都划在这一摊里。傅秋涛同志带10多个骨干，也是一摊。决定战士这一大摊先走，我们这两摊遇有情况，就分散打游击，敌人撤走，再合拢，尽可能保持联系。分头出发后，曾遭遇国民党部队出动的四个团"清剿"，把大家冲散了。后来得知傅秋涛带的那一摊，已突围到了苏南。我也决定率部突围到天目山。沿天目山麓向北再向东，在扶风桥找到了第十六旅。同我们一起突围到扶风桥的共有30多人。

这时，中央军委已宣布重建新四军军部，下辖七个师，十六旅属第六师，师长兼政委谭震林。我得知傅秋涛同志已在半个月前与十六旅会合，便决定马上去旅部与他会面，然后一起去向谭震林同志汇报。在皖南事变中，我九死一生，至此方脱离险境。

回顾皖南事变，当年腥风血雨，我永不会忘！由蒋介石密令，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相、冷欣等人一手制造的这桩大血案，将以我军将士壮烈牺牲，国民党顽固派不顾抗日民族大义、亲痛仇快的罪行而永载史册！

总结我党我军历史经验，在皖南事变中，项英同志实难辞其咎，这是中央早有明确历史结论的。从我亲身经历的情况来看，项英同志不仅对中央一再催促新四军北移的指示，一拖再拖，犹疑不决；直到非北移不可，而国民党军包围之势已成时，他又对如何应付变局，举棋不定，方寸全乱；特别是在战斗最紧张的危急关头，他擅离指挥位置只顾自己突围，因未冲出包围，才又返回军部，错误尤为严重。他对自己的错误，生前有所醒悟，说："部队遭到这么大的损失，责任在我。突围出去到中央后，我要作检查。"他有严重错误，但坚持革命直到惨遭叛徒杀害。这是项英同志的悲剧，但仍不失为一位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我认为，这才是对项英同志应有的实事求是的历史评价。

第九章　二到苏南

一　担任第十八旅旅长

如果说，1938年我随陈毅同志东进是第一次到苏南，那么，此次皖南突围，就是我二到苏南。

我和傅秋涛等一行20多人，在澄（江阴）锡（无锡）虞（常熟）交界处的顾山附近一个村庄里，见到了谭震林同志。时间是1941年3月5日，距我们在皖南分别正好一年。谭震林对我们的到来真是喜出望外，庆幸之情溢于言表。他除了为我们平安脱险而高兴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的到来，缓解了东路地区缺少军政干部的难题。

两个月的转战和跋涉，使我们对于皖南事变后我党我军的部署一无所知。经过初步交谈才知道，中共中央军委已于1月20日发布了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1月28日，新军部在苏北盐城成立。谭震林原任新四军第三支队副司令员，到苏南东路建立江南抗日救国军东路指挥部后，一直使用“林俊”的化名。

此时，为了粉碎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新四军第三支队已被消灭”的谣言，谭震林根据军部指示精神，恢复用原名公开活动，并于2月上旬将“江抗”东路指挥部改番号为新四军第三支队，同时成立新的新四军江南指挥部，谭震林任指挥兼第三支队司令员。2月18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新四军各师负责人名单，谭震林任第六师师长兼政委，并兼政治部主任，罗忠毅任参谋长。下辖第十六旅和第十八旅。从谭震林身兼三职之事即可看出，当时六师是多么缺少领导干部。由于缺少旅、团一级干部，十八旅的干部任命无法发表。因此，谭师长对我们一行的到来寄予很大的希望。

谭师长立即打电报给军部，告知傅秋涛和我已平安抵达东路根据地，并建议军部把我们分配在六师工作。东路根据地军民热烈欢迎我们突围归来。3月7日，在谭震林主持下，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召开欢迎大会，声讨反共顽固派的罪行，沉痛悼念在皖南事变中殉难的新四军将士。东路根据地出版的《东进报》还在3月10日发表会议消息，同时刊登题为《新自皖南突围东来的新四军新一支队司令傅秋涛同志访问记》，这对揭露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皖南事变的真相，坚定东路抗日军民的胜利信心，起到了积极作用，而谭师长对我们的慰勉之情也深寓其中。军部很快发来回电，要傅秋涛同志去盐城汇报皖南事变情况，其他同志留六师分配工作。回电强调“对于皖变来你处的干部，应向他们说明坚持苏南的发展意义，使其安心工作，更要使他们懂得，现在苏南工作是分区坚持，就原有基础去创造新局面，不应要求多带兵和位置大小，应服从组织，坚决留下，努力争取江南的伟大

发展。”于是，傅秋涛和谭师长商量确定，由我和吴咏湘、黄吉民、胡乾秀等八人留下。谭震林是我的老上级。我在皖南兼任过第三支队第五团副团长，知道他为人坦率豪爽，作风泼辣果断，生活朴素，学习刻苦，作战指挥灵活机动，还擅长演说。在他领导下工作我是很乐意的。

确定留下的人员以后，谭师长即电告新四军军部，并提议我参加新四军第六师军政委员会。军部复电同意。3月中旬，师军政委员会成立，谭震林、罗忠毅和我为委员，谭震林任书记。对于我的任职，谭师长作了一番考虑斟酌。开始，他觉得自己兼职过多，要我当六师政治部主任。可是这样一来，十八旅旅长没有合适人选。谭师长感到左右为难，便和我商量，征求我的意见。我对谭师长说，眼下六师刚刚创建，最紧迫的任务是要发展部队。我个人的任职无关紧要，只要能在党的领导下干力所能及的工作就行。从实际情况出发，我还是到旅里去带兵比较合适。这样，你可安心在师部掌握全局。我的明确表态使谭师长下了决心。后来，军部来电同意我任十八旅旅长。不久，十八旅在江阴祝塘召开成立大会，宣布由我担任旅长，温玉成任政委，夏光任参谋长，张英任政治部主任。会后，傅秋涛带领从皖南一同突围出来的其他同志离开东路，北上盐城军部。这样，我便第二次在谭震林直接领导下开始了新的工作。

二　东路抗日添劲旅

抗日战争时期的苏南东路地区，位于京(宁)沪铁路东段，其大致范围是东抵浦东，南临太湖，西至锡澄(无锡至江阴)公路，北濒长江，面积约 14000 平方公里，人口约 1000 万。这块地区在长江三角洲，除西部有一些低缓山丘外，大部为平原和水乡，水陆交通便利，东面是世界闻名的大都市上海，西面则是侵华日军总部和伪国民政府所在地南京，其战略位置极其重要。十八旅的组建，为在东路这个日伪统治的心脏地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增添了劲旅。

在我到达东路之前，这里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八·一三"淞沪抗战以后，上海地下党曾陆续派遣干部到东路开辟工作，建立了中共江南特委和浦东工委等党组织，并在江阴、常熟、无锡、浦东和浦西等地创建抗日游击基点，这是第一阶段。1939 年 5 月，陈毅根据党中央"向东作战"的方针，派叶飞率新四军第六团，以"江南抗日义勇军"的名义，挺进东路地区抗日，在完成筹集"人、枪、款"任务的同时，相机建立东路抗日根据地。同年 9 月，由于国民党扶持的顽固派武装"忠义救国军"阻挠和破坏，"江抗"被迫西撤。留在东路地区的新四军伤病员配合当地党组织在苏(州)常(熟)一带坚持打游击，这是第二阶段。1940 年 4 月，军部派谭震林来到苏南敌后，开始了东路地区第三

阶段的斗争。在谭震林的统一领导下，东路党组织放手发展抗日力量，以原有的苏常游击区为基地，东出昆（山）、嘉（定）、青（浦），西入澄（江阴）、锡（无锡）、虞（常熟），迅速打开了东路抗日的新局面。到皖南事变时，东路地区已公开建立了各级抗日民主政权，部队发展到3000多人。新四军第十八旅正是在这个基础上组建的。

我到十八旅任职以后，通过与温玉成、夏光、张英等交谈，并深入基层调查了解情况，对十八旅这支部队有了较全面的认识。概括起来是“新”、“纯”、“散”三个字。“新”是部队新成员多，除少数老红军担任团、营级指挥员外，战士和绝大多数连排干部都是抗战爆发以后入伍的，伍龄两三年已算是老战士了。“纯”是部队指战员的出身比较好，工人成分占30%左右，知识分子所占比例也相当高。“散”是部队尚处于分散游击状态，各项制度建设刚起步。我们在组建工作中，根据军部和师部的指示精神，结合东路的实际情况，决定旅部不设大的机关，保持精干与机动。团级建制采取两种形式，一种是设营的大团，另一种是不设营的小团。经过一段时间的紧张工作，十八旅的组织建设初具规模，所辖四个团的大致情况如下：

第五十一团，由原“江抗”西路司令部一、二支队改编而成，是不设营的小团，共有5个连，400余人。团长张开荆，政委陈光，参谋长赵伯华。其活动地区在锡澄公路以西的丹北地区，负责保证大江南北的交通往来。张开荆同志原任江南抗日救国军东路指挥部参谋长，为了加强新组建的五十一团，决定调他当该团团长。

第五十二团，由原“江抗”东路指挥部二、六支队改编而成，下辖两个营，600余人。团长陈挺，参谋长胡品三，政治处主任张鏖。该团是十八旅的主力团，其中第一营是战斗力最强的原二支队。其活动地区在江阴东乡，兼有保卫师、旅领导机关的任务。

第五十三团，由原“江抗”东路指挥部一、五支队改编而成，下辖两个营，约600人。团长刘飞，参谋长韩云，政治处主任彭冲。活动地区在江阴北部及沙洲沿江一带。该团第一营曾渡江到苏中参加过黄桥战役，武器装备得到更新和加强。

第五十四团，由原“江抗”东路指挥部三、四支队改编而成，下辖两个营，600余人。另外附属一个重机枪连。团长吴咏湘，参谋长王明星，政治处主任黄吉民。活动地区在无锡、吴县等地。该团第一营是十八旅工人成分最多、文化程度最高的一个营。

在我旅活动地区内，还有江南行政委员会保安司令部下属的地方部队。

警卫一团，由沙洲、王庄、华市等地常备大队组成，下辖6个连，约500人。团长杨知方，政委曹德辉，参谋长陈新一，政治处主任包厚昌。其活动地区在沙洲、江阴一带，经常与江南行政委员会一起行动。

警卫二团，由苏州、常熟、太仓三县的常备大队改编而成，下辖4个连，约400人。团长郭曦晨（因伤未到职，后由薛惠民担任），政委薛惠民，政治处主任钟发宗。活动地区在苏（州）、常（熟）、太（仓）及阳澄湖一带。

此外，还有无锡县警卫营、江南第四行政督察专员公署警卫连，以及各县、区常备武装。

在组建地方部队时，我们特别注意选拔在地方上有影响的人士担任主要领导，并配备得力干部帮助他们工作。警卫一团团长杨知方，是出身于沙洲锦丰镇大地主家庭的爱国青年。上海沦陷后，他流亡到大后方，考入国民党中央军校特别训练班，毕业后在国民党军队中担任接收壮丁的排长。1939 年秋，他因不满国民党的专制腐败，回家乡参加“江抗”。他作战勇敢，要求进步，不久就在党组织培养下入了党，当了教导队副队长。杨知方的异母哥哥杨行方是个帮会人物，抗战后拉起武装，称霸一方，先后投靠过“忠救军”和伪军，彼此争权夺利，相互火并。1940 年秋，杨知方受组织派遣，回家做杨行方的教育争取工作，促成杨行方率部反正，被改编为沙洲常备大队，杨知方任大队长。党组织派了一些党员协助他改造部队，还吸收了大批贫雇农和上海下来的进步青年充实部队，使该部的面貌为之一新，并对我们做好统战工作，开辟沙洲地区，产生了积极影响。所以，在配备警卫一团的团级干部时，我们破格选拔了参军入伍才两年的杨知方担任团长，而让参加革命较早的曹德辉、包厚昌分别担任团政委和政治处主任。

警卫二团团长郭曦晨，抗战前在国民党财政部税警总团任连长，抗战初在太仓任国民党江苏省保安第四团第四营副营长。1939 年 6 月，叶飞率“江抗”进抵太仓时，对他进行教育和争取，并派干部到该营开展工作。同年 12 月，在“江抗”东路司令部的帮助下，郭曦晨收容了保安第四团官

兵100余人，编为“江抗”第二支队，并任该支队副支队长。1940年7月，“江抗”二支队在进军江阴的作战中，郭曦晨右腿负伤，离队休养，后改任太仓县县长兼县委军事委员，主要负责扩军工作，并被聘为江南行政委员会委员。无论是打仗还是做后方工作，郭曦晨表现都很出色。所以当组建警卫二团时，他虽然腿部负伤行动不便，但我们考虑到他在苏常太地区有一定的影响，还是确定让他担任团长，以事实说明我们共产党确实是以抗日为重，任人唯贤，不像国民党结党营私，任人唯亲。这同我们任用杨知方一样，在地方人士和群众中反响强烈，对于我们在东路地区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迅速在这里站稳脚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三　创建主力兵团

1941年4月初，十八旅五十二团召开排以上干部会，我应团长陈挺和团政治处主任张鏖所请，在会上作了题为《为创造主力兵团而奋斗》的报告。这个报告的记录稿曾刊登在十八旅政治部主办的第36期《东进报》上。

我之所以要讲这个题目，完全是从十八旅的具体情况出发的。如前所说，十八旅成分虽好，但与新四军其他各部相比，还是一支年轻的新军。以同师的十六旅来说，全旅的部队是在新四军二支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主力团第四十六团是以新四军刚组建时的老部队为骨干；而十八旅

连一个成建制的新四军老连队都没有，即使是有“江阴老虎”之称的第五十二团第一营，也仅有年把“军龄”。其他各部就更不用说了，既缺乏打大仗的经验，又缺乏老部队的优良传统。这是十八旅组建之初带普遍性的问题。因此，我深感当务之急是要在巩固这支部队的同时，大力提高全旅指战员的军政素质，使它成为坚持苏南东路敌后抗战的主力兵团。指导思想明确了，我们有针对性地采取了一系列具体措施，归结起来就是抓整顿，抓建设，抓扩军。

抓整顿。不仅是组织整顿，更主要的是思想整顿。我们贯彻华中局和军部的指示精神，用毛泽东同志关于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和党的领导是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的思想武装指战员的头脑。当时，有不少指战员对新四军是什么性质的武装认识模糊，往往把执行统一战线政策的新四军当成是统一战线的武装组织。我们抓住这个带倾向性的问题，组织学习和讨论，指出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是以革命武装反对反革命武装。我们党要领导革命，便要对革命武装保持绝对的领导。在抗日战争时期，我党实行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团结和争取一切力量坚持抗战。然而，统一战线政策和统一战线组织不能混为一谈。新四军是我党领导下，执行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的军队，而不是统一战线的军队。如果混淆了两者的界限，就会产生右倾错误，削弱党对新四军的领导。为此，十八旅从创建之日起就实行了政治委员制度。团以上单位设立政治机关，营、连分别设立政治教导员和指导员。严格选派具有较高政治觉悟的优秀干部组成政工干部队伍。各部队积极做好党的发展工作，使基层连

队的党员数量保持较高的比例。各连队学习红军部队的优良传统，较好地发挥党支部、党小组的战斗堡垒作用。十八旅的政治教育是很有特色的。我们充分发挥指战员文化水平较高，接受能力较强的有利条件，重视对党员、干部进行马列主义基本理论的教育。旅政治部编写了《工人与革命》、《农民与革命》、《家庭与革命》等通俗易懂的小册子，供指战员学习。这样，就把阶级仇、民族恨的感情上升到工人阶级和无产阶级革命的理性高度，从而增强党性，自觉地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

抓建设。一是狠抓制度建设。十八旅各部队在原有基础上健全了军事、政治、纪律和军需四大工作制度。当时，由于处在游击战争的环境里，部队战斗频繁，流动性大，对制度建设带来一定的困难。但是，我们并不因此放松这项工作。再三强调，我们要发扬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和作风，而不能染上游击习气，这是能否成为主力兵团的重要标志。各部队在平时能严格执行军事训练和政治学习等各项制度，加强连队生活管理，从而增强了部队的战斗力；与此同时，通讯联络、军械修造、医疗卫生等方面，也在原有基础上取得进展。二是把培养干部作为部队建设的中心环节。我们明确提出，“干部决定一切”，创造主力先培养干部，并坚持自力更生，就地培养，而不是向上伸手。旅部办好教导大队，各团开办干部训练班。旅教导大队由樊道余任大队长，白书章任教导员，下辖三个中队，分别培养政治干部、军事干部和行政供管干部。训练内容有军事、政治和文化三大科目。军事训练包括行军、宿营、侦察、警戒、内务、刺杀、投弹、射

击、越障碍，班排连动作及游击战术等项目。训练中注意就地取材，讲求实效，不追求形式（经济条件也不允许我们去搞形式主义）。例如，在树桩上扎起竹杠代替单杠；用长板凳作支架，搁上竹竿就成了跳高架；步枪不够，就用木枪或扁担练习刺杀。尽管教学设备简陋，可是训练起来却一丝不苟。政治教育内容有党建知识、社会发展史、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连队政治工作、民运工作等，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做什么、学什么。例如，讲授连队政治工作就安排了怎样上好政治课，怎样讲革命故事，怎样开展个别谈心，怎样改造落后战士等专题讲座，这些都是连队政治工作经常碰到的问题，同实际结合得紧，学了就用得上，所以大家愿意学。教导大队的学习一般每期4个月，参加学习的有连排干部、支部书记、文化教员、事务长、优秀老战士、老侦察员、老警卫员、新入伍的青年知识分子和工人，还有少数归国华侨。经过几个月较系统的学习，成为创建主力兵团的骨干力量。

抓扩军。新四军其他部队的扩军都是面向农村，我们从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发，面向大上海扩军。当时，江苏省委设在上海，以刘晓为书记的中共江苏省委曾对十八旅的扩军给予大力帮助。上海的地下党花了很大力量，不仅通过动员失业工人、职员和失学青年到东路根据地来参军，给我们输送了大批战士，而且还给我们输送了一批部队急需的无线电、医务、财经、印刷等专业技术人才。旅部还决定各团派人到上海直接扩军。办法是以上海籍的干部、战士为主，组成秘密扩军小组前往上海，在地下党的帮助下，深入群众，了解情况，物色对象，进行宣传，同时通过串联亲朋好友，拓开

渠道,“招兵买马”。那时,饱受侵略战火和日伪奴役之苦的大上海,大批失业工人、职员和失学青年,既仇恨日本侵略者,又报国无门,他们听了扩军小组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很快提高了政治思想觉悟,纷纷要求加入到抗日救国的队伍中来。

招了新兵,如何送到东路敌后?由于不是在抗日根据地就地招兵,所以也不能采取披红戴花、大吹大擂送新兵入伍的办法,而只能在敌人眼皮底下秘密地走。一种是从上海坐火车到昆山、苏州或无锡下车,再换轮船或步行到根据地;还有一种是利用日伪军包庇的走私轮船,开辟从上海至沙洲的水路运输线。十八旅成立以后,仅三个月,各团扩兵总数即超过1000人。这些从上海招收来的新兵文化程度较高,知识面广,接受力强,经过一段时间的教育培养,进步很快。很多人成为班排骨干和后备干部的人选,为把十八旅建成主力兵团创造了条件。

四　痛击“忠救军”

忠义救国军的前身是“八·一三”事变后成立于上海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苏浙行动委员会。这个组织是由戴笠建议,经蒋介石同意,在杜月笙、杨虎等帮会头目积极参与下成立的,骨干多为帮会流氓分子。上海失陷时,其残部1000余人撤往皖南祁门县整顿。1938年3月,在武汉正式

成立了忠义救国军总指挥部，戴笠自兼总指挥，俞一则任副总指挥。取名“忠义”，据说是杜月笙的主意，实际上是借效仿岳飞的“忠义岳家军”，标榜江湖义气。

“忠救军”在军事建制上属国民党第三战区，是所谓“中央直接编练之挺进部队”。在第三战区管辖的浦东、松江、苏州、沪杭线、京（宁）沪线、吴兴、宜溧和当芜等8个江南沦陷区中，划为“忠救军”活动的有浦东区、苏州区和京（宁）沪线区。这样，东起上海、西迄南京，差不多整个苏南都成了“忠救军”肆虐的地盘，而新四军则被限制在当芜区（包括江宁、句容、丹阳、镇江、当涂、芜湖等县境）。由于“忠救军”在沦陷区里有军统的网络，又有帮会流氓的社会基础，所以其势力迅速扩张。从1938年春到1939年春，一年时间内，队伍从2000余人发展到20000余人，即增加了10倍。

“忠救军”以第三战区后方为基地，以苏南东路为基本活动区域，并与沦陷区日伪势力暗中勾结，扮演了反共摩擦急先锋的角色。在苏南东路抗日根据地的创建过程中，不仅多次遭到“忠救军”主力部队的大规模武装“清剿”，而且不断受到盘踞在根据地内的“忠救军”便衣武装的破坏和袭击。在东路地区的“忠救军”特务武装有澄锡虞行动总队、无锡行动总队、苏常行动总队、淞沪行动总队、太湖行动总队等。因此，我军在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同时，还要对付“忠救军”的反共摩擦，经常遇到敌伪顽几路夹击。这是东路斗争的显著特点之一。

皖南事变以后，国民党第三战区顽固派欣喜若狂，反共气焰更加嚣张。他们派遣“忠救军”打头阵，妄图把新四军消

灭或驱逐出苏南。1941年3月，“忠救军”总部制定了一项矛头指向苏南东路抗日根据地的作战计划。其部署是，以“忠救军”教导第三团、淞沪行动总队、教导第一总队组成苏嘉沪挺进纵队；以“忠救军”教导第一团、锡澄虞行动总队组成锡澄虞挺进纵队；以“忠救军”教导第二团和暂编教导第二总队组成锡武（进）宜（兴）挺进纵队。作战计划称：“苏嘉沪挺进纵队，应先以主力肃清吴县、昆山、常熟间任天石匪部，尔后协力锡澄虞挺进纵队夹击锡澄虞一带江抗匪军主力，并防范其突围东窜。”“锡澄虞挺进纵队应适时借锡武宜挺进纵队掩护，进至京沪铁道北，会同锡澄虞别动总队，苏嘉沪挺进纵队夹击锡澄虞一带之江抗匪军至长江南岸而歼灭之。”“锡武宜挺进纵队应随时准备跟进，策应作战。”这项作战计划还狂妄叫嚣：“各纵队除以军事力量清剿残匪外，应配合政治力量，扶纠流氓，安慰民众，恢复保甲，清查户口，安定地方，使匪军匪党无从立足。”“各纵队对长江南沿江要点，应绵密部署，遏阻苏北匪军南窜，又扬中县为匪军长江南北交通要点，尤须特别注意，尔后设法收复，以截断其交通。”这样，在苏南东路地区一度缓和了的国共之间的摩擦与反摩擦斗争又激烈起来。

我们十八旅在进行扩军和整训部队的同时，全力投入了反击“忠救军”、保卫根据地的斗争。这一时期反顽斗争的特点，一是时间长，从4月至9月延续半年之久；二是规模大，“忠救军”几乎是倾巢而出；三是范围广，东起淞沪、中贯苏常太、澄锡虞，西到丹北，整个东路抗日根据地都遭到“忠救军”的进攻；四是敌伪顽夹击，“忠救军”进攻之时，正是日

伪“清乡”之际。“忠救军”不惜投靠日伪，借刀杀人，使我东路抗日根据地面临非常严峻的形势。

首先是淀山湖战斗。1941年4月，我们派遣周达明率青昆支队的两个中队近百人，到淀山湖一带开辟新区，布置浦东支队向西发展，使浦东和浦西接通，以扩大上海外围的抗日游击战争。就在青昆支队和浦东支队取得联络，并商定了双方部队会合时间和接头办法时，由袁亚承指挥的“忠救军”苏嘉沪挺进纵队1000余人进入淀山湖地区，向宿营在青浦县西岑谢石关村的青昆支队发起袭击。由于顽我力量悬殊太大，青昆支队伤亡较多，周达明同志在率部突围途中英勇牺牲。谢石关事件以后，“忠救军”继续向北推进。青昆支队及地方民运干部为保存力量，避免损失，按照上级指示精神分头撤往苏常太和上海，仅留下少数党员坚持秘密斗争。

当年5月下旬，“忠救军”锡澄虞挺进纵队1000余人在郭墨涛率领下，由盘踞在阳澄湖的地方顽固派胡肇汉接应，越过京沪铁路，进入苏常太地区。在这次行动中，“忠救军”一改过去单纯军事活动的做法，注意利用顽方的地方党政力量，大造舆论，收集情报，并大肆捕捉我方的非武装人员，破坏抗日民主政权，妄图恢复他们所谓的“根据地”。6月10日，郭墨涛率部侵入苏州横泾地区，接着向驻在邵家坝的我十八旅五十四团一、二营进攻。我和参谋长夏光接到五十四团的急电后，即令驻常熟白茆的警卫二团火速增援。我参战部队在当地群众支援下，沉着应战，勇猛追杀。战斗持续6小时，毙伤顽军130余名，俘虏10余名。迫使对方败退到阳

澄湖边的湘城，构筑防御工事，采取守势。五十四团来电请示乘胜进击湘城。我们研究后认为，从战术上讲，在顽军败退、立足未稳之时，我军应乘机扩大战果；但是，鉴于我方在兵力装备和攻坚手段等方面均不占优势，本着不打无把握之仗的原则，遂命五十四团和警卫二团乘胜撤出战斗，另择时机歼敌。

为了给顽军以有力打击，我们决定派夏光带五十三团一营与五十四团汇合，组成东路支队，担负反击顽军的任务。这时，"忠救军"锡澄虞挺进纵队由常熟西乡的地方顽固派接应，从湘城经昆承湖、冶塘，进驻澄锡虞地区。7月4日，我东路支队集结七个主力连的兵力，分两路合击顽军驻鸷山的阵地。这一仗我军本该打得更好，但因负责北路包抄的部队收到电报后，译电员的密码本上没有"鸷"字，致使配合不力，让顽军乘机逃脱。

这时，日伪开始在苏常太地区"清乡"，"忠救军"加紧与日伪勾结。郭墨涛在其锡澄虞别动总队总队长包汉生的引领下，竟亲赴苏州与伪方联络。日伪报纸当时曾以"忠救军要员来归"为题加以宣传。日军还派出常熟宪兵队长等七人随"忠救军"行动。原"忠救军"苏常行动总队总队长杨春华，在投敌充任伪常熟自卫总团督察长以后，配合"忠救军"一起行动。日伪顽合流以后，更加猖狂地袭击我十八旅部队，搜捕我地方党政干部。仅7、8两个月的不完全统计，就捕捉我方人员近百名。

8月初，我六师师部和十八旅旅部驻扎在江阴祝塘以南的北山头和南山头一带。"忠救军"锡澄虞挺进纵队有恃

无恐地向我发起进攻。8 月 3 日中午,“忠救军”出动 400 余兵力猛攻南山头,我第五十三团和五十四团各一部设伏于道旁,出其不意予以痛击,“忠救军”败退祝塘,郭墨涛、包汉生为了达到歼灭我六师首脑机关之目的,竟向驻江阴青阳镇据点的日伪军求援。日军派汪伪新编“清乡”第一大队高杏宝部 300 余人从青阳出动,袭击我军后路,致使我军腹背受敌,南北两线作战。我军在歼“忠救军”80 余人后,主动向东转移,脱离险境。战斗中我五十三团一营教导员商健民英勇牺牲。

祝塘战斗后,“忠救军”头目郭墨涛调回总指挥部,由汪浩然接任锡澄虞挺进纵队指挥官。“忠救军”在换将之际,还导演了一幕宣布脱离常熟日军控制的闹剧。8 月底,该部向西逃窜,在武进县北部和江阴县西乡一带,与“忠救军”锡武宜挺进纵队会合,并在武进县焦溪镇设立“前进指挥所”,由“忠救军”少将司令刘伟统一指挥。与此同时,“忠救军”还在丹北地区集结兵力达 2000 余人,妄图实现其在长江南岸歼灭我十八旅主力,并截断我苏南、苏中交通线的既定计划。西石桥反顽战斗就是在这样的态势下发生的。

8 月下旬,我十八旅主力从澄锡虞地区撤至丹北地区。不久,我带领五十二团和五十三团主力先行渡江,在苏中根据地第三分区沿江一带保持机动。谭震林师长率五十四团和五十一团留在江南领导反“清乡”斗争。9 月 22 日,“忠救军”从焦溪倾巢出动,兵分三路向我军西石桥发起进攻。南路主攻西石桥,北路实施后路包抄,中路实行中间突破,战线从南到北有六七里长。谭师长亲自指挥这次反顽战斗。他

对“忠救军”的进攻早有准备，战斗的前夜，我在江北接到他的急电，要我速派一个主力营连夜南渡，设伏于顽军进攻的北线地带。我立即派第五十三团参谋长韩云、三营营长林辉才率三营执行任务。接着回电询问是否再派部队增援。谭师长来电说暂不需要再派部队，并告诉我军的部署情况。谭师长采用的是“田忌赛马”的计策，以强对弱，以弱对强。他知道“忠救军”进攻的重点是西石桥，而“忠救军”兵力最弱的是中间一路，即“忠救军”暂编教导第二总队。该部系散兵游勇拼凑而成，原在太湖北岸活动，总队长梅明章是个儿番投敌的民族败类。战斗进展完全如谭师长所预料的那样。天刚亮，北路顽军首先向我六师师部所在地申港、芦埠港一线实行包抄，恰好陷进我五十三团三营布下的埋伏圈。顽军遭到伏击后，惊恐万状，慌忙后撤，我军一直追至申港。中路和南路顽军同时向我防守西石桥的五十一团发起进攻。我军被迫撤出西石桥镇东街，转移到镇中心的大桥以西继续抵抗。此时，中路顽军向我驻守老所街、陈家桥的五十四团一营发动进攻。我军在营长杨绍良率领下勇猛反击，击毙指挥官梅明章，中路顽军全线溃退。我五十一团闻讯后士气大振。张开荆团长亲率突击队攀上屋顶，架起机枪，横扫占据西石桥镇东街的顽军。我澄西县地方武装和大刀会数百人配合作战，追杀顽军。顽军伤亡惨重，仓皇逃回焦溪镇。至此，西石桥反顽战斗大获全胜。“忠救军”妄图驱逐我军，截断我丹北交通的计划成为泡影。

五 开展反“清乡”斗争

1941年下半年，苏南东路的反“清乡”斗争，是苏南抗战史上的一件大事。我在谭震林同志的直接领导下，曾参与领导了这场斗争，觉得很有必要谈谈我所经历的情况。

我认为，笼统地说东路反“清乡”斗争失利是不确切的。所谓“失利”，主要是指反“清乡”开始时，在苏常太地区坚持内线斗争，不仅部队损失大，而且地方党政机构和群众团体也遭受重大损失。其后，我们总结了经验教训，在澄锡虞反“清乡”斗争中，主动地、有计划地实行战略转移，就不存在失利的问题。至于战斗中有些损失，是敌后游击战争中的正常现象，而不应该算在反“清乡”斗争的帐上。

那么，苏常太地区反“清乡”斗争失利的原因何在呢？翌年1月22日，我代表新四军第六师在华中局第一次扩大会议所作报告中曾归纳了这样几点：

1. 为了很好地指挥和领导，首先对情况的估计和认识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在苏常太反“清乡”斗争中，部分主力受损失，主要是由于忽视了日伪的“清乡”与过去的“扫荡”不同，对“清乡”的残酷性认识不足，致使我们在党政军各方面缺乏充分的准备。

2. 无论是对付敌人的“清乡”还是“扫荡”，我们的军事力量不能过于分散。兵力分散，会失掉打击敌人的机会，也

不利于集中力量突围。苏常太反“清乡”就是吃了兵力过于分散的亏，加之过去没有分散突围的经验，在敌人大兵压境时损失就大了。

3. 在不能坚持时，应机动转移，特别是坚持敌后斗争，各块根据地被分割的条件下，干部应机动。在不能坚持时，只有机动转移，才能保存我们的有生力量，而切不可机械地执行上级指示，导致坐以待毙。

4. 反“清乡”斗争的成败，与我们平时是否正确执行党的政策，关系极大。苏常太反“清乡”所以失利，客观上是由于敌人力量强大，但主要还是主观上有错误。过去，苏常太的干部在执行党的政策上过“左”，特别是反汪锄奸扩大化，把很多人赶到了敌人一边，结果孤立了自己。敌人正是抓住我们这个弱点，利用被我们赶走的人充当他们“清乡”的爪牙。这是个十分深刻的教训。

50多年后重温这段历史，我仍感当时总结的这四条经验教训还是恰如其分的。下面我就围绕着这些经验教训，再作些具体的回顾。

日伪关于分区“清乡”的计划，早在1941年初即开始酝酿了。当年5月11日，汪伪政府正式成立“清乡委员会”，由汪精卫亲自担任委员长，陈公博、周佛海任副委员长，特务头子李士群任秘书长，具体主持“清乡”的日常工作。日伪发动“清乡”的目的，是要强化汪伪政权，巩固其统治，以实现“以华制华”的阴谋；在军事上消灭或驱逐占领区内的抗日力量，使占领区变为其稳固的后方基地；在经济上则达到其更加随心所欲地掠夺人力物力资源，供其扩大侵略战争的

需要。为此，敌人“清乡”的方针是“三分军事、七分政治”，“政治力量与军事力量相辅而行”。日军借鉴在朝鲜和我国台湾及东三省推行殖民统治的办法，运用蒋介石在土地革命战争中“围剿”苏区的经验，实行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全面“清乡”。6月18日，日军第十三军军事顾问部主任晴气庆胤与李士群签订了《关于苏州地区清乡工作之日华协定》，其中规定伪军、伪警察及特工人员均受日军指挥调遣，担任作战和封锁等项任务。日伪一方面在报纸上大肆宣传，声称“清乡成败即中日合作成败”，“清乡是国民政府政治强化的试金石”；另一方面把常熟等地列为“实验清乡”区，将伪县政府改为“清乡特别区公署”，成立特别区封锁办事处，并以太仓浏河口为起点，沿长江南岸西行至常熟福山，再由福山向南，沿福山塘、元和塘至苏州，由苏州向东，沿京沪铁路、浏河至浏河口，构筑了一道长130公里的竹篱笆封锁线，在封锁线上的交通要道设立检问所，对进出人员和物资进行盘查。在日伪控制的市镇首先开始整顿保甲，训练壮丁，组织警察所和伪自卫团。

这些情报和动态，我们事先都是掌握了的。因此，日伪“清乡”从某种意义上说，是“阳谋”而不是“阴谋”。可是，我们虽然掌握了情报，却没有引起高度重视。从客观上说，日伪准备“清乡”之际，正是国民党“忠救军”窜入我东路根据地进行摩擦之时。这不仅分散了我们的注意力，而且牵制了我们的力量。从主观上说，我们对日伪“清乡”的认识不足，对“清乡”的特点缺乏研究。记得我曾向谭震林同志汇报，“这次鬼子搞‘清乡’，来势不同寻常。”谭师长带点轻蔑的口

吻说，“怕什么？还不是那么回事！”实际上，我们仍把它当成过去那样的“扫荡”看待。所以，直到6月28日，日伪已完成竹篱封锁线，对我部队和人员行动造成威胁时，师、旅部才召开反“清乡”动员报告会，由谭师长作动员报告。我们在向军部汇报时，仍然判断“清乡”“是仿华北对八路军扫荡方式”。基于以上主客观原因，我们开始时的指导方针仍然是以反“扫荡”的战术原则来对付“清乡”，即一方面主力分散坚持，另一方面各方面积极配合行动，以求分散调动敌人的兵力，待敌人的攻势过去后再拔除敌据点，恢复我们的工作。根据这一指导方针，我们反“清乡”的具体部署是，6月中旬，以原在苏常太地区活动的警卫二团和五十四团的一个主力营为反“清乡”部队，担任“清乡”区内线坚持任务。为了迷惑敌人，该部队对外番号为第五十五团。此外，把五十四团其他两个营调出苏常太“清乡”区。我们要求内线坚持的部队采取对敌纠缠的游击战，在保持自己有生力量的同时，求得打击与消灭敌人。对内线坚持斗争的作战原则也提出了三条：(1)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主要任务是打破敌人的封锁，破坏敌人的交通。(2)以小部队扰乱、阻止和牵制敌人。(3)以营或连为单位，采取大踏步的运动方式，寻找敌人弱点，进行攻击。这些战术原则用于一般的反“扫荡”是有效的，但用以对付日伪发动的第一次“清乡”显然是不够的。当时，敌人动用的兵力是日军3500人，伪军12000人；而我们在“清乡”区内线坚持的主力部队尚不足1000人。敌我力量如此悬殊，仍然采取内线坚持，这是造成苏常太地区反“清乡”斗争损失较大的主要原因。

在派谁去领导苏常太反“清乡”斗争的问题上，谭师长和我曾作了反复考虑。我要求去苏常太领导反“清乡”斗争，十八旅部队请谭师长直接指挥。谭师长不同意，说旅长要掌握全旅，不宜离开旅部。这时，十八旅政委温玉成在无锡带部队，旅级干部只有参谋长夏光和政治部主任张英，他们两位都是在东路工作多年的负责干部，对苏常太地区的情况比较熟悉。开始我们打算派夏光去。由于“忠救军”的进攻十分猖狂，反顽斗争十分紧张，夏光脱不出身，最后决定由张英任苏常太军政分会书记，统一领导反“清乡”斗争。

张英于6月下旬在东唐市召开了苏常太三县的县、区党政干部扩大会议，成立反“清乡”斗争委员会，杨浩庐（苏常太工委书记）、任天石（苏南第一行政区督察专员）、薛惠民（警卫二团团长）、钟发宗（警卫二团政委）为委员。在军事部署上，张英、薛惠民率警卫二团团部及三个连在常熟县；五十四团参谋长王明星和二营营长张友林率二营在苏州县；钟发宗率警卫二团一个连在太仓县。

日伪于7月上旬完成在“清乡”区内建立大批据点的工作。他们一方面实行封锁和分割，一方面在市镇和大村庄清查户口，召开“清乡”大会，规定“一家有罪，九家举发，若不举发，十家连坐”。这时，“清乡”尚未全面展开，我反“清乡”部队行动还较机动。钟发宗曾率太仓的部队袭击方家桥敌据点。由于我军兵力有限，久攻不下。在撤退途中反遭日伪搜索部队的堵截。这次行动虽未达到预期目的，但认识到日伪军联合驻扎据点，强攻难以奏效，并且暴露出一个严重问题：既然据点是日伪实施封锁政策的依托，据点打不下来，

即意味着不能打破敌人的封锁。7月15日开始，日伪在完成市镇的清查以后，利用汉奸和自首人员带路，逐步向乡村发展。敌人依仗其优势兵力，逐块进行昼夜不息的梳篦式“清剿”。在封锁线上则重兵防守，日夜巡逻。对于我军活动的中心区，敌人扣押毒打与我党我军有关系的群众，甚至以烧毁房屋相威胁，使群众不敢掩护我方人员。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我方最好的对策应是及早转移，撤离“清乡”区。但因缺乏经验，未能断然撤离，反而把部队进一步化整为零，以班、排为单位，继续原地坚持斗争。这就形成各自为战、互不配合的被动局面。我军指战员面对强敌，顽强战斗。警卫二团的一个连在常熟吴里区坚持斗争，团组织股长黄之平在掩护部队渡河时，被敌人包围。他拉响手榴弹，与前来抓他的日军同归于尽。这仅是我军指战员在反“清乡”斗争中可歌可泣、壮烈牺牲的一个事例。

7月下旬，我们多次收到苏常太军政分会发来的电报，报告敌人封锁严密、我军不断受损的情况，并表示誓死不退却，准备拼到底。我们研究了“清乡”区里的新情况，认为硬拼是不行的，现在最要紧的是减少损失，保存力量。于是立即致电苏常太军政分会，要求他们尽一切可能突围出来，不要硬拼，以免无意义的牺牲；并要求妥善布置地方工作人员撤离“清乡”区，强调要确保任天石、杨浩庐两同志安全撤退，因为他们是非军事干部，特别是任天石，是苏常太地区有影响的领导人，千万不能出差错。苏常太军政分会执行师部的指示是坚决的。接到电报，立即通知在苏州县的任天石和杨浩庐等人撤离“清乡”区，平安抵达上海。但是，由于交

通联系中断，无法将通知及时送达坚持在“清乡”区内的党政干部，加上缺乏经验，没有机动地采取分头突围的办法，而是通知在苏州县的五十四团二营到常熟县集中突围。结果，五十四团二营在北撤强渡白茆塘时，遭敌重兵截击，部队被打散，王明星、张友林两位指挥员相继牺牲。他们都是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老红军，王明星牺牲时才 24 岁，是十八旅最年轻的团级指挥员；张友林曾担任过粟裕的警卫员。我和谭师长在事后得知他们牺牲的情况，沉痛万分！在向北突围遭受挫折的情况下，张英、钟发宗、薛惠民等同志带领 200 多名干部、战士，改向西路分批越过福山附近的封锁线，于 8 月初进入澄锡虞地区。向西突围成功，减少了苏常太反“清乡”斗争的损失。

从叶飞率部东进抗日，到谭震林大刀阔斧打开苏南抗战新局面，苏常太地区一直是我东路抗日根据地的中心区。我初到东路时，曾去苏常太地区，看到那里社会秩序安定，抗日气氛浓烈，人民群众热烈拥护我党我军，完全是一派抗日根据地的兴旺景象，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人民高兴，敌人当然更加痛恨。东路根据地抗日斗争越发展，敌人越感到对他们的威胁严重，势必要千方百计来与我争夺这块地区。所以，日伪的“清乡”首先从苏常太地区开刀，决非偶然。我们今天来回顾苏南东路的工作，应该客观地说，把这样一个日伪统治的心脏地区，建成我党领导下的人民抗日的中心区，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在敌伪顽联合对付我新四军和抗日根据地的错综复杂的形势下，苏常太军民面对数十倍于我的穷凶极恶的敌人，不怕牺牲，顽强拼搏，反“清乡”斗争

能坚持到这样一个程度，是很不容易的。至于历史经验，如前所说，主要是我们对敌人“清乡”的残酷性估计不足，对反“清乡”不同于反“扫荡”的特点缺乏分析，因而开始时未能采取相应的对策；除此之外，从苏常太地区来说，在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具体政策上曾产生过一些“左”的偏差。例如，开展“肃汪”运动，混淆了汉奸分子与国民党党员的界限，导致锄奸扩大化，还错杀了数十名地方干部、抗日常备队战士和群众积极分子，一度搞得人心惶惶；对一些地方“实力派”的争取工作不够，在执行业（主）佃（户）政策、劳资政策中片面强调减息、增加工资，这种过头做法，脱离了当时的客观实际。所有这些，都驱使一部分本来同情抗日，或可以争取的人离开了我们，给反“清乡”斗争增加了阻力。

失败是胜利的先导。苏常太反“清乡”斗争的失利使我们获得了宝贵的经验教训。不仅在接着而来的澄锡虞地区的反“清乡”斗争中，而且在1943年春夏茅山、太滆、丹北等地的反“清乡”斗争中，都使我们从中获得教益，变得聪明起来。

六　反“清乡”新策略

在苏常太的干部陆续到达澄锡虞以后，谭震林同志领导我们六师师部、江南区党委、十八旅和东路特委的同志，多次召开会议，总结反“清乡”斗争的经验教训。我至今仍清

楚地记得谭师长没有因苏常太反"清乡"失利而责怪任何一个同志。他总是严于责己，着眼于今后如何搞好反"清乡"斗争。他对敌人的封锁政策、战术手段、伪政权的统治、特工间谍活动等情况都问得很细致。他在承担领导责任的同时，启发大家通过总结苏常太的经验教训，更好地领会和掌握毛泽东同志的游击战争思想。谭师长是坚持井冈山斗争的老战士，又经历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对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真是运用得炉火纯青。他教育我们，千万不能死守一地，不做赔本买卖，东方不亮西方亮嘛！会后，我们把情况向新四军军部作了报告，并提议，在日伪即将对澄锡虞地区进行"清乡"之前，我军宜先期转移，避开敌人锋芒，地方党政工作也应适应新形势，转为隐蔽斗争。

1941年8月14日，新四军军部向六师下达了"以分区转移应付敌分区清乡"的指示。这是一个重要决策，是采纳了我们的建议作出的。指示要求：(一）敌人对苏南"清乡"是分区"清乡"性质，六师各旅、团应以分区转移应付"清乡"为指导原则。在原地只留秘密工作同志打埋伏，保持联络，或完全不留，俟"清乡"过后再转原地工作。(二）我军转移之前，对居民应有深入动员，使人民了解长期抗战的意义，提高反对投降叛变的空气。在我军批准之下，可派人组织维持会，以应付敌军。(三）十六旅应向溧水天王寺以南地区及小丹阳地区去开辟机动位置，十八旅可向访仙桥、扬中一带作分散转移。部队到机动地区以埋伏隐蔽为主，不宜作大的行动，以免敌人注意。(四）应付苏南危局需要果断，同时需要灵活的策略。

我们以军部的指示作为澄锡虞地区开展反“清乡”斗争的指导方针，各项工作有步骤地展开。日伪对澄锡虞的“清乡”于9月1日开始。我们从8月14日接到军部指示后，在短短10天内就提前完成了分兵和转移两件大事。

首先是抓分兵。当时，十八旅在澄锡虞地区驻有五十二团、五十三团、五十四团、警卫一团及旅教导大队。军部建议我旅向访仙桥、扬中一带转移。我们研究后觉得，丹北地区不大，一下子容纳这么多部队，活动及给养均有困难。而太湖地区是日伪吹嘘的所谓“模范区”，敌人不太注意，空隙较大。根据内战时期的历史经验，我们平时不大敢去的地区，在反“清剿”紧急时被迫跑去，反而比较安全。现在虽然是抗战时期，但这一战术仍可以运用。于是，我们决定，分兵南下太湖，北渡长江。十八旅教导大队到沿江沙洲地区，与警卫一团配合行动，由沙洲向江北转移；五十二团二营原已派到苏州西乡配合苏常太反“清乡”斗争，就不再北调，留在太湖沿岸，与太湖游击支队合编为第四十八团，归新四军第十六旅指挥；其他各团集中反击国民党“忠救军”的进攻，并相机向丹北地区转移。这一分兵措施不仅保证了反顽斗争的顺利进行，而且避免了过多部队拥挤一处的被动局面，还开辟了太湖沿岸新区，不失为我十八旅在东路反“清乡”斗争中的一着妙棋。

确定了分兵部署，接着就抓转移。我们第一次西移，紧接在祝塘反顽战斗之后。十八旅各部以突然动作向西进发，计划穿越锡澄公路进入澄西地区。谁知天公不作美，当晚下起淅淅沥沥的小雨，田埂变得滑溜溜的，行军速度缓慢，不

时有人摔跤，天亮前才到达公路附近，许多人急切地要冲过封锁线，被谭师长制止了，还出人意料地下令部队向后转，退回出发地。为什么要退回去呢？就是为了使我们的转移万无一失。指战员们接到命令，坚决执行，悄悄地返回了出发地。8月23日傍晚，我军再次踏上西移的征途。半夜时分，部队就到达锡澄公路东侧，然后顺利地从青阳以南、堰桥以北的地段，拔掉竹篱笆，穿过封锁线，天亮时到达澄西的西石桥。

在十八旅主力撤离澄锡虞"清乡"区的同时，东路地方党政机关也有计划地实施了撤退。中共江南区委副书记邓振询，路东特委组织部长钱敏、青年部长赵秀英等人分别撤往上海。正如陈毅在1942年2月7日撰写的《苏南反清乡斗争的总结》一文结语中所说："我六师十八旅及东路特委、各行政专署在反清乡斗争中基本保持了我之主力及党政群众团体的干部大多数，还开辟了新区，恢复了非清乡地区的失地，锻炼了自己，增强了坚持苏南敌后前线的信心。我苏常太之局部损失，不是敌伪如何厉害，而是由于我初期之无经验，以及准备不充分和各方面的疏忽所致，以后即逐渐纠正。故使敌伪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之清乡即逐渐减弱其凶焰，而我之坚持力量乃逐渐上升。这是敌后抗战能坚持、能胜利之又一证明。"

七　开辟江高宝

1941年10月下旬，十八旅遵照新四军军部的指示，离开长江北岸的泰兴、靖江和如皋一线，向江都、高邮、宝应地区进军，去那里开辟新的斗争局面。这一决策的形成曾几经反复。六师师部和我旅主力从澄锡虞“清乡”区撤退后，向何处发展，到何处落脚，谭震林同志多次征求我们的意见。从感情上讲，我旅指战员绝大多数生长在江南，都不大愿意离开东路地区，何况日伪“清乡”是有期限的，等“清乡”高潮过后，我们还可以打回去恢复。而且我旅还有一条路可走，即向南发展，在京沪铁路以南地区敌顽之间仍有空隙可图发展。谭师长在听取各方意见之后，向军部作了汇报，提出恢复东路“清乡”区和向铁路以南发展的两个方向，请军部指示。9月17日，军部来电要十八旅暂不南进，渡江部队进行整训，但应作相机南调的准备。既然军部不倾向于我旅向南发展，那么是否有可能恢复“清乡”区呢？谭师长一面布置我旅主力在苏中的泰兴、靖江和如皋一线沿江机动；一面派警卫一团、五十二团一营等部队进入沙洲地区活动。

沙洲地处澄锡虞地区最北端，紧靠长江边，南北往来比较便利。谭师长的计划是以苏中根据地为依托，在沙洲地区建立反“清乡”桥头堡，日伪“清乡”高潮过后，再逐步恢复东路根据地。为此，警卫一团在何克希、曹德辉、包厚昌等人率

领下，曾打了许多小仗，特别是五十二团第一营在胡乾秀营长率领下多次出击，连连获胜。9月下旬，形势发生了变化。日伪军大量增兵沙洲，开始对澄锡虞地区进行第二期“清乡”。五十二团第一营奉命调至苏中如皋，由十八旅政委温玉成等人率警卫一团新整编的部队进入沙洲反“清乡”。警卫一团在连续作战中无法立足，被迫撤离“清乡”区。在突围过程中，警卫一团政委曹德辉、参谋长陈新一及部分干部战士英勇牺牲。沙洲地区反“清乡”斗争的实践说明，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要在短时期内恢复“清乡”区的武装活动是不可能的。这样，南进和恢复东路“清乡”区的计划均不宜实施。我旅在泰兴、靖江、如皋沿江的驻扎是暂时的转移，是为了便于休整和补充。10月，新四军军部先后两次来电，指示六师仍坚持以苏南为主要任务，但为便于六师转移安插后方及休整扩大，决定划江北泰州至口岸以西，宜陵、仙女庙以南与高邮湖以南，仁和集（天长东南）、谢家集至仪征县以东地区为六师长期活动地区，成立党政军委员会统一领导该区党政军民与地方武装以及税收工作；十八旅部队进入该地区完成接替任务及各种手续后，确保与仁和集以西二师部队及宜陵一旅部队经常取得密切联系。至此，我十八旅北上江高宝的决策终于确定。以后的事实证明，军部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不仅保存了我旅的力量，而且为开辟新区，沟通苏中、苏北、淮南、淮北四块抗日根据地的战略联系，发挥了重要作用。

江高宝地区从长江到宝应260华里，东西宽80华里，呈长方形。其东面是苏中抗日根据地的三分区和二分区；北

面是苏北抗日根据地；西面是淮南、淮北两块抗日根据地；南面与苏南抗日根据地的丹北地区隔江相望，是连结新四军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师的战略通道。早在1939年初至1940年夏，江都的沿江地带就是新四军挺进纵队的活动区域，我党我军在这里有一定的工作和群众基础。1940年7月中旬，郭村反顽战斗以后，陈毅、粟裕率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北渡，为了搞好与泰州地方实力派李明扬、李长江的统战工作，作为换取我军东进黄桥及通(南通)如(皋)海(门)启(东)的条件，我军遵守诺言，放弃了江都地区。皖南事变以后，李长江公开投敌，新四军第一师发起“讨李战役”。从那时以后，我新四军一师重新开进江都地区，将其作为继续北进的基地。1941年9月中旬，新四军一师一旅参谋长张藩率第二团，以挺进支队名义，过高港、江都等地，取得小纪战斗胜利，再与江高独立团合后，挺进高邮三垛以北、临泽以南地区，建立高宝同情区。10月初，新四军一师二旅参谋长杜屏率领第六团一部，以高宝支队名义，进入高邮临泽以北一带活动，一度攻克临泽镇。十八旅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进军江高宝的。翌年3月，苏中抗日根据地正式在江高宝设立苏中第一行政分区，并成立了党政军的领导机构，使这一地区迅速转化为苏中根据地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十八旅进军江高宝地区之初，这里大部分地区属于“同情区”和“伪化区”，处于复杂、激烈的三角斗争局面。日伪是一股强势力，国民党顽固派韩德勤也是一股强势力。特别是日伪，在外围有扬州、泰州、兴化、高邮、宝应五大据点，驻扎日军南浦旅团的部队。在内部有吴家桥、宜陵、丁沟、樊

川、临泽等据点，驻兵多少不等，但进攻行动很迅速。敌人称江高宝为“模范区”，这是因为伪军势力较强，除了在泰州驻有伪苏北行营外，还有刘湘图的伪二十二师，潘干臣的伪七十八师，夏岳五的伪新编二十九师，熊有恒的伪新编第四师，娄元勋的伪独立第十一旅，李长江的伪独立第十旅，伪军总数有一万多人。我旅刚进入江高宝，日伪军就增设了大小十几个据点，并发动了两次大“扫荡”。敌人在加紧军事进攻的同时，还强化保甲统治，轮训保甲长，组织伪自卫团和伪三青团，与我党我军展开激烈的争夺。

此时，我十八旅已经是一支训练有素、军政素质良好的抗日劲旅。在撤离苏南和连续转战的险恶形势下，部队非战斗减员很少；在到达新区，生活条件发生急剧变化之际，指战员始终保持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旺盛斗志。旅、团各级干部把政治思想工作落实到连队基层和战斗、学习、生活的每个环节。我们反复教育大家，虽然开辟新区将遇到很大困难，但是，我们也有许多有利条件。首先是有党中央、华中局和军部，以及一师、六师首长的正确领导，有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指导我旅的行动。其次是党政军民紧密团结，一切服从战争，一切为了开辟、发展和巩固这个地区。第三是有兄弟部队和其他根据地军民的大力支持。我旅北进既不是孤军深入，也不是孤立无援。有了这基本的三条，我旅工作就有了胜利的保证。我们还要求部队保持和发扬新四军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也就是党中央规定的三条：（一）当英勇作战的模范；（二）当遵守纪律的模范；（三）与人民群众、各阶层密切联系，当搞好统一战线工作的模范。只要执行这

三条，新四军所到之处就能够立足、生根，并发展壮大。

新四军军部首长对我旅开辟江高宝地区工作非常关心，曾多次告诫我们：江高宝地区为大江南北、苏北、皖东连接地区，又是敌伪自称的“模范区”，在战略上处于极重要地位，环境很复杂。因此，我们执行党的策略，贯彻党的路线，务须慎重灵活，尤其是统一战线工作极为重要。凡不来进攻我们的人，均不要去进攻他。与一切伪军、封建组织做好交朋友的工作。只有这样，才能自己站得住，较顺利地开展该地区的工作。正因为有军部的正确领导和我旅在苏南东路反“清乡”斗争的经验教训，所以我们从一开始就全面执行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团结中间势力，孤立打击顽固势力的斗争策略，把争取“大刀会”、“联庄会”势力作为突破口，迅速打开江高宝地区的抗日斗争局面。

“大刀会”、“联庄会”是抗日战争以后江高宝地区自发形成的自卫武装组织，大多数头领是地主乡绅及乡保长，但广大会众的主要成分是当地贫苦农民，他们的出发点是要防御日伪军的侵害，防范土匪的骚扰，保护老百姓生命财产的安全。我们通过具体的分析，认为“大刀会”、“联庄会”实质上是在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建立起来的群众抗日自卫武装，如果做好深入细致的团结争取工作，把它引导到抗日立场上来，就能转化为我新四军的“助力”；如果不分青红皂白地加以排斥，甚至以强凌弱，那就会变成抗日的“阻力”。于是，我们诚恳地拜访“联庄会”、“大刀会”的头领，向他们阐明新四军的宗旨和共产党的政策：第一，我们是抗日救国的军队，是和中国人民大众站在一起抗击日军侵略，反对伪

军压迫的；第二，新四军买卖公平，说话和气，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与老百姓同呼吸、共命运，是鱼水关系；第三，新四军团结一切抗日力量，欢迎他们共同抗日。

回想刚进江高宝时，各界人士，包括一般老百姓，由于受国民党顽固派欺骗宣传的影响，对我党我军疑虑很深，害怕、回避。经过我们广泛宣传，相互接触，终于逐步打消了他们的疑虑，取得了他们的信任。特别是以我旅指战员的实际行动，让他们看到我军确实是一支作战勇敢、纪律严明、处处尊重群众、关心群众利益的真正抗日队伍。从而由怀疑、害怕变为同情、靠拢我们。一些七八十岁的老年人看到我们部队到了哪里，就立即与那里的群众打成一片，帮助老乡打扫、挑水、做农活，为群众排忧解难，交口赞誉说："从未见过这么好的队伍。"解放后拍摄的电影《柳堡的故事》，就是我旅指战员进入江高宝地区以后关心爱护群众的真实写照。

话虽如此，由于"大刀会"、"联庄会"一时不了解我们的情况，也曾发生过一些意外的事情。记得我带着吴咏湘的五十四团进入高邮三垛不久，差一点与当地的"大刀会"发生武装冲突。一天夜晚，部队刚进驻一个庄子，突然锣声大起，会众们喊着："土匪来了！土匪来了！"我们干部、战士虽然十分生气，好在事先已打了招呼，要从抗日大局出发，努力去团结他们，不论遇到什么情况，都要"忍得一时之气"，不准开枪。共产党、新四军是人民的子弟兵，就要有这个肚量，不去计较一时的误会。经过我们耐心说服，最后化解了误会，避免了一场冲突，群众也由此受到了教育。对江高宝的地主乡绅，我们也注意做好团结工作，凡是愿意帮助我们的，我

们就称他们为“开明人士”，他们听了心里很舒服。总之，我们靠的是群众路线，靠的是统一战线这个法宝。在进行“感情投资”，做好团结工作的基础上，再把工作的重点转向武装问题，就比较容易解决了。我们曾对“大刀会”、“联庄会”的头领们说，你们虽有刀枪，毕竟力量还不够强。如果能和新四军合在一起，共同联防，抗日保家，就成了铜墙铁壁，何乐而不为呢？他们听了表示赞同。这样，上、中、下三层工作一起做，很快就将“大刀会”、“联庄会”争取了过来，领导权转到了共产党、新四军手里，逐步把“大刀会”、“联庄会”武装改造成了抗日民兵武装。

在江高宝地区，我们做的另一件大事，就是在中心区建立“三三制”的抗日民主政权。早在1941年2月，江都县政府就恢复了，同年建立了江高行署，许多民主人士被吸收参加到各级抗日民主政权中来。抗日民主政权的依靠基础是基本群众，这一点我们是非常明确的。同时，不能忽视团结开明士绅，这在大敌当前的抗日环境中，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认真推行了“三三制”的政策，调动了开明士绅的积极性，通过他们向中、上层人士宣传我党我军的政策和主张，往往要比我们自己出面作宣传效果更好。这件事，我们是做得比较成功的。在中心区外围和靠近敌占区的地方，我们则采取“打”、“拉”结合的斗争策略，做伪化区的区、乡、保长的争取和分化工作，逐步建立起“两面派”政权。开展这项工作的过程，就是促使他们从原来为日伪服务的“一面派”，先转变为两方都应付的“两面派”，再转变为真正为新四军服务，表面应付日伪的革命的“两面派”。当年我们做这项工作是

很有耐心，很细致的。“打”也罢，“拉”也罢，都要恰到好处，掌握好火候。要晓以民族大义，让他们懂得利害；还要执行“给出路”的政策，促其走自新之路，靠拢新四军，为抗战出力。这的确是一项需要具备较高政策水平和高超领导艺术的工作。

其实，我们在开辟江高宝地区时统战工作富有成效并不奇怪，因为我们已经深刻地吸取了在苏南东路地区斗争的经验教训。吃一堑，长一智，全旅上下对统战工作的重要性有了切身感受，指战员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的政策水平也在斗争中不断提高。据我所知，十八旅这支部队在后来漫长的革命征途上，一直是统战工作和群众工作方面的模范。

第十章　三到苏南

一　受命主持苏南工作

1942年1月20日至3月5日，邓振询和我分别作为江南区党委和新四军第六师的代表，出席了华中局第一次扩大会议。谭震林身为六师师长和江南区党委书记，本应出席这次重要会议。但是，1941年11月28日，发生了震惊苏南战场的塘马战斗。当天凌晨，日军出动步骑炮联合兵种共3000余人大举进攻我十六旅旅部驻地溧阳塘马村。为掩护旅部和正在这里开会的苏皖特委、苏南行署、苏南保安司令部的负责人转移，十六旅旅长罗忠毅、政委廖海涛亲自率部阻击，在与日军浴血拼杀中壮烈牺牲。当时，谭震林同志正在江高宝地区领导反"扫荡"斗争。他接到罗、廖牺牲的噩耗，悲痛万分，一面急电十六旅，命四十六团团长黄玉庭代理十六旅旅长，四十六团政委钟国楚代理十六旅政委；一面请示新四军军部，要求亲自到苏南十六旅整顿部队。12月4日，军部复电同意谭师长化装南渡的请求，同时指示：如不

可行，不必冒险。我们也都劝他养病（他因操劳过度，加之在反“扫荡”中曾掉入冰冷刺骨的河水生了场大病）暂不南下。谭师长谢绝了大家的好意，抱病前往苏南茅山地区，自兼十六旅旅长，由钟国楚任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张开荆任参谋长，着手整顿十六旅部队，同时电告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建议我和邓振询同志出席华中局第一次扩大会议。实际上，战争年代的情况瞬息万变，类似的事情是经常发生的。我在会上得知，新四军第一师师长粟裕也因忙于军务，未能到会，改由师政治部主任钟期光代表一师出席这次重要会议。

华中局第一次扩大会议是在阜宁西北边境的黄河故道旁一个叫单家港的偏僻小村庄里召开的。这次被称为“华中抗战里程碑”的会议的特点，归结起来是一大、二长、三透。一是规模大。出席会议的有华中局委员刘少奇、饶漱石、陈毅、曾山和华中各根据地党政军负责人以及新四军军部、各师、独立旅代表共 26 人，另有列席代表 70 人。这么多负责人聚在一起开会，这在华中八年抗战中是唯一的一次。二是时间长。会议从 1942 年 1 月 20 日开始，先开预备会议，再开正式会议，到 3 月 5 日结束，历时 45 天。三是各项工作和大政方针议论得透彻。刘少奇代表华中局作的《目前形势，我党我军在华中三年工作的基本总结及今后任务》，陈毅作的《论军事建设》，黄克诚作的《目前军事建设中的部队政治工作》，饶漱石作的《关于党与群众工作》和曾山作的《关于政权建设》等报告，对我党我军领导华中敌后抗战作了系统、全面的总结，并为尔后华中敌后抗战的工作制订了明确的纲领。

在这次会议上，邓振询和我分别发了言。我们两人的发言被安排在预备会议开头两天，即1月21日和1月22日。邓振询介绍了苏南的地理、社会情况和日伪顽态势，并对苏南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历史和我党我军领导抗战的经验教训作了阐述。他的发言很全面、很深刻，对成绩和缺点的评价实事求是，给与会者留下了深刻印象。我主要介绍了六师的历史和斗争情况。由于大家普遍关心苏南东路反“清乡”斗争，我着重介绍了日伪“清乡”的具体做法以及我军反“清乡”斗争的经验教训。我的发言，得到了华中局和军部领导同志的重视，并成为我三到苏南抗日的契机。

就在这次会议期间，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决定新四军一、六两师对内实行合并，谭震林任一师政委。派谁去十六旅坚持苏南斗争呢？华中局领导对此极为关切。在邓振询发言的当晚，华中局第一次讨论十六旅领导人选问题曾考虑过邓振询同志。那时，他是苏南区党委专职副书记，熟悉苏南情况，但他长期从事党的工作并不擅长军事。苏南是抗日斗争十分激烈的地区，让他全面主持苏南的党政军工作不太合适。第二天，我在大会上发言时，刘少奇向坐在他旁边的陈毅询问了我的情况。陈毅简要地介绍了我的经历，说我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曾在部队做过政治工作，并兼任过平江中心县委书记、鄂东南道委书记。新四军成立时任第一团副团长，和团长傅秋涛最先率部进军苏南敌后，因不久后调回皖南军部，所以鲜为人知。少奇同志听了连连点头，一边用手指弹着桌子，一边说“十六旅的人选有了”。我发言结束后，刘少奇宣布明天休会一天，然后把我留下来说，明天

我带你到党校去作报告，你今晚准备一下，把今天所谈的苏南反“清乡”斗争情况压缩到一个半钟点，现在，苏中地区对日伪“清乡”没有经验，既关心，又担心，你要如实介绍六师反“清乡”的具体做法。第二天，我就跟着刘少奇去党校讲了一课。少奇同志在一旁认真地听讲，实际上是对我考察。当晚，华中局再次讨论，一致同意刘少奇的提议，派我去苏南工作，并在征求了谭震林意见之后，把任命我担任苏南区党委书记、新四军第十六旅政委的决定正式通知了我。

华中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临近结束的一个晚上，刘少奇同志在他居住的村东北首的茅草屋里，与我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他询问了我的经历，并征求我对调任新职有何意见。我回答说，我虽然先后两次在苏南工作过，但时间都不长。这次的工作调动又这么突然，我感到责任重大，恐怕干不好。少奇同志听了笑着说，渭清同志，你说干不好，就有可能干得好；如果你说干得好，那你很可能干不好。革命的辩证法往往就是这样。你到苏南工作，首先要强化一元化领导，实现党政军统一领导，做到统一思想、统一指挥、统一行动。一元化领导，不是个人领导，而是要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实行集体领导。要注意听取各方面的意见，特别要听不同的意见。这样可以避免失误。要反对宗派主义，加强党政军民的团结，搞好上下左右的团结。团结的好坏，取决于你民主作风的好坏。

当我表示一定贯彻这次会议精神，用一切方法来坚持斗争，巩固苏南根据地时，刘少奇指出，苏南敌后的斗争环境越来越险恶，敌人像梅花桩一样布满了据点，如今又加上

"清乡"，说明日伪拼下赌注也要攫取苏南的野心。而国民党顽固派也想乘机挤进来，这就进一步加剧了苏南的三角斗争。这种敌强我弱的局面一时还无法改变。因此，我党我军在苏南的总任务是要长期坚持，而不是今天打个把胜仗，明天搞一点钱就了事。当党要求你们起劲干的时候，你们要有力量，也就是要你们现在坚守住苏南这块阵地，将来成为反攻的基地。怎样才能够巩固阵地呢？一是要有巩固的组织，即党和群众抗日团体；二是要有顽强的战斗力，即不断发展的新四军和民兵武装；三是要有灵活的斗争策略。特别是第三个条件最重要。在目前就是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要做到多交朋友、少树敌。如果朋友不多而敌人很多，就会吃亏。如果让敌人的反共反新四军的"统一战线"得逞，我们就会失败。而只要我们的统一战线搞好了，敌人就很容易对付和打倒。渭清同志，你要记住，朋友愈多愈好，敌人愈少愈好。在苏南面临的新形势和新任务下，要适当执行隐蔽政策，善于积蓄力量，扎扎实实地开展工作。譬如说，不要随意地、公开地提"打倒"的口号。我们要公开打倒的只是日本帝国主义和汪精卫，其他都不"打倒"，即使对汉奸，也要区别情况，分化瓦解，而不要笼统地喊"打倒"；对顽固派，更不宜喊"打倒"、"消灭"，他来进攻，我们自卫，但不放松争取，特别是对中下层要好好宣传和解释，这才是聪明的办法。

我对少奇同志说，这次会上介绍其他根据地用减租减息来发动与组织群众的基本经验，使我很受启发。苏南减租减息做得不够，原因一方面是根据地游击性大，成果难以巩固；另一方面则是主观认识上的片面性，把减租减息当成单

纯解决部队给养的经济斗争，因此重视不够。少奇同志高兴地说，你说得很对。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的确是巩固苏南根据地的中心问题。苏南过去在陈毅和谭震林的领导下，都开展了群众工作，是有基础的。但是，苏南是日伪顽争夺和敌强我弱的地区，抗日斗争起伏性大。形势好的时候，群众与我们关系密切，情况紧张时，群众便被迫离开我们，这是不奇怪的，但反映群众工作的基础还不广泛、不深入。一个重要原因是缺乏真正的减租减息，给群众以实际利益。这样做了，才能取得群众的信任与拥护。群众发动起来以后，再组织工、农、妇、青各类团体就是水到渠成的了。

这是我第一次单独与刘少奇谈话。经过少奇同志的指点，我对于如何开展苏南工作，大体有了个谱，胆子也就壮了。他的这席教诲，至今我还深深铭记在心中。

会议期间，我还向陈毅请示了工作，当时的新四军参谋长赖传珠也在座。陈军长说，渭清同志，这次把你从十八旅调到十六旅工作，我们是下了决心的，因为你在苏南的茅山地区和东路地区都呆过，具备这个条件的旅级干部非君莫属，相信你南去以后定能完成华中局和军部交给的任务。关于党的工作和统一战线问题，刘政委对你已经说得很透彻了，我就不再重复了。关于苏南部队的今后任务，谭震林师长还要和你具体商定，我仅就各方所获悉的最新情报，强调几个问题。

陈军长说，自从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苏南敌情有一个显著变化，这就是日军将长驻在苏南的大部分兵力抽调到了南洋作战，许多重要据点均被伪军接防。这说明敌人的威

胁较前减轻，对我坚持苏南阵地十分有利。你们要抓好根据地的扩大和伪军的争取这两件事。谭师长来电打算恢复江(宁)高(淳)溧(水)地区，军部完全同意。这一地区是通往二师的战略要道，最早还是你们老一团东进时开辟的。苏南开展伪军工作虽有成绩，但还不够普遍，办法还不够灵活，今后应成为你们的一项主要工作。要注意分析和利用伪军内部以及日伪间、伪顾问的矛盾，必须以交朋友的方式争取其中立与同情，对少数坚决反对我们的伪军才坚决打击，打还是要达到拉的目的。

赖传珠补充说，根据我们掌握的情报，国民党第三战区正积极利用伪军关系打通与苏北韩德勤的联系。他们计划分两路进行，一路是从长荡湖和滆湖之间，经金(坛)丹(阳)武(进)地区，再从武进北部渡江；另一路是从太湖和滆湖之间，经澄西北渡。此次粟裕师长未来开会，就是为了在苏中靖江地区反击澄西北渡的"忠救军"汪浩然部。如果该顽南窜苏南，你们务必要截断这两条交通线。

陈军长接着说，渭清同志，太滆、长滆地区是我军将来向东南发展的战略基点，这一地区要加强力量。不仅要扩大江当溧、金丹武、太滆等地区，对东路"清乡"区的恢复也要设法抓紧进行。军部正在酝酿，依据六师防区的情况，将第十八旅划归第一师指挥，与苏中一师隔江相对的东路"清乡"区也划归苏中区党委领导。这事还未公布。但是，东路"清乡"区的恢复工作，你要继续过问。总之，坚持苏南斗争是非常艰巨的任务，你们是独当一面，独立作战，军部暂时没有援兵给你们。一俟有可能，我一定给你派部队去。

二 苏南区党委扩大会议

华中局第一次扩大会议结束后，邓振询直接返回苏南。我回十八旅移交工作，于4月中旬赴苏南就任新职。当时，十六旅旅部驻溧水县经巷、李巷一带。到旅部后，我首先见到了谭震林师长以及钟国楚、张开荆等十六旅的负责同志。我们商议了贯彻华中局第一次扩大会议精神的方式。谭师长说，苏南区党委自去年（1941年）5月成立至今已有一年了，原打算去年7月在东路澄锡虞地区召开苏南区党代会，由于日伪在东路“清乡”，形势发生了变化，所以，党代会一直未开。现在，渭清同志来任书记，我提议召开一次区党委扩大会议，通过传达华中局扩大会议精神，总结苏南一年来的工作，这对于统一思想，提高认识，改进工作，很有必要。大家赞同谭师长的提议，我个人内心更是感到谭师长对部属的关心。我们把打算开会的事电告华中局，得到华中局的批准，并指定谭震林同志以华中局代表的身份参加苏南区党委扩大会议。这样，从4月21日至5月4日，苏南区党委扩大会议在溧水县白马乡的尤家村等地召开。这是苏南抗日根据地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但因艰苦的游击战争环境，会议转移召开，有关的资料也未能保存下来，以致对这次会议的内容众说纷纭，或者一笔带过。我作为当事人，来谈谈会议的一些情况。

这次会议虽说是苏南区党委扩大会议，但实际出席会议的只有丹北中心县委、苏皖特委和太滆特委，以及十六旅部队党组织的有关代表。如果按行政区，就是苏南的第四、第五和第六等三个行政区所辖党组织的代表出席了会议。东路地区当时已划归苏中区党委领导，就没有派代表出席会议。这样，苏南区党委基本上恢复到了皖南事变以前苏皖区党委领导的范围，因此，我们习惯地称苏南区党委为苏皖区党委，甚至在正式文件中有时也两个名称并用。会议还遵照华中局关于统一地方党组织名称的指示，撤销苏皖特委和太滆特委，成立了茅山地委、太滆地委和广郎中心县委。

这次会议是在险恶的反“扫荡”环境中进行的。4 月 21 日下午，会议在龙家村正式召开。其间，为安全起见，曾转移到经巷继续开会。4 月 29 日，我们得悉日伪军 3000 人于第二天“扫荡”经巷、李巷一带，于是，会议被迫中断，与会人员即随四十六团向东转移，直插溧阳陈塘圩。待敌人向南后，我们再返回溧水李巷一带继续开会，5 月 4 日会议结束。尽管会址几次变动，但是会议开得很认真，很成功。

会上，邓振询和我传达了华中局第一次扩大会议精神，大家听了很振奋。特别是谭师长的报告有很强的针对性。他在分析了苏南当前的敌情之后，着重指出两点：一是敌人对苏南占领的长期性，不到其最后瓦解，他是不会放弃的。二是敌人在驻军减少的情况下，“清乡”成为对付我军的基本方法。从现象看，敌人的“清乡”取得了一点成功，实际上，与他们原来的计划差得很远很远。不说别的，就说利用伪军。日军本想通过“清乡”使伪军“中央化”，以强化汪精卫的军

事力量。然而，伪军垮的垮了，跑的跑了，加上内部争权夺利，勾心斗角，调离的调离了，计划完全失败。谭师长还一针见血地指出，国民党顽军的新动向是利用“反攻”的口号来反共。他们极其险恶的一手是妄图把我军驱赶到敌人面前，借刀杀人。这一手不成，就制造摩擦，阴谋以此来消灭我军。我苏南根据地与日伪顽近在咫尺，对敌顽夹击一刻也不能麻痹，对摩擦与反摩擦斗争也要时刻作准备。谭师长对斗争形势的深刻分析，对尔后我们坚持苏南斗争帮助很大。

这次区党委扩大会议的另一项重要内容是整风。到会同志认真学习了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整风中所作的《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的重要报告，用以对照检查苏南部队思想作风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例如，有些干部怕调动他带领的部队，认为这是削了他的兵权；有些坚持过三年游击战争的干部，摆老资格，认为别人是统一战线统进来的；有些干部滋长了害怕艰苦、贪图享乐的思想；特别是塘马战斗之后，十六旅一度存在互相埋怨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部队的团结。至于地方党组织，主要是教条主义，机械地、片面地理解和执行党的方针政策。例如贯彻统一战线，强调团结就往往忘记了斗争；而开展反顽斗争时，又往往只打不拉，忘记了争取的一面。会上结合正面教育，表扬了丹北地区培养使用地方干部和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取得的成绩。谭震林同志说，丹北之所以成为铜墙铁壁，是因为有一个韦司令（韦永义）和一个四先生（管寒涛），而且每个区都有从减租斗争和反“清乡”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地方干部。丹北改造乡、保基层政权，注意做到了不同地区要求不同，不同对象

处理不同，实行区别对待，从而清洗了部分确实劣迹昭著的坏人，争取团结了大多数，使基层政权逐步改造成为抗日民主政权。他在表扬丹北工作的同时，反复说明整个苏南党组织和部队都为开辟、创建根据地，坚持抗日斗争作出了很多成绩，但是，由于长期处在分散游击的环境之中，我们一些干部在思想作风上确实存在许多问题，需要用整风的方法认真加以解决。他号召苏南全党同志，要继续发扬英勇善战的革命精神，通过自觉整风，坚决克服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等不良作风，争取坚持苏南斗争的更大胜利。应该说，这次整风的时间虽短，但由于我们强调自觉，强调实事求是，热烈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确实弄清了思想，教育了同志，达到了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的目的。由此，苏南根据地的党组织和十六旅干部、战士精神状况焕然一新，坚持苏南斗争的信心增强了，执行党的政策的自觉性提高了，维护团结的气氛浓烈了，从根本上扭转了塘马战斗以后的悲观、涣散局面。

三　在三角斗争中坚持

1942年，是我到苏南区党委和新四军第十六旅工作的第一年。这一年，苏南军民贯彻“加强团结，坚持抗战”、“一面作战，一面建设”的方针，不仅进一步巩固了茅山和溧水这两个基本区，而且向西恢复了江（宁）句（容）和江（宁）当

(涂)溧(水)地区,向东扩大了金(坛)丹(阳)武(进)和太(湖)滆(湖)地区,这样就使我们在敌后机动回旋的余地更大了。我们还在根据地的中心区开展了以秋收减租为主要内容的群众斗争,通过改善群众生活来组织和发动基本群众。此外,在对敌伪军工作和争取友军工作等方面也取得了进展。到年底,我们再次召开区党委扩大会议时,全区已建立了18个县委、73个区委、742个支部,有党员6792人。根据地内建立了11个县政府和1个相当于县政府的行政办事处,下辖64个区、373个乡、1369个保,拥有人口120万。抗日武装发展到4693人(其中十六旅为2667人)。虽然这些数字并不惊人,但这是在面对强敌、孤军奋战的情况下取得的,也就可以知道确实来之不易了。

我重返苏南茅山根据地,有一个最深切的感受是,在同日伪顽的激烈斗争中,我军可以运转的余地太狭窄了,不时出现被动应付的局面。我和钟国楚、张开荆等十六旅负责人商量,一定要向外发展,扩大机动范围,扭转被动局面。我们走的第一步棋,就是恢复江当溧地区,又称横山地区,以跨越苏皖两省边界,分隔江宁、当涂、溧水三县的横山而得名。这个地区北抵南京近郊、南达石臼湖、东临秦淮河、西濒长江,境内岗峦起伏,地形复杂,是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好场所。1938年夏,我们老一团挺进江南时,最先开辟了横山地区。不久由老三团接防,成为苏南最早建立的抗日游击根据地之一。1939年夏,老三团调回皖南,横山地区形势随即逆转。国民党顽固派武装不断进攻在这里坚持斗争的我地方部队,并于1940年8月初制造了大规模的刀会暴乱,史称

"横山事件"。当时,国民党江南第一行政区专员兼保安司令汪国栋等人,煽动横山地区各路刀会,裹胁了近万名受蒙蔽群众,包围袭击我江当溧县委机关和地方武装,捕杀我方干部及积极分子,甚至将前去增援的新三团一个主力连也围困起来。我军在新三团政治处主任彭冲、参谋长傅狂波的指挥下抢占山头,严密防守,于8月4日深夜始安全突出刀会包围圈,撤离横山。但横山毕竟是我新四军最早开辟的地区之一,群众工作还是有基础的,只要我们在政策和策略上不犯错误,重返那里站住脚是有可能的。我们分析了这些条件,趁日军大批南调进犯浙赣线,横山四周敌人兵力较前减弱之机,决定重返横山。

1942年5月下旬,我四十六团二营在钟国楚旅长率领下向横山进军。钟旅长曾任新四军二支队老三团政治处主任和新四军副团长,长期在这一带活动,对这里的情况比较熟悉。我军第一步先进入江(宁)句(容)地区,打开进入横山的通道,5月下旬至6月上旬,先后两次攻克江句地区的重要据点郭庄庙和索墅,并成立了区公所大队。接着从溧水县城西边南下横山地区,相继拔除博望、小丹阳、桑园铺、横溪、谢村,以及石臼湖西的下陇、马桥等十余个日伪据点。新四军重返横山,当地群众大为振奋,积极分子又抬起头来。在主力配合下,很快成立了中共江当溧县委,恢复了地方党组织的活动。问题是刀会暴乱的阴影犹在,部分受蒙蔽参加暴乱的群众,尤其是一些地方士绅,害怕算帐,对我们有很深疑虑。为此,我亲自去横山地区做工作。当涂博望镇有个名叫张干农的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是重要的统战对象,新

四军刚到博望时，担任过我抗敌动员委员会主任，后来又担任江当溧三县抗联会副主任，为抗日做过一些工作，但在刀会暴乱中表现不好。这次我军重返横山，他东躲西藏，不敢见钟旅长这位“老朋友”。我知道后，便和钟国楚同志一道登门拜访，向他解释我党的政策，表明新四军抗战为国，不记私仇，希望他继续和我们合作。我们的诚意消除了他的顾虑，转而现身说法，向其他士绅作宣传，使那些心存观望的士绅和刀会会众也逐渐消除了疑虑。经过一段时间筹备，1942 年 8 月 1 日，召开横山山南地区各县人士代表会议，成立了江当溧三县行政委员会，选举产生了 9 名委员，公推张干农为主任，童超（中共党员）、吴英（士绅）为副主任。我在会上宣布了三条政策：（一）不在地方上筹款筹粮；（二）按最低标准征收田赋和税款；（三）实行减租减息，同时要交租交息，并要与士绅协议进行。经过三个月工作，终于重新打开横山地区的局面。

正当我军西进横山取得进展之时，苏南根据地的南线和东线却出现了紧张局势。当时，南线包括溧水至武进公路的两侧地区。国民党第三战区将宜溧山区和广德、郎溪等地划为第二游击区，驻有重兵，计第五十二师，新七师，挺进第二纵队，江苏保安第一、第四纵队等部达数万人之众。1942 年 6 月，日军进犯浙赣线，国民党军队纷纷避战后撤。国民党第三战区当局为防我南进，成立了以江南行署主任冷欣为总指挥的苏南总指挥部，下辖五十二师和新七师各一个团，苏南保安第三、第四团，挺进二纵队的第五、第六团，以及独立三十三旅。此外，还重新组织各县保安团，勒令集中

民枪，拉伕抽丁，囤积粮草，强征田赋。接着，发兵向我武装挑衅，新七师第二团和苏保第四团于7月上旬由高淳东坝向北推进到溧水高淳边境的云鹤山、郃村、杭村一线，7月10日向我十六旅旅部驻地里佳山发起进攻。全旅指战员对顽军不抗日、专反共的反动行径极为愤慨，纷纷请战，有人甚至提议乘势南进，为皖南事变死难烈士报仇。旅党委冷静分析了形势，认为顽固派打上门来，必须坚决反击，但乘势南进时机还不成熟，不宜冒险，而应在军事上采取自卫守势，政治上积极发动攻势，以挫败顽军的武装挑衅和政治阴谋。上述部署意见经电告新四军军部和一师师部批准，我们立即组织实施，在实行自卫的同时，发表了告友军官兵公开信和告民众书，重申我党我军坚持团结抗战的一贯立场，声明新四军在皖南事变后虽继续受尽压迫，但决不乘人之危，寻隙报复，当然也绝不容许侵占我抗日根据地；痛陈大敌当前，凡我同胞均应一致抗日，切莫再做亲痛仇快之事。由于我们正确执行了党的统战政策和采取坚决自卫的方针，顽军在进攻受挫后即向南退去。南线始化险为夷，进一步巩固了溧水中心区。

在东线金丹武地区，向我进犯的是国民党“忠救军”教导第一团和新编第四团，这是我们的老对手。1942年初，日伪在澄武锡地区开始“清乡”，这股顽军立即窜至苏中从事反共活动，并企图在靖江南部建立根据地，以便沟通接济韩德勤部的交通线；在遭到新四军第一师第一旅坚决反击以后，他们被迫于5月底窜回江南，进抵金丹武地区，企图长期占据这一战略要道，其目的仍为继续接济韩德勤部，并进

而蚕食溧武公路以北我中心区。为此，顽军变换手法，成立所谓“武丹金三县党政军联合办事处”，由“忠救军”派员任主任，武进、金坛、丹阳三县的国民党县长任副主任，图谋用特务统治的办法控制这块地区。同时加紧与当地顽伪势力勾结，依托伪军据点掩护，不断对我进行武装骚扰，给根据地带来极大威胁。

为解除这个威胁，7月中旬，我旅在溧水里佳山挫败国民党新七师进攻后，立即腾出手来，派张开荆率第四十六团一营到茅山地区，配合第四十七团和茅山保安司令部对“忠救军”实施自卫反击。张开荆曾在苏南东路地区任“江抗”参谋长和第五十一团团长，对付“忠救军”有一定的经验，派他前去领导这场斗争是比较适合的。我军进入金丹武地区后，于7月26日精心组织了葛家桥伏击战，只用半个小时，就一举击溃“忠救军”一个营。第二天我再次发起攻击，进一步给顽军以沉重打击。8月7日，陈毅军长、谭震林师长和赖传珠参谋长联名来电指示我旅，“对进入金丹武地区之忠救必须以最大之努力达到歼灭或驱逐的目的，否则会造成坚持茅山地区的极大困难。”军、师首长的指示，更加坚定了全旅指战员反摩擦的决心，确定集中更多兵力，配合地方武装，依靠人民群众，与专事反共的“忠救军”作坚决斗争。9月6日，我军在武进县厚余南湾村重创“忠救军”教导一团；9月7日，我军又在附近地区对该团继续予以打击。参战“忠救军”团以下头目大部伤亡，以致部队失控，军心涣散，乃被迫于9月10日退向溧阳南部山区。9月14日，我十六旅主力进入金丹武地区，以大流动的方式，南至尧塘、夏溪，

北至吕城，搜索逃散顽军，肃清暗藏特务，到一处地方开一处地方的群众大会，宣传共产党、新四军的抗日主张和政策，迅速安定了社会秩序，稳定了群众情绪。9月20日，我们召开了金丹武各界士绅代表会议，有100多人参加，共商抗日大计。会后，我们将金丹武地区重新划分为十个区，配备干部，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并建立县警卫连和区大队。从而使这一重要战略通道成了我苏南抗日根据地的一个组成部分。

1942年，还有一件事情值得一讲，这就是驻在常州机场的汪伪航空警卫营官兵280余人，在上校营长顾济民率领下起义来归。该营原是伪军委会航空总署的直属部队，全营两个连又一个排，配备机枪4挺、掷弹筒4门、步枪300余枝，负责保护汪伪仅有的十几架飞机，因此，装备和给养都远远超过其他伪军部队，但军饷并没有全部发到警卫营官兵手里，而是受到了上级机关的克扣。顾济民对此有意见，不料伪航空总署制造借口，要将他撤职查办，顾十分愤慨，遂于这年5月毅然率部起义。伪军朝秦暮楚，变来变去，本属常事，但顾济民不去投靠国民党，而是投奔新四军，这就非同寻常，充分说明共产党、新四军抗日主张的正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共产党、新四军为国为民、真心抗日的业绩赢得了人心。回想华中局第一次扩大会议期间刘少奇对我讲的“要多交朋友少树敌”，确实很有道理。顾部起义，应该说也是我们在苏南贯彻了这个策略思想，加强敌伪军工作取得的成功。顾济民起义后，得到我金丹武抗日军民的及时接应，沿途老百姓杀猪宰羊、热情慰劳。我金坛县县

长兼四十七团团长诸葛慎和团政委熊兆仁亲自率部护送，第三天就安全抵达十六旅旅部。

我们在接到顾部起义报告后，立即召开区党委会议，确定对他采取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并派旅保卫科长张雍耿和旅组织科长王直率领一批连排干部，组成工作队到该营帮助整顿，同时向军部请示如何改编。陈毅军长指示说，先做好安顿工作，了解顾济民本人态度后再考虑改编的问题。按照陈军长的指示精神，我同顾济民谈了话，对他率部脱离敌伪，起义参加我军的正义之举，表示热烈欢迎。我很直率地问他，你起义时为何不与国民党“忠救军”取得联系呢？他们不就在你附近吗？顾济民长叹一声，对我说，我在国民党部队里混了十几年，对他们太了解了，也太失望了。我是一个中国人，受骗当了伪军官，不幸走错了路，如果再回国民党那里，去搞什么“曲线救国”，不是又要走错路了吗？听说新四军纪律严明，英勇杀敌，而且公道正派，只要真心抗日，都在团结之列，同国民党军队完全不一样，所以决心投奔新四军。他还讲了起义行军途中的所见所闻，说他过去带兵下乡，老百姓像躲避瘟神一样躲开他们，而这次却受到了老百姓的热情款待；过去他也曾三令五申不准部下拿老百姓的东西，可是令归令、拿归拿，这次他的部下一到根据地，全像是换了个人，没有谁搞偷鸡摸狗的。前后对比，感受很深。他还讲到了诸葛慎。他说，诸葛县长是国立北平大学法学院毕业的，如今身兼县长、团长两职，在当地那么有威望，兄弟实在佩服，说明贵党贵军有人才、得人心。经过交谈，我感到顾济民有一定的民族正义感和爱国心，对我党我

军也有所认识。于是，我把军部的决定告诉他，将他的部队与四十七团的一部分合编为新四军第十六旅独立第三团，他任团长，诸葛慎当政委。对于这部分起义官兵，部队热情地进行了教育帮助，绝大部分官兵后来表现都不错，打仗很勇敢，成了名副其实的新四军干部和战士。1942年8月，陈毅军长专门从苏北来电，邀请顾济民团长去军部参观。顾济民很高兴，我们派诸葛慎陪同前往。到达军部后，得到陈军长、黄克诚师长等的亲切接见，并被安排在苏北根据地参观学习。顾济民目睹解放区军民亲如一家，深受教育，要求留在苏北。陈军长同意了他的要求，重新安排工作。此后，我们又将独立第三团与四十七团合并，加强了第四十七团的战斗力。

伪航空警卫营的起义，在苏南伪军中引起连锁反应。不久，驻武进运村的伪和平建国军第十预备师四十三团三营营长王坤生率部300余人起义，改编为我武南支队第三大队，王坤生任大队长。还有驻金坛县臧村伪自卫团一个连携机枪两挺、步枪70余枝起义投奔我军。这些起义行动，给日伪以沉重打击。新四军的威望，在苏南人民的心目中越来越高。

四　开展减租减息运动

手拿镰刀快割稻呀，割下稻子好减租。
二五减租最公平呀，不分男人和女人。

手拿减租新章程呀，二五减租最公平。
全家参加农抗会呀，参加农会好翻身。

这是抗战时期在苏南抗日根据地广为流传的一首民歌。1942年秋，我们在苏南做的一件大事，就是开展减租减息运动，通过减租减息，进一步组织和发动群众，使根据地更加巩固。

苏南根据地的减租减息起始是比较早的。1938年秋，新四军第一支队进入茅山不久，就张贴布告，公布减租减息办法，规定了二五减租、二分还息等政策。但是，在这之后的近三年时间内，抗日民主政权还未正式建立，群众还未充分发动，加上敌情紧张，忙于打仗，基本上减减停停，或是明减暗不减。皖南事变后，苏南根据地缩小，环境恶化，减租减息处于停顿状态。1942年1月，中共中央颁布了《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对党在抗战期间实行以减租减息为中心内容的土地政策作了明确规定，号召各抗日根据地广泛深入地开展减租减息斗争，以进一步组织和发动群众，巩固、壮大人民抗日力量，这里的减租减息才重新开展起来，

形成了轰轰烈烈又扎扎实实的群众运动。

我们根据中央决定的精神，仔细研究了苏南的实际情况，总结了以往减租减息的经验教训，制定了《苏南行政区处理土地问题暂行条例》。为了便于根据地各界人士的理解和接受，我们在这个条例的开头特别强调这是“根据中华民国土地法和中华民国民法的法债编、物债编之规定，并按中国共产党中央颁布的关于抗日民主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及其副件制订的”。当年8月6日，我们在溧水县小蒋村召开了苏南民运工作会议。这是苏南抗日根据地具体部署减租减息斗争的一次重要会议。通过这次会议，提高了党内各级领导对开展这场斗争重要性、必要性的认识，统一了政策和策略思想。我们在会上反复强调，一定要从苏南的特点出发，实事求是地开展减租减息，注意正确执行党的政策和策略。一方面要向地主讲清楚，为了坚持抗战，渡过难关，必须实行减租减息；另一方面也要向农民讲清楚，为了团结抗战，一定要交租交息。地主的土地和财产，所有权仍属于地主。他们有权依法出典、出卖、抵押自己的土地和财产。但是地主在出典和出卖土地时，要经“农抗会”的同意，顾及到农民的生活。在具体做法上，强调由“农抗会”来主持其事，通过减租减息斗争，不仅使贫雇农在经济上得到好处，还要使他们在斗争中提高觉悟，得到锻炼，树立政治优势。党和政府既不能包办代替，又不能撒手不管，而是要加强领导，给农民群众的斗争以积极支持，同时要防止可能产生的偏差，及时加以纠正。对各级领导干部，我们强调了两条斗争策略。一是有理、有利、有节。有理，就是要造成社会舆论，

使大家同情农民对减租减息的合理要求；有利，就是估计不能胜利的斗争暂不去发动，等待有利时机的到来；有节，就是不要忘记团结抗战之目的，斗争而不致分裂，让步而不失立场。二是“和为贵”。对减租减息表现好的地主予以鼓励；对犹豫观望的地主，多做动员和说服工作；对态度顽固的地主，要先让群众直接与之谈判，尽可能求得妥善解决，实在谈判不成，以致有明显破坏行为者，才发动群众与之斗争。那种不分青红皂白，动不动就乱斗一通的做法，群众是不赞成的。

苏南民运工作会议结束后，区党委为取得直接经验，以便指导面上减租减息工作，确定在溧水进行试点。由邓振询带一批干部到溧水县新桥区作农村阶级调查，逐村逐户登记土地占有、租佃关系和雇工剥削情况，了解贫雇农的要求。从 29 个村的调查情况看，这一地区土地占有相当集中，封建剥削相当严重。在总户数 850 户、土地 17514 亩中，51 户地主占有 9170 亩土地；而 496 户贫农仅占有 1315 亩土地。地租形式以包租制为主，租额一般占年产量的 30%至 60%。高利贷也很突出，一般春天借一石稻，秋收后要还两石稻。我们在摸清情况后，制定了《溧水县(民国)三十一年减租减息实施办法》。这样，就能从当地实际情况出发，贯彻执行《苏南行政区处理土地问题暂行条例》，使条例具体化了。

按照上述“实施办法”，溧水县在减租方面，原则上一律按当年原租额减缴 25%，如果是分租制，则由“三七”分成减为“四六”分成或“对半”分成。因灾害歉收者，除减租外，

视歉收程度再酌情折扣减免。在减息方面，借贷年利超过二分的要减息，付利已超过本钱的，停止付息，分期还本；付利已超过本钱二倍的，停止付息，减半还本；付利超过本钱三倍的，本息全部停付。9 月 28 日，由溧水县政府出面召开县参政会讨论通过了这个“实施办法”，并报经苏南行政专员公署批准颁布。然后，区党委抽调大批干部，深入农村，由党内到党外，从骨干到群众，层层宣传发动。县农抗会还在小李巷举办为期十天的农抗会干部培训班，学习减租减息的方针政策和步骤方法。县政府和参政会则出面召开乡保长和士绅座谈会，向他们讲清减租减息的意义和政策，希望他们以抗战大局为重，遵守政府法令，自觉减租减息。10 月上旬，随着秋收到来，减租减息进入实施阶段。溧水县一些地主家庭出身的党员干部首先动员家庭、亲戚减租。县长曹明梁的哥哥曹明栋是新桥区南曹村的地主，家有三四百亩地。曹县长亲自回家说服哥哥，带头减租，在全县作了表率。县里一些出身于地主家庭的科长、秘书也都动员亲属主动减租，带动了开明士绅跟着减租。洞壁乡大地主汤德恒有地 400 多亩，在乡里有一定影响，区乡干部登门宣传，他立即同意减租，并且在区里召开的士绅会议上公开表态。县农抗会及时张贴布告，宣传表扬主动减租的地主士绅。顽抗的地主是有的。例如，有的收买笼络佃户，“瞒上不瞒下”；有的以拔田威胁佃户；有的造谣煽动，以“新四军耽不长”来恐吓佃户。对这些顽固地主，由农抗会组织力量，同他们进行面对面的说理斗争。轰轰烈烈的群众声势，灵活正确的斗争策略，促使许多地主看到了大势所趋，不能再“敬酒不吃吃罚

酒”了，于是“一根竹篙跟排走”，减租减息就这样在面上铺开来。据白马、新桥、韩胡三个区 71 个村的统计，这年秋季 407 户应减租户，实行减租的就有 403 户，共减租谷 31 万多斤，雇工工资也在原来基础上增加了 25%。到 11 月中旬，溧水县的秋收减租斗争胜利告一段落，在斗争中涌现出一大批土生土长的农民积极分子。我们抓紧在其中发展党员，选拔基层干部，推动了群众抗日力量的大发展，加快了根据地中心区基层政权的改造工作。

与此同时，茅山地区的秋收减租斗争也蓬勃展开。为了加强对这个地区减租斗争的领导，我们将原中共东路特委书记吴仲超调任茅山地委书记。他曾任新四军第一支队战地服务团团长、中共苏皖区委书记，是最早开辟茅山根据地的地方工作领导干部，作风平易近人，老百姓亲昵地称他为“吴团长”。他在参加苏南民运工作会议以后，就带领一批干部在茅山地区详细作了农村调查。8 月下旬，他给我寄来了调查材料，并在信中汇报了他打算召开茅山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宣传解释土地政策和减租法令，请我出席会议并作报告。我接信后立即赶到茅山，与吴仲超等同志研究决定，先以苏南行政专员公署名义，召开茅山地区县长联席会议，讨论制定具体部署，统一政策思路，明确实施步骤。接着，召开了有 200 多人参加的茅山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我和吴仲超到会作报告，还与到会的地方士绅进行座谈，解释党的方针政策，反复讲清租息非减不可的道理；然后由农民代表在会上提出减租减息、增加工资的具体要求。一些开明士绅，如茅东县巨村的耿国平和大袁村的王鼎，金坛县中塘桥的

蒋金昌和水北的朱老九，溧阳县罗村的杨欧亭、王锁龙和唐王的刘道生等，都是当地有影响的士绅，当场表态愿意带头减租减息。在他们带动之下，到会的大多数地主士绅都表示"抗战年头，兵荒马乱，生产受灾，农民困难，救国救民，非同一般，减租减息，理所当然"。会后，各县又分别召开参政会，重点做上层人士的工作。基层党组织则在群众中广泛宣传发动，使减租减息家喻户晓，甚至连老人和孩子也呐喊助阵："今年二五减租不含糊，租稻慢点缴！"

但是，减租减息涉及到地主和贫雇农双方切身利益，不是开个会就能完全解决问题的，必要的斗争也是不可避免的。不过，租子是从农民手里拿出来的，农民不按老规矩缴租，地主也没有办法，不减也得减。雇工增加工资，情况就不大一样，因为工资掌握在地主手里，于是就组织雇工会，团结起来同地主作斗争。金坛、茅东、丹阳三县曾发动了 5000 多名雇工参加要求增加工资的斗争。雇工罢工、怠工，地主毫无办法。有的地主对雇工威胁、欺骗，甚至打骂不给饭吃，但是在雇工会的领导和支持下，最后还是迫使地主增加了工资。经过秋收减租减息斗争，仅茅东、丹阳、句容三县就有 2646 户地主减了租，共减稻谷 260 万斤，增加工资 46285 元，得益农民 3482 户。减租减息不仅使许多贫雇农经济上得到了好处，更重要的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前提下，使我们摸索出了组织和发动农民群众的办法。茅山地区通过这场斗争，基层农民抗敌协会普遍建立起来了。共产党、新四军有了这样一个强有力的助手，如虎添翼，不是吓跑了地主，而是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巩固了中心区，发展

了外围区，苏南敌后斗争之所以能坚持，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五 与苏中南下部队合编

1943年初，苏南敌后抗战即将进入最艰苦的岁月。就在这关键时刻，传来了令人快慰的喜讯：新四军一师二旅从苏中抗日根据地的黄海之滨渡江南来，与我旅在溧水里佳山会师，共同迎接新的战斗。

陈毅军长果然给我们派援军来了！军部的这一重大决策使我们十六旅指战员和广大苏南抗日军民，都受到莫大的鼓舞。此时，新四军军部已由盐阜地区转移到淮南抗日根据地。苏中抗日根据地原有一师所属一旅、二旅、三旅和十八旅共2万余兵力。陈毅、粟裕、谭震林等军、师领导人对这种"塘小鱼多"的情况进行了电报磋商，认为兵力过于拥挤，不利于反"扫荡"、反"清乡"斗争，容易遭受不必要的损失。最后，陈军长决定，将一直在盐阜地区担任保卫军部重任的二旅部队，抽调到苏南抗日根据地。这样可一举两得，既分兵跳出日伪的包围圈，又使苏南抗战力量得到加强，为向苏南发展创造条件。

1月13日，纷纷扬扬的大雪把溧水的丘陵和原野披上了厚厚的银装。在溧水白马桥附近，我们迎来了王必成、刘培善等同志率领的劲旅。我至今仍然清楚地记得见面后王

必成说的第一句话："我们又回江南来了！"一年前，我重返苏南时萦绕在心头的也是这句话。凡是在苏南战斗过的新四军指战员重新踏上这块土地时，都会情不自禁这么说的，何况二旅这支曾在茅山战斗过的"老虎团"，拥有一大批苏南子弟兵，重返苏南当然更加高兴了。

会面后，王必成等二旅领导人通报了部队的情况。二旅原有三个团，南下前夕，遵照师部的指示进行了缩编。除六团改为兴化独立团，坚持原地斗争外，四团和五团缩编为一个三营建制的加强团，每营 500 人左右，每连有 9 挺机枪，还有团部机炮连、特务连、侦通连，加上旅、团机关及直属单位，共 2000 多人。许多干部服从组织安排，毫不计较职务高低，缩编工作很顺利。我们一边安置远道而来的二旅指战员，一边向军部电告二旅已平安抵达目的地，并请示下一步的工作部署。

军部很快回电，决定二旅和十六旅合编为一个旅，番号仍用六师十六旅。王必成任旅长，我任旅政委，张开荆、陈铁君分别任正、副参谋长，魏天禄、张鏖分任正、副政治部主任。原二旅政委刘培善和十六旅旅长钟国楚调延安学习。军部来电强调指出，二旅和十六旅合编是我军加强苏南的重大战略部署，各部队一定要从大局出发，加强团结，紧密配合，服从安排，尽快完成合编工作。随着苏中战局的变化，一师主力可能还将分兵南渡，你们对此要有充分准备。我们遵照军部电令，紧张地进行了两支部队的合编工作。新十六旅共有 5000 余人。原十六旅下属的第四十六团、第四十七团、独立第二团番号不变。前不久由丹北地区南移的十八旅五

十一团一个营编为十六旅五十一团。原二旅二团编为十六旅四十八团。此外还组建了新的旅教导大队、旅特务营。各部队的负责人是：四十六团团长黄玉庭、政委丁麟章、副团长刘一鸿、参谋长傅狂波、政治处主任陈绍海；四十七团团长熊兆仁、政委王直、参谋长刘群；四十八团团长刘别生、政委吴嘉民、参谋长饶惠潭、政治处主任童炎生；五十一团团长胡品三、政委李彬山、政治处主任江如枝；独立二团团长杨洪才、参谋长王香雄、政治处主任林胜国；教导大队大队长樊道余、政委许彧青；特务营营长廖坚持、教导员陈力。

2月5日是农历春节。我们在里佳山祠堂召开了合编后的第一次全旅排以上干部大会。我宣布了军部的命令，并作了报告，大意是，苏南的大好河山，早在1937年日军进犯京沪时，国民党军队弃之不顾，逃之夭夭；1938年春夏以后，在共产党、新四军的领导下，苏南军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才从敌人手中收复失地，创建了苏南敌后抗日根据地。这块地区位处京沪杭三角洲。这里有日军的"中国派遣军"总部、有汪伪的"中央政府"，还有国民党顽固派的第三战区。他们时刻都想消灭我们、驱逐我们，然而抗战五年来，我们坚持战斗在日伪的心脏地带，敌人始终奈何我不得。这对于全国战局、甚至国际反法西斯战争都将产生影响，说明我们的抗战一定能坚持到最后胜利。现在，我们的力量加强了，我们要进一步巩固中心区，扩大游击区，缩小敌占区，把苏南根据地建成对日反攻作战的前进基地，我十六旅一定能担当对日反攻作战的前卫军。王必成旅长也在会上讲了话，他着重指出，两支部队合编以后，要立刻捏成一个强有

力的铁拳，团结一心，共同战斗，为坚持和发展苏南抗战而努力奋斗。这样，由二旅和十六旅合编成的一支抗日劲旅，在苏南敌后抗战最艰苦的岁月来临之际诞生了。

新成立的十六旅隶属一师。粟裕师长在接到我们顺利完成合编任务的报告后，立刻给我们回电，表示祝贺。同时，他提醒我们，二旅南移虽加强了苏南部队的实力，但也增加了敌顽的注意，必然要加紧对苏南的进攻。在目前敌强我弱的力量对比下，根据地的各项工作仍应坚持隐蔽发展，不可大吹大擂，暴露力量，十六旅应加强训练，提高素质，在力量部署上应注意适当分散，以利坚持游击战争。粟师长的指示十分及时。我们立即将四十六团的三个营分散到溧水、江宁、当涂一带活动，四十七团坚持茅山地区斗争，五十一团进入溧阳北部流动整训，独立二团以连为单位在太滆各地行动，旅部则带领四十八团在溧水里佳山、云鹤山一线流动整训。

春节后不久，原在苏中的抗大九分校和苏中党校1200余名学员也来苏南办学。为了保密，九分校对外称“特务团”，原来的三个大队和一个党训队，分别编为三个营和一个特务连，军事上统一由十六旅指挥。刘季平副校长任团长，杜屏教育长任政委，张崇文任政治部主任。随同九分校南下的，还有一师供给部副部长孔峭凡等人，他们的任务是为一师主力继续南下作准备，后因战局变化而作罢。此外，以一师保卫部长蓝荣玉为团长、吴肃为副团长的苏南巡视团也曾来十六旅帮助工作。孔峭凡任十六旅供给部政委，部长由李建模担任；蓝荣玉任十六旅政治部副主任，张鏖改任

旅政治部组织科长。至此，十六旅指挥的部队达到6000余人，为取得1943年苏南反“清乡”、反“清剿”斗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六 茅山、太滆反“清乡”斗争

茅山、太滆两地的反“清乡”斗争，是从1943年春开始的。日本侵略军为加紧推行“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政策，把“清乡”区的范围扩大到苏北南通、苏南镇江、上海近郊和浙东杭州、海宁、余姚等地。当年3月4日，日伪双方签定了《关于镇江地区清乡工作之中日协定》，划定镇江(今丹徒)、丹阳、扬中三县和武进、金坛、句容、无锡、吴县等县的部分地区为“清乡”区。在这一区域中，包括我十六旅活动的茅山与太滆两块根据地和十八旅活动的丹北根据地。日伪妄图蹈袭1941年在东路“清乡”的故伎，重点扫除、消灭我党我军及其领导的抗战力量，达到巩固“京畿”(南京)地区的目的。苏南区党委领导根据地军民进行了长达半年之久的反“清乡”斗争。

敌人在正式宣布“清乡”之前，即开始了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是年2月，日伪军出动驻扎在镇江、丹阳、句容、金坛、武进、无锡等地部队，对划定的“清乡”区进行篦梳式大“扫荡”。敌军的军事行动虽很突然，但我们已事先获得情报，将主力部队及时撤离了“清乡”区。因此，尽管敌人气焰嚣张，

到处乱窜，仍找不到我军的行踪。我们抓紧"清乡"前的空隙时间，从思想上、组织上做好反"清乡"的准备工作。区党委发表了《告民众书》，召开各界代表座谈会，揭露日伪"清乡"阴谋，宣传反"清乡"的有利条件，反复向干部、群众说明，当前形势已和两年前大不相同。虽然苏南敌后总的还是敌强我弱，但天时、地利、人和均对我有利。随着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失利，大批日军调离苏南，敌人兵力空虚的矛盾更加暴露；茅山和太滆地区地形复杂，村落分散，有利于我军内外穿插而不利于日伪的封锁；更重要的是，我们认真吸取了东路反"清乡"斗争的经验教训，掌握了反"清乡"斗争的主动权。在广泛宣传动员的基础上，各地开展了群众性的表决心签名运动，誓与敌人坚决斗争到底。对于地方士绅，我们则着重进行民族气节教育，反对妥协投降，坚持抗日立场。在组织上，我们将"清乡"区的党政机构及人员实行精简。一批不适合在"清乡"区坚持斗争的干部迅速撤离，留下来的建立秘密组织，以合法的社会职业作掩护。同时成立精干的武工队，坚持原地斗争。我们还在原有的敌军工作基础上，增派人员打入日伪内部，从事收集情报和分化瓦解敌人的工作。所有这些，都是两年前我们在领导东路反"清乡"时不曾做到或做得不够的，而在茅山、太滆的反"清乡"斗争中，我们从一开始就做了。

3月上旬，日伪开始修筑"清乡"封锁线。这条封锁线北起长江边的镇江，沿镇宝公路两侧至宝堰，经西旸、直溪桥、白塔向东延伸，再经里庄桥、夏溪桥、滆湖东北畔、杨桥、漕桥，向南直指太湖边，全长200多公里，穿越苏南抗日根据

地的丹北、茅山、太滆三个地区，是日伪在华中“清乡”中建立的最长的一条封锁线。敌人计划用20天时间修完。我了解这一情况后，立即指示茅山、太滆两地委，要把反封锁作为当前反“清乡”斗争的中心环节，决不能让敌人顺顺当当地修筑封锁线。要采取拖延、破坏等各种手段与敌人作斗争。我为什么强调反封锁斗争呢？这同样是东路反“清乡”提供的经验。那时，因缺乏经验，任凭敌人拉伕修建竹篱笆。别看仅是道篱笆墙，一旦筑成，就会给我军行动带来诸多不便，给群众造成巨大的心理压力。所以我们非常重视反封锁斗争，而且搞得有声有色。首先从破坏竹子的来源着手，一方面号召群众砍掉自家的竹园，把竹子沉入水塘或收藏起来，不让敌人征用；另一方面布置地方武装和游击小组不断地袭扰敌人伐竹、运竹和堆存竹子的地方，陵塘日伪毛竹站，一次就被烧毁竹子2000担。把竹材的来源尽可能先掐死，接着就破坏竹篱笆。敌人白天筑好竹篱笆，夜晚就被群众拆毁。敌人再筑，我们再拆，其中白兔至上塘，西旸至宝堰、直溪桥等穿越茅山中心地段的竹篱笆三番五次地被拆毁，在3、4两个月中，茅山民兵共进行51次破坏竹篱笆的斗争，烧毁竹子2万多担；太滆军民7次捣毁了敌人筑起的竹篱笆，迫使敌人的封锁计划一再推迟。

在反封锁斗争中，群众的积极性非常高。白天，他们被敌人强迫去修篱笆，就采取一拖、二磨、三马虎的办法应付；夜晚，我们的干部和武工队一声令下，成百上千的群众齐上阵，拆的拆，运的运，堆的堆，然后浇上汽油烧，刹时间火光冲天，化为灰烬。东岗村的老百姓说得好：“只要部队来掩

护，破坏竹篱笆要人有人，随喊随到！”敌人眼见封锁线一再被破坏，恼羞成怒，采取沿线驻扎、掩护封锁的办法，强迫老百姓限期完成，护路看守，哪个地段竹篱笆被拆毁，就唯那个地段的老百姓是问，甚至血腥镇压。敌军还组织快速部队和伏击部队，专门对付我武工队。为了避免群众牺牲，我们暂时停止破坏封锁线，至5月初，日伪东拼西凑、修修补补，总算筑成了封锁线，比原计划拖迟了一个多月。我抗日军民经过反封锁斗争的锻炼，消除了最初的惧怕心理。

日伪在建立起封锁线以后，进入了所谓的“清乡政治建设”时期。所谓“政治建设”，其实就是推行伪化政策，建立所谓和平“模范区”。具体做法是整理保甲，编造门牌；发展伪国民党，组织伪自卫团；强行训练壮丁，建立情报网、瞭望台和“爱护村”等等，企图用这套统治手段，割断我新四军同老百姓的联系。此外，日伪还在“清乡”区内进行严密的军事搜索，在封锁线边缘地区实行驻扎“清剿”，妄图逼我武装远离“清乡”区。

在反“清乡”斗争最困难的阶段，我们区党委及时写信给茅山、太滆“清乡”区的党组织，要求灵活运用斗争策略和手段，顽强坚持原地斗争，教育党员和干部、群众咬紧牙关，熬过三个月的困难时期。东路反“清乡”，我们把一大部分主力留在“清乡”圈内吃了大亏。这次茅山、太滆反“清乡”，主力早就跳出“清乡”圈，但“清乡”区内的斗争还得有人领导。好在从陈军长、粟司令员率部进军茅山开始，就注意培养地方干部。我到十六旅后，对选拔地方干部的工作也一直没有放松，在茅山、太滆地区，不仅区以下核心领导大部分是地

方干部，地、县领导中也有不少地方干部，如樊玉琳、洪天寿、樊绪经、薛斌、诸葛慎、陆平东、彭炎、陈练升、朱春苑、钱震宇等同志，他们在本乡本土都有相当的威信，在群众中有号召力，连乡保长也得听听他们的话，这是我们所以能在茅山、太滆"清乡"区内坚持斗争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

在"清乡"区内，都有我们的便衣武工队，白天分散隐蔽在芦苇、田野、船舱和山岗，夜晚集中，神出鬼没地开展游击活动，以内外穿插的方式袭扰日伪据点，镇压汉奸和日伪特工，使日伪的伪化政策难以顺利推行。

"清乡"与反"清乡"的斗争，实质上是伪化与反伪化的斗争。从敌人方面来说，它和军事"扫荡"不同，政治奴役是第一位的。因此我们非常重视运用政治斗争策略，首先是团结和争取"清乡"区内一切爱国的地主士绅、帮会首领共同对敌。我们在做这件工作时抱着实事求是的态度，体谅统战对象的处境，不提过分的要求，希望他们能保持民族气节，不投向敌人，并在可能的情况下以各种方式参加或配合反"清乡"斗争。在太滆"清乡"区，南夏墅的钱伯显、鸣凰的张揆松、胜东的潘贤道等知名的开明士绅，当敌人"清乡"时都闭门不出，拒绝了日伪的拉拢。寨桥药店老板、礼嘉桥大地主李兆根夫妇，以及其他一些地方士绅，在"清乡"期间，不仅继续帮助我方征收田赋，兑换金银，采购布匹、药品，而且还积极参与营救我方被捕人员。苏南帮会比较普遍。在争取帮会势力方面，我们也下了功夫。区党委根据华中局的指示精神，对于帮会组织，只要不再干坏事，就允许其存在。我们派人进去，收徒弟、用徒弟都要同我们派去的人共同商

量。同时规定，地方上有威信的党政负责人可以出面招收徒弟，针对徒弟的不同情况，布置不同的任务。当时，茅山的樊玉琳、洪天寿，太滆的金坛县县长诸葛慎、武南县副县长陈成、新四军独立二团参谋长王香雄等同志都广收门徒，扩大了团结面，掩护了反"清乡"斗争，这个工作是成功的。诸葛慎同志曾告诉我，他把滆湖西岸湟里、星桥两个伪军据点的头目收作徒弟之后，不仅他本人可以随便出入这块地区，我方过境船只、物资、人员都可以通行无阻。这就说明在特定的条件下，为了革命事业的需要而借用封建组织的形式，是可取的。

其次是加强对敌伪军的工作，通过"一二一"政策，控制伪政权和伪组织，以利于在"清乡"区内进行合法斗争。"一二一"政策是我党在苏南抗战期间开展敌伪军工作的一个创造，具体做法是，把原来为敌人做事的一面派乡、保长及伪军，争取成为既为我方做事，又为敌人做事的两面派，再进一步改造成只为我方做事，表面上应付敌人的一面派。日伪在"清乡"区强制推行保甲制度，不让搞保甲是不行的，但我们可以因势利导，进行控制和分化。对敷衍应付敌人的伪乡、保长予以鼓励，争取其积极为我方收集提供情报、掩护接待我方人员；对危害地方、为虎作伥者坚决予以打击，各地都惩处了一些甘心附敌的汉奸分子。对敌人势力较强的乡镇或据点附近的伪保长，则通过各种办法向他们传递信息，晓以大义，进行教育，务求为我控制。我们还布置一批同志打入敌人营垒，在敌人的宪兵队、警察局、"清乡"机构以及各种伪组织中，都安下了我们的秘密工作人员。可以这样

说，日伪“清乡”的一举一动都在我们的监视之下。

“清乡”进入高潮，正是夏粮成熟季节。日伪兴师动众，在茅山、太滆闹“清乡”，从征收夏熟田赋这件事情就可以看出，它是注定要失败的。我十六旅和苏南区党委所辖范围党政军机关的给养，主要取之于茅山和太滆地区。夏熟田赋是一项重要的财政收入，在“清乡”区能不能收到夏熟田赋，这是个新问题。因为不少地方的农民要两面负担，我们要收，日伪要逼，还有顽方也要来插一手。为此，我们研究对策，做了工作，就是帮助农民，对日伪和顽方来征粮，能拖延应付的尽量拖延应付，而主动向我们缴纳钱粮，从而使地主士绅也就跟着向我们缴纳田赋。有些地方，我们不便公开征收钱粮，就利用受我控制的两面派乡、保长代收抗日田赋。7月底，我们就完成了夏熟田赋征收任务。仅茅山地区征收法币达640余万元，超过原来估计数的一倍以上。征收夏熟田赋，对我们苏南区党委和十六旅的群众工作、统战工作和两面派工作是一次最实际的检验，同时也生动地显示了人心的向背，表明了我们的反“清乡”斗争在赢得胜利。

日伪在茅山、太滆地区的“清乡”战线很长，表面上气势汹汹，实际上已是强弩之末。日伪出动的兵力总共不过五六千人。到6月份，我们分析研究了形势，认为敌人的“三板斧”已过，现在是我们加强军事行动的时候了。我们决定派遣主力部队伺机插入“清乡”区内，以长途奔袭的办法，配合“清乡”区内坚持斗争的武装，攻击“清乡”机构和据点，打乱其“清乡”部署。延陵是丹阳、金坛两县交界处的一个中心市镇，处于茅山根据地的腹地。日伪在此设立“清乡”机构，作

为镇江“清乡”区的一个指挥中心，对我威胁很大。6月22日夜，我十六旅四十八团一个主力连，配合茅山保安司令部的两个连，经百里行军，直插延陵镇。事先，地方党组织和武工队已通过内线，将延陵镇的地形和敌情摸得一清二楚。我军在向导的带领下，兵分三路，同时向各据点发起攻击。仅半小时就顺利结束战斗。这次袭击，全歼伪军一个中队和伪警察署、伪“清乡”政工团、伪“清乡”行动大队以及伪区公所、特工站等，将250余名“清乡”人员一网打尽，缴获60多枝步枪，把日伪刚登记的户口册和赋税帐簿烧得一干二净。

在其他“清乡”区内，我军也主动出击。6月30日，独立二团在太湖马山袭击砍伐竹木的伪海军，俘虏了该军一个排。7月5日，我武南短枪队袭击交通要道上的葛家村大坝头据点，全歼伪军一个排。7月9日，我四十八团和茅山保安司令部各一个连再克延陵以西的重要据点丁庄铺，全歼伪军一个中队。日伪军在接连遭受打击后，纷纷从“清乡”封锁线以外的据点和“清乡”区内的小据点撤退。伪“清乡”人员更是惶惶不安，不少人弃职潜逃，更多的人则来向我方打招呼说情。日伪在镇江地区的“清乡”，终于以彻底失败告终。

七　苏南反顽战役

1943年4月，正当日伪对茅山、太滆两地“清乡”之际，

国民党第三战区集结重兵，向我驻扎在溧水、溧阳一带的十六旅发起大“清剿”。这是苏南抗战期间国民党顽军发动的规模最大的一次反共进攻。

国民党顽军的反共进攻，蓄谋已久。1942 年 9 月，日本侵略军旨在打通浙赣铁路交通线的作战行动结束后，国民党军队乘日军撤退之机，大量涌向苏皖边区，并成立了第二十三集团军前进指挥部，由五十二师师长刘秉哲兼指挥，下辖第五十二师，江苏保安第一纵队、第四纵队，挺进军第二纵队等部。顾祝同在给蒋介石的呈文中，称成立这一机构之目的是“在军事方面固待予敌伪奸匪以打击”。其实，“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所谓打击敌伪只是陪衬，矛头对准我共产党、新四军才是真的。1943 年 3 月，国民党第五十二师、挺进军第二纵队、“忠救军”第一纵队等部从宜兴、广德、郎溪等地向北推进。此时，日伪开始在镇江地区“清乡”。我十六旅主力撤出“清乡”区，在溧水、溧阳交界的丘陵山区保持机动，抗大九分校、苏中党校等单位也从苏中转移到溧水地区，位于溧（水）武（进）公路以南、京（宁）杭国道以西、京建公路（南京至郎溪县建平镇）以东。这里岗峦起伏，云鹤山、回峰山、铜山、观山、芳山、湫湖山、曹山、芝山、傅家山等山岭绵延不断，是打游击的好地方。

国民党顽军向北推进到两溧地区后，与我军的摩擦不断发生。3 月 28 日，顽军江苏省保安一团在西线攻击我四十六团沈家山驻地，顽军挺进二纵两个营在东线攻击我五十一团竹篑桥、曹笪里驻地。我军一再退让，忍无可忍，于 4 月 1 日实施自卫还击，歼顽军一个营，4 月 4 日控制了溧阳

上兴、上沛一线。嗣后，我方本着团结抗日的立场，与顽军交涉，表示只要他们不再向我军进攻，不捕杀我方人员，不抢劫我军物资，我方愿主动让出上沛，向后撤退。我们还吁请地方士绅调解冲突，共同对付日伪的“扫荡”和“清乡”。

但是，我们的种种努力，均被顽方拒绝。顽方大肆进行反共宣传，扬言要“快刀斩乱麻，消灭苏皖新四军”，叫嚣要“打死王必成，活捉江渭清”，“争取第二次皖南清剿胜利”。更有甚者，他们为达到反共目的，竟认贼作父，把“剿匪”布告张贴到日伪据点周围，鼓吹“中日停战三个月，合力清剿新四军”。4 月 9 日，顽方调来五十二师两个团、挺进军三个团、一九二师两个团、“忠救军”第一纵队两个团、保安一纵两个团、保安四纵一个团，共 12 个团 15000 兵力，向我步步进逼。眼看大规模的武装冲突已不可避免。我方一面抓紧在部队动员备战，一面召开群众大会、乡保长士绅座谈会，向社会各阶层进行广泛宣传，揭露顽方倒行逆施、破坏抗日的罪行。旅部还召开排以上干部会，我到会作了题为《制止反共摩擦，求得继续团结抗战》的动员报告。旅政治部根据我报告的精神，印发了《为紧急动员起来，准备反顽战斗的指示信》和《自卫战斗讲话材料》，教育广大指战员认清形势，准备投入反顽斗争，增强胜利信心。同时，我们及时将顽军的动态向军、师部报告。陈毅军长来电指示：“你们站在自卫立场，给以打击是必要的，但应严守自卫原则。”粟裕师长在反顽战役爆发前曾先后三次来电，再三强调“绝对不宜主动向渝军进攻”，并具体指示我们，“顽方再向你们大举进攻，在其兵力雄厚时，你们首先以避开其锋芒，转入侧后，集

中力量迅速解决其薄弱一路为宜。”

我们遵照陈、粟首长的指示精神，迅速调动部队，部署反顽作战。到4月11日，我旅除留在“清乡”区坚持斗争的第四十七团二营和独立二团二营外，其他部队全部集结于两溧地区，计四十八团、四十六团、特务团（抗大九分校）、旅部特务营、四十七团一营和五十一团二营，共5000余人。4月12日凌晨，顽军开始向我发起进攻。顽军的部署是“西攻、东钳、北堵、南放”，其西线为五十二师和一九二师，东线为挺进二纵，北线为“忠救军”第一纵队，南线为省保安团。他们的如意算盘是，由“忠救军”第一纵队首先迂回到我军背后，从湫湖山到白马一线建立封锁，阻击我军北撤，接着以其主力五十二师、一九二师和挺进军第二纵队从西、东两翼猛烈攻击我军，缩小我军防御阵地，并迫使我军南移，进入它布下的口袋式阵地，最后加以围歼。顽军采取的这套战术，与皖南事变时的部署极其相似。当日，顽挺进二纵从东线大举进攻上兴埠和七里山。我四十八团一营、二营和四十六团实施自卫还击，歼灭顽军一个营。四十八团二营在营长黄祖煌率领下，沿京（宁）杭国道追击南逃顽军，黄昏时追至七里山上的一座庙前。顽军据守抵抗，我军经一小时激战，歼灭了据守庙里的顽军，并击毙顽军一个营长，从其公文包内查获了顽军的作战命令。黄祖煌营长觉得非常重要，当即派人把这个文件上报团部，团长刘别生又亲自把文件送到旅部。此时已到午夜。我们认真研究了顽军的作战命令，才完全掌握了顽方的作战部署及其险恶用心。我们一面命令部队停止追击，一面将东线部队西撤芳山。同时，我们急电

在西线担任防守任务的特务团，告知敌情，要求他们改变原定的防守计划，有步骤地撤出战斗。

在回顾这场发生在50多年前的反顽战役时，我始终不能忘怀特务团和四十七团一营在防守西线中的可歌可泣的事迹。在战役爆发前我们拟定的计划是：特务团及四十七团一营防守西线的云鹤山、观山、里佳山、铜山、芝山的阵地，掩护四十八团和四十六团在东线反击顽军。可是，顽军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以五十二师和一九二师等野战部队长途奔袭，于4月12日凌晨向西线特务团防守的榆树岭、观山、铜山阵地发起猛烈进攻。如前所述，特务团是从苏中转移到苏南来办学，由抗大九分校整编而成的，全团虽有三个营，1200余人，但武器装备很差，主要是些步枪和很少几挺机枪，与顽军五十二师、一九二师的精良装备不能相比。三个营的部署是一营扼守铜山，二营防守榆树岭和观山，三营防守芝山和和尚山。首先与顽军接战的是特务团二营，营长樊道余、营政委许彧青率部击溃顽军先头部队，控制了云鹤山制高点。接着与顽军大队人马展开激烈的争夺战。四十七团一营三连奉命增援，与顽军抢山头，肉搏三四次。全连60多人打得只剩下20多人，连长英勇牺牲。二营经过一整天的激战，终因敌我力量过于悬殊，于当晚撤退到观山主峰阵地。第二天上午，顽军五十二师一个团连续向二营阵地发起集团冲锋。我军奋勇抗击，弹药快打完了，就用刺刀、枪托和石块与攻上山来的顽军拼杀。中午，我军放弃观山，撤向曹山和芳山。在铜山阵地，特务团一营打得更加艰苦。该营一连指战员都是富有战斗经验的军事干部，英勇善战，打得顽

军无法前进。三连指战员虽是政工干部和文化干部，但他们同样无所畏惧，顽强战斗，用手榴弹与顽军近距离拼搏。顽军用猛烈炮火轰击我军阵地，我一营营长汤万益、政委唐昆元、副营长文有武先后阵亡，学员60多人牺牲。我们接到特务团发来的电报后，立即命令一营连夜撤出战斗，由四十七团一营的一连、三连接防，一直坚持到第二天傍晚才放弃铜山阵地。

经过一昼夜的战斗，到4月13日中午，形势更加恶化。东、西两线顽军于观山会合，形成了对我军北面的第二道封锁线。顽军会合后继续进攻我曹山阵地，企图进一步缩小包围圈，并将我军压向南线，再发起总攻。我们及时向粟师长报告了战况。粟师长回电指示："如无绝对胜利把握时，主力应即分散向敌后转移。"我们分析了当面敌情，感到这已不是一般的摩擦战斗，而是顽军经过充分准备，精心策划的一场大"围剿"。如果我们再犹豫不决，或向南撤退，将犯类似皖南事变中的错误，后果不堪设想。因此，决心丢掉侥幸心理，向北杀开一条血路，尽快脱离险境。于是，我们给旅特务营下了死命令，不管损失有多大，曹山阵地绝不能丢失。同时电令在南线的特务团三营和四十七团一营坚守芝山、和尚山阵地至14日下午，掩护部队向北突围。然后，我和王必成同志亲自到四十八团、四十六团下达战斗命令，进行战斗动员。要求当夜四十八团攻下回峰山，四十六团拿下北经巷，打开缺口，掌握战役的主动权。当时我对团干部说，"完不成任务以军法从事。"王必成旅长说得更干脆："什么军法从事，拿不下回峰山和北经巷，拿头来见！"可见当时形势的

严峻。

旅特务营接到死守曹山的命令后，决心继续坚持战斗。顽军凭借炮火掩护，在督战队的驱使下，向曹山发起冲锋。特务营指战员沉着应战，等顽军靠近时才进行反击。可是，顽军刚倒下一批，又拥上来一批，攻势凶猛，险情不断。整个曹山阵地展开了白刃血战。特务营的勇士们临危不惧，越战越勇，顽军终于胆怯了，丢下死尸逃下山去。直至13日下午16时，顽军始终未能攻占曹山。为此，顽军的突击营营长受到军法制裁。13日晚21时许，四十八团、四十六团分别向回峰山、北经巷发起进攻。驻守此处的顽军挺进第二纵队第六团没有料到我军的行动。我四十八团从东、西两面同时进攻，迅速攻占回峰山。我四十六团利用所掌握的顽军口令和暗号，顺利摸进北经巷。午夜，顽军挺进二纵第六团，除逃走二营一部外，其余全部被歼。接着，四十八团向北进击白马桥，四十六团向西北进击湫湖山，击溃"忠救军"第一纵队。这样，顽军在北面设置的两道封锁线，一夜之间就被我军攻破了。

4月14日，苏南反顽战役的最后一仗在南线的芝山、和尚山激烈展开。我特务团三营和四十七团一营为阻滞顽军前进，灵活地进行了穿插阻击。三营学员大多数是班排干部，战场经验较丰富，在特务团团长杜屏和三营营长朱传保的指挥下，预先修筑工事，并用树棍、泥块、草帽等做成假人，布下疑兵阵，迷惑顽军。顽军见我军众多，不敢贸然进攻，便以炮火轰击，再发起冲锋，这样就拖延了时间。我军从各方阻击，加上虚虚实实，顽军进展缓慢，直到下午才占领

芝山。这时，特务团团部在和尚山已完成了整理部队、清理文件和减轻行装等各项工作。当顽军继续来犯时，我四十七团一营乘其不备，实施反击，控制了和尚山山头阵地，掩护部队顺利撤出战斗。当晚，特务团三营和四十七团一营赶到芳山，与我们会合。

午夜，春寒料峭。我军各部队按照规定路线，分头向敌后地区转移。15日天亮时，顽军从东、西、南三路合拢而来，我军早已无影无踪。时刻关心着我旅处境的陈毅军长得知这一情况后，欣慰地说，"当机立断，化险为夷。你们没有恋战，恋战定要吃亏。"这场来势凶险的反顽战役，终于胜利结束。

八　进逼南京近郊

在两溧地区反顽战役之后，陈毅、张云逸等军首长来电指示，苏南根据地的发展方向应在南京周围地区，十六旅应转入敌后分散活动，把主要注意力放在敌后反"扫荡"、反"清乡"上面；鉴于苏南敌顽夹击的严重形势，已不便于抗大九分校继续在苏南办学，可转移到淮南根据地来。遵照军部的上述指示，抗大九分校于4月下旬渡江北上，我十六旅则开始了长达半年之久的南京外围地区游击战。

这时，顽军占据了两溧地区，疯狂迫害我地方干部和基本群众，摧残抗日力量，筑工事、修碉堡，扬言继续"清剿"我

军；日伪则在我军转入敌后地区后，改变了原来坐山观虎斗的策略，增设据点，加强兵力，频繁“扫荡”我军，妄图把我军赶回溧武公路以南地区。

处此敌伪顽夹击的三角斗争严峻形势，我军既不能去镇江“清乡”区，又不能去顽军“清剿”区，唯一可以活动的也只能是日伪眼皮底下的南京周围地区。针对敌后地区比较狭小、环境险恶的特点，我们的部署是：横山和江当溧，为四十六团行动地区；江句、句容和溧武公路西侧，为四十八团行动地区；五十一团坚持溧阳；四十七团坚持茅山；旅部率特务营和四十八团二营在溧武公路两侧穿插。我们之所以要分散活动，是为着避免暴露目标，重犯1941年冬十六旅在溧阳塘马战斗前的错误。为此，我们在给各团的指示信中强调，“在划定地区内，无论发生任何情况，如无上级命令，都要坚持原地斗争，或向外转移地区，不得向内缩拢，使许多部队集中一处。”部队转入敌后斗争，地方党政工作的配合更加重要，区党委给苏南根据地的各级党组织发出指示信，号召苏南全党同志以最大决心，咬紧牙关，克服任何困难，斗争到底。还要求各级党组织善于掌握和运用自身力量，审慎地处理工作中出现的问题，正确执行政策，灵活运用策略，在敌后斗争中求得我们力量的保存、巩固和发展。区党委和旅部的指示信在苏南根据地党政军各方面迅速得到了贯彻，为迎接新的更为艰巨的敌后斗争任务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

为了适应敌后分散游击的斗争环境，苏南党政军领导机关还在组织上进行了精简，将大批干部分散到各地，加强

基层工作。我记得当时区党委机关只留下秘书长欧阳惠林及一个会计，其他同志都分散到溧水、溧阳和江宁等地工作。区党委组织部长朱辉到溧阳中心县委任书记，旅民运科长黄吉民到横山县政府任公安局长，敌工科长张华南到溧水负责白马桥敌工站工作。苏南行署财经处与旅供给部合并办公，李建模任供给部长兼财经处处长，孔峭凡任供给部政委兼财经处副处长。行署公安局和旅政治部锄奸科合并办公，张雍耿任公安局长兼锄奸科长。在精简机构的同时，还抓了增收节支。5 月 6 日，区党委作出《关于 5、6 两个月财经工作的紧急决定》，除了突击征收夏熟田赋和税收，着重强调厉行节约。那些年月真叫艰苦朴素，只有口粮、衣服、电料、医药和军工生产五项费用允许开支，其他费用一律停发。"白天多做事，晚上少点灯"，"一张纸两面写，一个信封四次用"，千方百计把费用压缩到最低限度。我们这样做，不仅减轻了群众负担，更重要的是提高了政治信誉。老百姓看在眼里，佩服在心里，称赞说，共产党、新四军同国民党、"中央军"到底不一样，处处为百姓着想，事事做抗日榜样！

到南京的大门口分散打游击，做好伪军工作尤为重要。为此，苏南区党委于 5 月 8 日专门发出《关于伪军工作问题的指示》。南京周围地区是敌人推行伪化政策的"模范区"，我们的主要对手是伪军、伪自卫团和伪乡保长。我们各级干部，包括县委书记都动手做伪军工作，在出生入死的战斗中留下了不少佳话。例如：因病未赴延安学习的钟国楚同志，身体十分虚弱，不能随部队行动，就由溧水县委书记曹明梁亲自送到中山庵伪自卫团团长刘士诚家养病。刘士诚知道

这是新四军的旅长，吓得不敢接受。曹明梁同志对他说："因为钟旅长是我军将领，所以要你担保平安无事，不然来你家干什么？"刘士诚听命接受了下来，而且真的确保平安无事。还有江宁县委书记陆纲，原是大学生。他也亲自掌握伪军工作。当时，我军药品紧张，他就通过伪军的关系，在南京城里搞到不少药品。当年7月，区党委在句容四区北宋庄召开临时扩大会议，陆纲同志曾亲自护送药品来区党委参加会议。这件事至今仍印在我脑海中。在敌后分散打游击，军工生产怎么办？这是我们面临的又一个问题。十六旅有个军工厂，规模虽不大，但也不能搬来搬去跟着部队打圈子。我们就把这个军工厂安顿在江宁县龙都镇附近的夏庄。因为这里的伪军工作有基础，靠伪军掩护，并通过各种关系，从敌占区搞来生铁、焦炭和芒硝等原料，每天生产200多枚手榴弹。尽管日伪军频繁"扫荡"，这些手榴弹还是源源不断地从敌人眼皮底下送到了我们战士手里。从这几件事来看，应该说当年苏南根据地的伪军工作，确实做到了家。

当然，在南京外围地区打游击是异常艰苦的。4月17日，四十六团刚刚进入横山地区，就遭到溧水城和洪蓝埠据点日军的三路合围。我军在石臼湖北岸与敌人背水一战，打了6个小时，毙伤敌40余人，挫败了敌人的围攻。4月24日，四十八团一营在句容磨盘山下与金坛薛埠据点日军激战一天，打退了敌人的进攻。5月，南京、镇江之敌实行大调防，暂时停止了对我军的"扫荡"。进入7月以后，日伪军的"扫荡"又达到高潮，曾对我驻横山地区的第四十六团和在句容活动的第四十八团，连续多次大"扫荡"。日伪军从各据

点抽调部队，增加“扫荡”的兵力，第一次500余人，第二次1000余人，第三、第四次1600～1700余人。在7、8、9三个月里，我和王必成同志一直率旅部特务营转战江宁、句容及溧武公路两侧地区，指挥反“扫荡”斗争。敌人时刻注意着我军在南京外围地区的行动，处心积虑地对付我苏南党政军领导机关，妄图造成第二个“塘马战斗”。7月21日凌晨，旅部刚转移到赤山脚下的百里庄宿营，中午就遭到溧水城、天王寺、郭庄庙和葛村等地日伪军500余人的四路合击。盛夏中午，苏南农村有歇晌的习惯。我带着一个警卫班住在一户农民家里。战士们都在午睡，我没睡，坐在门口休息。忽然看到派去放哨的便衣拼命往回跑，边跑边喊：“鬼子来啦！”他发现敌人后竟忘了鸣枪报警，只顾跑，反而把敌人引了过来。我立即叫醒午睡中的战士，组织抵抗。少数敌人已冲了上来。就在这紧急关头，警卫班的机枪开火了，很快把敌人压了回去。突然，我感到右手臂一阵疼痛，鲜血从手腕上部的伤口直朝上喷射。我也顾不上负伤，仅用左手捂住伤口，继续指挥战斗。不久，我增援部队赶到，挫败了敌人的这次偷袭。我因失血太多而昏倒。警卫班找了一副门板，把我送到旅部卫生队抢救，这才脱离危险。事后知道，子弹打在我裤腰间的金属烟盒边上，再穿过我的右小臂。因为打断了静脉血管，所以流血不止。所幸未伤到骨头。

我负伤以后，身体虚弱不能行走。一连几天，王必成同志派人用担架抬着我随旅部行动。我看这样不行，太拖累旅部，于是提出来离队隐蔽休养一段时间。王旅长起初不同意，说许多大事要和我商量决定。我对他说，我们可否向军

部请示一下，由邓振询同志代理我的工作，这样便于旅部的行动，我也好安心休养。我们给军部发了电报。陈毅军长很快回电，关切地询问我的伤势，能否在苏南坚持？如果能带病工作，就不另派人来，暂由邓振询同志代理工作。陈军长在电报中再次强调苏南斗争环境的艰苦性，嘱咐我们要发扬民主，多作调查研究，自觉维护苏南区党委团结一致的良好局面。接到军部的回电后，我向区党委一班人交代了工作，便带着两个警卫员到江宁龙都附近的一个大地主家里“打埋伏”。这家大地主的房子有地下室，很安全。

谁知道我休养还不到一周，王必成同志派人来把我接回旅部。他告诉我一个不幸的消息：8 月 3 日夜里，邓振询同志在随四十六团渡秦淮河时落水牺牲。四十六团派出一个营的兵力掩护寻找打捞工作，到 8 月 6 日才在下游 200 米处找到其遗体。

邓振询烈士是江西兴国人，1927 年参加革命，1929 年由青年团员转为共产党员，是兴国暴动领导人之一。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先后担任中华全国手工业工会委员长、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执行委员兼劳动部长；参加长征抵达陕北后，任中华全国总工会西北办事处主任兼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劳动部长。抗战爆发后，邓振询到华中工作，先后任江西省委组织部长、皖南特委书记、苏皖区党委书记。1941 年皖南事变以后，我突围到苏南根据地，与他开始在一起工作，直到他不幸牺牲。邓振询同志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两条，一条是他刚直不阿，严于律己；还有一条是从不计较个人得失，没有任何地位观念，为了革命事业，能上能

下，甘愿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工作。别的不说，就拿苏南区党委书记一职来说，按资格，邓振询同志是革命老资格；按工作，他长期担任党政领导工作。但是，因为1942年9月，党中央决定各根据地实行党政军一元化领导，华中局领导考虑到邓振询不熟悉军事工作，就提议我任苏南区党委书记，他任副书记。他对华中局的决定坚决服从，积极协助我开展工作，主动分担许多繁重的任务。由于我们一、二把手关系融洽，所以苏南区党委一班人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邓振询同志的牺牲是苏南抗日根据地的重大损失。邓振询牺牲后，我们将烈士就近葬于江宁县龙都乡。第二年，我们又将他的墓迁到周冈乡猴山，并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仪式。1983年邓振询牺牲40周年之际，江宁县人民在东山镇环境优美的竹山公园兴建"仲铭亭"，以缅怀这位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献身的英雄。当时我正从江西回到南京。我怀着无限的思念之情，为纪念亭题写了匾额。

九　建立抗日民主政权

抗日根据地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在1943年3月至1945年2月期间，我还兼任苏南行政公署主任。

皖南事变以前，苏南抗日根据地没有正式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当时，国民党在苏南敌后地区都委派了县长和区长。他们利用"正统"的招牌发号施令，欺骗群众。我党从维

护国共合作抗日的大局出发，在我们活动的地区采取了成立抗日自卫会和办事处的形式，代行政权职能。皖南事变以后，为了坚决反击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行径，苏南抗日根据地普遍建立起县以上的抗日民主政府，由我党我军委派专员和县长。在苏常太、澄锡虞、青昆嘉、丹北、茅山、太滆等地区成立了6个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共辖23个县政府及若干个行政办事处和特区。记得我刚从皖南突围出来抵达东路地区时，谭震林师长正在无锡北乡召开江南行政委员会第一次筹备会议，聘定党政军负责人及各界知名人士25人为委员，成立了江南行政委员会，何克希任主任。在谭震林同志的指导下，东路苏常太、澄锡虞地区的抗日民主政府，很快就开展工作，制订了一系列法令和条例，并吸收部分开明士绅和要求抗日的国民党员到各级政府任职，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日伪"清乡"期间，由于我主力部队转移，属于东路"清乡"区范围内的我第一、第二、第三3个专员公署被迫撤销。在苏南的丹北、茅山和太滆则分别保留了第四、第五和第六专员公署。后来，丹北地区划归苏中抗日根据地管辖，第五、第六两个专员公署合并为苏南行政专员公署。

1942年春夏，我接替谭震林同志任苏南区党委书记以后，随着敌人"清乡"的失败，抗日根据地逐步恢复和扩大，以行政专员公署名义来制订和发布法规条令已很不适应。于是，我们多次向华中局提出恢复苏南行政委员会，以便于更好地运用政权的力量来推行根据地的各项工作。华中局同意了我们的意见，并指出苏南处于游击战争环境，要我们从这个特点出发，考虑建立一个精干的工作机构。这样，我

们便决定暂不成立单独的机构，而是把原苏南行政专员公署的“专员”两字拿掉，对外称“苏南行政公署”，其工作由苏南区党委机关兼管，实行一个机构、两块牌子，合署办公。同时，考虑到财经工作任务很重，苏南行政专员公署原有一个财经处，原班人马已从东路“清乡”区撤到茅山地区，仍予保留。区党委在讨论苏南行政区政权建设时，还遇到一个问题，就是要不要成立参议会。因为党中央早在1940年3月就明确规定，各抗日根据地最高权力机关是参议会，这是以民主选举方式产生的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权。共产党员、左派进步分子和中间派各占三分之一，简称“三三制”政权。华中大多数抗日根据地在华中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以后，都相继选举产生了各级参议会。苏南根据地由于处于同敌伪顽激烈的三角斗争之中，暂时还不具备民选参议员的条件。我们借鉴苏中抗日根据地政权建设的成功经验，采取灵活的办法，第一步先成立参政会，作为临时民意机关，行使参议会的职权；等条件具备时，再成立民选的参议会。华中局批准了我们的意见。

1943年3月，我们在溧水县小蒋家村小学召开了苏南根据地各县县长联席会议。参加会议的县长有溧水县曹明梁、溧阳县陈练升、句容县凌康、镇句县洪天寿、丹阳县马玉亭、茅东县徐公鲁、镇丹县包建华；金坛县副县长薛斌、江宁县委书记陆纲、江当溧三县行政委员会副主任童超。苏南行政区党政军领导人及有关部门负责人江渭清、邓振询、魏天禄、吴仲超、李坚真、欧阳惠林、李建模、陈立平、樊玉琳、樊绪经、蒋铁如等人出席了会议。会议主要有三项议题，一是

总结苏南抗日民主政权建设的经验，由樊玉琳代表原苏南行政专员公署作总结报告。二是选举产生新一届苏南行政委员会并确定苏南行政公署的组成人员，苏南区党委作为根据地的执政党，向会议提交了《苏南行政纲领》和《苏南区行政公署组织法》(草案)两个文件。会议在讨论并通过以上两个文件后，选举产生了第二届苏南行政委员会，由我和邓振询、王必成、魏天禄、吴仲超、李坚真、欧阳惠林、朱春苑、李建模、樊玉琳、张之宜、诸葛慎、蒋铁如等13人组成。我兼任苏南行政公署主任，邓振询任副主任，欧阳惠林任秘书长兼文教处长，朱春苑任民政处长，李建模任财经处长，张雍耿任公安局长，法院院长暂缺。三是研究和部署了今后的民主建政工作，讨论制订了《苏南行政区各级参政会组织条例》和《苏南行政区各级参政员选聘条例》，明确规定各级参政会为代表抗日人民的民意机关，各级参政会协同政府及抗日民众团体筹备各级参议会，俟民选参议会正式产生后，参政会即行结束。会上按照"三三制"原则，确定了各级参政的名额和分配比例，民众团体及学校、部队推选名额占30%，民选占30%，政府选聘占40%。同时规定在组成成分比例上，工农占三分之一，文化教育医务界及部队占三分之一，地主士绅及名流学者占三分之一。我们坚持从苏南实际出发，采取灵活的组织形式，把党中央有关政权建设的方针政策具体化了，现在看来也还是可取的。

苏南行署成立以后，苏南根据地的民主建政工作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经过1943年艰苦激烈的反"清乡"、反"清剿"斗争，我们不但坚持了茅山和太滆"清乡"区的阵地，而

且向南恢复了两溧地区，开辟了郎广等新区。在我们控制的1万平方公里的范围内，有51%的地区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共成立了4个专署、17个县政府和57个区公所。还有不到一半的地区是游击区，通过做工作，使原来的旧政权成为我所控制的两面政权。根据地的大多数县、区都召开了参政会。建政工作的进展，看似平常，实则来之不易。当时，苏南根据地四周和各个小块根据地之间，共有日伪据点332个，对付我军的日军有17000多人、伪军23000多人，经常向我"扫荡"。国民党顽固派也不断对我造谣诬蔑，威胁地方人士，不少业主士绅、地方人士对参加我政权抱着观望态度。我们耐心细致地做好宣传解释工作，并在党内反复进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教育，提出只要赞成民主、赞成抗日和不反共的，都在团结争取之列，要求各级领导亲自去做团结争取工作。经过各方努力，才把参政会一个一个建立起来。县、区参政会的议长，都由党外人士担任。为使参政会真正成为代表民意的参政议政机关，规定各级政府在决定重大问题时，都必须经过参政会讨论，充分听取参政员的意见。苏南行政区一级的参政会，因为频繁的战斗，没有来得及成立，但行署在作出重要决定前，还是尽可能考虑到党外人士的建议和意见。而以办学这件事情来说，苏南素称人文荟萃之地，历来教育事业比较发达。抗战爆发以后，学校遭到破坏，教员大量流失。在我们控制地区内的小学校只剩225所，中学仅有2所，许多小学毕业生要读中学就得到敌占区去，各界人士普遍希望抗日民主政府多办一些中学，但我们办学的财力物力有限，力不从心。于是，就通过各地参政会，请各

界人士共同出主意，想办法，确定了中学以民办私立为主，政府积极扶持、适当补助的办学方针，并于1944年2月制订和颁布了《苏南行政区私立中学校整理及设立实施办法》，使私立中学在组织、经费、教职员薪俸和学生学费等方面均有章可循，从而调动了运用社会力量办中学的积极性。到1944年底，苏南根据地的中学由原来的2所发展到34所，教员234人，在校学生4449人。虽然还未恢复到战前水平，但恢复的速度是相当快的。

我们在根据地的政权建设中，还抓了改造保甲制、民选乡保长的工作。那时，有的根据地曾提出"废除保甲制"、"铲除保甲制"的口号。我们感到，苏南根据地不宜提这样的口号。应当从实际出发，区别不同情况，采取不同做法：在新解放区，为稳定局面，凡乡、保两级旧政权未被日伪破坏的，原来的乡、保长继续留任，然后逐步调整；如旧政权已被日伪破坏或已自行瓦解的，则以委派和民选相结合的办法，建立新的抗日民主政权。在老解放区，只有在具备了有牢固的群众工作基础，封建势力已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击，并有一批得到群众拥护的，堪任乡、村长的党员或积极分子这样三个条件的中心区，才采用民主选举的办法，改选基层政权，废除保甲制。具体做法是，结合划小区、乡范围的工作，分批分期召开乡、村选民大会或代表大会，直接选出乡、村的行政委员会和乡、村长。新当选的乡、村长大多是党员或农救会骨干。条件尚不具备的地方，即使是中心区，虽废除保甲制，但不搞民选，仍用委派的办法任命乡、村长。基层政权经过这样一番改造，苏南根据地的巩固又前进了一步。

作为抗日民主政府，即使是战争环境，领导生产仍是一项重要工作。1944年初，正当苏南根据地开展减租减息斗争之际，传来了华北各抗日根据地热火朝天进行大生产运动的消息。苏南行署立即作出部署，号召各地紧密结合减租减息，开展大生产运动，并派干部到基层，帮助总结丰产经验，研究互助合作办法，运用典型，示范指导，把根据地的大生产运动搞得有声有色，仅句容县就组织了603个互助组、换工队，有些地方还办起了手工业、供销和信贷合作社。广大农民既从减租减息斗争中得到了经济好处，又实际体会到组织起来的力量，纷纷要求参加与各自职业有关的群众团体。到1944年底，苏南根据地农救会、工救会、雇工会等群众团体的会员达到12万多人。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大为高涨，促进了大生产运动的开展，当年光是溧水县就组织农民修塘筑坝、挖开河沟，扩大水浇地10万余亩；第三行政分区共出动23000人修水利，开荒6000余亩。

苏南行署第一位的工作还要数财经工作。打仗要军费，部队和党政干部要供给，据1944年统计，当时苏南脱产的党政军人员共19000多名，其中党政工作人员3400多名，部队15000多人。光是解决这部分人的供给就是一笔很大的负担。除此之外，还要在经济上支援新四军军部。皖南事变后，军部无论设在苏北盐城，还是搬到了淮南黄花塘(今属盱眙县)，这两个地方同苏南相比，经济条件总是要差一点嘛！记得军部刚成立不久，我们就在东路沙洲开辟了一条通往上海的秘密航道，多次采购布匹、药品、电器用材和军工器材等紧缺物资送往军部。1943年，苏南根据地全年财

政现金收入为7000万元(法币),其中上缴军部即达1000多万元。

抗战期间筹钱筹粮,同红军时代不同。红军时代主要靠"打土豪",现在抗战了,要讲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打土豪"不行了。我们苏南主要靠征收田赋公粮和货物营业税两大类,此外还有一些公产、学款和其他零星收入,那很有限。征公粮,收税款,中心区好办,问题是在边缘区、游击区,敌伪顽垂涎三尺,争夺非常激烈。每当夏收、秋收,敌伪总要出来"扫荡"、抢粮,我们就实行武装保卫夏收、秋收。然后征收田赋公粮,又是一番激烈争夺。我们的办法,一是责成两面派乡、保长代收公粮,有些乡、保要"两面负担",甚至"三面负担",就要他们能拖则拖,如敌伪或顽方实在逼得太紧,允许他们多少交一点敷衍,至于我方的公粮,两面派乡、保长一般都不敢马虎,说是"新四军的公粮总是要交的"。二是派工作组、农会骨干直接做群众的工作,日伪一般每亩年收田赋二三十斤大米,我们只收四五斤,多至十来斤大米,负担要轻得多,而且群众知道给新四军公粮是为抗日,所以交"抗日粮"、"救国粮"是光荣的,积极性很高,有些群众白天不敢交,晚上也要偷偷交给新四军。尽管这样,被日伪顽掠夺的田赋、粮食还是相当可观的。1944年秋收后,茅山地区仅一个区就被敌人抢走近2000万元(伪币)田赋,占这个区秋熟田赋总额将近一半。按当时估算,大体上"清乡"区征收公粮敌我一半对一半;我强敌弱的游击区,如江宁县的部分地区,征收公粮二八开,敌二我八;敌我对峙的游击区,如溧水县的部分地区,征收公粮我方一般占60～70%,敌方占30

～40%。很明显，要多征公粮，增加财政收入，归根到底要靠武装，扩大根据地。1943年，苏南根据地的三角斗争形势很紧张，根据地面积缩小，归我收公粮的农田只有350万亩，整个根据地的财政现金收入7000万元，公粮506万斤；1944年，根据地扩大了，归我收公粮的田亩达到544万亩，仅秋熟一季田赋就收入现金6.58亿元、公粮2800多万斤。另外，这一年还收入税金2.2亿多元（1943年收的是"法币"，1944年收的是伪币"储备券"）。当年财政收入迅速上升的原因，除了征收公粮的田亩面积扩大以外，还有一条是，苏南行署在春天就召开了财经工作会议，到会的有行署财经负责人，各专署以及附近几个县的财政局长、科长等，我和吴仲超同志都到会讲了话，研究确定了增收节支、健全财经制度、严格财经纪律等措施。那时，财经制度是非常严格的，例如党政机关干部和部队指战员一个样，每人只发一套棉衣，规定穿两年。战士穿了两年，还要把棉花取出保存，用旧布做鞋子。上下都能自觉执行这个制度，反映了我根据地的干部和新四军指战员艰苦朴素的精神风貌，保证了我们党与军队能够和苏南人民紧密联系在一起，战胜财政困难，在激烈的三角斗争中站住脚，直到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

这里，我还要特别提到时任苏南行署财经处长的李建模烈士。1941年，我刚到苏南东路地区，就听谭震林同志夸他是位"理财的行家里手"。1942年春，他率领苏南财经处转移到茅山地区，兼任新四军十六旅供给部长。他带领全体财经干部，千方百计开辟财源，保证了军政供给。最令我难

忘的是1943年春夏日伪顽对我十六旅夹击期间，他在茅山地委的紧密配合下，突击抢运出十六旅存放在茅山“清乡”区范围里的3000多担物资器材。接着，他率领财经处转移到江宁、句容等地，继续开展征收钱粮的工作。当时，十六旅正处于转战南京郊外的最困难时期，急需经费购买弹药、药品和其他军需物资。就在这时，江宁县警卫连护送着李建模他们新征收的500万元经费来到旅部。此情此景，真让人感奋不已！不幸的是，1945年10月15日，在部队从苏南北撤苏中时，有一艘中安号轮船发生沉船事件，乘坐这条船的李建模同志亦未能幸免于难。他的牺牲，使我失去了一位真挚的战友，我党我军失去了一位优秀的财经干部。

十　南下郎广，智取溧高

我在反“扫荡”中负伤，接着邓振询同志牺牲，粟裕师长对我们在苏南敌后的处境表示了极大的关心。他屡次来电询问敌情和顽情，并告诉我们，师部和军部考虑到苏南敌后地区塘小鱼多，部队过于拥挤，活动、给养都困难，打算将四十八团北调，要我们有所准备。接到粟师长来电后，我和王必成旅长交换了意见。王旅长先谈了看法。他认为，目前北有日伪，南有顽军，我们的大部队夹在中间，确实目标大，给养也不易解决。师部拟将四十八团北调，这是对我们的关心，但是，如果苏南形势一旦发生变化，手里没有一定的力

量，怎么办？所以，四十八团不过江也行。到底是去是留，他问我的意见。我说，你的想法和我不谋而合。我们在南京外围地区转战虽然艰苦，但对敌人威胁极大。按照苏南三角斗争的规律，日伪一定要把我们“送到溧武公路以南去”。再说，我们已经熬过半年，最困难的日子可以说就要过去，茅山、太滆“清乡”区的形势业已开始好转，我们又有了活动的余地，再困难也困难不到哪里去了。还有一点，敌人分兵南进投入太平洋战场的局面是很可能出现的。这对我们来说，是个极好的发展机会，如果我们力量分散，到时候可能抓不住这个机会。所以，我觉得四十八团目前还是不北调为好，过一段时间以后再说。王必成同志很干脆地说：“好，同意你的意见。”于是，我们联名给师部拍了电报，陈述我们的看法。粟师长一向从善如流，立即向军部转报了我们的建议。不久，军部回电：“同意必成、渭清同志的意见，第四十八团坚持苏南不北调。”

1943 年 10 月，正当我军继续在南京外围地区开展游击活动，日军出动两万之众，向苏浙皖边区发动了大规模的战役行动。其目的不仅要掠夺资源，更主要的是摧毁广德空军基地，以防盟军飞机由此起飞轰炸日本本土。三天之内，日军向前推进 100 余公里，占领溧阳、广德、郎溪和宣城四座县城，打通了宣城至长兴的公路。当敌军进击时，溧武公路以南的国民党军队望风而逃，其五十二军退至安徽宁国，“忠救军”大部分退至浙皖边境的孝丰、广德山区，挺进军溃散于宜溧山区，保安第四纵队张少华部则窜至长滆地区，依靠伪军掩护与我军争夺这一地区。这样，溧武公路以南至宣

城长兴公路以北的广大地区成为新沦陷区。日伪军在各大市镇增筑据点，委任伪县长，组织伪政权，颁发“良民证”，实行伪化统治。苏南三角斗争的形势果然如我们所预料的那样发生了变化。我们随即派第四十八团尾敌南进，袭扰牵制敌军的进攻，配合正面战场的作战。10月上旬，我军即恢复了春季反顽战役前的地区。区党委和旅部机关返回溧水里佳山一带，两溧地区再度成为苏南敌后党政军指挥中心。

在恢复了两溧地区以后，我们向军部报告了敌军的战略意图，并建议派兵南来，发展苏浙皖边新沦陷区的游击战争。军部非常重视我们的建议，立即向一师征求了粟裕、叶飞等人的意见。军部和师部都认为这是向南发展的一个极好机会，但又一时尚无力从江北抽调部队增援苏南，只能依照现有力量，灵活使用兵力，逐步向南发展，达成控制宣长公路以北地区的任务。接到军部电报后，我和王必成等同志立即进行研究，一致认为，机会难得，稍纵即逝。没有援兵，我们就分兵作战。决定由王必成率四十八团南进郎溪、广德，实施战略侦察，同时相机打击敌顽势力，准备向南发展；由我和钟国楚（因邓振询牺牲，钟国楚不去延安，仍留在苏南，改任十六旅副旅长）率四十六团廓清溧水、高淳一带伪军据点，完全控制溧高地区。11月初，王必成亲率南进部队经高淳进入郎溪，再向东插入广德。在半个月内先后进行了侯村、芦塘、泉村、砖桥等九次战斗，特别是芦塘一仗，消灭了顽挺进第二纵队司令部及所辖的一个团，俘虏数百人，缴获大批武器和迫击炮弹1000余发、山炮弹2000余发、高射机枪弹1000余发、机步枪弹10万余发，初步打开了郎溪、

广德北部的局面。

我和钟国楚指挥的溧高战役开始于11月20日。在日军大举南进时，伪和平建国军第三师一个团乘国民党军撤逃之机，进驻溧水、高淳的新桥、东流、郃村、漆桥、东坝一线，妄图以此为依托，逐步蚕食溧高地区。我们根据伪军兵力分散且无日军增援的情况，决定采取分割围歼的攻坚战术。11月20日晚，我四十六团首先向溧水境内的东洙伪据点发起强攻。敌凭险顽抗，经我严重杀伤后，于第二天放弃据点，逃往孔镇。20日晚，我特务营对溧水新桥伪军发起攻击。经一小时激战，全歼伪军一个连，俘伪军50余人，缴获全部武器弹药。22日上午，我带领四十六团和旅特务营南移，将指挥所设在高淳漆桥和东坝之间的小游山北侧。以四十六团二营主攻漆桥，一营、三营担任警戒，旅特务营设伏于大、小游山及小茅山一线。当晚，二营向漆桥守敌发起攻击。因缺乏攻坚重武器，未能打下据点。此时，正在东坝巡视的伪副师长陈炎生接到求援电，亲率一连伪军增援漆桥。陈炎生很狡猾，他率队进至半路突然改走小路，并边走边用火力搜索。我军沉着等待，俟敌人进入我特务营伏击圈时，埋伏在小茅山的特务营二连迅速截断其退路。敌军见后路已断，慌忙向西边的张沛桥逃窜。我特务营一连抢先占领张沛桥，将敌军压至沛溪河北岸。经半小时战斗，这股处在我军包围中的伪军全部被俘。伪副师长陈炎生是伪内政部长陈群之子，当他被押来见我时，吓得要死。我对他说，现在你有一个带罪立功的机会，你给漆桥守军写一封信，要他们放下武器投降，我们保证他们的生命安全，宽大处理。他真是

求之不得，马上按我的话写了信。我派人将信送到漆桥据点，还向据点喊话，开展政治攻势。漆桥守军见大势已去，便打开据点投降。至此，溧高战役胜利结束。这是苏南抗日斗争发生重大转折时取得的一个重大胜利，彻底打破了敌人在这一地区推行伪化和蚕食的计划，扩大了我苏南抗日根据地。延安《解放日报》曾专门予以报导。

在我军南进郎广、巩固溧高的同时，区党委着手解决苏南抗日根据地地区划分和地方党组织的调整问题。我由十八旅调十六旅时，苏南根据地的范围只限于茅山和太滆两个地区。经过一年多来的恢复和发展，我们向西抵达江当溧和横山地区，向南进至安徽宣城和浙江长兴公路以北地区。根据地范围扩大了，原来的地区划分和组织领导机构已不能适应新的形势。于是，我向军部和华中局建议，在原有的茅山和太滆两地委之外，增设江溧句、两溧高淳、郎广三个中心县委或地委，同时，由于邓振询同志牺牲后区党委领导力量缺乏，建议将吴仲超同志调回区党委任副书记，在溧高一带主持溧武公路以北地区的工作。我则率旅部南下郎广地区，与王必成同志会合，以大刀阔斧方式开展这一地区的工作。军部和华中局接到我们的电报不久，就给我们作了明确而具体的指示：按照苏南对敌斗争的新形势，苏南根据地可以分为三大地区，一是敌后战略联系地区，主要是溧武公路以北的茅山、金丹武、江溧句和江当溧等地区，为敌后要冲，是苏南与一师、二师的联系要道。这里的工作以长期坚持为目的，富余的干部应坚决南调，适应新的发展形势，但必须保持坚强的领导骨干和小型地方武装。二是根据地的

中心区，主要是指溧武公路以南的太滆、两溧和高淳等地区，区党委应以这里为苏南的基本阵地，以发动群众，改造旧政权和建立地方武装为主，用较短的时间打下稳固基础。三是广泛的游击区，主要是指宣长公路以北的广德、郎溪、长兴、宜兴和宣城各一部分，以建立地方党和地方武装为主，对基层旧政权暂时利用，上层政权由我方委派县、区长。以游击战争驱逐顽固派武装及其政治势力，同时开展广泛的抗日宣传运动，造成敌后抗战新局面，并准备与浙东抗日根据地打通联系。军部还指示十六旅旅部和苏南区党委应在一起指挥，同意我南去郎广地区，但应迅速回溧高地区主持区党委工作。接到这一指示后，我先到广德与王必成同志详细商讨，接着进行了近两个月的充分准备。

1944 年 1 月 20 日至 2 月 7 日，苏南区党委在广德县上保村、长兴县仰峰岕和宜兴县襄阳召开了一次流动的扩大会议，传达、贯彻、落实华中局和军部的重要指示。会议确定 1944 年的工作任务是：(一)巩固老区，建设新区，开辟边区，把建设新解放区作为首要任务，猛烈开展对敌军事斗争，拔除那些孤立的和薄弱的日伪军据点，使新老解放区连成一片。(二)放手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的大多数，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领导好反伪化斗争。(三)巩固和整顿党的组织，开展整风学习运动，大力培养新解放区的干部。为了实现上述任务，我们将全区划分为四个行政分区，建立四个地委。第一分区在溧武公路以北，京建公路以东，金丹公路以西，辖江宁、句容、茅东和镇句四县，汪大铭任地委书记，樊玉琳任专员兼军分区司令；第二分区在长荡湖以东，宜兴、

溧阳以北，常州以西，辖武进、宜兴、金坛三县和太湖行政办事处，陈立平任地委书记，张之宜任专员，杨洪才任军分区副司令；第三分区在溧武公路以南，胥溪河以北，长荡湖以西，当涂、芜湖以东地区，辖高淳、溧阳、溧水和横山四县，丁麟章任地委书记，朱春苑任专员，吴泳湘任军分区司令；第四分区在胥溪河以南，宣长公路以北，太湖以西地区，辖郎溪、广德、溧南、长兴四县，罗维道任地委书记，刘烈人任专员，刘别生任军分区司令。在军事部署上，为加强新区，将四十八团和独立二团配置在第四分区，四十六团配置在第三分区，五十一团配置在第二分区，四十七团配置在第一分区。从此之后，苏南抗日根据地进入了新的大发展时期。

十一　攻势作战捷报传

北京军事博物馆陈列着一门日制九二步兵炮。要说它的来历，还得追溯到半个世纪前发生在广德杭村的杀敌缴炮战斗。

我十六旅四十八团南进郎溪、广德、长兴地区后，日伪加强了在这一地区的防务，频繁向我进行“扫荡”，并四出抢粮、拉伕，闹得人心惶惶，鸡犬不宁。我军在反“扫荡”斗争中依靠群众的支持，利用山区复杂地形，与日伪军巧妙周旋，相机狠狠打击敌人。当时在郎广山区流传着一首抗日歌谣：“千重山，万重山，家乡就在山中间。东村伙伴去砍柴，西村

伙伴去烧炭；家乡儿女千百万，祖宗世代都靠山。北山有狼大家杀，南山有虎大家赶；要是敌人来抢山，你守南山岗，我占北山巅，四面八方齐参战，要把敌人埋山间。”

1944年3月29日上午，广德门口塘、流洞桥两个据点的日军一个中队100余人，在一营伪军300余人的配合下，携带一门九二步兵炮，窜至杭村一带，沿宣长公路进行“扫荡”。我四十八团闻报后，迅即命令第三营插入杭村西南的慈姑山，待敌接近时突然予以猛烈打击，截断了敌人的归路。第一营则抢占了杭村东南牛头山高地，从侧翼夹击敌人。日伪军慌忙丢下抢掠来的鸡鸭财物，有的脱下皮靴，负隅顽抗，伺机突围。王必成旅长亲临前线指挥战斗。他通过望远镜观察到日军正在调试九二炮，便把四十八团的小炮排调到牛头山上。他把望远镜递给小炮排排长戴文辉。戴排长举镜一看，激动地叫道：“大炮，敌人正在调大炮！”王必成对他说：“我们要用小炮打大炮，不能让大炮轰我们。”戴文辉娴熟地操纵着迫击炮，第一发炮弹落在敌人九二炮附近，紧接着第二发炮弹直落敌人拉炮的几匹大洋马中间。有的马被炸死，有的马狂蹦乱跳，敌人也和受惊的马匹一样乱作一团。我军乘势从两面的山村中杀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向敌人，把敌人全部压到一块麦田里，经一阵白刃格斗，除少数敌人逃走外，全歼日军一个中队，缴获一门崭新的九二步兵炮。在激战中，三营教导员郑大方英勇牺牲。

战斗结束后查明，被歼灭的日军系南浦师团小村中队。该师团号称“荣誉师团”，前身是驻扎苏中地区的日军独立第十二混成旅团。日军总司令部得知吃了败仗，丢了大炮，

认为有损“荣誉”，十分震怒。对于日军来说，这是在苏南战场上丢失的最重要的武器；对于我新四军来说，缴获了这门平射炮，确实如虎添翼，对日军推行“碉堡政策”是个严重威胁。于是，从第二天起，日军即出动1000余兵力，在特务、汉奸和伪军的配合下，进行报复“扫荡”，四出寻找这门大炮。如何保护这门炮，成了我军指战员共同关心的问题。开始，四十八团把大炮拆开，分成几部分随部队行动，在长兴煤山一带与日军捉迷藏。可是，部队不能老在这里兜圈子。我和王必成旅长商量，要四十八团就地掩埋大炮，部队撤离这一地区。四十八团的干部有些舍不得，但这是旅部的命令，必须执行。于是，他们把炮架、炮轮、炮栓和炮后座分散埋藏，仅带着炮身和炮弹，撤出了这一地区。事后，日军发觉我军没有带走大炮，便到处乱挖，并张贴布告，对知情报告大炮下落者重赏。他们还强行集合老百姓，把钞票摊在桌子上，进行威胁、利诱。可是，知情者不爱钱，贪财者不知情。敌人前后折腾了二十来天，仍一无所得，竟迁怒于老百姓，烧掉了杭村等一些村庄的房屋，杀害了我们好几名乡干部。最后，将丢炮的日军中队长枪毙了事。

九二步兵炮终于保住了。是年夏季，我军在苏南发起攻势作战，这门炮大显威力。当时，日军发动豫湘桂战役，向国民党军大举进攻。为了配合正面战场的作战，我十六旅集中第四十八团、四十六团和独立二团，于8月23日发起长兴战役。长兴地处太湖西南岸，是宣城至长兴这条战略公路的东端，也是我军向太湖南岸杭嘉湖平原发展的前沿地带。我们以四十八团担任主攻长兴县城外围据点，以四十六团担

任阻击长兴城出援之敌，旅特务营和独立二团监视泗安等方向之敌。四十八团首先扫除了长兴外围一些小据点，接着主攻白埠和合溪两个中心据点。当四十八团二营顺利进展到白埠的伪军营部时，伪营长竟在碉堡上叫喊："新四军没有炮，我们不怕！"我二营营长黄祖煌立即命令将九二步兵炮对准敌碉堡，同时开展政治攻势。伪营长先还不相信，后来从碉堡枪眼里看见了大炮真的对准了他们，吓得连声叫喊："别打炮，别打炮，我们投降！"

白埠战斗结束，我们又把九二步兵炮调到合溪镇。这时攻打镇北大祠堂的战斗正呈对峙状态。九二炮瞄准祠堂正门的碉堡一声怒吼，碉堡一下轰了个大窟窿，我四十八团刘别生团长和营长曾旦生指挥一营三个连同时发起冲锋。敌军吓破了胆，纷纷叫喊投降。担任打援的四十六团亦取得辉煌战果，长兴城伪军300余人出援合溪，在棋盘岭遭我四十六团的伏击，死伤大部，伪营长以下60余人被俘。8月25日，长兴战役胜利结束。我旅共攻克伪军据点13处，摧毁碉堡60余座，歼灭伪第一方面军第一师的四个营，生俘伪军副团长以下420余人。收复国土400平方公里，解放人口6万。当时，延安《解放日报》详细报导了长兴战役，称赞它是"近年来江南我军最大的一次胜利"。

长兴战役后，新四军军部来电，要我们在巩固原地区的同时，把工作重心放在太湖西南岸，沿京（南京）杭国道伸入天目山，造成进一步过钱塘江，与新四军浙东纵队打通联系的战略态势。在此之前，粟裕同志已向党中央提出过发展东南地区，配合盟军在浙江沿海登陆作战的建议，党中央复电

同意，并重申“对苏浙皖地区工作应有新发展的部署，特别是浙江工作应视为主要发展方向。”军部来电和党中央的复电精神是一致的，都是要我们率先部署南进工作。我们接到军部来电后进行了研究，决定发起周城战役。

周城位于溧阳城西南，北有南渡镇，南有社渚镇，三个据点分别驻扎着伪第一方面军二师四团的三个营。该部伪军武器装备精良，配置两门日制曲射炮，深沟高垒，盘踞京杭国道中段，割断我溧高与郎广两地区的联系，必须歼灭该敌，打通这条南北走廊，才能保证我军向南大发展。我们的战役部署是，四十八团攻击周城；四十六团在周城、南渡之间伏击南渡出援之敌；四十七团在周城、社渚之间伏击社渚出援之敌。攻克周城不成问题，但南渡、社渚两地伪军是否会出援很难说，因敌军屡次出援被歼，这次是否还会上钩没有把握。10月23日深夜，我军对周城发起猛攻后，很快突入镇里，分割包围各碉堡，将敌一一歼灭。周城方面的激烈枪声，使躲在南渡的伪团长牟新我大吃一惊。他原以为自己的防区工事坚固，加之东边溧阳城驻有伪军第二师的师部，北面有伪军第二师第六团，新四军怎么敢来攻？当他得知新四军攻势猛烈，决非小股游击队，很怕出援中了伏兵，不敢轻举妄动。可是，周城的部下呼救，溧阳的上司督责，他要按兵不动也不行，一直捱到天亮，他才仗着一小队日军壮胆，拖了两门曲射炮，率部出援。24日上午9时许，周城的攻击战已近尾声，突然，在我四十六团设伏部队的后侧响起了密集的枪声，牟新我所率部队顺着一条大堤偷偷摸摸绕到了我军的侧背。此时，我军早已把渡口封死，使牟新我陷于进

退两难的境地。我四十六团各路伏击部队在号声中发起冲锋，将敌人逼进一片圩塘里。我指战员奋勇向前，展开了缴枪和捉俘虏比赛，将牟新我及两门曲射炮缴获。只有一小队日军抓住一群小学生作掩护逃回南渡。与此同时，我四十七团在社渚、周城之间截获了伪军第四团副团长兼一营营长陈劲飞及随行的一个连，留在社渚的残敌还没等四十七团赶去围歼，已作鸟兽散。周城战役打了10多个小时，全歼伪军一个团，生俘正副团长以下700多人，缴获曲射炮两门、轻重机枪22挺、步枪400多枝，还有短枪、子弹及大量其他军用物资。经此一战，溧阳地区日伪军迅即从太湖沿边据点撤走以收缩兵力，防止我攻打溧阳城。至此，我溧高和郎广两地南北贯通，连成一片，为尔后向浙江天目山发展，创造了条件。

12月14日，我十六旅乘胜攻克宣城长兴公路上的重镇泗安。泗安镇敌筑有坚固防御工事，镇外围有几道障碍，密布的碉堡之间有地道相通。守敌是不久前从苏中南调的伪军三十四师一三四团。14日晚，我四十八团一、二营冒着鹅毛大雪发起进攻。一营首先从镇北摧毁敌碉堡四座，突入泗安镇中心，二营从南面直捣伪军核心工事，全歼伪团部及集训营。天亮以后，两个营配合向中心碉堡发起总攻，以猛烈炮火摧毁大小碉堡22座，俘伪军400余人，我军伤亡排长以下指战员20人。延安《解放日报》在头版刊登题为《攻克泗安——新四军真似活神兵》的消息，详细介绍了我旅攻打泗安的经过。

回顾1944年全年，我军在苏南作战1242次，取得了巨

大胜利。先后毙伤日伪军6700余人，攻克据点80处，缴获大批装备。正像《游击队员之歌》里唱的，"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敌人为我们源源不断地提供了武器装备。仅武器一项，就包括大小炮6门，轻重机枪130挺，掷弹筒15个，各种枪支4490余枝。到年底，苏南我主力和地方武装已发展到12700人，民兵24000人，自卫队14万余人，其中四十八团有四个步兵营、一个炮兵连和一个重机枪连，共4000余人。而在皖南事变后我六师成立之初，一个团有1000人就是了不得了。至此，苏南军民实现了党赋予的"向南巩固"的战略任务，为后来继续向南发展开辟了前进基地。

第十一章　南下苏浙皖边区

一　天目山反顽战役

1944年秋，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共中央提出了“以我为主，准备反攻”的主导方针，要求新四军派主力部队南下，发展东南沿海地区，造成配合盟军在中国东南沿海登陆作战的有利态势。11月20日，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作出发展东南的具体部署是，由粟裕同志率新四军一师三旅及一批党政干部渡江南下，会合十六旅向浙江发展，并打通与新四军浙东纵队的联络。粟裕以华中局代表名义，统一指挥苏南和浙江两块根据地的党政军工作。不久，粟裕、刘先胜、陶勇、阮英平等人分别率部南来，到达浙江长兴县槐花砌、邱峰岕一带与我十六旅会合。

粟司令员率师南来，苏南军民莫不欢欣鼓舞。当时《苏南报》的一篇题为《欢迎三纵队》的文章，说出了人们的心里话：“江南根据地的创造与建设，是与粟司令和三纵队的名字分不开的。1937年底淞沪沦陷后，日寇西犯，国民党数十

万大军仓皇败退，国民党政府官吏纷纷弃职潜逃或投敌伪化，整个江南沦于敌手。那时粟司令率部东进，首战韦岗，痛歼日寇，稳定了动荡局面，振奋了江南人心。接着有新丰、句容、延陵诸战斗，将广大失地次第收复，开辟与创造了江南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基础。"我个人对粟司令员的到来，更是由衷的高兴。他是我们新四军的名将，在他直接领导下，可以更好地工作和战斗了。

1945 年 1 月 13 日，即粟司令员率部到达长兴的第三天，新四军奉中央军委命令，决定建立苏浙军区，并对苏浙皖边区的部队进行整编。粟裕任苏浙军区司令员，谭震林任政治委员(未到职)，刘先胜任参谋长，钟期光任政治部副主任。我十六旅改编为第一纵队，王必成任司令员，我任政治委员，陈铁君任参谋长，刘文学任政治部主任，原来的四十八团、四十六团和四十七团，分别改编为第一、第二、第三支队，共 8000 余人。新四军浙东纵队改编为第二纵队，何克希任司令员，谭启龙任政治委员，刘亨云任参谋长，张文碧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第四、第五、第六支队，共 10000 余人。南来的一师三旅改编为第三纵队，陶勇任司令员，阮英平任政治委员，梅嘉生任参谋长，彭德清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第七、第八、第九支队，共 7000 余人。此外，苏南地方武装改编为两个军分区。一分区由熊兆仁任副司令员，陈光任政治委员，下辖独立一团、独立三团及七个县总队；二分区由杨洪才任副司令员，陈立平任政治委员，陈茂辉任参谋长，下辖独立二团及七个县总队。

2 月 5 日，苏浙军区成立大会在长兴温塘村举行，粟司

令员在庆祝大会上号召苏浙军区全体指战员团结一致，竭尽一切力量，完成党中央赋予的准备反攻，驱逐日军，夺取抗战最后胜利的伟大历史任务。我和三纵队政委阮英平分别代表两支部队指战员发言，坚决拥护军区的统一领导，发扬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加强军政、军民和兄弟部队间的团结，为解放苏浙人民而英勇奋斗！

2月10日，部队按照军区的部署开始行动。当时，第一个目标是进占浙西莫干山地区。沿途顶风冒雪，跋山涉水，粉碎了安吉、梅溪等地日伪军的“扫荡”，迫使日伪纷纷弃守据点。14日，我一纵一支队进占德清县城，二支队进占武康县城。我们还派出工作队发动群众，建立政权，迅速开辟莫干山地区。与此同时，三纵为配合我们行动，也进至宣长公路以南地区。当顽军发现我一纵远在莫干山地区，而广德以南仅有三纵队第七支队时，即乘机集结六十二师和“忠救军”共五个团兵力围攻七支队。从2月15日起，我三纵队与顽军激战于广德南部景坞里以南、丁岭以北一带阵地。我们接到增援的命令后，除留两个营坚持莫干山区以外，主力挥戈西进，参加自卫反击战。顽军在我夹击之下，于17日凌晨向南溃退。我一纵一支队乘胜追击，在孝丰以北的塔山歼灭顽军六十二师一八四团残部。接着于17日午后13时攻占孝丰。第二天，我一纵、三纵相互配合，将“忠救军”一部会歼于西圩市、渔溪口、大小杭垓一线。顽军残部向天目山区逃窜。此役后来被称为第一次天目山反顽战役，共歼顽军1700余人。

在此次战役中，我军果断地攻占孝丰城的战斗，打得十

分出色。那时，国民党第三战区曾在天目山地区修筑了大量碉堡和工事，建立起所谓“深沟高垒”的防线。我军则缺乏攻坚的武器装备，因此，苏浙军区确定了“野战为主，攻坚为辅”的战术指导原则，即以运动战的战术，调动顽军离开他们所据守的防御工事，将其歼灭，尽量避免因攻坚而遭受不必要的伤亡。2月17日上午，我们接到一支队追击顽军，攻占孝丰以北塔山岭的报告，并说塔山岭下有一条路直通孝丰，山坡上有顽军的大碉堡和散兵坑，请示是否继续前进。我们对照作战地图研究，王必成司令员说，孝丰城的顽军已被我们调虎离山了，现在兵力空虚，军心动摇，正是我们拿下它的好时机。江政委，你看行不行？我说，我完全同意王司令员的意见。我们要在天目山开辟战场，取得机动，孝丰城是横亘在我们前进道路上的第一个关隘。现在乘势拿下，就扫除了这个障碍。我们当即决定，王司令员和陈铁军参谋长赶到前线指挥夺孝丰，我向粟司令员报告。王司令员到前线后听取了叶藻营长的汇报，又亲自观察了地形和顽军部署，随后命令部队迅速占据前进通道，敲掉山坡上的碉堡，掩护后续部队夺取孝丰。在王司令员亲自指挥下，我军以猛虎下山之势炸毁了顽军的碉堡群，山头上顽军火力也在我炮火压制下大大减弱，被震慑住的顽军纷纷向后逃窜。我纵队乘胜解放了孝丰城。粟司令员接到我们已攻占孝丰城的电报后，非常高兴，立即回电嘉奖。的确，孝丰一仗，对尔后天目山战局的发展关系重大，为其后再次夺取天目山反顽战役的胜利扫除了阻碍。

第一次天目山反顽战役胜利后，我军控制了天目山以

北地区。国民党顽固派不甘心失败，调集了包括五十二师、六十二师、一九二师、"忠救军"、"挺进军"一纵队、浙江保安四纵队在内的共12个团的顽军，向我军发起第二次攻势，企图夺回孝丰城，逼我向北退却。在粟司令员的指挥下，我军采取"北面防御，南面攻击"，"诱敌深入，围歼敌人"的战术。第三纵队在孝丰城西北英勇阻击"忠救军"的进攻，我一纵队除一部参加阻击外，第一、二支队主力在西南方向对顽军实施反击。3月6日夜，将进占渔溪口、西圩市的"忠救军"击溃。7日，我军在完成总部署以后，全线出击，对孝丰西南的顽五十二师和一九二师各一个团实行分割包围，歼灭其6个营兵力，缴获轻重机枪60余挺，迫击炮4门，长短枪600余枝。尤其是重创了皖南事变中顽军急先锋五十二师，我军指战员无不拍手称快。3月10日，我一纵队乘胜扩大战果，分三路猛追南逃之敌。12日，一支队占领章村、孔夫关；二支队攻占羊角岭；三支队和独立二团向东扫荡顽军残部。尔后，我纵队又乘胜进占西天目山，解放了临安县城，取得了第二次反顽战役的重大胜利。截至3月底，我军在浙西控制了纵横各100余公里的广大地区，解放了100多万人口，并打通了浙西与浙东的联系。

二　新区政治工作

苏浙军区成立之初，我任第一纵队政委的同时，仍兼着

苏南区党委书记和苏南行署主任两个职务。当部队南进天目山后，我已无法顾及苏南根据地的党政工作，曾多次向粟裕同志提出辞去兼职，专任部队工作的请求。天目山第二次反顽战役后，华中局批准了我的请求，改由吴仲超任苏南区党委书记兼苏南行政公署主任。此后直到全国解放的五年时间内，我一直从事部队的政治工作。我觉得，对于一个党员干部来说，能否正确对待个人职务的变动，这是党性强不强的表现。无论是升职、平调还是降职，都应毫不犹豫地服从组织安排。当年我们许多领导干部在地方上和部队里威信都比较高，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以身作则，不计个人得失，不问职务高低，服从革命的需要。所谓"威信"，主要是由"信"来建立"威"，而不是以"威"去建立"信"。靠摆官架子和发号施令，是建立不了真正的威信的。

经过两次天目山反顽战役，扩大了苏浙皖解放区和我党我军的政治影响。由于天目山地区是国民党军长期盘踞的地区，我军基本上属于外线大兵团作战，在战局急剧演变的情况下，部队难免出现这样那样的思想问题。我们遵照上级指示，在纵队党委的统一部署下，抓住第二次反顽战役以后间歇，总结经验，整训部队，开展了形势教育、政策教育。

当时，部队一些干部、战士认为，天目山不是沦陷区，我们跑到这里来干什么？实际上反映了有些指战员留恋经营多年的苏南根据地，不愿意离乡离土。论生活给养，确实苏南根据地比天目山区要好。所以还要用大道理来管小道理。我们从敌顽我三角斗争的形势来反复说明进军东南沿海地区的目的是配合盟军登陆作战，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虽然这一计划还未实行，但浙江下一步很可能成为敌顽激烈争夺的战略地带。日本人不让我们来，顽固派阻挠我们来，我们偏要来。我们控制了天目山，就有了在京沪杭甬敌后坚持抗战的更巩固的基地，顽固派就不敢轻易到苏南老解放区制造摩擦。一旦盟军登陆，我们就可以就近配合作战，狠狠打击日本侵略者。记得我在孝丰西市街召开的一支队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说过：有人说天目山不好，钻在山里吃不饱。照我看来，缴几千条枪、几十门炮，还抵不上一个天目山。我军控制了天目山，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如虎添翼，如鱼得水，是战略上的伟大胜利。我们的部队有个好处，只要道理讲清楚，就会自己化解怪话牢骚，服从命令听指挥。经过这一番形势教育，全纵队上上下下统一了认识，个个摩拳擦掌，决心在天目山区再打几个胜仗。

我们进军天目山，开辟新解放区，遇到许多政策性的新问题。首先是什么人算汉奸，如何处理敌产，政策界限不清楚，一度出现乱捉人、乱没收等违法乱纪现象。天目山区不是沦陷区，但孝丰城是沦陷过的。我们打下孝丰城后，进城部队对城里的一家肥皂厂和一个造纸作坊，尚未弄清究竟是不是汉奸开的，就当作敌产擅自没收，并把这个厂子和作坊给破坏了。等我们纠正过来，要业主恢复生产时，业主说还得耽搁时间，花钱修理机器，造成无谓的损失。还有随便捕捉“汉奸”，一时闹得孝丰城中上层人士人心惶惶。更严重的是，有些家在国民党县政府或区政府附近的群众，房屋被搜查，财物被“没收”，说是“好人不会住在那里，不是好人的东西当然要没收！”至于把属于国民党政府的办公桌椅、沙

发等砸光，更认为是“理所当然”，有人还乘机浑水摸鱼，发“洋财”。

上述混乱现象，引起了粟裕司令员的严重注意。第二次天目山反顽战役刚结束，粟司令员就召集第一、三纵队负责人会议，对各地出现的违纪行为进行了严肃的批评。他说，由于执行政策上不注意，影响了我们进军天目山三个月以来的工作。他要求用三个月的时间进行整顿，从实际行动上加以纠正，以便挽回政治影响，树立我党我军在天目山地区的威信。我一纵党委认真讨论了粟司令员的指示，决定：(一) 全纵队从上到下对进军天目山以来的政策执行情况普遍作一次全面检查；(二) 捕人和没收财物必须经过支队以上政治机关批准；(三) 没收的财物，全部登记造册报纵队政治部，听候统一处理，任何单位、任何个人不得自行处理或据为己有；(四) 没收群众的财物，全部发还；(五) 有禁不止，继续违法乱纪的，查明属实后严肃处理。按照这几条规定，我们组织力量，在上层人士和群众中开展工作，宣传新四军的宗旨，讲解我们进军天目山的目的，并对前一时期部队某些违反群众纪律的现象表示歉意，挽回政治影响；同时在部队内部进行政策教育，层层检查政策执行情况，贯彻落实纵队党委作出的规定。我作为政治委员，在纵队大小会议上作了多次讲话，对于执行政策上出现的一些问题，首先承担责任，并要求纵队全体指战员自觉地坚决地贯彻执行粟司令员的指示。经过反复工作，全纵指战员以严格执行政策、遵纪爱民的实际行动，赢得了天目山区人民群众的信赖和爱戴。

进军天目山区遇到的另一个突出问题是如何对待俘虏兵。在苏南敌后期间，我们已经有一套宽待俘虏的政策，执行得很成功。但是在天目山反顽战役中抓到的俘虏，有不少属于"忠义救国军"，这是国民党特务总头目戴笠控制的部队，反共坚决，残害人民极端凶狠，对这些俘虏实行宽大政策，不仅很多战士想不通，有些班、排干部也想不通。但这个问题必须解决。因为蒋介石老家在浙江，军统头目戴笠、中统头目陈立夫兄弟，都是浙江人，浙江可以说特务如麻，特务直接控制的部队，除"忠救军"，还有"挺进军"、"国际突击营"等等。我们要在天目山站住脚，进而经营整个浙西、浙东，就必须同这些特务控制，或者带有特务性质的部队打交道。所以纵队党委决定，把检查落实俘虏政策，作为政策教育的重点之一。我几乎逢会必讲不折不扣执行俘虏政策的重要性、必要性，要求广大指战员对被俘士兵和军官，都必须讲政策。经过反复教育，连队对新俘虏来的"解放战士"，不搞"坦白反省"，而是从生活上关心他们，从实际接触中增加对他们的了解。许多老战士也能平等对待"解放战士"，并启发和引导这些"解放战士"从两种军队、两种遭遇的对比中逐步提高觉悟。机枪连有个"解放战士"就主动讲了被俘之前曾接受过特工任务，把收藏着的一张通用四乡的"通行证"拿出来烧掉了。当然，也不是所有"解放战士"都能用关心生活这把钥匙打得开心里这把锁的。国民党"国际突击营"官兵，一般都有相当文化，给养又比较好，有些人当了俘虏并不服气，对他们的生活关心还看不上眼。这就必须晓之以理，讲天下大势，讲战争性质等"大道理"。只要把道理讲

透了，他们一般都还是能接受的。我们对俘虏坚决执行宽大政策，收到了积极的效果，其政治影响尤其不可低估。一些国民党官兵看到我们对"忠救军"、"突击营"这样的俘虏尚且讲政策，这就打消了原有的疑虑，促使他们相信共产党、新四军说话是算数的。第二次天目山反顽战役中，国民党"挺进军"一纵队政训主任在看了我苏浙军区印发的《告挺进军官兵书》以后，就弃暗投明，主动来归；该部一位军医主任还挑了一担西医器材、药品前来投奔我军，就是很好的证明。

进军天目山，第一、第二两次反顽战役的军事战果固然很大，而经过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的磨练，我一纵全体指战员政治和政策思想水平有很大的提高，这是长期起作用的更宝贵的战果。在即将到来的新登战役，天目山第三次反顽战役，直至尔后的整个解放战争中，我一纵指战员始终以模范地执行党的政策和纪律严明、拥政爱民、艰苦朴素、英勇善战著称。所有这些，都是同我们坚持不懈地做好政治思想工作分不开的。

三　直捣新登，三战天目

第二次天目山反顽战役以后，叶飞同志率新四军第一师第一旅主力及高邮独立团等部来到天目山地区，出任苏浙军区副司令员。其部队改编为第四纵队，由廖政国任司令

员，韦一平任政治委员，夏光任参谋长，曾如清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第十、第十一、第十二支队，共6000余人。随同南来的还有淮海和苏中两个根据地的地方干部金明、张彦，朱克靖等100余人。他们的到来进一步加强了我党我军发展东南地区的力量。华中局这时下达了我们三大任务：(一)发展全浙，打开东南局面；(二)普遍开展苏南、浙西敌后游击战争，深入巩固江南各根据地；(三)加强京、沪、杭各大城市与交通要道工作。为此，苏浙军区决定四纵派一个团东渡富春江，开辟富春江以东至金(华)萧(山)以西地区，并打通与浙东第二纵队的联系。

此时，国民党第三战区当局也在调兵遣将，磨刀霍霍向我扑来。在他们制订的《东南战场作战计划》中竟声称："以剿灭奸匪接应盟军登陆为主要任务……集结必要兵力，配合党政地方武力、敌后游击部队及运用伪军，限制奸匪之活动区域而逐次剿灭之。"其勾结敌伪，破坏抗日，破坏配合盟军作战的努力，妄图消灭我共产党及党领导下人民武装力量的罪恶阴谋，昭然若揭。按照上述阴谋计划，国民党顽固派于5月22日急调第七十九师开进新登城，以堵截我东渡富春江的四纵十支队。在这种形势下，爆发了新登战役。

新登位于杭州至桐庐公路的中段，南濒富春江，北接天目山，向东直下杭嘉湖，乃军事要冲之地，故国民党派兵固守，采取十年内战"围剿"红军的办法，在城内外修筑了大批碉堡群。我苏浙军区成立了前线指挥所，由叶飞、王必成、陶勇和我组成，以一纵一支队、特务营，三纵七支队和四纵十支队共7000余兵力，三路进攻新登。我一纵一支队和特务

营在中路担任主攻，第一个目标是拿下大岭和小岭。这是通向新登的要道，两侧高山间只有一条路，顽军在山上及路口的凉亭筑有碉堡，挡住去路。我一支队和特务营于5月29日下午开始行动，首先抢占凉亭北面的高山，以重机枪压制顽军碉堡的火力。入夜，大雨滂沱。我军乘其不备，派爆破队冒雨出击，以手榴弹炸毁了顽军碉堡。30日拂晓，攻占顽军大岭阵地，接着又乘胜攻占了小岭。31日，顽军为夺回小岭阵地，出动数连兵力偷袭我军，终于进入我军伏击圈，全部被歼。是日下午，我纵一支队和特务营又投入争夺松溪北面前哨阵地的战斗，激战竟日，拿下上云山、下云山要隘。6月1日，占领松溪。右翼我军同时占领永昌，左翼我军扫清了新登外围顽军。新登北门完全暴露于我军面前。

前线指挥所接到战报，立即下达攻城命令，主攻任务交给我一纵一支队，第七、第十支队配合攻城。6月1日下午15时许，我们在松溪村外的小山坡上召开了一支队营以上干部会议。王必成司令员部署了攻城任务：二营主攻，三营拔除城东山岭上的据点，特务营随三营跟进，一营作预备队。约定各营攻占目标后，举火为号。入夜以后，各营开始了行动。三营拔除城东据点的战斗很顺利。当他们举火为号时，二营五连突击分队还被顽军火力封锁在护城河桥北端。顽军居高临下，护城河里又有大量鹿砦，我军掩护进攻用的重机枪又被顽军地雷炸坏。在这危急关头，五连一面用火力迎击顽军，一面奋勇冲过护城河，架起人梯，奋不顾身攀登城墙。二营教导员陈浩身先士卒，带伤指挥攻城，终于在6月2日凌晨4时攻入北门，点燃了火把。接着，二营各

连继续向城内顽军据点攻击，清理战场，捕捉俘虏，天亮时全部控制了新登城。三营看到二营突破城防的信号后，立即挥戈向西，攻占了城西北的雉鸡山高地，保障了新登城右翼的安全。上午，我军前线指挥所进驻新登城。我们一面抓紧排除地雷、安葬烈士、处理俘虏，一面张贴安民告示。当天下午，城内就有商店恢复营业，避居在外的居民也开始陆续返回城里。我军良好的军风军纪受到了新登市民的赞扬。

攻克新登城以后，我一纵一支队又与兄弟部队一起投入了保卫新登城的战斗。我一支队在新登城西南的虎山多路穿插，佯攻巧取，摧毁了顽军碉堡，控制了制高点。6月3日，全部美械装备，经英国教官训练的国民党"国际突击总队"第一纵队五个营共6000余兵力来犯，与我军在新登城西南展开激烈的争夺战。

令人十分惋惜的是，我一支队支队长刘别生在战斗开始时中冷枪牺牲。刘别生1928年参加红军，1929年入团，1934年转为中共党员，在湘赣边区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新四军成立以后，他先后任连指导员、副营长、军部特务营营长等职。在皖南事变中，刘别生担任军部特务团团长兼参谋长之职，率98位同志突围到达江北根据地，任一师二旅四团团长。1942年底，二旅与十六旅合编，刘别生任十六旅四十八团团长。此后的两年多时间里，他率部驰骋苏南敌后战场，屡建奇功，是我旅（纵队）最优秀的团级指挥员之一。他的牺牲，激起了一支队全体指战员无比的阶级仇恨，决心与来犯之敌决一死战，为刘别生支队长报仇。

我们根据顽军突击总队第一纵队地形不熟、狂妄自大

等弱点，与陶勇同志拟定了偷袭其司令部的计划。我一支队以小部队摆出进攻态势，又开枪又吹号，吸引顽军的炮火；而以大部兵力协同七支队主力于3日夜翻山越岭，一举捣毁了位于西山村的顽军突击总队第一纵队司令部，打伤其副司令王理真，打乱了顽军的指挥与联络。我兄弟部队同时击溃了突总一纵两个营，缴获大批武器弹药，还俘虏一批顽军。

此时，国民党第三战区当局又调集大批援军向新登反扑，粟司令员果断决定撤离新登。6月4日傍晚，我和王必成同志到五里桥向部队传达了粟司令员的命令。当晚，我新登战役各参战部队迅即主动撤向天目山区。新登战役既是一场攻坚的硬仗，又是一场守备的硬仗，顽军兵力三倍于我，装备也远较我为精良，我一纵与兄弟部队密切配合，英勇作战，终于战胜顽敌，摧毁其碉堡300余个，毙伤顽军1500余名，俘虏700余名，这是我军南进浙西的一次很大的胜利。

我进军天目山，除了有大批顽军挡路以外，还有一个很大的困难就是"缺粮"。天目山是缺粮山区，历来要靠皖南运进粮食。我军进入天目山后，国民党第三战区当局立即部署切断皖南宁国粮道，封锁禁运粮食，山区粮食更加紧张。

应该说，我们进军天目山，苏南老区人民为解决军粮，作了很大贡献。第一次天目山反顽战役时，仅我一纵队就有随军民工300多人；第二次反顽战役时，民工多达2000多人。民工们连续20多天，翻山越岭，为部队运送粮食。郎广地区也动员了100余民工，300多条驴子，日夜给我们前方

送粮。但是，短期作战可以靠后方运粮，大兵团远离根据地长期作战，靠后方肩挑驴驮军粮，困难就大了。此时，老区群众罄其所有支援部队，有些群众自己在吃青草，军粮不继成了我大部队行军作战的极大妨碍。我一纵在新登战役中，就曾一度断炊。在此情况下，顽军还在大举向我进攻。情势急迫，不宜恋战，粟司令员下决心修改原定计划，暂时放弃天目山，分兵就食，巩固苏南老解放区，开辟杭嘉湖地区。6月15日，我军主力撤离天目山，向孝丰以北地区转移。国民党第三战区将我军的退让当成是"溃退"，出动14个师的兵力，组成左右两个兵团，向孝丰城急进。其左兵团辖第五十二师、独立三十三旅和第一四六师一部，自于潜、宁国之线向东北进攻；其右兵团辖突击总队第一、第二纵队，第七十九师，自临安向北进攻；又以第一九二师、第六十二师和"忠救军"三个纵队等部进占天目山，构筑工事固守以为后援。苏浙军区根据顽军兵力分散、求胜心切的情况，决定在孝丰附近组织新的战役，以求歼灭其一部，挫败其攻势。于是，从6月19日至23日，举行了第三次天目山反顽战役。

在这次战役中，我们认真总结和吸取了前两次天目山反顽战役的经验，运用"诱敌深入，围歼敌人"，"集中兵力，以多胜少"，以及迂回、包围、奇袭等山地战术原则，取得了很大成功。战役开始前，我一纵三个支队会同三纵、四纵共七个支队，隐蔽集结于孝丰西北地区，孝丰城正面仅留第八、第十支队和独立二团。当顽军左兵团第五十二师进抵我预定的红庙、新桥一线时，我一纵立即以三个支队兵力围歼其一五四团；三纵、四纵以三个支队兵力围歼其一五五团。

我记得一纵的具体部署是，特务团2000余人打红庙敌一个营；二支队2000余人打新桥敌一个营，另以一支队一部阻击白步山敌一个营。第二天，我们又增派一支队的一个营，还有纵队警卫连，都扑了上去。这样，我们就占了绝对的兵力优势。同时，我们根据山地地形复杂的特点，发挥我军善于夜战的优势，趁黑以突然动作接近顽军阵地，打得顽军措手不及。经一昼夜激战，我一纵全歼顽五十二师主力第一五四团，三纵、四纵全歼其另一主力团第一五五团。我军在歼灭顽五十二师后，发扬英勇顽强、连续作战的精神，全力回击顽军右兵团。6月21日晚，我一纵由报福镇向东南迂回，与兄弟纵队一起，将顽军右兵团紧紧包围在草明山、白水湾、港口、井村的狭小山谷地带。我军大胆穿插分割，勇猛冲杀，于22日发起总攻。我一纵指战员忍饥耐渴，阻击顽军突一纵队突围，一支队连续击退顽军九次反扑，二支队和三支队一营击退顽军进攻并攻占草明山。顽军溃逃时，又遭我伏击，数十挺轻重机枪都打响了，毙伤顽军千余名。兄弟纵队也歼灭了顽军突二纵队及七十九师大部。至此，孝丰之战也以我军大获全胜而结束。

在第三次天目山反顽战役中，我军共歼顽军6800余人，击毙突一纵队司令胡旭盱，七十九师参谋长罗先觉，五十二师副师长韩法致等11名团以上军官，缴获各种炮17门，轻重机枪129挺，以及大批军用物资，是三次天目山反顽战役中战果最辉煌的一次。要不是粮食供应不上，战果还会更大。在战斗中，我军也付出了代价。我一纵二支队政委丁麟章就是在此次战役中英勇牺牲的。他是政工干部的楷

模，每次作战总是身先士卒，不仅鼓励战士英勇作战，而且以身作则，冲锋在前，真是集言教、身教于一身的出色的政治工作干部。

四　喜迎胜利扫残敌

第三次天目山反顽战役结束后，苏浙军区各纵队按既定计划撤离天目山地区。第一步撤至宣长公路以北地区休整。

时值 1945 年 7 月上旬，我一纵回到了离开半年之久的苏南老解放区，军民重逢，喜不胜言，又逢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闭幕的消息传来，我们在欢庆“七大”的同时，抓紧在全纵开展军政教育和军事训练，部署学习“七大”文件，总结南下作战经验，掀起了拥干爱兵、拥政爱民和技术练兵的热潮。由于南下作战过程中部队补充了大批俘虏和新的兵员，所以还专门进行了一段时间的团结教育工作。部队装备更加齐整，精神面貌焕然一新。苏浙军区为使我军在即将到来的战略反攻中处于更加有利的地位，要求我一纵进一步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8 月上旬，一纵在苏南一分区部队的配合下，在高淳发起了东坝战役。

高淳是日军推行伪化政策的重点地区。伪独立第十五旅胡冠军部乘我军南进天目山之机，于 5、6 月间进占高淳一带，在东起溧阳社渚、梅渚，西至宣城狸桥、水阳一线修筑

工事，遏制我军向南发展。我一纵决心扫除这个障碍。具体部署是，二支队及溧高地方武装攻击东坝、定埠、漕塘、固城、下坝之敌；三支队及宣当地方武装在左翼攻击狸头桥、塔山一线之敌；一支队在右翼攻击社渚、梅渚之敌。8月7日晚，各参战部队进入预定地点，午夜23时向敌军发起总攻击。第一仗是东坝之战，二支队一营首先攻克了东坝镇北的降福殿伪军据点，歼灭伪军两个连。接着，二营向工事坚固的淮阳祠堂发起猛烈攻势，全歼伪军一个营。三营先后攻克东坝以西的固城、漕塘两个伪军据点，歼灭伪军一个连。

第二仗是狸头桥之战。狸头桥、塔山、韦村、郑村等地驻扎伪军第一八九团1000余人。8月7日，三支队分三路进攻敌军。一营在扫清了狸头桥外围守敌后，直插街心，攻占徐家祠堂，接着又连下镇上的几个碉堡；二营向耕井巷守敌发起攻击，全歼守敌两个连，并击退从水阳来援的伪军第一八八团。8月9日，三支队在宣当人民自卫总队配合下，向狸头桥镇上的伪军一八九团团部发起总攻。突击队员顶着用桌子和棉被制成的“土坦克”，冲过石板桥，经两小时激战，攻入伪团部。此战全歼伪一八九团1000余人，缴获迫击炮4门，轻重机枪42挺，长短枪800余枝。

第三仗是定埠之战。8月9日，溧高县地方武装包围了定埠伪军据点。伪军依托坚固碉堡进行顽抗。二支队闻讯后，即派主力携带炮兵增援。在我炮火打击下，两连伪军举起白旗投降。

第四仗是溧桥之战。苏南一分区特务营在群众支援下，架浮桥攻入溧桥镇，分头攻打镇内各碉堡。在我炮火掩护

下，战士们把手榴弹绑在竹竿上伸进碉堡机枪口内爆炸，歼伪军两个连，生俘日军十几人。

第五仗是游山之战。伪军游山据点居高临下，三面峭壁，一面斜坡，易守难攻。我溧高独立团和溧阳警卫团连攻两日不下。8月9日，二支队主力赶来增援。我军以炮火击中伪军据点，压制其火力，再兵分三路发起强攻。同时利用被俘的伪营长向据点喊话，展开政治攻势。伪军走投无路，只好投降。与此同时，一支队在右翼的攻势也连连告捷。

此次东坝战役打了五仗，总计摧毁日伪军据点50余处，歼日伪军1800余人，解放了苏皖边区多个市镇，成为苏南战略反攻的第一战役。

其时，太平洋战争形势急转直下。8月6日，美军在日本广岛投掷第一颗原子弹。8日，苏联红军出兵中国东北。9日，美军在日本长崎投下第二颗原子弹。10日，日本政府发出乞降照会。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我们在敌后坚持了长达八年的抗战，终于取得了最后胜利，欣喜之情确实难以形容。记得杜甫在一首题为《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的诗里有这么几句："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我们刚听到日本投降的消息，欣喜若狂，就是这么个心情。

但是，和平的话音未落，日伪顽合流，反共的硝烟又起。蒋介石于8月11日连发了三道命令，一是要八路军、新四军原地驻防待命；二是要国民党军积极推进；三是要伪军负责维持地方治安。接着，他突击加封了大批汉奸，如伪上海市长周佛海当上了国民党军委会上海行动总指挥，伪江苏

省长任援道成了南京先遣军司令，命令日伪军守卫江南大中城市和交通线，拒绝向新四军投降。蒋介石依仗美军的支持，连日空运大批部队，抢占沿海各大城市。

在此形势下，苏浙军区根据上级指示，审时度势，将原定夺取京、沪、杭的计划，改为就地向四周发展，夺取县城、集镇和广大乡村，准备长期坚持斗争。据此，我们一方面紧急进行政治动员，要求全纵指战员树立整体观念，服从统一指挥，准备继续战斗；一方面要求地方党政机关继续以支援部队作战为中心，围绕中心做好城镇接管和新区开辟工作。

这时，日伪军仗着蒋介石的三道命令，重新壮了胆，蠢蠢欲动，欲作垂死挣扎。第一起公然向我苏浙军区新四军寻衅的是驻扎在句容城里的日伪军，共出动1400余人，于8月14日向溧水地区发起“扫荡”，妄图阻挠我军向南京挺进。我们接到情报后，立即动员群众做好反“扫荡”的准备，同时部署了诱敌深入的歼敌计划。我一纵一支队和苏南一分区特务营接到命令，即以一连兵力引诱敌军，将主力部署在回峰山西南经巷一带。当敌军进入我伏击圈后，一支队一营立即予以迎头痛击。敌军发现我军二、三两营正向北迂回包围，慌忙收缩兵力，但为时已晚。我一支队特务营和一分区特务营像两把利刀，将敌拦腰切成两段，分别包围在杜巷和张家岗两地。被围困在杜巷的有400余伪军，被围困在张家岗的有日军两个中队和伪军200余人。两地的敌军人数虽差不多，但张家岗村落较大，易守难攻，而且有两个中队日军。于是，我们在接到一支队的报告后，命令他们先打弱敌，再打强敌。果然，打杜巷敌军仅用一个多小时就彻底干

净地解决了战斗。而张家岗之敌则凭借有利地形和优势火力，负隅顽抗，企图寻机逃脱。随后，我军调整部署，由二营机炮连从西北方向主攻。15日晚，二营突破敌军防线，攻入村内，一营也由村东南突进村中，敌军遭我军南北夹击，准备逃跑。我军欲擒故纵，撤去对张家岗的包围，一分区特务营在敌军逃跑的必经之路蒋家坝布下伏击圈。敌军果然逃至蒋家坝坝头上。我轻重武器一齐开火，敌军死伤过半，其余全部被俘。

8月19日，我苏浙军区一纵队又向金坛、溧阳两城拒降的日伪军发起攻击。一支队经一昼夜激战，解放了金坛县城和朱林镇。日伪军逃至金坛和武进两县交界处的夏溪镇，向国民党地方当局投降。我一支队在地方武装配合下，于8月23日采取行动，将这股伪顽合流的武装全部解决，毙伤敌200余人，俘虏700余人，收缴了大批枪支弹药和军需装备。与此同时，我一纵二、三支队在溧阳地方武装配合下，向敌军重兵防守的溧阳城发起进攻，歼灭伪第一方面军第二师师部及官兵1000余人，缴获炮4门，各种枪支800余枝，日军一个大队逃往宜兴城。兄弟纵队也在苏浙皖边区发动强大攻势，解放了长兴、安吉、郎溪、广德、高淳等县城。

至此，只剩宜兴县城的日伪军拒不投降。如果强攻，将造成我军较大伤亡。我向陶勇同志建议，放开一面，让敌军逃跑，再在途中歼灭之。陶司令员采纳我的意见，部署三纵七支队在东横塘河的洋溪镇一带设伏。9月12日，无锡日军出动汽艇到宜兴城接应日军撤离，行至洋溪渡口，即被我军包围，激战两小时，歼敌60余人，生俘日军山本大佐以下

39 人。宜兴城日军内无粮草，外无援兵，被迫放下武器投降。我军同意其徒手撤往无锡、常州。这样，苏浙军区在苏南抗战的最后一仗，便以宜兴的解放而告结束。

第十二章 投入解放战争

一 北撤苏中

1945年8、9月间，正当我苏浙抗日军民向拒不缴械的日伪军发起猛烈攻势，解放了大片国土之时，中共中央军委和新四军军部下达命令，要求苏浙军区的部队立即北撤，越快越好。这是在中共中央决定由毛泽东、周恩来等组成中共代表团飞赴重庆，同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的形势下，按照中央制定的“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作出的决定。为此，新四军三师、八路军山东部队奉命进军东北，我苏浙军区部队北撤后将一分为二：一纵、三纵转移苏中；二纵、四纵北上山东。

我各纵队指战员对撤离苏南解放区依依不舍。从进军敌后，开辟茅山，到坚守根据地，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八年抗战，有多少战友在这块土地上喋血牺牲！我们及时地进行了形势教育，帮助广大指战员弄通思想，着眼大局，使

大家懂得，北撤是我党我军为实现和平建国的愿望所作出的重大让步，党中央、毛主席成竹在胸，制定了保卫人民胜利果实的正确方针，从而提高了全军上下坚决执行北撤命令的自觉性。

是年9月1日，中共中央华中局决定，将原苏南、浙西两个区党委合并，成立苏浙区党委，粟裕、金明分任正、副书记，粟裕、金明、吴仲超、叶飞和我为常委。苏浙区党委的原定任务是，加强党在苏浙皖边区的领导，深入开展根据地的各项建设。但是，由于国内局势骤变，在接到北撤命令以后，领导和部署北撤工作，就成为苏浙区党委的唯一工作。

怎样做好北撤工作？我们研究决定：（一）凡是能够随军北撤的人员，包括地方党员、干部和武装民兵，全部撤走。（二）按照指定的时间、地点，统一集中行动。（三）收回群众手中的全部“抗币”，具体办法是以我们掌握的粮油、布匹等物资兑换“抗币”。（四）成立中共苏浙皖边区特委和新四军苏浙皖边区留守处。陈立平为特委书记，下辖茅山、太滆、郎广和浙西四个工委；熊兆仁任留守处司令员，配备必要的精干武装，组织游击小组，秘密坚持斗争。同时在京沪铁路以北地区成立中共丹北、澄锡虞和苏常太三个中心县委，指定特派员，实行单线联系，并组建小型武工队。

10月初，苏浙区党委和苏浙军区在宜兴张渚召开留守工作会议，确定了留守工作任务和方针，并广泛散发和张贴《江南新四军北移告别民众书》，向江南父老乡亲表达了深切的感激之情，说明了我军北撤的原因和意义，指明了人民的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光明前途。

这样，在苏浙区党委的统一领导和部署下，我军的北撤，完全做到了有计划有秩序有领导地进行。由于事前宣传动员充分，组织安排落实，我一纵队从10月3日开始首批北撤渡江，仅用六天就完成了撤离任务。我在扬中登船北渡时，目睹着川流不息的部队和久已熟悉的航道，心中不由升起一个念头：江南，我们一定会回来的！在其后的渡江战役中，我所在的第三野战军第八兵团十数万大军，正是从扬中突破国民党军队的防线，飞越长江天堑的。这是历史的巧合，也是历史的必然。

在我们北撤的同时，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为贯彻党中央"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和"发展东北，巩固华北，坚持华中"的战略方针，从组织建制到人员部署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重大调整。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北移山东，华中局改组成华东局，统一领导华中、山东的全盘工作。在华中苏皖地区，成立了华中分局，由邓子恢、谭震林分任正、副书记；成立新四军华中军区，张鼎丞任司令员，邓子恢任政委，粟裕、张爱萍任副司令员，谭震林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刘先胜任参谋长，并将留在华中的新四军主力部队编为华中野战军，粟裕、谭震林分任司令员和政委，下辖六、七、八、九共四个纵队。我一纵到达泰兴以后即改编为华中野战军第六纵队，王必成和我仍然分别担任司令员和政委。12月下旬，华中野战军发起高邮战役。我六纵参加了战役。此役歼灭日军一个大队、伪军七个团，共9000余人，解放了高邮城。

1946年1月13日，国共双方签订的停战协定生效。我六纵领导机关移驻高邮城，与华中二分区一道，在城内驻扎

数月未移动，这是抗日战争以来从未有过的事。当时，除南通、扬州、泰州、海州和徐州等几个城市外，整个苏北均在解放区军民手中。由于我党我军坚决执行国共两党重庆谈判中达成的各项协议，出现了相对平静的局面，于是在一些同志中产生了错觉，误认为“和平已经实现”。我六纵遵照华东局和新四军军部的指示，当这种和平麻痹思想一开始露头，就及时做好工作。从2月份开始，开展了以政治训练为主的百日练兵活动。首先围绕战争与和平问题，进行形势与任务教育，使全体指战员认识到，在我党和全国人民普遍要求和平的强大声势推动下，国民党反动派虽不敢贸然发动内战，但是，他们可能利用和平作幌子，拖延时间，部署内战。因此，和平与内战两种可能都存在，我们千万不可“马放南山，刀枪入库”，一定要丢掉幻想，准备应付可能发生的突然事变。

百日练兵结束以后，上级为扩编主力兵团，将我纵队恢复新四军第六师的番号，谭震林兼任师长、政委，王必成和我分任副师长和副政委，张闯初任参谋长，李干辉任政治部主任，下辖十六旅和十八旅。十六旅旅长钟国楚，政委罗维道；十八旅旅长饶守坤，政委刘文学。从编制上看，与1941年3月成立的六师没有多少差别，从兵力和武器装备上看，那就大不一样了。经过抗日战争的洗礼和磨练，新恢复的六师已成长为强大的主力兵团。从5月份开始，我师开展了以军事训练为主的第二期练兵活动。相继进行整顿纪律和加强行政管理等教育；苦练投弹、射击、刺杀和爆破四大技术；开展野外攻防战和城寨攻坚战的战术训练，使全师的战术、

技术水平有了新的提高。在抓紧战备、搞好军政训练的同时，我们还派干部组成工作队，参加华中二分区的政权建设和土改工作，帮助地方训练民兵，组织区、乡武装，为巩固解放区做了大量的工作，为迎击国民党反动派的大举进攻作了必要的准备。

二 参加苏中战役

果然不出所料，蒋介石在美国支持下，于6月26日悍然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协议，重兵围攻我中原解放区，全国规模的内战从此爆发。我苏中军民，面对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奋起自卫反击，展开了著名的苏中战役，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史上，写下了“七战七捷”的光辉篇章。

苏中战役的第一仗宣（家堡）泰（兴）战斗，我第六师担当了攻歼泰兴之敌的任务。当时，苏皖解放区是国民党军队进攻的主要目标之一。7月上旬，敌军5个整编师、15个旅，约12万兵力，从南通、泰兴、扬州一线向北进犯苏皖解放区。泰兴县城地处长江北岸，位于苏皖解放区南端，除原有7米高的城垣和30米宽的护城河外，国民党整编第八十三师在年初抢占该城后，又修筑了大批坚固工事，成为蒋军出击的基地。为此，华野首长要求我师首先歼灭据守该城之敌。我和王必成等同志作了勘察之后，于7月12日凌晨召开师党委会，传达上级的作战命令，研究攻城作战要点，并

部署了各旅、团的战斗任务。决定第十六旅第四十八团主攻南门，四十六团和四十七团在城东南张家桥和大生桥担任阻击打援任务；第十八旅第五十二团突击小西门，第五十三团突击北门，第五十四团在城北七里庙阻击打援。13日晚21时，我六师以突然动作发起攻击，敌军措手不及，急忙收缩兵力。战至14日晨，我师扫清外围，逼近城垣。敌军依托城墙和工事，以炮火向我猛烈轰击。我攻城部队经过一整天紧张的准备工作，于14日晚18时开始攻城作战。我师炮兵首先开炮，打破了傍晚的宁静，怒吼的炮弹摧毁了敌军的桥头堡，炸开了城墙缺口。四十八团在炮火掩护下发起攻击，以勇猛迅速的动作强渡护城河，仅20分钟就占领了突破口。华东一级战斗英雄胡宗林带兵参战，用重机枪掩护步兵冲锋，并随突击班登上城头，击退反扑之敌。该团一、二两营几乎同时突破城防，迅速向敌纵深发展进攻。夜幕降临了，硝烟笼罩着泰兴城。十八旅的进攻受挫，被阻于护城河外。我们在师指挥所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命令攻入南门的第四十八团策应十八旅的攻城战斗。六师作战科长于大毛此时在十八旅第五十二团任代理参谋长，他和团政委郝光召开战地营连干部会，总结两次攻城失利的经验教训，重新组织了突击队，确定了“火力掩护，爆炸城墙，架梯登城”的攻城方案。五十二团首先用迫击炮将炸药包送上城楼炸开一道5米宽的缺口。突击队在队长徐长元的带领下，奋勇争先，登上城头。接着，主攻营冲入城内，与反扑之敌展开巷战。十八旅第五十三团也乘机突破北门。战至午夜，十八旅占领了东西大街及以北地区。15日凌晨，十六旅第四十七

团也入城参战。是日下午，泰兴守敌第五十七团及配属的一个山炮连大部就歼，仅剩团部百余残敌据守庆云寺顽抗。华野首长获悉一师已全歼宣家堡敌第五十六团及一个山炮营，遂果断决定我六师只留少数部队继续围歼残敌，主力挥师东进，另择歼敌良机。宣泰战斗胜利结束。

国民党第一绥靖区司令官李默庵得悉第八十三师遭重创，急令整编第四十九师、第六十五师及第八十三师余部从南通、泰州、黄桥同时发起进攻，三面夹击我华野主力。华野首长决心避开正面之敌，迅速转移主力，乘其不备，从其进攻战斗队形的侧后发起攻击，在运动中歼灭北犯如皋之敌。于是，我第六师又投入了奔袭如南的战斗。7月15日晚，我们接到向东转移，在如皋杨花桥、宋家桥地区迎击敌整编第四十九师及七十九旅的命令，立即召集各旅、团首长下达了战斗命令，部队迅即整装出发。在行军途中，各旅、团边行军，边布置作战任务，进行宣传鼓动。沿途党政机关和人民群众送来许多食品慰劳部队，鼓励我们再打胜仗。全师指战员不怕疲劳，夜行百里，向东疾进，终于赶在16日拂晓前抵达预定地点。这时，敌人还以为我军主力仍在泰兴城下。18日，我新四军第一师将敌整编第四十九师师部及二十六旅包围在鬼头街、田肚里地区。我六师第五十四团和第四十六团将敌第七十九旅包围在杨花桥、宋家桥地区。当晚，五十四团攻击杨花桥之敌未成。19日，增调五十二团、五十三团参战，仍未奏效。此时，一师在七纵队主力配合下已全歼鬼头街、田肚里之敌。20日晚，华野首长令一师的一个团配合十八旅再次强攻杨花桥、宋家桥，给敌以歼灭性打击。这时，

东援之敌已逼近作战地区，我六师乃奉命停止攻击，撤出战斗。担任阻援任务的十六旅四十七团和四十八团则灵活机动地打击敌人，顶住两个旅敌人的轮番进攻。由于部队连续十余天的行军作战，已相当疲劳，加之敌援兵靠近，上级决定及时结束如南战斗，我师在对敌进行佯攻后，秘密撤离战场，转移到富安、安丰地区休整。

在我一、六两师休整期间，华野七纵队从7月30日至8月3日奋战四昼夜，杀伤敌军3000余人，在创造敌我伤亡十五比一的优异战例后，主动撤离海安。敌人把我军转移休整看成是“不堪再战”，遂调整部署，进行所谓“清剿”。华野首长当机立断，决定以一师攻歼李堡、角斜之敌一〇五旅主力，以我六师十六旅攻歼丁家所敌一〇五旅一部，十八旅于西场配合七纵合力歼击海安东进之敌，并阻击如皋可能出援之敌。我六师接受任务后，迅速向作战地区开进。以十八旅五十四团一个营扼守陆家尖，以两个营和五十二团埋伏在陆家尖两侧，构成袋形阵地，以五十三团为预备队。我们要求部队全部隐蔽在民房和青纱帐内，沉着冷静，待敌人钻进口袋里再打。8月10日晚，一师乘敌调防之机发起攻击，至11日中午全歼敌新七旅和一〇五旅两个旅部及所属各一个团。我军攻势迅猛，敌乱作一团，通信联络瘫痪，海安东来之敌第二十一团竟一无所知，仍大摇大摆向李堡开进。是日中午，敌军进入我十八旅伏击阵地。我五十四团当即迎头痛击，七纵队抢占立发桥断其退路。敌遭我突然打击，一片混乱。我五十二团和五十四团各一营乘机插入敌阵，将敌军分割成数段。傍晚，我六师向敌发起最后攻击，仅半小时

就全歼敌第二十一团。

李堡战斗胜利后，华野首长根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一面调整建制，补充兵员，休整部队；一面研究敌情，制定作战方案，决心选择驻防丁堰、林梓的交警总队予以歼灭，打开西进扬州、泰州的门户，调动扬州、泰州、黄桥之敌，在运动中予以歼灭。我六师的作战任务是围歼林梓及附近之敌。林梓是个东面地形开阔，西南北三面环水的市镇，通扬运河流经镇中，河宽 20 米左右。战斗前得悉，守敌为敌交警第十一总队一大队和一个保安团。交警总队前身是"忠义救国军"，是我六师的老对手。此时，"忠救军"已全部换成美式装备，轻机枪、卡宾枪和火箭筒较多，但无火炮等重武器。该敌还利用河流和日军遗留的大碉堡，加修了火力点和堑壕，设置了铁丝网和鹿砦，构成坚固的防御阵地。8 月 16 日，我六师召集会议，研究作战方案，决心在一师攻歼丁堰守敌的同时，以十八旅一部攻歼林梓守敌；以十六旅主力在林梓西场打援，并相机夺取白蒲；另以一个团配合一分区武装围攻黄桥。21 日下午全师进行战斗动员，当晚 21 时半，五十四团从东、南、北三个方向同时向林梓发起攻击，遭到敌短兵火器的猛烈射击，前进受阻。该团后来又连续组织两次攻击，仅夺取镇北的一座大碉堡，与敌形成对峙状态。22 日拂晓，经审问俘虏得知，敌交警第七总队第三大队已于 21 日下午从如皋开抵林梓，是来换防的。从审问中还了解到，敌保安团与交警总队之间矛盾多，指挥不统一，防御工事是外面强，中间弱。于是，我六师十八旅根据新情况，及时调整部署，集中全旅兵力，采取四面包围、重点突破、穿插

分割的战术，为达速决全歼之目的，我们又调十六旅四十七团（欠一个营）和两个炮兵连加强十八旅。22日下午14时，再次发起攻击。炮兵用抵近平射的方法，实施火力急袭，摧毁了敌人的中心碉堡和火力点。接着，各攻击地段上的轻重机枪一齐开火，掩护第一梯队从新架设的浮桥攻入林梓。各团随即突破敌防线，与敌军展开市镇内各据点的攻防战，将敌压缩到三元宫等地。这时，敌军已逃跑无路，成为瓮中之鳖。我军进行政治攻势，迫使大部敌人缴械投降。经两小时激战，我六师全歼敌交警两个大队和一个保安团共2200余人，缴获大量美式自动火器。与此同时，一师全歼了丁堰守敌。丁堰、林梓战斗的胜利，为西进插入敌心脏作战创造了条件。

当我一、六两师在东线作战时，扬州之敌猛攻邵伯。为减轻西线压力，华野首长采取“攻黄（桥）救邵（伯）”的战法，调动敌人，予以歼灭。为此，我六师与一师、五旅、特务团迅速西进。敌见我西进，判断我军要夺如皋，急令九十九旅从黄桥东进增防如皋城。这就成了我军在如（皋）黄（桥）公路上打一场遭遇歼敌战的良机。我六师在行军途中接受任务后，即兵分两路，秘密而迅速地向黄桥开进。我们根据遭遇战变化多端、不易掌握的特点，要求各部队战前隐蔽我军企图，战斗触发后先机制敌，即先敌展开，先敌占领有利地形，先敌冲击，达到“堵头”、“断腰”、“击尾”，以全歼敌人之目的。8月25日上午，我十六旅前卫第四十六团秘密进到卢家庄，发现敌人在飞机掩护下沿公路东开，先头已越过分界。四十六团立即向分界攻击前进，拖住敌人，掩护主力展

开。四十七团、四十八团立即跑步至分界以西，断敌退路，阻敌增援，从侧后打击敌人。此时，我十八旅五十二团也在芦湖发现敌搜索部队，该团不顾敌机轰炸扫射，依托芦湖先敌冲击，五十三团、五十四团沿分界北侧急速前进。我们根据这一战局，急令四十六团和五十二团坚决堵头截尾，其他部队以分界为主攻方向，实施多路攻击。各旅、团受命后立即发起攻击，当夜占领了大小界沟、沈家巷、杨家岱和大小杨庄，拂晓前将敌压缩在荡里与东分界狭窄地带，使之陷入进退维谷、首尾不顾的困境。26 日上午，我六师再次调整部署，集中两个团并排由北向南突击，另两个团从东、西、南三面实施围攻。华野首长为迅速歼敌，又从一师调一旅和特务团加强我六师，作为主攻方向的预备队。敌人经我六师一夜攻击，伤亡惨重，士气低落。中午，天降大雨，敌人更加惶恐。我参战部队则越战斗志越高，各部队冒着滂沱大雨，于午后 13 时发起总攻，一举突破敌防御阵地，直插敌阵中心，全歼敌九十九旅和一个炮兵营。少数南窜之敌，也在卢家庄以北被我一师一旅歼灭。分界战斗的胜利牵制了敌人，有力地配合了兄弟部队在邵伯防御作战中取得胜利。

这样，从 1946 年 7 月中旬到 8 月下旬，一个半月时间里，我华中野战军主力在粟裕、谭震林同志的直接指挥下，以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英勇顽强、连续作战的战斗作风和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原则，连打七仗，七战七捷，共歼敌 53000 余人。我六师刚刚恢复，就投入了这七战中的五次战斗，五战皆捷，共歼敌 16000 余人，缴获各种火炮 57 门，各种枪支 7700 余枝。事隔 50 年，当日我师指战

员浴血奋战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

三　两次涟水保卫战

苏中七战七捷以后，我六师奉命北移六塘河以北的沭阳一带待机。这时，国民党集中 31 个旅，共 27 万余兵力，采取“由南向北，由西向东，逐步压缩”的方针，继续北犯苏皖解放区。9 月 19 日，敌整编第七十四师和第二十八师占领苏皖边区首府两淮（淮阴、淮安）。接着，出兵抢占苏北军事要地涟水城，妄图以此“结束苏北战争”。

涟水城位于废黄河、盐河之间，西南距淮阴 35 公里，南距淮安 30 余公里，是苏北的重要门户，联结山东和苏中两地的枢纽。整编七十四师是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一，全部美械装备，攻击能力强，被誉为国民党的“王牌军”。师长张灵甫，刚愎自用，气焰嚣张。国民党发动内战以来，他以声东击西的战术，在进攻淮南、淮北的作战中占了点便宜，因而更加骄横不可一世。本来，蒋介石曾要他占领两淮后即回南京休整，而他却认为涟水城虽有废黄河、盐河天然屏障，易守难攻，但是新四军兵力不多，防御能力不强，挡不住他的飞机、大炮和坦克。于是，他于 10 月 19 日，将两淮防务移交给整编第二十八师，旋即率七十四师全部和二十八师第一九二旅，共 3 万余兵力，分三路对涟水城实行宽大正面包围，扬言“打完苏北最后一仗再回南京”。

为了掩护我华中后方机关和人员北撤，振奋人心，鼓舞士气，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华中军区司令员张鼎丞、政委邓子恢、副司令员兼华野司令员粟裕研究决定，保卫涟水，歼灭七十四师。为此，我六师和一师南移涟水地区作战备休整，并集中第九、第十、第十一纵队及第十三旅共28个团，4万余兵力，投入第一次涟水保卫战。

战斗于10月19日开始。敌七十四师分三路向涟水城扑来：东路第五十七旅攻茭陵，中路第五十一旅攻涟水南门，西路第五十八旅沿废黄河与运盐河之间的狭长地带攻涟水西门。中路是敌军重点进攻方向。

我军担任涟水城守备任务的是十纵、十一纵和淮南六旅等部，运用伏击、出击、近战、夜战等战术，顽强抵抗兵力和装备均占优势的敌人。

10月22日拂晓，敌军在十余架飞机掩护下再次发动猛攻，中路敌五十一旅集中数十门大炮对涟水城南门渡口一线猛烈轰击，继以橡皮船强渡废黄河。我军阵地顿时一片火海，工事被打坍，许多指战员被泥土埋没了。担任中路守备的十一纵第十五团的勇士们不顾飞机扫射、大炮轰炸，从泥土中钻出再战，多次打退敌人的进攻，阵地始终在我军手中。败退的敌人在督战队驱赶下，仍不断向阵地拥来，我军指战员连伤口都来不及包扎，继续射击和投掷手榴弹。子弹打光了，就用刺刀、洋镐、枪托与敌格斗拼杀，英勇悲壮的场面，真是惊天地、泣鬼神。激战至当日傍晚，我南门第一道防线失守。第二道防线仍在激烈争夺中，涟水城危在旦夕。

当此紧急时刻，我和王必成接到粟裕司令员的急电，要

我六师立即从涟水城北驰援前线，并和一师等部队协力将敌七十四师歼灭于涟水城下。我们根据华野前指的命令，立即召集十六旅、十八旅负责人会议，要求各部队轻装、快速，务必于10月23日拂晓赶至涟水前线。我们还分析了可能出现的两种情况：一是涟水城外阵地仍在我军手中，可以直接进城增援；如果城中已有敌人，则不宜全部进城。各部队要机动灵活，出其不意地打击敌人。全师经一夜强行军，终于在天将破晓之时抵达指定位置。此时，小股敌人已占据城中阵地。十八旅旅长饶守坤带骑兵班进城找到第十一纵队指挥部。成钧司令员和赵启民政委真是喜出望外。他们要十八旅赶快进城参战。饶旅长传达了我们的意图，提出在目前情况下部队入城，一是展不开，二是未必奏效。还是从西门突入，沿街向东向南打为好，既可先解西线之急，又能迫使入城之敌撤退。成司令员和赵政委完全同意，立即部署23日白天的守城任务。

10月23日，涟水城经过几天激战，呈现出一片平静。敌人在我顽强抗击下，被迫暂停攻势。我六师等增援部队则抓紧时机，部署反击。当天黄昏，随着三发红色信号弹腾空而起，我六师十八旅投入了战斗。五十三团率先出击，从西门突入城内，一路横扫，敌人纷纷败退。晚21时许，该团与十一纵十五团会合，开始向南反击。十八旅五十二团和五十四团直接由城西大关镇向南出击。敌七十四师在突遭我猛烈打击后，慌忙逃出涟水城，退守第一道大堤。我指战员乘胜前进，轻重机枪一齐射向敌人阵地，并在不少地段与敌人展开了肉搏战。敌军退守第二道大堤。攻击战又在第二道

大堤上继续进行。

10月24日天亮以后，敌人的榴弹炮、迫击炮一齐从南岸向我压来，造成部队较大伤亡。但是，我军指战员不怕流血牺牲，冒着敌人的炮火继续向前推进，占领了第二道大堤，把敌人压到第三道大堤下。敌人出动多架红头绿身子的"野马"式飞机，低空扫射、投弹，我军进攻第三道大堤的战斗受挫。此时，敌军已无力发起进攻。我师与十一纵全部剿清了进入涟水城的敌人。夜幕降临之际，我一师和十三旅也赶到了涟水前线。当晚，华野前指命令我军全线出击，分三路杀向涟水城南门外的敌阵地，迅速收复了第三道大堤。敌军大部溃退到废黄河南岸，一部逃跑不及，退缩在城西南废黄河边的河滩上。25日凌晨，敌人的预备队第一九二旅在飞机、大炮掩护下，再次发起反扑。我六师和兄弟部队以血染黄河的英勇气概，奋勇抗击，连续击退敌人八次进攻，牢牢控制着废黄河的二、三两道大堤。进入黄昏，我军实施全线出击，敌一九二旅死伤千余，连夜退回茭陵。敌五十七旅、五十一旅在废黄河北岸的部队，也纷纷南撤或逃回南岸。我十纵出击部队直逼设在钦工镇的张灵甫前线指挥所。26日，敌军已无力组织进攻，只能靠飞机、大炮狂轰滥炸。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损失，并准备最后歼灭敌人，我六师奉命撤到后方休整，将正面防御交十纵接防，出色地完成了增援涟水的任务。

28日，华野首长部署了消灭七十四师的作战命令。30日，我六师和兄弟部队全线出击，连克茭陵、大小胡庄、张家洼、孙大庄、高家荡、徐家荡等地，歼灭大量敌人。11月1

日，敌军全线崩溃，逃回马厂、淮阴，第一次涟水保卫战胜利结束。在历时14天的战斗中，我六师歼敌近5000人，加上其他各部歼灭的敌军，此役共计歼敌9000余人（其中七十四师约6000人，一九二旅约3000人），缴获各种炮15门，轻重机枪150挺，长短枪6924枝，掷弹筒15架，以及大量弹药，沉重打击了张灵甫的锐气，更打破了七十四师“不可战胜”的神话。

涟水保卫战胜利后，我六师奉命转到涟水西北部的陈师庵、成集地区休整补充，并担负保卫华中分局和华野领导机关的任务。在此期间，华中分局在陈师庵召开了高干会议，陈毅同志到会作报告。我们结合讨论陈司令员的报告，认真学习了毛主席《三个月总结》的党内指示，总结苏中战役、两淮战役等作战经验，加深了对“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作战原则的理解。会议还就华中、山东两地野战军联合作战和增强军队内部与外部团结等问题开展讨论，达成了共识。根据会议的决定，原在皖南沿江活动的新四军七师二十旅拨归我六师建制，编为六师十七旅，梁金华任旅长，黄耀南任政委，马长炎任副旅长，陈仁洪任参谋长，高立忠任政治部主任，下辖四十九团和五十一团两个团。我师开始有了三个旅的完整编制。

就在举行陈师庵会议之时，蒋介石为他进攻解放区的表面胜利冲昏头脑，竟最后关闭了国共两党谈判的大门，于11月15日悍然召开了国民党一手包办的“国民大会”，制定伪宪法，当了伪总统。12月上旬，蒋介石再次调动28个旅的兵力，从东台、淮阴、宿迁、台儿庄和枣庄等地，向我华

中的盐阜、淮海和山东鲁南等地发起新的攻势，其重点方向是苏北淮海地区，妄图迫使我军放弃苏北，撤向山东，并逼我在鲁南与之决战。我军由陈毅同志亲率一纵、二纵、九纵及七师、八师等部共 24 个团的兵力，在宿迁、沭阳一带设伏，待机围歼敌整编第十一师和第六十九师。我六师和淮南六旅共 10 个团由谭震林同志率领，在涟水地区组织防御，阻击敌整编第七十四师和第二十八师，保障并策应我军在宿北地区的战略展开。于是，我师又投入了第二次保卫涟水的战斗。

此次作战，国民党军吸取第一次进攻涟水失败的教训，隐蔽主攻方向，以两个旅从淮安出发向王家口、谢家荡、钦工发起正面进攻；以三个旅在王营、悦来集一带集结待机。12 月 2 日，我六师接替一师和十纵在涟水城南的防务，淮南六旅两个团部署在带河镇、大关一线，监视和阻击西路之敌。3 日，正面之敌向我设在王家口、谢家荡和三堡的十七旅阵地发起进攻。激战两日，阵地为敌占领。为了扭转被动局面，我军采取以攻为守、连续反击的战法，于 5 日出动十八旅五十三团、五十四团，以及十六旅四十八团各一部攻击王家口；十六旅四十六团攻击三堡，十七旅五十一团一个营攻击谢家荡。但由于准备仓促，对敌情判断有误，打了一夜未能奏效，加之敌又增加了援兵，我攻击部队遂撤离战斗。

12 月 6 日，敌军继续北犯，占领徐家荡。我十八旅五十二团二营、三营和五十四团一部予以反击，重创敌人。我六师利用战斗间隙，构筑了以村落为依托，与野战工事相结合的纵深阻击阵地。在战术上则采取全面部署，重点守备，将

机动力量隐蔽集结于阵地内，发挥我军近战特长，实施强有力的反冲击，把进攻受阻或立足未稳之敌消灭于阵前。从8日至14日，我六师采取上述措施，有效地将正面进攻之敌阻滞在涟水城南地区。在此期间，我和王必成同志曾分析了敌情，并数次电告谭震林同志，认为张灵甫不太可能以南线作为主攻方向，很有可能运用声东击西的战术，从西线发起主攻。为此，我们建议，把防御重点转到西线，以防敌人从西边突破。可惜，这个意见未受到足够重视。

14日拂晓，张灵甫果然乘我六师在南线与正面之敌鏖战之机，在空军的配合下，以三个旅的绝对优势兵力，沿废黄河与盐河之间的狭长地带猛攻涟水城西的带河和大关。我淮南六旅指战员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与数量上和装备上均占绝对优势之敌展开殊死搏斗，终因敌众我寡，伤亡过大而退守二线阵地。入夜，敌人一改夜间不进攻的常规，再次发动攻势，西线阵地多次被敌突破，涟水城告急。为挽救危局，上级命令我十六旅摆脱正面之敌，火速夜渡废黄河，增援涟水城。接到电令后，我和王必成研究决定，由我留守原地，他去指挥十六旅。15日上午，十六旅赶到涟水西门外，发现敌人已迫近大关，形势万分危急。罗维道旅长立即下令四十七团全部投入战斗，配合淮南六旅，在大关至城西南角的大堤上，与敌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战至黄昏，敌凭借其人多和武器优势，突破了大关南大堤部分防线，战况更加严峻。这时，王必成带领作战参谋和联络参谋等少数精干人员进城直接指挥战斗，当天夜晚以两团之众全力向西反击。罗旅长亲自带头冲锋，指战员士气大振，激战至半夜，终

于将敌人击退，夺回大堤阵地。与此同时，谭震林同志来电，要我立即派十八旅回援涟水城。我下令十八旅连夜撤出涟南地区的战斗，夜渡废黄河，增援涟水城。因缺少船只，渡河耽误了不少时间。

16日拂晓，敌七十四师主力在十来架飞机的配合和排炮轰击下，沿大堤向东发起总攻。我十六旅指战员在西面受敌的不利情况下，沉着应战，待敌人进至阵地近前，即奋不顾身从战壕和弹坑里跃起，与敌白刃格斗拼杀。大堤上下，弹坑密布，硝烟弥漫，刀光人影，扭成一团。四十八团一营的勇士们在营长徐超率领下奋勇砍杀，越战越勇，阵地上只听到他们的喊杀声和金属碰击声。敌人倒下了一批又一批，在督战队的逼迫下，继续蜂拥而上。这是我六师从未遇到过的恶战。我军伤亡不断增加，加之弹尽粮绝，战至中午，几处阵地被敌人突破。下午，敌人从涟水北门、西门攻入城里，我十六旅与敌展开激烈巷战。此时，十八旅赶到了涟水城东门外。我和王必成同志电话商定，命令十八旅立即入城反击，掩护十六旅撤退；十七旅同时从棼陵阵地摆脱敌人，向北转移。十八旅各团队坚决执行师部命令，勇猛冲向敌阵，予敌迎头痛击，减轻了十六旅的压力。至此，历时两周的第二次涟水保卫战结束，我师全部撤至盐河以北，继续保障我军主力在宿北的歼敌战事。

这时，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谭震林师长电话通知我，六师保卫涟水城不力，是华野的耻辱、全军的耻辱。根据陈毅司令员的命令，撤掉王必成六师副师长之职，由我兼任副师长，要我立即向团以上干部宣布。我简直不相信自己

的耳朵！然而，军中无戏言，这是陈司令员的命令。我连夜策马向陈司令员的指挥部马陵山五华顶赶去。半道上，遇到谭师长骑马南来。他问我上哪儿去。我说去见陈司令员，请他收回成命。谭师长说，你最好不要去，我刚从他那里过来，峰山争夺战还未结束，各部队穿插分割六十九师的任务尚未完成，陈司令员在电话里要撤韦国清二纵司令的职呢！我说让我去试试吧。于是，我硬着头皮去见陈司令员。只见陈毅同志的指挥所里生着一个大火盆，他在屋子里来来回回走个不停。参谋人员对我说，陈司令员正在为峰山没夺下来发火，你最好先别去打扰他。我便在外屋等着。不一会儿，屋里传来陈毅同志打电话的声音："王必成已经撤职，你韦国清不把峰山给我拿下来，王必成就是你的样子！"我一直在门外等到第二天黎明。宿北战役取得了决定性胜利，我才进屋去见陈司令员。他喊我一同吃早饭，并问我半夜三更跑来干什么。我说："仗没打好，不是王必成同志一个人的责任。要撤职的话，连我一起撤，否则我没法向部队宣布。"他说："噢！你是来当说客的。那你说说，为什么你们上一次打得很好，这一次却把涟水城丢掉？"我见陈司令员口气缓和了，就把我军判断敌人主攻方向失误，兵力部署不当，遭敌偷袭等详细情况向他作了汇报。他问："那你们当时怎么不向上反映呢？"我说："我们先后三次提出建议，加强西线防御，防止敌人偷袭，不信，你可以问谭师长。等到我们奉命回援时，已经来不及了。"他沉默了一会儿，对我说："渭清同志，这事有些错怪你们了。我收回成命。"接着，他关切地询问起部队减员的情况，我告诉他，两次涟水作战，我们六师

共战斗减员七八千人，干部伤亡也很大。我们打算缩编部队，原则是团、旅建制不变，每个营缩为两个连。他表示同意，说好的，一个团保持六个连。他又问粟裕同志手头还有多少人可补充部队。粟裕说，指战员们打红了眼，俘虏的人数不像苏中战役那么多，因此只有3000人。陈毅说，兵力补充先考虑六师，可先拨2000人给六师，子弹补充10万发。他又对我说："你回去后，和必成同志一起抓好部队的缩编和休整工作。六师是一支胜不骄、败不馁的部队。希望你们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不断提高攻击和防守两套本领。代我向大家问好，我一有空就去看望大家。"陈毅的一席话，不仅使压在我心头的大石头落了地，而且感到一股暖流在我周身涌动。既严格又宽仁，在原则问题上，他铁面无私，在非原则问题上，他宽以待人。我激动地向敬爱的陈、粟首长举手敬礼，冒着清晨的寒气赶回师部。

第十三章　北上山东

一　莱芜大捷打出了军威

第二次涟水保卫战以后，我六师开往山东郯城地区隐蔽集结，待机参加鲁南战役。后因鲁南战役进展顺利，我六师未及参加，又移驻临沂以西地区休整。我们遵照陈毅司令员的指示，认真总结自卫战争半年来作战的经验教训，进一步加强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掀起了军政训练的高潮。在此期间，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华东部队统一整编为华东军区和华东野战军。我六师改编为华东野战军第六纵队，王必成任司令员，我任政委，皮定均任副司令员，陈时夫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杜屏任参谋长，下辖十六、十七、十八三个师，是由原来三个旅改编而成的。这时，蒋介石自恃兵力雄厚，不顾鲁南损兵折将的惨败，又制定了一个“鲁南会战计划”，即以重兵组成南、北两个突击集团，对我实施夹击，逼我主力在临沂地区与之决战。华东野战军首长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果断决定：以一部分兵力摆开阵势，佯装主力在

南线与敌人纠缠，秘密移动野战军主力第一、第四、第六、第七、第八纵队，会同北线我第九、第十纵队，围歼敌北线之敌李仙洲集团于新泰、莱芜地区。于是，我六纵结束了军政训练，投入了新的战斗。

1947年2月10日，我们接到华野司令部的紧急命令，令我六纵于16日以前开抵400华里以外的羊流店地区集结，暂留一个师在现地阻击敌人，待第二纵队接防后随主力之后跟进；规定部队白天隐蔽，夜晚行军，以封锁消息。我们虽然尚不了解具体的战斗任务，但看到陈粟大军会合后，兵强马壮，非常令人鼓舞，对上级避强击弱、南堵北攻的战役意图充满了信心。指战员们心里明白，在这场大战中六纵的任务不轻，首先是必须靠两条腿在六个夜晚隐蔽走完400里山路，这是实现华野首长决心、歼灭北线敌人的先决条件。在敌人看来，这是绝对办不到的；而我们呢，是人民的军队，再大的困难也要完成任务！

接到华野首长的命令，我们立即层层下达，除留第十八师在指定地区暂时担任防御外，其他部队当晚就轻装出发，多路向北疾进。此时，齐鲁大地正处于冰封雪飘的严寒时节，夜行军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不少战士鞋底磨穿了，脚上磨出许多血泡，就扯下破布包着脚继续前进。有的战士风趣地说："沂蒙山区有七十二崮，我们脚底也有七十二崮。"饿了啃煎饼，渴了喝冰水。涟水之战憋了一肚子气，这次要打大仗了，指战员们个个斗志昂扬。地方党政机关和人民群众，更是爱护自己的子弟兵，沿途到处是碾米磨面摊煎饼的场面。我们停下来宿营，就有民兵、儿童团站岗放哨、封锁消

息。经过六夜急行军，部队按时抵达羊流店以北地区。

就在地方党和政府向我们介绍敌情、地形和当前情况，进行协调工作之时，华野首长下达了作战命令，指出：北线国民党李仙洲所率第七十三军、第四十六军及第十二军新编三十六师已进占莱芜。我军集中于新泰和吐丝口一带的八个纵队，应歼敌于莱芜地区。我六纵的任务是，协同鲁中军区警卫四团，全力攻歼吐丝口和青石桥之敌，切断莱芜敌人退路。吐丝口简称口镇，范围有三里长、二里宽，比莱芜城还大，处于明水、博山通往莱芜的交通要道上，是李仙洲集团粮食弹药的储存地。敌驻军第十二军新编三十六师原系伪军，被国民党改编后，更新了装备，吸收了一批还乡团分子。其兵力部署是：师部率第一〇八团、辎重营及炮兵驻口镇，第一〇六团驻口镇北约7公里的青石桥，第一〇七团驻口镇北约20公里的上游庄。我六纵召开了各师负责人参加的作战会议。王必成司令员和大家具体分析了地形和敌情，研究了作战方案。我在会上说，两个月来我们天天盼望打大仗，现在时机终于到来了。口镇得失，关系全局。这是一场硬仗，一定要打胜。不是小胜，而是全胜。涟水之战打得不理想，我们一定要在这里大显身手，扬眉吐气！

2月20日，我军主力全线发起进攻。夜幕降临之后，我六纵攻击口镇的战斗打响了。十六师四十八团突击连在向导带领下，沿着一条2米深的水沟向口镇秘密运动。在逼近外壕时，被敌哨兵发觉，不等他开枪报警，即被我猛冲上去的战士击毙。突击连随后一拥而上，搭人梯抢占围墙，仅10分钟就控制了一段数十米长的突破口。守敌被这突如其来

的打击吓得晕头转向，纷纷向后退缩，我四十八团乘胜扩张战果。与此同时，四十七团采用迂回战术，由西南方向突入围墙，打通与四十八团的联系。两团并肩突击，控制了口镇大半街区。我十八师的第一次攻击行动则因敌防备严密而没有得手。拂晓以后，敌人炮兵和飞机对我狂轰滥炸。我们遂令十六旅留一部分兵力控制已占阵地，将主力撤出，整顿战斗组织，准备再战。

21日夜，我纵队发起第二次攻击。根据敌阵地碉堡密集、地道相连、层层沟通的特点，我们决定投入六个团兵力，轮番进行突击，不给敌人片刻喘息之机。我十六师三个团由西向东并肩突击，与敌人逐街逐屋争夺，我占领房顶，敌人即在房内向房顶打枪；我打洞穿墙，敌人即以燃烧弹焚烧我掩身之处。我指战员冒着熊熊烈焰，前仆后继奋力前进。我十八师部队沿南围墙向东门大胆穿插，连续突击，攻占了小东门。我军因伤亡较大，尚未最后解决战斗，但已控制了全镇的三分之一，将敌人压缩于东北一隅。

我六纵十六师、十八师向口镇发起猛攻，敌新编三十六师师长曹振铎惊恐万状，于20日当晚连连向李仙洲呼救求援。李仙洲自顾不暇，哪有力量来解口镇之危？曹振铎转而急令驻守青石桥的第一〇六团向口镇靠拢。他当然没有料到，我军截获了他的求救电报和给一〇六团的命令，业已在青石桥以南布下了袋形阵地。敌既成惊弓之鸟，又非常狡猾。21日晨7时许，青石桥守敌突然以一个营的兵力向北猛攻，企图造成向北突围的假象，诱我上当。我十七师识破其声东击西的诡计，主力部署按兵不动，仅以鲁中警四团回

击敌人。敌人见一计不成，又于当天中午13时，以一营兵力向南进攻三山庄的无名高地，掩护其主力抢占枣园，再夺路南窜口镇。我十七师各团求战心切，未等敌全部离开青石桥，即攻击其先头部队，致敌一〇六团缩回青石桥。我们改变部署，下令十七师强攻青石桥。当晚19时，正当我军发起攻击前夕，青石桥之敌再次分两路南窜口镇。我十七师及时查明敌情，调整部署，决心歼敌于运动之中。各团接受上午的教训，严格规定：敌人不全部离开青石桥不打，不进入我伏击阵地不打。当敌先头部队全部进了枣园后，各团才迅猛出击，发挥近战夜战的特长，把敌人分割成几段，仅半小时就把敌一〇六团一网打尽。鲁中警四团乘虚而入，一枪未发占领了青石桥。至此，口镇守敌陷入欲逃无路、欲战无力的绝境。

2月22日中午，我六纵接华野司令部紧急通知，李仙洲率七十三军和四十六军的五个师企图放弃莱芜城，向北会合口镇之敌突围。令我纵队在攻击口镇的同时，派一部兵力在口镇以南堵截北窜之敌，不使一个漏网。战局骤变，对我六纵是一场严峻考验。我们决心不惜一切代价，坚决完成攻坚和堵击的双重任务。为此，我们将十八师调至口镇以南设伏，十六师、十七师于黄昏后继续攻击口镇。当夜，我军向口镇发起总攻。十六师的两个团分别由东大街南段及小东街全力向东北攻击，连续夺得几栋房屋。敌狗急跳墙，向我军占领的房屋发射大量燃烧弹。顿时，火舌漫卷，烈焰冲天，好几条街道成为一片火海。我指战员不顾生命危险，继续奋勇攻击，与敌人激战于刘沟胡同以南地区。十七师由西向南

攻击，采用爆破、火力和突击相结合的战术，接连攻占四条街巷和一个弹药库，缴获大批迫击炮弹和手榴弹。残敌不支，退至师部盘踞的核心阵地关帝庙内，凭借坚固的院墙负隅顽抗。我爆破组在轻重机枪火力掩护下，炸开了一条长二丈的缺口，随后，在关帝庙内与敌逐屋争夺。十八师领受任务后，精心选择和构筑了阻击阵地，指战员隐蔽在冰天雪地里度过了一个通宵。

2 月 23 日，是战斗最激烈、打得最淋漓痛快的一天。是日天刚亮，20 多架敌机就在口镇与莱芜之间的道路和村庄上空扫射轰炸，密集的枪炮声从莱芜城方向传来，李仙洲集团果然兵分两路，向我六纵方向窜来了！我第一、第七、第四、第八纵队，会同刚刚赶到的第二纵队，左右开弓猛追逃兵。10 时许，敌先头部队闯入我十八师阻击阵地，顿时遭到我军炮火、机枪和手榴弹的猛烈袭击，敌军纷纷掉头逃窜。李仙洲慌忙调集后续部队，以汽车开道，步兵紧紧跟进，发起集团冲锋，我军阵地坚如磐石，阵前丢下大片敌人尸体。中午 12 时，我军各追击纵队以排山倒海之势压过来，把敌人五个师压缩在方圆五华里左右的狭窄地带。敌人像陷阱里的困兽般垂死挣扎。大批敌机对我阻击阵地扫射轰炸，各种炮火向我阻击阵地纵深轰击，然后发起更凶猛的集团冲锋。我五十三团、五十八团依托公路两侧高地，把各种火力倾入敌群。敌人上来一批消灭一批，刹时，阵前敌尸越积越多，有的地方叠了六七层。敌七十三军军长韩濬率 1000 余人从我五十三团、五十四团结合部冲开一个缺口，夺路逃入口镇。我十八师副师长罗桂华立即率一个营猛扑上去，消灭

了跟进的敌人，封闭了缺口。这时，合围圈中敌人已失去指挥，一片混乱。我和王必成司令员见最后歼敌时机已到，即令十八师转守为攻，以营连为单位，猛烈冲击敌群。与此同时，各追击纵队也以雷霆万钧之势冲向敌阵，连附近十几个县的民兵也浩浩荡荡地开进战场配合作战，敌人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敌机在天上见到犬牙交错的战场，只得盘旋哀鸣。我五十四团骑兵通信员吴成良见一股敌人企图逃窜，便拍马冲入敌阵，大吼一声"缴枪不杀!"300多敌人乖乖当了俘虏。围歼战于当日17时胜利结束。入夜，口镇残敌弃守而逃，窜至青石关亦被我第九纵队歼灭。历时三昼夜的莱芜战役，取得了歼敌56000人，生俘国民党第二绥靖区中将副司令李仙洲以下4万余人的辉煌战果。其中仅我六纵就俘敌两万余人。

我六纵是带着涟水之战的创伤投入莱芜战役的，全纵上下，同仇敌忾，真正打出了威风。虽然在开始时未能一举攻克口镇，随着战役的演进，正好促使敌人把口镇作为突围逃窜的跳板。华野首长将计就计，网开一面，纵敌北逃，在运动中全歼敌人。这样不仅缩短了战役的时间，而且减少了进攻中的损失。李仙洲全军覆灭，是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史上的又一光辉篇章，彻底粉碎了蒋介石全面进攻华东解放区的计划。我六纵也打了一场翻身仗。经过莱芜战役，全纵三个师加特务团，总兵力已达四万人。战斗结束的当天晚上，我和王必成等同志正围着火盆烤火，商量部队的整编工作，谭震林同志在一个排的警卫部队保护下来到六纵，向大家表示祝贺，同时找我们商量，要调一万人走。他说，这次六纵抓

了两万多俘虏，发了大财。兄弟纵队抓的俘虏不多。我们要顾全大局，不能穷则愈穷，富则愈富。王必成同志听了不作声，我知道这是因为他还在生涟水保卫战差点被撤职的“气”。我便对谭政委说，仗刚打完，我们正在商量这事。你来得正好，明天我们召开祝捷大会，请你做报告。第二天，谭政委在我纵召开的祝捷大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坦荡胸怀，诚恳检讨了自己在第二次涟水保卫战中的部署失当。他说，第二次涟水战役没打好，不是六纵作战不力，而是我指挥不力。我向全纵队同志赔礼道歉。会场上下群情振奋。当年，我党我军就是这么实事求是，知错必改。我深知谭政委襟怀坦白、肝胆照人的为人，从他这种勇于改过、勇于承担责任的作风中，再次受到了深刻教育。我代表六纵全体指战员发言，感谢华野首长的关怀和鼓励。我说，在战前动员会上我曾说过，我们一定要打好这一仗，转败为胜，化耻为荣。现在我们已经实现了这个目标。但这仅仅是开头。我们要再接再厉，夺取更大的胜利。祝捷会结束后，我找王必成同志商量调人的事，他情绪特好，回答：“还商量什么，二一添作五，给谭政委一万人！”

二 孟良崮全歼“王牌师”

莱芜大捷以后，我六纵在博山地区进行了解放战争开始以来的第一次战备整训。部队在做好兵力和装备补充工

作的同时，开展了以诉苦教育、战场纪律教育和拥政爱民教育为主要内容的思想和组织整顿。六纵大部分连以下干部和战士是南方人，即使在苏北长大，相对于山东来说，也还是南方人。那时，南方人吃大米饭，山东人吃高粱面煎饼，有些基层干部和战士，对涟水之战后的北撤，本来就有情绪，加上来到山东生活习惯大变，怪话牢骚不少，说什么“反攻反攻，反到山东，光啃煎饼，外加大葱”。同时，莱芜大捷后，又有大批被俘国民党士兵，补充成为我军新战士。所以极有必要进行一次整顿，在进一步解决南方战士思想问题的同时，还要突出地抓好以老带新，加强对新战士的教育工作。这次整训因为战局变化，只进行了一个多月。时间虽短，但收效很大。新老战士普遍激发了强烈的阶级仇恨，为贫苦人民翻身解放杀敌立功的思想深深扎下了根。整训一结束，我六纵又投入了粉碎国民党军队对山东战场的“重点进攻”的战斗。

1947 年 4 月初，国民党纠集华东第一线兵力 13 个整编师、34 个旅共 25 万人，分别由汤恩伯、王敬久、欧震组成三个机动兵团，部署所谓“重点进攻”，沿临沂至泰安一线并肩北犯，企图歼灭我华东主力于沂蒙山区。我军则主动由鲁南向鲁中后撤，大胆诱敌深入，寻机歼敌。华野首长为了调动敌人，命我六纵与一纵、三纵并肩沿津浦路西侧南下，出击宁阳，威胁敌重要补给基地兖州。我们南下，敌人则北上，双方部队好像捉迷藏，不停地兜圈子。我们把这种战术形象地比喻为“鹞子捉鸡”。不过，要捉住鸡也不是轻而易举的。5 月初，我六纵奉命北返鲁中，协同兄弟纵队围歼北犯新泰

的敌第十一师，我军刚刚形成战役合围，敌二十五师、八十三师即分头来援，急速靠拢，我军只好迅速后撤。此时我六纵已插至羊流店以南，形势变得十分不利：既来不及向兄弟纵队靠拢，又三面临敌，难以独立作战。怎么办？我和王必成、皮定均、杜屏等纵队领导进行了分析研究，大家觉得眼下只剩向鲁南进军这一条路。但鲁南是敌人后方，孤军深入，虽容易遭敌围歼，但从全局着眼，可以迷惑敌人，以吸引敌人兵力，有利于实现华野首长的战略意图。由于时间紧迫，我们纵队领导在取得一致意见后，就一边向南行动，一边向上级报告。华野首长很快来电，同意我六纵的行动方案，并要求我纵队“注意隐蔽待机，不要过分刺激敌人”。

说来奇怪，几个月前，部队向北开拔，一些指战员思想不通说怪话。如今，部队南下敌后，不少干部战士又有了意见。什么原因？这是由于敌人向山东重点进攻有三大主力：一是张灵甫的整编七十四师，二是胡琏的整编十一师，三是邱清泉的新五军。这三大主力有的已在鲁中，有的正向鲁中开进。我六纵合围整编十一师不成，不参加歼敌主力的战斗，却插向了鲁南敌后，所以许多指战员思想转不过弯来。由此，也反映了部队歼敌心切，士气高昂。我们纵队领导分析了这些思想动向，认为不能泼冷水，只能耐心做工作，向大家反复说清楚诱敌深入，持重待机，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作战原则和必须树立全局观念、服从统一指挥和调动的道理，使上下统一了认识，部队顺利地进抵鲁南平邑县以南地区。5 月 8 日，我纵队应地方党组织的请求，配合地方武装攻击白房、城前两个敌军据点。就在这时，华野首长发来敌

情战报，告知敌七十四师已被我军调动，进入鲁中地区。一场大规模围歼战即将开始。为了不暴露目标，我们果断停止攻击，隐蔽投入紧张的战备工作，确保我军行踪不被敌人察觉。骄横的七十四师也确实根本没有想到，在其腹背有我六纵的两万精兵！

5月12日中午，我们收到陈毅、粟裕、谭震林三位首长签发的十万火急电报，令我六纵星夜出动，兼程北上，抢占垛庄，断敌后路，参加围歼敌七十四师的战斗。我和王必成等同志读了电报，极为振奋，回想一个月前，粟裕同志曾对我们说："打七十四师，少不了你们六纵。"现在果然机会到了！我们迅速将战斗任务下达到部队。黄昏时分，全纵队回师向东北方向进军。沿途山峦重叠，道路崎岖，天上有敌机扫射，地上有小股敌人和还乡团袭扰，还有粮草准备不足等困难。然而，这一切都动摇不了我们围歼敌七十四师的决心。各单位充分发挥政治工作的威力，边走边宣传鼓动，召开"飞行会议"，传递"飞行快报"。许多干部和共产党员主动帮助体弱的战士扛枪、背干粮、背背包，以自己的先锋模范行动带动了全体战士，上下一心，不怕疲劳，不怕饥饿，不怕牺牲，两昼夜急行军200多华里，终于提前赶到了指定地点。

我们要攻占的垛庄，位于临(沂)蒙(阴)公路上，是敌七十四师的设防要点。它不仅是敌进攻的必经之地，而且是其后方补给点，既有坚固的守备工事，又有大军驻防其左右，所以，敌人开始时只留一个辎重连守备。我们根据以往的经验，决定出敌不意，一举攻占垛庄，死死掐住敌七十四师的

咽喉，才能不贻误战机，不让敌人从这里溜掉。为此，我们选择了有攻坚经验的十八师五十三团担任主攻。该团四连于5月14日凌晨进至垛庄以南彭家岗子，与敌二十五师一部迎头相遇。四连猛烈开火，将敌打垮，乘胜占领垛庄西南岱山寺西侧无名高地。当天下午，十八师全部赶到垛庄以南集结，查明敌情，联络友邻部队。深夜，十八师五十三团以两个营的兵力，从垛庄西南发起攻击，五十四团以一个营的兵力迂回垛庄北侧配合进攻。敌人一直以为垛庄是可靠的后方，并未想到会突然从背后杀出一支奇兵。在我两面夹击下，守敌束手无策，不到半小时就被全歼。在这之前，敌第一兵团司令官汤恩伯觉察我军有围歼七十四师的意图，曾亲自打电话询问垛庄情况，要七十四师务必重兵守住垛庄。然而，当张灵甫调遣其运输团长带领1000余人下山，前来加强垛庄防务时，我军已抢在一小时前占领了垛庄。这股敌人进至垛庄以东，就遭我十八师前哨部队迎头痛击，活捉了敌团长。我军乘势扩张，夺取了垛庄附近的要点，并与友邻第一、第八纵队打通了联系。这样，我六纵完成了华野首长交给的第一步的战斗任务，截断了敌七十四师唯一的后路。孤军突进的敌七十四师，被我第一、第四、第八、第九和第六共五个纵队团团围困在以孟良崮为中心的狭长地带，成了待缚之鸡。

蒋介石对七十四师被困大为震惊。他一面令张灵甫苦撑待援，一面调动十个整编师的兵力，妄图对我军实行反包围，以解救张灵甫，并与我军决战。华野首长早就料到蒋介石会出此一策，在敌人来援的方向部署了强大的阻援部队。

我六纵也奉命投入阻击敌援军的战斗，具体任务有两项：一是在孟良崮西南方的黄崖山、狼虎山，协同一纵阻击敌黄百韬整编第二十五师；一是在孟良崮东南方的牛头山、大朝山，协同八纵阻击敌李天霞整编第八十三师。我们判断：东南方向敌八十三师战斗力较弱，曾多次遭我重创，且与七十四师矛盾重重，所以该敌增援势头不会太猛，但敌二十五师则不同，来势很猛，已进至距孟良崮10华里的黄崖山，一旦越过黄崖山，将与敌七十四师联成一片。该敌为争宠抢功，定会不顾一切向七十四师靠拢。据此，我们决定十七师五十一团向南伸展，控制大朝山、大重山等高地，以防敌八十三师出援；十七师四十九团和五十团向北攻击，防敌七十四师夺路逃窜；而将抢占和固守黄崖山的任务，交给善于打山地阻击战的十六师。

5月14日晚，我十六师四十八团开始了抢占黄崖山的战斗。与此同时，敌二十五师一部也向黄崖山急进，企图抢先通过黄崖山，从这里撕开口子，打通与七十四师的联系。15日拂晓，黄崖山上浓雾弥漫，两军同时赶到山脚下，我军在西坡，敌人在东坡，展开了一场登山竞赛。我四十八团三营九连连长翟祖先率领先头部队，攀悬崖，跨沟坎，越绝壁，冲破层层障碍，终于先敌一步抢占了制高点。这时，在敌军督战队的逼迫下，有一股敌人离山顶仅有四五十米。我先头部队迅速抢占有利地形，六〇炮、轻重机枪、冲锋枪和汤姆枪一齐猛烈开火，打退了这股敌人。我后续部队也陆续赶到，控制了黄崖山、狼虎山和万泉山等制高点，抢修工事，迎接更加激烈的战斗。15日中午，敌人出动两个营的兵力，在

督战队“只准进不准退”的命令下，以密集队形集团冲锋，向黄崖山发起了第一次猛攻。我四十七团接替四十八团，担任正面防务，四十八团则隐蔽、集结在两侧，待机反击。当敌军冲到我黄崖山阵地前，我预伏部队突然向敌侧翼出击，经过一番白刃格斗，敌人纷纷就歼，残军连滚带爬逃下山去。是日下午，敌人先以密集的炮火破坏我山头防御工事，再次发起集团冲锋。敌军约一个团的兵力，分成三路，齐头猛攻，我阻击部队虽然英勇抗击，但前沿阵地还是被敌突破，情势万分危急。四十七团团长黄祖煌迅速指挥一营和特务连，跃出堑壕，冲向敌群。经过浴血奋战，敌人伤亡惨重，败退下去，我军收复了阵地。敌人见正面攻击不成，就利用夜幕的掩护，采用迂回战术，侧攻我左翼狼虎山一线阵地，妄图夺路通过，同样被我守军击退。在两昼夜的黄崖山阻击战中，敌人一共发动了十来次冲锋，不管上来一个营，还是一个团，也不管正面猛攻，还是迂回进攻，始终不能越雷池一步。我阻击部队饿着肚子抗击敌人的猛烈炮火，许多指战员渴得嘴唇开裂，但毫不叫苦，毫无畏惧，心里想到的只是“歼灭七十四师，为死难战友报仇”，“消灭蒋家军，活捉张灵甫”，“坚决顶住，就是胜利”。所以，尽管处境困难，士气越打越旺，阵地始终在我军手中。

在5月15日的激战中，我们看到阻击任务进展顺利，曾于当天上午主动向华野首长请战，要求从我六纵抽出两个师直接参加对七十四师的攻击。华野首长批准了我们的请求，命令我六纵从西北、正西和西南攻击敌人。我们立即召集各师和特务团负责人紧急会议，分配了具体任务。随

后，纵队指挥所前移至距孟良崮主峰仅4公里的大场山。我十七师、十八师迅速投入兵力，向孟良崮侧翼发起进攻。十八师五十三团和五十四团不顾敌机扫射轰炸，与敌争夺横山、官山、大山场等外围阵地，两军呈犬牙交错的胶着状态，连敌机投弹也无从下手，往往误炸他们自己的阵地，帮了倒忙。经过两小时短兵相接的搏杀，我五十三团终于突破敌前沿阵地，五十四团则插至业家沟敌阵地前。入夜以后，我们调整攻击力量，给十八师加强了炮兵和机枪，向敌发起持续10分钟的排炮轰击，炸得敌阵地碎石乱飞，敌人遭受严重杀伤。攻击部队乘势冲击，一举突入敌阵。至此，敌七十四师的侧背阵地，已完全暴露在我军面前。但是，张灵甫仍不认输，收拾残兵败将，继续负隅顽抗，企图伺机突围。深夜，华野首长向我纵队下达了配合友邻部队，最后解决七十四师的命令，要求我们务必于5月16日拂晓发起全线总攻击。我们在刚攻占的敌地堡里召开紧急会议，进行部署。以往，王必成司令员的战前动员总是开门见山，简明扼要，而且往往要我多说几句。这一次，他声音宏亮，情绪亢奋，不厌其烦地说要不惜一切代价，冲上孟良崮，活捉张灵甫，高呼“我们要为两次涟水保卫战牺牲的战友报仇！”他确实动了感情，并且感染了每一个在场的人。

16日凌晨4时，浓雾沉沉，我纵队六个团和预备队全部进入预定位置。这时，芦山和五四〇高地之敌向东移动，企图突围。我纵队在获悉这一情况后，提前实施全线攻击。十八师五十二团一马当先，直扑敌五四〇高地。在我强大火力打击下，敌人陷入混乱，大量就歼被俘。五十四团则向东

攻上五四〇高地，敌人慌忙溃逃。五十三团和十七师四十九团沿横山东侧，协同八纵向芦山攻击。芦山敌一个整团陷入我两面夹攻和猛烈的炮击之下，经反复冲击和争夺，我军终于完全占领了孟良崮南面屏障芦山。上午7时许，正当敌人精疲力竭之时，我六纵使用了预备队。几天来，作为预备队的特务团作战较少，干部、战士早就憋着一股子劲。如今接到协同兄弟部队打下东、西五四〇高地，直捣孟良崮敌巢的命令，全团就像离弦之箭，直扑敌阵，不到两个小时，就打下了西五四〇高地西侧的二八五高地。敌人十分恐慌，立即组织500多人的兵力，在飞机掩护下向我特务团反扑。我特务团迅速向敌运动，与敌撕扭成一团，使敌机无法投弹，在近战中反扑之敌被打得七零八落。我特务团在歼敌100余人、俘获200多人后，乘胜前进，与五十二团、五十四团密切配合，攻占了东、西五四〇高地。下午14时，总攻开始。我军的炮火从四面八方齐轰孟良崮山顶及六〇〇高地，敌人的末日来临了。我六纵特务团首先突破孟良崮西侧，直捣敌七十四师指挥所。绝望的张灵甫急令他的参谋长魏振钺率1000余残敌冲下山腰，阻我前进。我特务团奋勇迎战，向上冲去，与这群亡命之徒展开激战，几经拼杀，将敌一部歼灭在山坡上，敌参谋长及敌军大部被生擒。我特务团一营三连在指导员邵至汉率领下，首先冲到张灵甫藏身的山洞前，他身上多处负伤，仍坚持战斗，不幸被从洞中冲出的亡命之徒击中，英勇牺牲。三连指战员怒不可遏，用抵近射击和白刃战消灭了占据洞穴和石岩的残敌，击毙敌卫队长，活捉了张灵甫。后续部队源源不断地赶到，将蒋介石的御林军，总共

三万余人的七十四师最后歼灭在孟良崮上。

孟良崮战役，我华东野战军以九个纵队的优势兵力，以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的英雄气概，一举歼灭敌七十四师，震撼了敌军阵营，挫败了蒋介石的重点进攻计划，广大军民无不额首称快，扬眉吐气。电影《红日》就是由原华野部队作家吴强根据孟良崮战役创作的，影片大长人民的志气，大灭敌人的威风，所以深受群众的喜爱。在孟良崮战役中，要说还有什么不足，那就是被我六纵特务团活捉了的张灵甫，却被一名对张灵甫恨之入骨的干部给打死了。这真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情，否则，我们一定要同他叙叙涟水的那段"往事"了。

说到张灵甫之死，还有一段小插曲。当我们决定把纵队特务团拉上去投入总攻时，我曾专门强调了一条，即尽量争取活捉张灵甫。因为我从报话机中得知他还在呼救，活捉这个蒋介石御林军的头目，对于动摇和瓦解敌人的斗志，意义重大。谁知后来发生了意外，把他击毙了。特务团向我报告了这个情况，我可来火了，说那不行，活要见人，死要见尸。你们马上派人把尸体抬回来，保管好。当时有人很不理解，认为这是多此一举。第二天，我纵队与兄弟纵队一起开祝捷大会。陈毅司令员亲自到会。他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就是，"张灵甫的尸体在哪里？"我不加思索地回答，"我们抬来了，请陈司令员验尸！"他满意地说："好，很好。"后来，我们遵照陈毅同志的指示，将张灵甫的尸体擦洗干净，换上干净服装，弄了口好棺材，入殓以后，通过关系转交给国民党方面接收。这个举动产生了强烈的政治回响，张灵甫的家属，国

民党的文武百官，还有跟着共产党走的许多民主人士，起码从中得到了一个共识：共产党是通情达理的。张灵甫的灵柩运到浦口，国民党派大员迎接，蒋介石亲临致祭，这等于是大张旗鼓地替共产党作宣传，影响有多大！对于必须妥善处理张灵甫的尸体，起初不理解的同志这时也恍然大悟，懂得了打仗不光要会打军事仗，还要会打政治仗。军事和政治都胜利了，才叫真正的胜利。

三　开展新式整军运动

1947 年夏季，解放战争的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蒋介石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相继破产，人民解放军开始了全国性的战略反攻，战争正引向国民党区域。

为适应我军转入战略反攻的新形势，华东野战军遵照党中央、毛主席的决策，于当年 8 月实行分兵。由陈毅、粟裕率华野第一、三、四、六、八、十纵队及特种兵纵队，组成外线兵团，执行外线进攻作战任务；许世友、谭震林率第二、七、九纵队及由胶东军区组建的第十三纵队，组成内线兵团，担负内线作战任务。从此，我六纵加入了外线作战的行列，驰骋于苏鲁豫皖的辽阔战场。

在这个新形势下，中共中央于 7 月 17 日至 9 月 13 日，召开了全国土地会议，随后，公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等重要文件。根据全国土地会议的决定，在放手发动群众，深入

进行土地改革的同时，结合进行整党、整军。整军的具体内容是“三查”、“三整”，即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和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这就是著名的“新式整军运动”。这是为最终夺取解放战争全面胜利的新形势下，我军政治工作和民主运动的一个重大发展。陈毅等华东军区首长于12月15日下达了《华东军区关于全军坚决拥护土地改革的命令》，要求全体指战员“普遍地贯彻三查三整以适应土地改革要求”。

1948年初，华野前委召开扩大会议，学习土改政策，部署整军运动，并于1月间接连发出了《关于三查结合三整工作的原则指示》等文件，强调“必须认真的彻底的进行全军上下毫无例外的‘三查’”。此时，我六纵奉命袭击郾城、宋城，部队移驻漯河东北、西华西南的逍遥镇诸葛市地区休整，并召开了纵队党委常委扩大会议，学习、贯彻党中央和华野前委的有关文件和会议精神。我代表纵队党委以整军的精神率先作了检查，发动到会同志对常委，特别是对我本人，以及纵队其他主要负责同志提批评意见。然后，对纵队的“三查、三整”运动作出部署，纵队领导和机关干部分头到各师、团，直至连队，听取基层干部和战士的批评意见，帮助和指导运动的展开。

在连队，先进行正面的土改教育，接着通过典型引路，由点到面，开展“倒苦水”、“挖苦根”的诉苦活动。纵队党委从十六师四十六团一连选择了一位苦大仇深的排长谢金生，在全师大会上带头诉苦，带动全师，进而带动全纵队，召开多种形式的诉苦会。干部、战士根据各自不同的遭遇，诉

说旧社会、旧军队，以及封建地主阶级的压迫剥削之苦。讲的都是亲身经历，真人真事，所以感染力极强，诉的人，听的人，都沉浸在无比悲痛和愤怒之中。特别是“解放战士”，诉苦引发的思想震动最强烈。纵队直属山炮团有位刚解放不久的上尉连长王金厚，主动上台讲自己在国民党军队里如何“揩兵油，喝兵血”，揭露了国民党反动军队的种种黑暗和罪恶，他还用自己解放过来以后的亲身体会，把国民党军队同人民军队作对比，这就使他的发言成了对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反动军队的有力控诉。我六纵有一半左右的战士是“解放战士”，王金厚连长的现身说法，像一颗炸弹在他们中间爆炸了，许多土改前后参军的新战士也深受感动。全军上下，纷纷进行蒋管区和根据地，旧军队和人民军队，土改前和土改后的两个社会、两类军队、两种遭遇的对比，诉苦活动变成了“忆苦思甜”，迅速推向高潮。纵队党委因势利导，引导大家深入“挖苦根”，使大家懂得什么是剥削，什么是阶级，进而懂得广大劳动人民所受各种痛苦的总根子，就是以蒋介石、国民党为代表的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全纵队指战员同仇敌忾，“打倒反动派，解放全中国”，成了大家的共同决心和誓言。

在诉苦的基础上，纵队党委从部队的实际情况出发，将战士“三查”具体化为查忘本思想、入伍动机、战斗表现和对土地改革的立场、态度。干部还要查地富思想、军阀残余意识、享乐思想、本位思想。先作自我检查，然后相互批评。整个“三查”自始至终贯串了充分发动群众和充分发扬民主的精神。连队建立了“战士委员会”，对“三查”有很大的发言

权，指定哪个干部检查，那个干部就得作检查。纵队党委鼓励大家向党委、向领导提批评意见，并且规定任何人都不准报复打击。从开展批评的情况来看，总的是实事求是的，但在连队基层也曾出现过某些纯属道听途说、主观臆断的不实之词；有的连队由于受地方土改中一度出现的“贫雇农当家”影响，也提出“三查、三整”要由战士委员会“当家”，任意给干部戴政治帽子，甚至进行体罚或处分干部。纵队党委发现这些情况以后，立即按照华野党委的有关指示精神，重申：纵队党委坚决支持战士批评干部的民主权利，但运动必须由党委领导，必须坚持贯彻“党指挥枪”的原则；我们的民主是集中领导下的民主，不是自由主义、尾巴主义的“民主”；对坏分子的处理，必须经过上级党委批准才能执行；严禁超出思想斗争以外的任何错误做法。同时规定，在“三查、三整”进行过程中，一律不作政治结论。由于纵队党委态度坚决，及时扭转了偏向，从而保证“三查、三整”有领导和有秩序地进行。

3月上旬，由于出现敌情，“三查、三整”暂时中断。全纵队经连续四天秘密急行军，甩开敌人追踪，北渡黄河，于3月13日抵达河南濮阳。这时，毛泽东同志《评西北大捷兼论解放军的新式整军运动》的重要文章在《解放日报》上公开发表。华野党委于3月中旬再次召开扩大会议，学习毛主席的文章，并对照检查执行党中央方针、政策和毛泽东建军思想的情况，开展反对军阀主义倾向的斗争，以达到提高各级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的政治思想和政策水平，改进领导作风，加强军内外、党内外团结的目的。党中央十分重视这次

会议，朱德总司令曾亲临指导。六纵由我和王必成、皮定均、陈时夫、杜屏、谢胜坤等领导干部参加了会议。我们在学习和讨论中，一方面坦诚相见地向上级党委提出批评意见，另一方面在小组会上联系本纵队和各人实际，开展自我批评，检查自己的思想和工作。王必成同志还代表六纵在大会上作检查发言，大家认为讲得很深刻，前委向华东各部队转发了这个检查发言。会后，我们结合贯彻前委扩大会议精神，部署了"三查"的复查、补查和"三整"的开展，继续做好查清干部、战士的出身和历史，进行干部鉴定、改造党支部、建立健全各项财务制度等工作，要求做到没有空白单位，不留"死角"人员。在做法上，以营以上党委和干部为重点，自己摆问题，谈危害，挖根源，订措施。连以上干部集中到团部学习，团以上干部除了在本单位检查外，还分批下连，与战士同吃、同住、同操练、同学习，接受群众的批评帮助。通过复查，加强了干部、战士之间的思想交流和相互帮助，进一步密切了官兵关系，达到了既弄清思想，又增强团结的目的。

4月中旬，运动进入"复仇立功"阶段。我六纵各级党组织，将广大指战员在"三查"中激发的对国民党反动派强烈的阶级仇恨，及时引向苦练军事技术，提高杀敌立功本领的活动，并针对部队在自卫战争中暴露出来的作战方面的问题，提出"打硬仗不打蛮仗，打明白仗不打糊涂仗"的口号，使指战员认识到，打胜仗不能光凭勇敢，还要讲究战术，避免不必要的牺牲；打胜仗后要及时总结经验，知道获胜的原因，做到打一仗进一步。全纵队上上下下掀起了学习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热潮，首先是团以上干部，认真学习和深刻领会

我军的十大军事原则，掌握我军动作迅速、灵活机动、连续作战的特长，还针对我六纵在攻击战中的弱点，抓紧抓好实施火力、爆破、突击三结合战术的训练；基层连队，普遍开展了官教兵、兵教兵、兵教官的练兵运动，演练破坏鹿砦、铁丝网障碍和攻击子母堡的战术手段，以及训练土工作业、特别是近迫作业，要求人人学会炸药捆包和引爆技术，更多的人掌握八二迫击炮、六〇炮，以及枪弹筒掷炸药的技术。在后勤保障、战场救护等方面，也加强了训练和建设。

我们六纵这次整军运动，到5月份宣告结束。经过"三查"、"三整"，全体指战员的精神面貌为之一新，阶级觉悟大大提高，部队战斗力大大增强。整个纵队出现了讲团结，守纪律，顾大局，为人民解放事业而英勇献身的浓厚政治气氛，军事技术也有了很大进步。在尔后的豫东、淮海、渡江等战役中，都显示了新式整军运动的巨大威力。

第十四章 从豫东打到江南

一 激战龙王店

1948 年 6 月，我六纵结束在濮阳地区的新式整军运动后，投入了豫东战役。

豫东战役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我华野第三、第八纵队以突然行动向敌军在中原的重镇——河南省会开封发起攻击。战斗从 6 月 17 日开始，经过七天激战，解放了开封城，歼敌 38000 人。我六纵除担任华野领导机关的警卫任务外，还在曹县担任打援任务，坚决堵住敌第五军三个旅对我六纵第十七师、十八师的合围。我军攻占开封的胜利，使国民党朝野一片惊慌。蒋介石为挽回颓势，夺回开封，迫我决战，急令邱清泉兵团及第四绥靖区部队向开封攻击前进，又以整编七十五师、第七十二师及新编第二十一旅组成一个兵团，由区寿年任司令官，从民权经睢县、杞县迂回开封。这样，敌人果然被我华野首长所调动，豫东战役进入第二阶段。华野首长决定第三、第八纵队主动放弃开封，向通许地

区转移，吸引邱清泉兵团尾追，使其远离区寿年兵团；然后以第一、第四、第六纵队，以及中原野战军第十一纵队组成突击兵团，围歼区兵团。

6月26日，我华野第三、第八纵队撤出开封以后，邱清泉即以一师先头部队占领该城，主力尾随我军南下而来。此时，区寿年兵团见邱兵团捷足先登抢了头功，就停步不前，在睢县、杞县地区逡巡不前。这就使邱、区兵团之间形成了相距40公里的空隙。6月27日晚，我突击兵团抓住这个稍纵即逝的良机，不待查明区兵团各部的具体分布，就发起猛烈攻击。区寿年见我各部大军滚滚而来，急忙收缩兵力，退守龙王店、何旗屯及其东北一线。我六纵位于一纵和四纵之间，向敌攻击前进。

龙王店是豫东平原上的一个较大镇子。像河南黄泛区的许多城镇一样，为防御滔滔黄河水，龙王店也筑有一大圈高大厚实的围墙，区寿年将兵团部和整编第七十五师师部及数团兵力猬集于此。敌人在墙外开挖壕沟，砍除高秆庄稼，设置多层鹿砦，将四周围墙加固，大门堵死，还在镇子上构筑纵横交错的防御工事，把整个龙王店变成了一座重兵把守的要塞。华野首长鉴于龙王店四面均已暴露在我攻击部队之下，残敌分散在几个村落自顾不暇；北来的邱清泉兵团被我第三、第八纵队堵在杞县西南，徐州来援的黄百韬兵团尚未到达，遂决心于7月1日夜23时发起总攻龙王店的战斗，全歼区寿年兵团。

这时，豫东大地骄阳似火，像个巨大的蒸笼使人喘不过气来。我六纵十七、十八两师于7月1日下午开始，秘密运

动到龙王店的南面，进行掘进作业。指战员们在烈日炙烤下向敌阵地不停掘进，汗水和黄土搅在一起，一个个成了“活泥人”。晚上23时，总攻开始。在猛烈的炮火掩护下，我突击兵团各路纵队直捣敌巢龙王店。在西南面，我六纵十七师五十一团爆破队员迅速将一包包炸药堆放在守敌的土围墙下，一声巨响，土围墙被炸开一个两丈多宽的口子，敌人大批倒下，我突击队员跃出战壕，突进围墙，用集束手榴弹消灭了残敌。正当我军乘胜向纵深发展时，隐蔽在第二道屏障后面的敌火焰喷射分队突然开火，十几道火龙猛射过来，街道房屋被火焰吞没，我突击队员身陷烈焰之中。我五十一团第二梯队见状迅速发起攻击，乘敌人装换药剂的短暂间隙，向敌喷射分队甩去密集手榴弹，敌人弃镇西逃。此时，我后续部队已紧跟突击队冲进街区，分路向敌兵团部所在地冲去。在东南面，我六纵十八师五十二团打得尤其艰苦。一营四连爆破班是六纵著名的红旗爆破班，班长何俊杰带领全班担负扫除外围障碍和子母堡的艰巨任务。他们巧妙地利用敌人的照明弹引路，摸清敌人子母堡和鹿砦的位置，将70公斤重的炸药包放到敌堡下面，把敌人“送了上天”。接着爆破班来到第二道鹿砦前。敌人不停地从地堡里向外打曳光弹，阵地如同白昼。何班长命令第三组端掉侧面的地堡，自己带领第二组炸正面的地堡。他们到达敌地堡前时，战士何文章一把抢过何班长手里的炸药包在烟雾中滚进。当他跃上地堡，安放好炸药包时，腿部已被炸断，不能爬动了。于是，他一面喊战友慢点上来，一面拉响炸药包，与敌人同归于尽。何文章这位青年战士，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就

这样壮烈牺牲了。爆破班的四包炸药很快全部炸完，敌人的鹿砦、地堡和围墙三道障碍还未完全扫除，怎么办？爆破班和突击排的战士就用手榴弹与敌人拼，用手拔掉鹿砦，掩护兄弟部队从侧面打进鹿砦里，俘虏了围墙外的200余敌人。经过审问，得悉区寿年还躲在镇里，指战员们高兴极了，立即向敌人最后一道防线的围墙发起进攻。围墙里守敌居高临下，用火焰喷射器向我五十二团开火。我军虽遭很大伤亡，仍前仆后继，猛攻敌人，突入围墙。

在我六纵攻破敌人最后一道防线的同时，友邻部队亦从不同方向攻入龙王店。区寿年原以为凭借坚固的防御工事，至少可以坚守三天，孰料仅三个小时就招架不住了。成群的敌人狂奔乱跑，拥挤在镇中的几条主要街道上。突然，四辆敌军坦克从街心开出，径直朝东大门开来，十几名来不及躲闪的敌兵顿时惨死在坦克履带之下。我五十二团许多指战员还是第一次见到坦克，有的端起机枪和步枪扫射，只听"当、当、当"的响声，子弹被反弹到了地上，有的甩手榴弹，也只听"轰、轰、轰"的爆炸，不见坦克停下来。当第一辆坦克到达东门时，一排排装满土的草袋堵塞在门口，坦克发疯似地向门楼冲去，虽撞塌了门楼一角，但未能将门楼撞开，只好掉头南逃。其他几辆坦克已被我军团团围住，很快炸毁了两辆，炸坏了一辆，只剩南逃的那辆还在爬行。这时，我八连二排长邱永鑫只身跳到坦克履带边的甲板上，狡猾的敌人将坦克来了个360度急旋转，用炮管将他扫下坦克。邱永鑫左胳膊鲜血直流，忍着剧痛从地上爬起来，一边骂着说"老子非制服你不可"，一边由战友们托着再次爬上坦克，

紧紧伏在炮塔上，任敌人怎么转动炮塔，他的身子稳稳地随着炮塔转动。他不慌不忙，经过一番摆弄，终于掀开了坦克顶盖，大家好不高兴！突然，从坦克里伸出一支手枪，“叭”的一声，靠在坦克边上的五十二团作战参谋周君贤被击中肚子，鲜血直淌。指战员们愤怒地喊着：“炸死他们！”邱永鑫拔出一颗手榴弹，拉了弦挂在坦克顶盖上方，大声喝道：“投降不投降？再不投降就炸死你们！”坦克里传出了低沉嘶哑的“投降……投降”的哀叫声。接着，一个大脑袋伸了出来，中将军衔在双肩上金光闪闪，原来他就是国民党第七兵团司令官区寿年！不一会儿，五十二团指战员又从被炸坏的另一辆坦克里“请”出了敌整编第七十五师中将师长沈澄年。

我至今还清楚记得当时与区寿年谈话的情况。他沮丧地对我说：蒋介石好比一碗鸡汤，被人民解放军喝一口汤，再添一勺水，久而久之，他这碗鸡汤已变成了一碗水；而你们是愈战愈强，愈战斗志愈旺，你们延安有毛泽东、周恩来，中原有陈毅、粟裕，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蒋介石是败局已定了！

龙王店被我军攻克以后，敌整编第七十五师十六旅旅部及所属两个团仍固守在何旗屯和榆厢铺两地。我六纵第十七师和八纵主力分别承担了攻打两地敌军的任务。何旗屯位于睢县西南境的惠济河北岸，村落四周为防洪水泛滥筑起了一丈多高的土围子，土围子外面有一道防洪沟，沟外是开阔的平地。敌军3000余人，日夜加筑防御工事。在村庄四周及庄内主要巷口墙角构筑了大量明碉暗堡，组成了以子母堡群为核心的防御体系；在土围子外砍伐树木，排列

成密集的鹿砦，埋置了地雷，敌人还以反动骨干分子组成"敢死队"，保卫其旅部。

我们摸清了敌人布防情况，又分析了守敌南临惠济河，正值夏天水大，又无渡河船只，故难以向南逃窜。于是，我们决定十七师部队从东、北、西三面实施攻击。具体部署是，五十一团在东主攻，直取敌旅部；四十九团一、三营攻歼村北之敌；八纵配属给我纵十七师的六十七团在西攻击，牵制敌兵力；四十九团二营为师预备队。7 月 3 日下午，开始了扫清敌外围阵地的战斗。当晚 20 点 30 分，向何旗屯突然发起总攻，我各路突击队在炮火掩护下，迅速进抵冲锋位置。五十一团七连从东面炸开三道鹿砦，进入围墙爆破。由于围墙太厚，只炸开了一个小口子。还没等我军第二次爆破，敌人醒悟了过来，急调北面主力赶到我主攻的东门，敌军密布在突破口两翼的火力点也开始复活，五十一团的进攻一度受阻。此时，我四十九团九连已顺利炸开敌布下的层层鹿砦和土围子，并乘敌转兵东援之机，一举突破敌军防线，占领了北面的突破口。八纵六十七团也同时攻占敌西侧阵地。我和王必成同志得知这一情况，立即要十七师加强北面攻势，改由北路进攻。于是，五十一团主攻营继续从东门攻击，第二梯队则转兵北门，协同四十九团向敌纵深冲击，战斗进入白热化状态。敌人凭借坚固的庄内防御体系拼死顽抗，我军与敌逐街逐屋反复争夺，整个何旗屯映照在火光之下。在激战中，我五十一团再次爆破成功，突破了敌东面防线，推进到敌旅指挥部近百米之处。敌旅参谋长抬出一桶银元，当场分赏给百余名"敢死队"队员，这些亡命之徒，一个个携带长

短枪，手提雪亮的大刀，嚎叫着向我五十一团主攻营扑来，在一段仅有10米长的街道上，展开了激烈的格斗，留下一具具尸体。我英勇的五十一团，彻底打垮了敌“敢死队”。7月4日零时，我十七师预备队投入战斗。四十九团二营由北门向南快速前进，将残敌分割包围在少数院落里。凌晨2时许，我四十九团二营和五十一团二营向敌旅指挥部发起最后攻击，炸药包炸塌了敌指挥部的围墙，成捆的手榴弹投向敌人据守的房屋，仅30分钟就全歼敌十六旅旅部和四十八团团部。残敌纷纷投降。我纵十七师共俘敌2300余人，取得了豫东战役的又一胜利。

在豫东战役第二阶段中，我华东、中原野战军仅用10天时间就歼敌5万余人。其规模之大，战况之激烈，战果之辉煌，都是空前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是一场中原会战，也是日后规模更大的淮海决战前的一次实战预演。我六纵在豫东战役中经受了考验，进一步增强了攻歼作战的能力。

二　决战淮海

豫东战役胜利结束以后，粟裕率西兵团（即外线兵团）于8月下旬开抵山东泰安、曲阜一带休整。至此，分兵一年的华东野战军部队实现了东、西兵团会合。

10月上旬，我参加了华野前委在山东曲阜召开的前委扩大会议，听取传达9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制定的“从根

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统治”，“夺取全国政权”的决策精神，参加讨论了华野全军如何作出相应的部署，并且围绕学习毛主席关于“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的重要指示和华野前委扩大会议通过的《关于加强纪律性，克服无政府状态的决议》，对我们六纵两年来的工作进行了检查总结。我深感曲阜会议是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使华野全军在政治上和思想上更加团结，组织上和行动上更加统一，纪律性和战斗性大大加强，为我军夺取淮海战役的胜利提供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在曲阜会议上，我们还参加讨论研究了淮海战役的作战部署，遵照毛主席制定的《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对战役第一阶段的作战计划、兵力部署作了全面安排。会后，我六纵广大指战员很快投入了淮海战役的各项准备工作。

淮海战役第一个作战目标，是钳制邱清泉、李弥两个兵团，歼灭黄百韬兵团，首先砍掉敌人的右臂。华野首长赋予我六纵的任务，是和兄弟纵队一起，向徐州以东新安镇地区的黄百韬兵团实施主要突击，迅速歼灭该敌。战役发起之前，我六纵通过传达贯彻曲阜会议精神，总结经验教训，整顿作风和纪律，开展攻坚作战训练，使会议精神迅速转化为夺取新胜利的力量，全纵上下牢固树立起打前所未有的大仗、恶仗的思想。

11 月 6 日，淮海战役打响。我六纵和兄弟纵队一起，以排山倒海之势，向新安镇地区的黄百韬兵团攻击前进。敌人慑于被各个歼灭，遂令黄百韬兵团于 7 日晨放弃新安镇，向徐州收缩靠拢，以作决战防御。我们在判明敌人的这一突然

变化后，来不及等待上级的具体指示，即根据华野战字第13号攻击命令中关于“如发现敌收缩集结征候，应不失时机的展开挺进截击，各个歼灭之”的精神，急令各师迅速越过陇海铁路，从东向西追击敌人。全纵指战员与敌人抢时间，争速度，不怕打乱建制，不被小股敌人纠缠，以日行百里的速度，昼夜兼程，猛打穷追，至11日晚进抵碾庄、曹八集以南以西地区；此时，华野十三纵队乘何基沣、张克侠率部起义之机，由北向南直插陇海铁路，与我六纵会合，达成了对黄百韬兵团的包围。至此，黄百韬兵团的五个军，除六十三军和一〇〇军的四十四师在西逃中已遭歼灭外，其余被全部围困在碾庄及其周围不到18平方公里的狭小地带。在完成对敌包围后，我六纵乘敌惊魂未定，连续两天出动六个团的兵力扫清外围，继续压缩包围圈，攻占了碾庄东南、西南的大张庄、王家集和王庄等要地。

11月13日前，我军围歼黄百韬兵团的战斗，是在边追击、边合围、边攻击状态下进行的，因而组织准备工作不够严密充分，战果也不大。为了加速围歼黄百韬兵团，华野代司令员兼代政委粟裕于14日晚召开有关纵队负责人会议，总结经验教训，区分任务，调整部署。这时，我六纵正在准备当晚攻击彭庄的事宜，就由纵队副司令员皮定均和副政委陈时夫出席会议。会上确定，由华野副政委兼山东兵团政委谭震林和山东兵团副司令员王建安统一指挥各纵队，并下达我六纵首先攻歼彭庄、前黄滩之敌，尔后向碾庄实施突击的作战任务，这与我们原来的部署相吻合。会后，粟裕、谭震林专门来电话查询攻打彭庄的准备情况，问把握性大不大。

我们作了肯定回答，并报告具体作战计划，得到粟、谭首长的批准。彭庄位于碾庄西北3公里处，敌一〇〇军军部、直属炮兵营、工兵营、特务营、六十三师师部及三个步兵团麇集于此。敌人在村内和村周围突击构筑以野战地堡群为骨干的防御阵地，形成犬牙交错、纵横贯通的野战工事，企图固守顽抗。我们针对一〇〇军的防御特点，采取了三面攻击、一面截击与阻击的部署，力求全歼该敌，不使逃脱。

11月14日晚20时许，华野司令部配属给我纵的火炮，加上我们原有的火炮，发起了10分钟火力急袭，压制了彭庄东北角的敌炮兵火力，并摧毁了突破口的大部工事。随后，我十八师由西南及西北，十六师由东及东南，同时发起攻击。十七师则在彭庄和黄滩之间截击与阻击，并向黄滩进行近迫作业。战斗发起后，敌以彭庄阵地为依托，进行连续反冲击，并乘我进击部队立足未稳之际，集中炮火进行还击。我攻击部队充分发挥近战夜战特长，实施多方位攻击，与敌逐堡、逐屋、逐村地反复争杀，战局进展缓慢，敌我形成胶着状态。为加速歼敌，防其逃向碾庄，我们迅速调整和加强攻击力量，调十七师一部投入战斗。在战术上，采取攻其指挥首脑机关，乱其部署的战法。15日凌晨2时，我两个团直插彭庄中心，割裂敌防御部署。这一着震撼了彭庄守敌的军心，局势发生了有利于我军的急剧变化。各部队乘敌动摇之际，猛打猛冲，一鼓作气，将敌分割成几小块，再以炮火、爆破及突击相结合的战法，将其各个击破。敌军除军长周志道负伤后率少数残兵逃窜到黄滩外，副军长杨诗云、军参谋长崔广森以下，全部被俘。

刚攻下彭庄，就接到上级命令，继续向彭庄以东的前、后黄滩攻击。于是，我们要警卫人员将俘获的杨诗云、崔广森带走，部署新的战斗。黄滩在碾庄以西1.5公里处，敌四十四军军部，一五〇师、一六二师两个师部及所辖的三个步兵团盘踞于此，防御工事比较坚固。11月16日晚18时，我们先以一部兵力发起攻击，由华野司令部配属给我六纵的七辆坦克在前开路。由于战前对敌情和地形侦察不够周密，首次使用坦克和步兵协同作战没有经验，步兵与坦克脱节，所以进展较慢。到17日凌晨3时，虽突破了敌前沿阵地，但我步兵在突破口遭敌三面火力夹击，攻击受阻。友邻十三纵对后黄滩的攻击也未奏效。上级指示，十三纵南调执行新的作战任务，攻击前、后黄滩的任务由我六纵独立完成。这样，我们及时调整了攻击部署。为进一步掌握敌情，17日黄昏，十七师师长梁金华化装成国民党军，开着两辆坦克，抵近敌前沿阵地侦察。我军坦克大摇大摆地开到敌阵地前，梁金华等人主动发话，我们是第二兵团派来与黄司令联络的。敌士兵喜出望外，纷纷爬出堑壕，迎接“援军”到来。但是敌军官十分狡猾，不准士兵回话。我侦察人员乘此良机，仔细观察了敌指挥所及工事的具体配置。我们根据新侦察到的敌军部署情况，周密进行了总攻前的准备。各部队深入进行了战地动员，用兄弟纵队痛歼黄百韬兵团其他各部的胜利捷报鼓舞指战员，全纵上下斗志昂扬，决心在歼敌一〇〇军的基础上，再歼敌四十四军。

11月18日零时，我六纵所有火炮一齐开火，对敌黄滩阵地进行了30分钟的火力急袭，守敌陷入一片火海之中，

敌工事大部被摧毁。我攻击部队迅速发起冲击。十八师首先从西北角一举突破，紧接着十七师和十六师也分别从南面和西面突破。我两个团由西向东直插敌核心阵地，在坦克引导下，猛攻敌指挥所。敌军指挥瘫痪，一片混乱。我军经4小时激战，全歼前、后黄滩之敌，敌四十四军中将军长王泽浚被我生俘。一五〇师在我政治攻势下，由师长赵璧光率部投降。至此，黄百韬伸向徐州方向的一只臂膀已被我们砍掉，由西通向碾庄的障碍已全部扫清。18日上午，腿部负伤、满脸灰尘的敌四十四军军长王泽浚被带到我纵队指挥部。我们按政策以礼相待。他以浓厚的四川口音，讲了他这个非嫡系部队被蒋介石摆弄的境况，然后感慨地说："现在完了，被打得精光了！"泪珠簌簌滴了下来。

19日22时，我军向碾庄发起全线总攻，六纵奉命由西南发起攻击。两小时后，我们接到华野首长电令，要我六纵撤出战斗，挥师南下，与兄弟纵队一起进击援敌李延年、刘汝明两兵团。该两兵团被中原野战军阻击在安徽固镇以北的任桥、花庄集一线。为了保障中野集中兵力围歼黄维兵团，华野首长根据淮海战役总前委的意图，提出集中五个纵队歼击李延年兵团的部署。六纵的任务是，沿浍河以南向津浦线固镇、新桥段攻击前进，断敌退路，阻击援敌，然后协同兄弟纵队包围和歼灭固镇任桥之敌。11月27日晨，六纵由蕲县集奶奶庙地区出发；28日，先头部队第十八师由河集南渡澥河，进抵李园一线，沿途歼敌一部。这时，李延年见我大军迅猛南下，为免于被歼，狼狈南逃，猬集于蚌埠、淝河之间东西地区。我六纵于30日在南岳庙截断了敌三十九军独

立团和辎重团的退路，战至黄昏，歼其两个营。独立团团长邓纠夫、副团长杨涤非、辎重团作战主任朱德昌等人，见大势已去，率部向我投降，受到我军宽大待遇。他们纷纷诉说："国民党快倒台了，再不能干下去了，大官抢在前面逃命，我们不愿意替他们当炮灰。"李延年在南逃后，受到蒋介石的严辞斥责，不得已再次与刘汝明率部北进，以解黄维兵团之围。为此，六纵于12月1日进抵蚌埠以北的预定位置，在东起徐郢，西至古城，南起曹老集，北至张集，正面70余里，纵深40余里的地带，以清沟湾河为依托，阻敌北援。

12月2日，李、刘两兵团在坦克和炮兵支援下，以三个军的兵力，对我仁和集、曹老集、周家口一线进行攻击。我六纵各部依托工事，反复争夺，激战至5日黄昏，我十七师、十八师相继转移至界沟沿、陈集、石桥子、张八营一线阻击。中原野战军二纵赶来参战，与六纵并肩抗击敌人。6日，敌人以三个军的兵力继续发动攻击，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我军沉着应战，顽强阻击。坚守陈集的十六师四十七团两个连，等敌人进至阵地前80米时才开枪，以密集的火力将敌打退，歼敌300余人，我仅轻伤3人。敌人两个营向石桥子我十七师五十团九连进犯，连党支部书记号召大家沉着射击，要"一枪打一个"，结果全连等敌人进至阵地前沿时猛烈射击，毙敌130余名。在一周阻击期间，我六纵以顽强的坚守、迅猛的反击和不断的夜袭，给敌以重大杀伤。在我节节抗击之下，敌进展缓慢，伤亡惨重。华野首长屡次增调部队前来参战，更增强了六纵的阻击力量，鼓舞了指战员胜利的信心。从12月11日起，敌人投入20余辆坦克，对我发动了更

加猛烈的进攻。战至15日午夜，黄维兵团于双堆集被全歼，李、刘两兵团全线溃逃，我六纵转入分路追击之中。此后，六纵又奉命北上宿县地区集结待命。

我们在淮海战场上迎来了1949年元旦。1月10日，杜聿明集团被我军全歼于陈官庄地区。1月17日，我六纵再次南下，于19日强渡淮河，进入蚌埠。

在淮海战役中，我们以华东野战军16个纵队、中原野战军7个纵队，计60万兵力，同以徐州地区为中心的南线国民党军34个军，计80万兵力，进行主力决战，总计歼敌55.5万余人。这是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迹！我华野六纵，在兄弟纵队密切配合下，两个半月浴血奋战中，共歼敌28900余人，其中俘敌四十四军军长、一〇〇军副军长以下13800余人，圆满地完成了上级赋予的作战任务。

三　渡江作战

回顾淮海激战的峥嵘岁月，我难忘在战场上学习毛泽东同志撰写的《将革命进行到底》的1949年新年献词。毛主席在献词中满怀信心地宣告，“中国人民将要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获得最后胜利，这一点，现在甚至我们的敌人也不怀疑了”，并指出，“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向长江以南进军，将要获得比1948年更加伟大的胜利。”

淮海战役以后，我们遵照党中央和华东局的指示，立即

转入整训，为执行渡江作战和进军江南的新任务作好准备。在这期间，我参加了华野前委在徐州贾汪召开的两次扩大会议。第一次扩大会议，着重学习和贯彻中央政治局一月会议关于形势和任务的指示精神，制定了华东我军在1949年的六项任务，其中特别强调要做好发动与组织新区广大群众的工作；要加强政策和纪律教育；要尊重地方政府，服从各项法令；要努力学习军事，强化政治工作，健全规章制度，坚决与圆满地完成作战任务，将革命进行到底。这次会议结束以后，毛主席于2月8日再次来电，对华东部队的整训作了重要指示，要求突出对指战员的政策教育，作好接收并管理大城市的准备工作，还要经营江南广大的乡村。这样，华野前委再次在贾汪召开扩大会议，贯彻和落实毛主席的指示精神。通过这次会议，我们更加明确了我军不仅是一个战斗队，而且是一个工作队。在城市，我军必须善于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广大群众，争取其他能够同我们合作的人，以便向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势力作斗争，接收和管理好城市；在新区农村工作中，必须采取与老区不同的政策，首先开展剿匪反霸斗争，为以后实行减租减息作准备，并创造分配土地的先决条件。在第二次扩大会议结束前，根据中央军委1月15日的命令，对华东部队实行了统一番号和整编。华东野战军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所属部队整编为第七、第八、第九、第十共4个兵团，16个军。其中八兵团下辖第二十四军(原第六纵队)、第二十五军(原第七纵队)、第二十六军(原第八纵队)和第三十四军(原江淮军区部队与淮海战役中起义的何基沣部合编而成)，陈士

渠任兵团司令员，袁仲贤任兵团政委，我调任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渡江作战是在淮海战役期间组成的总前委统一领导和指挥下进行。总前委由邓小平、刘伯承、陈毅、粟裕、谭震林等五位同志组成，邓小平为书记。3月下旬，我参加了总前委在安徽肥东瑶岗召开的兵团以上干部会议，会上研究制订了《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这时，蒋介石业已"下野"，躲在幕后指挥，而让李宗仁充任"代总统"，派员与我党进行和平谈判，借以苟延残喘；同时纠集残兵败将，在江西湖口至上海的800公里地段上布置长江防线，妄图阻挡我军渡江，占据江南半壁江山。敌人部署于江防的部队有75个师，45万兵力，另有海军的江防船队、第二船队以及300架飞机集结于长江中下游地区。我军决定以第二、第三野战军组成东、中、西三个突击集团，采取宽正面、有重点的多路突破手段，实施强渡长江的作战计划。其中，东集团以三野八、十兵团及苏北军区部分部队组成，共35万人，由粟裕、张震指挥；中集团以三野七、九兵团组成，共30万人，由谭震林指挥；西集团以二野三、四、五兵团及地方部队组成，共35万人，由刘伯承、张际春、李达指挥，此外，四野先遣兵团及中原军区部队20万人亦归西集团指挥。这是名副其实的"百万雄师过大江"。

任务明确以后，我八兵团指挥机关由蚌埠进驻滁县。各部队采取做报告、上课、座谈讨论和个别思想互助等方式，掀起学习"形势和任务"的热潮，使广大指战员对敌人的反动本质以及"和平"阴谋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对渡江作战的

必要性和艰巨性有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与此同时，各部队加紧对国民党防御部署和工事以及地形水情的调查侦察，加强以强渡江河和水网稻田地形作战为内容的战术技术训练。特别是对如何顺利航渡和突破敌滩头阵地这两大课题，各部队作了充分准备。针对许多指战员不熟悉水情的困难，我们组织指战员练习游泳和划船，制作并学会使用救生器材，在训练中反复演习上下船、航渡、水上射击、滩头爆破、登陆冲击等动作，还在夜晚组织了长江试航。我们按照每一条船都必须是一个独立的战斗单位的原则，配备了船工和水手，调整了火器。经过勤学苦练，我们基本上解决了渡江作战的各种战术和技术难题，真正做到"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只等党中央、毛主席一声令下，我军就万船竞发，直捣金陵。

在渡江作战开始之前，我八兵团指挥建制有了较大变化。首先是根据渡江作战需要，将二十四军调归中集团指挥。二十四军是组建于皖南事变后的一支铁军，抗战期间长期战斗在苏浙皖边区。在多年的枪林弹雨中，我同二十四军的同志结成了深厚的革命情谊，此时为了人民解放事业，只好同他们分手了。二十四军调归中集团后编入七兵团渡江第一梯队，计划先期渡江，攻占铜陵后，迅速向南陵、繁昌、宣城、广德方向攻击前进，从后路包抄南逃之敌，并相机夺取杭州。接着，将我八兵团二十五军调归中集团九兵团指挥，计划从裕溪口渡江，攻占芜湖、马鞍山等地；而将九兵团所辖二十军和七兵团所辖三十五军调归我八兵团指挥。二十军的任务是先歼灭敌在江北的三江营、口岸、仪征、瓜洲

等地桥头堡，再参加强渡长江的作战。该军的前身是新四军东进作战时的老“江抗”部队，对这一段长江两岸地区十分熟悉，部署在这里渡江是最适当的了。

此时，还有一个最后并未付诸实施的计划。这就是中央军委于2月下旬曾向三野下达了攻占浦口及炮击南京的任务，目的是配合国共两党的和平谈判，警告国民党反动派不要玩弄假和谈阴谋。三野首长将这一任务交给我八兵团。为此，我们进行了紧张的准备。作为南京北大门的浦口、浦镇及江浦县一带，岗峦起伏，市镇稠密，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太平天国革命时期，进攻太平军的清军就是把江北大营设置于此。国民党当局为确保江防和首都南京的安全，在此部署了二十八军和九十六军，共四个师的兵力。其中二十八军五十二师几年来未受我军打击，其他三个师均是曾被我歼灭后又重建的。敌二十八军军部设在浦镇铁路工厂，敌九十六军军部设在浦口，并以这一带众多的工厂和山头为依托，构筑大批明碉暗堡，还在沿江和铁路、公路一线修筑起道道防线，准备作垂死挣扎。我们针对敌情，作了如下部署：以二十六军(全椒地区)、三十五军(乌衣镇)、三十四军(六合新集)及二十五军一部(含山以北)共11个师参加战斗，外加特纵配属的两个榴弹炮团。攻击重点是铁路工厂和浦口车站。攻占浦口以后，立即炮击南京。我们炮击时间预定在3月20日开始。总前委于3月14日批准了我们的部署计划，并在当日上报中央军委。由于预定3月20日左右举行国共和谈日期推迟，中央军委接报后提出了一个问题，即我军攻占浦口、浦镇之后，是否炮击南京，这要看谈判进展情况而

定。如谈判有利于我，不要炮击；谈判破裂，再考虑炮击。这是因为，和谈进展顺利，攻占两浦后再炮击南京，势必吓跑南京国民党政府的大部分人员，不利于签定有利于我的协定，也不利于我方和平接收南京政府的工作。关于攻占两浦的具体行动时间，必须由中央军委批准才能执行。

3月18日，我参加了总前委在滁州召开的商讨攻占两浦问题的会议。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精神，与会同志再三考虑，觉得攻占两浦的时间，必须与渡江作战的时间相衔接，其间隙以三四天为最好，如果间隙时间超过七天以上，就会使敌人从容部署，还会使我方在江南的可靠关系中断，并暴露我军部署情况，增加渡江作战的困难。基于这样的考虑，总前委再次致电中央军委，建议攻占两浦的时间根据渡江作战的具体日期来确定。中央军委对总前委的建议极为重视。经再次研究，于3月19日回电总前委，指出是否攻占两浦，要待谈判开始后才能决定，如谈判有成功的希望，则不要攻占两浦，以利和平接收南京；即使谈判不成功，也要根据渡江作战的实际需要，确定是否要攻占两浦。如军事上无攻占必要，则可置之不理。这样，经过充分的民主讨论，中央军委放弃了最初拟定的攻占浦口并炮击南京的计划。从这件事情，生动说明了革命战争年代，我党我军领导的高度民主作风。许多重大战略决策，都凝聚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集体智慧，所以才能料敌如神，无往不胜。孙子兵法上所谓"将能而君不御者胜"，我们在实践中感到是有道理的。总前委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精神，于3月26日决定，我八兵团不提前攻占两浦，将主力二十六军东移大运河以东，加

强东线渡江作战的力量；留三十四军和三十五军钳制两浦之敌，实施渡江作战时同时攻占两浦。

4月20日，国民党方面拒绝在国共双方代表团商定的《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上签字，和平谈判宣告破裂。4月21日，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渡江战役正式开始。我八兵团指挥的部队分别向两浦、瓜洲、扬中等地发起攻击。其中三十五军于4月20日下午18时，提前打响了解放江浦县城的战斗。按照原定的作战方案，采取“慢打渐进，伺机而动”的方针，先打江浦县城，后打浦镇，再打浦口，以此达到牵制敌兵力，配合友邻部队渡江的目的。我攻击部队一度遇到敌军的顽强抵抗，进展不快。21日凌晨，友邻部队已从西线突破长江天堑，我们给三十五军打去电报，要求加快进攻步伐。于是，该军加强了攻势，于21日上午攻占江浦县城，接着直插浦口，并同时对浦镇一带的山头发起攻击，敌人经不住我军的猛烈攻势，又见我军已从其他地段突破长江防线，慌张乘船逃向南京。22日清晨，三十五军达成了攻占两浦的任务。

负责渡江攻占镇江的是我八兵团二十六军和三十四军。4月上、中旬，我二十六军为攻占江中的新老洲和世业洲，与敌军进行了反复激烈的争夺战。敌军出动军舰和飞机向岛上狂轰滥炸，然后出动地面部队重占岛屿。我军则以炮兵回击，并于4月20日凌晨歼灭岛上敌军，解放了全岛。20日晚，三十四军和二十六军及警备六旅、七旅连续攻克了扬州至仪征一线长江北岸的敌桥头阵地。21日上午，三十四军和二十六军分别从扬州西边和东边江面渡江南下。敌军

四架飞机向我三十四军渡江船只射击轰炸，我军船自为战，以机枪对空射击，迫使敌机不敢低飞。各船军民同心协力，边打边行，相继闯过江心，冲向南岸。南岸守敌仓皇溃逃。我军直插高资，占领火车站，控制京沪铁路，向龙潭、南京方面前进。

与此同时，我八兵团二十军和二十六军一部向扬中发起攻击。扬中是位居长江中心的第二大岛，由几块西北至东南走向的冲积沙洲组成。岛北江面宽阔，水流湍急，岛南的夹江狭窄，江流平缓。我军只要攻占扬中，到江南就很容易了。因为如此，国民党反动派把这里作为江防的重点地段，仅在扬中岛上就驻扎了近一个军的部队。4 月 21 日晚，我二十军从泰兴县永安洲登船进发。尽管水天茫茫，伸手不见五指，但是熟悉水情地形的船工稳撑船舵，径直向扬中岛驶去。敌军发现我军渡江，接二连三地发射照明弹，把江面照得如同白昼，敌炮发射的炮弹在江中掀起了高高的水柱。然而，我军百船争渡，千帆竞发，势不可当。先头部队登岸以后，冲杀叫喊声此起彼伏，迅速打开了突破口，牢牢控制了滩头阵地。天亮以后，我二十军各师分头向扬中岛上的三茅镇、老郎街、八字桥等地猛扑，歼灭敌五十一军第四十一师和第一一三师主力，俘敌 2000 余人。扬中，这个曾是我新四军当年北上南下的江心跳板，又高高飘扬起革命的红旗。过江之后，二十军和二十六军奉命调归十兵团指挥。

4 月 23 日，我八兵团指挥部由扬州进驻镇江，接到了三野首长给我们的急电。由于我百万雄师迅速突破长江防线，南京地区的国民党军队纷纷向南溃逃，南京城成为一座

空城。三野首长命令我八兵团三十五军迅速渡江攻占南京，原来确定的由二野四兵团接收南京的任务撤销。我们接电后即命三十五军从浦口渡江驻防南京，命三十四军分驻镇江、丹阳、金坛等地担任警备任务。经过商量，八兵团部一分为二，陈士榘司令员和我去南京，袁仲贤政委和何以祥参谋长留镇江主持。这样，我便投入了接管南京的工作。

七 十 年 征 程

——江渭清回忆录

下 卷

（1949.4.—1995）

第一章　南京解放头三年

一　钟山风雨话当年

1949年4月23日，我百万雄师全部渡过长江，于当晚解放南京城，把胜利的旗帜插上了国民党总统府门楼。经营22年的蒋家王朝，至此宣告覆灭。

南京解放，毛主席写了《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我们这些曾经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横渡长江天堑的老同志，每当诵读毛主席的光辉诗篇，重温“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的伟大历史变革，不由得心潮澎湃。回想当年情景，南京大街小巷，男女老少，纵情欢呼“天亮了！”敲锣打鼓迎解放。我军干部、战士，严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入城当晚，部队秩序井然，露宿街头，不取群众一针一线，爱护城内一草一木。通过全军上下的模范行动，树立了人民军队完全彻底为人民的崇高榜样。长期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南京人民，看到了党领导下的这支队伍，不愧为人民的子弟兵，是同国民党反动军队有着本质区别的真正仁义之师。

南京，旧称金陵，是闻名中外的六朝古都。它雄踞长江两岸，北临江淮大平原，东接长江三角洲。当我们踏上江岸时，仰望巍巍紫金山，俯瞰滔滔长江水，不由得想起苏轼的名句："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历史上曾有多少诗人、作家，在秦淮河畔留连；多少政治家、军事家，在石头城旁折腰。三国时代的诸葛亮，曾感叹这座古城"钟山龙盘，石头虎踞"，是"帝王之宅"。而今，終于迎来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时代！

占领南京，进军全国，这是党中央、毛主席的决策，是全国人民的心愿。渡江以后，遵照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总前委决定，我们第八兵团领受了接管南京的任务。我作为兵团副政委，又是抗日战争中曾奉命率部攻打南京城郊的新四军老战士，心情格外激动。在接受任务后，我们兵团全体指战员又一次认真学习毛主席亲自撰写的1949年"元旦献词"和《向全国进军的命令》，用"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思想和党的方针、政策武装头脑。我协同兵团司令员陈士榘，离开镇江，带领部队乘胜进抵南京城，按照预定的部署，开展了接管工作。

这时，国民党"兵败如山倒"，那些军政要员如丧家之犬，仓皇逃离南京，包括"总统府"在内的国民党反动军政机关，一片狼藉。

南京地下党的同志及时作了迎接解放的准备，组织工人、市民、学生和其他各界人士，积极进行护厂、护店、护路、护校斗争，使电厂、码头、电台、报社、学校、医院，以及一批工厂和通讯设备，尽可能完好地保存了下来。当部队进城时，地下党的同志挨家挨户做工作，宣传党的政策，并以我

军模范执行纪律的事实，粉碎国民党特务散布的谣言，安定了民心，促进了各项接管工作顺利进行。

我军进城以后，根据中央有关军事管制的指示，迅即建立了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首先是命令解散国民党、三青团等反动党团，取缔各种特务组织，接管国民党政府所属一切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部门与单位的全部资产和物品。同时，命令保护工商业和公私财产，保护文物机构和名胜古迹。部队和地方的同志一道，按照军管会的命令与指示，为迅速建立革命秩序，稳定社会生活，做了大量工作。进驻之初，有的指战员由于对南京这样情况复杂的大城市缺乏了解，曾在涉外问题上出现过失误。例如，未经上级同意，对外国记者擅自停发新闻电讯；三十五军一位营长带着战士，误入原“美国大使”司徒雷登住所。中央对此十分重视，曾指示我协同陈士榘同志调查处理。我们在查明事情原委以后，及时报告中央，并由中央对误入司徒雷登住所一事作了通报，使大家受到了一次深刻的外事纪律教育。

4月26日，总前委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相继抵达南京（另一位总前委成员谭震林率七兵团进驻杭州），与原中共南京市委书记陈修良、副书记刘峰等会面。5月1日，在中共中央华东局直接领导下，召开了解放区南下干部和南京地下党干部共约3000人的会师大会。这是南京解放后的首次重要会议，充分肯定了南京地下党为迎接解放和配合接管南京所做的艰苦细致的工作，要求曾经在两条不同战线上战斗和工作的同志，不光要在组织上会师，更必须在思想上会师，做到相互尊重，相互学习，团结一致，进一步

做好接管工作。

会师以后，新的中共南京市委、市人民政府相继成立，我们尊敬的老帅刘伯承亲任市委书记、市长。宋任穷任市委副书记，柯庆施、张之霖任副市长。我是市委委员，担任南京警备司令部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士榘)。

7月6日，在南京最繁华的新街口举行了由党政军民各界人士参加的阅兵式。当天下午17点30分，隆重的阅兵式正式开始。刘伯承、张际春、李达、宋任穷、陈士榘等领导同志都上了阅兵台，在雄壮的《解放军进行曲》伴奏下，行进在阅兵队伍最前面的是八面红旗环绕着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画像的宣传车；接着是化装腰鼓队、高举军旗的骑兵仪仗队；美械装备的步兵兵团、装甲兵团、美式山炮团、榴弹炮兵团、摩托兵团等机械化部队都参加了检阅。隆隆的马达声与人们的掌声、欢呼声交织在一起，形成了排山倒海的宏伟气势。我与其他领导同志一起肃立在阅兵台上，向接受检阅的广大指战员频频挥手致意，为久经考验、举世无双的人民军队自豪。各兵种部队绵延不断地通过阅兵台，从中山路一直向北进发。工人、学生、店员、市民簇拥在街道的两旁，挥舞彩色小旗，热烈呼喊“欢迎人民解放军”、“打到广东去，活捉蒋介石”等口号，被服厂的女工还向战士们献上鲜花，充分表达了南京人民欢庆解放、建设新中国的豪情壮志。战士们一个个精神抖擞，高呼“保卫祖国”、“为人民服务”等口号，表现了军爱民、民拥军的鱼水深情。

这次阅兵，是南京军民的一个盛大节日，也是我来到南

京以后参加筹办的第一次大规模群众性活动，起了极大的宣传、动员作用，至今难以忘怀。

二　抓住时机公开党

1949年夏，我正式从部队调地方工作。鉴于刘伯承、宋任穷调离南京，当年9月，经中共中央批准，由粟裕任南京市委书记，唐亮任第一副书记，江渭清任第二副书记。

我和唐亮同志到任以后，在粟裕同志领导下，奉华东局“南京市委要整党”的指示，首先抓各级党组织的整顿。9月17日，邓小平同志向南京市3000名支部书记以上党员作了题为《忠诚与老实》的报告，阐述了整顿党组织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指出了对待整党的应有态度和有关政策，使我们认识到，整顿党的内部，加强党的建设，充分发挥党的核心战斗作用，这是建设新南京的基础。

我们在接管中感到，南京地下党在过去那种艰难困苦的情况下，不怕牺牲，坚持斗争，绝大多数同志对党忠诚，表现是好的；但是，由于党长期处于地下状态，也存在着组织不纯和思想不纯的现象。同时，为了密切党与群众的联系，1949年5月新的市委建立以后，就作出了公开党员的决定。我感到，抓住时机把党的组织从秘密转为公开，处理好部队、老区干部与原地下党干部之间的关系，这些都需要通过整党来妥善解决。

10月15日至25日，召开了中共南京市第一次代表大会。这是解放以后南京党的历史上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也是一次整党动员大会。出席会议的，有来自全市各条战线的611名代表。会议的主要任务是，对南京的党从思想上组织上进行一次整顿，其目的是要达到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一致，以便在市委的统一领导下，为建设新南京而奋斗。

会议由唐亮同志致开幕词。我围绕着如何开好这次代表大会讲了话。我在讲话中要求到会同志以高度负责的精神，完成会议预定的任务，把这次大会开成一个虚心学习的会议、加强团结的会议。无论来自部队和老区的同志，还是原来地下党的同志，在新的形势和任务面前，都碰到了新的问题，都要认真学习毛泽东思想，学习党的方针、政策，还要虚心地相互学习。要发扬我们党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南京市的工作做得好，功劳是大家的；如果不好，市委要带头自我批评，解放区来的老同志要多负责任，首先作自我批评。要在这个基础上，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加强党的团结，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

为了开好这次代表大会，我还受会议主席团委托，主持召开了小组长联席会议，指出：开好大会的中心环节，是要弄通为什么要从思想上、组织上整党和整党对于建设新南京的迫切性、重要性。当时，参加大会的代表来自各方，工作岗位、出身经历各不相同，文化程度、政治水平、入党时间、职务级别，差异都很大，要把大家的思想统一到大会规定的任务上来，需要做艰苦的教育工作。针对这个情况，我在联

席会议上要求代表们在分组讨论中抓住整党这个中心，第一步，从思想上深刻认识整顿组织对党对人民对自己的好处和不整顿的害处；第二步，按照党的原则，联系南京党的实际和个人的工作、思想，弄清存在的问题，以便“对症下药”；第三步，树立正确的态度，明确整顿组织的方针、步骤，把“与人为善，治病救人”，“教育、教育、再教育”，作为贯彻始终的方针，不仅地下党的同志要以积极态度参加整党，就是在部队和老区经过“三查”“三整”的老同志，也应在整党中提高自己。要通过这次代表大会，带动南京全党同志，都能把思想上、组织上整顿党的内部，作为自己的光荣任务和迫切要求。同时，要通过整党，进一步明确为什么要公开党的组织，解决好公开过程中的具体问题和公开以后应该注意的事项。

大会闭幕以后，市委常委研究了分工，制定了常委办公制度。我分工抓党群工作，包括工、农、青、学几个方面，都是围绕整党进行的。市委要求一边整顿党的组织，一边为“公开党”创造条件，以此来接近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元旦。《新华日报》还把我署名的《迎接新年，紧密联系群众》的文章，作为1950年元旦社论发表。我在文章中写道：

> 一九四九年岁末前，我们南京党在整党学习运动中，完全公开了党的支部，全体党员与广大群众见了面。在广大群众出自竭诚爱护的许多善意批评下，使南京全党在思想上提高了一步，广大群众由此更加认识了党，获得了很大的教育。党群关系进一步的紧密团结，这无疑的是建设新南京的

宝贵基础。

我在文章中对南京全党同志在新的一年里的工作，提出了要求：

> 我们南京的共产党人，以人民勤务员的身份，兢兢业业的在各自岗位上做好工作，并且团结广大群众在自己的周围，发挥先锋队所应有作用。特别是在党公开以后，每个党员应当以先锋队成员之一努力进行工作与学习，并将党的各种政策通过我们与广大群众见面而更好的推广起来。因此，遇事与群众商量，耐心倾听群众的意见，认真研究群众所提出有利于人民利益的问题，虚心向群众学习，就成为巩固党与群众联系的重要条件。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克服一切困难，建设新南京。
>
> （《新华日报》1950年1月1日）

南京市的整党，到1950年5月结束。而"公开党"则既是整党的成果，又推动了整党工作的深入开展。尽管在进城之初，由于对地下斗争的复杂性认识不足，对当时的历史环境和特点缺乏系统的了解，加之受"左"的思想影响，在组织整顿方面，对具体人的处理上曾出现过某些失误，带来了一些历史遗留问题，直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得以复查纠正；但总的来说，通过这次整党，基本上弄清了全市党员的状况，健全了党的组织，密切了党与群众的联系。在整党的基础上，市委作出了发展党员的决定，要求在产业工人、革命军人、革命职员和贫苦出身的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建立市委党校，由我兼任党校校长，有计划地培训党的

干部。为了适应城市工作需要，我还提议并经市委批准，在南京市建立市、区两级党的领导机构，各城区先后建立区委，撤销原区工委。

当年5月，中共中央决定，唐亮为中共南京市委书记（同年8月，柯庆施为书记），江渭清为副书记。我在担任市委副书记期间，还先后兼任了南京市警备司令部司令员、政治委员，市总工会主任、党组书记，市委统战部部长，市政府财经委员会主任等党、政、军职务。

三　彻底治理“烂摊子”

党中央、毛主席十分重视对旧南京的改造。我们新的市委建立以后，所以要抓整党，就是为着充分发挥各级党组织在改造旧南京工作中的先锋队作用。

我想起了1949年9月，正当秋风送爽的金秋时节，我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方面的代表，在代表团团长粟裕同志率领下，赴京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情景。这是一次空前的盛会，集中了我们党、国家和各族人民的精英。这也是我第一次踏进当时刚成为党中央所在地的中南海。我与来自全国各地的党、政、军、民各界代表一道，欢聚怀仁堂，聆听了毛泽东主席所作的《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开幕词，参与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事，还被邀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10月1日举行的开国

大典。我仰望第一面五星红旗由毛主席亲手冉冉升起，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深感任重而道远。

尤其令我终生难忘的是，大会开幕前，毛主席、周总理和党中央其他领导同志来到代表团下榻的六国饭店，看望全体到会代表，向大家亲切问候。毛主席还曾兴致勃勃地让我陪着他散步聊天。当时，张治中先生也陪同在一起散步。这件事，在毛岸青、邵华主编的《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丛书中的《和省委书记们》这本书里，也有专门记述。那是在饭后，我穿着一身簇新的军装，刚刚走进六国饭店（现在的北京饭店旧楼）豪华的中楼大厅，忽然耳畔传来一阵惊喜的叫声：

"啊！这不是江渭清吗？！"

我扭过头去，华丽的枝形吊灯下，正站着张治中。而与他站在一起的，竟然是毛泽东！

"哎，你怎么认识他啊？"毛泽东问惊叫的张治中。

"这个人可厉害哪，抗战之初我就领教过啦！"张治中回答道。

"那时他是个小兵，你是堂堂一省之主席，他能厉害得过你嘛？"毛主席风趣地反问。

"主席，你听我从头慢慢道来"，张治中朝我笑了笑，转向毛泽东说：

"那时我在湖南当省长，立了一条规矩，每逢星期一、三、五，我接见有关来访人员，每人限谈 30 分钟。有一天江副团长驾到，拐弯抹角谈了 30 分钟，走了。我就知道江副团长还得来，无事不登三宝殿嘛。果然，只隔一天，他又来了。这回门卫挡住了他，可他老兄在门道里就朝我的办公室大

声喊道：‘好，好，你不让我进去没关系，请转告张主席，现在国共合作抗日，可我们新四军没饭吃，士兵都有怨气，说老子没饭吃，上山打游击！’我一听话茬不对，赶快跑出来说：‘江副团长，我们合作很诚恳嘛，你怎么说要上山打游击啊？’您猜他怎么说，他说：‘民以食为天呀，我们没有饭吃，怎么抗日啊？’我赶紧说：‘咱们想想办法嘛。’他立即道谢：‘那我就代表将士们先谢谢张主席的大力帮助罗！’您瞧江渭清多会说话，一下子就把我将在那里了。结果，从我那里整整借走了2000块光洋！”

张治中先生的一席话，使我重忆起1938年初部队刚改编成新四军一支队一团时，我曾去长沙索要军饷的往事。那时，我还不到“而立”之年，所以说话不免很有些锋芒。须知，当时2000块光洋，可买4000担稻子哩！毛泽东听罢这件事，也不由得开怀大笑。

接着，我就加入了毛主席和张治中先生的散步行列。边走边谈。当我谈到接管南京的情况时，毛主席听了高兴地说：“你们的胜利，靠了三个法宝：模范的纪律，模范的群众工作，模范的统一战线。”在交谈中，我提起在中央苏区瑞金第一次见到他老人家的往事。他不无感慨地说：“是啊，那时曾有苏区政权，但只是几块根据地，只能算全国政权的雏形。现在就大不相同了！我们召开这次政协会议，就是要协商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建立全国人民自己的政权。”张治中先生也会心地笑了。

毛主席接着又语重心长地告诫说：“渭清啊，你现在从部队转到地方，当了南京市委副书记，要好好学习七届二中

全会决议，学习党的方针、政策。要保持党的优良传统，教育我们的党员、干部，切不可在进城以后被'糖衣炮弹'打倒！"他还特别谈了旧南京的改造问题，指出："你们要把南京这个为官僚服务的消费城市变成为人民服务的生产城市。"

我听了，非常振奋。深感毛主席的这个指示，既抓住了彻底治理旧南京的症结所在，又为建设新南京指明了方向，有着极为丰富的内涵。第一，从"为官僚服务"变成"为人民服务"，这是城市性质的改变；第二，从"消费型"变为"生产型"，这是城市发展方向的改变。归结起来，就是要改造成社会主义的新南京。我也向他老人家谈了自己的设想，打算在恢复工农业生产的基础上，首先从发展科学、文化、教育入手，更新南京旧貌。

当然，要实现这个根本性的改变，任务是艰巨的。人所共知，国民党给我们留下的旧南京，是个千疮百孔、腐败不堪、社会混乱、民不聊生的"烂摊子"。这里，既是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中心，又是个典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畸形发展的庞大臃肿的官僚消费城市。在灯红酒绿的"繁华"中，混迹着各色社会垃圾。据1948年6月统计，全市号称135万人口中（包括其后划归安徽的马鞍山市和当涂等县），有国民党政府官吏和公教人员11万，警察、宪兵、特务2万多，他们的眷属7万，专为他们服务的茶房、厨师、娘姨、仆役9万，还有同上述几类人沾亲带故的闲杂人员约33万，这几类人口共计70万，占总人口的一半以上；直接从事工农业生产的，仅占总人口的10%左右。

在这样一个畸形城市里，我们接管之初，就碰到了一个

严重的社会问题，即大批人员无业或失业，总数达50万左右，其中因天灾人祸而离乡背井的苏北、皖北难民约20万人；国民党的散兵游勇，包括有将军头衔的旧军人，以及流落街头的孤儿、乞丐、娼妓等约10万人；此外还有大批失业工人、店员、仆役、知识分子和国民党军政机关裁减解雇人员等也有20万人左右。街头杂乱而肮脏，称得上是座名副其实的"废都"！路边街道，到处是灾民们临时搭建的茅屋。在北极阁山下四周，简陋的茅草小屋成片相连；在三山街到夫子庙一带，从早到晚到处是银元贩子敲银元的丁当声和叫卖声；在夫子庙到石坝街一带，不分白天黑夜，妓女到处拉人；孤儿、乞丐多得叫你出了门都不能走，在鸡鸣寺、中山陵，到处都是。我们的干部一出门，就有行乞的孩子一串一串地跟在屁股后头，伸着乌黑的小手叫喊："老爷，老爷，给我几个钱吧！……"

特别是在这个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老巢里，军、警、宪、特机关林立，各种帮会社团众多，国民党南逃时有计划留下的"敌后情报员"等潜伏特务，加上流散特务，计有3300多名；还有在混乱中从监狱放走和逃逸的惯盗、惯窃3000多人；所有这些，对地方治安和社会稳定造成极大的危害。

面对这样一个"烂摊子"，我们市委根据中央、华东局"关于以疏散为主，临时救济为辅，大力开展群众性生产自救"的工作方针，于1949年9月成立"疏散人口委员会"，开始了大规模的疏散工作，着手处理50万左右滞留南京的失业无业人员。我和"疏散委"的同志认真讨论和制订了疏散方案，决心再繁杂也要解决好这个问题。

首先是妥善处理好国民党政权首脑机关“一府五院”(总统府、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试院、监察院)及其下属机构所留下的5.6万名人员问题。我们在具体工作中，由于缺乏经验，曾出现过简单急躁，“一锅端”的现象。毛主席及时发现问题，提出批评，他曾告诫大家说：“我们把南京国民党政府的大灶打破了，如果不给人家饭吃，人家就要另起炉灶。我在重庆谈判时就说过，国民党要我们不另起炉灶，那我们就要在你的灶上吃饭。今天，我们取得了政权，如果不把人家养起来，人家也要另起炉灶。”据此，党中央对国民党机关中旧人员的处理，曾专门作了指示，指出：除反动有据、劣迹昭著而为群众不满予以撤职，除首恶分子依法惩办外，对其他人员实行“一律包下来”，“三个人饭五个人吃，房子挤着住”的政策，其中有一技之长又愿意为人民服务的旧公教人员，尽可能予以留用。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我们对旧公教人员，分别情况作了处理：大部分继续留用，共有3.76万余人，成为人民政权的干部；6000多人被送到各类学校学习，然后分配工作；其余一般也得到了妥善安置，使他们感到共产党宽厚，新社会温暖。这样，团结、教育、改造了一切可能争取的力量，为建设新南京创造了有利条件。

作为疏散对象的第二类人，就是来自苏北、皖北的灾难民，这是疏散工作的重点。这类人原有20万之众，加之疏散过程中不断从江北涌来新的灾民难民，这就更增加了疏散工作的压力。当时，我曾去灾民难民群居的“棚户区”察访，看到他们拖儿带女，多数靠乞讨为生，以豆渣、野菜、菜叶充饥，景象十分凄苦。由于人民政权刚建立，处于百废待举阶

段，这么多难民充塞市区，不下决心疏散，正常的生产和生活秩序就难以建立。为此，我们一方面派人在难民中进行宣传教育，做好各项相应工作；另一方面发动难民，开展互助自救。1949年底召开市一届二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时，还特别选出了难民和失业公教人员的代表参加会议。会议决定成立“处理难民委员会”，并制定了疏散人员与组织生产、紧急救济“三结合”的灾难民处理方针。接着，于1950年1月专门召开了全市“难民代表会议”，进一步提出了对灾难民和其他失业人员，实行“社会互济、生产自救、政府帮助”的工作方针。

当时，正值岁末年初，寒冬腊月。灾难民和失业人员中的绝大多数，是我们的阶级兄弟。我们党和政府，对他们的疾苦怎能不闻不问?我代表市委，首先向市级机关和驻宁部队进行动员，号召大家节衣缩食，开展“捐献一餐饭、一件衣”的活动。在机关和部队带动下，工厂职工随之开展了“捐献一月所得”的活动。工商业者也纷纷响应市委号召，为赈济灾难民认捐、义卖。经过各界各方面努力，共救济灾难民9万人。市政府还拨出5万斤大米，急救处于寒冬中的失业和半失业工人。我们组织机关干部在大雪纷飞中来到灾难民群居处和失业、无业人员家中送粮、送钱、送衣，并组织巡回医疗队送医上门，为有病者治病，使他们深切感受到党的温暖，体会到新旧社会真是有着天壤之别!

在组织赈济的同时，有步骤地开展灾难民的疏散工作。先是将那些在家乡有房有地的人动员回乡生产；暂时难以回乡者，就组织起来，进行生产自救。鉴于土地改革运动已

经在各地普遍展开，我们因势利导，把动员疏散与鼓励回乡参加土改结合起来，在原籍农村的灾难民中，很快掀起了一个兴高采烈回乡分田分地的高潮。市委趁热打铁，指示召开回乡人员欢送大会，那种敲锣打鼓、热烈欢送的场面，至今使人难以忘怀。为了妥善安置回乡人员，除建立了转送站，帮助办理通行证、回乡证明和购买车船票、发给伙食费等以外，还派专人护送回乡，协助所在地政府安置，确保他们能分配土地、解决住房和生产工具等。市委考虑到灾难民的遣送和安置，面广量大，曾及时向政务院提出专项拨款的报告，使各地区较好地解决了安置经费的困难。到 1951 年初，安置回乡灾难民达 18.4 万人。

疏散的第三类人，是国民党军队的散兵游勇。他们结成团伙，流浪街头，有的因生活无着，偷窃扒拿，扰乱社会治安。1949 年 5 月 23 日，市军管会命令成立“南京市流散军人处理委员会”，我和杨松青分别担任正、副主任。次日，我们发出布告，成立了 10 个收容站，命令原国民党现役军人在本市无户籍又无正当职业者，就近登记。考虑到这批人身份特殊又凶悍蛮横，对他们的疏散工作做得特别仔细。一方面对他们进行教育，并发放路费，开具回籍证明；另一方面与各有关省联系，请派专人来南京，将他们带回去。截止 1950 年 2 月，共收容遣送散兵游勇及其家属 4 万余人。

疏散的第四类人，是流落街头的孤儿、乞丐、娼妓和失业的娘姨、奶妈等。对这些人区别处理，例如，动员娘姨、奶妈哪里来那里去；孤儿学校、孤儿院收容流落街头的孤儿；对有些年龄较大的孤儿，进行专门培训；许多孤儿后来成了

工人和生产骨干。

娼妓卖淫是一种社会丑恶现象。我们采取坚决措施，取缔妓院，消灭卖淫活动。对娼妓，一面组织她们学习，一面给她们体检、治病，有的送回原籍，有的安排就业，给予生活出路。

乞丐是旧南京的一大社会问题。除了灾民和老弱病残、生活无靠而沦为乞讨者以外，有相当一批是职业性的。这些人结伙强讨，干扰市民正常生活。我们设立了 7 个收容所，还办起了“生产教养院”，由各区政府组织群众中的积极分子，会同公安人员，深入丐窝，宣传教育，集中收容，分别处理。到 1952 年底，收容处理各类乞丐 49560 人。

在市委统一领导下，经过上下共同努力，全市共疏散回乡 33 万多人，加上安排就业就学和作其他安置的 10 万多人，基本上解决了国民党遗留的大批人员失业无业这一社会问题，稳定了社会秩序，为把南京这个畸形发展的消费城市转变为社会主义新型城市扫清了障碍。

四　维持、改造、恢复生产

我们共产党人为什么要干革命，归根结底是为着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是个颠扑不破的真理，也是我在南京工作中最深的体会之一。

解放头三年，是国民经济恢复时期。进城前夕，美帝国

主义分子曾断言，我们进入南京，一“白”一“黑”（“白”指大米、棉花，“黑”指煤炭）根本没有办法解决，似乎还要靠向他们乞讨过日子。历史证明，我们伟大的党、伟大的军队、伟大的人民，不仅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而且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美帝国主义分子的谰言，终于在事实面前宣告彻底破产。

从进城的第一天起，我们一面进行接管工作，一面积极着手恢复生产。当时既有国民党残余势力的破坏，又遭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要恢复经济，谈何容易！市委、市政府建立以后，作为市委书记兼市长的刘伯承同志，肩负着繁重的军事指挥任务，还腾出精力，关注南京的恢复工作，曾于1949年7月，作了《反封锁，进行城乡互助》的报告，动员广大党员、干部，带领全市人民，打破封锁，通过城乡互助来克服当前的困难。同时，针对当时物资匮乏、市场混乱、经济萧条、百业凋敝的严重局面，我们除了通过疏散消肿、整顿社会秩序以外，还采取一系列坚决措施，整顿经济秩序。

首先是整顿金融秩序。1949年4月28日，南京市军管会成立当天，就发布通告，限期禁用并开始收兑金圆券。5月2日至5日，共兑进金圆券876.6亿元，人民币迅速占领了市场。市政府成立以后，为整顿金融秩序，进而宣布停止银元交易，公布了《华东区金银管理暂行办法》。中国人民银行南京分行也宣布禁止私自买卖金银，不得收兑金银饰品。这就及时地打击了不法奸商利用银元交易牟取暴利的投机活动，有效地制止了因银元价格暴涨而引起的物价大幅度波动。

二是平抑物价。1949年5月2日成立了南京市贸易总公司。这对调节市场、平抑物价起了很大作用。其中有两次我记得很清楚：一次是当年6月下旬，上海和南京等地不法商人哄抬米价，粮食价格波动，我们十分焦急，连夜研究对策。市委迅速作出决定，由市贸易总公司抛售大米、面粉50万斤以平抑物价。至7月下旬，全国物价涨风再起，南京物价上涨持续波动达50余天。市委再次批准市贸易总公司陆续抛售大米16000石、面粉4000袋，有力地打击了投机奸商，促使了物价再次回落。

三是恢复工商业。我们进入南京，首先接管了38家国民党经营的"公办"厂矿和官僚资本企业，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的国营企业，迅速恢复生产，并在抓稳定市场的同时，花了很大力气，做好恢复私营工商业的工作。商业方面，由南京最大的商场中央商场率先复业，带动全市各行业商店全面复市，从而安定了人心，稳定了正常的生活秩序。工业方面，由有恒面粉厂率先复工，接着已停业4个月的江南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在人民银行贷款扶持下亦得以复业。至1949年6月中旬，全市2000余家私营工业、手工业户中有600多家复工。

尽管采取了上述措施，但要完全恢复经济，仍然困难很大。在毛主席作出关于"把南京这个为官僚服务的消费城市变成为人民服务的生产城市"的指示以后，市委分工，由我带领一批同志，深入工矿基层，进行调查研究。我们与工人一起睡在工棚的地铺上，同吃同住，谈心摸底，以便掌握生产、生活等方面的第一手材料，作为市委决策参考。1950年

2 月，市委常委就如何建设新南京的问题，召开了专门会议。我依据自己所作基层调查，强调：新中国刚建立，人民解放军在向西向南进军。就全国来看，1950 年的经济形势是严峻的，南京困难尤大。所以，我们的建设方针，要从维持当前生产出发。据此，我在会上提出，“大力维持与恢复生产，整理（生产）包括改造，以打下今后发展生产的基础”，概括起来就是“维持、改造、恢复”。我还提出，南京“全党同志应树立自力更生、积极克服困难的精神，抓紧一两个方面做出成绩来稳定人心”。在集思广益、听取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市委从南京有别于其他城市的具体情况出发，决定以“积极克服困难，维持改造生产”，作为恢复阶段的建设方针，经华东局转报中央批准实施。

1950 年 3 月，中央人民政府发出《关于统一国家财经工作的决定》。我们根据中央的决定精神，进一步采取措施，整顿市场，平抑物价，积极开展城乡物资交流和生产自救，终于使南京经济的恢复出现转机，特别是消除了影响社会稳定的物价暴涨的阴影，逐步建立了正常的经济秩序。

4 月，南京工商界第一次代表会议召开，柯庆施和我分别在会上作了报告。我着重谈了工商界如何认识当前的困难，分析了产生困难的原因，指出：过去一年，我们党领导全市人民打破帝国主义的封锁，克服了重重困难。工商业者也同样遭遇了严重困难。对此，党和政府是知道的、体谅的。现在，随着军事斗争的进一步胜利，我们党已将工作重心转过来了，转向经济建设。要求工商业者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转变经营方向。我在报告中还指出：过去南京的所谓“繁

荣"是畸形的，是建立在少数人享受的基础上的。现在，情况根本不同了。工商业的繁荣要建立在广大人民改善生活、购买力逐步提高的基础之上，发展前景才会广阔。据此，我向全市工商界提出了"改造思想，面向农村，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等四点意见，提高了工商业者克服困难、繁荣经济的信心。同时，我们遵照中共中央《关于接收官僚资本企业的指示》和《关于接收江南城市给华东局的指示》精神，对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工商业，给予大力支持。仅低息贷款一项，人民银行于 1950 年 5 月份起，5 个月内就给私营工商业贷款 332 亿元(旧人民币)，占同期发放贷款总数的 86.45%。当时，永利铔厂是全国最大的化肥厂，解放前三个月就停产了，连续四个月发不出工资。为帮助该厂渡过难关，我们让人民银行给予紧急低息贷款，并组织有关部门调运大量焦炭，帮助解决供电等困难，使生产很快得以恢复，日产硫酸铔由原来的 100 吨增加到 148 吨。还有江南水泥厂和下关电厂等，也是全国有较高知名度的工业企业，我们也给予了必要的贷款，并通过发动职工，群策群力，尽快摆脱了困境，恢复了生产。

除此之外，对于那些确能解决部分群众就业困难的工商业，如手工卷烟行业，给予间接扶持(减轻税额)，使其能维持生产；对于原先主要从事修配业务的钢铁机器业，引导其为农村生产碾米机、轧花机以及犁头、铁锄等农用工具，使之适应新的社会需要；对于解放前主要为官僚、阔佬挥霍享乐而开设的大旅馆、大酒楼、舞厅等奢侈性消费行业，有的帮助其转行，有的歇业停办。

这段时间内，我和市委、市政府的领导同志，日夜奔忙。眼看满目疮痍的旧南京，在党的正确方针指引下稳步地走向新生，内心有说不尽的高兴，特别是从建设新南京的长远目标考虑，我们不满足于改造旧的，更注重创建新的工业企业，使之在建设新南京的进程中发挥先导作用。首先是以三野的快速纵队作基础，筹建南京汽车制造厂。这个厂发展很快，毛主席和陈毅同志都曾先后亲临视察。毛主席称赞这个厂比长春汽车制造厂还要前途远大，主要是管理好，工人很有组织性，讲究劳动纪律。他在视察时曾风趣地对我们说："我要来当半年副厂长，学习学习！"使大家受到很大鼓舞。还有南京的轻纺工业，也是这个时期开始创建的。1950年春我去上海开会，时任上海市市长的陈毅对我说："南京要变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必须发展轻纺工业，特别是和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纺织工业。南京有苏、皖两省丰富的棉花资源，但过去所需要的棉织品都靠各地支援，这个情况要改变。"我觉得陈毅同志这个意见很重要。回南京以后，我立即与柯庆施、唐亮等商议此事，并决定以地方自筹为主，争取必要的外援，在地方财政很紧的情况下，拨出40亿元(旧人民币)，在私营益丰纱厂的基础上，筹建新的南京纱厂。方案确定后，我马上写信给苏南区党委书记陈丕显，请他大力支持。陈丕显同志帮助我们从常熟、川沙买来三个停产的私营纱厂设备。我们又将南京下关宝塔桥原英商和记洋行的厂房加以改建。一个拥有两万纱锭、1000余名工人的南京纱厂于1952年5月20日正式投产。时至今日，这个纱厂仍为南京纺织行业的骨干企业。

五　建立南京市总工会

我们进城以后的再一件大事，是筹建各级工会组织。新的市委建立以后，就决定成立全国总工会南京办事处，于1949年5月9日开始办公，地点设在“介寿堂”。这座富丽堂皇的建筑，原是为蒋介石祝寿而兴建的。刘伯承同志亲自提议把它改为即将成立的市总工会会址，以此作为人民翻身做主人的一个象征。这个举动，意义十分重大，大家一致同意。5月13日，在“介寿堂”举行了第一次全市工人代表座谈会。代表们无不扬眉吐气，自豪地说：“过去蒋介石在这里做寿，今天我们工人阶级在这里聚会。我们成了南京的真正主人！”参加会议的400多名代表，都是由各工厂的工人选举出来的。我和市委其他领导同志出席了会议。在会餐时，代表们高举酒杯说：“喝一杯胜利酒，从此我们要加紧生产，把南京建设成为一个生产城市！”特别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有位代表闪着激动的泪花，从椅子上站起来，放开了嗓门说：“兄弟们！我们现在解放啦！工人当家作主的这一天终于盼到啦！过去我们没有家，现在这里——总工会办事处就是我们的家了，我们要爱护她，要常到家里来啊！”

总工会南京办事处成立后，紧紧围绕着维持、改造、恢复生产这个中心任务，贯彻党的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充分发挥工人阶级在建设新南京中的主力军作用这个总精

神，首先在工人群众中进行广泛深入的宣传教育，并组织工作队到各工厂去发动广大职工，为恢复生产而努力劳动。还举办了工运干部培训班，培养工运干部，以适应工会工作的需要。6月，南京市总工会筹备委员会成立，由市委工委书记彭涛负责筹委会工作。不久，他随刘伯承、邓小平所率第二野战军进军西南，就由我兼任市总工会筹委会主任。筹委会分别建立了码头工人、店员、手工业工人、产业工人等四个专门工作委员会，以加强对全市四大系统工会工作的具体领导。

7月，世界工联执行局在北京召开亚澳工会会议，代表们在会议结束后曾来南京参观访问，考察工运情况。我代表市委接待并致了欢迎词。这是南京解放后接待的第一批国际友人。由于当时市总工会尚未成立，我在欢迎词中实事求是地指出："我们正在从各方面组织工人大多数，加强教育，决心用我们的努力来感谢战友们的期望。……我们南京工人阶级将和国际工人阶级一样，完全拥护亚澳工会会议的一切决议，反对战争贩子，保卫世界和平。"这次亚澳工会会议代表的到来，对南京的工运起了推动作用。

10月28日，上海铁路工会南京分会成立。接着，产业工会、店员工会、邮政工会、码头工会、机关工会、教职员工会和清洁工工会等各行业工会，也相继成立了。

1950年初，我们提出"要建立各级工会的领导机构和健全各级工会组织，争取今春成立南京市总工会"的任务。当南京最大的产业工会，拥有2000多职工的永利铔厂工会于1月25日成立时，我在市委宣传部长陈其五陪同下，曾

带领市级机关干部和各工会团体代表共300多人，乘专轮过江前往祝贺，并在成立大会上讲话，要求全厂新老职工团结起来，提高觉悟，提高生产技术，为进一步恢复和发展生产而努力奋斗。

3月10日，南京市首届工会会员代表大会正式召开。大会经充分准备，开得很隆重、很成功。我为会议期间编印的特刊题词："以工人阶级的伟大气魄，担负着新中国的光荣建设任务。"会上，市委书记、市军管会主任唐亮作了政治报告，我作了《关于南京工人运动当前方针与任务》的报告。我在报告中指出：南京工人阶级取得了从奴隶到主人的伟大转变。但是，这还是个开端。我们面前还有许多严重任务。市总工会的任务，首先要在市委的统一领导下，团结广大职工，克服各种困难，完成各项生产任务。其次，要在发动广大工人，大力支援解放军解放全中国的同时，提高革命警觉，防匪防特，巩固和发展已经取得的胜利，创造和平生产的环境。第三，工会活动要面向生产，学会管理工厂企业，在恢复生产的基础上，为发展生产积极准备条件。参加大会的600多位代表，纷纷表示要以实际行动带动全市13万工人兄弟来完成市委赋予工会的光荣而艰巨的战斗任务。在这次大会上，我被选举为南京市总工会首届主席。

5月12日，市总工会成立典礼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出席成立典礼的有工人、学生、妇女、工商等各界代表和党、政、军首长共3000余人。这不仅是工人阶级，而且也是全南京市100万人民共同关注的大事，成为改造旧南京、建设新南京的一个新起点，极大地推动了各工厂企业的爱国主义

劳动竞赛。职工群众焕发了前所未有的以主人翁态度迎战困难的积极性。永利錏厂职工曾主动要求降低工资25%。百货、粮食、绸布等行业的千余家企业职工，也集体要求减薪，其中永丰酒精厂、普丰面粉厂的工人，南北货店、酱园店和茶叶、绸布业的店员，也都主动提出减薪50%左右，同时努力提高生产效率。在职工群众的影响下，许多资方也自愿增加投资，发展生产。著名的荣毅仁、冯国华等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都曾为恢复生产、共渡难关作出过贡献。

依靠工人阶级克服困难，恢复和发展生产的过程中，我们始终把关心职工生活，最大限度地调动工人群众的积极性放在重要位置上。市总工会成立以后，工人疗养所、疗养院相继建立，还办起了387所业余学校，为职工提供了进行文化教育的阵地。1951年6月3日，南京市工人文化宫在“介寿堂”落成，并举行了开幕式，我致开幕词。南京工人文化宫的建立，是全市工人阶级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克服困难，努力生产，争取财政经济状况初步好转的一个胜利成果。

市总工会还协同市政府，在组织和发动广大职工开展发明创造、合理化建议的活动中，做了大量工作。据统计，在两年多时间里，全市41个厂矿企业单位的创造发明、合理化建议共1627件，采纳1260件。在1951年10月4日召开的全市评奖大会上，评出有重大价值的建议和创造发明247件，受奖166件。其中，永利錏厂工程师余祖熙研究的钒触媒剂正式投产，解开了长期依靠高价进口的“工业秘密”；电工厂试制成功用于无线电波、长途电话及雷达所必

需的三种整流管、两种三极管，为全国通讯事业及国防建设解决了难关；科学仪器厂杜仁昌制造的自动铆钉机，提高生产效率500多倍，等等。我代表市委、市政府为获奖者挂上金色纪念章时，他们个个红光满面，无比自豪地说："党领导工人阶级翻了身，也使工程技术人员有了用武之地。"大家表示一定要更好地发挥创造性，以报答党的关怀。这是南京解放以后的首次科技评奖活动，对全市的生产建设起了很大推动作用。

六　抗美援朝、镇反与土改

经过第一次市党代会以来一年多的努力，南京各方面工作逐步上了轨道。1950年11月24日至29日，举行了中共南京市第二次代表大会，有536名代表出席了会议。

这次代表大会，是在全国人民奋起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新形势下召开的。中心议题是讨论和部署如何深入广泛地开展时事学习和抗美援朝运动，加强反特保密教育，加强党的工作。陈毅到会作形势报告。柯庆施传达华东局扩大会议精神。我代表市委，围绕学习和讨论陈毅同志形势报告中提出的问题，于11月27日在会上讲了话。当时，中央提出的总方针是："制止战争，力争和平。"陈毅在报告中对形势的基本估计是："从全面来看，世界战争爆发的可能性很小。但从朝鲜战局来说，战争有逐步扩大的可能。"我也谈了

自己的理解，分析了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两大阵营的力量对比，指出：我们发动各界人民开展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就是以实际行动贯彻中央的总方针，就是最有力的制止战争，力争和平。我们开展时事学习，就是在新的形势下进行伟大而深入的阶级教育。要通过时事学习，极大地提高全党的阶级觉悟。我还谈了进行时事学习的基本要求，一是要真正认识美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真面目，对其侵略行径、树立起"仇视、蔑视、鄙视"的思想；二是从人民的利益和力量出发，增强"抗美援朝"的坚定决心和胜利信心。特别要求党内同志不怕"原子弹恫吓"，正确认识决定战争胜负的不是原子弹，而是人民的力量。在达到学习要求的基础上，第一，要做好当前工作。所有党员都要按照不同工作岗位，以搞好工作、生产、学习的实际行动投入抗美援朝。第二，要加强党的建设，进一步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

现在回头看那段历史，我们为什么要在党代会上如此强调时事学习，要求党员首先应站稳人民立场，澄清对形势的模糊认识呢？这是从南京曾经是国民党反动统治中心这样一个具体情况出发的。那时，我在抓工会工作的同时，还抓青年学生和学校的工作。1950年1月召开全市首届学生代表大会，我曾在会上作了《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的报告，号召广大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改造思想，开展学习运动。各学校普遍建立了学生会，会员达3万余人。抗美援朝运动开展以后，我曾先后在金陵大学（后改为南京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等高校作时事学习报告，了解师生思想动态。所谓"崇美"、"亲美"、"恐美"心理，在相当一部分人中确

实存在。

记得1950年11月13日，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该院社会系美籍教授费睿思在批改医预科一个学生的英语造句时，竟把"美国出兵朝鲜"改为"联合国出兵朝鲜"。当这位同学据理提出质问时，他还蛮横地坚持说："据我所知不是美国政府独力出兵，而是联合国出兵。"这位同学致信校学生会执委会，提出抗议。在金陵大学，也曾发生个别美籍教授诋毁中国人民抗美援朝运动，公然为美帝侵略朝鲜、轰炸我东北和平居民等罪行辩护的情况，激起了广大师生极大的义愤。市委除指示将这位同学的抗议信抄写出来，向本校师生公布以外，还抓住上述两个大学里发生的典型事例，于12月2日，发出《关于广泛开展反侮辱、反诽谤运动的指示》，要求在全市大、中、小学校中深入开展时事教育，发动广大师生，控诉美帝国主义罪行，揭穿它的欺骗宣传，克服崇美、恐美思想，并召开全市学生代表参加的控诉大会和举行全市学生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示威大游行，激发反美爱国热情，推动抗美援朝运动。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等重点高校，还按照市委指示，通过举办记者招待会、召开全校师生大会等方式，开展以反侮辱、反诽谤为内容的控诉运动。12月7日，市委向华东局并中央作了《关于南京学生反美控诉运动情况的报告》。毛主席于9日即批示全党，认为："南京市反美控诉运动的经验很好，各大城市均可参照进行"，要求各省、市、区党委"研究运用"。随后，毛主席在《关于编印学校反美斗争文件给彭真的信》中，要求将南京市委的这个报告编入文件，以便印发各

民主人士及党内高级干部。

市委遵照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精神，决定在学生反美控诉的基础上，以控诉日军制造南京大屠杀、反对美帝武装日本为内容，在全市范围内进一步掀起控诉高潮，发动工人、农民、街道居民、工商界和各行各业广泛展开控诉活动，还先后举行了有70万人参加的反帝爱国大游行。在控诉运动的推动下，各行各业、各界人士签订爱国公约，开展了捐献飞机大炮、支援前线等各种活动。学生踊跃参军和报考军事院校，人数达12700人。医生、护士参加抗美援朝志愿医疗团的有1608人。工人开展爱国主义劳动竞赛，增加生产，降低成本，多作贡献。工商界也积极投入抗美援朝活动，1951年1月18日那天，举行了万人集体交税，在营业税开征第一天，税款入库即占全部应缴税的95%。到年底统计，全市共捐献455亿元(旧人民币)，可购战斗机30架，超过计划一倍。郊区农民战胜灾害，获得丰收，敲锣打鼓缴公粮，超额完成任务77万斤。

在如火如荼的抗美援朝高潮中，我们根据中央的统一部署，开展了肃清匪特的斗争和镇压反革命运动。由于南京曾是国民党政府盘踞多年的老巢，政治情况复杂，敌特活动猖獗。还在解放之初，就由市军管会发动群众，进行肃特斗争，曾先后侦破特务案件214起，摧毁潜伏电台组(站)41起，破获重大武装匪特组织60起，逮捕特务分子913人、匪特472人，狠狠打击了敌特刺探情报、造谣破坏的反革命活动。1950年10月，中共中央发出《坚决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以后，我们市负责同志进行了认真的学习，一致认为，

中央的指示十分及时和必要。随着城市的抗美援朝与农村的土地改革全面展开，谣言四起，匪特活动重新抬头。我们分析了敌情，研究了贯彻中央指示的具体部署。在市委领导下，市军管会于1951年1月颁布了反动党团、特务人员登记的布告及实施办法，成立了反动党团、特务人员登记委员会，我被任命为委员会主任，陈养山、龙潜为副主任，制订了“首长负责，全党动手，认真发动群众，深入开展反动党团、特务分子的登记工作”的方针。我亲自掌握各区各部门的登记工作。全市宣传部门密切配合，利用各种形式，开展强大的宣传攻势，揭露反革命分子的罪恶，推动反动党团成员及特务分子的亲友、邻居积极参加规劝登记的活动，出现了妻劝夫、子劝父、特务劝特务登记的情形。当年3月，登记工作结束，登记的这类人员共有18611名。

在如何处理敌特分子时，开始缺乏经验，一度出现过于宽大的偏向。对此，毛主席曾批评说：“南京破案多，对罪大恶极怙恶不悛分子的镇压不够。”他还用幽默的语言，点名批评有的市委领导人，不敢放手发动群众，“镇压反革命不是大张旗鼓，而是打腰鼓”。群众对此也有不满，认为有“姑息养奸”的倾向，甚至尖锐地批评：“政府睡着了。”1951年2月，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毛主席亲自电示华东局转告南京市委，要“大张旗鼓地镇压反革命”，“以教育群众，并向反动派示威”，公安部部长罗瑞卿于当月来南京视察指导。我们市委领导带头严肃检查了镇反中存在的过分宽大的错误，并在全体工作人员中进行镇压反革命的思想教育和政策教育。3月9日，市委召开专门会议，

我向大家通报情况说："这次镇压逮捕的三批人员是惯匪、恶霸（封建会道门头子）、反革命特务头子，要有步骤地进行镇反宣传，要与群众利益、生产建设相结合，揭露反革命分子的罪行，以激发群众的仇恨。"我又说："南京这样一个敌情严重的城市，镇压千把反革命分子是应该的。但如不进行深入的宣传教育，缺乏过硬的反革命罪行材料是不行的。"我还向大家转达了罗瑞卿同志视察工作时的意见，强调"镇反要有真凭实据。要得到群众拥护，处理就没问题了。这个方针是正确的。"据此，我在会上要求各级领导在镇反中必须坚持一稳二准。"稳"是要有计划，有步骤；"准"是要分清敌我，证据确凿。

经过广泛宣传发动，深入掌握证据，根据市委决定，于3月11日、30日、31日和4月1日、10日，相继召开公审大会，处决了29名怙恶不悛、民愤极大的特务、恶霸、反革命分子，表明了政府坚决镇压反革命分子的态度，极大地震慑了敌人。苦主们纷纷上台控诉那些血债累累的"南霸天"、"土皇帝"杀人、强奸、鱼肉乡民的罪行。在下关三汊河一带称霸30多年的王化鹏，具有一贯道头子、汉奸、国民党特务三重身份，被他直接和指使杀害的有30多人，被他强奸、霸占的妇女达100多人。3月31日王犯被枪决时，冤沉18年的徐老太太激动得泪流不止，合手作揖："人民政府替我报了仇，真是我的大恩人！"恶名昭著的缪凤池，在20余年的罪恶生涯中，与蒋、汪勾结，贩毒聚赌，敲诈勒索，谋财害命，强占人妻，4月14日被处决时，围观者达8万人之多，群众欢声雷动。盘踞中华门外码头的"土皇帝"马忠极，剥削码头

工人 33 年，集恶霸、汉奸、特务、把头于一身，在他策动的数次械斗事件中就死伤无辜工人百余名，直至解放初，他还与特务嵇四海等非法组成的“工人服务队”勾结，继续进行猖狂的反革命活动。马犯被处决后，搬运工人兴奋地说：“今天打二两酒，多吃两碗饭！”在处决这些反革命罪犯时，群众自动集合起来，打着腰鼓游行，交口称赞人民政府“有天有法，为民除害”。4 月 10 日，各界代表在人民大会堂召开镇压反革命动员大会时，场外有 40 万人收听。台上血泪控诉，台下泣不成声，一致要求严惩反革命分子，当场收到检举信 7000 余封。是夜，全市统一行动，一举逮捕反革命分子 1200 多人，以后根据群众举报又逮捕了千余名反革命分子。

在大张旗鼓镇压反革命运动中，我们组织了由各民主党派、各阶层代表参加的市、区两级反革命案件审查委员会，审定有关案件，提交军管会批准处理。4 月 29 日，经市军管会、人民法院审判，市长柯庆施最后审批，对 376 名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处以死刑。其中有 1946 年在下关惨案中殴打马叙伦等民主人士的主犯吴凤鸣、伍家于；有解放前逮捕中共地下工作者和进步人士 28 人的“首都卫戍总司令部”军统特务侯兆麟、侯家祥、邱延海等。

大张旗鼓地镇压反革命，不但为人民除了害，而且提高了干部、群众的觉悟，激发了对共产党、人民政府的热爱。广大群众奔走相告，打消顾虑，检举反革命分子的热情空前高涨。城区家庭妇女刘永和检举了 17 个罪大恶极的特务、恶霸分子。永和园茶社帐房先生张文富在一个月内检举了 24 个反革命分子。到 1951 年 5 月，全市查明反动党团、特务分

子2万余人，逮捕7000余人。我们认真贯彻了“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和“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方针，对其中罪恶不大，坦白交代，认罪较好的反革命分子，予以从宽处理，有的释放。我们的做法受到中央的肯定。毛主席曾说：“镇压反革命，渭清不是打腰鼓，是真正的大张旗鼓。”

大张旗鼓地镇压反革命，促进了农村减租反霸和土地改革。南京郊区农村辖五个半区，土改由郊区土地改革委员会领导。我担任土改委主任委员，李广和民主人士陈鹤琴担任副主任委员。1950年12月下旬，三乡一镇开始土改典型试验。1951年2月，召开了南京市郊区农民第一届代表会议，宣告市农民协会正式成立。我到会讲话，号召各级农民协会要带领农民群众，积极投入土改斗争。会后，郊区的土改运动全面展开。由于准备比较充分，仅三个多月就基本完成土地分配工作。到1952年2月，最后四个乡完成土改。南京市郊区的土地改革，历时一年又两个月全部结束。郊区封建地主势力基本铲除，12万农民在政治上、经济上都得到翻身，政治积极性和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1952年郊区粮食产量达9970余万斤，比1950年增长37.7%，超过历史最高水平24.3%，是20多年来未有的大丰收。经过镇反和土改，从城市到农村，治安情况空前改观。古人所谓“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在镇反、土改以后一个时期内，确实出现了这样的景象。

七　难忘的“三反”、“五反”

我在南京工作期间，另一场运动是“三反”、“五反”。这也是与抗美援朝同时展开的。就其性质来说，这是我们党执政以后进行的第一次反腐肃贪斗争，也是第一次与不法资产阶级进行较量。影响深远，至今难忘。

应当说，我们党内的绝大多数同志，牢记毛主席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告诫，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戒骄戒躁，保持和发扬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不仅经受了革命战争的严峻考验，而且经得起革命胜利的考验。像刘青山、张子善那样，被资产阶级“糖衣炮弹”击倒，堕落为贪污腐化的罪犯，只是极少数。就南京的情况看，也是如此。我们在进城接管之初，曾用李自成进京的悲剧和太平天国失败的历史教训，教育党员、干部，切不可被胜利冲昏头脑，提出“进了城市别忘农村，住了楼房别忘草房”的口号。我们市委领导同志，处处注意“从我做起”，严于自律，生活俭朴，大家经常一起吃食堂。我还借用北宋名相司马光家训中的话，“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提醒我们的同志务必不忘战争年代的艰苦生活。勤俭节约，这是我们的传家宝。1950年春节前夕，为着急赈灾民，当我在市级机关提出“节约一餐饭”的建议后，党员、干部首先响应，连续三天每天节约一餐饭，共节约大米400多斤。数量虽不多，却体现了人民政府为人民，我们党的干

部处处想着群众疾苦的精神，因而得到了南京市民的夸赞，说："这个政府真正是人民的政府！"

但是，另一方面，也不能忽视进城以后，环境条件变了，那种"革命到头"、"功臣自居"的思想和贪图享乐的情绪，在有些党员、干部中，确有滋长。特别是担任了一定领导职务以后，有的丢了战马要吉普，有了吉普要"流线型"小轿车；有的经不起灯红酒绿的诱惑，热衷穿着，沉迷舞场；一些机关内讲究排场、铺张浪费等不良风气，也有所发展。1951 年秋冬，我们贯彻中央、毛主席关于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以支援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指示，各条战线都涌现出许多劳模和先进人物，同时揭发出许多铺张浪费、贪污受贿和官僚主义的严重问题，说明有的党员、干部成了经不起考验的意志薄弱者，甚至跌入了犯罪的泥坑。

就在这样的形势下，党中央、毛主席决定开展全国性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正如毛主席所说："反贪污反浪费一事，是全党一件大事"，"我们需来一次全党的大清洗，彻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贪污事件"，"才能停止很多党员被资产阶级腐蚀的极大危险现象"。12 月 8 日，中央发出由毛主席亲自起草的《关于"三反"斗争必须大张旗鼓地进行》的电报，强调"应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看作如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一样重要，一样的发动广大群众，包括民主党派及社会各界人士去进行"，要求"轻者批评教育，重者撤职、惩办，判处徒刑（劳动改造）直至枪毙一大批最严重的贪污犯"。

我们接到中央电报的当天，就对开展南京市的"三反"

运动进行了动员。9日，由市纪委、监察委员会和检查署三方面抽调力量，组成南京市委节约检查委员会，我被任命为主任委员，各区和市政府下属各局成立了精简节约分会。经过层层动员，了解情况，10天后，在市委办公会议上，我作了"三反"动员汇报。当时南京的情况是，市委决心大，有关领导亲自动员，但许多党员、干部有抵触情绪，认为"革命革到了自己头上"。据此，我建议从学习党中央、毛主席关于"三反"运动的指示入手，提高思想认识；同时，通过报纸报道正反两方面的典型事例，对广大党员、干部进行教育。市委要求各级领导干部以身作则，带头检查，向群众表明搞好这场运动的诚意；号召广大市民积极投入运动，大胆检举揭发。1952年元旦，市委不搞团拜，而是开会部署"三反"。当天，除在市邮局特设市长专门信箱以外，市政府大门口还设立了人民检举接待站，接受各界人士的检举。全市的"三反"运动，在党政机关基本铺开。1月27日，我们接到薄一波同志转来毛主席的电话指示，说："大小老虎都有，有很多，要积极打，打出来就算光荣，不能打出就不光荣，负责同志还要受处分。"所谓"打老虎"，就是查处重大贪污案件。市委的基本方针是："要打像样的老虎"，否则震动不大。政策是："争取多数，孤立少数，区别对待。"在市委领导下，全市参加"三反"的有6.6万多人。到2月底，运动进入高潮。

"老虎"打了出来，怎么定性处理？"三反"高潮中，各单位打出的"大小老虎"，有真也有假，必须认真鉴别，妥善处理。这段时间，我本人由于劳累过度，患了脑缺血，摔伤住院了。我虽然不能具体主持"三反"后期的定案处理工作，但仍

向市委提出了意见和建议。我认为，应当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要注重证据，认真调查核对。对人的处理一定要慎重。重大案件应交法院审理，依法办事，不枉不纵。经核定，全市查出贪污人数共 21086 名，根据情节轻重和坦白悔改程度，分别处理。最后，给以行政处分者 3575 名，受到各种刑事处分者 363 人，其中有 2 人被判死缓。

总的来看，全市的“三反”运动，贯彻了中央、华东局指示精神，除查处了一批贪污案件以外，更重要的是，使全党同志经受了一次反对资产阶级腐蚀的深刻教育，同时揭露了领导机关自身的铺张浪费、官僚主义等问题。通过这场斗争，纯洁了党的肌体，教育和挽救了大批党员、干部，极大地提高了党和政府在人民心目中的声誉。

在私营工商业者中开展“五反”，是紧接着在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开展“三反”进行的。当时的情况是：私营经济在党和政府扶持下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但是部分私营工商业者却以为有机可乘，唯利是图、见利忘义的不法行为在新形势下变本加厉地发展起来。特别是少数不法资本家借国家基本建设规模逐步扩大和抗美援朝前线急需大量物资和药品之机，大肆行贿、偷税漏税、盗取国家财产、偷工减料和盗窃国家经济情报，以攫取暴利，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严重损失和极其恶劣的影响。这种不法的“五毒”行为，在“三反”运动中即被大量揭发出来，引起社会各界强烈的反响，纷纷要求予以严惩。为此，在 1951 年 12 月 30 日召开的南京市二届四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曾通过了“在南京工商界中开展一个反行贿、反暴利、反偷漏税、反欺骗运动”的提案。

1952年1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要求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守法的资产阶级及其他市民，向着违法的资产阶级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2月6日，市增产节约委员会和市工商联筹委会联合召开了3000多人参加、50万人收听实况的"五反"动员大会，进一步号召广大职工大胆检举，要求违法者坦白自新，很快掀起了运动高潮。

那时，在全国影响最大的上海市"五反"运动，是陈毅同志亲自抓的。在上海的带动下，南京的"五反"运动，开展得也比较顺利。我们在运动中十分注意掌握党的政策，广泛组织工商业者认真学习中央文件，向他们反复宣讲"五反"的意义，消除他们的疑虑；强调重证据，重调查研究，要求各部门对坦白和检举的材料认真细致地进行调查核实，然后定案处理。到6月底，全市的"五反"基本结束。经核实统计，在全市工商户中，有行贿行为的3633户，偷漏税的20843户，偷工减料的3211户，盗骗国家资财的4423户，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129户。其定案比例为：守法户占26%，基本守法户占57%，半守法半违法户占15.2%，严重违法户占1.5%，完全违法户占0.3%。根据当时经济情况和工商界的实际困难，我们于6月初向周恩来总理写了请示报告。经中央批准，将"五反"退赔款由3200万元从宽核减为2200万元，实际退补款额控制在680万元，1953年6月前只收300万元。

历史是一面镜子。"五反"的全过程，就是检举揭发私营

工商业者确实存在的、危害国家和人民的“五毒”违法行为。除了对少数以身试法的不法资本家依法惩处外，我们对曾有不同程度违法行为的工商业者在查清问题、进行必要的退赔以后，仍重在教育，使他们更加深切地感受到党的政策的伟大，感受到人民政府确实是保护工商业者的，因而增强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自觉性。实践证明，这样做，有利于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并为今后开展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条件。

回顾南京解放头三年，正如毛主席诗中写的：“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悠悠岁月，往事难忘。在那些改造旧南京、创建新南京的天翻地覆的岁月里，我同南京的广大干部、群众同忧共乐，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第二章 江苏建省与“三大改造”

一 江苏建省

经过三年经济恢复，1952年8月，中共中央华东局扩大会议传达了中央关于苏北、苏南、南京三地区合并为江苏省的指示精神，并讨论了江苏建省事宜及有关省委、省政府的人选问题。

9月9日，华东局电告华东地区各有关省、市、区，中央业已批准“将南京市、苏南、苏北合并为江苏省，所有原属江苏省范围之地区全部划归江苏省”，并确定了省委书记、副书记和报请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通过的省政府主席、副主席人选。电报“望柯（庆施）、江（渭清）、萧（望东）、管（文蔚）四同志即至南京开始筹备，争取在本年内正式合并完毕”；要求合并工作应采取分期、分部门、有步骤地进行，以确保正常工作秩序；所有机关在未合并前，都必须严守岗位，各尽职守，不准发生任何混乱和不守纪律的现象。（1952年9月9日华东局《中央将南京、苏南、苏北合并为江苏省》电告

南京、苏南、苏北、鲁、浙、闽、皖）

10月18日，中央发出《同意江苏省委的组成及各部委干部配备给华东局的电报》，正式批准江苏省委由柯庆施、江渭清、萧望东、管文蔚、刘先胜、陈光、石西民、万众一、欧阳惠林、惠浴宇、黄赤波等11人组成，以柯庆施、江渭清、萧望东、管文蔚、刘先胜等5人为常委；柯庆施任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任省委第二书记，萧望东、管文蔚任省委副书记。

11月1日，中共江苏省委正式发出"省委业已组成"的通知，并于南京西康路33号（各部委在中山北路81号）开始办公。

11月7日，省委在南京召开了江苏省成立大会。省委各部委负责人和各地、市委书记出席了大会。省委第一书记柯庆施致开会词，传达中央关于建立江苏省的决定，宣读中央批准的省委组成及各部委负责人名单，并代表省委一班人，提出了江苏建省以后的任务和省委的当前工作。当时群情振奋，上下齐心创建新江苏的喜人景象，我记忆犹新。

接着，江苏省人民政府于1953年元旦宣告正式成立。由谭震林兼任江苏省人民政府主席，柯庆施、管文蔚、冷遹为副主席。

这就是江苏建省和省委、省政府成立的大致过程。

从华东局扩大会议传达贯彻中央关于江苏建省的指示精神开始，我就积极投入了建省筹备工作。对我个人来说，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艰苦岁月里，曾转战大江南北、淮海大地，江苏可以说是我的第二故乡。当我奉命从南京调到江苏省委工作时，我深感只有同省委其他领导同志一道，团

结一致，做好工作，才能不辜负党中央和江苏人民的殷切期望。

江苏作为我国东南沿海经济、科技、文化、教育都比较发达的地区，不仅以人文荟萃、物产丰饶、历史悠久著称于世，而且也是中国共产党建党最早的省份之一。勤劳勇敢的江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曾经为革命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涌现出许多革命英杰。解放初期，鉴于苏南、苏北的解放有先有后，工作基础不尽相同，相继在泰州建立了苏北行署，在无锡建立了苏南行署。中央决定撤销这两个行署，与南京市合并为江苏省，又将徐州、新海连(今连云港)市划归江苏。按当时统计，全省共有4000多万人口，下辖徐州、淮阴、盐城、扬州、南通、镇江、苏州、松江(后划归上海市)等八个专区和南京、常州、无锡、苏州、南通、徐州、新海连等七个省辖市。这是在各级人民民主政权已经普遍建立并得到初步巩固，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开始启动的新形势下，党中央、毛主席作出的英明决策，意义十分重大。江苏的历史，由此揭开了新的一页。

在江苏建省筹备工作中，我们遵照中央指示精神和华东局提出的要求，从部委设置到办公地址，都作了周密安排。在步骤上，先建立办公厅，以沟通与各地委的联系；然后合并和组建新的人事部门及财政部门，以做好干部安排和党的工作，确保税务、银行和财政预算等工作正常运转，不致混乱。在干部问题上，由于干部来自苏南、苏北和南京三个不同地区，相互不熟悉，这就必须相互学习，加强团结。同时，在合并过程中，有的要调动工作岗位，有的要变动工作

职务。针对这些情况，我首先做好南京市干部的工作。要求每个党员，都要像毛主席教育的那样，服从组织需要，不计个人得失，做一颗革命的螺丝钉。领导干部更应顾全大局，发扬风格，不争正职，甘当副手。这样，团结问题也就解决了。从省委到各部委厅局的领导班子，虽然其成员来自方方面面，但配合协调得都比较好，顺利实现了中央、华东局提出的“年内正式合并完毕”的预期目标。

党中央、毛主席非常关怀江苏建省工作。1953 年 2 月 22 日，毛主席在陈毅、罗瑞卿同志陪同下抵达南京。这是南京、苏南、苏北合并以后，毛主席第一次来江苏视察。当天下午，他接见了各部、委、厅、局负责干部，以及正在南京开会的地、市、县委书记。次日，我陪毛主席上了中山陵，视察紫金山天文台。毛主席还为《新华日报》题写了新的报头。

此次视察中，毛主席听取了我们省委和南京市的工作汇报。毛主席再次要求我们，一定要把南京改造成新型的生产城市。他还对如何利用原有工业基础，团结民族资产阶级，进一步恢复和发展生产，作了重要指示。

二　宣传贯彻总路线

江苏建省伊始，迎来了 1953 年开始执行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摆在我们江苏省委面前的任务，就是要在基本完成国民经济恢复工作的基础上，转入大规模的、有计划的经济建

设，首先是带领江苏全党和全省人民，集中力量，克服困难，为完成和超额完成1953年的建设计划而奋斗。

1953年元旦刚过，省委就召开地、市委书记会议。当时，党中央通过《人民日报》元旦社论，向全党和全国正式宣告，我们国家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执行。对此，广大干部、群众兴高采烈，我和省委其他领导同志更感到时不我待。在地、市委书记会议上，我们把贯彻执行中央提出的1953年度建设计划，作为全年工作的中心任务，对开展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作了相应部署。

在我们党把注意力转到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形势下，如何进一步密切联系群众，改进领导、改进作风，以适应新的经济建设任务，这是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为此省委曾于当年2月召开地、市、县委书记会议传达贯彻中央关于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指示精神，以半个多月时间，着重讨论改进领导作风问题。我代表省委，联系建省以后的实际和当前工作任务，作了会议总结。

春夏间，我们按照中央的部署，在继续抓好整党建党工作的同时，紧紧围绕着经济建设计划的正确执行这个中心，在各级党政机关和城市工矿企业开展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行为的严肃斗争。这是继“三反”、“五反”以后进行的新“三反”。主要是通过打击坏人坏事，表扬好人好事，使广大党员、干部受到深刻教育，在领导工作和思想作风上，都有大的改进。与此同时，在全省农村普遍进行了一次以共产主义教育和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的教育为主要内容的整党。通过整党，清除了极少数混入党内的坏人，提高

了党员的思想觉悟，使他们更加明确了我们党的奋斗目标和农村经济发展的方向。

入秋以后，开始传达贯彻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8月27日至9月14日，我们召开了由地、市委书记参加的省委扩大会议，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增加生产、增加收入、厉行节约、紧缩开支、平衡国家预算的紧急指示》，部署了当前的财经工作。同时，认真传达和学习周恩来总理8月11日《在全国财政经济工作会议上所作的结论》的报告。在周总理的这个重要报告中，不仅对当时我国财政经济工作中出现的某些缺点、错误和进一步做好财政、税收、商业、粮食、银行等领导工作的方针、政策，作了结论；而且正式传达了"毛泽东同志指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农业、对手工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应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了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报告强调，"我们在各个方面执行任务，检查工作和批判错误的时候，都必须以党的总路线为指针。"

我在学习周总理的报告中感到，党中央、毛主席经过充分酝酿，制订和提出的这条总路线，确实反映了全国亿万群众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的强烈愿望。认真宣传、学习和贯彻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这是全党的头等大事。10月24日到11月9日，省委召开了全省第一次区委书记会议，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三书记、主持

华东局日常工作的谭震林同志，专程从上海赶到南京，向我们省、地(市)、县、区几级干部，宣讲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他从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议的有关精神讲起，指出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不能不受限制、任其泛滥，而是应加以限制和改造，阐述了党中央、毛主席决定把“一化”(社会主义工业化)、“三改”(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作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的伟大意义。会议在听取和讨论谭震林同志报告的同时，传达贯彻了当时刚下达的《中共中央关于实行粮食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决议》，部署了全省统购统销和冬春工作。

全省区委书记会议结束后不久，我就赴上海参加华东局扩大会议。那时，经中央批准，江苏省委担任华东局委员的有我和柯庆施。会上，主要是讨论和研究如何正确传达贯彻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问题。我回南京以后，于11月25日向全体省委委员传达了华东局扩大会议精神，围绕着什么是过渡时期，为什么要有过渡时期，以及怎样做好过渡时期的工作，谈了自己的学习体会。当时，对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尚待解释，一些具体政策问题需要进一步明确。所以，我在传达中指出：对过渡时期，既不能冒进，也不能保守，而是要采取稳步前进的方针，首先是要在党内很好地学习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认真总结新经验，研究新问题，统一思想认识，积极做好工作。同时，要求各级领导同志必须清醒地看到，我们党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开展“三大改造”，这是一个根本性的社会大变动，必将在社会各界、特别是私营工商界引起巨大的反响。开展统购统销，

实行粮油计划供应，这实际上是对私营工商业的一种改造，整个市场已经出现"经济上升，供应紧张"，城市粮食、副食品和其他日用品的紧张情况十分严重。对所有这些问题，都不能掉以轻心。

年底，中共中央正式作出广泛深入地开展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教育的决定。我们省委领导同志带头，并组织培训了数千名报告员，深入机关、工矿企业等单位，宣传总路线。我们的要求是，按照中央宣传部起草的《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原原本本讲解，对广大干部、群众进行正面教育，积极引导，使总路线和总任务家喻户晓。各界人士，包括私营工商业者，也都积极投入了学习。

1954 年开始，全省城乡普遍掀起了学习和宣传总路线的热潮。省委紧紧抓住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带动农村互助合作、统购统销等各项工作，并为接着进行"三大改造"，积极创造条件。

2 月上旬，在全党和全国上下宣传贯彻总路线的新形势下，中共七届四中全会根据毛主席的建议，针对高岗、饶漱石的反党分裂活动，通过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3 月下旬，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江苏省委出席代表有柯庆施、江渭清、萧望东、管文蔚和当时担任南京市委书记的惠浴宇等同志。我们在会上听取了邓小平同志代表中央委员会作的《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进行了认真的学习和讨论。会议最后通过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

会后，省委立即召开高级干部会议，传达这次代表大会

的精神和大会通过的“决议”。然后，地、市、县委分别召开干部会议，按照中央的规定，进行传达和学习。各级干部在揭发和批判高岗、饶漱石反党活动的同时，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进行自我鉴定，提高思想认识，进一步明确这场斗争的重大意义，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以增强党的团结。

8月1日，中央决定：江渭清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惠浴宇、陈光任省委副书记(柯庆施调上海工作)。下旬，我们按照华东局指示，根据中央宣传部《关于传达中央宣布高岗、饶漱石反党罪行的报告提纲》，作出向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团员进行传达的具体部署。通过传达和学习，进一步统一党内外的认识，使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从“高、饶这样大的干部还要犯反党错误”的事实中，深刻吸取教训，认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确实是万恶之源，如果不很好改造世界观和人生观，难免要犯错误，甚至身败名裂。

9月21日至10月2日，中共江苏省第一次代表会议在南京胜利召开。这是江苏建省以后的第一次党代会。主要任务是，进一步贯彻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决议，部署今冬明春的农村工作。我代表省委向大会作了《继续贯彻党的七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做好今冬明春农村工作，进一步实现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而奋斗》的报告。当时，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周年国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由毛主席提出、党中央批准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被写进了我国第一部根本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参加省党代会的同志回顾建国五年来各条战线取得的伟大成就，精神振奋，决心在以毛泽东同志为

首的党中央领导下，以加强团结，做好当前各项工作的实际行动，为夺取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胜利而奋斗。

三 实行农业合作化

我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民占人口的80%。我在主持省委工作以后，更加深切地感到，做好农村工作，解决好农民问题，事关全局。早在1951年9月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中，就深刻地指出：实行土改以后，农民中存在着发展个体经济和实行互助合作的两种积极性。党一方面不能忽视和粗暴地挫伤农民个体经济的积极性，另一方面要在农民中提倡“组织起来”，发展农民的互助合作的积极性。“决议”肯定了当时已经出现的临时互助组、常年互助组和生产合作社这样一些互助合作的具体形式，要求各地根据生产发展的需要和可能，在农村开展互助合作运动。中央在印发这个“决议”的通知中，进一步明确要求，全党同志要把农业互助合作“当做一件大事去做”。在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1952年农业生产的指示》中，也明确规定，要引导农民组织起来，把建立季节性互助组、常年互助组和有领导、有重点地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作为农村工作的重要任务。我们江苏农村的互助合作运动，就是遵循中央上述“决议”和“指示”，在完成土地改革和恢复农业生

产的基础上，分别在苏北、苏南和南京市郊区，由点到面，逐步发展起来的。据不完全统计，到 1952 年底，全省互助组达 518526 个，其中常年互助组有 145116 个；加入互助组的农户有 3693985 户，占全省总农户的 42.8%。

在发展互助组的基础上，全省地、县两级先后试办了 60 个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其中，沭阳县赵甫亚农业生产合作社，原是个常年互助组，于 1951 年 5 月建社，成为江苏第一个初级社。

建省以后，省委认真贯彻中央“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通过总结各地开展互助合作的典型经验，一手抓巩固，一手抓发展。例如，我们曾总结了无锡市太平乡的经验。这个乡互助组每户平均亩产粮食 420.75 公斤，而单干户只有 369 公斤；全乡 132 个亩产千斤粮的农户中，99%是互助组组员。农民是现实主义者。我们感到，用广大农民的亲身感受与农业增产的事实，来说明“组织起来”的优越性和走共同富裕的互助合作之路的必要性，是教育广大农民最有效的方法。

1953 年 2 月，《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正式颁布。3 月，我在全省地(市)、县委书记会议的总结讲话中，按照中央“决议”精神结合江苏实际，要求全党同志务必着眼于社会主义工业化这个全局，充分认识搞好农业的重要性。农业不发展，工业建设就要失去粮食、原料、市场和资金。当时，江苏 4000 多万人口，农民有 3500 多万；在全省总产值中，工业占 39%左右，农业占 60%强，说明抓好农业确是事关大局，不容放松。各级党委，特别是地、县委，必

须把发展农业作为实施第一个五年经济建设计划的中心任务，全力加强领导。农业搞好了，整个工作就主动。每个农民都丰衣足食，那就是最强的群众观点，也是党性强的表现。

接着，我在总结中谈了互助合作问题，指出：发展互助合作运动，是发展农业生产的基础。逐步地引导农民走合作化、集体化的道路，把个体分散、贫困落后的农业改造成先进的集体化的农业，这是党的农村工作方向，也是土地改革以后党在农村的第二个历史任务。1953 年，江苏全省互助合作的方针是，在整理、巩固、提高现有互助组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要从当地实际出发，坚持质量，切忌片面追求数量，流于形式。

9 月 24 日，省委转发了省委农村工作部《关于江苏省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的初步检查报告》，检查了有些地区在互助合作运动中一度出现“行政命令，强迫编组”；有的地方不是采取典型示范，而是在“消灭单干户”的口号下，突击编组，“一个晚上完成‘组织起来’任务”等贪多、贪大、贪快的急躁冒进偏向，并从思想上对小农经济的改造存在极大盲目性，作风上缺乏深入系统的调查研究，领导上工作指导一般化、方法简单化等几个方面，分析了所以产生急躁冒进的原因，进一步要求全省的互助合作运动，必须在现有基础上继续进行整理和巩固，互助组要有领导地稳步地适当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要把已经试办的切实办好，暂不发展；以便为今后进一步发展互助合作组织打下有利的基础。

1953 年 12 月，中央发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

产合作社的决议》。江苏同全国一样，农村的互助合作运动逐步加快发展。省委于1954年2月召开了全省第二次区委书记会议。3月底，省委发出《关于1954年发展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的指示》，指出：在对广大农民普遍地、反复地进行以互助合作为重点的总路线宣传教育中，农村今后发展的方向是“组织起来，发展生产，建设社会主义”；从互助组到合作社的发展，必须贯彻农民完全自愿的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强迫命令。地、县各级党委要切实加强对互助合作的具体领导，掌握基点，指导全面，由点到面，稳步展开，防止和反对新的急躁冒进情绪。

随着广泛而深入地宣传贯彻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农村互助合作的来势很猛。在整顿和相应发展各种类型互助组的同时，全省有98%的区，30%的乡建立了农业生产合作社。1954年7月统计，包括原有266个老社在内，各地共建成农业生产合作社4395个，入社农户10.7万多户，占全省农户总数1.19%。我和其他常委认为：这个百分比虽然还很小，但树立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榜样，其意义和影响是巨大的，一定要把它办好。这时，党中央、毛主席明确指示，要把农村工作的重心放到互助合作方面来，而且明确了从发展互助组为中心转到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为中心方面来，实行“书记动手，全党办社”，提出“农业合作化运动要大发展”。根据中央、华东局指示和江苏的具体情况，在我主持下，省委相继发出了《关于整顿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组织和准备秋后建社工作的指示》（1954年7月18日）、《关于积极准备迎接农业合作化运动大发展的补充指示》（1954年8

月22日），既肯定了全省互助合作运动发展情况是基本正常和健康的，同时指出了各地办社情况极不平衡，在已建农业社中办得较好的约占25%，一般的约占60%，还有15%办得较差，有的濒临垮台的危险，说明进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工作是艰巨的，一大批新办的合作社要真正巩固和提高，必须从组织领导、贯彻政策、经营管理、政治思想等几个方面，进行艰苦、深入、细致的工作，任何麻痹自满思想都是错误的。省委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在迎接"大发展"中，必须真正深入到合作社去，切实地掌握办社经验；通过有计划地积极地向广大群众进行合作化的宣传，真正达到群众自愿办社；同时要大力培训干部，准备办社领导骨干。

可以这样说，到1954年9月第一次全省党代会召开时，我们已经有了两年多领导互助合作的实践经验，并为进一步发展互助合作做了大量准备工作。所以，我在向大会所作的报告中，对怎样迎接"大发展"，提出了更明确的要求。我对大家反复阐述了这样一个观点：不搞互助合作，光靠小农经济，生产搞不好；只搞互助合作，不搞生产，互助合作不是形式主义，就是强迫命令，而且必然会影响生产。所以，这两种做法都是错误的。我重申：必须坚持"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巩固工作与发展工作应同时做好，既要反对只讲巩固而不敢发展的保守思想，又要防止只顾发展而放松巩固的冒进倾向；特别是防止不顾条件、急躁冒进、"大呼隆"发展的错误做法。为此，我还要求各地指导互助合作运动的领导同志，应认真学习邓子恢同志在第二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总结中对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提出

的几条具体标准，就是：第一，应抓好生产，确保增产；第二，做好分配工作，使之公平合理；第三，做好财务管理与会计工作，适时向社员公布帐目；第四，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提高社员生产积极性。除此之外，我还强调指出，在巩固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同时，要加强对供销合作、信用合作，以及手工业、渔业、盐业合作的领导，使农村合作化事业有全面发展，以利于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按照第一次省党代会确定的发展任务，1955 年夏收夏种前全省农业生产合作社应达到 3 万个。但是，经过冬春大发展，实际上到年初就已接近 3 万个，此外尚有 2000 多个“自发社”。面对这种“超计划”发展的情况，我在 1955 年 1 月 15 日，省委第一次扩大会议的总结报告中提醒地、县各级领导，决不可看到发展数字很大而盲目乐观，许多刚建立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是不够条件的。我传达了中央 1954 年 12 月 3 日电报关于“急躁冒进已开始萌芽”，农业合作化运动必须强调“健康第一”的指示，要求各级领导用“健康第一”的标准来对照当地农业合作化的情况，认真学习和贯彻执行中央批转中央农村工作部《关于全国第四次互助合作会议的报告》，把全省已办的 3 万个合作社的基础打好。地、县委第一书记要负责统筹指导，并指定一名书记或副书记负责互助合作运动的具体工作，以保证运动健康发展。

为着进一步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以互助合作为中心的农业增产运动，1 月 17 日至 22 日，省委召开了全省生产互助合作会议。我和刘顺元同志（顺元同志于 1954 年 9 月调任江苏省委副书记）在会上分别作了互助合作问题和农业生

产问题的报告。会议按照中央委托中央农村工作部召开的第三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精神，认真检查了全省各地合作化运动情况，指出：新建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有 50%左右生产秩序尚未建立，社员思想很不稳定，其中有 15%左右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管理混乱情况，有的（约占 5%）不合办社条件；原有老社管理工作也跟不上，尚待巩固和提高。当时，邓子恢同志根据同毛泽东同志商定的意见，通过中央农村工作部对不同地区的合作社运动，提出了“停（停止发展）、缩（发展较快、较多的要收缩）、发（新区适当发展）”的方针。我们从江苏实际情况出发，确定全省在秋收以前，坚决停止发展，集中全力整顿现有的合作社。遵照中央关于合作社“只许办好，不许办坏”的指示，以及办好合作社要做到“生产增加，分配合理，接受国家计划，认真团结并帮助社外农民”四条标准，巩固已经建立的 3 万多个新老合作社，为今后进一步开展合作化运动打下扎实基础。

上述情况表明，直到 1955 年春，我省互助合作运动坚决贯彻执行了中央的方针和指示，在发展中巩固，在巩固中发展，基本上保持了积极稳步、健康正常的发展势头。

入夏，围绕着农业合作化速度问题，党内发生了意见分歧。7 月 31 日，毛主席在各省、市、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指出：“在全国农村中，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潮就要到来”，严厉批判了在合作化速度问题上的“右倾保守”思想，把邓子恢等同志提出农业合作化应该与工业化的速度相适应，发展不宜过快，要求不能过急的主张，比喻为“东摇西摆”的“小脚女人”，上升到

“资产阶级、富农、或者具有自发资本主义倾向的富裕中农的立场”问题。听了毛主席的这个报告，我们感到震动很大，压力很重。我们原来认为，合作化速度属于工作问题，有不同看法是正常的，并未认识到这是“两条路线”的分歧，是指导方针上的“右倾”问题和立场问题。8 月初，我们将毛主席的报告传达到地、县委书记。各地、县委通过三级干部会议，迅速传达到乡支部。在 8 月 28 日至 9 月 8 日召开的全省第二次党代会上，我们又组织全体代表学习和讨论毛主席《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检查和批判了对待合作化问题上的“右倾”思想，确定到 1957 年全省实现农业合作化的总体规划和分期实行的具体计划。

10 月上旬，我赴京参加了党的七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会上继续错误地批判邓子恢同志关于办社要有条件，要坚持质量，发展一批巩固一批，稳步前进的正确主张。把这些正确主张统统说成是“右倾机会主义”，并提出在互助合作运动比较先进的地方，1957 年春季以前，合作社发展到当地农户的 70～80%，基本上实现半社会主义合作化；在全国大多数地方，大体上可以在 1958 年春季以前先后基本上实现半社会主义的合作化。据此，我代表省委，在会上作了书面发言，违心地检查了“右倾”思想。我在书面发言中写道：江苏在 1955 年春季，农业生产合作社超过了原定 3 万个发展计划，经批准的有 35773 个，还有未经批准的“自发社”7166 个。我们见此发展势头，怕犯“冒进”错误，一面提出“停止发展，全力巩固”，不问各地实际情况，一律“煞车”；另一面卡

住7000多个“自发社”，提出所谓“不给合法地位”，甚至强制部分“自发社”退回到互助组。说明我们江苏各级领导，首先是我们省委领导，思想跟不上形势，领导落后于群众，存在着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右倾保守思想。基于这样的认识，我在书面发言中向全会汇报了经省委研究确定，江苏今后三年合作化规划是：今冬明春，全省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到11万个，入社农户达40%；明冬后春，发展到16万个，入社农户60%；1957年冬到1958年底，入社农户达到80%，基本上完成全省农业的初级合作化，并打算从1958年春开始试办全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经过自上而下反“右倾”和批判“小脚女人”，农业合作化的步伐大大加快了。鉴于“农业合作化高潮”的新形势，我们曾于当年9月从省、地、县抽调10万多名干部下乡，加强对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具体指导。省委还发出了《关于大力巩固新社、提高老社与及时完成秋种工作的指示》，并于10月26日至11月8日，召开全省第三次区委书记会议，进一步贯彻落实党的七届六中全会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决议精神。然后，又召开了参加此次区委书记会议的地、市、县委负责人会议，分析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出现的问题，研究解决问题的措施。当时，全省新老农业生产合作社146780多个，入社农户达49.31%，已经超额完成原定冬春的建社任务，如果加上各地计划发展的2万多个新社，合计将达到167290多个，入社农户约占55%，我在听取了各地的情况汇报以后，明确指出：要把这样一大批突击发展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巩固下来，这是个重大问题。省委研究，从现在起，在今后两

三个月内，要全面煞车，停止发展。各地、县委领导同志，一定要正确、全面地理解党中央、毛主席关于合作化的方针，既要看到广大农民迫切要求走集体化道路的积极性，又不能脱离可能的条件；农业合作化必须与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相适应，任何偏左偏右都是错误的。我再次重申：中央关于合作化运动要“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是不变的。毛主席提出“全面规划，加强领导”，正是为了更好地贯彻执行这个方针。我还分析了各地合作化运动的不平衡状况，有些地方因为发展过快，出现了党员少、会计少、领导办法少的“三少”问题，需要适当掌握发展的速度。各级领导必须解决三个“弄清楚”：一是把合作化的方针弄清楚；二是把合作化的政策弄清楚；三是把合作化的基本做法弄清楚。只有把这些弄清楚了，正确掌握了方针、政策，合作化运动才能因地制宜，解决问题的办法才能切实可行。

应当说，在合作化高潮中召开这次区委书记会议是适时的。对强化合作化运动的具体领导，起了积极作用。但是，在自上而下大反“右倾”的形势下，就全省来看，1955 年 9 月至 10 月掀起第一个合作化热潮之后，11 月份以后又出现了第二个热潮。合作化的来势之猛，速度之快，大大超过了原定计划。到 1956 年 1 月，各地入社农户骤增至 730 余万户，占全省农户总数的 84%，基本实现了半社会主义的初级农业合作化。与此同时，各地陆续办起了一批取消土地分红，即所谓全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鉴于这种情况，我们于 1955 年 11 月下旬和 12 月下旬，曾先后

两次召开有地、市委书记参加的省委扩大会议，着重讨论和研究如何有领导、有步骤地办好高级社的问题。1956年1月，全省参加高级社的农户有36.6%；到年底全省高级社达29218个，入社农户829.5万户，占农户总数91.3%。这样，原定到1958年实现对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实际上在不到两年时间内就基本完成了。

应该怎样历史地看待50年代中期出现的这场合作化运动呢？我想结合江苏情况，谈几点基本体会。

第一，在党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指引下，引导广大农民走互助合作之路，方向是对的。这是因为，在土地改革完成以后，刚获得了土地的贫苦农民，确实碰到了一个如何防止农村产生两极分化和如何提高农业生产水平，以适应工业发展的新问题。在农民群众中，确有通过互助合作，依靠集体力量，以达到共同富裕的迫切愿望。从我省互助合作运动的实践来看，在省委的领导下，各级党组织坚决遵循中央指示的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和国家帮助的原则，贯彻执行了从临时互助组和常年互助组，发展到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再发展到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指导方针和改造步骤，农村互助合作前期工作的方法是得当的，步子是比较稳妥的。

第二，农业合作化运动改变了几千年来形成的传统的生产资料私有制，这是一个巨大的社会变革。在这场变革中，我省各级党委遵照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把工作重心放到以互助合作为中心的农业增产运动方面，坚持搞合作化与搞生产两不误，农业生产一直保持了持续发展。据统

计，从1952年到1955年，全省粮食平均每年增长6.1%，棉花平均每年增长33.9%，油料平均每年增长15.2%。1955年，全省农业总产值达68.63亿元，比1952年增长13%。互助合作的优越性，还突出地表现在依靠集体的力量，在开展大规模的兴修水利、进行农田基本建设等方面，有很大的发展，这是个体农民很难办到的。所有这些，都应予以肯定。

第三，但是农业合作化速度问题上的经验教训，也是深刻的。以毛主席《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为标志，1955年下半年，全党开展了反“右倾”和批“小脚女人”。按照毛主席在《这个乡两年就合作化了》一文的按语中的说法，“右倾机会主义”者看不到“群众中蕴藏了一种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毛主席亲批的“这个乡”，就是我省昆山西宿乡。毛主席以此为典型，认为“新解放区可以和老解放区同时实现合作化”，并将此文选入他亲自主编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作为“治好右倾顽症的有效药方”加以推广。在全国范围掀起的这场“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原来的“积极领导，稳步前进”，一变而为“加速发展，突击完成”，各地的互助组一夜之间变成了农业生产合作社，许多初级社尚未来得及巩固就转为高级社，完全超越了客观条件的许可。省委在1956年3月24日给中央的《关于当前农业生产、整社工作情况和工作部署的报告》中，曾明确提出：“由于运动发展十分迅速猛烈，冲破了先试办、后分批展开的预定步骤，因此就对合作社的整顿巩固阶段，带来了成堆的问题。”我们尽管在合作化热潮中保持了比较冷静的头脑，并

通过召开相应的会议和发出有关的指示，力求既积极又稳步地指导运动，做好工作，尽量避免和减少因所有制急剧改变而导致农村生产力的破坏；但是，对合作化的要求过急，发展过猛，工作过粗，不仅在当时"问题成堆"，给整顿巩固带来了很大困难；因所有制改变过快而导致的许多遗留问题，直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村实行联产承包，才从根本上得到解决。这个历史经验，值得我们认真总结和记取。

四　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

在开展农村互助合作运动的同时，我们通过调查摸底，进行试点，逐步实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江苏是民族工商业比较发达的省份之一，拥有一批有影响的民族资本家。早在三年经济恢复时期，已开始陆续出现公私合营企业。据1953年底统计，全省公私合营的工商企业有49个，职工19936人，企业总产值达1.9亿余元。这些企业，由公方代表参与管理，生产纳入国家计划，比较适应当时已经开始的计划经济要求，显示了公私合营的优越性，在工商界影响很大，吸引力很强。

中央十分重视江苏的对资改造工作。1953年春，曾派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同志率调查组，根据在南京、上海、武汉的考察，写出了《资本主义工业的公私关系问题》的调

查报告，提出了公私合营是国家资本主义的高级形式，是将私营企业改造成社会主义企业最有利的途径，得到党中央、毛主席的肯定。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为对资改造工作指明了方向。由于经过抗美援朝、“三反”“五反”运动，工商界人士的觉悟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在宣传贯彻总路线的过程中，我们认真贯彻执行了党对私营工商业的政策，热情帮助和积极引导他们投入总路线的学习，使他们从新旧社会的对比中，认识到社会主义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企业才有广阔的发展前景，资本家才有光明的前途。这是历史的必由之路。当1953年9月开始宣传贯彻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时，刘国钧先生曾代表常州大成纺织公司表示，要成为总路线公布以后江苏第一家实现公私合营的企业。接着，无锡的荣毅仁先生、南京的徐美峰先生、南通的张敬礼先生等代表人物，都向省委、省人民政府表示，他们的企业随时准备实行公私合营。

为了加强对全省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具体领导，省委于1953年底决定成立“国家资本主义办公室”，由宫维桢任办公室主任，梅村任副主任，与省委统战部共同负责，把这项改造工作纳入有计划有步骤的轨道。

当时，省委的要求是，在广泛深入地开展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宣传教育中，一方面要看到多数工商业者愿意在党的领导下，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实行公私合营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必须注意到在对资改造新形势下出现的新问题。例如：有的对实行公私合营犹疑观望，顾虑很大，存在抵

触情绪；有的表面要求合营，暗里抽走资金，想甩包袱；还有的消极抵抗，哄抬物价，逃避税收，拒绝向国营企业进货，或拖欠资金，个别地方甚至出现殴打税务人员和国营工商业干部，合谋“罢市”等事件。这都告诉我们：实行对资改造，同样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充满着严重斗争。必须严格执行党的政策，讲究工作方法，做好过细的工作，而决不能掉以轻心。

经过调查研究，逐步试点，省委要求各地在对资改造工作中采取的具体步骤是：凡有条件合营的企业，先由市委书记、市长出面，与资方协商；再由有关部门与资方签订协议书，并由这些企业单独向政府申报，然后由政府单独审批。实行合营以后，企业的领导职务，一般由公方任正职，私方任副职。对那些有影响的企业，如无锡荣氏企业合营以后，各厂都建立了董事会，董事长均由荣毅仁担任；常州的大成公司，由刘国钧任总经理；南京的有恒面粉厂，由陈邃衡任第一厂长。对此，我曾经在一个会议上说过，像荣毅仁、刘国钧这样一些代表人物，不仅在全省，而且在全国，都有很大影响，他们带头了，其他私营工商业的合营问题也就好办了。我们对他们的态度，实际上就是对整个民族资本家和其他工商界人士的态度。团结了他们，也就团结了整个工商界。

经过这样审慎而细致的工作，1954 年上半年，直接由省人民政府批准合营的较大私营企业有 20 户。我们遵照中央“统筹兼顾”的方针，边试点边扩展。到 1955 年，全省公私合营的工业企业有 270 户，占私营企业总户数的 2.54%，

职工占37.94%,产值占50.53%。从公私合营的结果看,企业生产和管理水平显著提高,都达到了当年创利目标。我们明确要求,所有合营企业在利润分配中,贯彻中央确定的“四马分肥”(即国家税金、企业公积金、职工福利奖金和资方股息红利四个方面)原则,资方所得为企业利润的四分之一。常州大成纺织公司合营前每年发放股息红利为18万元,合营当年(1954年)股息红利达60万元。资方尝到甜头,笑逐颜开,称赞“四马分肥”政策确实好,企业有利可图,个人也有所得。

1955年10月上旬,党的七届六中全会作出《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以后,党中央、毛主席同时部署加快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0月底,毛主席亲自邀请全国工商联执行委员会召开私营工商业改造问题座谈会。刘国钧、张敬礼和陆小波先生等代表江苏工商界出席了会议。毛主席在会上讲话,号召资本家“认清社会发展规律,掌握自己命运,把自己的命运同国家的前途结合起来”。工商界人士议论热烈,触动很大。接着,中央政治局于11月16日至24日,召开各省、市、区党委代表会议。在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草案)》中指出:我们现在已经有了充分有利的条件和完全的必要把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工作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要求在一切重要的行业中分别在各地区实行全部或大部公私合营,把原来主要是国家资本主义的初级形式推进到主要是国家资本主义的高级形式。使私营工商业分别地、同时也是充分地集中在我们国家和社会主义经济的控制之下。

我返回南京以后，立即部署学习和贯彻会议通过的“决议”。省委于12月7日至17日召开了全省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各地、市、县委书记，镇党委书记，共938人。当我向会议传达中央会议的精神，以及毛主席和其他中央负责同志的有关指示时，还有省级各部、委、厅、局机关干部约4000人旁听。像这样大规模的工作会议，是建省以来不多的，其目的就是要加速推进对资改造工作。会议交流了经验，提出了对资改造的具体计划是：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两年，即1956年和1957年，全省基本完成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公私合营的任务。我在会议期间，参加了几个小组的讨论，着重讲了党对资本家采取“赎买政策”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指出：对资产阶级的私有生产资料采取赎买政策，这是从中国特殊的历史条件中产生出来的政策。我还向大家讲了赎买的办法是，从建国开始大约10年内，工人阶级在满足了人民群众和国家需要而生产的同时，也为资产阶级生产一部分利润。具体地说，就是资本家可以得到企业利润分配的四分之一左右。这是逐步的赎买，不是一下子赎买，也不是由国家另外拿钱来赎买，而是由工人阶级在10年左右时间内，用给资本家生产一部分利润的方法进行赎买。此外，对于那些有专业技术或有管理经验的资本家，还给予较高的薪金，这是过渡时期内，另一种形式的赎买，也是必要的。通过这次会议，使各级领导进一步明确了我们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政策和办法，为尔后出现的对资改造高潮创造了条件。

为了进一步加强对资改造工作的领导，12月上旬，省

委决定，由陈光、宫维桢、周一峰、许家屯、华诚一、陈书同、谢克西、徐进、谢克东、王治平、金逊、金文萍、张真等同志组成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领导小组，陈光任组长。省委号召各级党委，组织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认真学习、深入贯彻中央关于对资改造的决议和省委关于对资改造会议精神，广泛深入地开展一次群众性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宣传教育运动。据当时全省12个市的统计，参加各种报告会、座谈会而直接受教育的干部、群众达到156万人次。

按照省委的部署，1956年1月3日至13日，省工商联召开执委会扩大会议，传达、学习毛主席在全国工商界人士座谈会上的讲话和国务院副总理陈云的报告，以及全国工商联一届二次执委会的精神。我和省长惠浴宇分别代表江苏省委和省政府到会讲话。会议期间，我参加了工商界人士的讨论，与他们推心置腹地畅谈对资改造的方针、政策，帮助大家认清形势，清除疑虑，坚定走社会主义必由之路的决心。同时，听取大家的意见和要求，以便改进我们的工作。当时，比较突出的问题是，私营工商业者要求合营和小商小贩要求走合作化道路来势很猛，有些地方的党委和政府显得猝不及防，思想跟不上，工作简单粗糙。鉴于这种情况，省委在会议期间，一方面批转了中共南京市第四次代表会议关于迅速在全市掀起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决议，肯定了他们加快改造进程，修改原定两年内完成改造任务的方案；另一方面发出了《关于当前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工作中几个问题的指示》，要求各级党委在继续大张旗鼓地宣讲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方针、政策及其重

大意义的同时，必须十分重视和爱护工商业资本家要求合营的热情，加以积极领导，有计划、有步骤地分期分批进行，在企业合营前后，必须十分注意将生产经营和改造工作妥善安排。

这次会议期间，还有另一件鼓舞人心的事情，就是毛主席在谭震林同志陪同下，于1月11日来南京视察。我向毛主席汇报了工作，还陪他老人家参观了南京市郊栖霞区的十月农业社。毛主席兴致勃勃地听取了十月农业社主任何昌椿的汇报，视察了十月村的农田、学校和社员家庭，指示我们一定要抓好农业生产，搞好南京的城市和郊区的绿化工作。接着，毛主席又视察了玄武湖乡红光农业社、南京无线电厂和军事学院，来到南京市委大院接见了参加南京市第四次党代会的全体代表、在宁高等院校、科研单位的知识分子代表和省工商联执委会的代表。毛主席视察南京并亲切接见各界人士，对当时正在开展的农业合作化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省委为了进一步加强对资改造工作的具体领导，于1月14日召开了各市委书记和各地委工业部长会议，分析了对资改造高潮的形势，并对如何指导运动健康发展提出了具体要求。会议第二天，即1月15日，传来了北京市实现私营工商业全行业公私合营的消息，工商业者纷纷提出申请，要求公私合营。形势发展之快，来势之猛，出乎人们意料。《新华日报》于当天发表了《加快步伐，把改造私营工商业的运动推向全面高潮》的社论。我连夜主持召开省委会议，商讨具体部署，通知各级党委因势利导，根据当地具体情况做

好工作。1 月 17 日，省委发出《关于当前对资改造工作的指示》，明确规定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要分三个步骤：第一是批准公私合营，生产经营照旧，从业人员一律不动；第二是依靠工人、店员，团结资方人员，群策群力，进行清产核资；第三是进行经济改组，做好调整商业网的工作。

应当怎样正确认识这场迅猛掀起的对资改造高潮呢？实际上，这是由于合营经济不断壮大，我们党推行利用、限制、改造政策的必然结果，是私营工商业者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唯一可能的选择。在这种大势所趋下，1 月 16 日上午，南京市各区人民政府门前投送公私合营申请书的队伍一字长蛇阵，熙熙攘攘，络绎不绝，到下午 15 时，各行业申请手续基本办完，所有申请均获批准。1 月 17 日，南京市工商界举行 30 万人大游行，全城报喜庆祝的锣鼓喧天，鞭炮不绝。苏州、无锡、镇江等市也在当天（1 月 17 日）掀起敲锣打鼓、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的热潮。其他各市分别在 1 月 18 日至 23 日全部批准工商业公私合营。全省 71 个县，在 1956 年春节前后基本上完成了批准合营的工作。原定两年完成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在短短几个月内就提前实现了。

我省继北京市之后迅速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影响是巨大的。党中央、毛主席对荣毅仁等国内外知名的民族资本家带头合营，至为关心，高度赞扬。当时，全省私营企业中投资最多的是荣毅仁，资金为 6252950 元；其次是刘国钧，为 6140369 元。1957 年 1 月初，陈毅在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二届一次会议开幕前夕，曾对代表们传达毛主席的谈话精神，

他说："毛主席交给我一个特殊任务，要我和上海的同志们商量一下，把荣毅仁选为上海市副市长。"他还谈到，"毛主席说，荣家是我国民族资产阶级的首户。现在，荣毅仁把全部企业都拿出来和国家合营，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既爱国又有本领，堪当重任。而且凭着他的特殊身份，在国内外能起到我陈毅起不到的作用。"由此，充分反映了党对爱国民族资本家态度是何等诚恳，期望是何等殷切！

对资改造速度如此之快，不仅出乎人们预料，而且也冲破了省委原定的公私合营步骤。我们要求各地根据中央有关政策规定，组织相应的力量，切实做好合营中的各项工作，其中包括清产核资，经济改组，私方人员的工作安排，以及对私方推行定息制度等。

省委劳动工资委员会还专门召开了全省新公私合营企业工资改革会议。省人民委员会根据会议提出的工资改革方案和各产业、各地区的增资指标，于1956年11月26日颁发了《关于新公私合营企业工资改革中若干问题的补充规定》，对参加工资改革的合营企业的范围、工资标准、私方人员和小业主的工资问题，都作了详细规定。在定息制度方面，我们从江苏实际情况出发，原定7年，后根据需要延长了3年。私股定息一律实行五厘。私方人员的高薪不变，低薪逐步提高。全省1956年上半年发给私方人员定息700万元，以后每年付给资本家定息额为1400多万元。工商业者普遍反映"定息定心"。采取这些措施，对稳定人心，推进社会主义改造的顺利进行，都发挥了积极作用。

回顾江苏对资改造的这段历史，一个很重要的体会是，

积极引导党员、干部和职工群众正确认识中国的国情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特点，使大家真正懂得：我们党采取一系列正确政策，通过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过渡形式，最后实现马克思和列宁曾经设想的对资产阶级“和平赎买”，是完全可能的。用当时干部、群众的话来说，这是“对工人阶级有利、对社会主义有利，而且具有世界意义”的伟大创举，是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尽管在公私合营高潮掀起以后，也曾不同程度地出现过步子过大、速度过快、工作难以跟上等问题，但由于中央的方针明确，我们省委态度积极，头脑冷静，坚决贯彻执行了党的各项政策规定，因此，总的来说发展是健康的，成绩是巨大的。我深感，对资改造的胜利，是贯彻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进行“三大改造”的一个最值得称道的胜利，是党中央、毛主席提出“统筹兼顾、合理安排，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团结奋斗”的伟大方针的胜利。

第三章　整风和反右派斗争

一　1957年夏季以前的形势

1957年，是个极不寻常的年头。当年，春季开始全党整风，夏季展开“反右派”斗争。这是两件相互关联的事情，被载入了我们党和国家的史册。

我们江苏同全国绝大部分地区一样，到1956年基本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践证明，毛主席、党中央高瞻远瞩，在1952年提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反映了历史的必然性，是很正确的。总路线关于逐步实现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宏伟目标，代表了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一切爱国的人们的共同愿望和根本利益，这是国家独立、富强的当然要求和必要条件。

在“三大改造”的热潮中，1956年7月上旬，召开了中共江苏省第三次代表大会，进一步确定了全省为贯彻执行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

造而奋斗的任务和措施，选举产生了新的省委。

这个时候，随着“三大改造”的加速推进，社会主义建设步伐也相应加快了。首先是党中央公布了《1956 年到 1967 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要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方针，其精神是积极的，反映了党和人民在新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上，迫切要求把农业生产和其他方面的建设尽快搞上去的迫切愿望。我们在着手实施“纲要”和贯彻上述方针时，遵照中央在当年 5 月提出的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及时注意防止了实际工作中出现的要求过高过急的偏向。所以，这几年全省工农业生产一直稳步发展。

与此同时，毛主席作了《论十大关系》的著名报告，围绕着经济建设这个重点，提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并且尽可能将消极因素转变为积极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服务的基本方针。当时，正值苏共二十大以后，帝国主义利用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掀起了世界性的反共反社会主义浪潮。我们学习毛主席的这个报告，感受最深的是要“以苏为鉴”，其中包括斯大林在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错误以及对他的个人崇拜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毛主席告诫全党，不可重复苏联走过的弯路。他还指出，对于马列主义，我们要学的是属于普遍真理的东西，并且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事实表明，毛主席提出并论述的“十大关系”，标志着我们党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始，并为即将召开的八大作了思想上和理论上的准备。

1956年9月，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这是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大会。我率江苏代表团赴京参加了大会，聆听了毛主席的开幕词，刘少奇的政治报告，周恩来《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和邓小平《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还听取了朱德、陈云、董必武等同志的重要发言。大会就上述报告作出了相应的决议，选举产生了以毛泽东为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为副主席，邓小平为总书记的中央委员会。我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这次大会的最重要的收获，是总结了七大以来的经验，分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形势，提出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任务。大会明确指出，国内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虽然还有阶级斗争，还要加强人民民主专政，但根本任务已经是在新的生产关系下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八大制定的这条正确路线，为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健康发展，指明了方向。

八大闭幕以后，我们立即向全省党员、干部传达贯彻大会的精神，带领全省人民，在八大路线的指引下，转入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推动了农业生产和其他各项建设事业的进一步发展。邓小平同志谈到这段历史时，曾说："从一九四九年到一

九五七年上半年，我们的发展是健康的，政策是恰当的。”[1]他又说：“从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搞了土改，搞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大规模工业化建设，搞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事情做得非常好。”[2]这是对1957年上半年以前的基本总结，同样适合于我们江苏的实际情况。

二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继《论十大关系》之后，毛主席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光辉论著。

毛主席是一位站在正面指导时代潮流的伟大人物。他为什么要在1957年初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我认为，这是他注意研究中国历史情况和当时的社会情况，注意研究包括苏联在内的外国情况的结果。当时，我们国家正处在“由革命到建设”的历史转折时期。除了还有敌我矛盾之外，主要是人民内部的矛盾，这是大量的，无处不存在的。在国际上，继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错误的揭露和恶毒的攻击之后，接着发生了波兰事件（1956年6月）和匈牙利事件（1956年10月下旬至11月上旬）。毛主席、党中央曾指

①②《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53页、第136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

示以《人民日报》编辑部名义，相继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等文章。从国内的实际与苏联及波匈事件的教训，都使我们感到社会主义制度下不是“矛盾消失了”，而是确实存在着各种矛盾。人民内部的非对抗性矛盾，如果处理失当，甚至会转化为对抗性的敌我矛盾。毛主席提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学说，意义十分重大，是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巩固和发展的重大新课题。

这时，国内也出现了一些不安定的情况。有些地方的城市发生了罢工、罢课、请愿等事件，个别的在闹事中提出要搞个“匈牙利”。南京也发生过到市政府请愿的事情。但总的来说，城市还是比较安定的。有些地方的农村，则由于合作化过快过急，粮食统购任务过重，加上自然灾害的影响，闹事现象屡有发生。我记得针对这些情况，省委曾发出《关于正确处理农村人民闹事问题的指示》，列举了 1956 年冬至 1957 年春，泰县闹退社事件在几个乡范围内成片发生，有 2000 多人到县里请愿。乡、社干部对于群众闹事，有的束手无策，东躲西跑；有的迁就许愿，向上要粮要钱；还有的态度粗暴，甚至鸣枪恫吓，抓人关人，致使事态扩大。省委认为，形成群众闹事，虽然有客观原因，但归根到底还是由于领导上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对群众的思想教育不够。闹事过程中，有的确有极少数坏人在煽动，但绝大多数是群众自发闹起来的，属于人民内部问题。这些情况告诫我们，学会正确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特别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摆在各级党委面前的严重政治任务。

就在这样的国际、国内形势下，毛主席于1957年2月27日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报告。当时，我因病休养，经中央批准，由刘顺元同志代理省委第一书记职务。顺元同志赴京列席了会议，聆听了毛主席的重要报告。他返回南京，带回了题为《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报告——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的记录稿。我们立即召开省委委员，地、市委书记，各部委和各厅局党组负责人会议，认真进行传达和学习。接着，在3月8日全省城市工作会议、3月10日全省组织工作会议和4月1日省委三届三次全委（扩大）会议上，又分别进行了传达和学习。省委还专门发出《关于传达、学习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报告的通知》（1957年3月28日），强调首先应抓好县以上领导干部的学习。同时要求各级党委，结合学习和贯彻毛主席3月12日《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精神，切实加强对思想工作的领导，务使党内外干部明确认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和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克服教条主义，划清同“左”、右两种倾向的界限。“通知”对文教系统、文艺界和民主人士、民主党派的传达和学习，也作了部署，提出了具体要求。

我至今仍清晰地记得，党内同志和党外人士听了传达，都有一种春风送暖的感觉。在学习和座谈中普遍反映，毛主席的这个重要报告，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科学地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正确地阐述了社会主义建设中一系列重大问题，内容既丰

富又新颖，论述既深刻又生动，对于正确认识“三大改造”带来的社会大变动，处理这个大变动中出现的新矛盾，特别是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提供了新的思想武器。在4月2日至6日的杭州会议上，我们江苏的同志在向毛主席汇报时，反映了党内外参加学习的同志，“有个共同的要求，就是希望毛主席这篇文章能够早一点发表。”他老人家当即表态说：“从这里回北京，再过两个礼拜或三个礼拜，就可以发表了。”经毛主席亲自修改、补充，正式定名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篇光辉著作，终于在6月19日公开发表。这是我们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传达和学习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实际上是党内整风的开始。在这之前，毛主席南下视察，于3月20日亲临南京人民大会堂，向江苏、安徽、上海二省一市和南京军区的党员干部共2000多人，作了重要讲话。我们江苏省级机关处以上党员干部和各地、市委书记，都聆听了讲话。当天上午8时，我陪着毛主席走进人民大会堂，只见楼上楼下，座无虚席。毛主席身穿银灰色中山装，在热烈的掌声和“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中，容光焕发地走到台前，频频向同志们挥手致意。当我向大家宣布“今天召开党员干部大会，请毛主席给我们作重要讲话”时，全场响起暴风雨般的掌声。毛主席再次向大家挥手致意，然后一边就座，一边点燃香烟，开始讲话。他从南京“钟山龙蟠，石城虎踞”讲起，谈今说古，妙趣横生，一口气讲了近两个小时，毫无倦意。我领会毛主席的讲话精神，一是阐发党的八大路线，强调我们共产党人奋斗几十年，本世纪的上半世纪搞革

命，下半世纪搞建设，现在的中心任务是经济建设。二是论述社会主义时期还存在着矛盾，大量的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需要我们学会正确处理。三是教育我们党员、干部，要以整风的精神端正党风、转变作风，号召全党要坚持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他老人家风趣地说像“游方僧”，到各处“游说”。实际上是亲自为我们讲解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帮助我们开展整风运动。

为了广泛深入地传达和学习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报告，我们省委领导曾分工下去，向农村、厂矿企业和高等院校师生“游说”作报告。同时，相继召开省政协会议和党内外人士参加的全省宣传、文教工作会议。在这些会议上，我们同民主党派负责人，文艺界、医务界和其他各方面的代表人物，其中不少是学有专长的高级知识分子，举行座谈，贯彻整风精神，充分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反映。4月29日，省委在《关于学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报告》中，回顾这段时间贯彻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的精神，边学习、边检查、边改进工作的情况，指出：毛主席提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使党内外都感到振奋，解决了许多“苦思不解”的问题。关于两类矛盾的划分，使党内干部感到对待各种问题有了最基本的界限，增强了工作信心。把民族资产阶级等划入人民内部，使党外人士感到“吃了定心丸”，十分愉快和感激，表示“生逢盛世，再不奋发努力，有负人民期望”。

在省委的这个报告中，也提出了一些值得注意的动向。主要是：由于过去长期搞对敌斗争，党内外许多人对于在新

的历史条件下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存在各种疑虑和不同程度的抵触情绪。在党内，最突出的是怕“乱”。担心搞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分不清“香花”、“毒草”，万一给坏人钻空子，闹事闹出个“匈牙利”怎么办；还有的对“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统筹兼顾，合理安排”的方针不理解，认为是“把知识分子捧上了天”，“太便宜了资产阶级”，“安排民主人士当官不公平”；一些基层的同志搞惯了阶级斗争，认为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多此一举”，“自找麻烦”。在党外，顾虑更多。很多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和其他各界人士，怀疑“真放”还是“假放”，“长期放”还是“暂时放”，认为现在讲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鼓励大家“鸣”、“放”提意见是“放长线钓大鱼”，担心事后“抓辫子”、“算总帐”。

我们分析了党内外的思想动向，深感要解决这些问题，关键在于提高各级党委领导的认识。由于我们是胜利者，是执政党，有功劳，有威信，有地位，这就使一些同志自我陶醉、思想停滞，看不到或看不透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这种认识落后于实际、领导落后于形势的情况，也突出地反映在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方面。我们一些党员领导干部，或者盛气凌人，不平等待人；或者不尊重知识分子劳动，不听他们的意见；个别的甚至任意驱策和凌辱知识分子。情况表明，如果我们不是很好地学习和掌握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端正思想作风，就不能适应“三大改造”以后的新形势，过不好社会主义这一“关”。

1957 年 5 月 1 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整风

运动的指示》在《人民日报》公开发表。指示要求，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在全党重新进行一次普遍的、深入的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水平，改进作风，适应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这样，整风运动便正式展开了。

三　从党内整风到反击"右派"

根据中央的整风指示，5月9日，省委三届四次全委（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整风运动的计划》，要求江苏全党以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学说为指导，本着中央提出的"这次整风，应该是一次既严肃认真又和风细雨的思想教育运动"的精神，按照"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放手鼓励批评，坚决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都要密切结合当前工作和思想实际，订出切实可行的整风计划，边学习、边检查、边改进，把整风的过程，作为改进工作、转变思想作风的过程。省委决定，成立以刘顺元同志为组长，惠浴宇、欧阳惠林等同志组成的整风领导小组，在省委常委领导下，负责整风运动的日常具体指导。省级机关各部委厅局，各地（市）县委，都应成立整风领导小组。各级党委，都要把"扩大民主、改进作风"作为整风运动顺利开展的关键。领导干部都必须虚怀若谷，有计划地

召开工人、农民、学生、解放军战士、知识分子、民主党派、少数民族、机关干部的座谈会，了解有关工作中的具体矛盾，认真听取党外人士、一般干部和被领导者的意见，特别要耐心听取反对意见，结合全盘工作，进行个人思想作风的检查。

应该说，整风得到了党员的拥护、人民的欢迎，开展是顺利的、健康的。对于整风中揭露的问题，毛主席在5月16日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对待当前党外人士批评的指示》中，曾这样告诫我们：党外人士对我们提出的批评，不管如何尖锐，基本上是诚恳的、正确的。对于我们党改正缺点错误，大有利益。我和省委同志感到，毛主席的指示十分及时。指示中列举的许多事实，在我们江苏党内也不同程度地存在。例如：有的党组织任意发号施令，不信任和不尊重党外人士，以至造成"深沟高墙"；有的党员干部"官"气冲天，高居群众头上，特权自私；有的党员"高人一等"，把入党视作找到了"乌纱帽"，伸手要名利、要地位；学校里有的党员干部、教职员，不向学问多的非党教师诚恳学习，反而摆出架子，甚至板起面孔，动辄训斥老教授。种种事实使我们感到，在这次整风中，把党内这些错误的思想作风，完全扳过来，是非常必要的。

但是，从4月下旬开始的整风提意见进行了不到一个月，进入5月下旬，情况开始有了变化。

5月25日，省委发出《对当前城市开展整风运动的几个问题的意见》，指出：我省整风运动，在省级机关和南京等市已初步展开。在党外人士和知识分子提出的批评意见中，

许多是有益的，但“有一部分是右翼分子的不满言论和谩骂”。省委要求，省级机关和各市应该集中力量先在党政机关、大专学校、科研单位内解决我们同党外人士和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批评还没有展开或展开不足的，应继续发动大胆批评，把心里话都讲出来；批评已经相当展开的，要进行分析，有些是属于制度上的问题，有些是过去运动中的遗留问题，还有些确实是党员干部思想作风和工作方法的错误，应该分别采取措施，能改进的马上改进，不能马上改进的要解释清楚，积极创造条件求得逐步改进；对于那些错误的批评，应在以后适当的时机加以答复。工厂、中小学、医院、剧团等基层单位，均暂不发动批评，个别自发开展批评的单位和迫切要求开展批评的单位，党委应主动找他们开座谈会，给他们一个畅谈的机会，并安排适当时机再开展运动。特别注意不要在工人、学生中开展批评运动，以免影响生产和学习。如在他们中发生闹事，应抓紧时间正确处理，不宜扩大，也不要公开登报。指示强调，领导干部必须放下“老爷架子”，深入到群众中去，坚持开门整风，运用座谈会、小组会、个别谈心等方式，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而不应采取大会批评、大会检讨的方式，务求深入细致，真正解决问题。要正确执行整风与工作两不误的方针。各有关业务部门尤须抓紧做好当前工作，包括学校教育、市场供应等，千万不要关起门来，自下而上，人人过关，误了生产和建设大事。

省委发出这个“意见”，是出于形势所逼。其中“右翼分子的不满言论和谩骂”这一提法的根据是毛主席于5月15日写的《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文章认为，在民主党派中和

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告诉全党，让“右派的进攻”达到顶点，再予反击。

毛主席的这篇文章，标志着从整风到反右派的转变，是向党内发出的“反击右派”的第一个信号，开始只限高级干部内传阅，带有向党内同志“打招呼”的性质。就在省委发出上述“意见”的当天，即5月25日，毛主席接见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号召“同志们，团结起来，坚决地勇敢地为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而奋斗。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是完全错误的”(5月26日《人民日报》)。这就在实际上向党内外发出了反击右派的公开“动员令”。接着，《人民日报》于6月8日发表了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一场全国范围的“反右派”斗争，正式揭开了序幕。

四 反右派斗争深入扩大

反右派斗争的具体过程，党内外许多老一点的同志都亲身经历过。1957年6月至7月这段时间内，毛主席曾亲自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6月8日)、《中央关于反击右派分子斗争的步骤、策略问题的指示》(6月10日)，撰写了以《人民日报》社论名义发表的《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7月1日)，以及当时只限党内领导干部传阅的《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7月)和在上海干部会议上作的《打退资产阶级右

派的进攻》的报告(7 月 9 日)等。这些文件、文章和讲话,对指导当时的整风和反右派斗争产生了重大影响。

那么,应该怎样实事求是地对待反右派斗争呢?邓小平同志曾多次谈了这个问题。他指出:1957 年的反右派斗争,还是要肯定。这是因为,"三大改造"完成以后,确实有一股势力、一股思潮是反社会主义的,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其实质就是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扭转社会主义的方向。所以,反击这股思潮是必要的。不反击,我们就不能前进。错误在于扩大化。概括起来是两句话,"一句是必要的,一句是扩大化了。""扩大化是错误的,但当时反右派的确有必要。"这些重要谈话精神,写进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我们正确认识反右派斗争的基本准则。

现在,回头来看江苏的反右派斗争。当时,党中央、毛主席指示,"各地情况不同,何时开始反击,要看当地情况决定。"中共江苏省委于 6 月 29 日发出《关于坚决打击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指示》,要求各级党委遵照《中共中央关于打击、孤立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指示》(6 月 26 日)精神,组织左派力量,团结中间群众,造成强大的声势,同右派分子展开面对面的斗争。在斗争中,要把本地区、本部门和本单位的真正右派分子列出名单,区别对待,集中力量打击右派骨干分子和代表人物。省委在指示中还强调,反右派斗争要实事求是,不要扩大化。有些单位右派少,或者确无右派,就不要主观主义地勉强去找右派。凡点名批评,特别是报上点名批评,必须点得准,而且要按照规定事先履行报批手续。

当时,全国范围内反击右派正处于"趁热打铁,乘胜追

击"的高潮之中。所谓"内外夹击,无情打击"的温度越来越高。我们发出上述指示,是经过慎重研究,还算比较冷静的。在所谓"大鸣"、"大放"中出现的那股"杀气腾腾"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潮,在江苏一些城市、一些单位,确实也有所反映。一些知识分子、青年学生迷失政治方向,有的党、团员政治立场发生动摇。少数人鼓吹"大民主",煽动学校师生闹事;有的在"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口号下,要挟中共组织"退出"机关、学校。面对这种情况,我们要求由负责干部亲自动手,深入到民主党派和高级知识分子中间去做工作。我本人曾到南京的几所大学,就一些大是大非问题,找有关人士谈心。譬如,关于"外行"与"内行"的问题,我曾同著名教育家陈鹤琴先生谈了看法。陈鹤琴先生早年留学美国,学成归国以后专心幼儿教育事业,创建了鼓楼幼儿园,创办了幼稚教育会、中华儿童教育社等,是国内数一数二的幼教专家。我对他说,所谓"外行"与"内行"是相对的。资本主义在西方搞了200多年,而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刚刚建立,怎么建设社会主义还在摸索,可以说我们大家都是"外行"。搞教育,你是专家,是内行。可是,我们这些"外行"在解放后,把教育事业办起来,大、中、小学校比解放前多了,文化教育发展了,这是为什么?因为我们共产党人有个出发点,就是全心全意为广大人民群众谋福利,并且勇于在实践中学习,从外行变内行。接着,我又讲了新旧社会对比,说:解放前,你就是专家,但办不成多少教育;即使从学校培养了少数人才,也面临"毕业即失业"的困境,英雄无用武之地。只有在新中国,知识分子的聪明才智才有了充分发挥的广阔天地。

我列举这些事实，目的是为着说明离开党的领导，必将一事无成，辨明右派所谓“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实质，是要摆脱和反对党的领导。在这样的原则问题上，我们当然不能退让。

我还参加了民主党派、工商界的座谈会，对正确处理党与非党知识分子和其他党外人士的关系，同大家推心置腹地交换意见。我与高觉敷教授谈话时，曾以参加接管南京的亲身经历，谈了我们党“统筹兼顾，合理安排”的一贯方针。我对他说：我们党与党外人士历来有着和衷共济的合作关系。解放初期，我们面对国民党留下的“烂摊子”，在百废待举之际，还提出要把全部旧人员都包下来，口号是“同甘共苦，三个人饭五个人吃”。现在，我们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共同为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目标而奋斗，有什么理由不要知识分子，不要党外人士呢？我还以高觉敷先生本人为例，说：现在，你是九三学社南京分社主委、省人民代表，又是全国政协委员。我参加革命 30 多年了，现在是省委第一书记、省人民代表，但没当全国政协委员嘛！我这番话，既驳斥了右派的攻击，又说明了我们党对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生活上给予关心、政治上合理安排的一贯政策。他十分感动地说：“是啊！共产党为国为民，再要说不好，从良心上都讲不过去。”经过同各界人士接触，我感到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是爱国爱党的，只要坚持“摆事实，讲道理”，有的人即使在整风提意见时说过一些错话，有过某些偏激情绪，但在党的政策感召下，很快就澄清了模糊认识，端正了政治方向。右派的那套错误言行，也就失去了市场。

8 月 24 日，我们根据中央指示“反击右派的斗争，必须继续扩展和深入，在未开展的单位中分期分批地展开，在已开展的单位中要深入挖掘”的精神，发出《中共江苏省委关于继续深入反右派的部署的指示》。

当时的情况是，反击右派的高潮过去了，一些开展反右斗争的单位，普遍出现了厌倦情绪。7 月上旬，毛主席来南京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和政治局扩大会议，并和部分省、市委第一书记谈话，了解整风、反右情况。由于南京天气太热，会议开到中途停了下来，中央决定移会青岛。毛主席于 7 月 12 日从南京乘专机抵达青岛，并在那里撰写了《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印发到会同志。我们在学习和讨论中，比较突出的感觉是文章对右派的定性又升了级，定为“反动派、反革命”。文章强调反右派斗争“还需要几个月深入挖掘”，“决不可以草率收兵”。接着，中央发出一系列相应指示，要求我们以“反右派为主”，深入挖掘，扩展范围，把反右派斗争扩大到县级机关团体、工矿企业和中小学校等各个领域。

省委关于深入反右派的指示，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作出的。总的要求是，已经开展反右派斗争的省市级机关、民主党派、大专院校、科研单位和工商界等各方面，要“继续深入地加以挖掘，穷追搜山”；有些领导决心不大，斗争没有开展起来的单位，要“纠正右倾情绪，转变落后状态”，把“浮出的、露头的、沉底的右派分子都挖出来，搞透搞臭”。地、县两级和城市区级机关、民主党派、中小学校、工商界、宗教界，以及工矿企业中工程技术人员、职员的反右斗争，应先搞试点，取得领导经验，再分期分批地展开。同时，省委指示各级

党委在深入挖掘中，要防止盲目扩大；尚未开展反右派斗争的地区和单位，不能一哄而起，造成混乱；确实没有右派的单位，不要人为地去"制造右派"。指示再次强调，一定要注意党的政策和策略，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划定右派分子，必须经过反复排队，核实材料，正确鉴定。重申登报公开批判，要严格执行报批手续。要坚持说理斗争，不强词夺理、不乱轰、不逼供信。在此之前，在8月9日召开的省委常委会上，我们曾议定了几项政策性规定。一是工矿企业限于科室人员中开展反右派，我提出在工人中不搞什么"大鸣"、"大放"；二是农村开展整风，不扣"右派"帽子；三是整风、反右派，对党员干部，除叛徒和严重违法乱纪者外，一律保护过关。省委作出上述指示和规定的出发点，仍然是要稳定农村局势，维护工矿企业正常生产秩序，确保整风、反右派与生产、工作两不误。

中央在指示继续深入、扩展反右派斗争的同时，还要求向各阶层群众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展开一场全民性的两条道路的大辩论。根据这一指示精神，省委于8、9月份，还相继发出《关于农村社会主义大辩论必须注意斗争方法和工作方法的指示》(8月28日)、《关于开展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运动的指示》(9月1日)、《关于在全省文教系统立即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10月28日)。要求通过教育和辩论使广大群众辨明政治思想上的大是大非，重点是要辨明要不要党的领导，要不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是，当时的所谓"大辩论"，实际上就是在城乡普遍推行"大鸣"、"大放"、"大字报"。省委考虑如不很好引导，势必混淆两类

不同性质的矛盾。因此，在上述几个指示中，都强调了各级党委务必加强具体领导，防止简单地用“阶级斗争”的方法对待思想问题，特别是在农村、厂矿企业和大中小学，应以进行正面教育为主。比较而言，江苏的“大辩论”没有把基层搞乱，这是一个重要原因。

五 强调整改

在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的整风变为“反右派”斗争以后，还要不要继续整风？对此，党内外都十分关切。

8月29日，我在地、市委文教部长及专区、市教育科局长会议上的讲话中，对6月8日开始反击右派以前党外人士提出的意见作了具体分析，再次肯定多数人的意见是善意的，其中有的虽然也有错误，但出发点是好的。除了关系到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方向两个大是大非问题以外，对所有的意见，不论怎样尖锐，我们都要认真倾听，择其善者而从之，只要确实是我们的错误，我们都要认真改正。当时，中央的部署是，县级以上机关团体的运动，应按照“大鸣”“大放”、反击右派、着重整改、个人检查四个阶段进行，每个阶段都要贯彻“边整边改”的精神。我在这个讲话中，对省、市级机关提出不仅反右派要狠，改进作风也要狠。为什么提“两个狠”呢？这是有针对性的。我举例说，有的党员贪图享

受，不干工作，官气冲天，脱离群众，思想作风问题严重，在整风时被人提意见提得抬不起头来，到了反右派，尾巴翘了起来，大喊："他妈的，你反党！"这怎么行呢？对个别党员提意见，不等于反党，不能扣"反党"的帽子。这个界线必须区别清楚，党内外干部、群众才能在转入着重整改阶段，敢于大胆向领导提出批评意见，把我们各级领导的作风整好。

10 月 31 日，在地、市委书记参加的省委第五次全委（扩大）会上，我又着重讲了整风问题。由于开展反右派斗争，在党员、干部中产生了一种错觉，误认为我们党整风是假的，反右派是真的。针对这个情况，我在讲话中重申中共中央 5 月 1 日《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代表省委表明决心，整风首先要整省委和省级机关，省委领导要带头"引火烧身"，烧掉我们自己身上的"三个主义"。再次强调：我们党号召整风是真心实意的。反击右派进攻，只是整风中的一个插曲，是为了扫清整风的障碍。有的党员干部特权自私，甚至腐化堕落，听说"反右派"就翘尾巴，自以为挂着块"永不退色的金字招牌"，是专门整别人的，这种人虽然为数不多，但反映出来的问题确实触目惊心。如果整人不整己，不痛下决心整掉坏作风，克服"三个主义"，我们党是很危险的。

在这次扩大的省委全委会上，我还代表省委提出了整改措施，主要是精简机构，下放干部。宣布省级机关减员 30～50%，企业减员 50%的精简方案。在整改中精简党政机关，这是周恩来总理提出的要求，是下了决心，动了真格的。首先是省级机关，通过撤、并，精简了重叠的机构，精干了领导班子。同时，对各级干部提出"又红又专"的要求，按照毛

主席、党中央关于“党政主要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指示精神，实行干部轮流下放劳动，有的下放基层工作，并派出一批部、厅级干部到地、县担任领导职务。这些举措，不仅加强了省以下各级党委和基层的领导力量，而且对于转变作风，密切联系群众，推动经济建设和其他各方面工作，都起了很好的作用。我认为，这是那次整风取得的重要收获。

整风、反右派持续到1957年秋冬。当年11月1日至12月12日，我们按照中央的部署，召开了江苏党的三届二次会议。正式会议8天，预备会议34天，省、地(市)、县、乡四级干部参加(亦称“四级干部会议”)。我在闭幕式上讲了话，基本精神仍然是不能因为反右派而放松了整风。我把这次省党代会概括为两个字，一个是“放”。预备会议开头，省委领导表明“引火烧身”的决心，号召大家帮助省委整风，要求“大胆地放、彻底地放、坚决地放”。再一个是“改”。省委下决心“大胆地改、彻底地改、坚决地改”，重点是紧缩机构，下放干部，深入实际，面向基层，切实克服“三个主义”，在全省掀起“两个高潮”，即全民整风的高潮与发展生产的高潮。会议通过“鸣”、“放”提意见，不仅对改进我们省委领导作风帮助很大，也使我们更深入地看到党内存在个人主义、本位主义，伸手要官要权等不正之风，必须坚决克服。但是，在这次党代会上，把有的同志批评“统购统销”高征购引起瞒产私分，农业合作化过急冒进引起减产；有的同志批评“群众生活苦，机关酒肉香”；以及批评有的地方在干部任用上存在“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宗派主义现象等意见，都作为“右派的反动言论”加以“重点批评”，还据此初步拟定43名

“右派分子”。实际上，这些同志提的纯粹是工作上的意见，丝毫不存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问题。这样对待他们，显然是错误的。

六　当时的严厉批评与30年后往事重提

江苏反右派的重点在省、市两级机关、民主党派、大专院校和科研单位，高潮是6月中下旬至9月份这三个月。按照当时的说法，一个是“春季形势”，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风细雨整风；一个是“夏季形势”，转为疾风暴雨的反右派斗争。

那么，对于我们江苏的反右派斗争，应怎样看待呢？1957年7月上旬，毛主席在南京找部分省、市委第一书记谈话时，曾严厉地批评了我。

毛主席问：“你们江苏省委书记、常委里头，有没有右派？为什么不反？”

我回答说：“主席啊！哪个人没有几句错话呢？您老人家说的嘛，十句话有九句讲对，就打90分；八句话讲对，就打80分……”

毛主席大概没料到我会这样回答，顿时生气起来。他拍着沙发边的茶几，说：“你到底反不反右派！”

我想：自己是省委第一书记，是省委一班人的班长，如果书记、常委内有“右派”，那我就是“头”。所以我秉公直言：

“要反右派可以，请您老人家下令把我调开，另外派人来。因为是我先‘右’嘛！您先撤了我，让别人来反。”

听我这么表态，毛主席倒消了气，说：“那好嘛，你就不要反嘛！”他还带着幽默的口吻说：“渭清啊！你是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

我回答说：“主席啊！我是舍得一身剐，要为您老人家护驾。”

我这样说，完全出于对毛主席的由衷崇敬。在同我个别谈话以后，毛主席在会上当着各省的第一书记说：“对中央的指示，你们不要一听就说这是中央的，就完全照办。正确的，你要执行；不正确的，你要过滤，打坝嘛！”

话虽如此，7月青岛会议结束以后，按照毛主席《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的精神，中央要求各地的反右派必须“继续扩展和深入”，彭真同志于8月来南京，坐镇指导江苏的反右派。他先同我个别谈话，说：“渭清同志，这次主席要我来打招呼，他说你‘右’。”我说：“主席说我‘右’，就不要和我个人打招呼。明天召开省委常委会，请你在会上当众宣布，向全体常委打招呼。”彭真同志说：“主席要我个别向你打招呼。”我说：“你要对大家讲，让常委都知道我‘右’，才好反我的‘右’。”彭真同志说：“好吧，那就开常委会。”

第二天上午，我召集省委常委会。彭真同志到会讲话，传达了毛主席派他来南京，向我个别打招呼的话。他在会上问：“江苏为什么不打右派？江苏有没有右派？”这是因为他当着全体常委的面，所以笼统讲“江苏”，实际意思是问我们省委领导班子内有没有右派，为什么不反？我当即回答说：

"有右派啊！不过我还没有发现。"

这两次谈话，一次是毛主席当面向我下达的指示，一次是他派彭真同志前来传话。我是按照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指示，都"打坝"了。所以，可否这样说：我们江苏反了右派，并且同样出现了"扩大化"错误；但就党内来说还没有因为反右而到过分"伤筋动骨"的地步。从省委常委起到地、市、县委这几级主要领导干部，都没有扣"右派"帽子，保护了下来。

事隔30年之后，1987年，彭真同志来南京，下榻金陵饭店，同我谈起往事。他说："渭清同志，我真佩服你。当时，毛主席威信有多高！他老人家说你'右'，要你反省委的'右派'，你却不怕扣'右'的帽子，还要我向全体省委常委打招呼。反右派这么大个运动，你们省、地、县几级主要领导干部，一个右派都没有打！"

我对彭真同志说："我们是按照党的传统，按照毛主席的一贯教导办事嘛！毛主席早就讲一切从实际出发，注重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毛主席还说过，要敢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嘛！"

我这样讲，决不是说我就正确。事实上，在整风、"反右派"过程中，我也说过不少错话。当时，在"左"的指导思想下，反右派斗争如泰山压顶，加上缺乏正确区别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经验，说"打坝"，也只能说顶住了一部分，全省还是划了13349名"右派分子"，约占全国所划"右派分子"总数的2.4%，从比例来看是比较低的。再从江苏人口来看，比例就更低了。但不管怎样，还是犯了扩大化的错误。

在省、地、县委几级主要领导干部里没有划“右派”，但对党内主要领导干部一点没有动作也过不了关。当时，省委常委研究，决定批评几位部、厅领导干部的所谓“右倾”言论。我曾同刘顺元同志商量，先向这些同志交个“底”，说明只是思想批判，不扣“右派”帽子，仍属于整风性质。尽管如此，还是伤害了一些同志。特别是把一些长期与共产党合作，或者在建国之后与共产党人共事的知名民主人士和高级知识分子打成“右派”，则更是错误的。虽然后来陆续摘了“帽子”，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彻底作了改正，但还是使这些同志长期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不仅给他们带来了不应有的痛苦，而且也给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带来了不应有的损失。对所有这些，我一直内疚在心。

第四章　“大跃进”年代(上)

一　贯彻“总路线”与发动“大跃进”

1958年,在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推动下,兴起了全国性的“大跃进”,先后持续三年之久,人们称之为大跃进时期。

总路线的提出和大跃进的发动不是偶然的,是政治上反右派扩大化,经济上急于求成的思想急剧发展的结果。当时,苏联曾提出要“15年赶上美国”,我们党就宣布要15年赶上或者超过英国。1957年9月至10月召开了党的八届三中全会,毛主席在会上严厉批评了1956年的“反冒进”。

在这种加快经济发展速度的国内外气候下,他认为,“反冒进”扫掉了“多快好省”,扫掉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还扫掉了“促进委员会”。接着,在1958年1月召开的南宁会议上,毛主席再次严厉批评“反冒进”是泄了六亿人民的气,离右派只有50米远了。他还认为,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而“反冒进”没有摆正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的关系,

是方针性的错误，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我们各省的同志在会上听了毛主席的讲话，都感到压力很重。这年3月，中共中央在成都召开了有中央各有关部门负责人和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主要议题仍是批判“反冒进”，并酝酿和讨论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毛主席在会上作了多次讲话。他说，1955年底，党中央曾向全国正式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要又多又快又好又省，但由于“反冒进”，把“多快好省”反掉了。他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有两条路线，一条是多、快、好、省，一条是少、慢、差、费；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干劲十足，轰轰烈烈，坚持群众路线；另一种是“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他在讲话中列举了古今中外的许多事例，说明创立新思想、新学派的都是学问不多的青年人，号召大家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要有“势如破竹，高屋建瓴”的气概，敢想、敢说、敢做。总路线就是在这个指导思想下提出的。

成都会议于3月8日开始，至3月26日结束。会上，中央将准备提交八大二次会议的“报告草稿”印发给到会同志讨论。我记得“报告草稿”第一页上，原有“我们今后的任务是要为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而奋斗”这句点示主题的话，经毛主席仔细斟酌后改定为“我们今后的任务，是要贯彻执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为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而奋斗”。这是首次对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完整表述。

为了做好八大二次会议的准备工作，4月上旬，毛主席

还在武昌东湖主持召开了汇报会议。到会的有六个大区的书记。那时,大区书记由省、市委第一书记担任,所以几个有关省、市的主要负责人都参加了汇报。

毛主席让我们各省的同志每人讲一天。头三天的程序是,吴芝圃(河南),曾希圣(安徽),周小舟(湖南)。第三天轮到周小舟。毛主席见他手里拿着个本子,发了脾气,说:“你事先作了准备,照着汇报稿念,我不听。”改让柯庆施汇报。毛主席见柯也是拿着事先准备的本子,脾气更大了。说:“柯大鼻子!你就吃饭、睡觉,自己不调查研究,光凭工作组汇报,再叫秘书写好了稿子念,这样的汇报,我不要听。会不开了。”

休会一天。当晚,毛主席把大家召集起来,研究继续汇报,说:“江渭清,你打算怎么汇报,题目是什么?”我当即回答,我们江苏传达了成都会议精神以后,各级干部按照主席的指示,多快好省、势如破竹,所以我的汇报题目就叫“政治挂帅,以生产为中心,带动各项工作一道前进”。毛主席一听来了精神,说:“渭清同志,你这个汇报题目好。吴芝圃、曾希圣他们的汇报,就是政治不挂帅嘛!明天就你来讲。”

因为晚上谈得比较迟,第二天上午,我讲了个把钟头,毛主席看表,说:“吃中饭吧,下午继续讲。”下午,毛主席一边听我汇报,一边插话。当我讲到江苏今冬明春水利建设准备搞3亿方时,他插话说:吴芝圃讲搞300亿方,我看得死3万人;曾希圣讲搞200亿方,我看得死2万人;渭清讲3亿方,可以一个人不死。他们那是虚夸。我讲到5点多钟,毛主席越听兴致越高,光插话就有两个来钟点。他看着手

表，问柯庆施："快吃晚饭了，你看晚上干什么好？"柯答："王任重是东道主，请他安排吧！"毛主席说："晚上干什么大家讲！"我接话："先找个好馆子，请王任重同志招待大家吃顿湖南菜，晚上再搞点娱乐活动，看个什么节目。"毛主席说："我看就照渭清的决定办。"

晚饭吃得很高兴，曾希圣当着我对吴芝圃、周小舟、王任重他们说："'圣旨'夸赞江渭清讲得好，害得我们都挨了骂！"

这也算是"大跃进"开头的一段小插曲吧！

5月上旬，在北京举行了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毛主席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毛主席在大会上多次阐述了"多快好省"的总路线精神，提出了反对"右倾保守"的口号，批评了对高指标持有异议的同志。他说，从中央到地方，都有一部分"观潮派"、"秋后算帐派"，要大家辨风向，插红旗，拔白旗。根据毛主席亲自主持的武汉汇报会议的精神，我在八届二次会议上，代表江苏省委，作了题为《政治挂帅，以生产为中心，带动各项工作一道前进》的发言，着重介绍了江苏的"跃进"形势，说全省广大干部、群众已树立起"要跳、敢跳、能跳"的跃进思想，以"苦干、实干、创造性地干"的精神，掀起了"大跃进"的热潮。并列举了当时的一些豪言壮语，诸如"政治挂了帅，生产飞上天"；"干部能下海，我们能擒龙"；还有一些新编的顺口溜："志气比天高，干劲冲云霄；舀干大海水，切断荒山腰；就用这股劲，实现四十条"等，借以说明江苏人民蓬勃旺盛的革命意志，势如破

竹的豪迈气概，敢作敢为的大无畏精神，正转化为伟大的物质力量，日新月异地改变着全省的经济面貌。省委决心带领全省人民，苦干三年，基本改变江苏面貌。苦干五年或者稍多一点时间，全面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所规定的各项指标；地方工业产值在1957年的基础上增加3～4倍；文化教育等方面，也都提出了“大跃进”的奋斗目标。

党的八届二次会议于5月23日闭幕，省委《关于学习和宣传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报告和决议的通知》，在5月8日就发出了，这也说明当时那种只争朝夕、热火朝天的“跃进”劲头。“通知”要求在全省范围内大张旗鼓地开展学习和宣传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运动。党的八届二次会议一闭幕，我立即返回南京，经半月筹备，6月9日，省委三届八次全会(扩大)在南京正式召开。我在会上作了《关于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问题的传达报告》，着重传达了八大二次会议上毛主席的讲话和刘少奇同志的报告精神，讲了建国头八年的建设经验，和最近三年(1956～1958年)“跃进——保守——大跃进”的“马鞍型”的教训，批判了“右倾保守”，鼓励先进更先进，后进赶先进。我在报告中还具体讲了跃进规划，复述了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提出的江苏的各项跃进指标，特别是农业方面，要力争三年之内(1960年)提前实现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的各项主要指标，争取成为粮食单产800斤的省。要按照工业与农业同时并举、大型企业与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的方针，实行全党办工业、全民办工业，“政治挂帅，积极平衡，群众路线，自力更生”发展地方工业，以更好地适应农业发展的需要。科学文教事业也要有个“大跃

进”。不仅成立省的科学分院、专区(市)的科学研究所，还要做到县县有科学研究所，乡乡有科学研究站，打破科学研究的神秘化，由党委书记任所长、站长，加强党对科学事业的领导。同时要根据生产建设的需要，发展大中专教育，规划五年内兴办各种大学300～500所，三五年内普及初中教育，一年或多一点时间扫除文盲，两三年内基本实现“四无”(无蚊、蝇、鼠、雀)和消灭血吸虫病。当时，代表们称省委三届八次全会(扩大)有“三大破”：一是大破了农业生产不能高速度发展的迷信，肯定了农业可以“一翻再翻”；二是大破了办工业的神秘观念，地方工业可以自力更生大发展；三是大破了对科学技术和科学家、技术人员的迷信，地方也可以大办科学研究和高等教育事业。

在总路线的宣传和贯彻中提出这些目标和口号，显然片面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必然导致“大跃进”一再升温，指标层层加码。这样徒有革命热情而缺乏科学态度，既违背了客观经济规律，也丢掉了毛泽东同志一贯倡导和我们党长期坚持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调查研究的优良作风和工作方法，其结果只能是欲速不达，事与愿违。

二　狂热的“大炼钢铁”

组织和发动“大跃进”，虽然是从农业开始的，但“大跃进”发动以后，“一马当先”的则是所谓“大炼钢铁”。

为了在五六年以至两三年的短暂时间内，实现原定15年钢产量赶上或超过英国的奋斗目标，1958年8月，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发表了会议公报，“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用最大的努力，为在1958年生产1070万吨钢，即比1957年产量535万吨增加一倍而奋斗。”会议还通过了《关于1959年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决定》，明确规定1959年生产钢2700万吨，争取3000万吨；1960年生产钢5000万吨左右；1962年钢产量达到8000万吨到1亿吨。按照这次会议的要求，江苏同全国一样，一场从入夏以后就开始的全党动手，全民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更加热火朝天地展开了。

我在参加北戴河会议期间，于8月20日专门就大炼钢铁问题同省委通了电话，提出了三点意见，要求各地、市委立即认真研究，坚决贯彻执行：一是要把今年全省15万吨钢的任务，按18～20万吨的要求来保证完成，只准超过，一斤也不能减少。二是今年只剩下四个月了，各级领导决不能向困难低头，炼钢所需要的煤、焦，要及时加以解决。三是各地、市委第一书记，有钢铁生产任务的县委第一书记，都要亲自抓钢铁生产，农业由其他书记或常委去抓。这就是所谓“钢铁元帅升帐”。

北戴河会议结束，我赶回南京，贯彻会议精神，进一步部署钢铁工作。当时，钢铁生产进展缓慢，连续几个月都没有完成预定任务。我心里十分着急，在9月2日召开的市委书记电话会议上强调，9月份一定要超额完成计划，保证全月完成5.5万到6万吨生铁和2万吨钢的生产任务。

当时形势逼人。全国已有6个省日产生铁1000吨以上，其中湖南达到3000吨，河南达到1.8万吨，而江苏日产生铁才910吨多一点。中央决定在9月23日召开全国大炼钢铁电话会议。我急得没有办法，抢先召开地、市委书记电话会议，要求全省力争在9月22日突破日产生铁3000吨，29日放出个“大卫星”。什么叫“大卫星”呢？当时，日产生铁突破5000吨是“小卫星”，8000吨是“中卫星”，如果在国庆节那一天宣布江苏日产生铁突破1万吨，这就是“大卫星”。

对于“大炼钢铁”中大放“卫星”，任务一天比一天加码，指标像天文数字一样翻了又翻，我和省委的其他领导同志思想上是不赞成的，但又不好公开反对。记得这年9月20日，毛主席在张治中、罗瑞卿、曾希圣陪同下来南京视察“大跃进”形势，我来到中山陵他下榻的地方汇报工作。毛主席在听取汇报以后，指示我们要一手抓工业，一手抓农业，提醒我们不要因为大办工业，放松了农业。同时，他又提出要江苏搞100万吨铁，问我能不能完成？我说搞不到这么多。事实上，群众性“大炼钢铁”效率低，质量差，人力、物力的浪费从一开始就十分明显。所以我又说，像这样全民炼钢铁，说句不好听的话，叫“劳民伤财”。毛主席听我这么回答，就说：“不谈了，明天再谈。”

第二天，毛主席把我们省委书记处的几位同志都找去，说：“我要江苏搞100万吨铁，渭清讲搞不到。顺元，你什么意见？”刘顺元同志愣了一下，回答说：“渭清同志是班长，班长怎么说，我赞成。”毛主席就问：“惠浴宇，你什么意见？”惠浴宇回答：“我同意顺元同志的意见。”毛主席又说：“江渭清

不但说搞不到100万吨铁，还说这是劳民伤财，你们也同意吗？”见大家都不开口，他老人家就问我：“渭清，你还有什么意见？”我说：“主席，我们千方百计去搞，能搞100万吨更好，实在搞不到，就请您派人来检查我的工作。”毛主席说：“好，就这么办。”

我觉得，向毛主席、党中央讲真话，讲确实存在的困难，这是应有的责任，但“大炼钢铁”是当时全党的大局。我这个第一书记不抓不行。为了争取建国九周年到来之际，放出日产万吨生铁的“大卫星”，全省各级党组织和政府机关都动员起来了，成千上万的干部带领群众日夜奋战，砍树挖煤，找矿炼铁，连铁门铁栏杆都拆下来炼铁了，美其名曰“找米下锅”。在所谓“小土群”齐上阵的口号下，堆起了数不清的小土高炉、小土焦炉，到处浓烟滚滚，火光冲天。《新华日报》有个报导：9月30日“3万座土洋高炉烈火漫天，400万钢铁大军激战炉前”。据统计，当时全省一度动员了将近700万人炼钢铁，不仅有整劳力，而且有半劳力和未成年的孩子。国庆前夕，终于放出了日产生铁10073吨、烧结铁4000多吨的“高产卫星”，成为全国九个“万吨省”之一。

如此不惜代价地“大炼钢铁”，浪费了大量的人力、财力和物力。我们曾算了一笔帐，1958年“大炼钢铁”中，全省高炉利用系数平均只有0.5左右，炼一吨铁需耗煤五六吨至七八吨，炼出的铁许多不合格，钢大部分是土钢，根本不能用。所建上万座小高炉，只有个别的保留下来。直接经济损失更是惊人。全省土法炼钢炼铁共计亏损14109.6万元，省里补助9000万元，其余部分均由各地从地方财政中抽钱填

补。

实践证明，“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确实劳民伤财，得不偿失。所谓钢铁“一马当先”，各行各业“万马奔腾”，完全是一种主观主义的狂热。经过这样的折腾，不但没有实现经济建设的高速度发展，反而导致以后多年工业生产连续下降。全国如此，江苏也不例外。据1961年一份《关于1961～1962年计划汇报提纲》所载，这一年“全省工业总产值，1～8月完成43亿元，为原定年度计划100亿元的43%，比上年同期减少48%。”由此可见，经济建设所受的损失，是多么严重！

三 推行“公社化”运动

在“大炼钢铁”的同时，掀起了“大办人民公社”的运动。于是，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被称之为“三面红旗”。

如前所述，“大跃进”是从农业开始发动的。1957年底，中央正式颁布《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即“四十条”），并作出《关于在今冬明春开展大规模兴修农田水利和积肥运动的决定》，揭开了农业“大跃进”的序幕。就江苏的情况来说，到1958年4月，经过一个冬春的奋战，全省兴修水利、积肥造肥、改良土壤等方面，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跃进”形势。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以后，更加强调“速度是总路线的灵魂”，“多快好省”的关键是“多快”。所谓“思想解放”一

放再放,“破除迷信”一破再破,“大跃进”的口号随之越喊越“大”。全国各地报导1958年夏熟丰收,小麦亩产从几千斤跃至几万斤,“卫星”越“放”越离奇。江苏起初虽还比较冷静,终于也挡不住这股浮夸风。各地竞相攀比,产量指标越到下面越高。7月中旬,在省委召开的地、市、县委书记会议上,苏州地区一些县、社干部提出:“思想解放到哪里,产量就增加到那里”;“思想解放到2000斤,就有2000斤的干劲和措施;思想解放到1万斤,就有1万斤的干劲和措施。”镇江地区提出水稻亩产“消灭3000斤,保证5000斤,力争1万斤”。就连素以低产著称的淮阴地区也提出了秋粮亩产7000斤,力争9000斤,平均每人有粮1万斤的“跃进指标”。面对这样一股浮夸风中出现的高指标,7月21日,我在地、市、县委书记会议结束时的总结讲话中,除提出1958年全省粮食产量至少争取翻一番以外,还要求棉花、油料、蚕桑、水产、养猪等等,都要“立大志,鼓大劲,争冠军,放卫星”。

9月上旬,省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传达贯彻北戴河会议精神。会上,许多同志认为,按照中央提出1959年全国粮食达到8000亿斤到10000亿斤,皮棉产量达到9000万担到1亿担的指标,1958年江苏的粮食产量不是翻一番的问题,最低应达到760亿斤。会后,省委作了研究,将各地的“跃进指标”适当压低,在向中央报告中提出,600亿斤有把握,650亿到700亿斤有可能。如以600亿斤计算,则比1957年的248亿斤增产一倍半;如以700亿斤计算,则比1957年增产近两倍。对棉花生产,各地提出要翻两番或更

多些，即1957年全省皮棉总产量为400万担，1958年将达到1300万担，增加两倍以上。我们向中央报告，800万担有把握，1000万担有可能。此外，会议估算油料产量也将翻一番以上。后来的实践证明，这种单凭主观愿望和盲目热情提出的高指标，是完全脱离客观实际的。

就在全国各地已经刮起浮夸风的当口，北戴河会议作出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掀起了大办“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工农商学兵相互结合的人民公社”运动。当时，人们被“大跃进”的假象所陶醉，认为“共产主义就在眼前”，“人民公社是通向共产主义天堂的金桥”。按照“决议”的说法，“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的事情了，我们应该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为了贯彻北戴河会议“决议”，推进“公社化”运动，9月8日，中共江苏省委农村工作部召开地委合作部长会议，总结了前段时间，已在全省许多地区进行的公社试点经验，作出了进一步发展人民公社的初步规划。据统计，1957年底，全省共有农业社34367个，每社平均260户。经过冬春整社合并，1958年8月初，规划合并为9000～10000个社，每社平均1000户左右，其中有统一经营、统一核算的大社，也有统一领导、各负盈亏的联社。这次会议根据中央的决定精神，要求在全省建社1500个左右，每社平均5000～6000户。到9月底，全省即宣布农村实现人民公社化，建立了1490个人民公社，参加公社的有960万个农户，占农户总数的94%以上，还有市镇居民、工商业者和自由职业者约32万户。基本上是一乡

一社,每社平均6751户,相当于高级社平均户数的24倍;其中最小的约1000户,大的如盐城专区的一个公社达13820户,扬中县5万多户组成一个联社。同时,一些城市也办起人民公社,有的甚至宣布全市就是一个“大公社”。

在推行“公社化”的过程中,“五风”即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命令风、特殊化风愈刮愈烈。“五风”的核心是“共产风”。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局第一书记柯庆施提出了“吃饭不要钱”和“放开肚皮吃饭”的口号。我觉得,这样的口号明显过头了,尽管在“大跃进”,还没有这个物质基础嘛!所以,当中央分管农村工作的谭震林同志来南京视察工作时,我向他说:“谭政委,光放开肚皮吃饭,不搞生产也不行,还要加一句:鼓足干劲生产。”谭老板采纳了我的意见。后来的“放开肚皮吃饭,鼓足干劲生产”,就是他视察江苏“大跃进”以后提出来的。所谓“放开肚皮吃饭”,集中地反映了当时严重的“共产风”。在这股歪风中,有的提出“人民公社应当有计划有步骤地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剩余”,实行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和共产主义的“各取所需”相结合的原则进行分配,将社员自留地和私有林木、耕畜、大中型农具等统统收归公社所有,还提出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全省组成132个“民兵师”。在“生活集体化”的口号下,全省各地大办公社食堂,农村绝大多数人都到食堂吃饭。至于伴随浮夸风而来的生产瞎指挥风,更是愈演愈烈。有的地方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的口号下,盲目蛮干到了离奇的程度,如“农田深耕”从几尺到一两丈,“试验田”以白糖作肥料“夺

高产”；密植“越密越好”发展到几亩水稻移并在一起，以“并苗移栽”制造假“卫星”等等。

应当说，以北戴河会议为标志，全国范围内一哄而起的“大跃进”、“公社化”、“大炼钢铁”的高潮，完全违背了客观经济规律，极大地破坏了社会生产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大跃进”是一场“大灾难”，是并不过分的。

四 纠“左”煞“五风”

对“大跃进”和“公社化”中出现的这些严重情况和问题，理所当然地引起了全党同志，首先是毛主席、党中央的高度重视，从1958年11月上旬第一次郑州会议开始，多方面采取措施，着手纠正那些“左”的做法和严重的“五风”错误。

在党中央召开的这次会议上，毛主席多次发表讲话。他在肯定“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前提下，着重讲了“公社化”运动中发生的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错误。他首先指出：现在的人民公社，仍然是集体所有制，不等于全民所有制。将来达到全民所有制了，也不等于就是实现了共产主义。要求各级领导，必须划清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两种界限。其次，他阐述了社会主义时期必须发展商品经济，批评了废除商品生产、实行产品调拨而剥夺农民的错误做法。第三，针对各地“大跃进”、“大

炼钢铁”中所谓“白天一片人，晚上一片灯”；“挑灯夜战，日夜苦干”之类不顾群众生活的错误做法，要求各地实行“劳逸结合”，贯彻“既抓生产，又抓生活”的方针。会议期间，毛主席还给县以上各级党委委员写了一封《关于读书的建议》的信，要求认真阅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这两本书，并建议广大干部读一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我和参加这次会议的同志感到，毛主席的讲话和信，对于正处在发热中的各级领导，确实是一副“清凉剂”。

11月21日至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武昌召开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参加的扩大会议，主要是讨论人民公社和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问题。毛主席在会议讲话中说，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还是时间长一点好。“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学真理也破了。不要弄虚作假，虚报成绩，争虚荣。要老老实实，保持清醒的头脑，压缩空气，把根据不足的高指标降下来。

会上，各省都汇报了情况，只有两个省的负责人未汇报，一个是我，再一个是湖南的周小舟。各省都讲每亩粮食可以搞几千斤，甚至几万斤。毛主席作结论，对全国粮、棉产量继续“跃进”，仍然讲得很有劲。我曾几次站起来，要提意见。柯庆施几次把我拉下去，不让讲。毛主席见状，发话说：“柯老，你拉他干什么？江渭清同志还没有汇报，他有意见，可以让他当众讲嘛！”

听毛主席这么说，我鼓起了勇气，从座位上站起来，把

憋在心里的话讲出来。我以检讨的口吻说："主席，这半年多来，我犯了两个错误。一个是高指标，一个是浮夸风。"并讲了按照北戴河会议上中央提出的粮食、棉花计划指标，省委上报中央的更加夸大了的粮、棉产量。我说，省委上报中央粮食产量550亿斤，实际只有400亿斤。毛主席说，少150亿斤啊？我说，据这样浮夸的产量来订计划指标，从实际情况看，是不可能达到的，都要打几个折扣。

我又检讨了"大跃进"、"公社化"高潮中提出的一些不切实际的口号，譬如"放开肚皮吃饭，鼓足干劲生产"。我说，当时到处讲高产，以为粮食多得吃不了。实际上许多地方不放开肚皮，粮食还不够吃！毛主席插话说，"鼓足干劲生产"是对的，"放开肚皮吃饭"提早了，过二三十年以后再讲。

这时，周小舟同志也站了起来，对毛主席说：我也犯了江渭清同志所谈的同样错误。高指标，浮夸风，还有干部强迫命令，向下压任务，瞎指挥。

毛主席听了我和周小舟同志讲的这些情况，就对刘少奇、陈云同志说，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怎么修订，恐怕要重新研究，再听一下大家的意见，然后提交各地同志讨论。刘少奇、陈云同志赞成。

针对高指标、浮夸风的问题，毛主席还问，湖北"水稻亩产三万斤"，到底有没有？我插上去说，有！不过不是亩产。我汇报了江苏的情况。我和刘顺元同志等省委几个负责人分头下去查看，发现搞什么"并苗"，把十几亩已经成熟的水稻移到一亩地里，所谓几万斤的"高产卫星"，都是这样做假造出来的。毛主席听了说，有错误，就像江渭清那样自己作

检讨。错了改正就是了。大家把头抬起来，不要“如丧考妣”嘛！

几十年后重提这些事情，是为着说明：我所以在毛主席面前敢讲真话，因为我是来干革命的，不是来当“官”的。我们共产党人办事，一切都要有利于人民，为群众着想。关键时刻如果不向中央讲老实话，就是对党对人民不负责任。

会议停了一天，让各省重新估计产量。接着，正式召开中共八届六中全会。毛主席主持会议并作了重要讲话。邓小平同志作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的说明，李富春同志作了《关于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决议》的说明。经过讨论，会议通过了这两个重要文件。关于人民公社，会议明确在今后一个历史时期内，仍应保留按劳分配制度；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必须有一个很大的发展；不能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勉强进入共产主义。还规定社员个人所有的房屋、衣被、家具等生活资料和存款，仍归社员所有，社员可以保留宅旁的零星树木、小农具、小家畜和家禽等，也可以继续经营一些家庭小副业。

关于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会议强调必须注意按比例发展的客观规律，把冲天干劲和科学精神结合起来，既要继续反对保守，破除迷信，提倡敢想敢说敢做，又要压缩空气、反对浮夸。根据毛主席关于“压缩空气”的多次讲话和指示，会议对8月北戴河会议提出的钢、煤、粮、棉四大指标，进行了重大调整，但比1958年已经夸大了的产量估计数，仍提高40～50%，以四大指标为中心的“大跃进”仍在继续，农业生产中的浮夸风、瞎指挥风，也就难以彻底有效地纠正。

党的八届六中全会以后，我多次主持召开省委常委扩大会议和其他会议，传达贯彻毛主席的一系列讲话和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及经济计划的两个决议精神，对经济建设上“压缩空气”，人民公社煞住“五风”，做了许多工作。在12月中旬召开的地、市委书记会议上，除研究调整全省经济计划指标以外，我着重讲了整社问题。要求各地经过试点，取得经验，逐步推开，以四个月左右的时间，解决人民公社的突出问题，首先是要保证寒冬腊月不出问题，最低限度不饿死人，不出大乱子。由于推行“公社化”过程中搞“一平二调”和其他许多“左”的做法，干部与群众的矛盾十分突出，要求各地通过整社，切实改进干部作风，纠正强迫命令、瞎指挥，改善干群关系；同时要把整社与抓生产、生活紧密结合起来，搞好年终分配；安排好群众口粮，既要鼓足干劲生产，又要让群众吃好、睡好，安度冬春。

为了进一步贯彻“压缩空气”的方针，党中央于1959年4月2日至5日，在上海召开党的八届七中全会。全会讨论了调整1959年钢、煤、粮、棉四大指标，总的调子仍然是保持高速度、“大跃进”。5月，在陈云同志主持下，中央财经小组经过反复平衡，才将1959年钢的计划指标由1650万吨压到1300万吨；7月，又将1959年粮食计划指标由5500亿斤压到5000亿斤。按照中央精神，省委对1959年全省经济计划指标也作了几次调整，最后确定生铁由65万吨减为50万吨，钢由30万吨减至9.19万吨；粮食总产调整为320～340亿斤，比1958年增长10～17%；棉花调整为480～500万担，比1958年增长3～10%。实际上，这样的指标在

当时仍然是偏高的。

第五章 “大跃进”年代（下）

五 庐山会议与“反右倾”运动

就在我们“压缩空气”，调整经济指标之际，中共中央在中外闻名的庐山，相继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

会议除审议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调整钢、煤、粮、棉等主要指标以外，原定的议题主要是总结1958年以来贯彻“总路线”，发动“大跃进”、“公社化”的经验教训，以便继续纠正“左”的错误，使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进一步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毛主席在会议开始时，概括国内形势是：“成绩很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他提出18个问题，主要是关于当前形势、今后任务以及一些具体政策，请到会同志讨论和研究解决的办法。

庐山会议于1959年7月2日开始，至8月16日结束，先后开了一个半月。头半个月，气氛是轻松愉快的。我们参加会议的绝大多数同志，感到盛暑炎夏，来此聚会，既暂时

摆脱了繁忙的日常事务，放松一下身心；又在毛主席直接主持下，畅谈“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总结我们工作中的成败得失。每天除了开会，就是会同老战友、老领导观赏风景，叙旧谈心，大家称之为“神仙会”，心情十分舒畅。当时，谁都没有想到会上突然爆发“重大路线斗争”，导致会议主题从纠“左”转为反“右”，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

关于庐山会议从纠“左”转为批判鼓德怀、发动“反右倾”的经过情况，国内外已经发表和出版了许多文章、著作，真真假假，其中有的是参加过会议、亲身经历了那场斗争的当事者写的，而胡编乱造的也不少。庐山会议结束以后，中共江苏省委于8月30日召开三届十次全会(扩大)，我在会上对庐山会议的大致经过作了传达。现按照当时的“传达提纲”，将有关部分原文转录如下：

> 庐山会议从7月3日至8月1日是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8月2日至16日是八届八中全会。这两个会议都是在毛泽东同志亲自主持下进行的，毛主席在会上作了多次重要讲话。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的，除中央负责同志外，有中央有关部门的部长和全国各省、市委的第一书记。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又分为两段。第一阶段是7月3日至16日，我们当时称这几天是“神仙会议”。会议对毛主席提出的18个问题分组进行了讨论，原来准备把讨论的18个问题写成一个《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纪要》。会议原定在15日结束，但在讨论过程中，对于大跃进的成绩和缺点的估计上，实质

上是对总路线、对人民公社、对大跃进一开始就有了意见分歧，发生了若干争论，毛泽东同志早就看出了这一点，所以在18个题目外增加了一个团结问题。

我在“传达提纲”里还讲述了会议是怎样从纠“左”转为“反右倾”的：

当时，毛泽东同志指示，大家也有这样的意见，不管什么话都可以讲。毛泽东同志说，人生了个嘴巴，有两个作用，一曰吃饭，二曰讲话，有话就讲，有什么压力？7月14日，也就是原拟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前一天，彭德怀同志发出了他写给毛主席的一封信。16日，毛泽东同志以《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为题，指示印发到会同志。原来按地区分组的，这时就不分地区重新编成小组讨论，会议进入第二阶段。18日，黄克诚同志上山，19日在小组会上发言。21日，张闻天同志作了长达一个下午的长篇发言，周小舟同志也积极响应。他们都赞同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并在许多方面作了进一步发挥。于是，会议展开了大是大非的争论。23日，毛泽东同志作重要讲话，明确指出，争论的性质是两条路线问题，“右倾机会主义”是当前的主要危险。毛泽东同志紧接着又发出了对彭德怀同志一封信的评论。会议展开了对以彭德怀同志为首，包括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同志在内的“反党集团”的揭发和批判。8月2日开始，举行

八届八中全会。毛泽东同志对会议的任务、开法作了指示。全会进行了十天小组讨论和四天大会发言,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对“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反党集团”进行系统的揭发和批判。最后,议定了会议的公报,作出了《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和《关于撤销黄克诚同志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决定》。

以上是我当时作的传达。今天来看,庐山会议发生的批判彭德怀同志,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是完全错误的。开始讨论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时,我和李先念、王任重同志,还有胡乔木、田家英等几位“秀才”,都不赞成“反右倾”。当会议进行重新编组时,几位“秀才”被派到各组去当“观察员”,我被分到东北组,参加讨论。在会议对彭、黄、张、周展开激烈的批判时,我在小组发言中虽然也作过某些违心的“批判”,但思想上是有保留的。我见张闻天同志思想包袱很重,情绪低沉,曾找他谈心,说:“闻天同志,你愁眉苦脸干什么?如果错了,就承认;对的,就坚持。有什么想不通的,还可以找主席谈嘛!”我还讲了不少自己的看法。张闻天同志去世以后,在他秘书写的一篇回忆文章中,还提到了在庐山的这段经历。说在当时那种政治压力下,就连他的秘书也只好违心地参加批判。只有江渭清敢找张闻天同志谈心,谈过以后,他的情绪好多了。

多少年过去了,我和许多曾经参加庐山会议的同志对

于毛主席亲自发动的这场错误批判和作出的错误决定，至今仍感十分痛心。大家知道，彭德怀同志对党对人民无比忠诚，为人耿直，性格豪爽。他在党的会议上发表意见，向党的主席写信，这本来是完全正常的，信如其人，有啥说啥，即使提意见的方式有什么不当，内容间或有过头之处，也不能说是有计划、有组织地“反党”。会上，彭德怀同志并没有全盘否定“大跃进”的成绩，主要是对浮夸风、瞎指挥风提出意见，这是对的。他信中说，我们炮击金门，处理军事问题得心应手，搞社会主义建设没有经验，“大炼钢铁”是“得不偿失”，“大跃进”表现了“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等等，实际上这是党内外多数人皆有同感的。但是，毛主席坚持他提出总路线，发动“大跃进”的初衷，认为彭德怀同志的意见，表现了“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是“右倾性质”的问题，我们党正处在党内党外“右派”的夹击之中。他还认为，庐山出现的这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因此，不仅要求全党同志“硬着头皮顶住”，不要动摇，而且把“右倾”上升为主要危险，把彭德怀等同志说成是“反党集团”，从而引导批判不断升级，在会议公报和决议中，把对彭德怀等同志的“批判”，说成是“粉碎了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反对党的总路线、反对大跃进、反对人民公社的猖狂进攻”，是“在历史的紧要关头，保卫了党的总路线，保卫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领导，保卫了党的团结，保卫了党和人民的社会主义事业”，是使我们党“避免了两大祸害”，即避免了“党的大分裂”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大马鞍型”。这

样，经过庐山会议，就完全中断了正在着手的纠“左”步骤，使全党工作的指导思想转入了“反右倾”的更大误区，实际上等于为“左”的一套错误火上加油。由此不同意见很难发表，党内的正常民主生活遭受严重破坏，直到发展为“文化大革命”这样惨重的极“左”灾难。

六　“继续跃进”后果更为严重

还在庐山会议期间，中共江苏省委就根据中央的“反右倾”精神，对工农业生产和其他各项工作的“继续跃进”，作了具体部署。

8月2日，即八届八中全会开始的当天，我向省委电话传达毛主席关于反右倾、鼓干劲的讲话精神。省委迅即召开常委会进行讨论，并由常委分赴各地传达毛主席指示，要求狠抓当前工作，大干8、9两个月。

8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克服右倾情绪，厉行增产节约》的社论。省委据以召开电话会议，要求各级领导正确分析和认清形势，批判和克服右倾松劲情绪，掀起群众性的生产高潮。

8月8日，中央发出《关于反对右倾思想的指示》。省委于10日至12日召开有地、市委书记参加的常委扩大会议，组织学习讨论，研究落实的措施。

8月16日，庐山会议结束。由于会议后期的紧张气氛，

加之途中奔波，我赶回南京，就病倒了。待身体稍有恢复，即召开省委三届十次全体会议(扩大)。我在会上除了传达庐山会议的大致经过以外，还传达了毛主席的一系列讲话、指示和八届八中全会的公报、决议及其他有关文件精神。然后，按照庐山会议对所谓“彭德怀反党集团”的批判精神，联系我们自己的工作和思想实际，围绕着“世界观”、“两条路线斗争”和“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的态度”等问题进行对照检查，以提高对“反右倾”的认识。

反“右”势必出“左”，使本来已很膨胀的“左”的空气更加膨胀了。会议期间，我签发了省委报毛主席、党中央和上海局的几份简报。在反映宣传贯彻八届八中全会精神的简报中写道：

> 8月26日晚八中全会公报和增产节约决议公布以后，全省各地广大群众纷纷举行集会、游行，送喜报、表决心，人心沸腾，情绪高涨。工人称赞：“这个公报是团结的公报，鼓劲的公报，战斗的公报，振奋人心的公报，继续跃进的公报。”公社社员反映：“看了公报、决议有四喜：‘一喜工农业生产大跃进，二喜五年计划两年完成，三喜超过英国缩短五年，四喜四十条纲要提前实现。’”公报和决议，鼓舞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劳动积极性，有力地推动了当前工农业生产。目前，全省范围内增产节约的新高潮已全面掀起。在工业生产方面，计划和措施纷纷加强，生产节节上升。以南京市为例，8月份1～25日的工业总产值比上月同期增

长11.8%。从全省来说,6、7两个月以来生产逐月下降的情况完全改变过来了,一股松劲、泄气的乌云消散了。在农村,人民公社普遍开展了超定额、超包产运动,广大群众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

在9月11日的简报中,提出要在当前农村“继续大跃进”的大好形势下,全省粮棉产量在1958年的基础上再增产一成到二成。其中,粮食尽一切努力达到320亿斤,争取340亿斤,比上年增产10～17%;棉花达到480万担,争取500万担,比上年增产3～10%。油料、蚕茧、茶叶、果品、生猪等也要有所增长,争取农副业全面跃进。

在9月16日的简报中,列举了工业生产和其他工作中“右倾思想”的具体表现。例如,有的地方强调计划落实,不敢提高速度,指标越搞越低,余地越留越大,甚至到了“吃饭指标”、“睡觉指标”的地步;有的地方“大跃进”中倡导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不再动用,现场会议少了,竞赛从“公开赛”转到“秘密赛”;有的地方因反对浮夸风、形式主义,“红旗”不插,“擂台”不摆了,生产不是热气腾腾,而是冷冷清清。简报中还批评了一些干部思想上四平八稳,对“大跃进”中局部的缺点、错误,分不清主流与非主流,等等。这就在实际上把开始着手的纠“左”统统当作“右倾”表现而加以批判了。

省委三届十次全会(扩大)从8月30日开始,至9月18日结束,先后开了20天。我作了闭幕讲话,强调总路线不能动摇,“以钢为纲,全面跃进”的方针必须坚持。会议贯彻“反右倾”精神,研究确定了1960年至1962年三年的全

省经济规划，提出争取提前五年实现农业发展纲要指标。到1962年，粮、棉、油产量力争在1957年基础上增长一倍以上，农业总产值达到80亿元到120亿元。工业方面，要求1962年生铁100万吨到120万吨，钢30万吨至50万吨，原煤1300万吨至1400万吨，工业总产180亿元，即比1959年翻一番。重申1958年提出的"政治挂帅，以生产为中心，带动各项工作一道前进"的口号，要求反右倾，鼓干劲，全党要以保卫党的总路线作为一切工作的纲，大力宣传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优越性。

这里还应提到的是，庐山会议结束前，毛主席曾就如何贯彻"反右倾"的问题，征求各省、市负责同志意见。我在会上回答说：回去以后，我们从江苏实际情况出发，有右反右，有左反左，有什么反什么，有多少反多少。毛主席表示赞成，说，就照你们的具体情况办。

在贯彻庐山会议精神的过程中，中央曾于1959年11月27日转发《关于划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标准和处理办法》。当时，省委常务书记是刘顺元同志。刘顺元同志为人正派，严于律已，理论修养很深，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他对社会主义改造是积极拥护的，对社会主义建设也是充满热情的。后来，他感到从合作化，到总路线、大跃进、公社化，工作中的问题越来越多，风气越来越坏，很有意见，曾经公开批评过"三六九干部"、"风马牛干部"。"三六九干部"是指不干实事，只会在嘴上卖弄"三面红旗"、"六亿人民"、"九个指头"，以势压人的干部；"风马牛干部"是指见风使舵、吹牛拍马的干部。这些话传到了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那里。柯

庆施在庐山会议结束时，曾向我提出要批评刘顺元同志，暗示他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我作了解释，说要看通篇文章、报告讲的是什么，不能凭一句两句话就说有什么问题。如果省委常委里有人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要批先批我，我是班长嘛！我不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他怎么会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呢？就这样应付过去了。当年秋天，毛主席乘坐专列路过南京，在列车上召见我和省委其他负责人，并询问了“反右倾”情况。我向他老人家汇报说：我们有“右倾”思想，但没有“分子”。譬如对1958年放农业”高产卫星”、“钢铁卫星”，我和其他常委同志都说过那是“吹牛”，但不是否定总路线、大跃进，而是反对浮夸虚假。这样，从我们省委到由省委管理的各地、市、县委的主要领导人，都没有划“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但不归省委管理的基层党员干部，被划作“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还是有的。全省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帽子的党员、干部等254人，占参加运动的党员总数0.2%，虽然比当时中央所作的全国大约占2%的估计少得多，但毕竟伤害了一些同志。这批被错戴帽子的同志，在以后中央举行的“七千人大会”期间，全部平反。

由于从上到下层层“反右倾”，进入大跃进第三年，即1959年底到1960年春夏，包括江苏在内，在煞“五风”时开始制止的“左”的错误做法、浮夸不实的口号，又重新出现。一些地方提出在三五年内实现人民公社“由基本队有制过渡到基本社有制”；已在实践中证明行不通的农村公共食堂又被视作“有助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新生事物”而重加提倡；还有的提出要建立“城市人民公社”。与此同时，工业方

面“压缩空气”，下调过高的指标，被批为“右倾”；农业指标则由下调变为上调，一些地方重新提出要像1958年那样，“争上游，创奇迹”，“竞赛评比打擂台，现场会议插红旗”，不顾实际，盲目蛮干。

如此“反右倾，鼓干劲”的实际结果是，1960年农业全面减产。全省原计划1960年粮食总产380亿至400亿斤，实际只完成191.96亿斤，比上年减少6.58亿斤，还低于1952年199.5亿斤的水平；棉花600万担，实际只完成248.5万担，比上年减少93.1万担，低于1953年294万担的水平；钢铁、原煤等，均远未达到计划指标。

不仅如此，由于高估产、高征购，从1959年秋冬开始，各地农村就出现了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浮肿病、大量人口外流和非正常死亡现象。1960年春夏，情况更加严重。这年2月，省委向周恩来总理报告，全省城市浮肿病患者共有12.6万人。另据镇江、扬州、徐州、淮阴四专区和南京市不完全统计，农村外流人口达14.8万余人。到6月份，省卫生厅统计，全省共有89.2万余人次患上了浮肿病和消瘦病。我和省委其他负责同志曾分头下去调查，发现一些地区人口大量非正常死亡。以情况最严重的宝应县为例。从1959年冬到1960年4月，该县先后死亡35391人，占农村人口总数的6.2%。在这些死亡人口中，除一部分属于正常死亡，绝大多数是因为缺粮而饿死的。解放后多年没有出现的弃婴现象也出现了，而且为数不少。宝应城内拾到的弃婴就有927名，其中死婴153名。

宝应的自然条件在全省属于中等，1959年基本上未发

生大的自然灾害。为什么会发生如此严重的问题呢？1960年春，省委和国家粮食部门分别派工作组去该县作了调查。根据调查材料，我在5月初扬州地委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曾作了题为《兴(化)高(邮)宝(应)问题的病症何在》的讲话，指出：宝应出现如此严重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虚报产量，征购过头。当发生人口大批死亡、生病、外流的时候，领导上仍然熟视无睹，还在干部中大反“刮低产风”，在群众中大反“瞒产私分”，把群众的口粮、种子都征购一空。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太湖之滨的宜兴和宁镇山区的高淳等县。这些县的县委固然有责任，省委、特别是我要负责任。归根到底，是由于“大跃进”中那套“左”的错误所导致的必然结果，这是多么惨痛而又深刻的教训啊！

七 重兴调查研究之风

鉴于庐山会议以后“反右倾”、刮“共产风”，到1960年底整个国民经济进入了“低谷”的严重情况，中共中央相继于当年11月3日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即“十二条”)，11月15日发出《关于彻底纠正“五风”问题的指示》。1961年1月，召开党的八届九中全会，正式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毛主席、党中央采取一系列措施，力图纠正庐山会议以后继续发展着的“左”的错误。

尽管如此，1961 年经济滑坡的情况并未煞住。就江苏来看，以 1961 年与 1960 年相比，全省工农业总产值又从 137.16 亿元下降为 105.52 亿元，其中工业产值由 79.27 亿元下降为 49.42 亿元。全省入库粮食总数为 165 亿斤，又比 1960 年减少 22 亿斤；棉花、油料等也有不同程度减产。

事情非常清楚，“三年大跃进”（1958～1960 年），导致了“三年困难时期”（1959～1961 年）。就全国而言，所谓“天灾人祸”，除了“大跃进”中“左”的失误以外，还有自然灾害的影响，苏联的逼债，加重了困难；就江苏而言，1961 年春旱秋涝，7、8、9 三个月内接连三次台风暴雨袭击，致使全省 3000 多万农田严重受灾。其中本来比较差的徐（州）淮（阴）盐（城）扬（州）四个专区，粮食减产达 13.1 亿斤，真是“雪上加霜”。农业减产，工业滑坡，市场萧条，城乡人民生活极度困难，普遍实行口粮低标准，大搞代食品，粮菜混着吃。这就是人们至今记忆犹新的“瓜菜代”。

处此严重关头，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带头节衣缩食，与全国人民一道，共渡难关。同时，号召全党调查研究，纠正“五风”，团结奋斗，克服困难。我记得，党的八届九中全会闭幕不久，即 1961 年 1 月 29 日，毛主席在南下调查途中路过南京，同我谈话时特别强调：各级领导要深入基层，抓典型，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中共中央根据毛主席的提议，于这年 3 月 23 日发出《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在毛主席的大力倡导、率先垂范下，全党同志调查研究蔚然成风。由毛主席亲自主持制订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即著名的“农业六

十条”,就是在中央和各省、市、自治区领导同志进行调查研究,总结“大跃进”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经过不断补充、修改以后形成的。与此同时,还制订了“工业七十条”、“科研十四条”等。所有这些,对保证中央“八字方针”的全面贯彻执行,指导全党纠正“五风”,扭转危局,发挥了重大作用。

当时,我和省委其他负责同志,都深入下去,分头在徐淮、里下河、太湖、宁镇山区选点调查。从调查中,我们痛切地看到,三年“大跃进”,特别是庐山会议以后“继续跃进”,破坏很大。事实上,早在庐山会议之前,即1959年4月上旬在上海召开党的八届七中全会期间,毛主席曾就农村人民公社如何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问题,亲自交代柯庆施、曾希圣、江华和我,分头下去调查,找“理论根据”。一个星期以后,我们回到毛主席下榻的上海锦江饭店,集中汇报。柯庆施说,他忙于事务,未作调查。曾希圣、江华说,他们下去调查了,但未找到理论根据。毛主席要我讲讲情况。我说,到武进县作了调查,找到了理论根据,并把那里一些基层干部对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管理体制方面的意见,向他老人家作了具体汇报。我说,现在把一切统到公社,有“三个不适应”,一是与生产力发展水平不相适应,二是与群众的觉悟水平不相适应,三是与干部的领导能力和管理水平不相适应。所以,只有实行队为基础,才能解决这三个不适应。毛主席很重视我的汇报。他说,“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列宁没有讲过,斯大林没有讲过,马克思就更不用说了。现在群众讲出了“以队为基础”的理论根据。这个问题很重要。

接着，我谈到了为什么会刮“一平（平均主义）二调（无偿调拨）”的“共产风”，把武进一个大队支部书记的看法讲给了毛主席听。这个大队书记说，“浮夸风”主要由于“瞎指挥”。“共产风”，主要是因为存在“三个误解”，一是把社会主义误解为共产主义，二是把集体所有制误解为全民所有制，三是把“按劳分配”误解为“按需分配”。毛主席听后称赞说，这个书记的水平高。

这些情况说明，从毛主席、党中央于1958年11月召开郑州会议起，经过武昌会议、第二次郑州会议，以及上海会议，直到1959年7月庐山会议之前，我们根据中央指示精神，经过调查研究，在初步纠正“左”的错误，解决“大跃进”、“公社化”运动中的混乱思想和混乱现象等方面，曾做了大量工作。对于党中央、毛主席关于批评“共产风”，纠正平均主义，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体现按劳分配，恢复自留地和家庭副业等指示精神，都执行坚决，贯彻较好。例如，1958年11月，省委作出了关于保证工人农民吃好、住好、休息好的决定。1959年，省委、省政府联合发布文件，强调实行生产队部分所有制，以保护农村生产力，并作出十二条暂行规定，其中包括：三包一奖，超产奖励；粮食包干，多产多吃；耕畜农具，固定到队；养猪养羊，队营为主；零星土地，自行种植；菜地固定，自种自吃；饲料基地，队种队收；小沟小塘，由队放养；小片林木，归队收益；零星副业，队营队有；生活福利，包干到队；队营收益，规定比例。应该说，如果按照庐山会议前已经采取的这一系列纠“左”煞“五风”的正确措施坚持下去，即使遭受自然灾害，情况也要好得多。

八 有步骤地解散食堂

我们在调查中，还痛切地看到，要从根本上克服困难，扭转局面，除了坚决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和各项有关政策之外，要把“公社化”、“大跃进”中破坏的农村生产力完全恢复过来，中心的环节是保护和恢复农村劳动力。因此，安排好群众生活，保证群众最低的生活需要，就成为各级党委头等重要的任务。

当时，中央曾指示：“安排好群众生活是一切工作的基础，办好食堂是安排好生活的基础。”从 1960 年秋冬至 1961 年底，我在省委常委会、省委全委会和地、市委书记会议及其他有关会议上，几乎逢会必讲，在口粮低标准的情况下，必须充分注意安排好城乡人民生活，这是关系到能不能恢复、保护劳动力的首要关键。特别是在农村，一定要吸取宝应、高淳等县的惨痛教训，决不允许再发生因吃不上饭而出现大量浮肿病、非正常死亡、外流和弃婴等严重情况。为此，我反复讲，粮食产量一定要摸底，估产、征购一定要实事求是，口粮安排一定要落实到人头。省委决定，对全省社员口粮实行“以人定量，按月落实，发证到户，节约归己”。要求各级领导组织干部、群众，在搞好集体生产的同时，千方百计，因地制宜，挖掘潜力，包括开发代食品，种好自留田、十边地，开展生产队和社员家庭副业等，以解决口粮困难。还

强调必须坚决执行中央关于“劳逸结合”的指示，保证社员、职工、干部、学生睡足8小时，不得任意加班加点。在受灾歉收、口粮标准很低、病弱者又较多的社、队，冬春期间可以半天劳动，半天休息。

除此之外，还要解决吃食堂的问题。“大跃进”、“公社化”中提出“吃饭不要钱”、“生活集体化”，农民普遍吃食堂，全省一度办起30万个食堂，吃食堂的占农村总人口的97%。所谓“吃大锅饭”，就是从那时候流传开来的。当时，我们已经发现，这样大呼隆吃食堂，管理困难，浪费甚大，弊端甚多。还在1959年春夏，省委就同意一些地区提出的经过群众讨论、本着自愿的原则，可以把口粮分发到户，实行社员回家自炊自吃的办法。但是，庐山会议以后，刮起新的“共产风”，把这些做法当成“右倾”，加以批判。一些停办的食堂，被迫重新开伙。1960年春统计，全省共有农村公共食堂16.8万个，参加农户48万户，占农户总数的55%。为此，省委根据中央有关指示，作出明确规定：一是各级党委，都要有一个书记专管以食堂为主的群众生活福利，从省到公社都要建立生活福利委员会；二是建立以党团员为核心的食堂管理委员会，社、队各级干部都要轮流到食堂当炊事员，帮助改善食堂经营管理；三是各级干部下乡，都要按照定额标准吃饭，不准特殊，不准吃夜餐；四是分配给社员的口粮，一定要保证到人。

1961年2月6日至8日，毛主席南下调查，到达杭州。他把六个大区书记和华东各省、市委第一书记找到一起，听取关于纠正“五风”问题的汇报。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食

堂问题。在杭州到绍兴的专列上，毛主席带着大家，听柯庆施讲食堂办得怎么好，吃食堂有多少好处，其他人也是一片赞扬，毛主席听得眉飞色舞。那正是早春时节，我坐在车上，眼望窗外。所谓“三年困难时期”尚未过去，麦苗点缀田野，沿途寒风瑟瑟，富饶的江南大地，显得十分冷落。我看着外面的景况，心头很不是滋味，所以一言不发。

毛主席注意到了这个情况。他见大家议论风生，就我沉默不语，说：“渭清同志，他们都讲办食堂好，唯独你不讲话，这是什么道理？”

我回答说：“我不好发言。”

毛主席听出了我的言外之意，就鼓励说，有什么意见都可以讲。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后来，有人把这话概括为“三不主义”，就是毛主席在杭州到绍兴的专列上，对着我第一次提出的。

毛主席既讲了“三不”，我也只好放开胆子讲了。我对他说，大家都讲食堂怎么好。要我来讲，是怎么不好。

毛主席笑了，你是反对派嘛！就把你的“不好”讲给大家听嘛！

接着，我具体讲了食堂有三个“不好”。

我说：“食堂耗粮特别大。本来，一家一户过日子，再穷也有个‘糠菜半年粮’。您老人家也曾讲，要‘平时吃稀，农忙吃干，老弱干轻活的吃稀，青壮年干重活的吃干’。大办食堂以后，不分老少，不管活轻活重，都在一个大锅里吃，一年吃了两年粮，全年口粮几个月就吃光了，吃不起。”

毛主席伸出一个手指，打着手势说，这是一。第二呢？

我说："农民一家一户过日子，每户挖点野菜，剩汤剩饭什么的就能养一头猪，全国一亿多户农民，每户养一头猪就是一亿多头猪。现在办公共食堂，不许养鸡、养鸭、养猪、养羊，结果没有蛋吃，没有肉吃。"

毛主席伸出第二个手指，这是二。第三呢？

我说："吃食堂浪费大得不得了！各家各户烧饭时，对锅灶碗盆，十分爱护。办了食堂，锅灶经常坏，碗筷随手丢。许多食堂要经常买锅添碗置灶具。还有，干部和他们的亲属借机搞特殊化，多吃多占，严重影响干群关系，这些问题还可以通过整风整社解决；更严重的还有个烧草问题。您老人家提倡种树绿化，现在办食堂缺烧草，就到处砍树。农村的树木砍得差不多了！"

我总括起来说，刚才大家讲食堂怎么好，有的还讲公共食堂给社员吃"四菜一汤"。我在江苏没见过。要我来讲，如果再搞下去，连"一汤"都要喝不上了！

毛主席听我这么讲，就掉头问坐在一边的周总理，渭清意见对不对？总理说，他讲得有道理。坐在另一边的胡乔木、田家英同志也表示赞许。毛主席就对总理说，作两个决定。一是派乔木、家英分头到湖南、浙江农村作调查，时间一个月；二是调查以后，中央开会讨论食堂问题。如果渭清讲的对，就"一风吹"；不对再作别论。这时，柯庆施插上来说，苏州地区条件好，食堂可以办下去。我说："苏州也不能办。"毛主席说，渭清同志，你回去以后，先把江苏的食堂解散。

我说："主席，马上解散也不行。"

毛主席问："照你看，该怎么办？"

我回顾了1958年“大跃进”以来，食堂从“大办”、“散伙”到“再大办”的过程，说：这几年搞了几个“大办”，特别是“大办钢铁”、“大办工业”，不少日用品，包括火柴、食盐、煤球、锅子、碗筷等，都严重脱销，有的地方已经很长时间见不到了。所以要停办食堂，不光要确保口粮定量到人，分发到户，还必须解决一家一户用的锅、碗、烧柴等问题。不能办食堂“一哄而起”，停食堂“一哄而散”，如果马上解散，势必给群众带来新的困难。

毛主席表示赞同，说：就照你们江苏的具体情况，研究办理。

我从杭州返回南京以后，于2月23日召开省委常委会，传达和学习毛主席的有关指示精神，着重讨论和研究了食堂问题。我们从当时具体情况出发，没有讲“解散”，而是讲“调整”。省委确定，要防止有些干部卸包袱，食堂的调整要慎重。城市的食堂可以先行调整，农村食堂的调整则要有领导有准备地进行。实际上就是要求采取积极态度，逐步停办食堂，并为群众创造自己开伙做饭的条件。

5月下旬，我赴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在这次会议上，讨论通过了经过修改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即“农业六十条”)，决定取消农村公共食堂。

九 总结“大跃进”的经验教训

根据党中央、毛主席的一系列指示精神，在省委和地(市)、县各级领导比较深入地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我于1961年7月20日在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对江苏“大跃进”的经验教训，作了初步总结，指出：三年多来，我们做了许多工作，取得了巨大成绩，但也产生了许多缺点和错误，并造成严重后果，使农村生产力受到破坏，给人民生活带来了困难，使许多人心情不舒畅。

我回顾了1957年冬季农业大生产运动到1958年春发起“大跃进”，在“鼓干劲，争上游”的口号下，盲目地认为农业产量可以“一翻再翻”，片面强调人的主观能动作用，接着在“大炼钢铁”、“大办人民公社”的高潮中，大放“高产卫星”，大办食堂，“五风”愈演愈烈。根据党的八届六中全会《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第二次郑州会议批判“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和毛主席的《党内通讯》六条指示，以及上海会议《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的精神，我们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着手纠正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但是，在传达贯彻庐山会议“反右倾，鼓干劲”的精神以后，又掀起了“继续跃进”，工业生产层层压指标，基本建设层层加码；农业生产大搞“连片种植”，大办千头、万头猪场，助长了强迫命令风、瞎指挥风；强调“发展社有经济”，提出“农村公共食

堂普遍化”,刮起了新的“一平二调”的“共产风”。直到1960年底,秋粮过秤入库,摸到了农业减产的“底”,我们的头脑才真正冷静下来。遵照中央“十二条”紧急指示精神,省委部署了整风整社,狠刹“五风”,明确提出以抓生活作为冬春工作中心,才逐步恢复了正常的生产秩序。

通过以上回顾,我代表省委对三年“大跃进”的缺点、错误,总结了三方面的经验教训。

一是在所有制的问题上,光凭主观想像,企图尽快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因为根本不具备物质条件,于是只好大刮“共产风”,搞“一平二调”,无偿调用社、队和社员个人的生产、生活资料;只好在分配中实行平均主义,而且把社员家庭副业当作“自发资本主义”,无偿没收其收入和产品。据当时估计,全省“平调”帐约20亿元左右,差不多对每个农民平调60元。这不仅动摇了集体所有制的基础,而且犯了剥夺农民的错误,伤了农民的心,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因此,只有彻底纠正“五风”,坚决退赔,才能稳住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集体所有制,重新取信于民,稳定人心。

二是没有很好地贯彻执行党的群众路线和民主集中制。发动“大跃进”的本意是想为群众做好事,尽快改变“一穷二白”面貌,确实出于好心。但是没有走群众路线,没有充分发扬党内外民主,凭主观愿望,盲目蛮干,结果违背了客观规律,违背了群众意愿。例如,大办水利,是件好事,但是要求过高过急,在人力、物力、财力上大大超过群众负担能力,有些工程是搞得好的,也有相当一部分工程,群众付出

了很大代价，还是配不了套，发挥不了效益，造成很大损失。又如一个月实现人民公社化，结果在劳动组织、生产指挥、经营管理、基本建设、进行协作等方面都只能采取行政手段、强迫命令；在对生产的领导上，包括种植计划、生产改制、工具改革、技术措施等，都是“一个样”、“一律化”、“一刀切”。党长期以来在农村工作中和农业生产指导上坚持的“因地制宜”、“从实际出发”和“说服教育”、“典型示范”等基本经验，都被丢掉了，助长了浮而不深、粗而不细、华而不实的形式主义，“花架子”大为盛行。甚至不惜动用大量人力、物力制造假“典型”，动不动组织“万人大检查”，到处召开现场会“比武打擂台”，严重挫伤了群众积极性，对生产起了很大的破坏作用。

第三，我还检查了“大跃进”中所以出现这些缺点、错误，除了指导思想上的“左”以外，又是同放松调查研究分不开的。在“五风”泛滥的那段时间内，我们各级领导“走马观花”的多，深入一点蹲下来的少；听干部汇报的多，直接听群众意见的少；看第二、第三手书面材料多，直接掌握第一手材料少。毛主席一贯倡导“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那段时间内，包括“大办人民公社”在内的许多事情，恰恰是凭主观愿望，未经调查研究，就夸夸其谈；情况不明，就大下决心；结果必然以感情代替政策，发展了主观主义，助长了浮夸风、强迫命令风和瞎指挥风等“五风”危害。

此外，我还检查了三年“大跃进”中，放松了“以农业为基础”这个基本国策，在“以钢为纲，全面跃进”的口号下，严重削弱了农业，忘记了吃饭是第一件大事，造成了农业大减

产。

今天看来，我当时的这个检查，还没有提到应有的高度，但确实比较实事求是，心情是沉痛的。1961年12月13日，毛主席乘专列从上海来到无锡。14日至15日，他接见了我和许世友，还有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等同志，听取了无锡市委书记何冰皓、苏州地委第一书记储江、镇江地委第一书记李楚等同志的汇报，对如何看待国内外形势，如何克服当前困难和贯彻执行“农业六十条”、“工业七十条”，作了重要指示。他针对一些同志情绪低沉的情况，一再强调，有困难、有缺点，不要怕，是可以克服的。鼓励我们不要理不直，气不壮，不要灰溜溜。我在汇报中讲到集体粮食的分配数虽然少了，但由于贯彻了中央的政策，群众活路多了，算上自留地、“十边田”生产的粮菜，估计70%的社员生活可以比上年好一些。毛主席听了连连点头。我又讲到这几年农业生产为什么有的地方增产，有的地方减产，说明“条件大体相同，主观努力不同，效果也大不相同”。毛主席说：“你讲得好。”要我们正确总结经验教训，对困难也要“两点论”，要看到有困难，有办法，有希望。他充满信心地说：“久卧思起，现在到了起床的时候了。到了谷底，就要上山了。”毛主席还详细询问了《关于农村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指示》的贯彻落实情况。这个指示，是他亲自调查研究、听取下面意见以后，建议中央发出的。针对一些干部认为人民公社实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是“倒退”的说法，他指出：“这不是后退，恰恰是前进。江渭清同志不是讲底子薄吗？国家底子薄，工厂底子薄，公社底子

薄，最主要的是现在生产队底子薄。要使生产队底子厚起来，就要实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他说：没有肥料靠谁搞?把牛养好靠谁?还有农具的使用保管，都要靠生产队，所以要花工夫搞好生产队，扩大生产队的分配权。我还具体汇报了全省粮棉收购情况，虽然超额完成了任务，但有些专区、有些县减产严重。毛主席对这样如实汇报作了肯定，还说要把超额上交中央的部分粮食还给江苏，调动你们的积极性。当询问城市工作时，我针对当时市场萧条的情况，汇报了南京搞“十副担子”(即小吃、小零售、小手艺等担子)串街，既活跃了市场，又方便了群众。毛主席听了很感兴趣，连声说：“这个办法好!”最后，他指示，1962 年工作要抓工、农、兵、学、商、政、党七个字，要大抓一年，在这几个方面都要抓出一个头绪来，把全党全国工作进一步引上轨道。毛主席的这些谈话和指示，实际上是帮助我们省委，在初步总结“大跃进”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进一步振奋精神，纠正失误，克服困难，也为我们参加即将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和“七千人大会”，作了思想准备。

回顾三年“大跃进”，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1958 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及其基本点，其正确的一面是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情况的普遍愿望，其缺点是忽视了客观的经济规律。”这是完全正确的。我们今天总结这一时期的历史经验，也应采取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我认为，“大跃进”确实是一个严重的失误。但是，

三年“大跃进”中全党和全国人民那种奋发图强，力求改变我国“一穷二白”面貌，赶上西方发达国家的斗志；那种鼓足干劲，战天斗地，改造自然的热情；那种意气风发，吃大苦耐大劳，大干社会主义的精神，则是可贵的。广大干部群众付出的辛勤劳动也取得了一部分成果。江苏的钢铁、农机、化纤、电力、电子等工业，就是在这个时期奠定发展基础的。南京钢铁厂、无锡钢铁厂、苏州钢铁厂、徐州钢铁厂等钢铁企业，都是在“大炼钢铁”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江苏有名的社队企业也是最初出现在这个时期。特别是农田水利建设发展迅速，从 1958 年至 1960 年全省共完成 30 亿土石方，兴建了 50 多万马力的机电排灌工程，扩大了灌溉面积，拉下了贯通全省排灌网络的框架，为实现洪涝分开、排灌分开、高低分开、内外分开、降低地下水位的综合治水目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直至 30 多年后的今天，还在发挥效益。

在这一章结束之前，我要说一说，我作为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苏在“大跃进”中的一些重大决策，最后都是由我拍板的。对于江苏“大跃进”中的严重失误，我应负主要领导责任。“大跃进”的沉痛教训，教育了全党，教育了我们的党员、干部，使我们更加深切地认识到，探索一条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是多么来之不易，又是多么至关重要！

第六章　开展“四清”运动（上）

一　从“七千人大会”到“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经过广大干部、群众奋发努力，江苏同全国一样，到1961年底，各方面工作开始重新走上轨道，工农业形势有所好转。

当年11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的通知》，决定由中央、中央局和省、地、县三级领导干部，共七千多人参加会议。这次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后来人们习惯地称为“七千人大会”。我们党在全国执政以后召开如此规模盛大的党内会议，这是首次。

我带领江苏的省、地（市）、县及部分重点厂矿企业的领导同志，赴京参加了会议。当时大家曾想：中央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刻，召开这样一个大会呢？对此，毛主席在会议讲话中作了很中肯、很透彻的回答。他说：违背了客观规律，就一定要受惩罚：过去三年，土地瘦了，人瘦了，牲畜瘦了，也可以说，三年“大跃进”，带来了“三瘦”的大惩罚。他又说：未有

先学养孩子而后嫁者也，未有先学会社会主义的具体政策而后搞社会主义的。重要的问题在善于从实践中学习，从失误中吸取经验教训。我领会，中央请全国几级领导干部都来参加会议，其目的就是要大家一道来认真总结三年“大跃进”的经验教训，以便统一思想，做好工作，战胜困难，脚踏实地地前进。

“七千人大会”于1962年1月11日正式开幕。在这之前，先开中央工作会议(1961年12月20日至1962年1月10日)，确定“七千人大会”的主要议题是，讨论和修改刘少奇同志代表党中央作的《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报告》(简称“书面报告”)。报告肯定了几年来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着重指出了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特别是“高指标”、“共产风”的严重错误。这个报告，曾印发给全体代表反复讨论，经过几上几下修改。所以，刘少奇同志于1月27日向大会作报告时，不是拿着“书面报告”“照本宣科”，而是就经过讨论修改的报告要点，作了若干说明。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是对三年“大跃进”的成绩和缺点的评估，不是用“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去套，而是强调有多少错误，就说多少错误；二是对造成“三年困难”的原因，不是笼统地归结为“自然灾害”，而是指出有不少地方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报告中的这些提法，得到了绝大多数代表的赞同，表明了我们党勇于面对现实，实事求是地总结历史经验，彻底纠正“左”的错误的决心。

“七千人大会”原定1月28日结束，会期18天。听过刘少奇同志的报告，大家都作了返程的准备。但是，毛主席把

代表们留住了。他于1月29日下午作了简短讲话。他说：最后要解决的中心问题，是有些同志有些话还没有讲出来，所以要把大家留下来，“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由于当年春节是2月5日，毛主席就请七千人一起在北京开会过春节，开个“出气会”，“有什么气，出什么气，有多少气，出多少气，不管是正确之气，还是错误之气，决不打击，不报复。”让大家出完“气”，舒舒服服回去。接着，毛主席于第二天(1月30日)下午作了长篇讲话。他旁征博引，古今中外，从写《史记》的司马迁讲到我们党内斗争，其中心是民主集中制问题。这样，会议实际上分成了两段。前段讨论和修改刘少奇同志所作的“书面报告”，1月29日转入后半段，重点是讨论和学习毛主席的重要讲话。围绕讲话精神，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其他中央领导同志，都在会上讲了话。2月7日下午，在毛主席亲自主持下，由邓小平同志宣读并通过了关于刘少奇同志报告的决议，大会宣告闭幕。

多少年过去了，真是岁月蹉跎，但“七千人大会”召开的情景，宛然就在眼前。当时，困难很大，生活艰苦，但从上到下，不泄气，无怨言。全党团结，举国一致，卧薪尝胆，发愤图强。毛主席鼓励大家“出气”，就是要大家说真话，对“大跃进”的缺点、错误进行认真的反思，以便更好地前进。会上，毛主席、刘少奇和党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与各地代表一道，发扬民主，畅所欲言，认真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充分体现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是那样从谏如流，勇担责任，为国操劳，为民分忧，给我们所有亲身与

会的同志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至今仍为我们这些健在的老人津津乐道。

会议期间，我不断地与省委在家的同志联系通气，把毛主席与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精神及时传回省里，做到会内会外结合。记得农历除夕前一天(2月3日)，我听过周总理关于1962年八项任务的重要报告，立即打电话向省委传达其要点，一是基本建设要“放下架子”；二是坚决精简；三是争取农业增产；四是保证木、煤、矿、运；五是清理物资；六是保证市场；七是贯彻各项政策条例；八是建立新秩序，加强党的民主集中制和“三八作风”(即“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我还在电话中强调，此次会议提出贯彻中央“八字方针”，1962年是关键，是最紧张的一年，也是愉快的一年。为此，各级领导都要遵照毛主席所说的：“要浪漫主义一点，还要现实主义”，看远景，抓现实，万丈高楼平地起，认清目标，脚踏实地前进，把周总理提出的八项重要任务落到实处。

“七千人大会”结束以后，我返回省里，先后于3月上旬和4月中下旬，主持召开了省委常委扩大会议和省、地(市)、县三级干部会议，进行传达贯彻。中央在“七千人大会”后，又发出了包括陈云同志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即“西楼会议”)上所作的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及如何克服困难的重要讲话等一系列文件。我们组织参加全省三级干部会议的同志，认真学文件，并仿照“七千人大会”的做法，鼓励大家畅所欲言，发扬民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研究克服困难的措施、办法。

4月28日，我在三级干部会议结束时，围绕着如何正

确对待困难的态度问题讲了话，要求省、地（市）、县各级干部以身作则，从我做起。越是困难，越要艰苦朴素；越是困难，越要谦虚谨慎，顾全大局，增强团结，任劳任怨；越是困难，越要加强对干部、群众的思想教育工作，耐心细致地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避免简单粗暴。我还根据省委派出的工作组对18个县所作调查，严肃指出：有的地方，群众饿肚子，稀饭都喝不上，干部却多吃多占，大吃大喝，搞特殊化，出现了“大干部送上门，中干部走后门，小干部找窍门”，这股不正之风，理所当然引起群众不满而“骂山门”。告诫各级领导，务必与群众同甘共苦，并作了自我批评，我说：“这些年来我也不像过去那样注意生活刻苦了，多少放松了自己，应当引以为戒。”我指出，只有干部做出好样子，才能上下齐心合力，把大困难变为中困难，中困难变为小困难，尽快改变困难局面。应该说，60年代初那样严重的困难，所以能比较顺利地走过来，这是与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干部同广大群众甘苦与共、齐心奋斗分不开的。

1962年下半年，由于贯彻执行了中央以调整为中心的八字方针，加强了农业战线，各方面工作进一步走上轨道。我前往北戴河，参加了于7月25日至8月24日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8月26日至9月23日举行的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议，前后达两个月。在此期间，我省遭受多次台风、暴雨袭击，特别是9月初的14号强台风和特大暴雨，致使全省近2000万亩农田严重受涝，苏北里下河地区一片泽国。经请示中央同意，我赶回南京先抓生产救灾和“四秋”工作，然后传达贯彻八届十中全会精神。

当时，全国的经济形势，确是“去年比前年好一些，今年又比去年好一些”。江苏尽管相继遭受严重旱涝灾害，除苏北重灾区以外，其他地区生产情况也在继续好转，许多县(市)1962年粮食产量达到或者接近正常年景水平。“大跃进”中被破坏的生产力有所恢复，农村经济又开始复苏。但是，就在经济形势趋于好转之时，八届十中全会提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开展了对“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的批判，致使政治风向再度发生逆转，正在进行的纠“左”又变成了反“右”。接着，按照毛主席关于“反修防修”、防止“和平演变”的指示精神，党中央决定在全国城乡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开展大规模的阶级斗争。

二　进行农村社教试点

1962年11月15日至12月15日，在南京召开了中共江苏省第四次代表大会。其中预备会开了24天，正式会议开了6天，来自全省各地和各条战线的535名代表出席了大会。

这次省党代表大会是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精神指导下召开的。我作了关于党的八届十中全会精神的传达报告，除了传达全会的决定、决议和有关工作部署，中心是传达毛主席从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到全会召开期间所作的关于阶

级、形势、矛盾问题的几次讲话，并结合江苏的情况，提出了贯彻意见。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省委书记处常务书记刘顺元，也分别在会上讲了话。会议选举产生了中共江苏省第四届委员会和中共江苏省监察委员会。会议闭幕那天，毛主席抵达南京，接见了全体代表和省市机关、驻宁部队、厂矿企业的部分干部，号召大家"团结起来，努力奋斗，克服困难，争取胜利"。

第四次省党代会除了在组织上完成了省一级党的领导机构和监察机构的选举，积极方面的成果是，进一步提高了江苏全党克服困难的信心，明确了坚持贯彻"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继续努力执行以调整为中心的"八字方针"的指导思想，同时通过认真学习和讨论中央《关于进一步巩固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两个文件，大大提高了纠正分配中的平均主义、维护生产队的权力和加强农业这个基础的自觉性。所有这些，对推进江苏经济形势的进一步好转，尤其是促进农业生产的恢复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左"的思想指导下，在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影响之下，这次党代会上也灌输了不少"左"的东西。特别是柯庆施以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华东局第一书记身份出席大会，坐镇督促，给我们省委压力很大。他从"大跃进"以来，总觉得我江渭清思想右，江苏省委右，所以在会议讲话中摆出一副老"左"姿态，离开经济建设，大讲"反修防修"和"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把在干部、群众中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强调到吓人的

“高度”。

第四次省党代会结束以后，省委于12月20日发出《关于在农村中开展社会主义教育和加强人民公社建设工作的指示》，对全省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作了部署，并决定由省委农村工作部组织工作组到句容县城东公社试点。

这里，有必要指出，党中央、毛主席一直很重视对农民的教育问题，这是必要的。但随着形势的变化，教育的内容和方法也不断地改变。早在1955年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毛主席就提出“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1956年冬、1957年春，全国不少地区发生闹“退社”的风潮，党中央在“反右派”开始后，即明确提出“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1959年庐山会议后，农村虽然没有搞“反右倾”，但针对批判所谓“富裕中农”思想，党中央再次提出在农村中进行一次社会主义教育。1961年11月13日，党中央又发出《关于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重点是纠正“五风”，改造所谓坏人当道的“三类队”，阶级斗争的火药味，已比批判“富裕中农”思想浓了，但还没有到全面开展阶级斗争的地步。农村干部、群众反映，“运动年年有，不在三九在四九”。江苏这几次农村社教，都是以整风整社形式出现的，除了改造“三类队”那次伤害过一些基层干部，运动的发展基本平稳。

这次进行农村社会主义教育，情况有所不同，是毛主席在八届十中全会上严厉批判了“单干风”、“黑暗风”、“翻案风”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毛主席把这“三股风”，都提到了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进攻的高度，提到了抵制和反对党中央

领导的高度。柯庆施在会上添油加醋，围攻邓子恢同志，说："单干风"、"黑暗风"，越到上面刮得越厉害。在省第四次党代会的讲话中，他又重复了这些话。这更增加了对我和江苏省委的压力。尽管这样，我同省委书记处的其他几位同志商量，大家感到这几年农村运动不断，干部已经折腾得够了，生产形势才开始好转，经不起再折腾了，决定把农村社教的着眼点放在巩固发展集体经济上面。所以省委在关于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中，没有突出强调批判斗争，而是强调以正面教育为主，并提出了两方面要求。一是在思想上通过向农村干部、社员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达到认清形势，提高觉悟，明确方向，鼓舞干劲，发展集体生产的目的；二是在组织上加强人民公社的建设，重点是加强党的建设和生产队的建设，要求把生产队建设成为"集体思想好，执行政策好，团结互助好，经营管理好，增产增收好"的"五好"生产队。

为了及时指导扩大试点，省委于 1963 年 2 月 11 日向各地、市、县委转发了《句容县委关于城东公社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情况报告》，根据城东公社的试点经验，省委在批示中进一步明确：农村社会主义教育必须以全面贯彻《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为中心，着重解决三个问题：一是广泛进行社会主义方向的教育；二是切实整顿社队干部的思想作风；三是划清若干具体政策界限，特别是不能把正当的家庭副业、正当的集市贸易和政策规定范围内的自留地，当作"资本主义"，以免造成混乱。省委在批示中还强调，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必须坚持先党内、后党外的原则；

强调运用回忆对比的方法，启发农民进行自我教育；强调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必须与当前生产紧密结合，再次指出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目的是要发展农业生产，争取农业丰收。

就在这个时候，中央召开工作会议。我和刘顺元同志赴京参加了这次会议。会上，毛主席批发了湖南、河北省委关于社会主义教育的两个报告，提出了“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强调要用社会主义重新教育干部、教育群众。会议根据毛主席的讲话精神，作出了在城市开展“五反”(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运动的部署，规定各级领导干部要首先在运动中“洗手洗澡”，并规定各省、市、自治区都要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试点。

我同顺元同志商量，按照毛主席的意思，显然是要用阶级斗争的方法来搞社教了，搞得不好，很容易混淆两类矛盾，还是稳妥一点为好。顺元同志也是这个看法。于是我们回南京后，在向省委常委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精神时，讲了我同顺元同志两人的看法，常委们也都赞成搞稳妥一点。

2月底，省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传达并研究贯彻中央工作会议精神。会后，省委向中央作了《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情况报告》，对进一步开展全省农村社教，提了四个要点：(一)明确指导思想，把重点放在阶级教育方面，主要解决农村两条道路斗争问题；(二)坚持先上后下，先党内后党外，层层培训骨干，进行正面教育；(三)教育的内容要结合当地实际，完整地宣传和贯彻中央的方针、政策及各项

有关规定；（四）加强对落后队的领导。应该说，这是我们经过调查研究，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来的，着眼于教育，着眼于按照党的方针、政策办事，是比较稳妥的。但是，与当时中央批发的其他省的一些典型材料相比，省委的这些要求，被认为“对两条道路的斗争抓了，对阶级斗争这个纲没有高高举起”。为此，我在省委召开的一次会议上作了自我批评。

这年5月初，我前往杭州，参加毛主席召集的有各中央局书记和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的小型会议，研究制订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的文件。毛主席反复修改了文件，加写了关于“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段论述，还亲自审阅批发了东北局宋任穷同志和河南、湖北、湖南等省委的几个报告，浙江省委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7个材料，共20件作为附件，经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于5月20日正式发出，这就是《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共提出了10个问题，称“前十条”。在“前十条”中，规定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的主要内容是清理帐目、清理仓库、清理财物、清理工分，简称“四清”。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般也就称作“四清”运动。城市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则仍以“五反”为主要内容。

三　贯彻“前十条”和“后十条”

杭州会议以后，我向省委常委传达了会议精神，并下去分别向地委和部分县委作了传达。6月10日，省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我在讲话中说：“前十条”归纳起来实际是五个问题，即阶级斗争问题，社会主义教育问题，组织贫农、下中农的阶级队伍问题，“四清”问题，干部参加劳动问题，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要抓住这五个重点。我还讲了毛主席在“前十条”开头写的关于“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段话，这是认识论问题，要求大家结合《矛盾论》、《实践论》认真学习。我又对“前十条”中毛主席关于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是一次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指示，谈了自己的理解。我强调说：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是不可分割的，社会主义教育和搞好生产是完全一致的，决不能“为教育而教育”，应当把社会主义教育与当前鼓足干劲、向自然灾害作斗争，克服困难、争取农业丰收联系起来，农忙少搞，农闲多搞，不能因为搞社会主义教育而影响生产。我还针对各地同志的思想实际，讲了如何正确对待“前十条”20个附件中有关兄弟省区的经验，指出：既要虚心学习，又要从实际出发，抓住精神实质，不要照搬硬套某些具体做法。

我们江苏农村的“四清”怎么搞？我说：省、地（市）、县各

级领导都要深入下去，蹲点抓典型。要按照毛主席在一次谈话中说的，第一，千万不要着急，先搞试点，把情况摸清楚；第二，千万不要伤人过多，“四清”试点中要坚持“说服教育，洗手洗澡，轻装上阵，团结对敌”的方针，团结95%以上的干部和95%以上的群众；第三，要想尽方法，争取今年的农业生产比去年好一些。密切结合生产，不要关门搞运动。城市的“五反”，也要贯彻这些精神。增产节约与“五反”密切相联，决不能因为搞运动而打乱了工矿企业的生产秩序。

我的讲话，表达了省委对全省农村“四清”和城市“五反”的基本要求。当时，我觉得开展这场运动是有必要的。通过运动，切实解决一些地方确实存在的“四不清”问题，特别是干部中存在的所谓“政治上和平共处，组织上稀里糊涂，经济上马马虎虎”的问题，这对于防止党内腐败，对于密切党和群众的联系，对于推动社会主义建设，都有重要意义。我所担心的，始终是怕运动伤人过多，还有一条是怕运动妨碍生产。所以我一再交代，必须做到“运动、生产两不误”，必须继续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通过运动，进一步促进全省农业生产全面好转。

根据杭州会议精神，省委决定按照“前十条”的规定，在省、地、县三级扩大“四清”试点，全省共组织了7000人的工作队，搞了67个公社，占全省公社总数(1847个)的3.6%。省委直接在吴县唯亭公社和江都丁沟公社试点，江都花荡公社作为省委试点的“副点”，以进一步摸清农村阶级斗争情况，训练和培养骨干，取得经验，指导全省分期分批开展“四清”。与此同时，城市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增产节约和“五

反”运动,也分期分批地展开,揭发了一批贪污盗窃案件,考察和了解了干部。“五反”运动搞得比较好的单位,在政治思想上、组织建设上和经营管理上,都取得了一定成效,出现了新的气象。

10月下旬,省四届二次党代表会议在南京召开。我在代表省委向大会所作的工作报告中,回顾和总结了四届一次党代会以来的工作,提出1963年冬季和1964年工作的基本任务和要求,着重讲述了继续深入开展农村“四清”和城市“五反”问题。省委的要求是,农村“四清”一定要完整地按照“前十条”的规定精神,有领导有步骤地展开,并提醒领导上必须注意掌握好几个问题,这就是:领导带头,洗手洗澡,自觉革命;进行阶级教育,帮助干部、群众提高觉悟,划清敌我界限和是非界限;认真搞好“四清”,解决干部和群众的矛盾,改善干群关系,实行民主办社、勤俭办社;坚持说服教育,团结“两个95%”,对干部队伍要有一个基本估计,要看到绝大多数干部是好的或者基本上是好的,即使对犯错误的干部,也要耐心做好思想工作,不追不逼,不搞批斗大会;完整地贯彻阶级路线,在组织贫农、下中农的同时,要做好团结中农和其他劳动人民的工作;正确开展对敌斗争,防止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从抓生产、生活入手,妥善安排生产和运动,做到“两不误”、“两高涨”。

我代表省委提出的这些要求,比较完整地体现了“前十条”的精神。这些讲话精神传达到点上,绝大多数基层干部觉得放心了,社员群众也觉得这样做好,尤其是中农和其他劳动人民终于也安下心来。

11月，毛主席正式批发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即“后十条”。这是基于在有些省、市和地区的运动试点中出现了打、跪、罚等违法现象，发生了自杀、逃跑等事件，中央认为有必要对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做出明确的规定。我们在学习和贯彻中感到，前后两个十条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后十条”对团结“两个95%”作出了更具体的政策规定，这对于防止扩大打击面，保证运动健康进行，是很有必要的。但是，它的基本指导思想是要“挖修正主义根子”，所以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在“后十条”中提出了“一纲五点”，即“以阶级斗争为纲，抓住五个要点”(对敌斗争，社会主义教育，组织贫、下中农队伍，“四清”，干部参加劳动)，作为运动的基本方针和主要内容，把阶级斗争放到了“纲”的位置，这就不可避免地要导致阶级斗争扩大化，而且随着运动的发展，必然要把阶级斗争形势看得越来越严重。有的地方，在运动试点中发生的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左”的错误，不但未能有效地遏制，反而因为有了“纲”这个理论根据而有所发展。

根据“双十条”的精神，省委在12月上旬作出了关于1963年冬和1964年春农村“四清”运动部署，决定在过去一年试点的基础上，展开第一批公社的运动。省、地、县三级共组织19000人的工作队，搞125个公社，占全省公社总数的6.7%；一般一个县搞一两个公社，部分县搞三个公社。实际上是扩大试点范围，目的在于使各级党委取得系统开展农村“四清”运动的领导经验。

除了开展系统“四清”的公社以外，全省约有90%的公社围绕生产这个中心，进行面上的社会主义教育。具体做法是，通过宣读讲解和组织学习“双十条”，使干部、群众懂得农村“四清”的意义、目的和方针、政策，鼓励犯有“四不清”错误的干部主动改正错误，消除顾虑，安定人心，改善干群关系，调动积极性，搞好冬春生产和灾区的生产救灾工作。

1964年3月上旬，省委召开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座谈会，总结经验，修订部署，研究第二批运动怎样搞得“好一点、快一点、多一点”，并拟定了一些具体政策的补充规定。我在座谈会结束时讲话，肯定了第一批公社开展运动的经验，要求机关、企事业单位的“五反”，也要总结经验，以便搞得更好些，并对进一步加强农村“四清”、城市“五反”运动的领导问题，提出了意见。在这次座谈会的基础上，省委作出《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几个问题的总结》，对全省社会主义教育试点、第一批系统开展运动和面上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工作所取得的成果、主要做法和基本经验，作了比较全面的总结。与此同时，省委发出《关于全省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部署的补充规定》，部署分期分批开展农村“四清”运动。当时的计划是，1964年夏收以前搞第二批，大约13%的公社；夏收以后到秋收以前搞第四、第五批，大约17%的公社；秋收以后到来年春耕以前再搞两批，每批大约20%的公社；剩下200多个公社，争取在1965年年内搞完。据此，要求除保持现有19000人的“四清”工作队以外，再抽调11000人，包括现任大队党支部书记、转业军人、师范学院应届毕业生等，全省组成3万人左右的“四清”工作队，以

适应运动发展的需要。

3月下旬，中央相继发出《关于在全党组织干部宣讲队伍，把全党全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行到底的指示》和《关于继续抓紧进行“五反”运动的指示》。在关于组织干部宣讲队伍的指示中，明确提出全党全民的社会主义教育，至少需要三至四年完成。要求从中央委员到县级党委委员，除年老体弱者以外，一律要“充当宣读员，至少一至两次”。省委于4月13日召开省级机关处以上党员干部会议。我在会上全文宣读了中央的两个指示，着重讲了如何提高对运动的认识、加强对运动的领导和改进领导方法问题。第二天，省委发出《关于加强领导，把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行到底的通知》，要求全省各地、市、县委和“四清”工作队对照中央指示精神，认真检查是不是真正理解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伟大革命意义，是不是真正树立了把运动进行到底的决心，是不是坚决按照“双十条”的要求，确实解决了问题。“通知”强调，必须善始善终结束第一批公社的运动，凡是搞得粗糙的地方，要认真补课；同时要坚持质量第一的原则，组织好第二批公社的运动；对全省农村的“四清”要求搞深搞细搞透搞到底，完整地按照毛主席提出的六条标准，其中包括“要看是增产还是减产”这条重要标准，进行验收。决不能草率了事，“走过场”。

第七章　开展“四清”运动（下）

四　刘少奇视察“四清”运动

在江苏省农村“四清”运动开展过程中，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情，就是刘少奇同志来南京视察和我对他几次讲话的“顶撞”。为重温历史经验，我想回顾一下前因后果。

事情还应追溯到1964年5月15日至6月17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这次会议开了一个多月，除了讨论、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贫农下中农协会组织条例(草案)》，还讨论了政治、经济、军事以及文化教育等问题，重点是讨论研究如何进一步深入开展农村“四清”和城市“五反”问题，明确了城乡社会主义教育，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就是“反修防修”。会上印发了陈伯达在天津小站和王光美在河北桃园大队的“四清”材料，以及中共甘肃省委和冶金工业部党组关于白银有色金属公司夺权的报告。毛主席在这次会上第一次提出了培养接班人的问题。刘少奇同志在讲话中联系农村“四清”、城市“五反”中揭发出来的问题，反复阐

述了苏联变修的教训，提出了如何防止“和平演变”，保证不出“修正主义”的问题。少奇同志讲到苏联搞了40年，出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要大家想一想，我们中国会不会搞修正主义？他说，凡是不注意，一定会搞。毛主席接着说：小站、白银已经搞修正主义了，全国有三分之一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由此又提出了“追根子”的问题。按照少奇同志的说法，“朝中有人”，“危险在上面”，“四不清”不只下面有根子，上面也有根子。一些省、市的同志还在讨论中提出，不但城市“五反”要重新“划阶级”，农村“四清”也应像过去老区搞土改那样“搬石头”。显然，“四清”运动中的阶级斗争，又要升温了。

会后，中央决定由刘少奇同志挂帅，建立“四清”“五反”指挥部，并负责修改“后十条”。少奇同志坐镇指挥以后的“四清”运动，内容范围扩大了，包括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所以称之为“大四清”，而将此前的农村“四清”称之为“小四清”。“大四清”的基本路子，就是不久之后由中央转发的王光美同志在河北桃园大队蹲点搞“四清”的经验总结，即《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大家称之为“桃园经验”。

为了传达贯彻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精神，我主持省委常委会议，研究确定召开省委四届四次全会。会议于7月2日开始，6日扩大到县委书记。7日，我向全体到会同志原原本本传达了毛主席、刘少奇同志关于防止“和平演变”、反对修正主义、搞好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讲话和邓小平、彭真等中央领导同志的发言。会议结合江苏实际情况，对如何贯

彻落实中央工作会议精神作了深入讨论，作出了进一步深入开展农村“四清”和城市“五反”的部署。

省委四届四次扩大会议召开之时，适逢刘少奇同志来南方视察“四清”运动。当少奇同志到济南时，华东局曾派魏文伯同志专程前往迎接，然后陪他到安徽。在刘少奇同志一行抵达合肥后，魏文伯同志来电话向我和省委打招呼。一个总的精神是，刘少奇同志对前一段“四清”运动很不满意。魏文伯同志在电话里说：“渭清同志，你要小心！这次少奇同志脾气大得很。他在山东已经发了脾气，到合肥发了大脾气。”提醒我要有思想准备，要在刘少奇同志到南京后“注意”。

7 月 14 日，刘少奇同志到了南京。少奇同志这次来南京，没有住招待所，而是住在省委办公大楼，在办公室里临时搭了个铺。当天下午，我和在家的李士英、彭冲等省委负责同志向他汇报工作。主要由我汇报传达贯彻中央工作会议精神，部署农村“四清”和城市“五反”的情况，并向他送了《城市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情况》、《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情况》等书面材料和省委四届四次扩大会议的简报。在我汇报时，刘少奇同志曾有许多插话，省委办公厅专门整理了《少奇同志在听取江渭清同志汇报时的谈话》记录。接着，刘少奇同志亲临省委四届四次扩大会议，分别于 7 月 15 日和 17 日作了两个下午的讲话，我们也都整理成记录，印发省委和其他到会同志学习。

刘少奇同志讲话，有些是谈工作问题，如阐述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提出各级党委都要重视培养接班人，大胆选拔年轻干部，包括知识分子干部等。他在讲话中还强

调“发展生产是我们的主要目标”，指出：我们共产党人领导各族人民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过去搞土改，现在搞社会主义教育，目的都是为了发展生产。这些都是很对的。他讲话的中心是阐述为什么要搞社会主义教育。他认为，现在，不仅国际上出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而且国内也出了不少“修正主义”。农村“四清”、城市“五反”，就是把国际上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同我们国内“反修防修”的斗争联系起来。从这个基本精神出发，他在几次讲话中对当时城乡社会主义教育，包括我们江苏的“四清”运动，提出了批评。归结起来，集中在三个估计上：一是对“大约三分之一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的估计，他认为，“也许不止三分之一”，有些地（市）、县领导同志没有调查，不了解实际情况，就说没有那么多，这是对“和平演变”、“资本主义复辟”警惕性不高，是很危险的。二是对干部队伍状况的估计。他认为，“真正有严重问题的”、“四不清”的，占基层干部的多数，不是少数；没有多少问题的、可靠的、团结了95%群众的干部很少，不是多数；因此，如何认识对基层干部“又依靠又不依靠”的关系，应该是“靠得住就靠，不可靠就不靠”，而且“要等基层干部改变了，再来依靠”。三是对运动情况的估计，他认为，社会主义教育已经搞了一年多，“农村、城市都没有搞好”。这个革命运动比土改、合作化、公私合营更广泛、更深刻、更复杂，因此没有充分时间不行。

刘少奇同志在讲话中向大家透风，“后十条”要修改。他反复强调只有团结95%群众，才能团结95%干部。要放手发动群众。群众尚未发动，先交代具体政策，就会变成束缚

群众手脚的“框框”。他指出:“四不清”不光是经济方面的,还有政治“四不清”、思想“四不清”、组织“四不清”。所以,“四清”不只清经济,还要清政治、清思想、清组织,这就比较全面包括了“大四清”的内容。他再次强调,要“追根子”,认为生产队有严重问题,一定是大队有人保护。大队有严重问题,一定是公社有人保护。公社有严重问题,一定是县委、地委有人保护。地委有严重问题,一定是省里、中央有人。工厂、机关也一样。处长有严重问题,一定有部长保护。“四不清”的根子在上面,不可不追。

刘少奇同志针对在场的省、地(市)、县几级领导干部,严厉批评了许多领导同志浮在上面,不蹲点,就是下去也是“面上跑跑,听听汇报,指示指示”。(我插话说:是“蜻蜓点水”。)他反复强调,农村“四清”、城市“五反”,各级领导都要蹲点。他还认为:现在情况变了,搞调查研究,光靠开调查会不行了,只有领导亲自带工作队,蹲到点上去,直接掌握运动,才能取得第一手材料和经验。他又说:你当书记的,生病也生得,休息也休得,离职学习也离得,甚至死也死得,为什么离开自己职务蹲半年点就不行?要求省、地、县三级领导都要分期分批,轮流下去蹲点,并提出:省、地(市)、县委书记以及其他负责人,都要参加两批农村“四清”,搞两个大队,从扎根串联到整顿组织,取得比较完整的经验。还要参加两批城市“五反”,搞两个单位的运动。有了两个大队、两个工厂的经验,才有资格当省委书记、地(市)委书记、县委书记。

刘少奇同志是我们尊敬的领导人。我个人在抗日战争

时期，就亲聆过他的教诲。我至今仍然认为，他批评我们有些同志进城以后满足于听汇报、看报表、不调查、不研究，是很中肯的。他提醒各级领导，都要下决心，蹲下去，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在蹲点中取得对各方面工作的第一手材料和领导运动的直接经验，也是非常必要的。按照刘少奇同志的这些指示精神，我们省委常委很快作出分期分批下去蹲点的安排，并要求县委书记以上领导干部都要在一两年内经过蹲点，取得比较完整的经验。省委确定我和许家屯、彭冲及省级各部门48名负责人，第一批下去蹲点，接着下去蹲点的省委常委，还有宫维桢、辛少波、欧阳惠林、曾如清等同志。除彭冲同志分管工业和城市“五反”，蹲在南京307厂以外，其他省委领导同志均到农村。那时，我化名“江淮”，以普通社教工作队员的身份，蹲在句容县天王公社蔡巷大队一个姓陈的下中农家里。随同我在蔡巷大队蹲点的，有欧阳惠林等同志。

但是，在刘少奇同志几次讲话中，对于城乡阶级斗争状况所作的估计，特别是“不止三分之一单位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的估计，超过了毛主席关于全国有三分之一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的估计。对毛主席的估计，我已觉得过头了，对少奇同志的估计，我认为显然更过于严重。对于基层干部状况和社会主义教育成绩的估计，以及“桃园经验”中撇开基层干部搞“扎根串联”、“访贫问苦”的一套做法，我也有不同看法，或者持保留态度。记得在刘少奇同志7月17日下午讲话以后，我曾向他当面直言了自己的看法。

我讲了学习他讲话的体会，对他所说城乡社会主义教

育都没有搞好，我认为江苏不是这个情况。少奇同志说：过去一年多，“小四清”打了败仗嘛！我说：不能这么讲。据我们了解，已经开展社会主义教育的社队，60%打了胜仗，是有成绩的；30%比较一般，成绩不够显著；只有10%不够好，需要补课，或者要重搞。

我对他讲话中所说好的、没有“四不清”问题的基层干部是少数，公社、大队干部大部分烂掉了，也讲了不同看法。我说：基层干部多数是好的、比较好的，江苏没有发现烂掉的社、队领导班子。少奇同志说：你这是没有下去，不知道实际，讲的还是三年前老情况。我回答说：我经常下去，对本省情况是知道的。毛主席也说干部的大多数是好的、比较好的。

少奇同志打断我的话，问我对王光美同志向参加省委四届四次扩大会议的同志所作的关于“桃园经验”的报告有什么看法。这是因为，王光美同志作报告时，我没有到会，请了省委其他常委主持会议，可能少奇同志认为这是对“桃园经验”重视不够。特别是“桃园经验”基本的一条，是认为社、队干部烂掉了，有的是“和平演变”变过去的，有的本来就是地、富、反、坏，都不能靠。所以，他听我讲干部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就很反感，并进而问我：究竟赞成不赞成王光美同志的报告？我说：从江苏的实际出发，学习精神实质。符合江苏情况的，就学习运用；如果不符合江苏情况，就不照搬。少奇同志说：那你们江苏就不执行了？我说：不盲目执行。

当时，刘少奇同志听我讲了看法并未发脾气。第二天晚

上，临他离开南京前夕，我偕同我爱人徐敏，去看望他和王光美同志。少奇同志与我个别交谈，严肃地说：你昨天讲的那三个不同意见(即农村“四清”、城市“五反”是有成绩的，基层干部多数是好的，对王光美同志的报告不能盲目执行)，是不对的。我坚持原来的看法，这就引起了“顶撞”，少奇同志发了脾气。

尽管发生了“顶撞”，我和省委仍然十分重视少奇同志对江苏“四清”和其他各项工作的指示。我在会议结束时的讲话中，对搞好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除了贯彻中央“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加强领导、整顿队伍、缩短战线、适当延长时间等指示精神以外，特别强调要按照刘少奇同志的讲话精神，省、地(市)、县各级领导都要下去蹲点。对我们过去没有很好地蹲点，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强调：少奇同志对我们不蹲点的批评，“一针见血”、“十分正确”，并检查了所以不蹲点的根本原因，是由于怕艰苦。同时，从江苏实际情况出发，对如何传达贯彻中央工作会议精神和少奇同志几次讲话精神，也向大家作了交代。主要是：关于“三分之一单位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的问题，对基层干部“又依靠又不依靠”的问题和“搬石头”的问题，应由县以上领导掌握，对下不传达。我们认为，这样做，有利于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稳步健康开展。

五　刘少奇同志的一封信

但是，事情并没有完。刘少奇同志对包括我在内的，从中央到地方许多领导同志不蹲点的批评，还只是开头。

刘少奇同志离开江苏以后，我们即于7月27日专门召开地、市委书记会议，按照少奇同志的讲话精神，部署第二批农村“四清”的结束工作，并于8月15日、19日，省委相继发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部署的意见》和《关于在城市全民企业中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意见》。作出这些安排之后，我于8月下旬赴京参加中央召开的会议。这是个小型座谈会，有六个大区的书记和江苏等八个省委的负责同志，共14人参加。会议只开了四天，主要议题有两个：

一是讨论修改“后十条”，刘少奇同志7月视察南方几省“四清”途中，主持修改了“后十条”。毛主席将修改稿批印给参加会议的同志，要求大家提出“再修改”的意见。其中最重要的修改，是补充了毛主席提出的衡量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搞得好不好的六条标准。同时，再修改稿也将少奇同志在南京讲的一些重要观点，作为具体的政策规定写进去了，如领导干部要亲自带工作队蹲点，要把放手发动群众放在第一位；团结95%群众是团结95%干部的基础；整个运动都要由工作队领导，等等。

二是讨论研究关于运动的部署。会议明确提出了“集中

力量打歼灭战”的原则。按照少奇同志的提法，这次运动要上下左右一道解决，所有根子都要挖出来，所以要“彻底革命”，非集中力量打歼灭战不可。座谈中，少奇同志还提出“反右倾”的问题。他说：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我们有些同志怕干部躺倒不干，怕影响生产，东也怕，西也怕，就是不怕“修正主义”，不怕“和平演变”，不怕脱离群众。这是个什么问题？本质是什么？他要我回江苏以后，同省委常委同志一起想一想，讨论一下。他又说：前几年“宁左勿右”，现在又“宁右勿左”，这对运动的阻碍相当大。他特别提到涟水县高沟公社的问题，那里曾发生原来的社、队干部对“四清”运动中新的领导骨干和积极分子“打击报复”，“反攻倒算”。这就是省委四届四次扩大会议揭发的所谓“高沟事件”，除发了会议简报以外，当时的淮阴地委书记张景良同志还就此事在会上作了专题发言，受到少奇同志赞赏。7 月 29 日，王光美同志曾打电话给我，传达少奇同志对“高沟事件”的指示：这是一起“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性质的现行反革命事件”。这次中央召开的座谈会上，少奇同志重申对“高沟事件”要作“现行反革命处理”，要以此为典型追上面的“根子”。

鉴于此次座谈会议十分重要，时间又较短，我于 8 月 28 日会议开始以后，就打电话向省委通报会议的主要精神，传达中央对“后十条”所作的修改补充，同时要求省委转告各地、市委，要按照“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原则，重新调整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部署。

但是，就在此时，刘少奇同志找我个别谈话，说他看到

“江苏的一个通知”，要“学习江渭清同志的讲话”，问我：“为什么不学中央、毛主席的指示，要学江渭清的?”显然，这是对我和省委极为严肃，也是极为严重的批评。我回答说，不晓得有这样一个文件，待我请省委查一查。经查，在省委办公厅7月28日拟发的《关于善始善终搞好第二批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通知》开头，确有要“各级党委和工作队，都要认真学习和研究这篇讲话”(即7月27日我在地、市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当时正在北京开会的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曾连打了三个电话给我，要我非作检讨不可。我觉得，这个通知是省委办公厅拟发的，我和书记处其他同志事先均未具体过问，不好直接检讨，便叫随我赴京开会的秘书打电话给省委办公厅，指出：“通知”“要认真学习江渭清同志在地、市委书记会议上一篇重要讲话，这是一个严重的政治性错误”，应该强调认真学习中央工作会议精神和毛主席、刘少奇同志以及其他中央负责同志的指示，而江渭清同志讲话中对全省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部署意见，只能作研究参考。电话责成省委办公厅立即转告地、市、县委，把这个“通知”作废。今后任何时候，都要认真学习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因为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任务，都是中央制定的。

9月1日，省委办公厅发出《关于在〈关于善始善终搞好第二批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通知〉中所犯错误的检查》，按照我在电话中的意见，检查了“这是一个严重的政治性错误”，检讨了未经我和书记处同意和审批，擅自拟发通知，这是一种“无组织无纪律的错误行为”。其实，省委办公

厅作为省委的一个办事机构，是完全有权力发这样的通知的，不存在“擅自”的问题。这是在当时非常特殊的情况下，才作出了这样的处理，总算对这件事作了一个交代。

9月5日，我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议，传达中央座谈会精神和毛主席、刘少奇同志的讲话，并决定召开省委四届五次全会。大家按照少奇同志对我们没有认真蹲点的批评和要我们保持清醒头脑的指示，检查了我们几年来对党中央、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指示“跟得不快，跟得不紧，跟得不好”，对怎样进行“新形势下的阶级斗争认识不高”，决心“彻底批判和克服右倾思想”，把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行到底。

9月7日至13日，我们召开了由各地、市委书记参加的省委四届五次全会。我在会议开头作了8月中央座谈会精神的传达报告。会议过程中，我主持召开了一次省委常委会，根据毛主席和少奇同志的指示精神，专门检查了我们对一年来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存在着“成绩估计过高，时间要求过急”；对干部队伍内部受封建主义、资产阶级的腐蚀和资本主义势力的影响估计不足，对运动中充分发动群众的认识不够；怕运动时间过长，大批撤换基层干部会影响生产等“右倾思想”。为着更集中时间和精力在下面蹲点，我提出并经常委会同意，在我蹲点期间，第一书记职务由书记处书记陈光同志代理。会议结束时，我又结合代表们在讨论中提出的问题作了结束讲话，比较详尽地分析了全省农村第一、二两批“四清”运动和城市“五反”运动的情况和问题，提出在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贯彻执行“集中力量打歼灭

战”的方针和部署。

会议结束以后，省委发出了《关于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部署的报告》。这个报告，曾上报中央、华东局并发各地、市、县委，实际上是省委四届五次全会的决议，强调只有贯彻执行“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方针和部署，才能集中工作队的力量，加强领导，像少奇同志要求的那样，比较快地取得全面、系统的经验，“使农村城镇，各行各业，上上下下，里里外外，统一部署，全部解决，消灭死角，无一遗漏”，达到毛主席提出的搞好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六项标准。为此，全会决定对全省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部署，加以重新调整，要求从当年秋冬起，农村每个专区集中搞好一个县，全省搞好七个县(即新沂、涟水、大丰、邗江、海安、句容、太仓)，在一个县范围内，分批开展运动。在省辖市，首先集中力量把主要行业与产业的运动分批搞好，其余企事业和街道居民，以区为单位开展运动。为要“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必须组织强大的工作队。全省组织一支6万人左右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工作队和一支2万人左右的城市社会主义教育工作队，以后随运动的深入发展，逐步壮大这支队伍。要求机关干部除老弱病残和其他不适宜参加工作队的人员以外，区以上机关按三分之一、公社按五分之一、企事业单位按10～15%的比例抽调。另外，选拔一批优秀的农村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回乡职工以及城市企事业工人和不脱产干部参加工作队。工作队要以开展运动的县、市为单位建立团部，由所在地区的地委书记担任团长。省委抽调7个常委(其中4个书记)和65个部委、厅局长以上干部下去蹲点，其中少

数人担任工作团副团长。与此同时，省委决定成立“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办公室”和“城市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办公室”，协助省委掌握运动情况，研究有关政策，处理日常工作。

为着认真贯彻中央、毛主席的指示，诚恳接受刘少奇同志对我们的批评教育，省委四届五次会议开始以后，我于9月8日以个人名义给刘少奇同志写了封信，向他报告了全会召开的情况、全省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部署，以及根据他的指示，正在讨论对“高沟事件”的处理；同时，再次检讨了省委办公厅通知要各地、市、县委学习我的一篇讲话，是个严重的错误，并由我承担了领导责任。

我的上述信件和省委关于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部署的报告相继发出以后，刘少奇同志于9月30日给我写了一封信，开宗明义，严肃批评我给他信中关于“在任何时候、任何问题上，我们都必须学习中央、毛主席及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指示，否则，将犯更大的错误”等说法，“不完全正确”，是出于对他在北京与我谈话的“某种误解”。由此，提出了“我们应当向谁学习的问题”，并列举当时中央批转各地学习解放军的政治工作、学习大庆油田的建设经验和王光美同志的“桃园经验”等，指出“我们的原则，是向一切有真理的人学习”。信中还说：你是中央候补委员，大区书记之一，又是省委第一书记，职位也是很高的。为什么要各地、市、县委学习你的一篇讲话，就是“严重错误”呢？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这篇讲话的内容是不是值得各级干部学习。他认为，我的这篇讲话是“不值得学习”的，“基本上是一篇教条

主义的讲话"。其实,少奇同志所以给我写这封复信,并不仅限于批评"教条主义"。根本的原因,是在于他认为,包括我本人在内的省委领导和江苏许多地、县委的负责人,"都已经严重地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因而在领导工作中,"就不能不犯主观主义的错误"。他在复信中重提,8月中央座谈会期间同我的谈话,说:

> 我和你在北京的那次谈话中,我向你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我说:你在抗战时期就是在江苏打游击的,解放以后,你一直在江苏工作,从前你作省委副书记,以后作省委第一书记,也有许多年了。我问你:你了解江苏的情况,是比十年前更多了,还是比十年以前更少了呢?毛主席说,我们有些干部"高官厚禄,养尊处优,骄傲自满,固步自封",你和江苏的许多同志是不是除外的呢?对于第二个问题,你当时就回答,你和江苏的同志不能除外。对于第一个问题你当时不好回答我,在我作了进一步的解释之后,你最后也承认,你对于江苏社会上当前的许多重要情况,特别是当前阶级斗争的情况,比十年以前是了解得更少了,而不是更多。严重的问题就在这里。

复信联系当时正在开展的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还写道:

> 你了解本省的情况,很多是老的情况,大部分已经过去了。你对于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的新的社会、政治、经济、思想和党本身的当前的情况,并

不是了解很多，而是很少，或是了解得错了。你实际上比过去了解当时的情况更少了，但是你自以为比过去多了。对于外省的先进的经验也觉得没有十分必要去认真学习。因此就骄傲自满，固步自封。你们必须重新了解本省的情况，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才能进行当前的革命斗争。

少奇同志在信中认为，"这个问题不仅是你们那里有，中央许多部门，许多负责同志，许多省、市、自治区党委，地委、县委的负责同志不同程度都有这个问题。"于是，他通过这封信，将7月份在南京讲话时就提到过的"到底是你们省委、地委、县委领导基层干部更多一些，还是基层干部领导你们更多一些呢？"这样一个问题，重新提了出来，并且认为"是基层干部领导你们更多一些，而且是那些不大好的基层干部领导你们更多一些"，"你们常委是接受一些不好的基层干部的包围和领导"。他还以亲自主持修改"后十条"为例，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下决心长期下去蹲点"，要"直接地去接近群众"，倾听多数群众特别是贫下中农的呼声，而不是只听基层干部的汇报。按照信中的说法，这样做，"就可以解决框框问题，即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问题"；不这样做，"则官越大，真理越少，官做得越久，真理也越少"。

少奇同志最后要求，把他这封信"送给江苏省委常委各同志阅读，并在适当的时候在省委会议上讨论一下"，提出意见，然后将讨论情况向他报告。

我接到刘少奇同志这封信，感到问题越来越复杂，越来越严重。立即召开省委常委会议，原原本本宣读了这封信，

并表态接受少奇同志的批评，要求常委同志联系我的思想作风和工作开展批评，并遵照少奇同志信中所嘱，建议将此信扩大印发省委各委员、省委各部委、省人委各厅局党组和地、市、县委常委同志学习和讨论，对我提出批评和意见。省委常委会认为，“少奇同志的批评，不只是对江渭清同志个人的，同样也是对省委所有常委同志和各级许多领导干部的”，一致同意我的建议。10月15日，省委发出《印发刘少奇同志答江渭清同志的一封信》的文件。16日，省委常委正式开始学习少奇同志的信。20日，中央发出《关于认真讨论刘少奇同志答江渭清同志的一封信的指示》，批转省委印发的少奇同志这封信及附件(包括我给少奇同志的信)。在此期间，中央还批转了《李雪峰同志给少奇同志的信》，要求在“四清”运动中开展“反右倾”。省委即于10月19日至26日，召开地、市委书记和社教工作团正、副团长参加的常委扩大会议，讨论贯彻“反右倾”精神。28日，省委常委会复会，学习和讨论少奇同志的信。我在会上作了检查。常委同志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

省委常委会议结束以后，我于11月12日向刘少奇同志写信报告了学习和讨论他这封信的情况，附报了我在省委常委会上的检查。16日，少奇同志给我复信，认为“态度是好的”，“检查还不深刻”，再次希望我和省委其他同志，“凡能够蹲点的都去认真蹲点”，并要求在“蹲完一期点，取得了一些经验之后”，再开常委会，进行学习和检查，以便提高认识，“逐步克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状态”。

为贯彻刘少奇同志的这些指示精神，省委于11月18

日在向中央、华东局上报《中共江苏省委常委学习讨论〈刘少奇同志答江渭清同志的一封信〉的报告》的同时，向县委以上各级党委发出了这份“报告”和我在省委常委会上的检查，要求县委以上的领导干部继续学习和讨论少奇同志的这封信，对我和省委其他同志提出批评。

这就是曾经转发全党，并对江苏和全国“四清”运动有过相当影响的《刘少奇同志答江渭清同志一封信》的主要内容和大致经过。

六　贯彻“二十三条”

那么，刘少奇同志在给我的第二次复信中，为什么既肯定我“态度是好的”，又认为“检查还不深刻”呢？

这是因为，我在省委常委会上作的“初步检查”中，虽然表示“毫无保留地接受少奇同志的批评”，但只是一般地检查了5月中央工作会议以后，“特别是7月少奇同志来南京作了极为重要的指示以后，自己对于中央、主席和少奇同志的指示接受不快，领会不深、不全，没有在实际工作中迅速地、全面地反映出来。”具体来说，表示“接受”这样几个方面的批评：一是对全省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成绩和经验，估计有错误。省、地、县三级领导干部未能认真蹲点，自始至终把一个点里的运动搞完，结果，“不了解情况，自以为了解情况；没有经验，自以为有经验；搞失败了，自以为有成绩”。

二是对运动的部署有错误。第二批运动基本没有搞开，我们却要“善始善终”结束。结果就不能像刘少奇同志指示的那样，把重点放在如何重新了解情况，重新发动群众，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重新进行试点，重新取得经验，把运动重新搞起来；而是把重点放在如何结束第二批运动，“舍不得重新部署”。这实际上是要“自己另搞一套”。三是对运动中的突出问题，如涟水“高沟事件”，“认识不鲜明、不坚定，措施不果断，处理抓得不紧”，没有像少奇同志指示的那样，坚定地明确地指出这是严重的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性质的现行反革命事件，因而在对此事的批语中“含糊不清”，说成是“客观上纵容包庇了坏人坏事”，“实质上是反对社会主义”，没有着重地强调放手发动群众，大张旗鼓地镇压现行反革命的破坏活动，也没有明确指出要追查上面的根子。四是8月中央座谈会以后，我虽然在省委常委会和省委四届五次全会上，传达了少奇同志在北京与我谈话的主要内容，但没有认真贯彻他反复强调的“反右倾”精神，特别是“没有很好联系本省实际情况，进行分析，没有真正认识到右倾思想是当前党内的主要危险”。

我的上述表态和检查，得到了省委常委的一致赞同。省委还按照我检查的几条，向中央、华东局作了学习少奇同志一封信和贯彻“反右倾”精神的检查报告。当时，除由华东局派夏征农同志前来参加省委常委会议以外，中央还派了薛暮桥、张彦两同志来江苏检查和指导“四清”运动，并曾写信批评我和省委的检查“笼统”、“一般化”，没有“把认真讨论少奇同志答江渭清同志的信同反右倾结合起来”，没有“抓

住省委在指导运动中的一些突出的错误事件进行分析和解剖”，没有“对省委过去提出的一些错误的条条杠杠进行系统的批判”，一句话，省委没有“主动揭盖子”。这也正是刘少奇同志所以要我下去蹲点一段时间以后，再认识和检查“错误”的原因所在。

就在刘少奇同志给我第二次复信一个月以后，即 1964 年 12 月，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隆重开幕，刘少奇当选为国家主席。在此期间，举行了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全国工作会议。

如前所述，8 月中央座谈会结束后，我就到句容蔡巷大队蹲点了。那时，省委组织了社教工作团，由省委常委欧阳惠林担任团长，宫维桢、胡宏等同志都曾参加过工作团的工作。省委的日常活动，包括书记处的一些会议，就由省委其他同志来蔡巷与我沟通或交换意见。可能由于我在蹲点的缘故，这次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全国工作会议，各大区书记、省委书记，华东地区包括魏文伯、谭启龙、江华等同志，都到会了，但未通知我参加，准备由陈毅同志到华东来向我传达。后来是会议开始时，毛主席叫通知我赶到北京参加会议的。

会议于 12 月 15 日正式开始。主要议题是，讨论和研究全国“四清”运动，特别是贯彻“双十条”以后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1965 年 1 月 14 日通过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全国工作会议讨论纪要》。这个文件，就是由中共中央印发，一直张贴到城乡基层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共分 23 题，所以简称“二十三条”。并明

确规定,“上述各条,原则上也适用于城市的四清运动”(从此不再称城市“五反”)。过去的中央文件,包括“双十条”在内,凡与“二十三条”有抵触的,一律以“二十三条”为准。这样,“二十三条”就成为指导全国城乡“四清”运动的纲领性文件。

会议期间,毛主席曾找我谈话,问到刘少奇同志对我批评,检讨了没有?我回答说开始不检讨。少奇同志给我写信以后,作了检讨,但不深刻,还要再检讨。

毛主席听我这么说,就以他惯有的幽默口吻,说:没有什么了不起,就是这么回事。你感到批评对的,就检讨;不对的,就申诉;申诉还解决不了,就等历史作结论。

毛主席还曾当着我和刘少奇同志的面,说:“少奇同志给你的一封信,是错误的。你的意见是对的,少奇意见是错的。”

尽管毛主席给我平了反,我和省委其他领导同志,还是一如既往地尊重少奇同志,认真地对待少奇同志对我们的批评,用以鞭策自己,改进工作。直到1965年11月16日,毛主席来江苏视察战备和全省工作,找我和陈光同志谈话时,我们汇报了要按照毛主席关于反对固步自封、骄傲自满的指示和少奇同志答复我的一封信的精神,进一步检查省委的思想作风。他老人家听了惊讶地问:“你们还要作检讨?”我诚恳地回答说:“主席的指示,少奇同志对我的批评,给我教育很大,每检讨一次就有一次收获。”毛主席说:好嘛,你们就检讨嘛!接着他叮嘱:检讨也要“一分为二”,不要说得一无是处。

检讨也要“一分为二”，显然是针对少奇同志的批评信而言的。再回过头看当时，在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全国工作会议讨论和制定“二十三条”的过程中，最为大家关注的，就是关于“四清”中提出的矛盾性质和运动的搞法，由此暴露了毛主席与刘少奇同志之间存在着严重意见分歧。毛主席曾对少奇同志指导“四清”的一些提法和做法，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不过，我们各省工作的多数同志是从搞好“四清”运动的正面意义上理解毛主席的批评，学习毛主席提出并被写进了“二十三条”的那些重要提法和意见的。例如，关于矛盾的性质，不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而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我们在思想上是赞同的。对于首次出现于“二十三条”的“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们当时只认为主要是针对城乡基层那些“四不清”干部说的，没有也不可能料想到沿着这个思路竟会导致产生“文化大革命”那样严重的灾难性后果！

我从北京返回以后，立即召开了省委工作会议，传达贯彻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全国工作会议精神。1 月 22 日，我在省委工作会议结束讲话中，结合自己参加会议的感受和学习“二十三条”的体会，从江苏实际情况出发，“一分为二”地分析了形势，明确指出：不能因为城乡“四清”运动中揭发了严重的阶级斗争，而否定当前大好形势。全省工农业生产、财贸市场的情况，都大大好于“四清”开始时的 1962 年。在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大批领导干部下乡下厂蹲点，坚持“四清”“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发扬了我党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促进了各级干部作风的转变，“四清”运

动的成绩是显著的。这就在广大干部中,澄清了刘少奇同志来南京讲话和给我的一封信以后,在对形势和"四清"成败估计上的一些混乱认识。

根据"二十三条"的精神,我还对"讨论少奇同志一封信"和贯彻"反右倾"精神以后全省城乡"四清"运动出现的问题,作了自我批评。首先强调对"四清"运动的性质,应统一到"二十三条"的提法上来。我在蔡巷蹲点期间,工作队曾参照中央批转广东省委的一个报告,提出"四清"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农村中正在形成的特权阶层同广大群众,特别是贫下中农的矛盾"。这是错误的,事实上并无这样一个"阶层"。这样提法,容易混淆矛盾的性质,扩大打击面,应予纠正。

第二,关于干部问题。我强调指出,如何正确估计基层干部状况和如何正确对待基层干部,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对他们肯定一切和否定一切,都是片面的,不对的。必须按照"二十三条","一分为二"地全面看待干部,肯定干部的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不能把他们说成"漆黑一团"、"一无是处"。即使对犯有"四不清"错误的干部,也要实行党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一贯方针,重在说服教育,讲究批评的方式方法,退赔和处理要"合情合理合法"。

第三,关于工作方法,要求所有"四清"工作队,必须坚持走群众路线,依靠"两个大多数"(即群众大多数和干部大多数)。对"扎根串联"的那套做法,明确提出了不同意的看法。我认为,"搞扎根串联,只在少数人中间转圈子,丢掉了大多数,这是一种神秘化的冷冷清清的做法"。只靠少数人

在上面发号施令，而不是通过“四清”运动发现和培养积极分子，形成基层领导核心，这是不可取的，不能再这样搞了。

第四，关于“集中力量打歼灭战”。我认为，贯彻“打歼灭战”的原则是一回事，“集中力量”过多是另一回事。当时，省、地、县派出工作队已达7万多人。如此“大兵团”集中在少数几个县“打歼灭战”，显然是搞绝对化了，并讲了省委对集中过多的城乡“四清”工作队，作适当调整的意见。

最后，我还对省、地、县各级的领导方法，提出了要求，这就是点与面要兼顾，抓好面上的工作。“二十三条”指出，全国范围内，“四清”运动重点以外的面占绝大多数。江苏也是这样，开展“四清”的重点县只有7个，90%的县都还没有开展“四清”。做好面上的工作，这是决定全局的。我重申“四清”运动要自始至终抓生产，要通过“四清”使工农业生产和其他各项工作都得到进一步发展。各级领导干部，除蹲好一个点以外，必须加强对面上工作的领导。

省委工作会议结束以后，我就前往蔡巷，听取了句容社教工作团举办骨干训练班的汇报。在训练班上，我讲了学习“二十三条”的体会，特别是对“四清”的标准问题、干部问题、工作方针和领导方法问题、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等问题，结合实际，讲了我的看法。我强调一定要坚持按照“二十三条”规定的六条标准检查“四清”是否达到了要求，缺一条都不行。我最担心的始终是“四清”后增产还是减产，这是个硬杠子、实杠子，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任何大话空话都掩盖不了，所以感到压力很大。我再三告诫大家务必把生产抓得很紧很紧。再一个重要问题是“一分为二”看干部。对他们的

错误要凭事实说话，既不缩小也不扩大，实事求是地作具体分析。我举例说，基层干部在办食堂时搞强迫命令，群众意见很大。实际上，食堂是我们叫办的，强迫命令是上面瞎指挥引起的，就不能怪基层干部。诸如此类的问题，要分析其根源，领导上要恰如其分地挑担子。对犯有错误的干部，要注重说服教育，前阶段“反右倾”，有人提意见，说我江渭清要求对犯错误的干部“一次说服不了，两次；两次说服不了，三次、四次”，这是“右”。还说我江渭清右倾的根子，主要是因为思想上有个“换思想不换人”的“框框”。我说，不说服教育，光压光打，行不行？不帮助改造思想，把所有的人都换掉，行不行？所以，不仅要正确估计干部队伍状况，还要正确对待干部，包括犯有轻重不等错误的干部。否则，就会犯扩大化的错误。

我在讲话中再次本着自我批评的精神，对在句容县和蔡巷大队“四清”中曾贯彻中央批转的“桃园经验”，搞“扎根串联”，作了检查。说明那种做法是土改时提出来的，那时候在贫雇农中扎根串联，是为着反对地主。今天如果只讲在贫下中农中扎根串联，那就只能是反对我们的干部了。结果，不仅把基层干部撇到了一边，往上延伸，就会连地委书记、县委书记都不敢靠了。这样搞下去，势必上下之间、同志之间互相不信任。所以，“二十三条”不提“扎根串联”，强调要走群众路线，要依靠群众大多数和干部大多数，包括犯错误的干部。还有运动中“查三代”，如果查下去，不光机关干部，就连贫下中农也没有几个“纯”的了。

我还结合讲了领导方法，指出各级领导干部蹲点，要同

调查研究结合起来。还要注意点面结合，个别与一般相结合，领导与群众相结合。要坚持唯物论的反映论，端正思想方法，克服绝对化、片面性、形而上学；有右反右，有左反左。对前阶段“四清”中出现的缺点和问题，要由领导上首先是我承担责任。

在省委工作会议以后，市、县各级也召开相应会议，宣传贯彻“二十三条”。3月初，省委向中央、华东局作了《关于各县召开四级干部会议学习“二十三条”的情况报告》。4月中、下旬，省委召集在江苏蹲点的中央、华东局机关和军队的负责同志，各社教工作团长，各地、市委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总结了农村“四清”运动的基本情况，以及取得的成绩和体会，并按照“二十三条”的精神，对今后的运动提出了原则意见。总的要求是，坚持六条标准，争取搞得快一些，打算再用大约三四年时间，分期分批搞完全省农村“四清”。为此，我们重新提出了要既好且快地开展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要求。到1965年7月底8月初，全省有7个县、88个公社、12个县属镇和徐州、南京等市的323个单位，结束“四清”。接着新的一批开展“四清”，有14个县(包括上批未搞完的6个县)，7个市的郊区，251个公社、17个县属镇。已经结束和这一批新开展“四清”的县市，共占全省总县数的23%，11个市同时开展城市“四清”，共850个单位，37万职工，占全省职工总数的35%。

1965年11月4日至12月6日，省委召开四届七次扩大会议，我在会上传达了中央工作会议精神，要求总结三年以来的工作，正式提出“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口号，

并传达了中央书记处指示，“四清”运动必须坚决地、认真地搞好。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由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自己决定。接着，于12月10日至16日召开了中共江苏省四届代表大会三次会议。我在大会结束时的讲话中，对当时刚刚提出的所谓“突出政治”，讲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必须落实到贯彻“二十三条”，搞好城乡社会主义教育，抓好当前生产上。重申各级干部和社教工作队员，都必须抓生产，大忙时一定要以生产为中心。

江苏“四清”运动后期在“二十三条”的指导下，纠正了某些“左”的错误做法，这是得人心的。但总的来说，“四清”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下开展的，消极因素还是很多的。所好的是我们在运动领导的掌握上，始终强调“运动、生产两不误”，从省到县建立了抓运动和抓生产的两套班子。所以，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为止的几年时间内，全省工农业生产和其他各项建设事业，一直保持良好发展的势头。

第八章 “文化大革命”的狂潮恶浪

一 省委在“文革”前夕的几项主要工作

1966年，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实施。我们结合江苏省实际情况，在总结执行前两个五年计划经验的基础上，从年初起，就为实现“三五”计划的各项主要目标，作了精心的组织和安排。

当时，毛主席曾对“三五”计划提出三条：第一，要为老百姓生活着想；第二，要准备打仗；第三，还要考虑可能出现的灾荒。概括起来，就是“备战、备荒、为人民”。我们遵循党中央、毛主席关于“三五”计划的指示精神，在指导思想上，首先是继续加强农业这个基础，进一步搞好农业，解决城乡人民的“吃穿用”；同时着手调整工业布局，展开三线建设，加强战备工作。这都是从国际、国内形势出发，完全应顺民心的，得到了广大干部、群众的热烈拥护。

上述基本精神，我在当年1月11日至16日召开的中共江苏省军区第四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讲话中，作了

详细的阐述。讲话回顾了1962年以来，工农业生产在调整中稳步发展。特别是农业，连续四年获得好收成。1965年，江苏部分地区遭受了严重的旱涝灾害，粮食产量仍达260亿斤，比丰收的1964年增长4.2%；棉花产量约500万担，超过历史上较好年份的水平。据当时统计，全省有20个县(市)的粮食亩产超过农业发展纲要指标；两个专区、12个县(市)棉花超过农业发展纲要指标。虽然从发展的眼光来看，农业生产还不稳定，抗灾能力不强；工业、交通、基本建设还有不少薄弱环节；但只要在已有基础上充分发挥有利条件，正视前进中的问题，克服工作中的缺点，我们对搞好“三五”计划的建设，是充满信心的。

为了探索“三五”期间江苏农业发展的新路子，在我主持下，认真贯彻毛主席“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指示精神，曾组织了农村干部、农业科技专家深入苏南、苏北各地农村，进行调查研究，吸取各地农业增产经验。例如苏州地区建立农业“大样板”，实行“四种田”(革命种田、科学种田、民主种田、勤俭种田)的经验，经过省委反复讨论和修改，写成了由我署名的长篇文章《运用样板、推动全盘，是领导农业生产的好方法》，在1月28日《人民日报》正式发表。文章首次公开了刘少奇同志在“四清”期间对江苏工作，特别是对我们省委领导要深入蹲点的重要指示，比较系统地总结了我们在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指引下，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各级领导蹲点搞“科学种田”样板，推动全盘，发展农业的初步经验。那时，邓小平同志提出，要建设稳产高产农田，解决

好群众的吃饭问题。“三五”期间，全国先搞五亿亩。这是贯彻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战略方针的重大举措。我写这篇文章，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要求省、地、县各级运用“样板”，分类指导。对于那些已经稳产高产的地区，要进一步提高产量，稳高兼顾；已经稳产的地区，要提高产量水平，达到稳产高产；产量尚不稳定的地区，要先达到稳产，再争取高产，经过努力，有步骤地因地制宜地建立稳产高产农田，全面提高农业的稳产高产水平。省委的这个决策，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我的这篇文章被诬为“推行刘邓路线”的“大毒草”，成了“打倒”我的重要“罪证”。对此，当然只能嗤之以鼻！

进入 1966 年，我们抓的另一件事情，是进一步按照“二十三条”的规定，抓紧搞好农村“四清”运动。当时的情况是，经过 1964 年冬季以来“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已经搞了两批“四清”。各级领导通过蹲点，也都取得了比较系统的直接经验。但是，就全省来说，63 个县，搞完“四清”的仅 12 个；尚待开展“四清”的还有 48 个整县，加上尚未搞完的 3 个县和 7 个省属市郊区，共 1698 个公社（镇），占全省社（镇）总数的 82.8%。鉴于这个情况，我在 1 月 17 日省委书记会议讨论当前工作部署时，着重讲了“四清”运动，强调指出：“四清”要在“好”字当头、质量第一的前提下，适当缩短时间，搞快一些，既不能走过场，也不宜拖拉。各地开展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活动，一定要讲究实效，反对形式主义。重申“四清”要密切结合生产，大忙时要以生产为中心，使“精神变物质”。各级领导要继续蹲点带面。“四清”工作队要坚持

与群众实行"三同"。与此同时，我在与欧阳惠林等"四清"工作队负责人谈话时，还针对当时所谓"突出政治"的问题，讲了意见，要求各地在"四清"中学习毛主席著作，必须围绕着生产任务。"突出政治"要体现到实际工作之中，否则就是一句空话。对于各级干部，政治要体现为思想作风的革命化，深入实际，关心群众疾苦，全心全意为老百姓办事，切实解决好群众吃饭、穿衣问题、居住问题。要继续提倡革命精神与科学态度相结合，按照客观规律，积极地干，不能重蹈过去那种胡来蛮干的覆辙。

我的这些意见，得到书记处同志和省委其他常委的一致赞同，并研究确定，全省农村"四清"运动，力争到 1968 年基本结束。省委还于 4 月 2 日批转了省委农村办公室《关于今后农村社教运动部署问题的初步意见》。接着，又于 4 月 25 日发出了《关于农村第一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后建设工作情况的报告》。省委的要求是，进一步加强领导，依靠群众，正确执行政策，改进工作方法，紧凑组织运动，务求好中求快。通过"四清"，推动"农业学大寨"。学习毛主席著作，搞县、社领导班子和基层组织的革命化，都要落实到生产建设上来，"三大革命"要一起抓。应该说，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提出这些要求，既有很强的针对性，又切合时宜，十分必要。直到林彪、叶群一伙打着"突出政治"的幌子，在我省太仓县洪泾大队大树特树所谓"活学活用"的样板，我们仍坚持反对形式主义，强调"三大革命"一起抓，要求学习毛主席著作不能离开生产建设。但是，省委的这些部署和要求，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爆发被完全打乱了。我和省委其他领导同志，

还因此成了“政治要落实到生产上”的“大批判”对象。

二 从“五·一六通知”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1966年4月22日至24日，毛主席在杭州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我和华东局书记魏文伯等同志都参加了。毛主席在4月22日下午会议开始时的讲话中，首先谈了对吴晗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批判问题。他说：我不相信只是吴晗的问题。这是触及灵魂、意识形态的斗争。触及面很广泛。朝里有人，包括中央各部门、各省市都有。出修正主义，不只文化出，党、政、军也要出，主要是党、军。讲话点名批评了彭真同志主持下，1966年2月制定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他说：2月3日急于搞一个五人小组文件，迫不及待。他针对“提纲”中“有破有立”的说法，提出应该“先破后立”，不破怎么立？不破不立，彻底破，破中有立。破就要讲道理，讲道理就是立。

毛主席的这些讲话，我是当面聆听的。彭真同志主持起草的“二月提纲”，我是认真看过的，认为写得不错。毛主席所以提出批评，当时只感到是否嫌这个“提纲”太温和了些，并未想到存在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问题。但是，会议遵照毛主席的讲话精神，于4月24日通过了关于撤销“二月

提纲”及以彭真同志为组长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的“通知”修改稿。随后，中央政治局于5月4日至26日召开扩大会议，展开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所谓“错误”的揭发和批判，并于5月16日会议上正式通过了这个“通知”，发至全党。这就是经毛主席多次修改定稿，被人们称为“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的“五·一六通知”。许多重要文字，例如：“中央和中央各机关，各省、市、自治区，都有这样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钻在共产党内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代表人物”等等，都是毛主席亲自写进“通知”的，成为“文化大革命”中层层揪斗“走资派”的“最高指示”。

5月16日至6月6日，省委召开了由各地、市委书记参加的四届八次全会（扩大），重点是学习“五·一六通知”和中央关于彭、罗、陆、杨“错误”的文件，讨论“文化大革命”问题。我在会议开始时，传达了省委常委同志学习毛主席、党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指示的基本认识和常委会研究的几项措施，提交全会讨论。省委根据会议讨论的意见，于6月7日向党中央、毛主席作了《关于讨论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问题的报告》，检查了江苏“阶级斗争的实际情况”，认为我省思想文化界，同样“朝里不清”，几个主要文化学术刊物，曾发表了一批宣扬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的“毒草”。同时检查了我们省委对这场“波澜壮阔”的“革命”，“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表示要“迅速跟上中央、主席的指示，

跟上迅速发展的革命形势”,把“文化大革命”放在领导工作的第一位。

这是我们给中央发出的第一个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正式报告。当时的形势是,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6月2日,发表了毛主席批示向全国公布的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的一张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当天,华东局召集我们各省、市负责同志紧急开会,商讨对策。我于6月3日上午即打电话向省委传达会议精神,要点是:好好学习“中央关于十个问题的通知”(即“五·一六通知”),这是指导这场“革命”的“最高指示”;运动中不能有“清规戒律”,不要“束缚群众手脚,阻碍革命”;要很好区别左、中、右,保护“左派”,集中打击“右派”,打倒“资产阶级权威”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人物”;掌握好报纸,重大问题按“中央的统一口径”;各省、市文化革命小组要加强与华东文化革命小组的联系通气;最后,我在电话里强调,城乡“四清”要与“文化大革命”一起抓,革命与生产一起抓,要以革命促生产,不能顾此失彼。

鉴于《人民日报》社论和北京大学一张大字报发表以后,各大学“相应而动”,“揪黑帮”(以大学校长和教师为主要对象)的浪潮由北京席卷全国,从学校推向社会;南京大学从6月2日起,就对以匡亚明同志为首的校党委和一批知名教授、学者的大字报铺天盖地;苏州市出现了大学生上街游行等情况,一些大学的领导实际上已经失控。我于6月4日上午,再次打电话给省委,要求各大学党委迅速跟上形势的发展,党委负责同志要挺身而出,召集群众大会,掌握

运动领导权，以防止坏人钻空子，把运动搞乱。

此时，我记得中央还曾向我们传达了毛主席在6月10日、12日与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的谈话要点，大意是：学校要夺权，重点是大学的运动，中小学也要搞；城乡“四清”，要搞“文化大革命”；打击面5%不少了，登报点名要慎重，但各省、市一个不点也不行（有人插话：匡亚明要全国点名）；不要急于派工作组，让他“混战一场”，乱几个月。

按照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精神，省委紧接着召开了全省地、市、县委书记会议，讨论如何正确对待来势日益猛烈的“群众运动”。我从华东局开会回来，于6月11日在会上讲了话。

当时，我只能用“照本宣科”的方式，首先讲述了“文化大革命”的性质和“伟大意义”，然后按照自己的理解讲了应当在这场斗争中接受什么“经验教训”。我从改造世界观的角度，重提“个人主义是万恶的根源”，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在运动中“触及灵魂深处”，“亮”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进行“自我改造”，并联系自己，讲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几方面表现：第一，因为资格老，可以倚老卖老，满不在乎；第二，在党的教育和同志们的帮助下，多少做了点工作，可以功臣自居；第三，在党中央、毛主席的培养和领导下，没有犯过大的路线性质的错误，还有点工作能力，可以骄傲自满，自以为了不起，甚至盲目地认为“一贯正确”；第四，国家和人民给了很高的待遇，可以放松密切联系群众、艰苦朴素的作风。对于各级领导干部怎样积极参加与领导这场“大革命”，我除表示自己的决心以外，特别强调各级党委要有两条线，

一条线领导革命，一条线领导建设，要坚持“三大革命”一齐抓起来，做到抓革命，促生产建设，争取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更大发展。

这些情况表明，当时我和省委其他领导同志，都是从正面理解毛主席所以要发动这场“文化大革命”，其目的是为着坚持社会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消除党内可能出现的腐败现象，保证我们党和国家不变颜色。包括我自己在内的许多老同志，开始也确实怀着改造自己的思想，改进我们党的作风的善良愿望，积极投入和领导运动。针对那种片面强调“群众运动”，大学已经乱得误了正常的工作和教学，并将影响社会安定的情况，我在对各地、市、县委书记的讲话中，还明确提出“领导要与群众相结合”，既要放手发动群众，又要积极领导群众。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说明道理，讲清政策，应当相信群众是坚决跟党走的。有些单位乱一下是可以的，但不要长乱下去；误一下也是可以的，但不要长误下去。要警惕坏人乘机破坏，制造混乱。那时，从中央到我们各省的同志，确实都没有想到，所谓“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会给我们党和国家带来如此灾难深重的内乱。

就在我对各地、市、县委书记讲话的第二天，即 6 月 12 日，南京大学召开了揭批校长、党委第一书记匡亚明同志的“万人大会”，正式宣布“罢官”“夺权”。接着，《新华日报》从 6 月 13 日起，除错误地公开报导撤销匡亚明同志党内外一切职务之外，还错误地开始了对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陶白、钱静人，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孙叔平等同志的点名批判。当时，曾有 20 万人涌到南京大学“声援”，校园里除大字

报之外，还扯起了广播喇叭，操场上搭起了台子，一些人登台讲演，展开所谓“大辩论”。在南京大学“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带动下，成群结队的学生，有的围到《新华日报》“辩论”，指责《新华日报》“包庇黑帮”；有的冲到省委哄闹，扬言要揪省委的“黑帮分子”；有的窜到工厂游说，煽动工人起来“造反”；还有的跑到北京、上海，要挟中央、华东局派工作组，等等。

为了坚持党对“文化大革命”的领导，6月中旬，在中央作出向北京市的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的决定以后，省委在南京军区的大力支持下，组织了以部队同志为主力的840多人的工作队，进驻省属高等院校和省级重点文化单位。对于南京大学，省委决定由彭冲同志亲任校党委第一书记，汪冰石同志带工作队进驻。各地、市、县委也先后抽调7800多名干部，进驻1155个单位，其中包括大中专学校、文化单位和其他领导受冲击而陷于瘫痪状态的单位。当时，省委决定，由省委“文化革命小组”采取分线领导的办法，设立省级机关组、高等学校组、省级文化单位组和审批组，以加强对运动的具体领导。省委的部署是，适当集中力量，分期分批开展运动，首先把省、市、地党政机关、大专学校、文化单位和正在进行“四清”单位的“文化大革命”抓好，县级党政机关的“文化大革命”，推迟到秋后进行，以确保搞好秋熟生产。

但是，由揪斗“黑帮”而掀起的“怀疑一切”、“横扫一切”的恶浪，实际上已经到了不可遏止的程度。我们这些长期在党和毛主席的教育下，担任一定领导职务的同志，对此不但

"很不理解"，而且越来越想不通。我首先搞不清楚的是，什么叫"文化大革命"？究竟要"革"谁的"命"？那时，大学的校长、书记被罢了官，许多教授、专家、学者被打成了"黑帮"。在江苏南京地区最先乱起来的南京大学，提出要将匡亚明同志"戴高帽子游街"，还要轰走刚进驻学校的工作队，搬掉"绊脚石"，实际上是要摆脱党对运动的领导。这怎么行？联想到自己入党数十年，在党的领导下干革命，哪有这样搞法的？如果这是"革"文化的"命"，能这样"革"吗？随着动乱加剧，我的抵触情绪也越来越大了。

话虽如此，我作为省委第一书记，又怎能不"跟"呢？省委迫于形势，曾于 7 月 7 日在南京五台山体育场召开了号称五万人参加(包括收听)的干部群众大会。我在会上作了题为《高举毛主席思想伟大红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更加广阔、更加深入地开展起来》的报告，主要讲了三个问题：第一，进一步认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第二，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第三，在斗争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新高潮。报告除了宣讲"文化大革命"是"最活最好的阶级斗争的大学校"，"规模是这样广阔，声势是这样雄壮，威力是这样强大，发展是这样迅猛，这是古今中外从来没有的"，"世界革命人民特别是亚非拉人民，都在欢呼我国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之类所谓"大好形势"之外，还讲了"广大人民群众起来批判旧世界"，是"文化大革命"的"根本特点"。要求各级领导同志"在革命群众运动中不能怕乱"，要敢于打破"资产阶级的秩序"。号召全省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革命干部，高举毛泽东思想的

伟大红旗，更好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武器，“在阶级斗争的大风浪中经风雨，见世面”，“把钻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和一切牛鬼蛇神统统揪出来，把一切资产阶级霸占的阵地统统夺回来”；“全省各级党组织，坚决按照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放手发动群众，站到运动的前面，站在群众之中，积极地、大胆地领导运动”。

我之所以不厌其繁地原文复述这些陈旧的“文革语言”，因为这是真实的历史，不应掩饰。作为我个人来说，为什么抵触情绪很大，却要强打精神，作这样一篇大报告呢？那时，由于南大、北大相互呼应，南京地区的“文化大革命”不但动得较早，而且对全国都有很大影响。毛主席要华东局书记魏文伯打电话给我，说：不要怕群众起来“革命”，要进一步放手发动群众，并指示我起草个报告，不要太长，开个大会，讲半个钟点。我奉命组织人马赶写，然后送给魏文伯同志修改。魏老德高望重，我们都很敬重他，请他帮助把关，理所当然。但是，那时大会小会都在喊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谁能真的知道“底”究竟在哪里呢？就像《红楼梦》讲的，“不知底里”。毛主席当然也不会把“底”交给魏老。所以，魏老也不敢改定，只好送到北京，最后由毛主席亲自审阅定稿。这个“高举”报告，就是这样产生出来的。当时，很少有人知道这段“隐事”；现在我把“真情”公开出来。这是为了帮助大家更好地了解“文化大革命”的大乱、长乱是怎样“发动”起来的。同时，由此事例可以看到我们在“文革”开始以后的一段时间内，有些违心之事（包括对文化教育界一些领导同志错误地点名批评）和违心之谈（包括在党内外会议上

的一些讲话），要讲责任，首先在我这个当第一书记的“班长”。若要具体说来，确是出于无奈啊！邓小平同志高屋建瓴，谈到历史问题，特别是“文革”期间，要我们“宜粗不宜细”，是完全正确的。

这是由省委主持召开的第一次“五台山大会”。嗣后，在8月18日毛主席登上天安门城楼接见全国“大串联”的“红卫兵”以后，省委于8月20日在五台山召开了“江苏省暨南京市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10月下旬，中央工作会议批判所谓“刘、邓资反路线”以后，省委于11月19日在五台山召开省委关于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方向错误、路线错误的检查大会；最后，在“造反派”冲击下，省委于12月31日在五台山召开所谓“平反大会”。这些大会，都由我代表省委登台讲话或“检查”，虽然具体内容各有不同，但实际上都是照毛主席他老人家“裁定”的第一次五台山大会的方式办理的。

三 八届十一中全会前后的“造反”狂潮

7月7日五台山大会以后，江苏南京地区的“文化大革命”掀起了“第三个浪潮”。除大中专学校和文化宣传系统以外，省、地、市党政机关也普遍动了起来。据当时统计，省级机关65个单位有57个开展运动，贴出了40万张大字报，包括省教育厅厅长吴天石同志在内的一些部、厅级干部，被

诬为“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许多科研单位的科技人员，被作为“反动权威”或“隐藏在机关内的牛鬼蛇神”，进行错误的批判。全省32所高等院校全部夺了权，648所高级中学和中等技校，都停课“造反”，其中仅南京的19所高等院校，被重点批斗的就有404人。一些地、市党政机关，也开始揭批当地的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分子”。全省正在进行“四清”的13个县、280多个公社和650多个工交财贸单位，都转搞“文化大革命”。

形势的发展，越来越险恶。我和省委其他领导同志一道，本着对党负责和对全省人民负责的精神，仍然在可能的范围内，为安定社会和维护生产秩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首先是如何稳定农村的问题。7月11日，省委发出《关于农村文化大革命和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紧密结合的通知》。那时，虽然有“五·一六通知”，但中央尚未制订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具体政策规定。所以，省委要求地、县各级党委，必须根据中央关于城乡“四清”运动的“前十条”和“二十三条”的精神，把“文化大革命”和“四清”运动紧密结合起来。在人民群众中，主要是通过正面教育，提高思想觉悟，破除旧的思想习俗，提倡新的思想风尚，巩固社会主义的思想阵地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重申对待有“四不清”错误的干部，要坚持贯彻“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在社员群众中，不能搞“社员反社员”，以团结“两个95%”。要坚持抓革命，促建设，促生产，做到革命与建设双胜利、运动与生产双丰收。对于学校的“文化大革命”，我们以南京大学为重点，决定由彭冲同志亲自到校召开师生大会，并由工作队分

头到群众中去，倾听各种不同意见，引导师生分清是非，制止了围攻《新华日报》、要给匡亚明等同志戴高帽游街以及要“轰走工作队”等错误做法。省委采取的这些正确举措，虽然很快就成了所谓“压制群众”的“罪状”，但对稳住一段时间内的局势，还是起了积极作用。

7月24日，省委再次向党中央、毛主席作了《关于当前文化大革命情况的报告》，综述6月份以来全省“文化大革命”的情况，着重提出运动中“放手发动群众”、“大造革命声势”，还要做好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坚持党对“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掌握政策界限，团结干部、群众的大多数，包括团结那些爱国的、积极工作的、有一定贡献的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报告强调，应把党的政策交给群众，反复向群众宣传教育，坚持摆事实，讲道理，提倡文斗，不能武斗。

与此同时，我赴京参加了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这是继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五·一六通知”以后，又一次讨论和研究有关“文化大革命”问题的重要会议。在预备会议上，毛主席曾有几次重要谈话。7月24日，在听取李雪峰同志关于北京大学“文化大革命”情况汇报时，毛主席谈了话，要点是：第一，撤销工作组，改派联络员、巡视员、观察员；第二，中央和各省领导同志，都要到学校去看大字报，不了解情况，怎么打仗？

7月25日，我作为华东局书记之一，参加了有各大区书记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出席的预备会议，毛主席对即将提交全会讨论通过的关于“文化大革命”问题的文件，谈

了话。他反复强调，工作组起了阻碍运动的作用。阻碍革命就是不革命，势必帮助了反革命。要赶快改变派工作组的方针，取消工作组。学校、机关的“文化大革命”，一个叫斗，或者叫批，一个叫改。斗就是破，改就是立。斗、批、改，靠工作组不行，省委也不行，要靠学校内部的革命力量，靠本单位的人，成立群众的“文化革命小组”。学生要求派代表到中央，不要阻止。现在高中停课了，初中也停了课，他们要闹事，闹事就是革命嘛！他严厉批评了我们许多领导人“怕”字当头。怕反革命，怕动刀动枪。哪里有那么多“反革命”？革命的是多数，不革命的是少数。所谓“现行反革命”，是指杀人、放火、放毒，这些可捕，此外不可捕。有些地方不准围报馆，不准到省委，不准到国务院；到了，接待时搞些无名小卒。西安和南京的报社（指《新华日报》）被围三天，吓得魂不附体，那么怕呀！你们不出面接待，我出面！你不革命，革命就会革到你自己的头上。他要大家停止日常事务，到下面去。在北京开会期间，参加会议的人都要到出大问题的地方，到北京大学、广播学院等单位去看大字报，要到那里去点火。如果被围起来，就讲一讲，我们是来向你们学习的，是支持你们革命的。

8月1日至12日，在毛主席亲自主持下，召开了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列席会议的人员中，除中央“文革小组”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关（锋）、戚（本禹）一伙以外，还有聂元梓等“造反”风云人物。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文革”期间家喻户晓的“十六条”，是在毛主席主持下制定的。

其主要内容，就是按照毛主席上述谈话精神写的。

在此期间，从全国到江苏南京地区，“造反”、“打倒”的声浪越来越升级。北京市率先撤销了工作队，各地的工作队也在8月上旬从学校和一些重点单位相继撤走。南京大学、华东水利学院、南京师范学院等学校，都出现戴高帽子游街、“喷气式”批斗等愈来愈严重的打人骂人、人身侮辱的事件。吴天石夫妇就是在这股狂潮中，被南京师范学院的学生戴了高帽子拖上马路，在酷暑高温下游斗，惨遭迫害致死的。

鉴于这些情况，我在赴京参加全会期间，与坚守省委的其他领导同志一样，寝食难安，焦虑万分，力图稳住局势。7月27日，我打电话向省委传达了北京大学已经撤出工作队的情况，江苏要稳一稳。7月29日，我又打电话向省委传达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同志在北京市大中专学校师生积极分子参加的人民大会堂万人大会上的讲话精神，既要支持革命师生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又要加以积极的引导。我提醒省委，北京市委根据党中央、毛主席指示，已经正式决定撤销工作队。我们也要对撤销工作队主动准备，说明理由，做好相应的工作。

7月30日，我再次与省委通电话，传达正在讨论的“十六条”精神，要求省委掌握几点：（一）“文化大革命”的斗争矛头不能搞错，任务是一斗（“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二批（“批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三改（“改革教育制度和教学方针、方法，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二）对工作队要具体分析，有的是好的，有

的是比较好的，有的有这样那样错误，甚至“方向性、路线性错误”，要做好撤销工作队的工作，包括工作队自身的工作，以免发生更大的混乱。（三）各级党委要妥善安排，坚持抓革命，促生产，做到城乡社教、“文化大革命”和生产两不误。农业要抓紧抗旱、防涝，争取秋熟丰收；工业要加强安全生产、防暑降温，提高产品质量。并提请省委书记处研究，将上述要点连同7月29日电话精神，一并电告各地、市、县委，迅速贯彻执行。

8月1日至2日，我们参加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各省同志，在周恩来总理的带领下，连续两个晚上前往清华大学看大字报，参加学生座谈会。我曾乘隙向总理汇报了江苏南京地区“文化大革命”情况，谈了我对形势的估计。我说：各学校撤走工作队，运动会有反复，甚至出现很大的反复。总理十分关心江苏，赞同我的看法，并作了重要指示。他说：工作队撤走以后，一定会来个高潮。第一是不可怕，第二是要做好工作。要向群众讲清楚，老干部、老同志碰到了新问题。要告诉青年学生，你们比我们年轻时不同，你们生长在毛泽东时代，要以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从实践中学会革命，在革命中采取严肃谨慎的态度，学习党的方针政策，按照党的政策办事。要讲清楚，这样做不是“清规戒律”，不是束缚群众，阻碍革命。该讲的不讲，就会造成不必要的混乱。一定要在全体干部中讲清楚，要敢于发动群众，又要敢于领导；要支持群众，又要善于领导运动。这样做，对广大革命师生有利，对革命事业有利。领导干部到群众中去，讲点错话也不要紧，要表态：第一，完全支持大家；第二，帮助大家把运动搞

得更好，尽可能使缺点、错误少些。

当时，彭冲同志分工负责省委“文化革命小组”的工作，掌握南京大学和其他高等院校的运动，有着很大的压力。我于8月3日上午，打电话给彭冲同志，原原本本传达了总理的谈话，并按照总理的指示精神，讲了我的意见。首先是对戴高帽子游斗的问题。要向青年学生讲清楚，《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讲戴高帽，那时我们没有掌握政权，农民被压迫得厉害，这样做是为着打掉敌人威风。现在无产阶级掌握了政权，在党的领导下搞革命，就不能这样做。第二，运动中可以参考外地的经验，包括北京的好经验。但各个学校的情况不同，对外地的具体情况不知道，互相传来传去，有些是传错的。各个学校之间的大字报，要有组织地转送张贴。工厂、机关也应如此，大字报要由领导上组织转送和张贴。这些情况，领导上都要大胆站出来讲话。第三，南京大学和其他大中专学校（包括中学）的工作队都要撤出来，但撤销工作队，党委还是要的。要加强党对运动的领导，发挥党支部的作用。我还传达了周总理在清华大学座谈会上曾讲了“文化大革命”中如何体现党的领导问题。总理强调，要实行民主集中制，要对师生进行政治思想教育，放手发动群众，不能没有党的领导。要告诉学生群众，懂得斗争方法，掌握党的政策。

按照我与彭冲同志电话商量的意见，第二天，即8月4日，省委组织南京大学工作队听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同志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万人大会上的讲话录音。当天下午，我又同彭冲同志电话沟通情况，交换意见。彭冲同志讲了吴

天石夫人已被学生游斗拖死，吴天石同志也危在旦夕。同时讲了工作队一旦全部撤离学校，必将乱得更加严重。我在电话里反复强调，从省委起，各级领导干部和工作队同志，都要好好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按刘主席、周总理、邓小平同志的指示办事。各学校的工作队，如果学生没有什么意见，就撤出来；如果有意见，暂留几天，让学生提完意见，工作队作了自我批评以后再撤走。领导干部，包括我们省委书记在内，不要怕“罢官”。要向群众讲清楚党的政策，戴高帽子、打人是不对的。还要防止“学生斗学生”。

在我与彭冲同志打过电话以后，8月5日，毛主席写了题为《炮打司令部》的一张大字报，并在当天印发全会讨论。会议的紧张气氛达到顶点。后来的事态表明，毛主席通过这张大字报，实际上是告诉全党，他之所以要发动这场“文化大革命”，并亲自出马“炮打”所谓“资产阶级司令部”，其矛头所指，就是刘少奇、邓小平等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一些领导同志。尽管如此，直到8月7日，我在与彭冲同志通电话时，仍然重申周总理和刘少奇、邓小平同志的讲话精神。当彭冲同志讲到南京各大学围绕着吴天石夫妇被游斗害死而发生辩论时，我在电话里强调，“要坚持少奇同志的说法，我们要保护少数人”。要耐心说服，讲清道理，不要变相体罚，不要逼、供、信，要文斗，不能武斗。

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还有一件使我难忘的事情，就是在讨论修改“十六条”的过程中，毛主席与周总理一道，曾找了我和谭启龙同志谈话，征求对这个文件的意见。

毛主席要周总理先讲一讲意见。总理说：他们两位来自

基层，情况比我们了解得多，请他们先说。

谭启龙同志谦让，要我先讲。我想，“文化大革命”搞了两个来月，已经乱成这个局面。当着中央主席的面，要敢于“直谏”。我就对毛主席说，运动这样搞法，对不对？很多同志有看法，延安整风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批评从严，处理从宽；团结——批评——团结。这都是您老人家倡导的方法。现在，学生群众同我们这些当领导的人之间，等于猫吃老鼠。戴高帽子，拖上街游行，打骂侮辱，把人都搞死了。完全不讲道理。

毛主席听我讲到这些情况，就问：照你的意见，应怎么搞法？

我说，还是应采取延安整风的办法，并讲了我们省委给中央的报告和我几次电话向省委提出的建议，对学生群众，要讲清楚党的政策，要文斗，不要武斗。

毛主席赞同，说：对，要文斗。

我接着说，现在，学生已经把斗争目标从校党委、校长，集中到了我们省委和各级党委，什么人都要揪出来“打倒”。我们这些当省委书记的，都是“走资派”。对于这个情况，总要有个说法。

毛主席说：对你们要保护。运动中要文斗，不要武斗。

我又联系江苏南京地区的情况，说：搞革命，要有饭吃，有衣穿。现在学生已经闹出学校，走向社会，如果工厂、农村也乱起来，不抓生产怎么办？

毛主席说：按你的意见，还是要抓生产。又问谭启龙同志是什么意见？谭启龙同志表示同意我的意见，要抓生产。

这次谈话以后，在8月8日全会通过“十六条”时，毛主席在全会上说：文件里“抓革命，促生产”这一条，是江渭清、谭启龙同志提的。“要文斗，不要武斗”这一条，是江渭清同志提的。我站起来对毛主席说，我提出您作决定。这就是您的指示。在8月12日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式的讲话中，毛主席重申，“我们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对犯错误的同志要给出路，准许改正错误，实行“一看二帮”，“团结——批评——团结”。毛主席还谈了这次全会为什么要作出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他认为，过去包括向学校派工作队在内的那些方针，广大的革命学生和革命教师是抵抗的，我们就是根据这些抵抗来制定这个决定的。但是这个决定能不能实行，还要靠在座的与不在座的各级领导去做。比如依靠群众，群众路线，还是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依靠，一种是不依靠；一种是实行群众路线，一种是不实行群众路线。绝不要以为，决定上写了，所有的党委，所有的同志都会实行，总有一小部分人不愿意实行。他还指出，此次全会对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常委进行调整，就是为了从组织上保证中央这个决定以及全会公报的实行。根据毛主席的提议，全会通过改组中央领导机构，陈伯达、康生进入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刘少奇同志从常委排名的第二位降到了第八位。全会以后，被称为“中央副主席”的只有一个林彪。原来的副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都不再提及他们的这个职务。从这次全会起，展开了对刘少奇、邓小平同志的错误批判。全国范围的内乱，更加不可收拾了。

四　面对席卷全国的“红卫兵”运动

八届十一中全会结束以后，我接着参加了华东局书记处会议，讨论传达贯彻全会精神和工作部署问题。随后，根据华东局的讨论纪要，我以全会参加者的身份和学习全会决议及公报体会的形式，在8月中下旬召开的省委扩大会议上，传达了全会的情况，谈了自己的初步认识。我说：4月杭州会议上，毛主席批评我们对“文化大革命”的领导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经过四个多月的实践，用毛主席的指示和全会的决定对照与比较，我承认自己对这场“革命”的领导还是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并提请大家充分展开讨论：我们工作中有哪些缺点、错误，是什么性质？有没有路线的错误？我个人的看法是，我们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怕”字当头，而不是“敢”字当头，提出了一定要坚决地不折不扣地按照“十六条”精神办事。会后，遵照中央的决定和省委的部署，全省上下迅速掀起了大张旗鼓宣传“十六条”，学习“十六条”，熟悉“十六条”，运用“十六条”的热潮。当时，我和省委其他领导同志都觉得，八届十一中全会既然作了决定，下达了“十六条”，“文化大革命”应该逐步引上正确轨道了。但是，实际上“十六条”强调的是，运动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提倡“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鸣大放……揭露一切牛鬼蛇神”，大

破所谓“四旧”;鼓吹的是“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要敢想、敢说、敢闹、敢造反,其结果导致了更加盲目的、大规模的、混淆敌我、引发内乱的所谓“群众运动”。特别是毛主席于8月1日即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的当天,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写信支持他们的“造反”精神;“十六条”刚公布,毛主席又于8月18日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这就促使“红卫兵”运动很快席卷全国。从大学到中学,都建立起什么“兵团”、“战斗队”之类名目众多的“红卫兵”组织,旗号纷争,令箭在手,乱上加乱,更加无法收拾了。

面对这股新的狂潮,8月25日,我们通过中央办公厅,向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并担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长的陶铸电告情况,提出意见。

一是针对“红卫兵”借破“四旧”为名,大肆抄家,从抄教授、资本家,蔓延到社会上,从没收金银财物,到砸文物古迹,烧古书、古画等打砸抢现象,我们提出,要根据宪法规定,加以阻止。已经没收的,要教育他们妥为保存。

二是针对大批学生戴上红袖章,借故外出“串联”,有的要上北京,有的要去西安、长沙、兰州“支援”“造反”,每天数千人涌上去北京的专列,成千上万的学生挤不上车就坐铁轨不让开车,交通开始严重堵塞的局面,我们提出要尽力劝阻,积极疏导,实在劝不动的,由铁路部门妥善安排。

三是针对“小道消息”满天飞,中央“文革小组”一伙人蓄意制造混乱,散播所谓“中央负责同志讲话”,并不断从北京向各地抄寄,在“红卫兵”中相互传播、广为张贴的混乱情

况，我们提出：如果确有这样的“重要讲话”，请中央办公厅正式转发，以便我们了解真情，把本地区的“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

这时，南京的学生涌向外地，外地的特别是北京的学生涌到南京，进行“串联”和“点火”，冲击目标越来越集中到省委。除彭冲、张仲良等省委负责同志分工抓接待和处理“串联”上访学生的问题以外，我一方面主持省委全面工作，另一方面腾出很大精力接见来自省内外的“红卫兵”。我和书记处及其他常委同志，经常被围到深夜，吃不成饭，睡不成觉。例如，8 月 28 日，北京几个高校南下的学生，串通了扬州、无锡来宁“造反”的学生，200 多人围在省委门口。我因为要主持省委的一个会议，请张仲良同志带领省“文化革命小组”工作人员，出面接待。他们坚持一定要江渭清出来回答“如何领导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哄闹了一个下午，有的学生翻墙冲进省委大院内。大家很紧张，劝我不要出去，以免被学生揪住不放。我考虑，如果不站出来，同他们直接见面，反而会闹得更凶，干脆中断会议，将学生请进省委小礼堂。进了礼堂，谁当主席主持会议？又闹起来。北京航空学院的学生提出，要由他们当主席。我说：主席就请你当，相信你能当好。北航的学生上了台，提出要同我搞“一问一答”。我说：这个办不到。因为对你们提的问题，我不能即席回答。这时，中国人民大学的学生站起来说：你们这是斗“黑帮”的做法，江渭清不是“黑帮”，要允许他讲话。

接着，我对全体学生讲了四个“欢迎”、四个“但是”。我说：你们北京的学生南下串联，介绍经验，我们是欢迎的，但

是，我们认为，搞好“文化大革命”，进行斗、批、改，主要依靠本地区、本单位力量，因为只有他们才最熟悉本地区、本单位的情况；你们要了解南京各学校“文化大革命”情况，我们是欢迎的，但是，只能平心静气，派代表来座谈，而不是采用哄闹的方法；你们提出问题，以平等的态度民主讨论，我们是欢迎的，但是，不能要我们马上“交代”，甚至指定要什么人来“交代”，因为对有些问题我们也要了解情况，进行思考，才能解答；你们觉得南京大专院校的运动有缺点、错误，提出批[illegible]意见，我们是欢迎的，如果提得正确，我们愿意改正，但是，在问题还没有搞清楚之前，不要轻易下结论。

我为什么要旧事重提呢？因为，这次接见，影响很大。我所以能在那样复杂、那样严重的情况下，“敢”字当头，不怕“围攻”，完全是由于周总理在北京同我的谈话作“精神支柱”。在接见中，我确实按照总理讲的领导同志要敢于站出来，向学生群众讲明道理，讲清政策的指示精神，宣讲党的政策，表明省委的态度，既坚持原则，又积极领导，使少数带头哄闹的学生亏了理，失去了市场。

为了继续稳住局势，力保全省工农业生产和其他各项工作正常进行，我在10月14日接见《解放军报》记者时，谈到省委在“红卫兵”运动掀起以后，坚持了几项举措。一是，正确贯彻“十六条”，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对领导干部要有分析，不能一概“打倒”。当时，实际上被陈伯达、康生和中央“文革小组”一伙把持的“两报一刊”，通过社论、文章，越来越居心叵测地把斗争矛头引向各级党政领导干部，煽动揪“走资派”。在江苏，到9月25日为止，除《新华日报》和各市

市报点名批判了一批所谓“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①以外，省级机关部委厅局，大专院校党委书记、校长，各地市委书记、专员、市长，已经被批斗的达64人。如再蔓延扩大，不但所有学校瘫痪，各级党政机关，包括我们省委，也势必被冲垮。我明确提出，江苏省委是好的。我们国家，从根本上说，当权的是无产阶级。在党政军各部门，工农商学兵各界，负责领导工作的干部大多数是拥护党、拥护毛主席，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我还指出，在运动中，省委掌握斗争大方向，坚持避免和制止群众斗群众，学生斗学生，说服工人、农民不要干预学生运动；坚持说服学生“要文斗，不要武斗”，这是运动中的一项重大政策。华东局认为，江苏这样做是对的，对运动的控制是比较好的。对于“炮打省委”问题，我引用周总理的话说，“炮轰，先要调查研究，否则就是放空炮。”江苏4600万人口，没有一个好的省委，要搞好“文化大革命”，搞好生产，都是不可能的。

二是“敢”字当头，省委领导挺身而出。我举了8月28日接见北京南下学生的事例，说明我们是怎样做好学生工作，向他们宣传毛泽东思想，宣讲党的政策。并强调指出，对党的政策，不是“各取所需”，而是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和周总

① 据当时统计，《新华日报》点名批判的有120人，其中包括匡亚明、孙叔平、陶白、吴天石、刘子见、钱静人、周邨、吴白匋、陈瘦竹（南大中文系主任）、陈嘉（南大外文系主任）、曹汶（南京市文化局局长）、张一之（南京某中学校长）等同志、各市市报点名批判的有21人。

理的几次讲话精神办事。我和我们省委的其他书记、常委，还经常主动深入到南京各高校，参加座谈会，回答学生提出的问题，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我和彭冲、张仲良等省委领导同志接待学生，短的3小时，长的8个钟头。有的学生不讲理，我们耐心做工作。不管他们怎么激动，我们坚持好的态度。对“红卫兵”只要做到：第一，听从党的领导；第二，方向对头；第三，遵守党的政策；第四，以解放军为榜样；我们统通支持。

三是坚持抓革命，促生产。“文化大革命”，应该促进生产发展，这是至关重要的。当年，江苏夏旱接伏旱，伏旱接秋旱，从6月至10月初，一直无雨。旱情之严重，几十年少有。省委和各级党委在那样困难的处境下，挺直腰杆，组织干部、群众奋力抗旱，争取大旱夺丰收。粮食不但没有减产，预计还可以比1965年多收十几亿斤；棉花总产预计700多万担，是历史上少有的大丰收。工业1至8月份总产值比1965年同期增长20%，市场供应、财政收入均好于上年。

四是对于“红卫兵”运动，既不迁就，又积极疏导。特别是8月份以后，“红卫兵”大破“四旧”，我曾在接见“红卫兵”时，热情耐心地教育大家，要善于总结经验。“破”得对的，要巩固下来；一部分“破”得对，一部分“破”错的，要坚持对的一面，改正不对的一面。我这样说，是因为青年学生，凭着一股狂热，破封建迷信之类是应该的，但他们的行动带有很大盲目性和破坏性。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混水摸鱼，借“破四旧”之名，抢劫钱财；有的大肆破坏古书古画和文物古迹；尤甚者，竟连耸立在南京新街口的孙中山铜像都要砸掉。对于

这件事情，我明确表态：孙中山先生是伟大的革命先行者，他的铜像，不是“四旧”，不能“破”。一些学生就到省委哄闹。我们对闹事学生一方面教育劝阻，一方面采取迁移的办法，使这尊具有历史意义的铜像得以保护下来。

五是要求广大干部、群众提高政治警觉，防止坏人破坏，特别提醒大家要警惕少数以极“左”面目出现，进行招摇撞骗的“政治扒手”。

由于我们基本上坚持了这些举措，从省委到各级党政机关，虽然受着极大的压力，但仍以最大努力排除干扰，抓生产这条线一直没有中断。如果不是内乱越来越严重，全省工农业生产和各项建设事业，比我当时预计的情况肯定还要好得多。

五 从批判“资反路线”到爆发“全面夺权”

10月中下旬，我赴京参加了中央工作会议。这也是我在“文革”之中，最后一次以省委第一书记、华东局书记的身份，参加中央会议。

按照毛主席的说法，八届十一中全会两个月之后，召开这次中央工作会议，是因为许多同志感到“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没有思想准备，所以要总结经验，做政治思想工作。但是，实际上会议更加集中地对刘少奇、邓小平同志进行错误的批判，指责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提出了一条“压制群

众，打击革命积极分子的错误路线”。刘少奇同志被迫“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在会上作了“检讨”。陈伯达有恃无恐，在会议“批判”讲话中，吹捧“红卫兵”的“造反”行动，攻击刘少奇、邓小平同志推行了一条镇压群众、反对革命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和参加会议的地方及中央的许多负责同志一样，心情异常沉重。眼看全国性内乱日甚一日，不少党政机关在“红卫兵”运动冲击下，处于半瘫痪状态，陈伯达和中央“文革小组”一伙人还在煽动“造反”。运动这样搞下去，怎么收场！

在我参加中央工作会议期间，陈光同志主持省委日常具体工作。我通过电话，不断同他交换意见。那时，已经有人提出要“揭发省委”。由于刘顺元同志病休，我和陈光、惠浴宇、彭冲、李士英、张仲良、包厚昌等同志商量，一致表示：谁要“揭发”，我们都欢迎。省委没有做见不得人的事，没有犯方向、路线错误。“抓革命，促生产”，一定要坚持。这时，许家屯还没有同“造反派”结合在一起，所以还能与省委一班人保持一致。他揭发这个揭发那个，是后来的事。他叫人上街抄大字报，然后编排拔高，变成他的“揭发材料”，光揭发我的“材料”就有30万字，以此表示他站在“革命路线”的实际行动，这都是后话了。

当时，我在给陈光同志的电话中重申：第一，省委和各级党委分工抓运动的负责同志，要主动接见学生，帮助他们解决可以解决的困难；第二，要耐心做好工作，绝不能与学生发生冲突；第三，为避免发生冲突，如有学生冲进机关和办公室，可以让他们进去。省委将这三条意见，电话通知了

各地、市、县委和省级各部委厅局负责人。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我通过反映下面情况，表达了自己的焦虑。我说：毛主席号召我们到群众中去，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究竟还要搞多久？现在“红卫兵”到处串联，闹得人心惶惶，再搞下去，就要工厂不生产，农民不种田了。其实，这也正是全党和全国上下多数人担心的。鉴于这个情况，毛主席在10月25日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讲话中，说他发动这场“革命”，“闯了一个祸”，就是批了聂元梓等人一张大字报，给清华附中“红卫兵”写了一封信，还有他自己写了一张大字报。时间很短，6、7、8、9、10，五个月不到，全国都闹起来了，来势这么猛，连他也没有料到。大家不理解，有怨言，不能怪。毛主席运用辩证法炉火纯青，他这样说，究竟真认为“闯了一个祸”，还是有什么别的含意，大家都吃不透，只是希望运动早点结束。毛主席大概也估计到这种心情，所以讲到运动时间，他说已经搞了五个月，可能还要搞五个月。就搞两个“五个月”，可能还要多一点。这次开会，就是做大家的政治思想工作，大家回去，也要做政治思想工作。中央局、省委、地委、县委，都要开十几天会，把思想弄通。“原则问题通了，具体问题还不好处理吗？”他认为，“冲”一下有好处。有的地方，十个书记七八个搞接待，“红卫兵”一冲就冲乱了。要变被动为主动。谁要打倒你们呀！他表示，我是不想打倒你们的，我看“红卫兵”也不要打倒你们。什么“路线错误”，改了就算了嘛！他老人家还像往常一样，讲得很幽默，很轻松。我们在下面听了，心头更感沉重，就像他老人家赞赏的李清照词里所说：才下眉头，又上心头；怎一个

“愁”字了得！以江苏来说，到11月，省、市报纸点名批判的人数又有了增加。从省级机关到各地、市、县，被揪斗“打倒”的领导干部就更多了。

根据中央工作会议精神，省委相继召开了常委会议和全省三级干部会议。大家的抵触情绪越来越大。由于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省委的处境越来越困难。我们仍然从大局出发，要求各级领导坚守岗位，并于12月上旬作出省委常委会议《关于当前工作中若干问题的纪要》，明确要求把批判“资反路线”的矛头引向省委。各地区、各部门“方向、路线错误”，主要责任由省委承担。省委欢迎“炮轰”，欢迎“火烧”，决心彻底改正“错误”，把革命和建设搞得更好。“纪要”还明确提出，要“不折不扣地、雷厉风行地”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各地区、各部门、各企事业单位，都要组织两套班子，一套抓革命，一套抓生产。强调生产指挥系统，千万不能中断。抓生产的班子要短小精干，机动灵活，深入实际，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并对今冬明春的工农业生产，提出了具体要求，作了具体部署。

当时，我和省委常委同志仍然坚持认为，无论工厂还是农村，都不能“停产闹革命”。但是，在林彪、江青的唆使下，由中央“文革小组”起草并强行以中央名义发出的关于在工交系统和农村开展“文化大革命”的两个文件（即“工业十条”和“农业十条”）传到各地以后，到处是“踢开党委闹革命”，运动从党政机关和文教单位，进一步扩展到工厂、农村。城乡“四清”运动亦告停止，“四清”工作队被迫撤离，有

的转为“造反”。全国性大乱更加不可收拾。江苏南京地区也拉起了包括学校、工厂和党政机关在内的，跨行业、跨地区的“造反”联合总部，并于12月21日、24日，分别在五台山、中山东路体育馆召开“彻底摧毁江苏省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要挟省委书记参加。我们坚持原则，拒绝到会。他们就煽动参加大会的数千人，围攻省委。接着，大批打着“赤卫队”旗号的群众也涌到了省委。当时，在陶铸同志接见“江苏省革命造反派赴京代表团”以后，省委曾同意签订了关于制止群众斗群众和关于揭批省委“资反路线”，妥善处理运动初期被整人员材料等八个问题的协议执行意见（简称“八项协议”）。少数人就煽动数以万计的群众，日夜围住省委，反对“八项协议”，责令省委书记出来也要同他们签订“协议”，并在浦口火车站拉起了“指挥部”，先后集结成千上万人，拦截火车，要求进京“告状”，以此向中央、省委施加压力，造成津浦线交通一度中断。

在极其紧张而混乱的情况下，我坐镇省委，统筹全局。省委书记处书记李士英、南京市委书记王楚滨等同志，先后深入工人群众，进行劝阻。哄闹到12月26日晚上，天气严寒，大江南北落起了大雪。爬上火车的几批“赤卫队”近万人滞留在滁县火车站。省委考虑，无论“赤卫队”还是其他群众组织，多数人受蒙骗，应该与煽动闹事者区别开来。所以，迅即组织力量，除向当地借用了一批棉被以外，紧急调运5000条棉被送去御寒，同时继续说服群众，返回南京。

在此期间，农村局势仍然基本稳定。干部、群众的大多数是不赞成“停产闹革命”的。各地冬春农田基本建设和其

他农事活动，仍然坚持进行。内乱严重的是城市。省委在采取措施，继续稳住局势的同时，并于12月24日向各地、市、县委和专署、市、县人委发出《关于坚决劝阻群众之间的冲突的通知》，要求各地党委召开机关、学校、工矿企业干部会议，进行教育，对已经发生的群众之间冲突的事件，要总结经验，主动承担责任，做好深入细致的工作。号召广大干部、群众，按照“十六条”的规定，“要用文斗，不用武斗”，要“抓革命，促生产”。“通知”强调，凡是发生群众斗群众、群众相互冲突的地方，地委、专署，市委、市人委，县委、县人委的主要负责同志，包括正副书记、常委，正副专员，正副市长，正副县长，都要立即挺身而出，亲临现场，进行说服教育，制止事态扩大。要坚持文斗，坚决反对坏人挑动群众之间搞武斗。对于在武斗中受伤的群众，要进行慰问，治疗抚恤。

省委尽管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但是，各级党政机关受到的冲击越来越严重。省级各部委厅局和各地、市、县党委和政府部门，只剩少数人抓生产，也是东躲西藏，难以正常工作。大批涌到车站，包括滞留滁县、浦口的群众，在少数指挥者的煽动下，涌到省委，然后冲进江苏饭店，制造了两派群众之间的严重武斗冲突。

这就是1967年1月3日晚上发生的江苏饭店事件（简称“一·三”事件）。所谓“革”（“造反派”）与“保”（“赤卫队”）两派群众的武装冲突持续了三天，南京市内交通一度停顿。当时，我们省委和南京市委的领导同志，偕省公安厅等有关部门的负责人，曾亲临现场，进行劝阻和教育，但未能制止。事后查明，这个事件，完全是造反派坏头头蓄意策划和挑起

的。他们还制造耸人听闻的谣言，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赴京诬告省委"挑动武斗"，从南京军区"调动枪支武器"打死"造反派"，等等。其目的是为着进一步向中央施加压力，制造更大规模的武斗冲突，冲垮省委和各级党委。实际上，在双方冲突中，并无一人死亡，约有300人受伤，多数仅是皮肉轻伤，我们及时组织医务人员帮助包扎，并加以慰问，送他们回去。

江苏南京地区的"一·三"事件，惊动了中央。张春桥一伙乘机诬陷江苏省委"坐山观虎斗"，挑动"造反派"进一步把矛头指向省委。当时处境日益困难的周恩来总理，在日理万机之中，亲自接见赴京告状的江苏"造反派"代表，处理这个事件。并在1月6日晚上，接连两次打电话给我，查询情况。

这里，我将当时省委记录的第一次通话内容，原文抄引如下：

总理：你(是)江渭清？你现在到什么地方？

江：我在省委办公的地方。

总理：不是几天找不到你吗？

江：我一直在省委。(12月)31日昏倒后，休息了几天。

总理：没有离开南京城吗？许世友都找不到你嘛！

江：我(1月)4日早晨都与许世友、杜平政委碰头的嘛。

总理：(1月)5日，学生去找许世友，说你不知

道到哪里去了!

江:我就与陈光同志住在一起。因为我这几天休息,许多问题由陈光同志负责主持(处理)。

此时,随着事态的发展,省委大院内外,围满“造反”人群。高音喇叭昼夜不停地对着省委办公大楼,高喊“造反有理”和“打倒”、“砸烂”的口号。但是,从这个电话记录里,也可以看出我们省委领导班子始终团结一致,处惊不变,仍在坚守岗位。我在电话里,还按总理的提问,作了认真的回答,汇报了南京市内交通和轮渡、火车均已恢复,商店并未关门,武斗冲突亦已停止。省委根本没有调动过武器去支持任何一派群众,冲突中并未造成人员死亡等情况,澄清谣言,让总理放心。

按照周总理电话里指示精神,我在1月7日主持召开省委书记处会议,分析局势,研究对策。我在会上告诫省委和南京市委的同志,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还会出现更大的内乱。我特别讲了中央“两报一刊”元旦社论,直率地对大家说:“他们的口气,是乱得不够。”我说的“他们”,就是指实际上控制了“文革”领导权的中央“文革小组”。我还对大家说,“造成大乱最核心的是大的武斗。”要大家尽一切努力,避免再发生类似江苏饭店那样的事件,并提出了省委常委分工意见,李士英同志,还有许家屯,由周一峰同志陪同到“造反派”那里做工作;包厚昌同志由周泽同志陪同到“赤卫队”那里做工作;陈光同志由韩培信同志陪同做机关干部工作。分工以后,我反复强调,核心问题是平息大的武斗。

这次书记处会议以后,省委实际上很难再集中开会。在

上海“夺权”的带动下，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全面夺权”的风暴，“打倒一切”的全面内乱更加升级。但是，我和省委其他领导同志，没有一人躲避，仍坚持工作，包括接见“造反”组织，处理工业、交通中最紧迫的问题。直到1月26日，江苏南京地区的“造反”组织发表“夺权声明”，向省委、省政府和南京市委、市政府夺权，这就是所谓“一·二六”夺权。全省各地的“造反”组织，也随之向各级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夺权”。从省委到各地的所有党政领导干部，包括一些基层干部，都被作为“走资派”揪斗“打倒”。我在运动开始时曾指出的“大乱、长乱”局面，愈演愈烈了。

六 我被“请”到了北京

所谓“一·二六”夺权以后，江苏南京地区的“造反”组织更加派别林立，内讧不已。他们一面抢着“夺权”，一面争着揪“走资派”，把我们省委的所有书记、常委，分别扣押了起来。我被扣押在南京炮兵工程学院。

在一片混乱中，各派“造反”组织召开大会、小会，对省委和各部委厅局的领导人搞车轮战术，进行轮番批斗。由文凤来等“造反派”坏头头主持，在五台山体育场召开批斗大会，我们省委十几个领导人都被揪上了台。我被戴了一尺多长的高帽子，胸口挂了写有所谓“反革命修正主义”字样的大牌子。他们还极其蛮横地搞“喷气式”，进行人身侮辱，我

就同他们“智斗”。我先对主持会议的坏头头说：江苏“走资派”，我是为首的。毛主席教导：要缩小打击面，扩大教育面。你们要批斗，就留我一个在台上。他们不准我说话，有的狂喊：“滚，滚，把他轰下去！”那时天气严寒，我们都穿着棉大衣，戴了帽子。他们强令脱掉。我说：“我身体不好，大衣、帽子不能脱。脱了生病，你们就斗不成了。”接着，他们要我低头弯腰。我说：“我不能低头。把头低了，台下就看不到江渭清这个‘走资派’是什么样子了。”我还对他们提出：我要坐着批斗。因为我的腿受过伤，不能站。他们无计可施，只能台上台下哄闹着乱喊“打倒”、“砸烂”口号。

就这样，我有时被单独揪斗，有时同省委其他领导人一道被揪斗，斗过再押回炮工，前后折腾了十多天。看管的几个“造反派”，态度很凶。每天早上见我未起床，开口就骂。这天上午，他们见我还睡在床上，也没有骂，只是催我起身。我问：“今天到哪里去批斗？要不要带毛巾、牙刷？”他们说：“随你。”然后，等我穿戴好衣帽，就带着我来到门口，一辆部队的轿车已经停在那里，把我直送机场。

我记得很清楚，这天的时间是：1967 年 2 月 8 日。

我登上飞机，8 个机务人员，就我一人乘坐。敬爱的周总理派了一位秘书到北京机场来接我，我如见亲人，差点落泪。轿车把我送进了京西宾馆。我问：“要我来北京干什么？”秘书说：“毛主席、周总理请你到北京来休息。”

这时，在上海“一月革命”煽起的“夺权”、“罢官”的狂潮恶浪中，仅以华东地区来说，除我们江苏省委领导人都被揪斗以外，上海的陈丕显、曹荻秋，浙江的江华，山东的谭启

龙，安徽的李葆华等一批省、市主要领导人，都已被揪斗，就连中央政治局常委陶铸同志，也被宣布“打倒”。在毛主席的亲自过问下，周总理顶住陈伯达、康生和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中央“文革小组”一伙人的压力，作了周密的安排和组织，把我和其他一些省、市的主要领导人“请”到北京，加以保护。

当然，这些情况我是事后才知道的。当时，我被“造反派”连续揪斗关押，已经隔断了同中央的联系。住进京西宾馆的当天，服务员先通知我理发、洗澡，也没人来打扰。第二天，周总理派李先念、余秋里、李人俊等同志来看望我。我向李先念同志表达了对周总理和他们几位前来看望的谢意。在李先念同志与我谈到为什么会在“文化大革命”中“犯错误”的问题时，我讲了五句话，十五个字。

第一，“想不通”。“文化大革命”，到底“革”谁的“命”？我们这些老同志，跟着党和毛主席南征北战几十年了，怎么都是“走资派”，都成了“革命对象”？还有的被搞得家破人亡。谁想得通？

第二，“看不惯”。“红卫兵”破“四旧”，乱冲乱砸，是一场大破坏。成千上万人到处“大串联”，把铁路交通搞瘫痪了。学校全部“停课闹革命”，工厂、农村也跟着搞“停产闹革命”。毛主席说“抓革命，促生产”，现在，学校不读书，工厂不生产，再闹下去，农民也不种田了，还有谁来管生产？我们各级领导都焦急，对这样搞法看不惯。

第三，“吃不消”。什么“斗、批、改”，把所有干部当敌人打，往死里斗，完全蛮不讲理。我们过去发动群众斗地主、恶

霸，还讲政策。“十六条”明文规定，要“用文斗，不用武斗”。现在大会、小会轮番“请罪”、逼供。开批斗会，挂牌子、戴高帽子的“走资派”、“阶级敌人”一长串。还动武揪头发、“喷气式”90度弯腰，拳打脚踢，说是“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一天斗几次，一斗就是几个钟点，有谁吃得消！

第四，“有抵触”。“文化大革命”，开头说搞几个月，后来说搞到今冬明春。现在到处揪斗，一片打倒，从上到下，“罢官”、“夺权”，党的领导没有了，各级党政机关都让“造反派”夺了权。说是“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还不知道乱到哪一天能“治”。所以抵触情绪越来越大。

第五，“犯错误”。运动一开始，中央下达“五·一六通知”，毛主席就批评我们这些当领导的“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后来，他老人家号召我们到群众中去，要“敢”字当头，不要“怕”字当头。再后来，说是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就不是怕不怕的问题，也不是革命革到自己头上，“触及灵魂”的问题。大批领导干部被揪斗，从灵魂到身体都受折磨，有的被拖死斗死了。所以，要讲我为什么“犯错误”，就因为想不通、看不惯、吃不消、有抵触，对这样搞“革命”，不光“不理解”，也没法“不犯错误”了。

由于我对当时中央政治局内的斗争情况不了解，所以我还对李先念同志说：你们在上面，没有被批斗，体会不到。请你谢谢毛主席关心，谢谢周总理保护我们这些老干部的苦心。同时，也请你把我的这些想法转达给毛主席，让他老人家了解下情。其实，就在我讲“想不通”、“看不惯”、“吃不消”、“有抵触”的时候，叶剑英、陈毅、徐向前、聂荣臻等老

帅，已经对林彪伙同陈伯达、康生、江青乱党、乱军，破坏生产的倒行逆施，提出了强烈的抗争。李先念与李富春、陈毅、谭震林等几位副总理，也已在商议同中央“文革小组”一伙人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并且在几天之后，即2月16日，谭震林在陈毅、李先念等同志支持下，“大闹怀仁堂”，当众揭露张春桥等人打倒老干部的罪恶阴谋，痛斥江青“比武则天还凶”，因而被林彪、江青诬为“二月逆流”。所有这些，正是在我刚到北京的那段时间里发生的。

我来到北京以后，随着全国范围的“打倒一切”、“全面内战”加剧，江苏南京地区同样出现了大规模的动枪动刀的武斗，内乱日趋严重。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一伙，出于乱中夺权的险恶用心，变本加厉地唆使“造反派”把斗争矛头指向各级党政领导干部，特别是把我们这些老干部，当成他们篡党夺权的最大障碍，确实“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在他们的煽动下，我也曾被多次提出要揪回南京批斗。

第一次是在3月初，周总理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接见江苏南京地区两派群众组织代表，宣布对江苏实行军管。有人当场向周总理提出，要江渭清回南京接受批斗。周总理说：江渭清到北京，是毛主席批准的，我不能作主。经请示，毛主席回答说：回是要回去的，时候没有到。再接见时，周总理就当众宣布了毛主席的这个“最高指示”，把他们的这个要求顶了回去。

第二次，张春桥、姚文元窜到南京，在5月14日这天召开大会，作了臭名昭著的“五·一四讲话”，叫嚣“旧省委”的

“走资派”还在“走”，要抓住“活靶子”，不要打“死老虎”，煽动“造反派”掀起揪斗各级领导干部的“新高潮”，并打电话给周总理，说是“造反派”要求，一定要江渭清回南京，没有江渭清在场，群众不好批斗。周总理向毛主席作了汇报。毛主席回答说：为什么不可以背靠背批？周总理据此回了电话，要张、姚把毛主席的这个“最高指示”告诉江苏南京地区的“造反派”，再次把他们顶了回去，只能搞“背靠背”批斗。

第三次，1968 年 3 月，我到北京一年多了，江苏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新华日报》公开点名批判我和陈光同志是“中国赫鲁晓夫在江苏的代理人”、“江苏党内头号走资派”。所谓“新生红色政权”的赴京代表向周总理提出，现在有了省“革委会”了，搞了“大联合”、“三结合”，毛主席也同意点名批判江渭清，可以让他回南京了吧？周总理保持他惯有的冷静、沉着，没有贸然答复，仍坚持要“请示毛主席”。毛主席听了汇报，说：批江渭清，你们都说同意，我也同意。报纸已经点名批了，还要他回去干什么？周总理就向江苏省革委会有关的领导人和几个“造反派”头头传达“最高指示”：“要江渭清回南京干什么！”从这以后，就没有人再提要我回南京了。

从以上几次“最高指示”，可以看出：毛主席对我确实是“一保到底”的，但他老人家又“同意”点名批判江渭清。这又怎么使人“理解”呢！

七　发配湖南，再回北京

196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0周年。眼看国庆节就要到了，我到北京已有两年半时间。这时，“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仍在继续。我回想自己在党的领导下，戎马半生，在新中国的各项建设事业中也尽了心，出了力，反而成了“革命对象”，这样“背靠背”批下去，还不知道会怎样发落？

就在这种更加“想不通”的心情中，我和在北京的一批老干部，于国庆前夕被逐出了北京。后来我听说，林彪、江青一伙曾处心积虑要把我们这批人全部搞到边疆，被毛主席打了坝，决定分散到各省。邓小平同志就是在那次被发配到江西的。当时被发配出去的还有朱德、叶剑英、徐向前、陈毅等老帅，蔡畅、邓子恢、谭震林、萧克、王震、曾山等一批老同志。我发配到湖南，实际上是“划地为牢”，软禁在长沙附近的马王堆。

马王堆这个地方很有名，曾出土了简帛医书、彩绘帛画和大批汉代文物，还有一具埋了2000年不腐的古尸，所以能吸引大批中外游客。不过，在我去的那个时候，还没有动手发掘，仍很冷落。那里有10幢房子，是给干部住的。我带着老伴徐敏，被安排住在第8幢。住下来以后，我也不写什么“检查”，自己背米，自己拖煤，别的什么地方不去。每天搞点劳动，在家前屋后开自留地，种菜点豆，自种自吃。

春去秋来，我在那里过了三年多“世外桃源”生活，直到1973年1月，中央关于“九·一三”林彪“折戟沉沙”事件的文件早已传达到基层。在周总理的协助下，毛主席开始采取了一些纠“左”措施，所谓“二月逆流”也平了反。我得知当时已在中央工作的华国锋同志到了长沙，就打电话给他，要去看望他。华国锋回话说，你不要来，我到马王堆来看你。当天他就驱车来了。我们见面以后，徐敏忍不住问：“国锋同志，我们到底犯了什么罪？就算犯了罪，也要给宣判。还能这样不明不白，自生自灭？”华国锋表示“完全可以理解”。我说，从1967年初离开南京到现在，已经有六年了，打算给毛主席他老人家写个报告。华表示赞成，并同意由他带回北京，转呈给毛主席。

我给毛主席的报告很快写好了，只有六七百字。第三天，华国锋再次来到马王堆，我将报告交给了他。他把住在那10幢房子里的干部都召集起来，转达毛主席、周总理对大家的关心，并当众对我宣布：毛主席要你好好休息，保重身体，问题很快会解决。周总理还要把你接回北京。华国锋走后十来天，中央办公厅正式通知湖南省委，要我返回北京。还是周总理派人到北京机场接我的。

当年8月，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会前，周总理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宣布，毛主席提议我和一批老同志当十大代表，江青、张春桥一伙起哄反对，受到毛主席斥责。他们反对我当代表的理由是，放到哪个单位选？周总理就向毛主席请示。毛主席说，江苏不能选，就作中直机关代表。他们还反对，周总理又请示。毛主席说，江

渭清不但要当代表，还要当中央委员。他们这才不敢公开反对。

现在回头来看，十大虽然按照毛主席的指示，经周总理耐心做工作，把一些在“文化大革命”中备受打击迫害，被排斥在九届中央委员会之外的老干部，如邓小平、王稼祥、乌兰夫、李井泉、谭震林、廖承志等同志，选为中央委员，我也被重新选为中央候补委员；但是，与此同时，一些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骨干也被选进了中央委员会，“造反”起家的王洪文还当了中央副主席，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结成“四人帮”，变本加厉地推行极左路线，造成了更加严重的灾难性后果。

第九章　在江西的日子里

一　受命于危难之时

党的十大以后，江青一伙叫嚣，不能把“走资派”都“解放”，不能“放虎归山”。我和其他许多老同志一起，仍闲散在北京，不给分配工作。

当时，由于对我们这批人的安排一时难以确定，就编了个“学习班”。参加学习的有德高望重的李富春、邓颖超、王稼祥、谭震林、乌兰夫、廖承志、江华等同志。那时的报刊舆论掌握在“四人帮”手里，“两报一刊”充斥着“梁效”的“大批判”，根本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学习”。虽然也出了些讨论题目，例如军队的革命化、现代化建设问题，少数民族地区的政策问题，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问题等等，布置给大家，准备讨论发言。实际上谁也没有心思去研究这些问题。大家日益忧虑的是，王、张、江、姚一伙，越来越猖獗，搞得国无宁日。特别是1974年初开始“批林批孔”，江青、王洪文等人乘机大反所谓“复辟回潮”，把罪恶的矛头指向周恩来同志，

再次煽动全国性大乱。一些地方的派性斗争愈演愈烈，有的闹到北京，其中就有江西。中共中央出面把江西省委部分常委与两派群众代表召集到北京，“学习班”从这年7月7日办到12月底。就在这样危难情况下，中央决定调我去江西工作。1974年12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华国锋、纪登奎、陈永贵在人民大会堂找我谈话。他们对我说，毛主席和党中央决定派你去江西工作，明天还要召开政治局会议，正式和你谈。今天我们先同你通一下气。

第二天，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正式找我谈话。会议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组部部长纪登奎主持。他说，渭清同志，毛主席和党中央决定派你去江西工作，担任省委第一书记、福州军区政治委员、江西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江西是革命老根据地，这个地方很重要。目前派性严重。中央把省里的领导和两派群众代表召集到北京来，已经住了好几个月了，要他们共同研究，解决江西的问题。中央决定，改组江西省委的领导班子。这次准备让他们和你一起回江西。不知道你有什么想法。

我说，江西是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老根据地。毛主席、党中央派我去江西工作，我很高兴。但是，要我担当这样的重任，我感到担子太重了。一是我的水平、能力有限，二是我八年没工作了，好多情况不熟悉，就让我当个省革委会副主任吧！我之所以这样回答，倒也不是由于“谦虚”，而是事出有因。在此之前，毛主席、周总理对我的工作安排早有考虑，但均遭阻挠。在场的其他政治局委员怕我推辞搞僵了不好办，就拿出“上方宝剑”，说：毛主席对你的工作安排亲自作

了交代。中央已经正式决定，你就不要推辞了。

我作为一名老党员，服从组织需要是自己的本份。我想既然毛主席和党中央已经定下来，没有理由再说什么了。因此表了个态：服从中央决定，一定和江西的同志一起，尽力做好工作。

政治局会议决定，要我赶在12月底之前到任，发表元旦讲话。1975年元月1日《江西日报》正式公布我任职的消息。

后来，在一次座谈会上，叶剑英同志说：渭清同志，你的工作好难分配呀！决定你去江西工作，已经是第六次安排啦。第一次安排你去山西，有人说，山西是重工业基地，不能让你去；第二次安排你去黑龙江，有人说，那里靠苏联，不能让你去；第三次安排你去湖南，有人说，等于放虎归山，不能让你去；第四次安排你去六机部，有人说，六机部管飞机，让你飞跑了怎么办；第五次安排你到中组部，有人说，到了中组部，把"走资派"统统放出来怎么办？这次毛主席亲自发话了：东也不能去，西也不能去，就让他到江西去吧！其一，江西地处中间；其二，那里是革命老根据地，他想跑也跑不掉。这样才确定下来。叶剑英同志讲的"有人"，是指"四人帮"一伙。他们对待老同志的工作安排，总是设置层层障碍。阻挠我重新出来工作，不过是其中的一例。

1974年12月底，中央派了一架专机送我去江西。同机前往的还有徐敏同志（后任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和孩子，以及两名工作人员。当飞机即将进入江西上空时，省委通过无线电与飞机上联系，说是两派群众组织都有不少人

去向塘机场，要放鞭炮迎你的到来。为安全起见，要飞机改在樟树机场降落。这样，我这次到江西，第一站就到了樟树，再从樟树坐汽车到南昌，立即同省委常委及有关负责同志见面。第二天，我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省有关负责同志列席，与大家共商治理和建设江西的大计，开始了我在江西的八年工作。

二 抓 整 顿

1975 年 1 月，周恩来同志的病情加重。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同志受毛主席委托，主持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他以高屋建瓴、势如破竹的革命魄力，以及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领导才能，与“四人帮”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全国各条战线进行大刀阔斧的整顿。我到江西后，遵照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集中精力抓好三件事：一是学习理论，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二是促进安定团结，消除派性，增强党性；三是千方百计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三件事相互联系，都通到整顿。

如何通过整顿，打开局面，我决心依靠各级领导，依靠广大干部、群众，倾听他们的意见，以便作出决策。于是，我先到基层调查。元旦一过，我就到九江。这个地方是长江中游“万商云集之区”，江西茶叶、木材、粮食、瓷器和其他工业品的集散中心。就是这样一个得天独厚的港口城市，因“文

革"中"派仗"不断，社会秩序极度混乱，工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我到九江前后十天时间，跑了六县一市，所到之处，基层干部、群众都迫切要求省委按照中央精神，来一次彻底整顿。调查结束后，我在向省委写的汇报中，针对调查发现的问题，突出强调了三点：一是毛主席的三项指示，切合下面的实际，要排除一切干扰，坚决贯彻执行；二是要促进安定团结，特别是在加强社会主义教育中，要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绝大多数人应以正面教育为主，对极少数罪证确凿、民愤极大的坏人才给予准确而有力的打击；三是要千方百计克服困难，恢复发展生产。九江地区"山上是银行，水里是宝盆，地面是粮仓"，生产潜力很大，但粮食却不能自给，港口的优势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因此，要振奋广大干部、群众的精神，下决心抓好工农业的整顿，把经济搞上去。

这一年，根据省委的意见，九江港开展了以加强生产指挥系统和以增产节约为主要内容的企业整顿。将三号码头的原六、七、八号仓库拆除，改建为 18 米双跨、净空 7.5 米的新仓库两座，总面积 3750 平方米，并配有相应的机械设施，使堆存能力适应通过能力。9 月，交通部下达《关于九江磷矿码头设计任务书的批复》，同意在九江建设进口磷矿、煤炭码头各一座及相应配套设施。为配合九江港新港区的建设，南昌铁路局在南浔线新建七里湖车站，使港口吞吐量增加到 200 万吨，以促进港口腹地经济的发展。

但是光建车站还不行，关键是要保证铁路畅通。向(塘)九(江)铁路北连长江，南接浙赣线向东西辐射，是南昌

联结各地的主要通道。可是，当时成了“卡脖子”路段。从1973年第4季度开始，连续17个月完不成运输任务，车道受堵，搞得南昌前往浙、湘、闽、粤、桂等地的火车得了“肠梗阻”，无法畅通。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是抓铁路的整顿。当时，邓小平同志一针见血地指出：南昌铁路的问题，省里就有人支持。一定要把铁路上搞派性活动的里外联系割断。铁路上的派性问题，地方解决不了的，由铁道部解决。铁道部部长万里同志坚决执行小平同志的指示，亲临江西帮助解决铁路问题。4月28日，中共南昌铁路局委员会召开分局以上机关干部和南昌地区铁路基层单位领导干部大会，万里在会上宣布了经铁道部研究、中央批准的南昌铁路局新的领导班子名单。同时调整了向塘机务段的领导班子，对极少数坚持错误的派头头采取了坚决调离的措施，要求省级机关、南昌市和其他有关地区的同志都要支持铁路搞好安定团结，搞好运输生产，决不允许任何人到铁路去串联，去搞派性。南昌铁路局4月份动“手术”，5月份开始，月月超额完成运输任务，整个铁路畅通无阻，安全正点。先行官先行一步，更加坚定了我们抓整顿的信心和决心。

接着就是整顿农业。江西号称“鱼米之乡”，“文革”闹了几年，农村政策无法贯彻，闹得几乎饭都吃不成。省委下决心加以整顿，尽快恢复农村正常的生产秩序。于是，在1975年3月8日至21日，召开了全省“农业学大寨”会议。我在会上代表省委作了总结报告。强调农业的整顿着重抓“两个基本”：一是加强党的基本路线教育；二是抓好农田基本建设。在党的基本路线教育中，要严格执行现阶段的农村各项

经济政策。明确宣布，农村人民公社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政策，人民公社社员可以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的政策，还有“六十条”规定的其他政策，都必须切实贯彻执行。当然，实行改革开放以后，农村经济政策又发生了重大变化，但从当时农村经济受到极左思潮严重干扰破坏的混乱状况来说，强调贯彻执行这些政策，对于恢复和建立农村的正常生产秩序，是完全必要的，对推动江西农业的发展是起了作用的。

在农田基本建设方面，我提出山、田、水、林、路统一规划，综合治理，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大力兴修水利，改善排灌条件，改良品种，改变耕作制度，实行“科学种田”，把广大党员和干部、群众的积极性及时引导到发展农业上来，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力争农、林、牧、副、渔各业都有一个较大的发展。

会后，全省迅速掀起大搞农田基本建设的热潮。1975年和1965年相比，全省旱涝保收面积由1330万亩增加到2020万亩，新增有效灌溉面积802万亩；农村用电量增长6.9倍，有16个县初步形成以小水电为主的发电网；化肥施用量增长20%；农业机械总动力增长3.1倍。由于生产条件得到改善，一些低产田变成高产田。当年虽然自然灾害频繁，但早稻、晚稻和棉花仍然获得了好收成，粮食总产达到216亿斤，比1974年增产26亿斤，是解放26年来增产粮食最多的一年。

第三是整顿工业。在华东六省一市中，江西工业生产排在倒数第二。我和省委常委一起，认真分析了全省工业生产

的被动局面，于1975年4月下旬召开全省“工业学大庆”会议。会上，我代表省委强调，工业的整顿要突出重点，狠抓煤、电、运输等薄弱环节。当时，江西同全国其他地方一样，工业受极左思潮的干扰，管理混乱不堪，把中共中央1961年颁发的《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称之为“修正主义的管、卡、压”；把贯彻按劳分配原则的政策和措施，称之为“物质刺激”、“奖金挂帅”；把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以及企业在财务、技术各个环节的岗位责任制，称之为“专家治厂”、“技术挂帅”；把企业应该上缴国家的利润，称之为“利润挂帅”。凡此种种，都在痛加批判之列。大批工程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被下放到车间，监督劳动，接受“再教育”。管理机构被冲击，管理人员被批斗，把坚持生产岗位的职工和干部，诬为搞“唯生产力论”；把不上班不劳动、搞动乱的人，吹捧为“反潮流英雄”，致使许多企业管理瘫痪，生产大幅度下降。针对这种极端混乱的状况，我在报告中明确提出企业领导要理直气壮地抓生产、抓管理。为实施计划管理、劳动管理、财务管理、技术管理而建立的必要规章制度，只要是来自实践，有利于调动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有利于解放生产力，就是合理的，必须坚决贯彻执行。各级地方党委要支持企业领导大胆工作，迅速恢复生产秩序，扭转生产下降的局面。

在抓工业生产的同时，还抓了基本建设。江西过去基本建设摊子过大，资金不足，许多项目长期不能完工交付使用。我在省委常委会上提出基本建设也要整顿，下决心停一批，保一批，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常委意见一致了，全省决定

确保37个重点项目，其中25个于当年底就建成投产。

这一年，我们通过重点整顿和狠抓生产，全省工业总产值比1974年增长15.23%，开始重新出现上扬势头。

上述各项整顿要取得成效，关键在于下决心消除派性。早在1967年春，“江西省造反派革命委员会”就紧接上海“一月风暴”，夺了省委和省政府的权。随后，扩展到各地、市、县以及一些学校、工矿企业。造反派坏头头万里浪、涂烈先后钻进省革委会、省委的领导班子，策划、挑动南昌和其他一些地方的武斗不止，派仗不停，打、砸、抢成风，从省、地、县级机关、工矿企事业单位到农村基层许多干部乃至群众，被无端审查、批斗、关押。据不完全统计，这些造反派坏头头策划制造的冤假错案，全省达4100多起。“批林批孔”开始以后，涂烈、万里浪按照“四人帮”一伙的旨意，布置层层揪“孔老二”，颠倒黑白，捏造事实，阴谋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的帽子强加在省委几位主要领导人头上，还密谋策划制定了“夺权”名单，成立了“南昌民兵总指挥部”，多次围攻省委主要领导，重新挑起武斗，不断制造停工、停电、停水、停交通事件，给省委施加压力。这一年，全省工农业生产又出现下降，财政收入比1973年减少36.6%，江西已很困难的经济变得更加困难。

派性问题如此严重，中央要我到江西后下大力消除派性。我在元旦讲话中旗帜鲜明地提出增强党性，消除派性，团结起来，做好工作。有一段时间，我几乎是逢会必讲，只有消除派性，江西才有希望。为了保证反对派性的斗争健康地进行，我在1975年6月召开的省委工作会议上提出要注意

划清几条界限：一是把搞资产阶级派性同“文革”中两大派群众组织的意见分歧区别开来。二是把资产阶级派性，同党委内部正常的工作争论，同干部群众向领导提批评意见，同要求落实党的政策的合理要求区别开来。三是1975年3月5日中共中央下达9号文件之前搞派性的，只要认识了，改了就好，应当欢迎；9号文件下达之后，继续搞派性的，要限期改正，坚持闹派性不改的，必须严肃处理，不管哪一派，不管哪一个人，决不姑息迁就。四是把领导干部搞派性的同群众中搞派性的区别开来。对领导干部要严，对群众重在教育。同时，我们还规定：(1)上下之间、军队与地方之间、铁路与地方之间、军队与铁路之间，各部门、各单位、各厂矿之间坚决割断一切派性联系，禁止串联和一切非法的组织活动。(2)任何人都有权揭发检举派性活动，对领导干部搞派性的，要发动群众进行监督。(3)坚决执行中共中央[1974]21号文件，少数擅离职守的领导干部，必须立即返回工作岗位，逾期不归的，停发工资；情节严重的，经过群众讨论，给予必要的纪律处分，直至撤销职务。其他擅自离开生产和工作岗位的人员，要动员他们回来，经过说服教育仍然不回来的，按旷工处理。

在反对派性的斗争中，我强调严格按政策办事。对犯错误的同志采取“团结——批评——团结”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借以达到既弄清思想，又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引导大家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不纠缠历史旧帐，不争个人输赢。对犯错误的同志坚持“一分为二”，既严肃批评其错误，又不否定他们过去为党和人民做过一些

好事。坚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做过细的思想工作，只要他们认识了，应当热情欢迎和鼓励。如果犯错误的同志一时想不通，允许他们想一想。一犯错误就揪住不放，就打倒，这不是党的政策。我代表省委所作的这些讲话，为广大干部、群众所接受。一些曾卷进派性、犯有错误的同志，解除了思想包袱，作了自我批评，增强了团结。

对极少数不听劝告、坚持派性、一意孤行的人，我们则采取果断措施。比如，江西拖拉机厂 1974 年打了一年“派仗”，只生产 1001 台拖拉机。1975 年上半年继续搞派性，在坏头头的唆使下许多工人“脱产闹革命”，打派仗。1～9 月份生产的 1000 多台拖拉机质量低劣，才出厂过南昌八一大桥，就开不动了，要人推着走。省委下决心彻底解决这个厂的问题，并与南昌市委一道，在派人深入调查、摸清情况的基础上，于 9 月底将坚持搞派性的“老班子”“一锅端”，重新组织了一个新的领导班子，排除了派性干扰。10 月份工人全部回厂，积极性起来了，当月就生产拖拉机 400 多台，第 4 季度共生产拖拉机 1400 多台，质量也比过去有了明显提高。萍乡、景德镇等市委对几个闹派性的“老大难”单位也采取组织措施，进行了类似的整顿，生产都很快有了起色。

三　邓小平同志的两次重要谈话

1975 年，邓小平同志曾在百忙中专门抽出时间，两次

接见我，听取我所作关于江西工作的汇报，并发表了重要谈话，围绕着抓整顿，作了一系列指示，使我受到深刻的教育和极大的鼓舞。

一次是 7 月中旬，邓小平同志在中央有关领导同志听取我汇报时的谈话。

当时，经请示中央同意，我去北京看病。因为我遭受“文革”的折磨，到江西后又超负荷运转，感到很累，经常出现头晕、头痛，所以想查一查脑部有没有毛病。中央安排我住在北京医院作检查、治疗。中央有关领导同志曾到医院来看我，说江西“这个烂摊子，够你收拾的”，并约我汇报了上半年江西情况。我代表省委常委着重汇报了上半年江西贯彻落实毛主席“三项重要指示”，抓学习理论，克服派性，增强团结和进行农业、工业、交通等方面的整顿，千方百计恢复和发展生产的情况。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华国锋等十位中央政治局领导同志听取汇报，邓小平同志主持了汇报会，并对江西工作作了重要指示。小平同志说，江西的工作中央是满意的，继续这样抓下去，是大有希望的。铁路就通得很好嘛！其他工作就带动起来了嘛！江西确实狠抓了主席“三项重要指示”的贯彻落实，这是好的。江西的各项工作都取得很大成绩，所以江西的形势转得很快，从我来说是很高兴的。

在讲到反对资产阶级派性时，小平同志说，现在的资产阶级派性，不是当初的派性。现在是有领导干部参加搞宗派，拉山头，搞坨坨，这坚决不允许。批判资产阶级派性，你提出着重以教育为主，这是对的。江西消除派性的工作已经

取得一定成效，对闹资产阶级派性的干部，不管是老的，还是新的，都要进行教育，经过教育不改的，坚决调走，不宜放在领导岗位上。

在讲到整顿领导班子时，小平同志说，凡是看准了必须调整的，不能再拖延了，再拖延，我们要被动，要贻误大局。调整领导班子，要注意选择党性强的，有经验的，作风比较正派的，能团结人的，身体又比较好的老中年干部，也要注意选拔一些真正优秀的青年干部，但是伸手向党要官的不给。

当我汇报到应当如何理解"补台"问题时，小平同志说，"补台"条件成熟不成熟，第一，要看派性克服了没有；第二，要看接班人的五条具备了没有。我们要按接班人五条，搞老中青三结合，搞五湖四海。真正提拔一些优秀的产业工人、农民。现在"补台"的条件不成熟。他要"补台"，你就问他：你要补什么人？是不是伸手向党要官的？伸手向党要官的一律不给。

当我汇报到江西停止"民兵指挥部"活动，撤销"批林批孔办"时，小平同志说，你们解决"民兵指挥部"和"批林批孔办"问题是好的。撤销"批林批孔办"，工作人员一律回原单位工作，是对的。"批林批孔办"，实际上把党委摆在一边，凌驾于党委之上，有些地方的党委实际上是听"批林批孔办"摆布，自己放弃了抓大事，放弃了领导权，这怎么行？

在讲到农业、工业的整顿问题时，小平同志说，你们狠抓以农业为基础是对的，要尽量争取农业丰收。重点厂矿、重点单位的工作，要狠抓落实。否则，时间很快就溜过去了。

我从北京回江西后，8月下旬召开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会上，我传达了中央领导同志对江西工作的重要指示，并谈了个人的学习体会。我说，中央领导同志特别是小平同志所作的重要指示，既表达了党中央对江西工作的亲切关怀，也表达了党中央对富有光荣革命传统的江西人民的热切期望，这是鼓舞，又是鞭策。大家要正确领会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精神，正视现实找差距，千方百计排除干扰，集中精力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还有一次是当年9月，邓小平同志单独接见我时的谈话。

那时，我去北京参加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农村工作座谈会，前后一个多月。参加座谈会的有：广东、广西、湖北、河南、浙江、福建、江西、江苏、四川、云南、贵州、河北等12省的负责同志，还有谭震林、李井泉、江华等同志，共15人。座谈会由李先念、纪登奎、吴德、陈永贵、华国锋同志主持。中央领导同志说，为什么找你们来？是毛主席提议的，找老省委书记来议一议，听听你们的意见，看行不行？这是毛主席过去一贯的做法，什么事情都同省委第一书记商量，现在又恢复了。会议集中讨论了两个问题：一是农村工作问题；二是加速工业发展问题。

在这次座谈会上，邓小平同志曾三次到会讲话，还单独找我谈过一次话，主要讲了这样几个问题。

关于各行各业整顿。小平同志说，各方面都要整顿，主席是同意的。核心是党的整顿，关键又是整顿领导班子。现在各方面都有个整顿的问题。问题相当多，不是少。应该多

花点精力和时间考虑整顿问题。小平同志还说，在整顿中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怎样宣传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有丰富的内容，是完整的一套，不能割裂开来。割裂毛泽东思想，这个问题实际上没有完全解决。所以，我们一定要强调全面地学习、宣传和贯彻毛泽东思想。

关于整顿领导班子。小平同志说，现在党内有许多问题，整顿重点放在整理各级领导班子上，一般党员的问题容易解决。一个大队、一个公社、一个县，选好一、二把手，整个领导班子就带起来了。特别要抓好县委一级，选好县委一、二把手。建立强有力的县委领导班子。过去为什么总是讲县团级，县团既是指挥机关，又是执行机关。领导班子要有老、中、青，这个班子要肯干的，能带头吃大苦耐大劳的，还要有头脑。小平同志还说，要解放和使用老干部，发挥他们的骨干作用。对此，有的人无非说你是"还乡团"，搞"复辟"等等，他说他的，搞事情总是有人要反对，不要怕。老干部要敢于发扬革命精神。为什么有的地方不过几个月时间，局面就改变了？主要是领导干部大胆、不怕。现在有些干部就是怕打倒。要不怕打倒，不怕犯错误。打倒一次，还怕打倒第二次！工作搞好了，再打倒也没有关系。不要顾虑太多。怕这怕那，就办不好事情。领导干部没有一股劲不行。要敢字当头。错了，可以改。要横下一条心，拼命干。

关于反对资产阶级派性。小平同志说，领导班子里硬是要下决心，把派性搞干净。同派性作斗争，要发动群众。北京有个"老大难"单位，过去就是老虎屁股摸不得。我们讲不管 60 岁、50 岁、40 岁的，老的、新的都得摸。摸一下，面貌就

改变了嘛!当然,要注意政策,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打击面不要宽。这个问题"文化大革命"以来翻来覆去,有经验教训。

关于落实党的政策。小平同志说,政策天天在落实,今年大有进展。这是安定团结的很重要的方面。中央副部长、各省副省长以上干部,全国还有相当一批尚未作结论,今年大体上可以搞完,对他们要做团结工作。要他们正确对待,不要发牢骚。正常的意见要说,涉及到个人的问题不要再说了,说了不利于党的团结,不利于党的事业。还是要团结起来,去争取更大的胜利。

关于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小平同志说,一个工业问题,一个农业问题,正反两方面经验都有了。不注意,往往会重犯过去的错误,没有饭吃总不行。工业、农业,两筐鸡蛋,两个问题都很复杂。不要犯主观主义错误,不小心把蛋碰破了。农业,就照你们的做法,抓好"两个基本"(加强党的基本路线教育,抓好农田基本建设)。要把粮食问题抓一下,总要有点积余。工业问题,11、12月要狠抓两个月,把工业内部的关系调整好,把领导班子调整好。年内要把机械设备检修好,把规章制度整顿好。今年把这些事情抓好,明年就有希望。

这次农村工作座谈会精神和小平同志谈话要点,我回江西后,及时作了传达、学习和贯彻。

想不到,小平同志和我的两次谈话,后来竟被"四人帮"列为邓小平同志的一大"罪状",我也因此遭到江西"造反派"坏头头更加无休无止的围攻和迫害。

四　把井冈山建设得更美好

井冈山是毛泽东、朱德等无产阶级革命家创建的我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1929 年 1 月，红军主力撤离这里后，井冈山人民遭到敌人很大的摧残。建国以后，井冈山人民在党的关怀下，为医治战争创伤，重建家园，作出了很大努力，经济有所发展。但是，由于长期受“左”的影响，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破坏，经济发展仍然比较缓慢，群众的温饱问题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一定要把革命老区井冈山建设好，这是我“文革”后期复出江西工作时的一大心愿。1975 年 11 月 12 日至 25 日，我专门到井冈山地区搞调查研究，先后跑了新干、吉水、吉安、泰和、永新、莲花、宁冈、遂川等八县和吉安市、井冈山管理局，边走、边看、边听、边讲，和基层干部、群众共商建设井冈山大计。

到新干县，县委正在开四级干部大会，我在听了县委的汇报并和基层干部座谈后，在会上讲了话。我说：有人讲，中国革命有四大圣地，第一是韶山，毛主席诞生的地方；第二是井冈山，毛主席亲自开创的第一个革命根据地；第三是遵义，遵义会议是中国革命的转折点，确定了毛主席在全党的领导地位；第四是延安，当年党中央的所在地。四大圣地，井冈山名列第二。现在我们井冈山的工农业生产搞得不够好，

与邻近几个省的地方比较，我们这里是“洼地”，是“锅底”，四面八方都比我们高。我问：井冈山有多高？会场上有人回答：井冈山最高的山是1600多米。我说：1600多米，应当成为一个“高地”，而不应该是一个“锅底”。这种状况与革命老根据地的光荣称号是很不相称的。

那么，井冈山地区为什么生产发展缓慢，成了“锅底”呢？我在井冈山地区和吉安市、县干部大会上说，是不是我们吉安的党组织不好呢？不是的。我们吉安的党组织是好的。是不是吉安的党员、干部不好呢？不是的。吉安的广大党员是好的，绝大多数干部也是好的和比较好的。是不是吉安的群众不好呢？不是的。吉安的广大群众好得很。是不是吉安这个地方不好呢？不是的。吉安的自然条件很好，广阔的山区处处有宝藏，吉泰盆地是富饶的粮仓。以吉安、泰和两县为中心，向四周扩展到吉水、峡江，土地肥沃，光照充足，气候温和，雨量充沛，适宜种植业和养殖业的全面发展。地下还有煤、铁、钨、铜等矿藏，这是发展工业生产极为良好的基础。

既然井冈山地区各方面的条件是好的，为什么生产上得不快？我通过调查认为，主要原因是两个：一是干部思想作风有问题，一是生产基础设施薄弱。这是首先需要着力解决的。当然，还有山区闭塞、交通不便等等原因，也要创造条件逐步加以解决。

当时，井冈山地区一部分农村干部，有一些很不好的风气，铺张浪费、超支挪用、大吃大喝，群众反映非常强烈。有一个县五年财政收入只有102万，可是盖楼堂馆所就用去

100多万，相互攀比摆阔气。楼堂馆所不是不可以盖，要看经济条件嘛！经济还落后，不顾群众生活困难，大盖楼堂馆所就不对了。公家这么干，干部个人也忙着营造“安乐窝”。没有钱盖房子，就超支挪用集体公款，再加上吃吃喝喝，掏空了集体经济，社员收益分配不能兑现，严重地挫伤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

为解决这个问题，我一路引导大家学习《毛泽东选集》，主要是学《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和《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这几篇著作，中心思想是鼓励大家恢复和发扬革命传统。大家回忆起当年苏区军民“红米饭，南瓜汤，挖野菜，当干粮”，“干稻草，软又香，金丝被，盖身上”，“着草鞋，背土枪，反围剿，斗志旺”，“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日着草鞋干革命，夜举火龙访贫农”的情景，心里感到热乎乎的。许多同志比前辈，看自己，找到明显差距，决心切实转变思想作风，以实际行动为建设好井冈山地区出力。有一个县委，一位副书记和两位常委在四级干部会上，当场订出还清超支借款计划，带动2200多名县、社、队干部，退还超支借款18.9万元。群众高兴地说：“领导干部改得痛快，我们甩开膀子干得痛快。”

另一个问题是改善农业生产基础设施。井冈山地区水利资源很丰富，但农田水利设施很落后，有水留不住。1969年全地区开工的几个水库，一亿立方以上的大型水利工程，搞了6年，仅完成一座。这些水利工程有的花了几百万、上千万的钱，始终没有搞起来，大部分地区靠天吃饭。我和井冈山的同志们都认为，必须大力兴修水利，从根本上改变农

业生产条件，农业才有希望稳步高产。这一年冬春，井冈山地区动员了70万劳动力兴修水利。第一步重点放在原有工程的配套上，以求尽快发挥作用。以后又连续抓了几年，以提高灌溉效益为中心，实行水、旱兼治和蓄、引、提、防、排结合的全面治理。同时，建立了一批小电站。经过这些努力，井冈山地区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得到明显改善，为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五　难忘的1976年

1976年，我们相继失去了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朱德委员长和毛泽东主席，唐山又发生了历史上罕见的大地震，党和国家遇到了极大的困难。在此期间，“四人帮”指使江西的“造反派”坏头头，上下呼应，在全省掀起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恶浪，再次挑起大规模武斗，围攻、绑架、游斗各级领导干部，妄图搞乱全省，乱中夺权。同年10月，中央一举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才结束了这场长达十年之久的“文革”浩劫。这一年，是我们党历史上极不平凡的一年，也是我毕生难忘的一年。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全国人民沉浸在无比悲痛之中。周总理是“四人帮”篡党夺权的最大障碍。周总理逝世，邓小平成了他们篡党夺权的最大障碍，于是“四人帮”立即把矛头直接指向邓小平同志。2月14日，中央召

开“打招呼”会，出席会议的有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大军区的司令员和政委，中央部委的主要负责人。会议内容主要是帮助大家“转弯子”，开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会议由王洪文主持，华国锋讲话，江青、张春桥多次插话。张春桥在会上气势汹汹地点了四川、福建、浙江和江西的名，要我们向群众公开检讨，把邓小平的关系彻底交代清楚。江青在会上虽已多次插话，仍觉意犹未尽，又单独召集东北、华北、华东和华南12省(市、区)的书记开会，滔滔不绝地讲了三个多小时，肆无忌惮地攻击邓小平同志。

邓小平同志复出主持中央工作以来，经过大刀阔斧的整顿，社会秩序日趋稳定，国民经济日渐恢复，这是有目共睹的。人心思定，人心思治，“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真是颠倒黑白，失尽人心。“四人帮”把邓小平同志主持下制定的一切正确的政策措施全盘否定。一批坚决执行党的正确政策的领导干部，再次遭受残酷斗争。一批在整顿中受到批判处理的坏头头又纷纷出笼，整个社会重新陷于恐怖与混乱之中。

我从北京参加“打招呼”会议回来，立即遭到涂烈、万里浪一伙的围攻。这伙人一面给江青写效忠信，一面密谋制定了“围垮省委领导，搞乱全省局势，争取地市起义，造成既成事实，迫使中央表态”的反革命夺权计划，大肆污蔑省委是“还乡团执政”，“复辟派掌权”，说我是“邓小平的黑干将”，“还乡团的分团长”，“胡汉三(电影《闪闪的红星》中还乡团的团长)又回来了”等等。在他们的日夜围攻下，致使省委根本无法工作，处于瘫痪状态。这时，省委有的领导同志主张

赶快向中央打报告，揭发批判邓小平，争取主动。我觉得这是个党性原则问题，坚决反对。我说，你们要打报告你们打，我是不会签字同意的。

1976年3月的一天，涂烈一伙指使“造反派”突然袭击，强占了我的宿舍，使我有家不能归。我在福州军区司令员皮定均的关照下，住到了位于南昌市郊的福州军区政干校。住进干校时间不长，头痛、抽筋的老毛病又犯了。本想离开江西去外地治疗，但考虑到我是省委常委一班之长，要对党和人民负责，在最困难的时候坚守岗位，不能离开，因此我向中央报告，要求留在江西治病。经中央同意，住进位于南昌市区的福州军区陆军九四医院。这个医院派性斗争也很厉害，我住院的消息很快被透露给了地方上的造反派。一天，涂烈指使一伙人开着卡车冲进医院，找到我的病房，见我躺在病床上吸氧。不由分说，便拔掉我的氧气管，气势汹汹地责问我为什么不住地方医院而住部队医院？我的秘书回答说，首长是军区政委，住部队医院是经中央同意的。他们恼羞成怒，一把抓掉我秘书的眼镜，将我从病床上强行拖下来拉上卡车，我的警卫员机智地跟着上了车，想方设法保护我。他们本想把我拉到大街上游斗，不料卡车开出去不远，我因供氧、供血不足浑身抽筋，抖得厉害，又昏了过去。事后，听警卫员说，这伙人有些手忙脚乱，说是不好了，不好了，昏过去了。他们不得不改变计划，把我送到江西人民医院去抢救。第二天一早，他们仍贼心不死，不顾我的病情，竟惨无人道地用医院装死尸的车子强行拉我再次上街游斗，并要医院派医生随车前往，以防出现意外，推卸责任，理所

当然遭到医生的严词拒绝。游斗途中，我又出现抽筋、昏迷，他们不得不重新把我送回医院。那一段时间，我就这样接连不断遭受迫害和折磨，身心受到严重摧残，吃的苦头比“文革”前期还大。

这年9月9日，是中国人民极其悲痛的日子，毛泽东主席逝世了。这天下午16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向全世界公布了毛泽东逝世的消息。这一噩耗如同晴天霹雳，震惊了整个中华大地。江西2800万人民怀着十分崇敬和爱戴的心情，用各种方式悼念自己的敬爱领袖。即使是在这样悲痛的时刻，“四人帮”在江西的一伙爪牙，仍然不忘进行破坏。他们力图阻挠我代表江西全党和全省人民主持悼念活动。经过复杂的针锋相对的斗争，才挫败了他们的阴谋。毛主席的遗体安详地躺在人民大会堂的鲜花翠柏之中，我和江西的其他几位同志代表全省人民去北京向他老人家深深鞠躬告别。接着在南昌举行了江西省各界人民悼念毛泽东主席大会。会上，我代表省委、省革命委员会、省军区致悼词。

在全省人民深切悼念毛主席逝世的日子里，涂烈、万里浪一伙认为篡党夺权的时机已到，心急火燎地拟定了省委主要部门和部分地、市、县委的官职名单，准备一旦夺权成功，立即走马上任。然而，他们的美梦很快化为泡影。

10月6日，中央一举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接着，中央政治局召开“打招呼”会，宣布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实行隔离审查的决定。江西是受林彪、“四人帮”直接插手破坏的重灾区，“内伤”和“外伤”都很惨重。林彪折戟沉沙，

全省人民曾高兴过一阵，但“四人帮”仍在作祟，倒行逆施变本加厉。毛主席逝世后，大家对党和国家的前途忧心忡忡。现在听说粉碎“四人帮”，大街小巷，鞭炮齐鸣，人们欢呼雀跃，奔走相告。除“四人帮”在江西的帮派体系以外，党内党外无不额手称庆。在欢庆十月胜利的日子里，我更禁不住高兴地吟了一首小诗：

纵观“文革”不寻常，大地神州遍地霜。
奸贼乘机登宝座，忠良迫害下牢房。
国民经济临崩溃，传统精神几破光。
幸喜中流来砥柱，马列主义万年长！

粉碎“四人帮”后，我们遵照中央部署，着手清查江西同“四人帮”篡党夺权有牵连的人和事。“四人帮”在江西的帮派，盘根错节，自成体系，清查工作，到处遇到障碍。我们得到中央的支持，得到全省各级党委和广大干部群众的支持，坚决排除干扰，基本上把江西同“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查清了，一方面深入批判“四人帮”的反动帮派思想，使绝大多数因受欺骗蒙蔽而参加“造反派”的群众提高认识，重新回到正确的立场上来；一方面着手摧毁“四人帮”在江西的帮派体系，根据确凿的材料，坚决把参加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篡党夺权活动的骨干分子从各级领导机构中清除出去，对极少数罪行严重、民愤极大、触犯国家刑法的坏头头，如涂烈、万里浪则予以法办。对“文革”期间林彪、“四人帮”在江西一伙制造的大量冤假错案予以平反，同时为一大批受迫害的干部、知识分子落实了政策。

通过这些工作，江西又逐步恢复平静。“文革”之前，一

些外宾因为向往中国的革命摇篮井冈山，常来江西参观。“文革”之中，外宾来江西中断了。现在又有许多外宾要到江西来参观访问。一方面，他们想来看看革命老根据地；另一方面，听说闽、浙、赣三省是受“四人帮”干扰破坏最严重的地方，他们也想看看到底是个什么情况。1977 年上半年，先后有 30 多个国家的驻华武官和夫人，80 多个国家的驻华大使和夫人以及外交官，60 多个国家的驻京记者，参观访问了井冈山和南昌。许多外宾参观访问后，热情称颂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革命实践，称赞井冈山不愧是中国革命的发源地。他们还称赞南昌市，不仅是个英雄的城市，而且是个文明的城市。

大批外宾的到来，标志着江西又开始苏醒了。

1977 年 8 月 12 日至 18 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这次大会在揭发“四人帮”和动员全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面起了积极作用。会上，我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

六　伟大的历史转折

1978 年 5 月 11 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一篇极其重要的文章，从理论上否定了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领导人提出“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引起人们的广泛注意。由此围绕着真理标准问题开展了

全国性的大讨论。成为粉碎“四人帮”以后，进入新的历史时期的一场伟大思想解放运动的开端，对于促进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我们积极参加和部署了这场讨论。9月25日，我在省委党校干部读书班的开学典礼上作了《坚持实践第一观点，坚持实事求是作风》的报告，旗帜鲜明地支持《光明日报》这篇文章的观点，强调坚持实事求是，要“敢”字当头。敢于实事求是，这是无产阶级党性的表现。自己错了，不护短，不遮丑，敢于承担责任，勇于改正错误。对于错误的倾向，敢于揭露，敢于开展原则性的斗争；对于林彪、“四人帮”设置的“禁区”，敢于冲破；对于搞乱了的思想、理论、路线是非，敢于拨乱反正。这就是无产阶级彻底的无私无畏的唯物主义精神。同时，还强调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就是要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来认识事物，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好的就是好的，坏的就是坏的，对了就是对了，错了就是错了。成绩不夸大，错误不隐瞒，不能弄虚作假。说假话的人，是不老实的人。如果不改，一害人民，二害自己，终究是要垮台的。

我这个报告，《人民日报》作了报道，《光明日报》摘要发表，并被收进了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这本小册子里。

1978年11月，我到北京参加了中央工作会议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央工作会议先开了一个多月，接着于12月18日至22日，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是我们党在建国以后的一个

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伟大转折。在邓小平同志的指导下，全会高度评价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严正批评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恢复和发扬了党内民主和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果断地决定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从1979年起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在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期间，还解决了为1976年4月5日天安门事件彻底平反的问题，纠正了"文化大革命"中对部分老同志所作的错误结论，撤销了中央有关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错误文件。同时，确定了解决好这类问题的方针、政策。

参加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民主气氛浓。不少同志在会上敢讲真话，敢讲心里话，敢讲实在话，再也不是林彪、"四人帮"横行时，逼着表态，逼着讲假话、空话、大话，不许讲真话的情况了。许多同志敢于把问题摆出来，把矛盾揭开来，对中央一些领导同志和一些部门的缺点错误，指名道姓，直言不讳，摆到桌面上，公开进行批评。对于工作，不论是政治方面的、经济方面的或者是组织方面的，大家敢于提出意见和建议。党中央很民主，凡是正确的意见，都及时采纳了；一时不能办的，也都有个说法。比如，对一些历史遗留问题的处理和人事安排，就是集中了大家的意见，才作出决定的。会议开得生动活泼，大家畅所欲言，确实是党内生活的一个重大进步。

我参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回南昌，已快到年底。

1979年1月，我主持召开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会上，我传达了中央工作会议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研究和部署了贯彻意见。我协同省委常委一班人，在以后一些日子里围绕工作重点转移，主要抓了三件事：

第一件事，继续深入开展真理标准的讨论。江西受“两个凡是”的影响很深。粉碎“四人帮”后，虽然在全省开展过真理标准的讨论，但不广泛、不深入，地区之间、部门之间很不平衡。省委决定认真补上这一课，除作出专门部署，我在省委党校举办的第二期干部读书班上还作了长篇报告，反复动员，广泛深入地开展这一讨论。我和省委常委的一些同志，参加并且引导大家进行讨论。通过这次补课，对于帮助大家理解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对于推动江西全党实行工作重点的转移，开始有了一个比较好的思想基础。

第二件事，拨乱反正，进一步落实党对各种人的政策，包括错划“右派”的改正，经过长期劳动已成为自食其力的地富成分的改订，等等，以及历史冤假错案的平反昭雪。江西大部分是老区，在苏维埃时期发生过多起冤假错案，如所谓“AB团”问题就造成了许多冤案。井冈山武装割据时期的袁文才、王佐同志一案，也是一起重大冤案。还有一些其他冤假错案，包括红军长征后留下来的基层干部、群众，被错误扣上种种政治帽子的，经查实以后，都一一平反昭雪。落实政策的工作，一直延续到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之后，根据“决议”的精神，又对平反冤假错案作了一次复查，比较彻底地解决了这个问题。这样，就把江西全省人民进一步团结起来，为工

作重点的转移，建立起群众基础。

第三件事，抓经济。按其重要性来说，这是第一位的工作。上面讲到的真理标准的讨论和冤假错案的平反，其基本目的都是为着解放思想，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投身于现代化建设。我初到江西工作，考虑最多的除了整顿，就是如何改变江西的经济面貌。因为处在“文革”之中，抓整顿虽有成效，但为时不久整顿就搞不下去了，无法集中精力搞建设。粉碎“四人帮”的头两年，江西经济基本上仍是处于徘徊的局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省委、省政府才开始用比较多的精力去抓经济。

省委、省政府真正全力以赴抓经济，还是1979年4月中央对国民经济提出“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之后。根据江西的情况，我们首先抓了经济调整工作：一是根据中央“决不放松粮食生产，积极发展多种经营”的农业生产方针，调整农业内部结构。经过调整，1981年，全省林、牧、副、渔业产值在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1979年的23.9%上升到26.3%。二是调整工业结构，重点加强轻纺工业以及交通、能源等薄弱环节的建设。对轻纺工业实行“六个优先”，即：原材料、燃料、电力供应优先；挖潜、革新、改造措施优先；基本建设优先；银行贷款优先；外汇和技术引进优先；交通运输优先。1980年，轻纺工业投资额在全省工业投资总额中的比重，由1978年的6.4%上升到13.3%，轻纺工业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1978年44.7%上升到48.7%。三是调整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压缩基本建设规模，停建、缓建一批建设周期长、经济效益

差的工程。这年，全省确定了18个重点工程和372个竣工投产项目，对停建、缓建工程认真做了善后工作。1980年，全省国民经济积累率由1978年的27.7%下降到25%。调整工作进行一年多一点，这三方面都有进展。虽然还只是几个百分点的变化，但它标志着江西的经济正在走出低谷和徘徊，向着比较合理的方向发展，意义是重大的。

当时，江西在贯彻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中，我要着重提一下农村经济政策和农业经营管理体制的调整。我对于农业，是始终不敢放松的。民以食为天，三年困难时期我们吃足了农业大幅度减产的苦头，所以始终不敢对之有所懈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有利于发展农业的决定，我同省委常委同志商量，大家表示坚决贯彻执行中央的决定。根据江西的情况，采取了以下几项措施：

一是较大幅度地提高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国务院规定18种农副产品收购提价，江西增加了3种，提高了21种农副产品的收购价，其中稻谷提价21.6%，油菜籽提价24.7%，棉花提价15.2%，生猪提价21.6%。

二是降低化肥、农药、农用薄膜和农业机械的销售价格。

三是减轻农民粮食负担。特别是对贫困老区，省委在1980年7月召开的全省革命老根据地建设工作会议上，提出“要让老区人民吃饱饭”，免掉了老区人均口粮不足200公斤的几万个生产队的粮食征购任务。到1981年，全省连续三次调减粮食征购基数，共减购6.76亿公斤贸易粮，并相应地扩大超购、议购粮比重。

四是调整、改革农业经营管理体制。这是个逐步解放思想，逐步进行调整、改革的过程。开始是根据中央有关发展农业生产决定的精神，落实生产队经营自主权，取消限制社员种自留地、搞家庭副业、进行集市贸易的种种规定，并以省政府名义颁布了有关保障生产队和社员这方面权利的文件。接着，逐步朝联产责任制的方向发展。最初是包产到组，联产计酬。我记得广昌县有个生产队最早实行这个办法，很快就推开来了，到1979年底，全省约有30%的生产队采用了这个办法。就在这个时候，宜春地区出现了“四专一联”(专业队、专业组、专业工、专业户，联产计酬)责任制。有的地方，又发展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责任制。

省委从1980年开始连续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各地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情况，提出边远山区、单家独户以及集体经济不巩固、生产搞得不好、困难落后的地方，可以搞包产到户。1980年冬到1981年春，“双包”责任制在吉安等地得到普遍推广。1981年4月，省委召开全省地、市委书记座谈会，会议肯定“双包”责任制有利于发展农业生产与改变一些贫困落后社队的面貌，要求各地在选择什么样的责任制时，要尊重广大干部、群众的意见。同年7月，省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再一次肯定了“双包”责任制，把土地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开来，让农民享有更多的自主权。于是，这种合乎当时实际、顺应农民要求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得了迅速的发展。1982年春，全省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形成了以“双包”责任制为主、多种形式并存的局面。所有这些农村经济政策、措施和调整、改革农业经营管理体制的动作，都

大大地调动了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

七 告别江西

1981年，我71岁，在领导岗位上算是“超期服役”了。由于年事已高，身体不好，面对繁重的工作，深感力不从心。这年下半年，我向中央打报告，请求退下来，让年富力强的同志走上第一线。中央同意了我的请求。1982年8月机构改革时，我从领导岗位上退了下来。

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和抗日战争初期，我就在湘鄂赣根据地同江西人民战斗和生活在一起，先后达十年之久。江西的人民和土地养育过我，而我的鲜血和汗水也曾流在江西的土地上。1974年末，我受命来到江西工作，直至1982年离开，我又在江西度过了不平常的八年，同江西的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结下了不平常的情谊。离开江西之前，当时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同志到江西视察，专门和我谈过一次话。他对我说：你是在“四人帮”肆虐的特定历史时期来江西工作的，这里又是林彪、“四人帮”直接插手的“重灾区”。我们知道，你的处境相当困难。这些年江西各方面工作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这是非常不容易的。

回顾这八年在江西的工作，我尽心尽力为党和人民做了一些有益的事情，江西的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对我的工作给予多种方式的支持和帮助。但由于当时

所处的环境特殊，加之我个人能力、水平有限，许多想做的事情还没有来得及做，许多想做好的事情也没有完全做好。每每想起，就感到抱憾。

江西素称“福地”。“六山一水二分田，还有一分道路和庄园”，这是群众对全省地貌的生动概括。有山地有水面，有丘陵有平原，发展种植业和养殖业真是得天独厚。江西盛产粮食，每年都要上调几亿斤，为国家作出了很大的贡献。赣北的棉花，赣南的柑桔、甘蔗等经济作物也都享有盛誉。江西地下资源丰富，已发现各类矿藏资源140多种，其中铜、钽、铯、铥、铌、铀等13种矿藏储量为全国第一，钨、金、碲等7种矿藏储量为全国第二，真可谓“有色金属王国”。非金属矿已探明60多种，瓷土、大理石等储量非常丰富，质地优良。这些都为工业生产的发展，展示了美好的前景。江西地上的资源，地下的宝藏，早在公元11世纪时，著名文学家欧阳修就怀着对家乡的挚爱，写道：“为爱江西物物佳，作诗曾向北人夸。”虽然这些资源都还有待于进一步的开发，但前途未可限量。

江西历代人才辈出，群星璀璨，光彩夺目。如王安石被列宁誉为“11世纪的改革家”，文天祥是著名的民族英雄，朱熹是享有很大声誉的学者，汤显祖被称为“东方的莎士比亚”，宋应星是17世纪有杰出成就的科学家，雷发达是清代宫殿、园林、陵墓等建筑的主要设计者，还有欧阳修、曾巩等等，江西的确是“文章节义之邦”。

在中国革命史上，江西更是一个丰碑叠现的圣地。1922年，毛泽东、刘少奇、李立三来安源领导工人运动。1927年8

月1日，以周恩来为首的前敌委员会率部二万余人，在南昌起义，以革命的武装反对武装的反革命，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1928年，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与朱德、陈毅领导的南昌起义的余部，会师井冈山，创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使中国革命走上农村包围城市，然后夺取全国政权的道路。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红色的中央政权在江西大地上诞生。

勤劳勇敢，艰苦奋斗，是江西革命根据地人民的光荣传统。在革命战争时期，江西人民为了反抗国民党政府的统治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为了全国人民的解放，母送子，妻送郎，前赴后继走上战场，作出了重大贡献。许多英雄儿女牺牲了，仅有名有姓的烈士即达24.7万人，约占全国烈士总数的六分之一。江西革命根据地的伟大斗争，可歌可泣，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永不磨灭的光辉篇章。

江西是个好地方，江西“老俵”好得很。我离开江西十多年了，依然时常思念江西的山山水水和勇敢、勤劳、纯朴、可爱的江西人民，为江西在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中取得的巨大成就而感到由衷的高兴。祝愿江西全党和全省人民在江泽民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坚持以邓小平同志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为指导，继续发扬优良传统，争取更大光荣，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上，突飞猛进，谱写更加光辉灿烂的历史新篇章。

第十章　晚晴荣享清平乐

1982 年，我告别江西，返回了我的第二故乡江苏。

我对江苏的一草一木，充满了眷恋之情。我与江苏省委及其他各方面同志叙旧谈新，万分激动。回顾十年“文革”，不胜欷歔。值得庆幸的是，我们党历经磨难之后，确立了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指引下，全党工作转入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正确轨道。我欣喜地看到，江苏同全国一样，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焕发了新的蓬勃生机，到处出现了蒸蒸日上的繁荣景象。这正是：小平思想辉中华，日月重光暖人心！

当年 9 月 1 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隆重开幕。我光荣地出席了大会，聆听了邓小平同志致的开幕词，胡耀邦同志作的题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报告，叶剑英、陈云同志关于干部队伍新老合作和交替问题的重要讲话，以及李先念同志致的闭幕词。剑英、耀邦、先念、陈云同志虽然相继与世长辞了，但是，他们的音容笑貌，宛然就在眼前；他们的谆谆教诲，依然那么亲切。我时刻怀念着他们。

党的十二大制定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

面的纲领。邓小平同志在开幕词中科学地总结了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我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基本历史经验，高瞻远瞩地提出了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光辉思想。这是十二大的指导思想，也是整个新的历史时期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一切胜利，都是在这个思想指导下取得的。

党的十二大规定中央和省一级设立顾问委员会，作为新老交替的过渡性机构，发挥许多从第一线退下来的富有经验的老同志对党的事业的参谋作用，这是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邓小平同志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主席，并亲任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我和其他一批老同志被选为中顾委委员。在中顾委第一次全体会议上，邓小平同志对为什么要建立中顾委和中顾委的任务，作了重要讲话。对我们这些担任中顾委委员的老同志，怎么做工作和怎么起作用，提出了殷切的希望。

会议期间，我曾向邓小平同志汇报了自己的工作、思想等情况，他老人家对我今后在江苏的工作，直至生活安排，都无微不至地关怀，使我感到无比温暖。尤其令我感奋不已的是，邓小平同志在中南海怀仁堂宴请各省的新老省委第一书记，酒酣之际，他请大家赋诗，并问：谁带头说第一句？我见一时无人接应，就自告奋勇，即席口吟七绝一首：

茅台美酒喜盈杯，畅饮中南四化催；
全国人民齐奋斗，中华重振凯歌回！

党的十二大以后，我国改革开放全面展开，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迈出了新的重大步伐。我曾对省委和各地、市的领导同志说：我退出第一线工作了，中央决定我定居南京，我就是江苏的一个普通公民。江苏的父老乡亲是我的衣食父母，各级干部是我的父母官。作为中顾委委员，我遵照邓小平同志的指示和党章的规定，在党中央的领导下，积极当好政治上的助手和参谋，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发挥自己应有的作用。

怎么支持和帮助省委及各级领导班子工作？我对自己的要求，概括为这样几句话："不顾不问，未尽责任；多顾多问，操心过分；少顾少问，谦虚谨慎。"我这样说，是提醒自己，老同志"资格老"，"牌子硬"，说话有份量，有人听，所以更要注意以身作则，处事谨慎，不要去发号施令；不要随便批条子，给第一线工作的同志添麻烦，更不能妨碍各级党委的工作。

江苏人才辈出，老同志比较多，发挥好他们的作用是很重要的。我对大家说：老同志要关心、支持新的领导，帮助选拔和培养年轻干部，搞好"传、帮、带"，新到领导岗位的同志要尊重老同志，多征求他们的意见，关心他们的生活和健康，给予必要的照顾。这样做，新老同志的合作和交替就会搞得更好。在老同志之间，有的称我"老首长、老上级、老领导"，我说不能"倚老卖老"，要改为"老同志、老战友、老同事"，大家一起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并送了四句话：帮助"四化"，保持晚节，多活几年，延年益寿。我对大家说，现在不少同志已退居二、三线了，以后还会有更多同志退下来。但是，实质性工作退了，思想不能退。要不断学习，不学习就会思

想僵化。要保持晚节，注意自律，把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坚持下去，发扬光大。什么叫“延年益寿”呢？我提了“三点”，就是气量大一点，胸襟宽一点，生活注意一点。起码活到1997年，看到香港回归；活到2000年，看到翻两番。要有这个雄心壮志，才能老马识途，老当益壮，保持那么一股精神，一股朝气。

党的十二大以后，我把坚持不懈地学习和宣传贯彻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作为自己的光荣职责。每到一处，我都要宣传这个理论。我对大家说：中国有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制定了“农村包围城市”等一整套策略，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现在有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指明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取得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辉煌成就。邓小平同志精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抓住“实事求是”这个精髓，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这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不仅向各级领导干部宣讲这些观点，还向一些大学和中学的师生宣讲。有人不是说什么“信仰危机”吗？我们就是要使全党同志，全国人民，包括青少年，建立起崇高的政治信仰，始终不渝地遵循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坚持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不动摇，紧紧地围绕着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做好各项工作，奔小康、翻两番的目标一定可以提前实现。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前程灿烂。

我们党长期处于执政地位，“文化大革命”是一次严峻

考验。在改革开放全面展开的新形势下，面临着新的考验。邓小平同志曾反复强调，“端正党风，是端正社会风气的关键”，批评了享乐至上，“一切向钱看”等歪风，教育全党同志要反对腐败。所以，整顿党的作风，加强党的政治思想建设，进行反腐倡廉、拒腐防变教育，是一件大事。1983年10月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以后，我应邀去向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学院的师生作报告，针对当时情况，曾列举了党内不正之风的各种表现，其中包括：坚持“左”的或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错误思想，在政治上不能同党中央保持一致；怀疑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对共产主义信念动摇；把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看作自己称王称霸的资本，搞钱权交易、以权谋私；为人民服务的观念淡薄，个人利益第一，贪图享乐，“一切向钱看”；个人专断，搞家长制、“一言堂”，严重违反民主集中制原则；高高在上，脱离实际，不调查研究，不关心群众疾苦，甚至欺压群众，作威作福；利用职权，搞特殊化，拉关系，走后门，损公肥私；庸人哲学，“好人主义”，不顾大局，只顾局部，搞任人唯亲、“小圈子”等等，我认为，所有这些都是党性不纯、党风不正的表现，必须坚决纠正。

为什么要不遗余力地讲党风问题呢？我曾向一些基层领导同志谈了自己学习邓小平同志指示和中央决定的体会。我说：党的思想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就难以领导人民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所以，不仅要从组织上，而且要从思想上、作风上把我们这个党风，特别是要把县团级以上领导干部的思想作风整好。把各级领导的作风整好了，就会

把全党和整个社会的风气带好。俗话说："上梁不正，下梁歪。"领导干部一定要作风正派。陈云同志担任中纪委第一书记以后，曾语重心长地告诫全党同志，党风问题是关系到我们执政党生死存亡的大事。他还讲到了群众意见很大的"吃喝风"，无论如何不能大吃大喝。

1983年夏秋，我到南通市及其所辖六个县走了一趟，看望老同志和新同志，看望基层干部和群众，看到政治上安定团结，经济发展较快，各项事业进步显著，但在经济发展中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有的干部说：国营企业是"猪"，靠国家喂养；社队企业是"鸡"，靠自己找食吃。在这种情况下，拉关系，走后门，请客送礼，吃喝浪费等现象，成为最难煞的歪风之一。一些干部中流传这样四句话，叫做"坚持原则意见多，老好先生选票多，拉拉扯扯朋友多，吃吃喝喝好处多"。这是一股不正之风。我对大家说，一定要通过思想教育，纠正党风，树立正气，把这四句话改过来，树立这样一种新风，就是："坚持原则支持多，敢纠歪风选票多，联系群众朋友多，勤俭节约好处多。"我们对外开放，对内搞活，招待一下，生意兴旺嘛！但不能动不动请客送礼，大吃大喝，不能把人情关系、"钱权交易"这一套带进党内，侵蚀党的肌体。我把这些情况向中顾委和主持中顾委日常工作的薄一波同志写了简报，还向彭真同志提了建议，对这些问题要立个制度，搞几条规定。

作为老同志、老党员，对于我们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对于当前干部、群众迫切关心的"热点"，要敢讲真话、老实话，积极地提出意见和建议，以帮助党委更好地了解下情，作出

决策，我认为这也是应尽之责。1983年初，邓小平同志到江苏视察工作，我在无锡向他汇报说：现在经济发展，政治稳定，但社会治安情况很不好。城市里女工晚上不敢上班，好人怕坏人，这样下去不得了！这件事情，只有你老人家下决心才行。邓小平同志征求我意见，怎么搞法？我说：调查研究，半年准备，打几个战役，一个战役打几仗，该抓的抓，该杀的杀，还有的押送边疆改造。犯罪分子最怕杀头，还有怕吊销户口发配边疆。邓小平同志听取了我的汇报，回去以后综合各方面意见，果断地采取措施，作出了严厉打击刑事犯罪和经济犯罪活动的决策。我重提这件事情，是因为邓小平同志高瞻远瞩，一切从实际出发，最善于倾听来自干部、群众的呼声，他的心总是同广大人民群众息息相通。他一贯强调，在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的同时，必须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只有"两个文明"都建设好，才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以，要一手抓物质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我同省委和一些市、县的领导同志见面谈话时，经常讲邓小平同志的这些重要思想。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抓精神文明，怎么行！

我还遵照邓小平同志关于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和关于必须坚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指示精神，提醒各级领导同志，要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加强对干部、群众的政治思想工作，其中包括对青年学生的思想教育。对于搞精神污染，包括传播封建迷信，兜售西方资产阶级精神垃圾的，决不能姑息。对于搞自由化，反对四项基本原则，这是

大是大非，必须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地予以反对。我非常高兴地看到，尽管我们国内曾发生了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接着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但不论国际国内出现什么情况，都没有动摇我们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江苏同全国一样，各级党组织在政治上始终保持与党中央的高度一致。我们的党更加成熟了。

正像邓小平同志在中顾委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说的，我们这些革命几十年的人，革命故事多得很。用我们党的历史和中国革命的历史教育人民，教育青年，这是另一个重大政治职责。返回江苏十多年时间内，我先后参加了中央和省、市、县党史部门组织的党史资料征集、编纂活动。例如，1982年5月在南京召开华东七省、市党史资料征集工作会议，谭震林、陆定一、刘瑞龙、刘晓等老同志，在江苏的有我和刘顺元、惠浴宇、管文蔚等同志，都参加会议，发表了意见。在1983年和1984年召开的全省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工作会议上，我遵循邓小平同志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对为什么要研究党史，怎样做好党史资料的征集研究工作，使之充分发挥“存史、资政、育人”的作用，更好地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等问题，讲了话。1986年3月，我赴京参加讨论编纂南方八省健儿坚持三年游击战争丛书的座谈会，回顾艰苦卓绝的战斗岁月，我即席赋诗一首：

时局风云几变迁，坚持苦战整三年；

光辉业绩千古颂，八省群英谱史篇。

当年10月，省委在海安隆重举行苏中“七战七捷”40周年纪念大会及苏中“七战七捷”纪念碑奠基礼，我与惠浴

宇、管文蔚、钟国楚、梁灵光、刘文学等同志参加了盛会。我还代表参战老同志，回顾战役经过和战斗情况，谈了自己对这个具有重大意义的战役的认识，以及从中吸取的主要教益，一是要善于根据形势的变化，适时转变工作方针和重点；二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情况出发作出正确决策；三是要继承和发扬艰苦奋斗、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推进当前的“两个文明”建设。

在此期间，我先后撰写了《威震江南敌胆寒》、《三到江南战敌寇》、《回忆十八旅开辟江高宝地区的经过》和《刚直无畏，功垂千古——回忆谭震林同志》等文章，发表了《谈苏南敌后抗日斗争》、《在纪念十八旅成立 50 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等。我还接受中央委托，担任了《谭震林传》和《回忆谭震林》两书的编委会主任。谭震林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是我尊敬的老上级、老领导。十年“文革”历尽磨难。他曾与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陈毅等老帅和李富春、李先念等几位副总理，坚决同林彪、“四人帮”作斗争，带头“大闹怀仁堂”，在党内外广为传颂。我主持编委会，在上海、湖南、江西、浙江、安徽、山东、江苏等八个省、市委和中央有关部门、南京军区的大力支持下，建立编写小组，进行深入采访，认真编写，经过近四年时间（1989～1992 年），终于在谭震林同志 90 诞辰之年（1992 年），出版了近 30 万字的《谭震林传》，得到中央的充分肯定和各方面的好评。

我还多次到革命老区，看望那里的父老乡亲，重温当年斗争历史，了解今日面貌变化。陈毅、粟裕同志 1938 年率新

四军挺进苏南，开辟茅山抗日游击根据地，那里也是我同王必成、钟国楚等同志率新四军十六旅坚持敌后斗争的地方。我在参观茅山新四军纪念馆时，把当年浴血奋战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历史巨变联系起来，写了《重游茅山》诗：

三峰屹立大江边，酷暑严寒任我眠；

一旦春雷惊梦醒，揭开云雾换人间。

江苏盐阜地区是革命老根据地。1941年"皖南事变"以后重建的新四军军部最初就设在盐城。刘少奇、陈毅、黄克诚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曾在这块土地上战斗过。1985年夏，我重访盐阜地区，看到这里面貌虽有变化，但经济发展还比较缓慢，同先进地区相比差距仍然较大，就向中顾委写了《开发治理盐阜地区的几点意见》，得到中央领导同志和江苏省委的重视。

我还到过湘赣老区，包括我的故乡平江。看到今日面貌巨变，回忆当年平江起义，我浮想联翩，即兴赋诗。诗曰：

昔到平江路不平，乾坤奠定是人民；

坚持马列春常在，遍地黄金遍地银。

回顾党的十二大以后，我定居南京以来，十多年时间内，中央、省委对我们这些老同志非常关心，还经常征求意见。我也无所保留地谈自己的看法。中央领导同志有一次曾问我：你做了几十年工作，有些什么经验？我早年投身革命，从湖南到江西，到江苏，算是个几十年的老兵了，经验不多，体会有一点。他问：几条呢？我说：不多，有十句话。他说，你要讲多少时间呢？我说，短则几分钟，长则十几分钟。

他说：你就讲吧！

我讲了当领导的十句话：第一，肚量要大，宰相肚里好撑船。肚量就是气度，包括听得进批评。没有肚量，缺乏气度，很难当好领导。第二，肩膀要宽，敢于挑担子。当领导不能好大喜功，更不能争功诿过。要有这样一种境界：成绩是大家的，缺点、错误自己挑起来。不要成绩是自己的，问题是人家的。第三，耳朵要硬，不能偏听偏信。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当领导既要注意听取各方面意见，包括反面意见，才能开拓思路，科学决策；又要在原则问题上不含糊，不动摇，不管刮什么"风"，耳朵不能软。第四，办事要公，光明正大。所谓"公"，就是待人处事不能有亲疏好恶、大小高低之分。出于公心，办事公道。抛开个人恩怨，公事公办，才能得民心，得人心，这是对领导干部的基本要求。第五，群众路线。这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干革命、搞建设，不走群众路线，任何事情都不可能办好。第六，民主作风。这是与群众路线相辅相成的。领导作风不民主，听不得不同意见，高压手段，霸道作风，当然不能服众。要搞"群言堂"，不搞"一言堂"。第七，调查研究。只有调查研究，才能情况明，决心大，减少失察和失误。第八，实事求是。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不虚假浮夸，这是与调查研究密切联系的。实事求是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任何时候都要坚持。第九，高瞻远瞩。人无远虑，必有近忧。领导者要站得高，才能看得远、想得深。既要看到现在，更要看到将来；既顾及局部，更顾全大局，才能立于不败之地。第十，谦虚谨慎。有了职位，有了权力，就越要谦虚，越要谨慎。这一条对于领导干

部尤为重要。

遵照十二大通过的党章规定，我与中顾委其他老同志一道，列席了历次中央全会，参与讨论中央关于经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的各项重大决策。参加了党的十三大，这次大会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引下，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制定了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还参加了党的十四大，这次大会以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的重要讲话为指针，进一步全面系统地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历史经验，把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写上了我们党的旗帜，引导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我的年龄在增长，心潮更是逐浪高啊！1990年我曾作了一首《八十寿辰抒怀》：

欣逢八秩寿延年，松柏长青傲九天。

六五征途如一日，披荆斩棘总当先。

历尽艰难年复年，为民奋斗闹翻天。

心怀马列心红亮，自我牺牲自觉先。

革命生涯不计年，党群恩育大如天。

晚晴荣享清平乐，传统精神誓永先。

党的十四大选举产生了以江泽民同志为总书记的新的中央委员会，决定取消中央和省一级的顾问委员会。我们这些老同志更加欣喜地看到，我们党顺利地实现了新老交替，确立了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中顾委作为一个过渡性组织，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用邓小平

同志的话来说，这是尊重生活和历史的辩证法。

党的十四大以来，中央和各级党委更加关心我们这些老同志。我的"顾问"头衔虽成了历史，但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的大事，仍时时萦绕我心头。有一次中央领导同志来江苏视察，征求意见，我曾突出地讲了农业问题。我说，中国有十几亿人口，吃饭仍然是一件大事。在新的形势下，农业为基础不能动摇。各级党委必须十分重视农业问题。中央领导同志赞赏我这些看法，经过深入调查研究，采取了加大对农业的投入和减轻农民负担等一系列措施。我和许多老同志一样，也十分关心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加强党的政治思想建设，提高干部队伍的素质，进一步加大反腐败斗争的力度，教育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弘扬党的优良传统，坚持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坚持不懈地同各种腐败现象作斗争。只要继续切实抓下去，我相信一定能进一步抓出成效。

现在，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指引下，全党上下，全国人民，坚定地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阔步前进。原定2000年比1980年翻两番的目标，已经提前实现。我们国家的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都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我晚年荣享清平乐，满怀信心看未来。衷心祝愿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九五"计划和2010年的远景目标而艰苦奋斗，开拓创新，夺取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更大胜利！

后 记

本书记述了我投身革命、为党工作的主要经历，回顾了从1925年直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党的直接领导下，我先后七十年为实现共产主义伟大理想而矢志不移，团结奋斗，以及在各个革命阶段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具体实践，故取名《七十年征程》。

在具体回顾中，我努力遵循邓小平同志倡导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和"一分为二"的方法，力求辩证地分析问题，正确地对待有关的历史事件和人物；特别是对我本人经历的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在充分肯定党领导下取得伟大成绩的同时，也不回避实际工作中出现的某些缺点、失误，其目的是为了"以史鉴今"，有助于我们吸取历史经验，把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搞得更好。

中共江苏省委、省人大、省人民政府、省政协的领导同志十分关心本书的编写工作。省委办公厅、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省档案馆和南京市委党史办公室等单位，在本书编写过程中曾给予多方面的帮助和支持。由于组织上和同志们的热情关心、支持、帮助，使我在有生之年能比较顺利地写

成这部书稿。我谨向他们致以由衷的谢忱！

由于时间跨度长、涉及范围也比较广，本书从酝酿纲目到形成文字，经历了五六个春秋，并曾数易其稿，反复补充、修改，最后写成这样一部书稿。先后参与和协助史料搜集、整理工作的，有叶绪昌、戴蔺、陈鸿祥、张衡、陆纪林、施正东、司锦泉、邹嘉南、常浩如、徐建华、许荏华、颜鸣等同志。为了确保书稿质量，由陈鸿祥同志对全书文字作了统一加工润饰，并认真审核全稿内容及有关史实，务求准确无误；叶绪昌、戴蔺同志帮助审稿把关；陆军同志主持了出版协调工作。我一并向他们表示感谢！

我还要感谢江苏人民出版社的领导以高度的责任感，投入了精干的编审力量，加大了工作的力度，在编辑、出版方面做了大量而细致的工作，保证此书能及时与读者见面。

江渭清

一九九六年七月